



中國百年史鑒

(1921-2021)

三英 著



禁書，让它更能傳播
真相，讓暴政轰然倒下
特別獻給所有炎黃子孫

版权说明

中文名：中国百年史鉴

英文名：China History 100 Years

This book in Chinese outlines China History for 100 years from 1921 to 2021 with commentary.

请从授权经销商或出版商购买

Order this book from authorized retailers or publishers.

Other titles of the author are available at major online book retailers.

版权声明

©Copyright 202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written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版权所有

Author Credits: Three Heroes

美国或澳大利亚印刷

Printed in Australia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国际版书号 ISBN: 978-0-6451796-1-3

大十六开版 字数：825,926 字 内页：850 页

上卷 民国风云（1921-1949年）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立.....	001
第二章 孙中山革命未竟身先死.....	024
第三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	045
第四章 蒋中正的崛起.....	058
第五章 陈独秀被免除中共中央领导权.....	075
第六章 蒋中正统一全中国.....	090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	103
第八章 中共苏维埃红色政权.....	118
第九章 民国政府五次围剿中共苏区.....	141
第十章 中共西逃之长征.....	160
第十一章 中华民国之新生活运动.....	180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	201
第十三章 日军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	221
第十四章 中国抗日战争.....	234
第十五章 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	263
第十六章 重庆陪都时期.....	280
第十七章 国共内战.....	298
第十八章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	326

下卷 中共乱国（1949年-2021年）

目 录

第十九章 中共政治协商之骗局.....	338
第二十章 中共参与朝鲜战争.....	358
第二十一章 中共入侵新疆和西藏.....	372
第二十二章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391
第二十三章 大鸣大放跃进.....	408
第二十四章 三年大饥荒时期.....	428
第二十五章 中共恶斗之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	447
第二十六章 四清运动 毛刘矛盾公开化.....	466
第二十七章 中苏交恶.....	482
第二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494
第二十九章 刘少奇之死.....	519
第三十章 林彪之死.....	532
第三十一章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545
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之死.....	558
第三十三章 拨乱反正.....	571
第三十四章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583
第三十五章 六四事件江泽民上位.....	602
第三十六章 一切向钱看.....	621
第三十七章 以贪治国 以黑治国.....	638
第三十八章 通向世贸之路.....	656
第三十九章 人心向善 道德沦丧.....	671
第四十章 胡温时期.....	701
第四十一章 薄熙来政变.....	737
第四十二章 习王反腐.....	755
第四十三章 习近平倒行逆施.....	778
第四十四章 中共在亚太和西方的渗透扩张.....	796
第四十五章 郭文贵爆料革命.....	820
第四十六章 中共末日疯狂.....	845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评说：乾坤朗朗，日月照明，大道之行，教化众生，止于至善。自三皇五帝到历朝历代，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华夏文明，延绵不绝。从司马《史记》起，二十四史，述秦皇汉武、唐宋宗道、明清崇德，纪事本末，历历在目。

华夏先祖，有巢、伏羲、神农、黄帝，垂范天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老庄孔孟，乃至诸子，兼收并蓄，百家争鸣。儒释道三教，如三光丽天，亘古而长耀。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风刀霜剑，铁骨铮铮；李白、苏轼、李清照、曹雪芹，心怀激荡，文采飞扬。

黎民百姓，芸芸众生，为衣食经济思虑奔忙；凡夫走卒，终日营营，共争不急之务。纵然世风日下，道德日衰，千百年来，国人仍存向善之心，知晓天道昭昭、因果报应、善恶分明。纵然朝代兴衰，封建更迭，社会仍然追求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普天之下，从黄河到长江，自昆仑至泰山，依然寒来暑往，春生秋长。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本是东方强国的土地上，西方列强早已蜂拥而至，蚕食瓜分，半壁江山沦为半殖民地；四万万国民，被污蔑为“积贫积弱，实如东亚病夫”，毫无抵抗之力。无数仁人志士，为求思想自由和民主共和，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中国人最终选择走上了邪路。自中共诞生以来，以马列立党，背负圣教，数典忘祖，宣暴力革命，尚阶级斗争。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善？何为恶？全部颠倒。何为家、何为国？何为伦理纲常、公平正义？统统泯灭。共产党用事实来证明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机器，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其假丑恶从成立之日起就被掩盖了起来，欺骗了世人满一个世纪。

呜呼！毛泽东是世界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胸怀远大，却因其帝王思想和深谙马列主义的斗争精髓而成就了希特勒屠夫式的霸王伟业。其他一千无知而傲慢的共产党人，本来亦胸怀救国济世之志，却着了邪灵附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助纣为虐，乃至杀盗淫妄，堕入万劫不复之魔道。

百年中国，从此红魔乱舞，坏了天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表宣统帝退位诏书，标志着延续了2132年的帝制结束。

1913年4月8日，巴西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民国，秘鲁紧随其后。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日，古巴、墨西哥也正式承认。10月7日，沙俄和英、法、德、日、意、比利时、瑞典、丹麦、葡萄牙、荷兰、奥地利、西班牙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评注：沙俄对中国北方领土一直虎视眈眈。早于17世纪，俄国已极力向西伯利亚扩张，并与清朝发生冲突。清俄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立边界，但这并未阻止俄国的野心。1858年5月，俄国乘英法联军与清政府开战之际，以武力威胁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璦琿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1860年俄国逼迫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更把整个外满洲吞并，并获得不冻港海参崴，以扩展其于西太平洋的影响。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1895年2月，清军溃败，清廷被迫派李鸿章代表清廷向日本求和，并以战败国身份在日本威逼下签订了条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此事严重威胁到俄国意欲侵占中国东北而取得远东不冻港的战略意图，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与清政府签订《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将中国东北不少权益拱手让予俄方，以寻求俄国的“保护”以抗衡日本。俄国因此租借旅顺港；1897年12月，一支俄国舰队进驻旅顺港，并在当地修筑防御工事。根据约定，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便于俄国运输军队。在1897至1903年间，俄国与清政府在东北建造了一条由哈尔滨通过沈阳到旅顺港的东清铁路。

俄国势力渐渐扩展至朝鲜半岛。在1898年，俄国已经取得图们江及鸭绿江附近的矿场及森林，此举引致日本的不安。因应俄国威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与俄国修好，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俄国谈判，他认为日本并未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对抗俄国，所以他提议俄国控制中国东北以换取日本控制朝鲜半岛。俄国拒绝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并进一步要求以朝鲜半岛39度设立两国间的中立缓冲区。

1900年，义和团拳乱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尼古拉二世趁机派军，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由，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展开入侵和屠杀，导致近万人死亡，紧接着再入侵大清顺天府占领满洲。义和团事态过后，俄军仍有十万驻守东北，实际增强了沙俄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日本请求英、德等方出面要求沙俄撤军，迫于外交压力沙俄于1902年4月与清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分阶段撤兵满洲，但拖延到1903年还是未有撤军时间表。同年4月18日，俄国更向大清外务部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含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在满洲扩张的条款。俄军重新出兵占据沈阳，俄国沙皇设置“亚东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统治满洲。在接到沙俄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当局便与沙俄交涉要求俄军撤退遭拒，到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日本逐步出兵，意图迫使沙俄放弃扩张。2月8日，日本海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攻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俄国战败，日本不但夺回了辽东半岛和旅顺港，还把俄军赶出了东北。

1911年12月1日，在沙俄支持下，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向署理库伦大臣三多发出通牒，限其三日内离境。第二天，沙俄军队与外蒙叛乱武装包围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将清军全部缴械。16日，外蒙古部分王公僧侣在沙俄支持下，由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

12月9日，中俄两国在齐齐哈尔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1,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国占去。

1912年1月，沙俄强占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2月4日，沙俄军队强占满洲里，清军因兵力不足退出。4月14日，袁世凯电令陆征祥向俄国声明，外蒙之事如不经过中国政府承认，一律无效。

6月1日，沙俄军队借口保护侨民，入侵伊犁。6月24日，新疆和田县策勒村发生中俄流血冲突。沙俄籍此派兵入侵喀什噶尔，要求赔偿。袁世凯政府以支付赔偿费和惩处中国有关官民了结此案。

7月8日，日俄第三次订立密约，划分内蒙势力范围。10月，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分兵两路入侵内蒙古地区。11月3日，俄国密使与外蒙古库伦当局代表签订《俄蒙协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11月9日，俄国公使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1913年2月16日，俄国军队1,200人入侵海拉尔，并驱逐当地居民。7月6日，俄国以俄报记者在齐齐哈尔被殴为由，派兵3,000人进驻齐齐哈尔。

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字互换《中俄声明文件》，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1915年6月7日，库伦活佛哲布尊巴丹宣布取消外蒙古独立。同年11月6日，中俄订立《呼伦贝尔条约》，中国承认呼伦贝尔的特殊地位及俄国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苏俄政府。反对势力组成白军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俄国内战随即爆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北京政府段祺瑞内阁追随协约国的外交政策，拒不承认苏俄。12月26日，中国当局出兵镇压俄国革命党人在哈尔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1918年1月14日，北京民国政府派军队封锁中俄边境，阻绝中俄交通，以防范思想过激的共产党人。2月，苏维埃政府公告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3月10日，北京政府电令绥远、察哈尔都统派兵驻蒙，保护库伦。3月15日，被苏联红军击溃的哥萨克军队纷纷逃窜至黑河地区。3月19日，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奉系与苏联红军达成协议，苏联红军不侵犯中国边境，中方不支持谢米诺夫的白俄军队。4月5日，民国政府海军部派军舰至海参崴，并由吉林派陆军前往。海容号军舰9日从上海出发，17日抵海参崴。1918年8月24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将结束，北京政府发表《海参崴宣言》，宣布中国将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

评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十月革命在动乱中的圣彼得堡爆发。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7月16日深夜，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家族被赶至一废弃教室内，红军士兵架起机关枪将他们集体处决，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

1918年到1922年在崩溃的沙俄帝国境内发生内战。在十月革命发起的时候，旧的俄罗斯帝国军队被解散，志愿者组成的赤卫队是布尔什维克主要的军事力量。四分之三的红军军官由前沙皇时期的军官组成。苏联红军与保皇党等组成的白军，以及波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14国的派遣军展开一系列的战斗。当时旅俄华工20多万人，俄国内战期间至少有5万中国人参加了红军。内战结束前，红军总兵力550万人。

内战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战争总共造成30万人被杀；红色恐怖期间惩治反革命，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就地处决了“阶级敌人”至少25万人，据估计死者有一百万人以上。沙俄分裂期间，芬兰、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成为主权国家。

内战末期，苏俄被耗竭且近乎毁灭。1920至1921年的干旱以及1921年的饥荒使灾难更为严重。疾病大规模流行，仅1920年就有3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一百多万人还死于大规模饥荒、交战双方的大规模屠杀和乌克兰和南俄对犹太人的迫害。1922年，世界大战和内战将近10年的破坏造成俄国有至少七百万流浪儿。

苏联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吸收其他小国家成为加盟国，定国名为苏联。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介绍和颂扬俄国十月革命。

列宁的新政权为了得到更多外国政府的支持，乃向中华民国示好。7月4日，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宣布，俄国将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所有掠夺品，并表示中东路是中俄两国人民的财产，中国可将其提前赎回。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员委员齐切林复函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领袖致敬。

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发表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新纪元》，称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每周评论》和《国民杂志》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3,000余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强权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第二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5月4日被捕的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援北京学生斗争。五四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

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5日，《新青年》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

评注：有史学家认为，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这是一家之言。

其实，正是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首先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暴力革命，自觉而明确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才有了今

日共产乱国的百年历史。其他四万万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只是被动接受或成为其帮凶而已。这种自觉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当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见一斑。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时期，1917年前后形成规模，“五四”后达到高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运动。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陈毅、邓小平等进步青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理论与方法，自愿自动而积极地走上了留学法国的航程，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

蔡和森是其中的先驱。1920年2月，蔡和森抵达法国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近似疯狂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且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详细的叙述：“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并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底，或能成就。”蔡的夫人向警予更加激进，她在留法勤工俭学女生中，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

赵世炎赴法后，很快就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抱有任何幻想，“务要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主张脚踏实地去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是张申府，他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最早酝酿建党的三人之一。1920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党的北京支部成员张申府，负责建立党的巴黎小组。张申府于同年12月抵法后，随即着手筹备建党工作。1921年1月和3月，分别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

1919年，陈独秀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送到法国留学。他们还只是19岁和17岁的学生，陈独秀就想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了。邓小平的年龄更小，只有16岁。邓小平为了维持生活，还曾经在蒙达尔纪的胶鞋厂、雷诺的汽车车间和巴黎的车站、旅馆辛苦打工。

1922年6月下旬，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等18人，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举行了旅欧

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张伯简为组织部长。

当时在法国的华工就有十八九万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多达 2000 余人，一般都是家境比较优越的人，以四川、湖南、河北人最多。

法国是世界民主自由的发祥地，但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抵抗德国一直与俄罗斯帝国交好，并深受其影响。马克思是犹太裔德国人，因批评德国政府受到排挤，长期生活在法国巴黎。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在法国选择了共产主义，选择了与暴力的魔鬼为伍，这不是无知而被动的，而是幼稚而自觉的。

人生就是不断地选择，我们选择了怎么样的道路，就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中国这一群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选择当时欧洲人正在追求的议会选举、民主政治，人权博爱，以及如何维护人的尊严；而选择了大多数人要丢弃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

7 月 25 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废除在华特权和一切密约。

11 月 19 日，列宁接见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1 月 22 日，外蒙古取消自治。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公布外蒙政府、王公喇嘛的联合请愿呈文，正式发表外蒙古王公已决定取消自治的消息。8 月 14 日，外蒙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决心取消自治，服从中央，随即向中国驻库伦代表陈毅转达了这一决定。

1920 年 3 月 26 日，苏俄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正式收到苏俄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宣言》称：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缔结的一切密约；把沙皇政府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别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庚子赔款；废除一切特权。并建议中国政府立即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关系。

5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同北方的李大钊相约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8 月，列宁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考察东方革命运动情况。8 月至次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均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对。11 月 2 日，列宁接见北京政府派赴苏俄的专使张斯麟。11 月 7 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

评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共产主义激进分子鼓动革命浪潮，得到孙中山的肯定。他们所谓“启蒙”“救亡”的爱国热情，压倒了胡适等尊重传统文化的微弱声浪，导致共产分子走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台。

五四运动以后的半年内，全国涌现出约 400 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和艺术。各种社团组织纷纷建立。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加速社会基础的分化。

孙中山在广州大学演讲民生主义时批评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

蒋介石说：“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实在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评说：天下大势，人心所造，应天而变。《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一出生就是血液里沾满了邪恶的幽灵，它在欧洲游荡，经俄国来到中国，从此为人类带来灾难。

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就是反人类而生的。马克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鼓吹其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所谓的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消灭所谓的资产阶级。因此，共产主义的血液里，一开始就沾满了杀人的基因。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还宣称要消灭有产者的家庭。共产党人因此成为一伙只有党性而没有人性的畜生之类。马克思还无耻地说，“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不但如此，马克思主义还要消灭这个世界上的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制。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灾难。马克思说，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他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呜呼！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华夏大地的传播，悲哉华夏！习近平说“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共产党吸人血的幽灵。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开始可能只是一时狂热，但是邪灵入体，即可丧失人性，心中不安。正如被这个幽灵困住的毛泽东所说，“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从此中国人民真正进入了相杀互害的百年大灾难时代。

1919年12月，北京民国政府发表1919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数为427,679,214人。1920年发布台湾地区普查总人口为3,654,388人。

1920年春，杨明斋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人领着俄国人来北京面见李大钊。

杨明斋本是山东平度县农民，十九岁（1901年春）被迫闯关东后进入海参崴谋生。1908年在西伯利亚做工人期间，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1917年，在苏俄临时政府外交机关当职员，十月革命前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被保送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他被派回到日本占领下的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从事秘密活动。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中国了解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南亚书记处。杨明斋作为维金斯基的翻译兼助手一同来华。到达北京后，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找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的李大钊。双方在北京多次会谈，取得了建党的共识。

5月，经李大钊介绍，杨明斋陪同维金斯基转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交流，并取得了共识。他们还参与了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等 20 余人。8 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1919 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提倡白话，一直受到很多批评。陈独秀常常嫖妓，还有流言说陈独秀嫖妓闹出风波，因为争风吃醋挖伤某妓女下体泄愤，北大人批评他“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陈独秀在五卅期间于 6 月 12 日散发传单被捕，辞去教授职位，出狱后不久离开北京去上海居住。

为了方便开展活动，杨明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租赁了一幢二层楼房。7 月，杨明斋在此开办中俄通讯社。8 月，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22 日，杨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 月，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杨明斋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都设立在这里。上海外国语学社于 1920 年 9 月 30 日开始招生。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都在这里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20 余人经海参崴赴苏联勤工俭学。

9 月 1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中称准备组建的政党为社会党。同年 8 月 13 日和 9 月 16 日，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并且首先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此他在考察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后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与在北京的李大钊也通过信函讨论党组织名称问题，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政党的名称。

大家一致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蔡和森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十分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斗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洋留学，但是他是马列成绩最好的留学生。

1921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给蔡和森以及其他留法同学的信中说：“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一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

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

蔡和森告诉毛泽东，中国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来建设党。共产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对于党员的条件，认为必须“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党员必须联系群众，应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可以说，蔡和森是毛泽东真正的马列老师。

作为湖南老乡，蔡和森和毛泽东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有很深入的交流。蔡在信中还分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组织步骤：

（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这些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蔡和森为建党而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他提出的观点，毛泽东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陈独秀也十分重视这些观点，认为蔡和森“所说的问题甚大”。

评注：二十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成了马列主义共产党试验革命的理想土壤呢？这是中国人的劫数，也是中国人的性格特质所造成的。

在中共的历史书中，清朝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事实上，清朝总体来说，仍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朝人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最高，乾隆时期达到三亿。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量在世界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按照 1990 年美元价格计算，1820 年清朝 GDP 总量为 2286 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 32.9%，仍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均 GDP 为 600 美元，高于西欧国家人均的 427 美元，而且藏富于民，不是个贫穷国家。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1917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4等。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元，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助教月薪50~120元。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元；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银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月薪300银元；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月薪240银元；徐志摩当时在上海同时兼着三个大学的教授，还平时做一些兼职，如翻译、写评论、发小说等月平均收入约600银元。普通教授一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一栋很好的房子。191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是三进大四合院，花费了4000银元。

林语堂从美国和德国留学后，于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同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这时，他开始用英文写作《吾国吾民》，谈到中国人的性格，引起了西方人广泛的兴趣。

林语堂说，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总的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我没有将“诚实”包括在内，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诚实的。中国商人的所谓诚实只不过是本土办法做生意的副产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产物，如果把他放到一个沿海城市，他就会大大失去那种纯朴的诚实，变得与华尔街的股票买卖经纪人那样不诚实。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没有把“诚实”当成中国人的性格，林语堂是对的。老实人吃亏，这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教训，每个中国人都懂得。试问，有几个中国人是诚实的呢？诚实的人，在中国活不好，也活不下去。而这恰恰是民主、自由社会最需要的特质。很多中国人的美德，本身就是恶习，比如老谋深算和老奸巨猾是同一个意思，幽默滑稽和装疯卖傻是同一个意思。消极避世、知足

常乐和因循守旧只是一部分人的性格，可能还是小部分，或者特指中老年人。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追求，或精神意淫，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中国人能守住孝道已经很难得了。仁义之于利益，表面上看是根正苗红，但很难在现实的生命中扎根，可能更多的只是影子而已，是影子随行罢了，没有落到人们的现实性格里面。相反，奴性比仁义有更多的表现。

1920年7月，上海美专延聘裸体女模特陈晓君，成了爆炸性新闻。此时，“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虽然著名画家刘海粟因裸体画被批“禽兽不如”，但一股崇西方之风已经扑面而来，谁也阻挡不了。到了1921年，中国大城市全部开放女禁了，上海尤领风气之先。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不但开设西洋画班，还真正进入了男女同学时期。美专的女生们与男生一起旅行写生，一起画男女裸体模特，其社会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几千年的道统再也束缚不住国人求变的性格了。

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以“巴人”的署名连载，该小说极大地震动中国文坛。阿Q的形象和性格正是无数愚昧国人的样板子。但是，不管清末民初国人如何愚昧，当时的中国人还是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应该说，这种自由是从民族的根子上来的。中国人的性格是多样性的，南北东西各有差异，由于历史的沉淀，都有其劣根性。比如胡适追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迪者。他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代表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他又是注重实践的，所以他没有抵触外来思想在中国的试验。胡适还称赞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共产党和参加国民党都是同一类性格的人，只是他们的人生际遇各有不同而已。正是这样同时具有劣根性和包容性的土壤，才使得马列主义有了生存的空气，让其把劣根性中之恶演绎得淋漓尽致。

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不要中老年人，他们需要年轻的空气，他们连45岁的何叔衡都嫌弃太老了，不想让他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只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受欢迎，因为他们思想不成熟，叛逆，容易冲动，而有愿意尝试新事物。同时，他们有气有力，能打能杀。年轻人可塑性强，能培养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才是共产党需要的。

人之初，其性本无善恶。一旦为了生存而奋斗，甚至在残酷的斗争中，人性之善恶才渐渐被激发出来了。不管是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共产党，人性之初，都是一样的。但是共产党的精髓把人变成了魔鬼，这恐怕是当

事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身上被注入了一种新的邪灵基因，从而激发了其人性之中之极恶，而且欲罢不能。而这种邪性之恶，在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性尊严的制度中是可以避免的。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人代表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杨明斋和陈独秀受邀参加并被聘为荣誉会员。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人们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秋天，杨明斋还回家乡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谈，推动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但两人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创性的革命行动，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

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评注：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乳名“石三伢子”。父亲毛贻昌，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在湘军当兵多年；善于经营，由贫农变为中农，后又贩卖稻谷，成为富农；他性情暴躁，对子女严厉。母亲叫文素勤，俗称文七妹，不识字，心地善良，慷慨厚道，虔诚信佛，吃观音斋。

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坵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家四世同堂，务农为业，生活富裕；毛泽东同表兄弟生活，6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

8岁时，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冲的私塾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先后有6个老师教过他《四书五经》等，培养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10岁这年，毛泽东因为逃学不敢回家，又害怕父亲责打他，便往湘潭县城跑，跑了三天，才跑出8里路，就被家人找到带回。13岁时，毛贻昌在饭桌上骂毛泽东懒惰无用，两人当着客人吵了起来，随后毛泽东离家出走，毛泽东到一池塘边寻死威胁父亲。

14岁时，老师李漱清送给毛泽东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支那瓜分之命运》，书中提到“呜呼！中国其将亡矣！”16岁，在东山小学，有留学日本归来的教员，他经常和毛泽东谈起大日本帝国的革新。同年，父母安排毛泽东娶了比他大四岁的远房堂姑之女罗一秀。

1911年春，毛泽东经老师介绍，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校期间，他读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还有黄花岗起义的新闻。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去武汉加入革命军，但后来改变主意，就近加入了长沙的湖南新军，当了半年的兵。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毛泽东只读了6个月就退学了，但他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广泛涉猎欧美的文史地理知识，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1913年春，毛泽东开始认真思索前程，认为最适合于教书，同时因父亲不同意他自修，拒绝供给费用，生活十分困难，于是考入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他在师范留下笔记，勉励自己“修身、奋斗、朝气”。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了5年书，他结识了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和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罗章龙、李立三等同学。1915年当他看了《明耻篇》以后，义愤填胸，挥笔在书上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杨昌济推荐毛泽东看胡林翼（字润芝）的《胡文忠公全集》，毛泽东阅读后改字“学润”，经杨昌济建议改字“润芝”，也写作“润之”。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经常爬岳麓山，在湘江游泳。他写了一副对联“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来表达自己的志向。1917年，毛泽东受到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和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瓚、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之青年离长沙去北京。送别留法同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9月2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写的信说：“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

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

10月，经已经调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月薪8块银元。此时，毛泽东开始追求杨昌济女儿杨开慧。

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中途经过曲阜，瞻仰了孔子故里，并且登了泰山。到了浦口后，毛泽东身无分文，而且鞋子被盗，幸亏一个湖南的老乡借钱给他，才到达上海，4月6日回到长沙。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联系新民学会会员交换看法，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毛泽东此时认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在《新湖南》发表文章鼓吹改革。他在《湘江评论》创刊时鼓励罢工，要用“打倒”的方法对付强权；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又说：“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关于成立女子革命军，毛泽东说：“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什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弊？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毛泽东还写“湘江杂评”说：“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雷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雷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第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1920年1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信给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写给湖南的同学“淳元”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人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及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动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毛泽东说他要办的自修大学有别于传统的书院和学校，是平民主义的大学，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

1920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9月13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毛泽东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毛泽东号召说：“湖南人呵，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旅居法国之向警予：“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音绝少……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0年9月11月26日，毛泽东给同学“荣熙”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种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

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

这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结婚地址是一师附小主事室，证婚人是楚怡校长陈润霖，主婚人是一师校长易培基；而他的父亲毛贻昌因为伤寒逝世。

1921年6月，毛泽东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奔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

当时，除了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外，各地还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包括上海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1921年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后，杨明斋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达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杨明斋与张太雷一起，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筹建工作。6月，与张太雷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袁世凯1916年6月去世后，中国社会局势持续动荡，军阀割据延续了十三年。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河北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安徽段祺瑞为首的皖系。1920年7月14日至23日，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在东北张作霖奉系的配合下打败了皖系。自此，直系和奉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设立东三省航空处，正式开始组建东北空军。1921年1月，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各地苏俄共产党宣传机构。

晋系军阀以山西为根据地，由阎锡山于辛亥革命之际创立，曾因拥戴袁世凯洪宪称帝，和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唐继尧、龙云、蔡锷为首的滇军集团，占有云南、贵州两省。川军内部的派系繁杂，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湘等人各据一方，其中势力较大者为刘湘。

袁世凯死后，两广宣布独立，两广割据成为南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1916年至1920年，粤系由当地军政人物领导的军政集团主政广东。1920年，孙中山指挥驻于闽南漳州的粤军陈炯明、许崇智等部，进攻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因驻广州之魏邦平、李福林两军倒戈，致使桂军失败，全部退回广西。1921年，旧桂系投靠北洋军阀，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旧桂系再败，陈炯明粤军攻入广西，瓦解了旧桂系政权。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开始崛起。

1921年2月19日4月7日，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实权在陈炯明手上。

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是一位体格强健、雄辩自傲的荷兰人，演讲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是个坚定的共产斗士，深受列宁赏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

马林曾经前往荷属东印度和印尼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4月20日，马林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赴中华民国的签证时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荷兰警方向各国警方通报，各国警方均密切关注其动向。5月7日，马林以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身份，从亚丁登上阿奎利亚号客轮，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皆受严密监视和检查。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到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化名安德莱森。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均已提前获知共产党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对马林实施监视。

包惠僧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之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建党事宜。陈独秀说：“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后来，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资助要求，并且具体确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通常莫斯科将款项先汇至哈尔滨的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而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6月，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团队展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发给每位参会代表一百元路费。

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会议，但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南方政府广东省教育厅长，不适合出席会议。李大钊在北京被打住院。而北京大学哲学系刘仁静后来回忆说，由于对中共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参加会议。当时在法国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也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议。45岁的何叔衡因为年纪偏大，被几位主要代表认为是“老夫子”不适合出席，在开会之前返回长沙。

7月23日晚，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这一幢名叫李公馆的石库门房屋，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由108号和106号两栋房屋打通而成，他的弟弟李汉俊住在106号楼上。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命案，法租界巡捕房到处搜寻凶手。早已监视马林行踪的法租界华人探长程子卿发现周公馆有人正在用外语发

言，遂闯入会场探查。只见一名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那人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说：“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后退出去。马林警觉起来，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程子卿返回霞飞路葛罗路口捕房汇报，派遣巡捕前来搜查。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周公馆。陈公博在发生该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写道：“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的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篋，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陈公博后来补充说，“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法籍警官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后，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这次搜查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会议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部分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西湖开会。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下，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由她提前在嘉兴安排会议事务。

8月2日，王会悟与部分代表等先行乘火车抵达嘉兴。她为会议在烟雨楼前预租了一艘丝网船。次日，其余代表乘火车抵达嘉兴，由王会悟接站、登船。他们佯装成游湖的客人，在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马林、尼克尔斯基以及李汉俊、陈公博未前往南湖参加闭幕会议。

8月3日上午阴雨，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晚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共产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官方说，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评注：李大钊曾评价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杨明斋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中共一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杨明斋没有见证这一切的发生。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后来杨与陈独秀因国共合作问题产生分歧，杨反对国共合作，于是离开广州，到上海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假利券》，再到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1925年夏，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0月，杨明斋受共产党委托，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并亲自率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人前往苏联。之后杨明斋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担任校长，杨明斋与之产生分歧，于是提出回国。

离国多时的杨明斋已经被边缘化了。他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他先是居住在北平一个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他在那里写作5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后来，他后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完成了全部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但是没有人重视他的粗劣作品。杨明斋象一头歇驴，此后失去联络，再未见诸中共档案。

实际上，杨明斋辞去教职后偷偷进入西伯利亚，想东山再起，准备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但被苏联政府逮捕。

1931年，杨明斋以叛逃者身份被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流放期间，他仍不死心，曾写信给张国焘请求帮助，但张国焘此时已经离开苏联。当时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等人没有理会过他，只有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

的师哲看望过他。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任职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处决。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呜呼，悲哉！这是百年以后无数共产党人经过伤痛后才体悟出的真理，但是这个悲剧从此刻就开始了。正是：

青年不更事，误入红魔窟。闯关东，征途跋涉，不知身是客；虽有坚胆，傻冒飘零杨柳风。莫斯科，红魔都，郊外晚上鬼狼哭。八千里，征途路，多少华夏儿郎敢赴死。梦里明明求善果，踏遍青山，一片空无。山东老母，泪眼望穿，吃斋念佛等汝归。我儿啊！一生辛苦，换来孤坟草亦枯。

杨明斋的付出，换来中共建党。中共把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并没有忘记。性格暴躁、思想叛逆的陈独秀成了第一任中央书记。而同样可悲而可笑的是，陈独秀最后被开除党籍，在监狱里度过余生。1927年，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因被北洋政府指控其里通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被捕。国民政府多数将领主张立即正法，蒋介石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北洋政府督军统帅兼代理总统职权的张作霖乃判其绞刑。历史就是如此真切，无容篡改。呜呼，哀哉！

第二章 孙中山革命未竟身先死

北京碧云寺是一座幽静的寺院，是香山最美的一座古刹，一座布局完整、庄严典雅的园林式皇家寺院。院内的金刚宝塔建于清乾隆十三年，高耸挺拔，清凉的汉白玉石装点这肃穆的气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其灵柩停于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达四年，根据其遗愿，1929年5月才移葬南京中山陵。

评注：革命和改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广泛流行的政治词汇。孙中山首先是革命家，在国家建设上又有改良的思想。为了拯救中国，他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于此，孙中山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生如一。

致力推翻清朝政府是一项极其凶险的事业。为了摆脱通缉或隐蔽身份，孙中山使用过大量化名和笔名。在族谱上，他名叫德明，幼名帝象，象其家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北帝庙之北帝。他1866年11月16日出生在这里，13岁随母到美国夏威夷投靠兄长孙眉，在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

孙中山对岭南大学的学生演讲中说过：“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所以现代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上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地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孙中山是一位有道德的人。他从小有革命志向，仰慕太平天国，反对清政府的腐败。赴檀香山后，喜阅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传记，希望用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在教会学校，他选择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回国后，孙中山先后在美国长老教会海外基督使团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学校和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学习，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藉医术掩护其革命活动。他在广东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阐述救国主张并要

求接见被拒。1894年11月24日，28岁的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现代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0月，兴中会计划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泄密而流产后，孙中山经澳门转香港逃亡日本。

1896年6月至9月，孙从檀香山到美国，向华侨宣传革命，在旧金山设立兴中会分会。之后，孙中山辗转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和东南亚宣传其革命主张，联络策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监视和追捕。1899年10月11日，兴中会、洪门、哥老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三合会随后加入，公推孙为总会长。

广东华侨多称孙中山为“孙大炮”，其在海外煽动革命之情，有乱天下之才，听信者众。上海《申报》斥“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举国皆骂孙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孙中山到美国宣传革命并筹集捐款时，有侨胞在旅馆给他租了一间房，但他不肯去住，而住在侨胞洗衣作坊的一间小屋里。他对侨胞们说：“这屋子既然侨胞们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呢！把花用旅馆的钱用到革命事业上岂不更好？”据美国洪门会首领司徒美堂老人回忆，孙这次在美国共筹款15万美金，可“他自己却是不名一文的人”。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犬养毅还曾如此评价孙：“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1905年7至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发表演说时，会场爆满，后来者犹络绎不绝，有逾700名学生云集在大厅内，许多学生不得其门而入，门外拥挤不通。

从1905年至1911年春，孙中山先后发动八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11年1月，孙中山委派黄兴筹备广州起义。初定起义日期为4月13日，但由于武器装备尚未到位、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策应起义的新军大部即将退伍等多种原因，起义时间最终被推迟。4月23日黄兴赶赴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起义原计划配合新军、巡防营和巡警队，分十路进攻夺取广州城，并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革命。由于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悬

殊，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大批革命党被捕牺牲。后收殓到 72 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称这场起义与武昌起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孙中山为了他的民主革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1905 年 8 月 13 日，时任华兴会骨干的陈天华在日本称赞孙：“有失败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讴歌之。英雄而失败也，人哀吟之。若夫屡失败而将来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则世界之视线集焉。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申报》刊载一篇时评称：“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规定称：“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

2 月 12 日，清廷下诏宣统帝逊位，诏书文本由南京方面草拟，再传给袁世凯。孙中山为避免内战妥协，第二天向临时参议院辞任临时大总统，并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为防袁世凯野心，参议院发布《临时约法》，特设责任内阁制，强调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袁世凯在面对国民党大选胜利威胁他的地位后，准备发动与国民党的战斗。1913 年 5 月 6 日和 15 日，袁世凯先后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用兵计划。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发动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势力，但最终失败。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入党者必须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发誓为救中国危亡而舍身命和自由权利。

当时革命党内多人反对孙中山独裁。宋教仁说：“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言：“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徵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5 月 9 日，北洋政府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震怒。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尽为袁军所消灭。袁世凯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国民党既失其武力，其在议会及舆论之势力，亦受压迫。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至此仅存中华民国之四字矣。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致书日本外务省大臣，向日本政府承诺优于二十一条要求之权利让渡。

之后，孙中山是明确表示要废除日本二十一条的。他1920年8月5日在上海太平洋社欢宴美国议员团的演说说：“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孙大炮有时灵活得象条变色龙。

1915年10月26日，宋庆龄离家私奔孙中山，在东京由日本律师和田瑞作证，两人结婚。宋庆龄之父宋嘉澍闻之大怒，不能谅解，宋嘉澍夫妇追到日本。据日本人士回忆：宋嘉澍在大门口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出来后，宋庆龄的父亲突然往地上一跪，磕了几个头说：“我不懂事的女儿就拜托你了，请千万多关照！”之后转头就走。

孙中山和宋庆龄还缔结婚约誓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多次劝进袁君主立宪制的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迫取消称帝。6月6日，袁世凯病重逝世。

袁世凯逼宣统帝退位之后，延续清朝的尊孔，1912年9月20日，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儒家伦常。1913年6月22日，袁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1903年起，袁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工业方面，袁世凯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

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袁世凯虽然想复辟帝制，但他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袁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袁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

1917年7月1日，张勋发动政变，拥戴时年12岁的逊位皇帝溥仪复辟，前后历时仅十二天，被段祺瑞讨伐而失败。段祺瑞违反临时约法，通过对德宣战案，举借日债，企图扩张势力，孙中山于是发起护法运动。

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织军政府。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因实权掌握在军阀手中，孙中山向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再赴日本。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2020年11月9日颁布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实施三民主义、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孙中山说：“所谓宪法者，就是将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而独立。各国宪法只分三权，没有五权。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自兄弟创出这个五权宪法，大家对之都很不明白。”孙中山说要增加一个选举权，一个考试权，还是没有把道理讲得很明白。

历史的车轮来到1921年。

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上称：“广州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陈炯明等不赞成，但孙之主张得到多数支持。

1921年2月15日，陈炯明任命孙中山之子孙科为广州市市长，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孙科，191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1917年回国。因他在美国曾学习市政管理，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不顾孙中山反对，力荐他出任广州市市长。孙科从此进入政界。

评注：陈炯明任命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为广州市市长一事，看似轻淡，但体现的是陈炯明骨子里坚守的传统伦理纲常。史学家往往因为陈炯明最

后走到了孙中山的对立面，而片面地贬陈誉孙，这是无益于呈现历史真相的。但陈炯明确实高看了自己，而低估了孙中山的坚韧意志和影响力。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清朝秀才，比孙中山小 10 岁。1911 年 4 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民国成立后，陈炯明历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文个人，陈炯明认为其不符合民主思想，并未参加。

1916 年陈炯明在广东东江地区组织共和军，反对袁世凯称帝。陈炯明在汕尾建立造弹厂等设施，并协助当地人修筑道路。1918 年 8 月 31 日，援闽护法粤军进驻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于 1920 年 11 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

长期受到桂系力量打压的广东地区欢迎陈炯明主政，省外广东人合资汇款 60 万支持陈炯明，又有华侨捐献飞机 12 架。孙中山看重陈炯明的人品和才干，把二十营警卫军改编为两个军时，第一军由陈炯明统帅。

与陈炯明一样，孙中山之前也是赞同地方自治的理念的，认为此是民国之基石。1916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尚贤堂对两院议员演讲中说：“欲行此制，先定规模。首立地方自治学校，各县皆选人人学，一二年学成后，归为地方任事。次定自治制度，一调查人口，二清理地亩，三平治道路，四广兴学校，而其他诸政以次举行。至自治已有成绩，乃可行直接民权之制矣。”

陈炯明为无政府主义者，赞同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的主张，曾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实践其政治观点。1919 年 12 月 1 日，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倡言“全人类社会主义”，并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想把福建漳州建设为“闽南的俄罗斯。”1920 年 4 月，苏俄派波达波夫带着列宁的亲笔信与陈炯明联系，以咨询合作的可能。在苏俄，陈炯明已有“布尔什维克将军”之称。陈炯明虽然赞颂苏俄，但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才是中国应走的方向。

陈炯明希望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陈炯明主导广州建市，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将地方法院分为三级，禁赌禁烟。他又下令兴建公路，公家兴办实业，扶持民间企业。在家乡和梅州、揭阳等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

1920 年 10 月，陈炯明以广东省省长名义，请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兴办教育。陈独秀相继在广东省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中山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人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很重要，在走的道路上遇到怎么样的因缘也很重要。如何评价陈炯明？最好看一看他在人生节点上选择的轨迹。陈炯明晚年生活拮据，有时甚至三餐不继。1933年他在困顿中病逝于香港。

1921年2月中旬，孙中山召集广东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目标是全中国，而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只扎根南方，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陈炯明以选总统无异于自树目标，广东目前无力抵抗北方进攻为由反对大总统选举，但最终未能阻止。

4月7日，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4月22日，驻京公使团致电驻粤领事，不承认广州选举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6月，北京军政府指派援桂总司令。同月，桂系军阀再次进逼广东，陈炯明带兵迎敌。此战虽大败桂系且一度反攻广西，但死伤人员约有全军五分之一，士气大受打击。

10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孙中山递交的北伐出师案，孙中山随即将粤军编为约3万人的北伐军，于15日向广西进发。12月4日，孙中山率军抵达桂林，在此设立北伐大本营。陈炯明对此进行了抵制，拒不离开广州。北伐军在桂林大本营誓师，孙中山称“民国存亡，在此一举。”

为了激励士兵英勇战斗，孙中山曾经用蚂蚁和蜜蜂为例子说：“人的天性和动物的天性不同，多数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蚂蚁。譬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去做。好像守门的蜂，尾上藏有蜂蛰，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使用尾刺激，拼命抵抗，就是牺牲生命也是不辞。这种奋斗精神，真是视死如归。”

1922年2月13日，北伐军进抵湘南，向着江西吉安进发。

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大本营迁至韶关，陈炯明拒绝参加会议，反而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职，率部离开广州，返回惠州。

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的奉军战败，无法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上下夹击河北直系。蒋介石向孙中山建议先巩固后方再北伐。孙中山多次派人劝说陈

炯明参战未果，电令蒋介石立即率军赴广州。北洋直系曹錕等人提出方法，要求徐世昌退位，南北总统共同下野，以促进和谈。陈炯明亦支持南北总统同时下野。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表声明，尊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唯一大总统。6月8日，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汪精卫等通电，主张以孙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大总统死后，黎元洪于接续其未完成的任期为第一任大总统。徐世昌被驱逐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黎元洪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停战。

6月13日，陈炯明密令部下准备袭击广州，令军队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6月15日，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惠州邀请陈炯明参与北伐，在石龙被扣留。当天，叶举、洪兆麟、杨坤如等于白云山总指挥处开秘密会，叶举指授诸将领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机关及派兵进驻韶关各方略，并悬赏二十万元谋害孙中山，许事成后大掠三日。由洪兆麟部首先发难。

6月16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宣布取消广州政府，部下劫掠各重要机关，断绝广州与外界交通，并炮击总统府和观音山住所粤秀楼。

孙中山旋即连夜离开总统府前往海珠。孙中山刚刚到海珠，陈军就控制了广州，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占据各政府机关，并向总统府围攻。陈炯明军从观音山上扫射粤秀楼一带，被总统府卫队击退。上午10时，陈军从观音山炮击粤秀楼，总统府卫队长陈喧率部掩护宋庆龄等人潜出。孙中山各部队相继遭到缴械，广东的要塞虎门炮台也被占领。孙中山登山永丰舰逃脱。

17日晨，孙中山率领永丰号等七艘军舰，驶至白鹅潭时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之陈炯明叛军发炮射击，打退了陈军，回到黄埔军营。

当日，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孙中山驻省城军舰炮击东关及白云山陈炯明部，两军继续惨烈对抗。

18日，孙中山电促正在家乡奉化守制的蒋介石促来广东，蒋介石6月29日到达黄埔，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此时，形势持续恶化，永丰舰受到威胁，已走投无路。蒋介石急请孙移居下舱，而自守舵楼，冒险通过车歪炮台，直驶至白鹅潭。由于白鹅潭系广州对外通商口岸，由英法军队控制，孙中山遂能在此躲避陈炯明叛军火力，脱离险境。

蒋介石在永丰舰上为孙中山参赞军事行动达4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处于危难而急需时赶来，使得孙在以后对蒋有更深、更多之信任和期望，蒋介石日后在国民党内政治地位的攀升，此为重要之契机。

19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从江西回师戡乱。20日，陈炯明突袭占领韶关。孙中山遂决定与陈军决战，下令加强黄埔戒备，防止长洲炮台失守。孙中山召见各舰长，要求坚守黄埔。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各部进入粤境，誓言三路进攻韶关。陈炯明分兵堵截，并向广州政府求和。

11日，北伐军进攻韶关，陈炯明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电令闽督李厚基就近出兵援陈，分三路入粤，以断北伐军之后路。15日，北伐军进攻帽子山，与陈炯明粤军激战两天。

半个月后，北伐军仍然屯驻于翁源、曲江一带，而与陈军相持不下。29日，北伐军自韶关附近失利，被迫全线退却，直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收容部队，重加整顿。

8月4日，陈炯明占领南雄。蒋介石以韶关未复，赣南复失，南雄不保，第一师降敌，前方军队已失重心，劝孙中山离开广州，另图发展。孙中山未允。

8月9日，北伐军回师途中，在韶关遭到陈军阻击。同时，受到曹锟、吴佩孚所派北军的进攻及广西陆荣廷旧部沈鸿英在赣西的袭击，三面受敌，不得不分途向赣、湘、闽、滇等地退却。回师平叛之举，终于落空。孙中山被迫于是日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再转往上海。

1922年10月，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从闽南方向讨伐陈炯明；又派邹鲁联系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组成西路讨陈炯明军。1923年1月，西路讨贼军进入粤境，陈炯明大败。14日，陈炯明的粤军纷纷倒戈，拥护孙中山回粤。陈炯明次日通电下野，率残部逃亡惠州。

9月至12月，孙在上海寓所三次召集在上海各省中国国民党负责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继、杨庶堪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问题。孙中山和吴佩孚谈判，盼望能回到北京；孙同时与张作霖秘密交涉，从张作霖得到若干经费。

孙中山逃亡上海时，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商谈，与苏联政府特使越飞会谈，因受到陈炯明政变打击，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建党、建军。

1922年8月，苏联政府秘密通过马林联系孙中山；马林和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讨论振兴中国国民党。

评注：孙中山与苏联和日本政府有些交接，是世人皆知的。孙早年赴檀香山，曾四度游访美国本土，并居留两年半，但只在华侨华人群体打转，始终没有和美国的主流社会打交道，这令人有些困惑。

1912年9月4日，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一为英国，一为美国。英国有两党：一自由党，一保守党。美国两党：一为共和党，一为民权党。民国初成，吾愿两党诸君，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

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

在美国人看来，孙中山这个矮个子的亚洲人，其貌不扬，像个讨饭的叫花子，与其他华人劳工没有两样，根本没有人搭理他。孙中山是亲身生活在美国的人，他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卑微和受到的歧视，心中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孙中山虽然想效法美国，创建共和国，但对美国民主模式只有仰视，始终没有勇气走近白人世界，或者他曾经尝试过，最后选择知难而退；加上他反清政府的行为，在美国同样也视为非法，更无法获得美国官方的支持。

对于孙中山来说，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曾经生活在那里，通过观察研究美国，对美国相当了解；而陌生在于，孙中山对美国政府、主流社会的政策和想法还不甚理解。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他们只重视利益的获取，而不轻易付出。就算孙中山在中国被公推为大总统时，中国仍是一个动荡多变的社会。美国人还看不准该支持谁，所以最终没有给孙中山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1904年1月11日，孙决定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为规避美国《排华法案》，孙中山取得伪造文件，亲友们做出孙在夏威夷出生的证词。孙从檀香山抵达旧金山，为阻止孙入境，保皇党已促请清朝驻旧金山总领事转告美国海关，并指控孙中山所持乃假护照。由致公堂向保单公司具保500元，担保孙外出候判后才被批准入境。

孙中山在欧洲和英国是类似的遭遇。1896年9月，孙中山抵达伦敦，清朝廷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即派英籍参赞马凯尼向英国政府交涉逮捕、引渡，并雇侦探监视。10月11日，孙中山被龚照瑗诱捕，准备将他秘密遣送回国，最后化了一千英镑才被当地的基督教会救出。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认为，孙中山是一个慷慨大度但想法糊涂的机会主义者，他最热衷追逐征服和权力游戏，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并不出色，相反经常是无能为力。

相反，俄国人常常主动向孙中山抛出橄榄枝，所以，孙中山在理念上亲美、在行为上靠近苏俄，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在1921年，孙中山在寄给苏俄政府的信上诚恳地表示愿和苏俄保持友好关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

苏俄助外蒙古成立政府。1921年3月13日，临时蒙古革命政府成立。3月21日，外蒙独立政府成立。本月，俄国白党恩琴率军进袭外蒙，攻陷库伦，策动活佛宣布独立。同时，苏俄帮助成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亦在恰克图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请求苏俄红军出兵援助。苏俄红军攻占库伦后，驱逐了白俄势力，蒙古人民革命政府遂改为正式政府，仍奉活佛为元首，由司卫巴都执政。9月，外蒙古诸王公不满新政权，请愿归附中国。

11月5日，外蒙与苏俄订立友好条约。条约规定：苏俄承认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在双方领土内不准有以反抗、颠覆对方政府为目的的团体、个人或军队存在；苏俄可在外蒙购置及租借土地，承办邮电铁路等。

10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的代表张继会晤。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抵桂林，他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核心，创办军官学校。孙中山表示赞同，并决定派代表团赴俄考察，以利在北伐胜利后实现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盟。12月23日，孙中山再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陪同下抵达桂林与孙中山会面，马林建议内容有三：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农民及劳工大众联合、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与谋求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对此未予实施。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有代表参加。列宁在莫斯科接见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探讨国共合作之可能。

8月20日，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发表宣言，谓苏俄愿交还库伦。27日，苏俄代表越飞提议召开中俄会议，并请中国派员参加日俄会议，被拒绝。自此，越飞一直与孙中山保持通信联系。

29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9月12日，外交部正式答复苏俄代表越飞，同意召开中俄会议。11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俄要求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否认苏俄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并请中国政府选派代表，召开中俄会议协商解决中东路问题。

12月，张继奉孙中山之命，在北京会见苏俄全权代表越飞。

1923年1月17日至1月26日，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到月底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确立联俄政策，主要内容有：苏联愿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大业；苏联愿抛弃沙俄对华之不平等条约，另行开始中苏交涉；中东铁路问题由中苏协商，暂仍维持现状；苏联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苏军也不必立时撤退。

2月21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府，于3月1日任大元帅职。

3月17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6月17日，又特任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6月15日，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任主编。《国际歌》中文词曲在创刊号首次刊出。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首领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控制，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正如鲁迅笔下描绘的苦难中国和愚昧国民，北京政府治下法律废弛、财政紊乱，地方势力割据、盗匪焚掠横行无忌，致使中国国际地位每况愈下。8月3日，英国提议国际共管中国；各国驻北京外交团遂商议国际共管中国。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邀请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并提出委派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孙中山与马林、张太雷、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8月16日，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共产党员张太雷任俄文翻译，还有共产党员沈定一和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宗山。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在俄期间，代表团考察了苏俄的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情况，并洽商了苏俄援助中国等问题。代表团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11月25日，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蒋介石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状况及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

9月，苏俄政府委任鲍罗廷为常驻广州代表。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讨论改组国民党及组建军队等问题。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武装。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着手改组国民党事宜。

1924年1月1日，孙与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暨授勋典礼。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大会；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但须服膺三民主义及遵守党纲党纪；与会代表百多人，包括2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孙中山强调必须改组党，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科因为发表反苏反共言论，不支持改组，被父亲孙中山亲自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划掉名字。

评注：孙中山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赞成资本公有，推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圣人”，但是，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适用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认为，他的主张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曾很高兴地宣布，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孙中山又认为，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他不主张全面、彻底地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办部分企业。他认为，斗争的手段只适用于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他强调的是阶级合作、阶级互助。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

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认为土地和空气、阳光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普遍馈赠，不应为个人私有。但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土地问题时，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办法。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的核心内容是“涨价归公”，即土地原价归地主所有，因工业、交通、商业发达所增长的地价归全民所有。这一纲领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所剥夺的仅是因社会因素所增长的地价，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

孙中山相信，通过“社会经济进化”，资本主义还会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孙中山跟列宁又有很大的差别。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孙中山演讲说：“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孙中山“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孙中山还亲书“国友人师”以表敬意。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展开筹备工作。筹备委员7人：王柏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委员会以建立培训军事人才的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的长洲岛上，以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学校校址，通称黄埔军校。

然而，蒋介石却在2月21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出辞呈，表示“自惟愚陋，不克胜任”，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其辞职原因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挟俄自重，又忧心国民党不能达成扫荡军阀。孙中山接到蒋的辞呈，同意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1月，苏联为黄埔军校派来了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军事顾问小组成员有：切列潘诺夫、格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鲍罗廷把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介绍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承袭西方学制的传统军官学校，培养一名初阶

军官一般需要三年。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则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规划了半年完成初阶军官军事训练的速成学制，还根据修业期限详细安排了各项军事课目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并针对各科的具体内容及特点，拟定了实施办法练。

鉴于黄埔军校缺乏军事干部，总顾问鲍罗廷受孙中山的嘱托，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发电报派遣教官。苏军军长巴甫洛夫到达广州，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兼军事顾问团团团长。10月，苏俄派加伦将军到广州接替因不幸落水殉职的巴甫洛夫将军，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

5月3日，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5月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并负责筹集军校经费。之后委任李济深和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和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和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周骏彦和俞飞鹏为军需部正、副主任，宋荣昌和李其芳为军医部正、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而何应钦为总教官，张家瑞和王登云为中、英文秘书，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亦获任教官及各方面工作，其中包括张申府、周佛海、聂荣臻、鲁易、恽代英、夏曦、熊雄、萧楚女、张秋人、高语罕、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人。

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入伍，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有学员600多人。孙中山发表演讲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评说：孙中山仰慕欧美民主制度，却俯首听命于信仰共产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并书写“以俄为师”，无异于引狼入室，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大败笔。

1924年10月7日，苏联“波罗夫士见号”巡洋舰驶抵黄埔港，为孙中山运来了广州大本营所定购的第一批枪炮弹药。喜出望外的孙中山在欢迎词中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关系为最密切。”到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之军事、政治人员已达1千人左右，并且提供中国国民党每个月3万5千元，外加其他补助。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

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没有交代接替人选。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 1925 年 2 月 24 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

《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语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他们这些见证人只有一辈子遵照执行。

在《致苏联遗书》中，孙中山说：“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孙中山对苏俄已经是有些象饿狗一样的摇尾乞怜了。

1924 年 1 月 20 日，孙中山对国民党各省代表讲话中赞扬俄国人说：“俄国人立志革命，希望一百年成功，现在不过二十多年便完全达到成功的目的。我从前希望数年成功，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年，还没有大功告成。这是因为中国人革命的方法和气魄不及俄国人。俄国人因为有了这种气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经发动，得到机会，便大告成功。”

孙中山没有亲身到苏联去考察过，对苏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实践没有深入的了解。他在 1924 年对广州湘军的演说中讲“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孙未经深思熟虑，并无视国民党元老们的反对，而请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干部来为民国建军，此招极对国民政府为凶险，是导致中国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从此，带着邪灵的共产党走进了国民党的心窝里了，国民党何能不身患恶疾而败！

孙中山说：“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然而，孙中山在与苏俄合作这个事情上，究竟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思想确实有变呢，我不得而知。

6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定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6月21日，外蒙通告苏俄政府，决定脱离中国，实行共和。7月1日，外蒙古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以江苏督军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军阀同占据浙江的皖系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管辖权而爆发战斗。战争以卢永祥败亡，直系占领浙江、上海告终。这场战争既是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扫除皖系残余势力的延续，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战争爆发在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江浙地区，社会经济损失巨大。

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因与皖系、奉系订立反直联盟，所以决定讨直系。同日，廖仲恺辞去军需总监、财政部长和财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反对孙中山北伐，出现批评、抗议的声音。孙科辞去广州市长，廖仲恺放弃广东省省长，蒋介石也拒绝让黄埔师生参加北伐，只派一连兵到韶关保卫孙中山。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改组内阁。冯玉祥驱逐溥仪的举动，受到张作霖、段祺瑞和各地遗老们的猛烈抨击，也遭到日英荷等国公使的质问。郑孝胥、罗振玉等人更大肆活动，故意煽惑，引起溥仪的恐惧。郑、罗勾结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和日本公使芳泽，并取得陈宝琛、庄士敦的合作，将溥仪带到东交民巷，先进日本兵营，随后住进日本公使馆。

10月30日，孙中山舍弃在韶关建立之北伐军总部，返回广州。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分别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是。孙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和平统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民治。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时称：“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在新闻记者会上说：“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

11月24日，孙与宋庆龄抵达日本神户。11月25日，孙在神户与前来拜访的头山满长谈。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主张日本政府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孙中山希望中国和日本要联络起来运动，他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日本自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成了亚洲的头一个独立国家。其他亚洲的有名国家，像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独立的国家，都是由欧洲任意宰割，做欧洲的殖民地。”

孙中山称赞日本是个有道德的社会，说：“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亚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来欧美学者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孙中山无疑是亲日派。他在神户演说中谈了他取道日本去北京的原因：“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军领袖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

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在天安门前受到十万群众和学生的欢迎。

1925年1月，孙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却主张召开善后会议。2月，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共两党均激烈反对，4月善后会议结束，一无所成。

孙中山扶病入北京，苦无成果，终于病情恶化。3月12日9时30分，孙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在北京逝世。

评说：孙中山的死因有肝癌和胆囊癌两种说法，可能是西医诊断不准确之故。按照孙中山的性格和生活作风，他四处奔波，又不讲究衣食。他的肠胃有问题是一定的，幸亏他自己是个医生，调理脾胃的问题应该富有经验。他思虑过多，每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肝胆一定会出问题。可惜，孙中山没有同时学好中医，作为西医学者，缺乏对生命真相的深切认知。

1914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极力主张废除中医，各地中医为此组织成立医药救亡请愿团。

从清末民初开始，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的“废除中医运动”。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开始，一群无知而傲慢的官员，不但主张立法禁止中医师行医，而且试图通过在学校体制、国家医疗体制等领域驱除中医的影响来达到让中医逐步流入民间甚至消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西方所谓先进科学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大多认为中医是充满偏方和迷信的医学。一些有海外游历经验的人士，

如余云岫、鲁迅、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陈独秀等倡导废除中医。我读过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他确实是文学大家，但他在《呐喊》自序中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就太无知了。同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发表文章，建议取消所谓的国医，无知者就是无畏啊！

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事业之障碍案》。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兆铭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因此，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

然而，天道昭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曾经慷慨激昂而创造“伟大事业”的革命者却仍只是无知而可怜的糊涂虫而已。他们多以短命收场。

鲁迅本来是拿了清政府的官费到日本去学习采矿冶金的，但他想回国后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中医误治的病人，选择远离东京、地处东北偏僻小城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鲁迅又弃医从文，所以在医学上没有建树。鲁迅1936年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而在中医看来，肺结核并不是很难治疗的疾病。

北大校长傅斯年晚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除肉类荤腥，后来他又查出有胆结石。1950年，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然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

孙中山是西医医生，却无法医治自身的疾病。1925年春，孙中山在国内忧外患之时，应该是罹患肝癌而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一直用西医治疗。后来病情恶化才一度改用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我在网上查阅了当时的历史档案，发现陆仲安开出的一个处方为：石斛3钱、人参3钱、萸肉3钱、寸冬4钱、生地4钱、沙苑子3钱、沙参3钱、甘草2钱。这真是庸医，这样的方子怎么能治疗肝癌或肝病严重的患者呢？难怪后来孙中山拒绝了中医治疗。

评注：孙中山是人中大丈夫，坦坦荡荡，他的性格是相当透明的，我们试图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并不是很难的事。

孙中山十四岁初到檀香山，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孙中山的家人，也多是基督教徒。孙中山在为英国学者翟理斯编撰《中国名人词典》所写的自传中说：“至于教则崇耶稣。”孙中山在病榻上执着朋友徐谦的手说道：“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为我国人民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

然而，人的思想信仰和精神世界，是会随着他自身成长和环境而变化的。宋庆龄 1966 年 4 月 13 日写给友人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宋庆龄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从来没有走进过孙中山的精神世界，二是宋庆龄完全屈服于共产党而说了违心的话。

1905 年 7 月 30 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

孙中山的政治理念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他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但孙中山过早仙逝，还没有机会让中国人明白，中国必须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因为有了大政府，政府权力大了、垄断的资源多了，老百姓就会没了活路。

1911 年 10 月 27 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1 月 1 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11 月 2 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

孙中山为了其革命实践，需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襄助，而在政治理念乃至宗教上采取了更富实用性的包容态度，并展现出更宽广的胸怀。孙中山从小就鄙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以及老子的道统，但是他不得不希望崇敬孔老的子孙支持他的革命。年幼的孙中山没有在中国接受更深入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骨髓里的东西，还是缺乏认识的。有幸的是，他晚年补上了这一课。在《中国之命运》中，孙中山说：“从宗教文化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继孔子的倡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至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中山是主张共和的，包括思想和宗教之和，因为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文化，就是一个和字。这种思想后来被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所打碎。而孙中山是连共产党也要和的，连苏俄和日本也要和。孙中山的心量，一天天增长，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他的革命目标很明确，就是推翻满清统治，建设一个公平进步的中国。他顺着孔子的话说：天下为公。

1923 年 10 月 20 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说：“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

孙中山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犬养毅是日本第 29 任首相，庇护过孙中山和蒋介石。根据宫崎寅藏《孙逸仙其仁如天》一书记载，有一天犬养毅问孙中山：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革命”。犬养毅说：“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您最喜欢什么？”孙中山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推问：“答答看吧。”孙中山答道：“女人。”

第三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

评说：历史者，过往人事也。历史没有正义，因为有了邪恶，所以才生出正义。历史没有对错，只有真相和假相；真假难辨，乃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世间一切法，人心所造；历史亦是人心所造的。所造皆有因缘，皆存因果。此因果是留给后人看的，不在于纪念，而在于启迪。

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故读史可以明智。此智不是知，知是求语，智是求义。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今我以史作镜，是为了防范己过。

自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舍百姓，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必然土崩瓦解，此千古之理。朝代有兴衰，犹朝之有暮，太阳之有日出日落，冥冥中似有主宰。天下兴盛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满清如是，民国亦如是。其败亡者，皆因执政者不知时政，蔽人耳目，罔顾民生，谄者日进，见过不改，所以民国军阀更替轮转，你方唱罢我登场。

然而无论何党何派执政，政府之喜好，往往并非百姓之所愿。当权者常常假托民意，妄行私德，百姓亦当自然。所谓无政府社会，人民自立自足，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比坏政权强过百倍。因为人性向善，互帮互助，鲜有盗贼，亦不足为患。正如清末民初，政权动荡，人民生活困苦落后，但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报禁，灵魂自由，少有管束，华夏亦是一方乐土。中共匪党之兴，祸乱寰宇，从此争斗蜂起，社会生灵涂炭，百年之间，再无宁日，不亦悲哉！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他们接下来想干什么呢？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借鉴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搞工人暴动，试图迅速谋取政权；又煽动农民起义，城市难行就走农村道路。首先是建立组织，培养领导暴动起义的干部，培训学员骨干，同时建立劳动工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鉴于初创力量薄弱，马林提议中共应该与国民党合作。

1912年2月12日临朝称制的满清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在北京全权组建临时政府。2月13日，孙中山遵守南北议和时的承诺，向参议院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无人有声望和能力统御整个北洋军，北洋军遂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割据势力，统称北洋军阀。桂系、滇系、粤系、

川军等各地军阀在名义上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支配，但实际上各自为政，有如独立王国。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据一方。直皖战争以前，皖系把持中央政权，以北京为中心，据有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等地。直皖战后，直系势力大振，把持了中央政权，势力陆续扩展到直隶、山东、河南、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福建等地。奉系长期经营东三省，逐步深入内蒙古、京津、热察等地，在北洋政府末期主宰中央政权。

北洋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办报自由，思想自由，各省文化大放异彩。《临时约法》基于三权分立制度，以此为基本原则，限制大总统权力，防止个人独裁，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然而在军人干政的环境下难以实现。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行使过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

北洋政府虽然曾为国际认可的合法政府，但由于混战经年，中央财政羸败，只能借债度日，连驻外使领馆也无款可拨，须自筹经费度日。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据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

军阀长期混战，百姓饱受荼毒。军阀视兵若命，1914年，全国陆军不过45.7万人，1918年即增到85万人，1925年更达到147万人。庞大的军队需要巨额军费来维持。于是各地加征赋税、摊派公债、滥发货币，坑骗百姓。军阀巧取豪夺，积累了社会的怨气。

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农民饱受战争之苦。北洋时期，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化为游民和散兵游勇，为共产革命制造了土壤。学者张鸣总结说：“当中国的红色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发动农民反抗新旧军阀的统治时，不仅社会状况对他们十分有利，而且农村里还准备好了会使用新式火器的农民和流民。原来从军阀部队里兵变、逃亡、溃散的小股士兵，不仅有了成为土匪和民团的可能，也有了化为红色武装的可能。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跟军阀几十年武化其实不无关系。”

军阀混战，导致匪盗蜂起。大部分土匪是由破产农民及无业游民转化而来，由于农村经济的恶化，遇到灾荒，年轻人视当兵作匪，为谋生的惟一去路。兵匪

之间双向流通，不仅招匪为兵，并且裁兵为匪，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军队的游民化和土匪化。

北洋时期，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化为游民和散兵游勇，为共产革命制造了土壤。当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干部走向农村，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和军阀统治时，不仅社会状况对他们十分有利，而且农村里已经有了会使用新式火器的农民和流民。从军阀部队里的裁兵、逃兵、溃兵，不仅成为土匪和民团，很多也成了共产党红色武装的骨干。共产党政权的红色种子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跟各地军阀多年匪化有直接关系。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同月，在上海公开成立工人维权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分部，筹划发动工人维权罢工活动。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讲所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正式开学，由彭湃担任主任。至1926年9月，广州农讲所共办了六届，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分别担任一至五届主任。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主任。当时称农民讲习所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大势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其实是共产党为广大农村发动农民起义作准备。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影响最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等人两次来到江西安源了解情况，李立三留下组织工人，发展党员。1922年5月，有一万多职工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安源路矿当局拒绝发放长期拖欠的工人工资，并试图解散工人俱乐部。毛泽东、刘少奇赶到安源，准备罢工。9月12日深夜，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近两万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9月18日，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路矿当局终于屈服，签订了十三条协议。共产党取得了这次大罢工胜利。

1923年2月1日，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但吴佩孚下令禁止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包围，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军警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站，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

2月7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配合下，在京汉铁路沿线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导致5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1000多铁路工人被开除。死者包括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以保存实力准备将来的斗争，下令复工，大罢工结束。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领导了此次罢工。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中国大总统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共应该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陈独秀最初对马林的提议不屑一顾，依旧投身工人运动，在全国建立了13个工会。

1922年1月，莫斯科召开劳动者大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否定了中共的思路，要求与资产阶级合作反日。7月，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在其命令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将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积极支持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最高纲领，即最终目标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导。

中共二大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李大钊、李汉隽、向警予。陈独秀担任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并由蔡和森任主编。

1922年9月，经国民党元老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出席大会。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之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各个决议案。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之情况，强调农民问题之重要意义；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及谢持任主席团成员，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此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

《大会宣言》描绘当时中国之现状称：“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指出：“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

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评注： 联俄容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关系。

列宁赞扬孙中山“真挚的民主精神”，又批评他“是个梦想家且优柔寡断”。列宁要搞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共产国际，希望与孙中山合作。马林热切支持列宁观点，渴望见到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实现。

1919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成立之时，其军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北洋政府，两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在两次挫折后，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才能实现建国大计。在孙中山无法得到西方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列宁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过中国国民党进行共产革命。

1920年秋，孙中山常在上海寓所接见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维经斯基。列宁本来是想要孙中山当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西方及日本并不看好孙的政治资本，拒绝给与金援；他便开始考虑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可能。于是，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接见过共产国际官方代表马林，了解更多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的态度。

对于与孙中山的合作，苏俄内部亦有反对声音。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之远东劳动者大会上，共产国际首领季诺维也夫大肆抨击中国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作风，以及孙中山寻求美国援助之执拗。8月，越飞到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之后，越飞转向联络孙中山。11月至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综论东方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天体质不良，主张暂与中国国民党及若干地方领导人妥协，并提议组成统一战线。

中共二大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和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 7 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

针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声音，孙中山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他说：“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1 月 26 日，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孙中山愿意容纳于中国国民党内，一来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二来是为集中力量，壮大国民革命声势。

10 月 6 日苏联新特使鲍罗廷于抵达广州，出任孙之政治顾问，负责执行与中国国民党之统一战线策略。本月，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五度私下会谈。鲍罗廷曾组织两支志愿队参加对抗陈炯明的城防工作。孙中山虽然实行联俄政策，但并不放弃联系美日，这引起鲍罗廷的不满。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孙中山。鲍罗廷不得不承认：“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

1923 年底，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国，报告游俄观感，其中提到：“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孙回复说无须太过忧虑。

参议长张继曾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指称李大钊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反对李大钊假意国共合作，张继态度开始改变，转而发对容共。1924 年 6 月，张继和谢持、邓泽如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指中共树立反帝反军阀旗帜，使中国国民党遭受国际之仇怨。张继受到孙中山斥责，而避走上海。

陈独秀屡次在中共机关报上批评孙中山的政策，于是孙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孙中山似乎有些天真地想“将共产党转化为国民党，只成为国民党中之一派，则共产党自然不存在。”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有狼子野心的。中共党员的个性格往往比国民党党员更激进而傲慢。中共党人自视为最先进一代，而蔑视国民党为落伍一

代。中共党员是年轻人居多，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缺乏活力的“老朽不堪”。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其依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谭平山抱怨说，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自孙联俄伊始，国民党赤化之说便不脛而走。特别是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宣布联俄联共，更激起轩然大波。自国民党改组后，颇有人怀疑国民党已改趋于共产制度。国民党“以俄为师”，引起很多国民党元老担心，很多人绝不混同于共产党，并做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

1924年2月26日，孙中山接见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时说：“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

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共产党员林伯渠在广州担任了国民党第一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彭湃任农民部秘书。1924年5月，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为适应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彭湃的建议，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1924年春天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会农民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制订、推行中国国民党之农村政策：农民部的实际负责人是秘书共产党人彭湃，由中共农民委员会和鲍罗廷在幕后操控。

在廖仲恺倡议下，5月1日大型庆祝会于广州筹开，孙在会中演讲，再度呼吁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而把阶级斗争之主题摆到次要地位。中共党员威胁拒绝统一战线即是与苏联绝裂，多次急电催促鲍罗廷回来前解决争端。鲍罗廷暗示“旧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新国民党刚诞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待共产党放弃他们自己的组织。

上海、北京国民党人函电涌至广州，抗议共产党干预、操纵，尤其是共产党人想通过中苏条约之宣传扩大影响；张继和汪精卫在广州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发起要求驱逐危险盟友之请愿连署。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中国国民党诸多重要职务，引起中国国民党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以南京蒋中正为首的清共势力和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容共势力发生分裂的事件。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内外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的一栋石库门住宅内举行，由20人代表当时全国994名党员参加大会。陈独秀作了工作报告。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强调要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是中共内部残酷斗争的开始。

1925年2月，上海日商棉纱厂日籍管理人员用铁棍殴打致死一名童工，于是全体工人罢工抗议。4月19日，青岛日商大康纱厂4000余名工人为争取权利，举行大罢工。5月，多间日本纱厂以男工引发工潮为由，将所有男工解雇，引起22家上海工厂大罢工，共产党组织趁机煽动闹事。内外棉第七厂的日籍资方人员与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发生争执，冲突下日籍资方人员开枪打死了顾正红，另七人受伤。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当地出动警察和保安队强迫工人复工，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逮捕。中共及时派李慰农来青岛，建立四方支部，派任书记，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等也前来青岛指导工人运动。

5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顾正红大会。共产党鼓动各大学学生组织演讲组，到租界各处宣传民族主义，反对外国在华势力。日本政府和山东、青岛军阀当局加紧联合镇压青岛工人运动。日本海军军舰从旅顺等地开来公开威胁，准备以武力对付罢工工人。29日，包围青岛内外棉纱厂的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厂内日本职员也枪击工人，结果打死工人8名、重伤数十人，逮捕工人70余人。

5月28日，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

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条马路组织大示威游行。下午，大量学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内最繁华的南京路，跟公共租界警方发生冲突，有十多人受伤，其中有100多人被捕、关押在老闸捕房。到下午3时，

约有上万群众涌到老闸捕房门前进行交涉。下午 3 时 55 分，英国籍捕头下令向外开枪以驱散人群，结果造成 13 人死亡、40 几人受伤，有 49 人则被拘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借此契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具体领导事后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约有 1700 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由 6 月 1 日开始，上海全市工人、商人、学生等一起罢工、罢市、罢课。三罢一直持续到 6 月中旬，约有 25 万工人、20 万商人、5 万大中学生参与，总人数超过 50 万。五卅惨案发生翌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 2 号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各科正副主任大部分为共产党员。

6 月 5 日，中共又策动青岛四方机厂全厂罢工，全市各界迅速响应。秘密返回青岛的邓恩铭主持成立了上海事件后援会，发表宣言，确定了各界反帝斗争纲领。6 月 8 日，青岛全市大中学校罢课。10 日全市市民大会召开，动员全市民众举行示威游行。16 日全市各界 3 万余人举行了青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邓中夏及香港海员工会的苏兆征等共产党人，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组织，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6 月 19 日起，各个由指挥的工会，包括电车、印刷、船务首先响应，三日内即有二万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

在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亦于 6 月 21 日起响应，拒向英商及领事馆提供服务。在共产党以中国国民党名义组织下，广东各界巡行大示威，赴会者包括省港澳各团体，省内国立市公私立等大小男女学校、商界各团体、农民团体及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警卫军等，人数十万余众。

共产党再次煽动广州学生、军人及工人在 6 月 23 日游行，与沙面之英法军队冲突，约二百中国军民死伤，称为沙基惨案。

广州政府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工人部长廖仲恺的主导下，决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广州生活。7 月 6 日，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各部门主持罢工，成立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禁止粮食输出香港及经香港之货物入口。至 7 月 8 日，已有十三万多人离港，前往广州、佛山等地。

大罢工运动后期，商人群体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积聚大量矛盾，商人因损失惨重而纷纷停止罢市。上海市政厅则宣布戒严，各国在港海军陆战队随后上岸，与万国商团一起维持市面秩序。香港市面一度恐慌，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至 7 月中旬后才稍为回复。

7月26日张宗昌调集大批军警镇压青岛工人罢工，封闭铁路工会和各纱厂工会，逮捕杀害了中共青岛负责人李慰农与胡信之等，镇压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一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工人学生骨干被捕，青岛国共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团体全部被取缔，民众的一切自由均被剥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8月中旬，各地工人停止罢工，罢工事态逐渐平息。9月18日，卢永祥令上海戒严司令奉系军阀邢士廉，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李立三、刘华等工人领袖。但是到全国大罢工结束时，中共党员人数激增至18500多人，共产党想要快速夺权的野心显示无疑。11月，邹鲁、林森等国民党元老出面表达不满，维经斯基要求中共收敛，缓和与“中派”戴季陶等的矛盾。

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由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国民党的一个右翼派别——西山会议派，在孙中山灵柩停存所在的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解雇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的苏联人鲍罗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职，并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出席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元老大多是佛学素养极深之居士，有林森、居正、邹鲁、叶楚傖、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振、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14人，他们西山集结初始意并非为政治，而是在碧云寺为孙中山超度，诵经念佛。这是当年中国佛教信士领袖大集结，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汪精卫的联共，与长期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内部以汪兆铭、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左派不合。

1926年初，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微妙变化，廖仲恺先于1925年8月底被暗杀。而省港罢工委员会于1926年3月初因中山舰事件而被蒋介石缴械。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出现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党内派系丛生。立场较为亲苏的汪兆铭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央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并坚决地支持联俄容共政策。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国赤化而急速恶化，也因此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兆铭企图联手推翻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当时汪兆铭与蒋介石感情融洽，但是蒋介石内心并不认同他的这个上司。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命令，派“中山、宝璧”两艘军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演达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

请示蒋介石调中山舰回广州。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李之龙事先得到汪的指示，要将一些水兵调离，以防蒋介石重新夺回海军。

3月20日，蒋介石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命令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李之龙于家中，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

蒋介石识破斯大林令中共通过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阴谋，奋起反苏清共，给予共产党重重的一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及亲共国民党员。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批评。

7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共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准备发动军事暴动和秋收暴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评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19世纪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社会贫富的鸿沟确扩大了。各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基础，试图以暴力反抗现行政治秩序，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1917年11月7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苏俄政府。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亦称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号召世界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国际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6年至1928年的领导人为布哈林。

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中国因此也成为共产国际的创始会员国。

列宁反复强调推翻旧秩序和革命成功需要恐怖和暴力。列宁担心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将会推翻政府，遂在 1917 年 12 月下令建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别称“契卡”），组成政治警察机构。

1918 年春季，俄罗斯西部许多城市因为长期粮食不足，而面临着饥荒。列宁指责由富裕农民组成的富农阶级囤积粮食，乃发表征用命令，查扣富农粮食至城市分配，并公开绞死至少 100 多名富农。

列宁在遭遇两次刺杀后，在苏联推行红色恐怖。列宁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说：“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1921 年，列宁透过中央政治局给予契卡自主行动的处决权力。契卡依照法令建立集中拘留营。到了 1923 年 10 月，拘留营成长至 315 个，约有 70,000 名囚犯，遭到契卡绞死和枪决的精确人数并未留下纪录。

1921 年至 1922 年，俄罗斯因为干旱引起极为严重的饥荒，这次严重的饥荒波及 30 多个省份，导致大约有 500 万人死亡，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情况。农民抗拒政府征粮。饥荒引发富农暴动，导致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反布尔什维克农民起义，但遭到列宁的残酷镇压，导致数千人死亡，而幸存者则居留在劳改营。

1922 年 1 月，列宁政府更进一步强制宗教机关拨出所有贵重物品出售，遭到神职人员的反对，约有 8,000 名神职人员遭到就地正法，使俄罗斯正教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列宁遇刺后中风，又感染梅毒，在 1921 年下半年病重，患有听觉过敏、失眠和经常头痛，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尽管罹患疾病，列宁仍然对政治发展有着强烈兴趣，仍透过选举成为新苏联政府的主席。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在戈尔基公馆逝世。列宁的官方报告中，将死亡原因纪录为无法治愈的血管疾病，政府计划向国外购买设备，将列宁的遗体冷冻，以便将来让他苏醒，最终将列宁的遗体制成木乃伊以长期防腐处理保存。

母亲为犹太人血统的列宁热忱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而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配给严格地受到国家控制。列宁具有秃头、结实、强壮的身体外貌，情绪化且反复无常，却把自己看做应运而生的人，过着朴素的生活。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有钱人的民主”，描述美国的民主制是“毫无意义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决斗”，表示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是国际主义者，坚定支持世界革命，

并相信第三世界的革命将通过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联盟发生，最终建立“世界合众国”政府。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被视为共产国际中最神秘的部门，主要负责向世界各国共产党派遣人员、分发资金和传达指令。共产国际东方支部是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门，当时的东方支部还负责朝鲜和东南亚。维经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以上海作为其基地。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维经斯基提出关于远东部机构的组织、义务的划分、支出的概算等方面的措施。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和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人)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

张申府和李大钊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加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1923年2月30日比扬古会议上，陈延年和尹宽指责张申府干预少年共产党的工作，故将他开除出党。张申府取道苏联回中国。1924年2月，抵广州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广州大学任教。5月，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6月辞职。1925年1月在上海中共四大上，关于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张申府与张太雷冲撞，后退出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少问政治，一直在大学教书。张申府成为第一个退党保平安的人。

1926年4月远东书记处最初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拨款和建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中共派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为驻远东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学家为常任副代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大量中共党员的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于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拒绝了申请，只是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蒋介石早年对马克思主义颇为热衷，但1923年奉命到苏联考察，正值列宁病重，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内斗，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之风气盛行，令其对马克思主义“极度失望”，萌生反共念头，反共亦成为蒋介石一生的信念。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得最高权力。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地位，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政治对手，以肃反的方式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展开了大清洗。同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其在任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1925年10月，蒋介石安排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苏联留学，

一直十分关注苏联的形势，对苏联的政治是相当了解的，知道在中国不可能走俄国一样的道路。

1927年与国民党决裂后，中共被国民党右派清除出党。维经斯基5月参加完中共五大后，很快被召回莫斯科。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1927年张太雷在八七会议上同陈独秀路线进行斗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广东省委书记。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海因茨·诺伊曼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在大北门附近遭遇广州机器工会反共人士袭击，身中三弹，倒在车内身亡。

第四章 蒋中正的崛起

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国民党出现权力真空，各派迅速展开斗争。此前，蒋中正通过打败陈炯明，在危急关头救了孙中山一命，博得孙的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声誉。后来，他以特委身份调查“廖仲恺刺杀案”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并通过中山舰事件将赤色分子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并打击国民党左派，逼走了最大对手汪精卫。在四一二事件清除中国共产党，获得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正式接掌孙中山的权力，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新星和大赢家，自此开始了近半世纪的掌权生涯。

评注：1887年10月31日，蒋中正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幼名瑞元，学名志清，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尚以此名为正名。留学日本时取表自“介石”，意为“其介如石，以中正也。”

蒋家远祖蒋宗霸，笃信佛教，生前常诵《般若心经》，世称摩诃居士。蒋母王采玉为忠实佛教徒，以孝悌闻名的蒋中正中年之前亦信佛。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8岁时去世。蒋家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共30亩地，使蒋家成为溪口镇五大富农之一。

蒋五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自称“幼性顽钝”。蒋中正对母亲颇为孝顺，15岁在母亲的安排下同毛福梅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

蒋婚后先后转入奉化和宁波读中学。时值《辛丑条约》之后，蒋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使之产生了赴日学习军事的念头，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了3个月日语。蒋母同意其要求并提供了出国经费。

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响。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只好回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学习炮兵。由于蒋在保定军官学校深受校长和教官赏识，第二年就成为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之四人之一。

1908年春，蒋与陆军速成学堂62名学生，一起到东北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进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创立之东京振武学校。两年后蒋被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表现相当不错，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很快又晋升军曹。蒋见识了日本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认为是日本军事成功之主要原因。

蒋在同学中人缘不好，只有张群和何应钦等几个朋友，假日和同伴会到餐馆饮酒，常常逛窑子，也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在日本，蒋认识了同盟会的陈其美。在陈其美的带领下，蒋开始沉迷风尘，尔后也多次前往妓院寻欢作乐。蒋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陈其美比蒋大 11 岁，成为蒋在政治上之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之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受到蒋之重用。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蒋和张群等即向高田联队请假回国。

11 月 3 日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和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夺取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赴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当时，蒋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异姓兄弟。

1912 年，陈其美派蒋中正与王竹卿，于 1 月 14 日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乃避往日本。

蒋中正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 1913 年 7 月在上海。孙中山从侧面了解到蒋生活糜烂、纵情声色、饮酒无度。蒋表示愿意与孙同甘共苦，期望孙能委以重任。当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蒋被迫逃进陈其美之娘姨、舞厅交际花姚冶诚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

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于 9 月 1 日抵达长崎，10 月 29 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做监誓人，加入中华革命党。在这一年蒋介石尽力读书，读完曾国藩全集。

1914 年春，蒋奉孙中山之令主持上海讨伐袁世凯军事，兼第一路司令，担负攻取上海西部之责。袁下令严缉蒋，蒋又避祸于日本。孙中山命蒋中正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蒋上书孙中山阐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蒋在东北策划讨袁工作，难有进展，遂返回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之军事战略。

1915 年 10 月，蒋奉孙命回上海，协助陈其美，拟定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12 月 5 日，策动上海军队反袁肇和舰起义失败。陈其美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做自己接班人。

1916 年 5 月 18 日，陈其美在寄宿的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 14 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次年在上海打铁浜苏州集议公所为陈其美举行国葬，上万人送行。蒋经纪丧事，复为文以哭之。

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他更以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

1916年6月初，孙中山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本月，袁世凯暴毙，蒋乃辞职赴北京观察政局。由许崇智代其职。蒋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

1918年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桂系所刺杀，孙中山益无所恃，乃电召蒋中正赴广东以为助，3月11日蒋奉派赴汕头，出任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受排挤，四个月後辞职。8月，蒋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攻取大埔、永泰。蒋又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蒋再去日本。

1920年，孙中山命蒋中正、朱执信等赴福建漳州。9月30日，孙派蒋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于11月12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到后，次日再回到浙江老家，探望老母。孙中山在写给蒋母的祭文中认为他与蒋“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并评价蒋是“守经达变”之人。

11月，蒋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富商女子陈洁如同居。陈洁如祖籍宁波镇海，出生于上海，家境宽裕，她的父亲陈学方是经营纸业的商人，母亲是苏州人。在12岁的时候进入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就读，在那里与巨商张静江的几个女儿成为好友，并经常去张家做客。

1919年时，陈洁如在张家做客时，偶然见到了来访的孙中山和蒋中正，蒋对她一见钟情，并展开热烈追求，陈洁如不知所措，但后来对蒋逐渐有了好感。陈洁如的母亲在请人调查后却发现蒋中正已经有一妻一妾，并且没有正当的职业，于是拒绝了蒋的求婚。蒋介石则透过张静江和孙中山的关系，继续向陈母表示有意明媒正娶陈洁如，并最终得到陈母的首肯。蒋向陈洁如声称自己已经与原配及侍妾脱离关系，并许诺“你将是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蒋中正有写日记的习惯。《蒋中正日记》由蒋中正从1919年直到1972年患病止，用毛笔亲笔工整在日记簿上书写，共57年，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完整、资料量最巨的领导人日记。

蒋中正1919年7月26日在日记写道：“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1919年3月，蒋旅经香港，又在旅舍中嫖妓，他说是“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蒋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1919年5月7日日记写道：“往第三十九营点名，为士兵侮辱，当时只有忍辱包羞而已。”

1920年，蒋中正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由于蒋对投机之奥妙了解非常透彻，在证券起落中，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1922年孙中山受陈炯明打击避祸永丰舰时向蒋中正求救，蒋即赶赴上海，找到虞洽卿借到6万银元；蒋带着巨款搭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在上海，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的同乡虞洽卿指点蒋中正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

从《蒋中正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中正如何从一个平凡人到领导者之心路历程，让任感觉他这个人很真实，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之人。很多同时代的与蒋中正有深入接触的人都知道蒋的生活用度非常节俭，自己补破衣，不挑食，吃东西十分简单。蒋中年以后不喝酒、不吸烟，基本上只喝白开水，日常生活很平淡。他喜欢读书，所以跟一般军人很不同，更富有文人气质。

蒋中正守传统而不古板，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批评。孙中山曾提及蒋“脾气刚烈、恃才傲物”，他发现蒋有些刚愎自用、心胸不够宽，曾担心他脾气暴戾、憎恨凡人庸才会成不了大事；但是后来看法有了改变。蒋中正也自承脾气暴躁，有时会对文官雷霆责骂、对军人拳打脚踢，他说虽然想克制自己，但是个性似乎不易改变。蒋常与人起争执，很难与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国民党中常委主席胡汉民说蒋中正“长于应急，能迅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一问题后，却因之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此《蒋中正日记》不但为后人提供了较为真实客观的历史发展线索，更重要是揭露人性真实的一面。他自认常常犯错，但知错能改，反省悔过，并且是用心和行动表达出来。

1925年孙中山病重后，汪精卫（汪兆铭）作为孙的文胆，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在北京同奉系军阀谈判时，汪精卫一直是追随左右。

孙中山临终前曾对汪精卫等表示，担心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然则遭敌人“加害”。之后闭眼不再说话。汪精卫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先生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先生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画押。孙中山表示同意。汪精卫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中山没有签字。3月11日，孙中山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

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孙中山一生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选举，因而自己不能指定接班人。

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廖仲恺是左派领袖，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精卫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

孙中山垂危之际，汪精卫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精卫表示同意。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成为仅次于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国民党领袖。

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中正主张杀之，汪精卫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汉民“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

许崇智与蒋中正虽为结拜兄弟，蒋以同样的理由排挤许，许崇智的很多亲信被抓。在蒋的要求下，汪精卫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许崇智被迫到上海避居公共租界。汪精卫感到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结拜兄弟欧阳格。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汪精卫任临时主席，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上午，汪精卫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下午，蒋中正报告军事状况。1月16日，大会选出包括汪精卫在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中正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中正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与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身

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因病在家休息，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汪精卫以治疗糖尿病为由，5月11日赴香港，经法国马赛抵达巴黎，于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3月。

孙中山一贯主张发动北伐战争以统一中国，在1917~1924先后组军发动三次北伐。1926年奉系张作霖称霸于北方，兵力35万，控北洋政府，并辖有华北、东北等地。直系吴佩孚再起后，割据中原，兵力约20万，占据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握有京汉铁路。在东南方面，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约22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控制苏浙沪赣等地。三大集团形成鼎足之势，其兵力虽远超广州国民政府。

为了宣示履行孙中山遗志，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兵力约10万人，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北伐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进攻湖南、湖北；中路进入江西；东路驻守广东东部，伺机进入福建。

北伐前，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北伐军先遣部应唐生智请求进入湖南，进展顺利。7月，北伐军攻下长沙，贵州、四川等军阀宣称归附。8月，北伐军攻下湘北重镇岳州。8月底，北伐军攻下通往武汉之险要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军兵败如山倒，从此一蹶不振。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二万多守军全部被歼，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被全部消灭。北伐军占领两湖，声威大振。

蒋击破吴佩孚后，决进取江西，亲自领兵约五万人，后又加派援军2万人。北伐军进抵武汉后，也调兵进攻江西，与十万孙传芳军发生激战。蒋亲临督战攻克南昌，孙传芳在江西军力被全部消灭，精锐尽丧，残部败退安徽南部及江苏浙江一带。此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战役，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

1926年9月，蒋命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很快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等地。北伐军势如破竹，闽军望风而逃，11月，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向浙江挺进。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则企图乘机夺占孙、吴的地盘。

此时，是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蒋中正和张作霖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4月6日，张作霖命令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了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

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还清查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包括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以及近来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分三路进军。2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第二次武装暴动”，再次失败。3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包围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国民党钮永建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起“第三次武装暴动”，占领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建立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22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中路军攻下南京。国民革命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部杀害、掠夺外侨。英、美、日领事分别报告，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蒋介石下令追查责任者。英美军舰以此为由炮击南京，遂形成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3月底北伐军占领南京，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

自北伐展开后，中国共产党员加紧夺取领导权，与中国国民党斗争日趋激烈。蒋中正因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精卫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11月下旬，汪因盲肠炎刚刚开刀，身体未痊愈，但是依然决定带着陈璧君和曾仲鸣匆忙启程回国。经过柏林时卧床不起，高烧40°C，又不得以返回巴黎。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中正权力。

3月6日，奉命组建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政治委员会委员钮永建、杨铨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会面，商谈整理上海国民党党务问题。双方意见不同，陈独秀还狂妄地称不出20年中国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

鲍罗廷在武汉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

蒋中正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蒋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先后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清党。

3月15日，蒋中正离开南昌。3月16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随即封闭解散了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各报刊及民众团体。3月16日，蒋中正抵达九江。3月17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机关被捣毁。3月20日，蒋中正抵达安庆。3月23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被捣毁。蒋中正主要依靠少数手下，借助地方帮会，通过打、砸、冲，或者挑起左右派之间“械斗”，从而区分敌我，壮大自身力量，夺取党政权力。蒋中正也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级官员。

3月25日上午，张静江约李石曾、吴稚晖会见白崇禧、潘宜之等驻上海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表示国共“非分裂不可”，李石曾的态度亦激昂。3月27日，众人一起迁入蒋中正总部行营，和蒋中正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在讨论中，吴稚晖主张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接连几天的讨论中，蒋中正始终未明确表示意见。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达上海。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

4月3日，在上海继续召开秘密会议，汪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讨论蒋的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会上议会人士与汪辩论十分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最后，汪精卫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经反复策划后决定，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

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介石公职。

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势力日益膨胀，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无端杀害其所谓阶级敌人，并剥夺其合法财产。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内讧愈演愈烈，不少不满国共关系状况的

资深国民党员焦虑不安，认为共产党的夺权危险迫在眉睫。中国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等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

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精卫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精卫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汪秘密乘船赴武汉。蒋中正受汪精卫赴武汉的刺激很大，担心汪会在武汉反悔。

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都刊登了《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报道称：汪精卫、蒋中正、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子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

（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

（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蒋中正即日起开展了夺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蒋中正在南京，其手下秘密支持帮会组建劳工会，再组织劳工会人员实施打砸及抓捕。

4月11日，蒋中正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杨虎是青帮领袖，他在行动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

汪精卫到达武汉。4月11日，汪在武汉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还在《中央副刊》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

坚持容共。4月12日，蒋在南京下令清除共产党后，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

4月12日凌晨，亲国民党右派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机枪扫射，死亡300余人，被捕200余人。接着，蒋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

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中正发表《告民众书》。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声明、宣言、通缉令，为清党建立了合法性。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各省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失去合法抗争基础，纷纷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此前各城市街头频频出现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很快消失，通过衣着、发型乱捕的情形也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

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

5月21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称中国共产党计划在5月25日开始实行大烧杀，许遂于5月21日当晚发动“铲共行动”，指挥王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围封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但滥杀左倾者，释放所有在押的地主，并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

四一二事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中正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合法财产等因素。据当时《中国周报》记者斯诺估计，被杀害之左倾分子在5,000人以上。上海流氓势力反共清党有功，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第一期清党中，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也被列为清党对象，但实际上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蒋中正等实际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敌，宣布的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也从未实施。1927年6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决定：“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

第二期清党虽标榜要清除党内土豪劣绅，但缺乏标准，也没能实现目标。部分地区清党手段残酷，尤其是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及其特别军法处手段更残酷。白崇禧、周凤岐联名向蒋中正表达对上海清党的不满，要求加以规范。埔军校学生也因不满清党中的做法而不断给校长蒋中正来信来电呼吁规范。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携一份《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到达武汉，把这份指示先拿给汪精卫看。其中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汪精卫认为这几个指示会让国民党灭亡，这让汪精卫开始决定分共，但他希望能争取到宁汉之外的第三方冯玉祥的支持，从而达到分共制蒋的一箭双雕效果。不料冯玉祥另遣李鸣钟与蒋中正联络，蒋中正答应给与冯玉祥更好的条件。6月

20日，蒋中正、胡汉民、吴敬恒等与冯玉祥会于徐州，协议统一指挥，完成北伐，22日由冯致电汪精卫，指责武汉之恐怖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公开了《五月指示》，指责共产党的政策，但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抗议并退场。会议最后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国民党和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予以停职。但汪精卫亦表示无意采取暴力分共，武汉政府更派员到莫斯科，讨论切实联合办法，保护中共党员的个人身体自由。在当天，汪精卫得知了7月13日中共发表的宣言，次日，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抨击共产党“破坏革命”，并将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一律停职。

评注：蒋中正因清除共产党被中国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中国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中国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延缓了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权力，完成北伐。开启了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统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国共内战失败后离开大陆。

清党对中国国民党组织发展影响深远。清党期间，除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内的左派党员和思想较激进的青年党员亦被当作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基层农工党员出于失望或恐惧而自行脱党，重创了国民党的形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4年春到1927年春，国民党员总人数从不足20万增至100万人，其中普通党员约60万。清党后，据1928年3月统计，普通党员已减至22万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19万党员，清党后“合格党员”仅1526人，其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而在汉口，清党前原有3万多党员，登记时仅5000人。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使得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

普遍发生的投机、暴力、专断与诬陷等情形使清党严重扩大化、黑暗化，对国民党自身造成很大伤害。大批对国民革命抱持高度热情，或是热衷于农工学运动的党员，因为左倾而在清党期间被当作共产党人惨遭清洗。

清党的另一个后果是使国民党地方组织遭受极大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省及其以下之地方党部有着不少共产党员担任干部。清党发生后，国民党地方组织随即陷入瘫痪。清党之后，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逐渐“光棍化”，基层组织逐渐衙门化，党和民众逐渐疏远。在地方自治工作

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称：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

7月，被北伐军击溃之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铁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蒋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之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持蒋之地位；蒋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1927年8月8日《蒋中正日记》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然而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早已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无可替代的人物。蒋下野后，李宗仁于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精卫翌日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称，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停止办公。汪精卫遂覆电李宗仁，决定迁往南京，宁汉合流。9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蒋中正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此时，蒋正欢迎从德国延揽来之外籍顾问鲍威尔将军；德国人为蒋中正制订一套参谋本部制度，称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之军事作战和决策。

蒋中正宣布下野后，回家乡住一个多月，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广泛接触，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只表示支持蒋反共和统一中国南方，不支持他北伐及统一整个中国。

10月3日，蒋中正到神户，与宋子文同赴有马温泉见宋母，请其允诺与宋美龄之婚事，宋母允其所请。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蒋宋婚事，其时蒋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表示要遵守基督教义，宋母方予允准。10月19日，国

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蒋 11 月 8 日离日回中国。12 月 1 日，蒋中正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蔡元培担任主婚人。

192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会议最后一天恢复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评注：宋美龄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父亲宋嘉澍是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担任美南监理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以印刷和批发《圣经》致富。母亲倪桂珍，她的父亲倪韞山是基督教圣公会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为上海名门望族。

1908 年，宋美龄与宋庆龄同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皮德蒙特学院、卫斯理安学院就读。1912 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宋美龄 1917 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1922 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见面。宋美龄和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宋庆龄家里，当时孙中山一家正在广州；蒋对宋美龄一见倾心，便追求宋。蒋曾赞成孙中山同宋庆龄结婚，见到宋美龄后不久，蒋就自己打算同宋美龄结婚之心事，向孙征求意见。孙认为宋美龄接受之可能性小，并且劝蒋不要操之过急，使蒋大为吃惊。

蒋宋联姻不仅使蒋中正与孙中山家族有了连襟关系，还直接促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合作，是蒋中正日后主政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本，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28 年，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霭龄之夫孔祥熙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后任中央银行总裁。陈其美姪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在蒋中正政府掌握党政大权。

1927 年蒋中正和宋美龄大婚，一家报纸刊登两人结婚照，底下配着四个字“中美合作”，一语双关，确实预示了蒋中正今后要走与美国合作的道路。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认为，蒋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同时心性坚苦卓绝。蒋对黄埔军校训练和发展颇有定见，正是蒋之坚持，黄埔学生始能取得佳绩。蒋练兵事必躬亲，严格督导学生之教材、训练、生活，教导学生清洁、卫生、服装。蒋年少浪荡，但极思反省改进。也颇敬重、爱慕宋美龄。

从 1920 年代末期，蒋逐渐习惯早起、静坐、读书、饮食简单、不抽烟、不喝酒、爱情专一，后来增加祷告之生活。蒋随时随地读书，很留意时势，很注意欧美新闻报导；勤学扩阔他眼界与视野，增加其政治智慧。在历次

挑战与竞争中，蒋都不是被动挨打。他隐忍于弱势时，甚至暂时退避；时机一到，立刻全力反击，毫不手软。蒋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复以儒家修养抵励，掌握军事财政力量，迅速攀上权力高峰。其中固然充满权谋机变，但更多是大势必然。

据日本高田第 13 师团师团长长冈外史在回忆录中称，留学时期之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之表现。要让蒋与普通士兵一样去扫马房时，蒋之面上即显出悲愤之色，那种气慨，几乎无人敢当。当然，令师团长吃惊是，蒋在 1927 年 11 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时，特意走访他，这使长冈对此颇感意外，而蒋临走时，特别写下“不负师教”四字。长冈骤然感慨，蒋能有今天，大概是因为有这类美德之缘故。

第五章 陈独秀被免除中共中央领导权

1927年中共在权力斗争中加紧行动，控制党政要害部门，联合国民党左派，分化国民党，最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权斗中败北。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批评。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当日，鲍罗廷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实为软禁。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评注：陈独秀一生的政治思想变化很大。开始他崇尚欧美的民主观，发展到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到后期又部分地回归。胡适称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家谱名庆同。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瘟疫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后，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没考上。

陈独秀从小受传统教育但内心十分叛逆。他乡试没有中举人，心里就鄙薄科举。他18岁便由父母包办婚姻娶了妻，但与旧式妻子感情不和，个人生活便更趋叛逆。

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一年后转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组织抗议清廷与沙俄准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创办《爱国新报》。

清廷并下令通缉。陈独秀逃往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报》，被上海地方政府查禁后又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安徽俗话报》，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文章《婚姻》，批评中国传统婚姻伦理“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1905年8月，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办学工作。1907年春，因两江总督端方发出通缉令，陈独秀再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

1909年9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09年，陈独秀与在北京师大读书的小姨高君曼公开同居、结婚，“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陈独秀后来对高君曼移情别恋，于1925年分居，后来又有两任妻子。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由“独秀”亦名可知此人有多么的恃才傲物。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认识，胡适写信谈了他对文学改良的想法，陈独秀非常认同。《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热烈反响。鲁迅前后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五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坛巨匠的地位。鲁迅是沾了陈独秀的光，才能上自己的文章呼吸上了自由的空气。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如鱼得水。《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进一步扩大到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评论》杂志。

陈独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评和争议。他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提倡白话，一直受到很多批评，有压力排挤他和胡适等人，包括来自政府的压力。对于陈独秀个人，还有一个谣言是关于他嫖娼的事。嫖娼在当时

社会屡见不鲜，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大有“探艳团”之恶名，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提倡戒赌戒嫖等。

当时新派人物在主张解放婚姻的同时是主张废除娼妓的，认为都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但陈独秀在这一点上却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间因为嫖妓闹得满城风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说：“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者底觉悟》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拜访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至1927年，陈独秀连续被选为共产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陈独秀四次提出不参加或者退出国民党，全部被共产国际拒绝。四一二事件中，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被杀，想不到现在更被停职检查。真是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啊！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主义铁拳的痛击。他自己说：“我自从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

1926年至1927年蒋中正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因为“容共”或“清党”两种意见的冲突，而造成内部分裂。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共产党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等人也出席了大会。中国国民党领导汪精卫、徐谦等列席大会。

1927年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中共与蒋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其实陈独秀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他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之前，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入党。1924年10月，26岁的陈延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次年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奉命前往上海重新组织当地共产党活动，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被国民政府逮捕，拒绝招降，于7月4日被押赴刑场，宁死不跪，被乱刀砍杀，尸体被抛入黄浦江。第二年，次子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边被杀害，尸体也被抛入黄浦江。陈独秀不到一年就失去两个儿子，悲痛欲绝。

中共五大，陈独秀代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关系等11个问题。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5日，武汉汪兆铭政府知悉苏联顾问鲍罗廷，决定和平分共。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根据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全面暴动。

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八七会议确定了今后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

后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周恩来因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也缺席。

中共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组织暴动。国民党军张发奎辖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及贺龙的第二十军，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团长朱德会合，准备发动武装反抗。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中共部队向驻守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国民政府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队撤离南昌。

张发奎拥护武汉的汪精卫政府，部下不少人为共产党人，包括叶挺。南昌事发后，张发奎立即率领其余部，包括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二师（缪培南）、第四军二十五师（李汉魂）、第十一军二十六师（许长志）前往南昌讨伐。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击退中共部队，叶挺及贺龙部队往广东潮汕、梅州退却。因天气暑热，中共起义军长途行军，且未鼓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

在起义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南下进击潮汕地区，企图获得苏联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师，加上朱德的教导团及20军新组建的3师约3000多人，坚守三河坝，抗击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3个师的追击。失败后的中共部队在南甯途中遭粤军和中央军夹击。

9月23日至10月2日，南下中共部队到达汕头。于潮安汕头战斗及揭阳战斗过程中，一度攻占潮汕，但最终于汤坑受到大败。20军2个师投降，领导机关分散突围。后谭平山、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分别前往香港、上海。董朗、颜昌颐率1300人余部转移至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赤卫队会合，后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朱德所率领的部队撤出三河坝时剩2000多人，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200余人，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提出隐蔽北上湘南。10月16日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0月17日击退追敌，剩下1500多人。部队到达江西安远的天心圩的状况时，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只剩下朱德，政工干部全走了。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比做1905年俄国革命。此时部队约800人，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

任纵队参谋长，下编3个步兵大队，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只有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编余军官编成教导队。

南昌起事后当日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南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挂羊头、卖狗肉地成立了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张发奎等所谓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中共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途中到达长汀时，革命委员会决定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并以谭平山为国民政府委员长，陈友仁、顾顺章、王荷波、苏兆征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9月24日，中共部队到达汕头后，决定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并决定由谭平山任国民政府主席。25日张太雷到达汕头，提出反对此前的决定，并即于第二天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暂不发表国民政府名单。

11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以违反共产国际指示所谓“政治纪律”问题，决定将谭平山开除出党，并给予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三人处分。张国焘制止不力，也被记过处分。

1928年1月中，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事军余部二千余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此前，中共湘南特委在湘南各县城镇和乡村中恢复和建立了工会、农会及起义队、赤卫队等组织，已制定《湘南暴动计划》。故此朱德得知宜章县城的守卫军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伪装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团副的身份，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稳住宜章的政府高层后，大部队随即跟进。为了不让国民政府要人逃脱，朱德要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都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以便一网打尽。

2月21日下午，胡少海带领先遣队开进宜章县城。22日下午，朱德、陈毅率余部开进宜章县城。宴会和县参议会里举行。酒过三巡，朱德落杯为号，起事军一拥而入，枪口对准国民政府的县长、官员及当地士绅。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起事军，迅速占领了驻在当地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400余人。

2月23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给群众分发粮食，庆祝暴动胜利。朱德宣布起事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

国民政府得悉此讯后，遂命令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受命后立即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欲平定湘南的暴动。朱德即率领部队秘密撤出宜章县城，隐蔽在乡间，与当地农民配合，坪石一战，以少胜多，击溃了许克祥的兵力。随后重占宜章，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

在此期间，安仁、茶陵、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县大部地区的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事，起事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广泛鼓动工农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

3月下旬，国民政府湘粤两省军队7个师从南北西三面联合进攻湘南地区。中共湘南特委提出了比土匪还狠的“焦土战略”，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以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在部分人员提出反对意见后，决定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并向各级干部施加压力，强令执行，没有商量余地。

消息传到郴州，立即遭到大部分群众的强烈反对。3月21日，中共郴州市委在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时，会场一阵骚动，台下群众表现出极度的愤怒。几名群众手舞大刀蹿上讲台去，将台上中共县委书记夏明震等9名干部砍死，引发台下群众使用大刀、梭镖、锄头等械斗，当场死伤200余人。中共特委派陈毅率两个连前往平乱，陈毅再次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首先代表县委作公开检讨，承认烧毁大路两侧房子的决定是错误的。但土匪式的恶行致使工农革命军无法在当地立足。朱德、陈毅率起事部队只好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往湖南乡下去考察，至2月5日止，共考察了三十二天，经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布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毛泽东给中央的总结报告中说：“为应付目前环境，准备不久要求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最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在才六千），省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独委，这样才有办法。”

八七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于1927年8月18日携夫人杨开慧及其儿子抵达长沙，参加了改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开会决定缩小暴动区域，以长沙为中心，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发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毛泽东将杨开慧送至距长沙六十公里杨开慧的老家板仓。

9月初，毛泽东抵达安源，部署暴动。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驻修水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22岁的团长卢德铭是中共党员），安源路矿工人，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纷纷起事。各路起义军先攻克平江、浏阳，然后包抄长沙，但在平江、浏阳先后失利。因收编部队叛乱及临时组成的农军经验不足，导致溃不成军。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湖南、江西边界，参加秋收暴动的各支队伍，

集中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共三个团，共 5,000 多人。余洒度任师长，毛泽东任师党代表，卢德铭担任秋收暴动总指挥。

9月10日，4团邱国轩部为抢劫辎重队，突然袭击打散了1团的第2、3营，两个营剩下不到200人，团长钟文璋离队，压后的1营与师部完好，卢德铭带领1团残部去文家市。2团未能攻克萍乡，随后攻占醴陵县城，后遭偷袭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

9月19日，起义军余部在文家市汇合，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师长余洒度进攻长沙计划，主张“向江西萍乡退却”。毛泽东计划向南把这支部队带去一百七十里外的井冈山，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唯一在场的党代表。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国民政府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成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出没之地，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毛泽东计划将他们的地盘抢过来，作为根据地，但24日毛泽东的部队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激战中阵亡。之后，毛泽东收编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人马。

9月29日，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提出立了“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治军方略。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史称三湾改编。

10月3日，毛泽东的部队从三湾来到江西宁冈县古城镇，当天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共60余人。会议上，决定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井冈山的茅坪、大陇一带。在此，毛泽东听回报的探子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于是率部上了井冈山。

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时，陈独秀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评价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实行惩办主义政策，将毛泽东、彭公达、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残部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砦市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4日，在龙江书院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共三个师八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第十二师，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

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指导方针。6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毛的信中说：“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此后，部队才正式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毛部队在井冈山驻军共历时两年零四个月，至1930年2月。

评注：在井冈山，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毛泽东说，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¹³⁾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了解了中共的历史，如果谁还相信中共领导革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他就应该把自己的鸡巴切割了喂狗了。

毛泽东如何分析其独特的原因和存在发展的条件呢？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1928年10月25日，毛泽东于宁岗步云山《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

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绝俄”政策。在1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对苏绝交决议》。年底，南京政府又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消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苏联在华的太多商业机构。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在北宁铁路上刺杀而死，28岁的张学良继任，统领奉系。张学良认为苏俄、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其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对苏联的经济机构进行查封，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2月29日，张学良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即日改悬国旗，东北易帜，完成中国表面上的统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俄罗斯莫斯科近郊五一村“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代表当时全国13多万名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革命的性质、对象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由于此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镇压政策，共产党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遂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由向忠发主持，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现在处于低潮，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陈独秀已于 1927 年八七会议上被撤总书记职务，但是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拒绝出席，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

1929 年 6 月 22 日—25 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

7 月 7 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取得中央政府对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支持。7 月 10 日下午在北平，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外交部长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民国驻苏外交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蒋介石决定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资助军费几百万银圆。会议决定收回中东铁路，驱逐所有俄籍人员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迅即付诸实行。

7 月 14 日苏军在中苏边境接连举行军事演习和利用飞机进行示威飞行等军事示威行动，对中方展开心理战。7 月 18 日，苏联发出第二次通牒，并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驱逐中国驻苏代表离境，与中国断绝邦交。

蒋介石对张学良表示，中央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继续鼓动张学良对苏联采取武力威胁的强硬政策。7 月 1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7 月 20 日苏联对中东路东端的绥芬河方面进行炮击。7 月 26 日苏方在中东路西端的满洲里朝 3 个方向进行炮击。7 月 29 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

8 月 6 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兵力号称有 3 万人之多。动员包括预备队、边防部队在内，苏联红军 20% 的力量前往前线及周边地区。8 月 8 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 2 门、机枪 3 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8 月 13 日，苏联兵舰两艘，陆战队员 300 人，飞机两架，侵入黑龙江省绥东县境。刘伯承、叶剑英、黄平等响应苏联的号召，参与“远东工人游击队”，协助苏联进攻中国黑龙江海拉尔之役。

由于这是当时东北易帜后的中国第一次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8 月 15 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东北军一线兵力增至十余万人，相对苏军略占优势。8 月 17 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当日起，中俄军队在多地发生激战。

8 月 23 日发生密山战斗。8 月 28 日至 30 日发生汪清战斗。10 月 2 日，满洲里之战爆发，双方战斗激烈。

战斗进行最激烈的 10 月到 11 月之间，苏军大幅增强己方战力。据中方的观测，苏军在中苏边境部署海陆空将近 8 万人规模的军队。

在东线，经过三江口、同江、富锦三次战役，苏军连连得手，东北军节节败退。西线的主要战场在满洲里与扎赉诺尔一带。从 1929 年 8 月起，这里的冲突接连不断，发生大小战斗 100 余次，苏军侵入中国内地百余公里。进入 11 月，战事升级，主要有扎赉诺尔战役、满洲里战斗、海拉尔战役三次战役。据苏方记载，在达赉诺尔和满州里的战斗中，中国军队 1500 人以上战死、9000 人以上被俘，而苏联方面则死亡 143 人，失踪 4 人，受伤 665 人。中方大炮 30 门、装甲列车 2 列被苏军俘获。斯大林因此次胜利而狂喜：“明显，我们远东集团军的人让（中国人）吓破了胆。”

中国政府不得不在 1929 年 11 月 26 日求和，承诺恢复苏联对铁路的控制并“解除白卫军的武装，将其组织者和煽动者从中国东三省铁路驱逐”，并呼吁各国派遣调查团前往实地调查侵略苏联真相。双方开始停战谈判。

1929 年 12 月 20 日，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未授权蔡运升签约的情况下，蔡运升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协议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

12 月底，苏军开始撤军，但继续占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 360 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

对于《伯力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蔡运升无权草签“伯力会议记录”，因而对“伯力会议记录”不予承认，并将蔡运升等人撤职查办。从 1930 年 12 月 4 日至 1931 年 10 月 7 日，国民政府派莫德惠与苏联交涉，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 25 次会议，始终未能取得结果。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的原因是蒋介石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

1929 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 8 月 1 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

刘伯承与叶剑英等人响应“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参与“国际义勇军”，前往伯力加入即“远东工人游击队”执行特殊任务，与国民政府军张学良部作战，协助苏联进攻中国的黑龙江海拉尔之役。同时，共产国际派遣伍修权担任苏联红军翻译。

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则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8 月 22 日，在奉天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用潜一同被捕，9 月

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日后，此事成为诬陷刘少奇“叛徒”的重要证据。

中东路事件中，中苏双方的武装冲突在1929年12月即已结束。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并未结束，持续数年。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认为工人阶级遭受的惨败，是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一手造成的悲剧。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个主张是反对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提倡工人阶级民主、主张性解放和伦理自由。陈独秀被认为是托派主义的中国代表。

7月28日，陈独秀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应，称他的提议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进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对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扩大。10月，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只有认错，“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

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评说：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虽然思想有些叛逆和激进，但良心从未泯灭。是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陈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这样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服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上仍然非常幼稚。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陈独秀的悲剧尚未结束，等待他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监狱里那暗淡的微光。

第六章 蒋中正统一全中国

1928年1月3日，蒋中正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2月2日，蒋在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政委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中正从而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3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正式成立，以蒋为校长。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一次会议，推蒋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8年，全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评注：从蒋中正1927年底定都南京开始，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高水准。

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称，1928年至1937年，中国国民党力量巩固，取得成就。政府积极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建设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立法禁毒、扩大农工生产。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接轨。当时中国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发展长足，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

1928年6、7月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本平等互惠原则重订新约，此后一年间，与各国所改订之新约以通商条约和关税自主条约为主。

6月下旬，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约有70人是中国银行界和工商界头面人物及财经问题专家和学者。财政部长宋子文向会议提出财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

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美国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之后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在全国经济会议上，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宋子文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国币。

中国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基本的社会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

1928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业。1929年1月，铁道部长孙科提出《庚款筑路计划》，拟6年中从庚子赔款和关税中集资4亿余元，修建铁路4,000余公里。

国民政府把公路建设列为国家经济建设要政。1928年，交通部拟订全国公路计划，以兰州为公路中心，分全国公路为国道、省道、县道3种，总长为41,550万公里，预计10年完成，并成立铁道部。

南京十年这段时间，国民政府首重教育，开始订定学校设备与课程标准，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致力扫除文盲。国民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国语作为标准语言得到推广。

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及复兴文化运动，企图籍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及主张排斥病态与奢华堕落的清洁检查政策。政治上另一个特点，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在文化方面，发展与动乱间，造就许多各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学影响政治界的鲁迅；创造新哲学观的胡适；文化出版业的邹韬奋及陶行知；文学界的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京戏与新艺术的梅兰芳与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顾颉刚、徐悲鸿、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及傅抱石均对1930年代的文化中国贡献良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8年秋于南京设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政令的机关，同时各省市的公民营电台亦迅速增加，全国电台，无论公

营民营，均受该会的指导监督。报业和杂志出版业在政界、学界各派竞逐，十分兴盛。同时期政见不同者在各个媒体仍然针锋相对，尤其在左翼及亲政府人士之间为甚。反映社会仍享有相当言论自由。

1929年3月至10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先后在上海成立。

国民政府除发展各级教育外，亦派学生出国留学。1929年，教育部颁布《中央派遣留学生管理章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民政府与西方英、法、美诸国友善，跟德国也关系良好，而跟日本、苏联疏远。

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

十年建国期间，即由1927年至1937年，可说是国民政府法统创立时期，主要标志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完成。民法典是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间草拟分期公布的，主要是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民法条款。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

国民政府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权利。1928年9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及青海、西康、宁夏等边疆民族地区正式改设为同内地一样的行省。

国民革命军建军之初，原聘用苏联顾问，自1927年中共发动广州起事后，国府即与苏联断交，转为聘用德国顾问，开展中德十年军事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在德国顾问的建议及协助下，积极发展空军，并陆续由美国、意大利购入新飞机。

北伐完成后，国内隶属于国民革命军下之武装，多达220万之众。为了达致国家实质统一，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国府乃计划部队的编遣，加

强效率，从而充实战力。1928 年底德国顾问团鲍尔等，即针对此情形提出“裁军及整军委员会计划书”，建议保留 65 个师，建立一支完整，战斗力强且属于国家的军队。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1928 年 6 月，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赶回奉天继位。12 月，东北易帜，张学良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改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顺国民政府。北伐宣布成功，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

蒋中正北伐过程中，将自愿投靠国民政府部分军阀，直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北伐完成后，中国国民党大多在各地留下政治分会。地方军阀掌控军事、人事、行政、财政大权，中央无法从地方军阀控制区获得税收。有些地方军阀扩大势力与中央冲突。中央对各省份影响不彰，不但无法介入，只能以谈判调停纠纷；甚至必须支付预算给不受号令、独立自主的各地军队。全国军费支出超过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财政部统计实际军费甚至是国家预算 2 倍以上，加上军阀以提伕等方式，征用民众人力、物力进行战争，深深威胁蒋的统治地位与国民政府经济。

1928 年 6 月，蒋呈请设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屡次发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征求意见，以期协调一致，实施裁兵。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何应钦在 1928 年 7 月 2 日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编遣计划，提到全国的国民革命军共有 84 个军、272 个师，总编制人数 220 万人以上，全年军费 8 亿元，而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仅 4.5 亿元，缺额差距极大。7 月，蒋发表整军意见及裁兵方案，并决定由第一集团军率先裁编，以为之倡。蒋最初构想是将全国军队缩编为 80 个师、120 万人，军费降低至国家预算的 60%。

1929 年 1 月 1 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在南京召开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商讨国军编遣，减低军费支出。蒋决定依据德国顾问建议，推动“军队中央化”。除了各集团军外，蒋提出另外在全国编制 20 万人宪兵维持治安。若算入宪兵后，中央军力明显优于其他集团军。在编遣会议上，四大派别都希望本派军队少裁，别派多裁，以谋取最大军政利益。虽然后来的结果是会议破局，但是各派决议为各军应尽快改编为师，四派总和兵力应保持在 60 万人内，中央政府分配 20 万人配额，其它派系则维持在 10 万人左右。

由于裁军将大幅削弱军阀实力，遂引起各派系疑虑。这使各军事派系关系开始紧张，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冯玉祥、与桂系李宗仁等不满军队被削，过去赖

以为生的军权，等同被蒋变相并吞，故开始进行反南京国民政府之举动。各派在善后编遣会议上政治斗争导致矛盾激化，但各派在会后亦陆续按会议决议开始整编部队。

在1928年初，新桂系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等主持湖南政务，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但鲁、何二人不和。1929年2月，鲁涤平暗地投向蒋中正，蒋中正并绕过武汉政治分会接济鲁涤平部大批军械弹药，何键查扣后当即上报李宗仁为主席之武汉政治分会。2月21日，新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叶琪等人大惧，在未得到李宗仁同意，亦未与二号人物白崇禧商讨之前提下，即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擅自宣布免去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同日，夏威、叶琪二人率部进军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

李宗仁因担任国民政府中央职务，与家眷常住南京。李宗仁闻讯后，因担心自身安全，迅速离开南京，避居上海公共租界。蒋中正以“违反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各地政治分会不得擅自任免辖区内特定人员”为名，调集军队，准备进攻新桂系。

3月，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北上南京调停蒋桂矛盾，被蒋扣留。粤系将领陈济棠、陈铭枢所部在广州投蒋，粤桂政治联盟被拆散。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准备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暧昧，新桂系陷于不利境地。

蒋桂矛盾激化之后，驻扎河北之新桂系部队由白崇禧指挥。白崇禧原定沿保定，津浦路南下徐州，配合湖北桂军东进攻击南京，但其部原多为唐生智旧部。蒋将唐生智从日本接回，并派唐生智赴河北唐山收买其被白崇禧收编之旧部两个师。唐生智对旧部之影响，使白崇禧对军队失去控制，幸得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通知，侥幸逃生，乘船逃离河北。以广西籍士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官只得辞职南下，余部被唐生智旧部李品仙收编。蒋桂战争尚未正式爆发，河北桂军已经土崩瓦解。

白崇禧乘海轮南下香港，蒋中正命海军截停此海轮，如不尊号令，可将海轮击沉。但消息泄漏，李宗仁委托日本方面派船中途迎接白崇禧护送至香港。李宗仁为保住武汉，于上海电令其第四集团军夏威、陶钧、胡宗铎等三个军在黄陂、武穴一线布防后，潜回广西组织反蒋。而李宗仁、白崇禧因交通原因，均无法返回武汉指挥新桂系部队，黄绍竑留守广西，因粤军态度不明，亦无法北上。新桂系部属实质上进入了各自为战之状态。

3月28日，蒋令朱培德指挥5个师由江西省九江、南昌进占武昌至长沙铁路沿线，切断桂军退路；刘峙指挥5个师又1个旅由安徽省与湖北省边境进攻武汉；韩复榘指挥5个师从河南省向武汉进攻。3月31日，蒋下达总攻击令。

在大军压境的不利情势下，新桂系将领间也因积怨而分裂，胡宗铎、陶钧与李明瑞、俞作柏等人不和。俞作柏与李明瑞接受蒋中正以 40 万银圆的代价收买，蒋并承诺两人战后将委任广西督办与协办。被新桂系扶持的湖南省主席何键亦倒向蒋中正。4 月 3 日，桂军李明瑞所部在花园、孝感倒戈。

俞作柏、杨腾辉等人与蒋中正接洽后，宣布不参与“内战”，将所属部队沿粤汉铁路撤离。新桂系在武汉周边的防线出现多处缺口，南京政府军趁隙自安徽、江西、河南、宜昌四面进军包围武汉。新桂系被迫放弃武汉，退守湖北西部。同时，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到达香港，自广州西进返回广西，与留守广西之黄绍竑会面。但湖北形势已经不可逆转。

4 月 25 日，蒋下令进攻广西。蒋并去信告李宗仁、白崇禧下野出国，黄绍竑可以留任广西，但广西将由李明瑞、俞作柏主政。新桂系认为此条件十分苛刻，不予接受，动员部队准备迎战。

5 月 5 日，新桂系宣布成立“护党救国军”，通电讨伐蒋中正。计划主动出击，先攻取广东。5 月 15 日，北方之冯玉祥提出与新桂系合作讨蒋，出兵进攻蒋中正。但其属下石友三、韩复榘等人投向蒋中正，冯玉祥的出兵计划因此受挫。

5 月中，新桂系部队兵分两路攻入广东，击败粤军，进抵广州城下。蒋中正调集湘军、黔军、滇军等部攻入广西，牵制桂军。桂军与粤军在白泥地区展开决战。桂军侵粤被击退。桂军被迫撤回广西。但同时桂军在桂林、柳州一线连连获胜，击败湘军、黔军、滇军等部。同月，湖南何键部由湘南向桂林推进；广东陈济棠部由肇庆攻梧州、贺县；云南龙云部经贵州独山县进占柳州。

蒋中正迅速调动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所部原桂军南下广东，西进进攻广西。因李、俞、杨所部战斗力较强，迅速攻占了梧州，桂平守将韦云淞弃城，桂军至此已无力再战。

5 月 26 日，孙中山灵柩扶入灵车，由北平南移。28 日，灵柩抵达南京。停灵公祭至 31 日。6 月 1 日，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举行奉安大典，灵柩由其夫人宋庆龄和子孙科及党政要人护入墓室。各国使节、各界群众前往送殡，队伍长达 3 公里。全国各地举行公祭，并令全国停止工作及交通 3 分钟，以示哀悼。

6 月，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下野。新桂系自宁汉战争和“二次北伐”以来势力不断扩张，至此受到严重打击，丢失全部地盘，包括大本营广西。所有军事实力基本损失殆尽。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越南西贡、海防等地。6 月 27 日，李明瑞所部入南宁。新桂系势力失败，蒋委任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主政广西。蒋桂战争结束。

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三人主政广西后，因政治面貌左倾，并引入共产党邓小平等在广西活动。于是仅3个月后，蒋中正即出兵广西，驱逐李，俞等人，广西政局陷入混乱，李明瑞等其后与邓小平等共产党在广西建立共产党根据地。

评注：蒋桂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广西百色策划暴动，企图武装夺取广西政权。

1929年上半年，被蒋介石收买了的原桂系将领俞作柏和李明瑞临阵倒戈，回师南宁，主持了广西军政工作。俞作柏和李明瑞既想反蒋又想反桂，可是又怕孤掌难鸣，迫切希望和共产党人合作。就派人通过南方局捎话过来，要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到广西合作。

7月底，代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昭礼，化名陈豪人，被中共中央从福建派到南宁，通过粤系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秘密主持广西军委工作。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是通过陈豪人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的。

1929年8月底，邓小平化装成商人（化名邓斌），匆匆离开上海，受命前往广西，准备协助领导武装起义。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劝阻，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和邓小平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做好接应南宁军队撤退到左右江的准备。10月初，俞作柏和李明瑞反蒋失败，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为护照原因而滞留南宁。陈豪人和邓小平领导中共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举行了南宁兵变。接着，指导李明瑞、俞作豫和张云逸分别率领兵变后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

10月22日，陈豪人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抵达百色。立即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

参加暴动的人员除了中共派来的骨干外，主要是由张云逸和李谦掌握的广西国民政府警备第四大队的三个营和南宁军官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加上来自恩隆、奉议、思林和凌云等县的农民自卫军，约3000人，以及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军，加上百色的农民自卫军，约1000多人。

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西部的百色转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李谦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韦拔群任第二纵队长。中共广

西前委也改名红七军前委，陈豪人任书记，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等任委员。第二天，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雷经天为主席，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

百色起义后来成为邓小平重要的政治资本。百色暴动举行时陈豪人是中共广西前委书记和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是中共在广西右江地区和红七军的首要领导人，在暴动中起着旁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文件中他的名字和邓斌是并提的，可是后来在大陆的一些出版物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陈豪人的名字和他在百色暴动中的领导作用是经常有意或无意不被提及的。

张云逸是前委常委和右江督办主任，也是参加暴动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参加领导和策划暴动工作的还包括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李立三的弟弟李谦、广西特委在右江的负责人雷经天、和东兰县农军总指挥韦拔群等中共党员。其中的龚鹤村虽然并不在前委委员的名单之内，但全程参加了暴动，还主持了红七军成立大会，应该在领导者之列。不过后来龚鹤村逃离了红军，并在香港和中共彻底决裂，在百色暴动领导人的名单中就完全消失了。

作为中央代表邓斌曾经参与策划和领导暴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担任指导左右江地区工作的中共广西前委第一任前委书记。领导了南宁兵变和解决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等前期工作。可是在暴动发生的三或四个星期之前，邓斌已经离开了左右江，在前往上海汇报的路上。所以后来说邓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百色暴动，多少是有一点儿勉强和颠倒史实的。

新桂系失败，使得冯玉祥、阎锡山两派与蒋中正矛盾加剧，造成随后各派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

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冯自任西北路权党救国军总司令。蒋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前赴济南，慰勉韩复榘。5月11日，中央军发起总攻击。战事揭开序幕。战场可分为南北两方面：北方主战场在河南，副战场在山东，分别沿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三条铁路进行；南方战场主要在湖南的岳州、长沙一带，沿湘江进行。

反蒋联军中，以西北军战力最强，拥有全中国战力最强、数量最多的骑兵军和铁甲车队，以及善筑高大的垒楼、挖掘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闻名，让严重缺乏自动武器及重火力的中央军难以应付。

战争初期，数量较少、缺乏重装备的中央军主动在陇海铁路发动进攻。并在豫东马牧集与部署坚固严密防御工事阵地的万选才第十二军发生激战。西北军援

军陆续投入增援归德战线的第十二军，蒋介石命令刘峙率第一师、第三师、教导第一师、第十一师兵分三路攻击。

第一师代师长徐庭瑤以自告奋勇的第九连连长张灵甫为先锋，亲自突袭攻下防守工事险固的塞城谢集，接连攻占郑村、民权。中央军猛攻，抢下归德等重要据点，蒋命刘峙大举西进。

5月22日，反蒋联军主力进入兰考地区布防。冯玉祥调整部署分四路反攻，激战旬余，刘峙部退至定陶、曹县、民权地区。西北军使用铁甲车队，让中央军攻势损失惨重。双方大战僵持不下，惨烈鏖战超过一个月，在民权、野鸡岗一带相互僵持，拉锯战超过三个月以上。

5月31日，西北军第二方面军骑兵集团司令郑大章率千余骑兵奇袭中央军后方的归德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飞行员和地勤50余人并进攻附近的朱集车站。郑大章认为车站有重兵把守，干扰后自动离去。实际当时车站守军只有200余人，蒋介石就在此地。而且，当时蒋介石的指挥列车有车厢无车头，无法逃脱。郑大章的离去使蒋介石逃过一劫。

6月4日，冯玉祥旗下优秀的野战指挥官樊鍾秀被国民政府飞机队在许昌前线炸死，对西北军的平汉线战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西北军的攻势放缓使得何成濬指挥的第三军团得以喘息，并继续与西北军进行消耗战。

6月13日，何成濬部退守漯河。在平汉铁路，中央军攻势逼迫西北军调来主力精锐支援，冯玉祥被迫回来亲自坐镇指挥。

另晋军方面，被阎锡山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指挥反蒋之战。5月下旬，阎部沿津浦铁路进攻德州，迫韩复榘部向南撤退，在石友三部配合下，于6月25日攻克济南，6月27日进至泰安、曲阜。晋军在兵力较少的中央军主力西调时奇袭山东，以数百门重炮打击缺乏炮兵的中央军，并遣派别动队从东阿偷袭渡河，使杂牌部队的韩复榘不支退败。晋军主力强渡黄河，进占德州、东明等地，韩复榘、马鸿逵败退。但晋军未能提供援助，伤亡惨重的西北军逐转守势。

西北军在开封修筑高垒深壕，密布鹿砦、诡雷的严密防御工事，击退中央军张治中率领教导第二师的反击。并且差不多与阎锡山的晋军成功包围中央军。

7月，蒋中正亲赴前线督战。阎锡山发动曲阜包围战与中央军激烈攻守，陇海中央军胡宗南奉令带第一师北上增援，进入防守的西北军在陇海线大筑工事，压迫中央军陷入僵持状态。蒋介石仍坚持在前线的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作战，稳固中央军战线。湖南战场结束后，蒋介石决定自山东津浦展开反攻，并自青岛发动登陆增援韩复榘反攻。8月初，晋军全线溃败，阎锡山为挽回劣势出重金收买冯玉祥，支援武器补给请求西北军进攻徐州。

8月，反蒋联军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合取蒋介石。

评注：自古成王败寇，英雄代有辈出。冯玉祥、阎锡山等民国军阀，叱咤风云，雄霸一方。人人各有命运，皆是天定，亦是自作自受，因果相报，分毫不差。是世界改变了他们，又是他们改变了世界。

冯玉祥 1882 年生于安徽巢县竹柯村，家庭赤贫，父亲做泥瓦匠。20 岁投靠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1918 年 3 月，冯率部驻常德期间，受为其看病的医生影响，经常前往教堂听牧师布道，开始笃信基督教，在军中设置教会，请随军牧师向全体官兵布道、探题，并为 100 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1923 年底，冯玉祥开始倾心于苏俄，由基督教转而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明，苏俄的外交官越飞对他评价很高，加拉罕称其为“中国解放运动的柱石”。

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带领军队占领紫禁城，使用武力要求逊位皇帝溥仪签署“取消皇帝尊号声明”，限溥仪在两天时间内，收拾个人物品，离开紫禁城，如果溥仪拒绝，冯玉祥威胁要烧毁紫禁城。冯玉祥不顾民国政府与清朝皇室所签之条约，驱逐溥仪，夺取清皇室财宝，为人诟病。

1926 年 5 月 9 日到达苏联莫斯科开始考察，期间在蒙古库伦在徐谦的介绍下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冯玉祥多次提出要与小斯大林会面但被婉拒。

6 月 19 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会面。冯称蒋“风采和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提出要给蒋介石造铜像。蒋称冯玉祥为“大哥”。

1927 年，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并发动全省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各行省，也都纷纷跟从，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冯玉祥所酿“中原毁佛”是三武一宗之后，最大规模的毁佛。

经过中原大战，蒋冯阎李张五大集团中，冯玉祥成为唯一输得精光的总司令。

据说名相士彭涵锋算过冯玉祥的面相：貌似刘备、才若孙权、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

不同的是，阎锡山演绎的是另一种人生精彩。阎 1883 年生于山西五台县大清山文昌堡，是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人称万喜子。

1904 年阎锡山赴日本军校留学，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担任山西都督。

1912 年 9 月，孙中山视察山西，与阎锡山密谈，谓“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等语，阎亦在被袁世凯势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多方与袁和北洋军阀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才得保住自己不被拔除。阎锡山深谙中庸之道，善于化解矛盾，达到适中，求得生存自保。

1917 年开始，阎锡山大力发展山西农业，对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建立炼油厂、炼钢厂、发电厂。1925 年山西军人煤矿场建立，而在隔年建立山西火药厂，并设立无烟药厂、火工厂、酸厂等之分场，其日产可达无烟火药 300 磅、硫酸 3 吨。阎锡山为了整顿山西经济，建立了山西官钱局，并在隔年建立了晋华银行，使山西经济重新复兴了起来。

1918 年，阎锡山推行《山西逐年教育进行企划案》，将山西省之教育产业推至高潮。而当时山西省之义务教育为四年、学龄期为七至十三岁。而到 1921 年国民学校数量增加至约两万，在学儿童约 9 万 5 千人，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达到约 70%。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成为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

1930 年的美国《时代》记述：“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 1100 万人带来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管辖之山西省，自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以来，经历多场内战、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直至 1949 年 4 月太原战役结束，被中共军队占领为止，一共历经 38 年，是众多民国军阀中纪录最长者。

此时，位于郑州与中央军对抗的西北军已成强弩之末，冯玉祥决定搏命发动最后一击。精锐尽出的西北军攻势猛烈，一度攻下归德等地，与中央军大战，双方伤亡在 20 万人以上。西北军攻势仍被蒋鼎文挡下，筋疲力尽的西北军攻势受创，也无法得到溃退的晋军支持，结果西北军战败。蒋介石调 3 个军与 3 个师反攻，至 8 月 15 日，相继攻占曲阜、泰安、济南，阎部节节败退。晋军伤亡惨重，撤出山东。

蒋介石决定不渡过黄河追击晋军，将转调主力集中于平汉铁路及陇海铁路，对西北军发动最后攻击。蒋在津浦铁路战事结束后，转向陇海铁路，分三路向郑州进攻。在8月底到9月初，蒋向西北军发动总攻。9月6日，中央军全面攻击郑州，兵分十八路突破迂回西北军阵地，胡宗南带第一师深入截断西北军后路。9月10日，蒋介石亲征，一日内击溃民权战线正面主阵地的西北军主力。至10月6日，攻占兰封、开封、郑州等地。冯部退守郑州外围，因阎部撤退，洛阳失守，遂转入晋南。西北军全面溃败，一路逃出河南。

西北军主力溃败后，异志者众，石友三败逃河北，宣布中立；西北军猛将庞炳勋被冯玉祥留下断后，部队死伤惨重，愤而投诚蒋介石，并协助中央军夜袭西北军张自忠部，让中央军得以轻松长驱直入华北，冯玉祥仅在亲兵护送下逃至山西。川军、滇军面对此状，也纷纷表态加入追击，滇军领袖龙云通电拥蒋，派卢汉、朱旭率军进攻广西，直逼桂系根据地南宁，后不敌桂军，败退回滇。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令何键率部由湘西反攻长沙，李宗仁部再夺衡阳受挫，7月初撤回广西。蒋调动第十一军切断桂系，加上滇军响应南京政府，自云贵等地出兵进军桂系根据地广西，腹背受敌的广西军队北伐攻势只好草草收场，被迫撤回根据地防御。

在蒋介石调度下，中央军攻陷洛阳，截断西北军溃逃后路，战况渐渐明朗。但此刻蒋、联双方皆师老力疲，各方都试图拉拢隔岸观火的奉系东北军，蒋中正运用各种手段，包括高官、让出华北地盘相许、出兵华北的军费予以满足（先后汇出500万出兵费，另筹公债1,000万元资助东北财政）争取到张学良支持。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发出《巧电》，言“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呼吁蒋中正、反蒋联军双方停止内战，随即遭到联军的拒绝。

9月20日，张学良率东北军数万人入山海关，攻进北平。

得到奉系领导人的支持，胜败局势已定，中央军进攻北方几无阻碍。10月，中央军攻下陕西等地，重兵包围山西残军败将。10月上旬，张学良占领河北，阎部退入山西。张学良趁势大举接收冀东地区，并呼吁停战。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战争结束。阎锡山由日本人协助出走天津，西北军则被张学良收编接管。反蒋同盟即告瓦解。张学良以东北军三十万人入主华北，势力大增。至此中原大战告一段落。

评注：国民政府内部的军事集团以及地方实力派因为裁军会议产生的巨大分歧最终演变成了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

京中央政府与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中原这场混战，双方共伤亡 30 余万人，造成深重灾难，蒋势力扩大，加强统治。中原大战是北伐统一中国后，中国内最大的内战，战事蔓延冀、鲁、豫、陕、鄂、湘、桂等行省，各方投入兵力超过 130 万。本来准备剿共的国军亦多数被调出，让中国共产党得以喘息发展。

财政方面，虽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经费而接近破产的边缘，但战胜的蒋介石顺利收编地方军队，地方政治分会被取消。裁撤地方军人掌握的釐金，统一全国税赋，达成国家体系的巩固。

从更高的层面看，战事反映中国国民党表面上的北伐统一，也让国际社会对于国民党所率领的南京政权是否能代表正统中国政府产生些微信心，但是除此之外背后却有重大的隐患危机：蒋介石无法被其他有力军人信任，国民党也无法单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央与地方军阀的摩擦，只能诉诸武力解决。中原大战的结果虽然以代表中央的蒋介石胜出，但是显露出蒋仍旧需要东北军张学良的支持，且东北军止战后，并没有彻底消灭地方军阀的势力。

结束中原大战使张学良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当时拥有 30 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变成为了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在经过权衡利弊后，张学良最终选择支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 年 9 月 18 日，张学良一纸和平“巧电”发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也随之结束。东北军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关。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仅次于总司令蒋介石的全国第二号人物。同时按照出兵约定，张学良全权节制黄河以北的地区，包括华北、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等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东北军发兵入关内接收西北军系的华北地盘造成山海关关外防务空虚，亦间接成为日后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沦陷于日本关东军的原因之一。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

评注之一：石原莞尔具有不拘一格和特立独行的天性。石原学生时一年到头不洗澡，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次独立进行作战绘图时，老师特别安排了写生课。石原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又写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让老师瞠目结舌。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到驻汉口的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上司是板垣征四郎少佐。石原逗留了一年多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总结出应对军阀最好的办法是“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和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在他的认知中，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1928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中佐，之后经过河本大作（皇姑屯事件的主谋）的推荐，到满洲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也被调到关东军任高级参谋。因为熟悉中国情况，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中被奉为的“中国通”。

在1905年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帝国后，日本拥有中国东北地区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东北的统治者、奉系领导人张作霖为获得日本的支持，同意日本修建铁路。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称为辽宁省政府，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军队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此役张学良大败，暴露了其相对虚弱的军事实力。东北当局对俄力抗无功，俄亦知难而退，中央政府对俄宣布绝交，中苏关系彻底断绝。

日本人既嫉妒中国之统一，复羡慕东北三省之资源，发动侵略日趋积极。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诉诸

武力，驱逐张学良。石原莞尔拟有“攻沈要领”，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

1930年5月30日，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朝鲜人，在延吉、龙井等间岛主要都市铁路沿线一齐爆发，袭击日本领事馆、日本驻扎在当地的机关和铁道设施、电灯会社等。日本军部警察进入间岛镇压，东北军也参与镇压。

7月，日本关东军煽动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石友三叛乱，以飞机载送因中原大战失败流亡大连之阎锡山重返山西，命阎锡山与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张学良无暇顾及东北。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于9月率领其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蒋中正中央政府。东北军入关后，东三省驻兵减弱，张学良长期留在北平，注意力转向关内。日本军人认为此时夺取东北，可不费吹灰之力。

评注之二：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中正，早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北伐战争时期，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

1930年10月3日，中原大战战局已定，蒋中正立即决定以“肃清共匪”作为今后施政重要方针之一。10月6日，中原大战结束，以蒋中正一方的胜利而告终，蒋中正得以将主要兵力集中，部署于江西，用以对逐渐坐大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发动军事围剿。

自1927年国民党分共开始，中共在各省迅速的发展武装势力和根据地，蒋中正虽然一直视中共武装为心腹大患，然而在这一期间的他将重点指向北伐以及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和与冯、阎、李等新军阀势力，并不认为中共能成多大气候，把此事交由湘、赣地方当局负责，并以地方军进行“进剿”和“会剿”的小规模军事扫荡。

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长久被牵扯在江西前线，国民革命军中各派系的矛盾开始呈现。1931年2月28日，蒋中正与胡汉民因“约法”问矛盾激化，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破坏约法等罪，将胡软禁在南京汤山。

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5月28日，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中正的独裁之工具。胡汉民又和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

蒋中正感受到压力，希望缓和与广州方面的紧张局面。10月14日，蒋中正在张静江陪同下去见胡汉民，蒋对胡说：“过去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请胡先生指教。”10月14日下午，让胡汉民回到上海，结束软禁。

当时中国华中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华中地区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从春季开始就下大雨，降雨量在7、8月达到高峰。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亡908人。”长江水灾延伸到下游，9月16日洪峰抵南京。长江以北的淮河同时发生水灾，导致京杭大运河在高邮湖附近的堤防崩溃，其中一个估计指8月26日凌晨有20万人在睡梦中淹死。全国灾民5311-6000万人不等，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逃荒。

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在洪水时忙于第三次江西剿共，既无力救灾，也无暇顾及东北事宜。他先在7月23日通电《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9月1日再通电《呼吁弭乱救灾》指“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

放眼世界。1929年-1933年之间全球经济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大萧条是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大萧条严重影响日本经济。在1929-1931年间，日本经济衰退了8%。

1931年5月以来，石原莞尔等日本军人复认“外在形势于日本有利，确为对东北行动之少有机会。”当时，日军驻中国东北部队有陆军驻扎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

9月18日，日本的南满铁路柳条沟的一段铁桥被关东军炸毁，并称是中国军队所为，晚十点日本军队炮轰国军东北驻地——沈阳北大营。

铁桥爆炸后，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沈阳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根据石原莞尔中佐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9月6日，张学良命沈阳军事负责人，“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9月11日，蒋命其避免与日本冲突。事变之日，蒋正赴江西督师剿共。

评注：在孙中山的灵柩前，蒋中正放声大哭，旁边观礼者也为之抹泪动容。李宗仁说，蒋介石这是惺惺作态。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蒋中正听后也哭了。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容易外露的人。

蒋中正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不知他是否也曾哭泣，但是他真的感到奇耻大辱。他的《蒋中正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狴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19日，《蒋中正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

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器）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9月18日，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驻军在睡梦中惊醒，死300余人。驻军因长官正滞留于关内，闻变无法应付，奉命取不抵抗主义，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以及兵工厂。

东北军共约20万人，半数驻于关内。时张学良方滞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沈阳的进攻。关东军一万余人于8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当日完全占领奉天。接着长春、营口、安东等地亦一一陷入关东军之手。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长德兰孟和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9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坚决保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维持世界和平，尊重国际公约。第二日，蒋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9月22日，蒋中正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评注：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9月19日，蒋介石电致张学良：“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肯定“不抵抗”。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

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日军不断扩大占领区，五天之间，辽宁、吉林两省全失。日本着手谋取黑龙江。

10月8日，“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曾被逼上梁山而沦为盗匪的高鹏振任司令，开始抵抗。10月16日在嫩江桥，日军被驻黑龙江省防军击退。10月21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在嫩江铁桥一役，大胜日军。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毙敌2000余人但终于不敌日军。马占山退守齐齐哈尔，再撤往克山、海伦。至此，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九一八事变后仅两个月，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各地诸多主要城市。事变之后，辽宁省府迁至锦州。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沈阳，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日军攻占黑龙江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932年1月2日，日军

占领锦州，东北军撤入关内。2月6日，日军攻陷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吉林自卫军伤亡惨重。

面对日本之军事扩张，中国军队完全无力抵抗。南京政府大元帅蒋中正秉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在江西围剿而屡遭败绩。全国上下，一片抗议之声。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亦受到严厉批评。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撤军是主动放弃。据日本产经新闻社的《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12月15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

事变后，上海开展抗日运动，抵制日货，沉重打击日本在上海之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排日运动”商讨对策。

评注：川岛芳子是爱新觉罗氏，原名显玕，满洲镶白旗人，清朝皇族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

1914年，年仅七岁的显玕跟随养父母前往日本，改名川岛芳子。数年后，川岛芳子完全日本化，亦从养父川岛浪速那里接受了政治、军事、情报等多方面的专门训练，作为日本间谍暗中参与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组建满洲国。

1933年川岛芳子被送回日本软禁。川岛芳子在日本电台广播中强烈批判日本军部的大陆政策，并利用权力释放一些被关东军逮捕的中国人，因此被日军视为双重间谍。1936年潜逃回中国天津，1937年经营“东兴楼饭庄”，并暗中继续其间谍活动，与日军高官及中国奸细频繁来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34号私宅被中华民国军统局逮捕，并以汉奸罪名被提出公诉，后被判处死刑。

据中央社报道，根据当时司法文献，川岛芳子被枪决后，陈尸监外，任人拍照，没有所谓购买他人替死一事。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5人，于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之三友实业社，与2名日本僧人与3名信徒冲突。日本日莲宗僧侣和信徒在

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敲鼓念经，厂内义勇军数十人上前拦截盘查，结果僧侣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 2 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

1 月 20 日凌晨，上海的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 32 名暴徒，携带武器闹事，引发混战。日侨又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捣毁商店。中日双方互相抗议。

日本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1 月 23 日抵达上海，海气氛极为紧张。当日，蒋中正谈到对日方针时要求“作最大努力之抵抗”，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

24 日，由旅顺出发之日本航空母舰“能登吕号”驶达上海。日本海军已决定挑起战争，并于 27 日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在交涉期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即纷纷抵达上海，并在浦东登陆。

1 月 28 日，日机飞往闸北示威，日本海军又发出布告：“日本海军鉴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的军队撤退，并解除一切敌意的防卫”，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晚上 11 时 30 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掩护下向警卫上海十九路军开始攻击，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第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战争遂揭开序幕。国民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方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中正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

1 月 29 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 584 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

1 月 29 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 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发出《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誓言“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1 月 29 日早上，蒋中正约见何应钦、朱培德商讨对策。蒋手定对日交涉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作战部商定布防、警戒南京和长江沿线及对日抵抗作战事宜。蒋自下野后正式复出，以避免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

1 月 30 日，中国国民政府宣言迁都洛阳，蒋通电抗日，并派精锐之第五军增援上海。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称“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厉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人心士气，为之大振。

1月31日，日本第三舰队开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2月2日，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有效压制第十九路军。

蒋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区，并决定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蒋致电慰问第十九路军称：“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2月6日，蒋命令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昆山。2月8日，蒋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以增援十九路军。2月9日，蒋介石调动国军胡宗南第一师、王均第七师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

当时正值江淮大水灾，前线补给捉襟见肘。蒋电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

2月12日，经曹家桥一战，日军会师计划遂全面粉碎。2月13日晨，日军混成第24旅团强渡蕴藻浜曹家桥，与国军交战，十九路军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日军在永安纱厂门前被国军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2月14日，蒋命令将已抵达上海附近南翔、昆山一带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合编为第五军，任命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为补充十九路军因伤亡而造成的减员，蒋还多次下令各地对十九路军输送兵源。

2月20日，日军开始对国民革命军总攻击。闸北之八字桥、天通庵、宝山路、江湾之庙行、跑马场、江湾车站、吴淞之炮台湾、狮子林、蕴藻浜、张华浜都有激烈战斗。国军个个奋勇，人人当先，结果不到两周，日军死伤逾万。

蒋中正石下令调卫立煌第十四军所辖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战。又令第九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区，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战。

蒋中正还命令正在江西“剿匪”的陈诚第十八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进攻后迅速增援上海。”但是，陈诚的部队被共军死死拖住。

2月24日，日军决定再度扩大作战规模，自日本本土抽调第11师团与第14师团与当时以参战的部队合组上海派遣军。浏河守军力量单薄，当即失守。浏河

一失，中国闸北江湾大军，成为腹背受敌之不利态势，不得已已在苦战 34 天之后，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3 月 1 日，日军增援部队在自上海战线后方登陆。国民革命军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 3 月 2 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为免遭合围歼灭，于是被迫全线撤退。3 月 3 日，日军宣布停战，双方进入对峙状态。蒋中正不敢掉以轻心，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师应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驻，不经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东，能在夜间行动最好，以免日军侦知。

3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在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命令空军、炮兵部队和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并实际到位参战。但蒋介石为增援十九路军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部队，却因为交通问题和中共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在停战前到位。蒋鼎文第九师奉命驰援淞沪，只中共红军前后跟踪追击，且战且走，后面的一个旅还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抄击，才避免了全部被歼的危难。

评说：每当我读到上海一二八事件和十九路军的故事时，一个中共小丑的形象跃然纸上。

中共是苏俄的傀儡，亦是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在中华民国统一中国之际，中共在江西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傀儡政权，就像在中华健康的肌体内长出了一个毒瘤，日日流出脓水，腐蚀全身。

后来中共立了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罪按在持不同政见者头上。其实这个罪名，它自己早就背上了。中共是颠覆国家政权之首恶。

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 1 月 31 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1932 年 4 月 15 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表明其正式宣布对日宣战。这是其言。

其行如何？中共鼓动并要求所谓的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趁着蒋中正的国民军在抗击日军之际，加大对国民党军队的偷袭，将河南、安徽、江西等地的国军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以及陈诚第十八军死死地拖住，使其无法驰援上海。

在短短三年多的生存时间里，第十九路军参与了第一、二、三次江西剿共战争和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并剿灭，本是一段佳话，却成一段笑话。

军长蔡廷锴出身贫苦家庭，为改变家境，他参加了旧军队。由于作战英勇，他从一个士兵一步步打到了师长的职位，在陈铭枢的部下投诚蒋介石。因指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享有极高声誉，被调到福建剿共。

蔡廷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愿继续与红军作战，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之后即与江西中央苏区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署协定，停止军事对抗和开始经济合作。蔡廷锴本来是个英雄人物，因染上了红色的基因，却成了一个不自量力的小丑，作起他的“中华共和国”大梦来！

蒋中正调八个师入闽镇压。最后十九路军被中央军全面击破，部分军官和士兵则向国民政府投降、部分军官和士兵则投奔中共。蒋介石决定对十九路军进行裁撤与惩罚，并由中央直接管辖。1933 年 12 月 15 日，蒋中正下令十九路军全面裁撤，并于隔日去除十九路军番号。

抗战结束后，蔡廷锴完完全全地投靠到了中共的怀抱。蒋光鼐亦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评价，称其“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目。”呜呼哀哉！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上班请救兵。张学良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3 月 20 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上海开停战谈判。5 月 5 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军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虹口越界筑路各地，中国则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不驻军队，对中国十分不利。

6 月，日军全部退回日租界。8 月 6 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学良一同下野。指责其“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之时，又不能施以援手。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中正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由于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占领东北三省后，关东军在各省扶植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但其中马占山只是表面上同意服从，暗中策划武装反抗，不久就打响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前清朝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之后，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天津事件”，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1931年底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3月为“满洲国”执政。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据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所说，“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满洲“建国”，发布《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首都为长春（改名新京），领土包范围包括现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全境（不含日据关东州，即今日大连），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

在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通过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

评注：作曲家张寒晖的歌曲《松花江上》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后东北居民的苦况和收复失地的盼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1932年满洲国建立时总人口有3千4百万人，日本人和朝鲜人只占百分之二。满洲国建国之后，推行日本人移居满洲之国家政策，共移居130万人到满洲。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

满洲国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皇帝和国务院分别行使国家统治权和行政权，但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日本神道教在满洲国具有国教的地位。满洲国军事力量日本关东军控制。

满洲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肥沃的可耕地，丰富的林业、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日本控制这一地区后，为满足其战争的需要，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投资铁路，重点发展钢铁、煤炭与农产品，建立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在1945年时，偏安一方的满洲国的工业规模事实上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工业国。到1939年，铁路线全长已超过一万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成为当时世界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在满洲大面积种植鸦片，又以法律形式确定鸦片的专卖垄断。

满洲国建立了具有殖民色彩的普遍教育体制，施行义务教育，实行所谓孔教之王道教育，将祭祀孔子的活动和日本神道教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满洲国境内共有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

中华民国政府虽然被迫退出满洲地区，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在上海，李香兰将《夜来香》唱的轻盈抒情优雅从容，歌曲迅速在全中国走红，成为时下最热门的流行歌曲，李香兰因此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父母亲都是日本人，早年生活在满洲国。李香兰的中文说的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流利，她受过正式西洋声乐教育，是抒情女高音，擅长美声唱法，成为满洲国头号女星。李香兰担任“日满亲善歌唱大使”，在日本和台湾造成大轰动。1942年李香兰来到流行娱乐事业的重镇上海发展，在中国演艺圈的知名度逐渐提高，成为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1944年，李香兰到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无意中发现《夜来香》的曲谱，她哼了几次之后对它爱不释手，经她演唱的《夜来香》旋即风靡全中国。她演唱的其他歌曲如《苏州夜曲》、《卖糖歌》、《戒烟歌》、《恨不相逢未嫁时》、《花香为情郎》、《第二梦》、《海燕》、《不要告诉我》、

《进酒杯莫停》、《兰闺寂寂》、《梅花》、《小时候》、《十里洋场》、《分离》、《歌舞今宵》、《只有你》、《心曲》等同样深入人心。

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傀儡政权，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均实行日本人优先、歧视和奴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政策。李香兰（山口淑子）曾记载：“在满洲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人差别待遇。就共同桌吃饭，吃相同的料理时，日本人吃白米饭，中国人吃的却是高粱饭。”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将满洲国抢掠一空而离去。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第八章 中共苏维埃红色政权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在中央剿匪军的压力下，转战赣南、闽西地区。1931年9月，在成功防御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评注：1927年9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杨开慧携带儿子回长沙板仓乡下老家躲避。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

1920年1月，父亲杨昌济（北京大学教授）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长沙，进美国基督教教会开办的福湘女中。同年末，与毛泽东结婚，是他的第二任妻子。1920年，杨开慧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武汉等地开展政治活动。

杨开慧在1930年10月被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部下逮捕。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11月14日杨被判立刻处决。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丝蔓，依倚榛与荆。荆榛易蒙密，百鸟撩乱鸣。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桂树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鹳度海食，应龙升天行。灵物本特达，不复相缠萦。缠萦竟何者，荆棘与飞茎。”1922年，毛泽东抄写唐朝诗人元稹的诗歌《菟丝》给杨开慧，暗喻杨开慧就像菟丝一样粘他，杨开慧随即恼怒反问毛泽东，毛泽东顿时哑口无言。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杨开慧，毛泽东数次向杨开慧解释，杨开慧仍然一直没有释怀。

1908年，父亲毛贻昌包办婚姻，13岁的毛泽东和18岁罗一秀结婚。尽管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但婚礼后，毛泽东离开家乡小村，在韶山和学生一起生活，从来都没有罗一秀同居过。毛泽东的离去使得罗一秀受到外人的羞辱；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痼疾而病逝。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分严厉，对于毛泽东日常叛逆的态度十分不满。从6岁起，毛泽东就要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要帮忙记账。毛贻常常常说：“谁会盘算，谁就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要是不会盘算，即便给他金山银山，也无济于事。”

在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讲述对其父亲的对抗。毛泽东说：“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弟弟，他一文钱都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是最差的”；“父亲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并离开了

家。”“我认为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找失败，我学会了恨他。”罗一秀和毛家的亲戚关系是毛贻昌选择的理由之一，因为罗一秀母亲也姓毛，住在离毛贻昌家不到二里路的地方。毛贻昌唯一能做的只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家谱。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年轻时就读于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永新女子学校。192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永新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兼青年团委书记。“四·一二事件”之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与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亦嫁给毛泽东之弟毛泽覃为妻。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三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毛泽东说：“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1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在路上，为掩护宋任穷的夫人，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贺子珍养病期间，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引发贺子珍的误会，两人感情出现裂缝，不久之后，贺子珍怀孕了，由于她生孩子过多不想再生，打算去上海做人工流产，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延安远赴西安。当贺子珍抵达西安，上海被日军占领，她打算去上海市的计划破产，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于是坐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其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贺子珍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28年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打破国军对井冈山第一次“进剿”。3月初，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误传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决定为“开除党籍”；取消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之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对毛泽东是极严重打击。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砦市，同先两天到达砦市之朱德、陈毅部队会合。后与朱德、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当时社会普遍称其“猪毛红军”。

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打破国军第二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割据区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万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称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评注：关于军事根据地，毛泽东说：“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军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八月失败”。9月至10月，打破湘赣两省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在茨坪召开，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毛泽东，统辖边界和红四军军委。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

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毛泽东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关于军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当时中共红军的处境是及其困难的。毛泽东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¹⁶⁾。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

当时，朱毛红军被中央军剿匪部队追击，只能流窜在赣南和闽西一带山区，但毛泽东并没有丧失斗志，他写道：“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进军赣南。4月13日，毛泽东《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流寇思想和集权制领导原则之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

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支武装队伍，也招致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力围剿。1929年初，红四军在巨大压力下撤出湘赣苏区，转而转战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在此期间，作为南昌起义余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义部队代表的毛泽东，对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争”。

当时，中共对红四军进行领导的三个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前两个均是毛泽东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召开罗福嶂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取消了红四军军

委，将其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了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就独揽了红四军的所有党政军领导权，引起了朱德、陈毅等人的不满。

为了解决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矛盾，实际掌握中共中央军委权力的周恩来在2月7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个指示，要求二人均“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而红四军则应立刻转入游击战。4月3日，毛泽东收到来信，即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回信中央，拒不交出指挥权，称2月7日来信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月初，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在传达了六大精神后，免去了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自任之。刘还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要求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仅负责红四军的军事行动。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弹。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白沙会议，但是出乎毛意料的是除了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坚决支持毛之外，大部分红四军领导干部并不站在毛一边，毛于是以退为进，称病辞职，并于6月14日公开指责朱德“与党争权”。朱德同时亦做出反驳，指责毛泽东“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是要“以党代政”。

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为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维持红军的团结，陈毅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根据大家发言意见，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会议上，支持朱德的一派占据了上风，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担任。

会后，毛泽东携贺子珍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养病”，朱德和陈毅成为了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但是，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向广东和福建的两次突击中损失惨重。7月29日，朱德和陈毅被迫前往上杭蛟洋拜见毛泽东，请其出山，会见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率领红四军一部依托根据地合力击败了国民政府的追击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

此时，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行动。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朱德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希望在会上同毛泽东握手言和，命郭化若起草信函邀请毛泽东与会，但是毛泽东仍然拒不参加，导致会议在三天之后不了了之。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方来到会场，提出：“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决不回来”。

同时，在上海李立三已取得了中共实际领导权，他和周恩来撤销了二月来信，重新起草了一封九月来信，命陈毅返回苏区后仍邀请毛泽东主持工作。中央九月来信虽然仍对朱、毛二人均给予批评，但明确要求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至此，毛泽东获得了全面的胜利。11月28日，在陈毅传达了九月来信精神后，毛立即表示：“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评注：1899年，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乳名李凤生，小名狗妹仔。上私塾时，父亲李昌圭按照祠堂辈分给他取名李隆郅，毛泽东曾说他的名字难认难写，于是他在安源改名能至。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懂得密电码的编制。

从1927年起他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6月接替余泽鸿成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此时总书记向忠发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在李立三的策动下，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向忠发于7月16日命令：武汉、南京举行暴动，上海总罢工，争取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因为暴动失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先后有11个中共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30年10月初，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后被派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莫斯科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

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文革时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评注：向忠发1879年出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家庭，幼年勉强读了5年私塾，辍学后随父母迁回家乡湖北汉川。1923年2月，他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以轮驳工的身份出面掩护帮助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向忠发积极策划反对中国国民党。陈独秀被罢黜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共产国际出面要求中共加强中国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向忠发也因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从上海抵达莫斯科，经数月苏联及欧洲游历之后，在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受到斯大林接见。

1928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名义上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以取代李立三职位。王明逐渐开始领导中共中央，而向忠发逐渐成为挂牌总书记。向忠发自知无力与王明

比拼，遂与妓女杨秀贞姘居。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政府逮捕，之后供出共产党机密，包括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

1931年5月底，中共特科接到消息称，已经叛逃的顾顺章调查向忠发的住处，并因此要求向忠发立即搬家。6月22日上午9时，向忠发前往英国商人在法租界开办的泰勒租车行，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陈立夫与顾顺章布局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和租界巡捕抓获。

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6月24日，向忠发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中共对这位党的总书记的评价却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关于‘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呜呼哀哉！

12月28日至29日，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名。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与会者讨论了中央指示和上述报告，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会议之一。在会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林彪在此事件中毅然站到毛泽东一边，而向其老上级朱德、陈毅反戈一击，他的举动为其赢得了毛泽东数十年的绝对信任。朱毛双方握手言和，朱毛之争至此结束。

1930年1月上旬，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2月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二七会议”，任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之共同前委书记。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社会调查，并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说“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写道：“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5月下旬，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任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评注：1930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当时瞿秋白和周恩来都不在国内，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中共总书记向忠发是中共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

6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向共产国际发电请示。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正式向中共中央否决了这一请示。但是在李立三的策动下，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向忠发于7月16日命令：武汉、南京举行暴动，上海总罢工，争取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7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湖南省长沙，建立“苏维埃政府”，震惊中外。8月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李立三提议，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8月6日，红军被迫从长沙撤退，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均遭流产，并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根据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先后有11个中共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止“立三路线”，瞿秋白代替李立三再次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因离开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

从中共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路线斗争。这样因意见分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斗争超出了人性的范畴，是野蛮、残酷而非理性的，而且是致命的。因此，有无数的共产党人丢掉了性命。

1930年8月5日，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在上海出席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李文林在会上传达了“立三路线”，刘士奇遭到了猛烈批判并被撤销特委书记兼红二十军政委、开除了党籍。会议改组特委常委会，李文林任特委常委。

8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会合红三军团，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两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毛泽东；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毛泽东。9月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转移。

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一军团，于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彻30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放弃攻打南昌、九江的行动，实行“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红军退入根据地。李文林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在南浔路、九江一带与敌人速战。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

李韶九是湖南嘉禾县北街人，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

中学未毕业即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4团，1927年参加北伐，随队往江西南昌。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时，李韶九被俘，后随共军至广东东江，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李韶九又回到了国民革命军。半年后，又与中共江西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到江西安源的红二团工作。黄克诚的好友何笃才曾指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李韶九在红三军一纵政委任内跋扈异常，在军队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作出反右倾斗争的部署。1929年2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强调进行反右倾斗争。之后中共中央把苏区内部的肃反对象锁定为AB团。

1930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发表《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声称AB团混入共产党内部。6月，将反AB团列为当前重要的工作。6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宣布要对AB团“实行

赤色清乡”和“实行赤色恐怖”。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提到兴国、永丰、吉安地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 AB 团组织，其中是吉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9月16日，赣西南东路行委发出《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表示赣西南破获不少 AB 团的组织，捕杀许多 AB 团的首领。

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 AB 团》，提到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被怀疑为 AB 团分子，并对他实行逼供。朱家浩承认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赣西南 AB 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于是赣西南特委抓捕谢兆元等人。当年5月至9月，于都有 1000 余人被指称为 AB 团分子并遭到捕杀，城关区就有近 200 人被杀。

10月，红一军团攻占吉安，随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特委此时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毛泽东表示 AB 团是混进中国共产党内的庞大特务集团。毛泽东于 10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赣西南的领导机关多数被 AB 团把持，必须彻底改造。

1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肃反委员会，以李韶九为主席，立即开展反 AB 团行动，大约有 4000 人遭到清除。

12月3日，毛泽东指示李韶九：“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古柏等人在富阳逮捕中共江西省行常委段良弼、省行委代理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将其尽行捆绑禁闭，当晚处于重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12月7日，李韶九带人来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军驻地富田，以反 AB 团为名抓捕了省行动委员会干部段良弼、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冕等八人，其后五天时间中，先后关押 120 多人，处决了 40 余人。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抓起来，并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严刑拷打后，获其他 AB 团成员的口供。

12月9日，李韶九到东固抓捕红二十军中被认定为是 AB 团的人，同时要求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配合在军中抓 AB 团。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被人供出是 AB 团成员。刘敌认为李韶九不是抓 AB 团，而是借机打击赣西南干部。

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 17 人，后来又处决 7 人。李韶九在审问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时，逼供出红二十军 174 团政委刘敌等人也是 AB 团。11日上午，刘敌被召回东固，随即被李韶九召去问话。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并相识，且早知李的为人，自知危在旦夕。12月12日刘敌与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等率部队包围富

田，扣留李韶九及数名士兵，并释放段良弼、金万邦等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史称“富田事变”。

12月13日，事变领导人率领红20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

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于追究。

1月1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议自己的学生王明（原名陈绍禹）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补选为中央委员。2月，王明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中共实权已经由李立三转移到了王明。陈绍禹随后派遣张国焘、夏曦、曾洪易等人到各个中共红军根据地，并在之后产生了新一轮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共官方后来的声称，从此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派系；中共指出该派系的主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切指示。

在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自行渡过赣江以东，向吉安永阳转移，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并推举萧大鹏为军长。

刘敌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1931年4月上旬，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三人推翻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但依旧强调要消灭AB团，肯定肃反委员会的作用。于是李韶九重获重用，4月下旬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

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相关问题，代理书记项英没有听信毛泽东的一面之辞，在《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事变”客观上虽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速捕”。这客观起到了保护红20军的作用，阻止了在苏区乱肃AB团的严峻形势。

3月28日，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却支持了毛泽东，提出“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革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

5月，李文林以及王怀等人被以属于AB团分子为由遭到处决。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掀起了新高潮，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皆遭到处死。

7月，毛泽东指派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率领一、三军团部队对红二十军进行秘密剿杀，制作隐密方案，以“开会”为名，诱捕副二十军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包括军长萧、政委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人，均集中到平头寨的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红二十军番号取消，余部军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从此，这支在赣西南苏区骁勇善战、战功卓着的红二十军部队宣告解体，不复存在。

根据当事人回忆，红20军干部被诱杀的那一天早晨，天空阴暗，满天乌云，红军总部派来平头寨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20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20军副排以上干部“全体集合”，到已布置好“会场”的平头寨祠堂“开会”，当20军的干部一个一个按他们的要求进入会场时，旋即被他们缴枪、捆绑，立即被押解到谢田河滩，宣布以“AB团分子”的罪名，立即执行枪决，分批在平安省河坝上被杀死……当时，红20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各级军官，除一个团副谢象晃被杨至诚保下来外，参加“会议”者全部罹难。据当地曾目睹枪决的老人回忆：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李韶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时，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由于陈毅不能完成在二十二军中打击 AB 团的规定数字，李韶九认为陈毅有包庇 AB 团的重大嫌疑，决定认定陈毅也是 AB 团分子，并把陈毅喊来开会。陈毅迟迟未能回家，其妻萧菊英担心丈夫出事，于是选择投井自尽。

富田事变的处理及苏区肃反扩大化，引起了中央苏区部分领导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1931 年 12 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发现反 AB 团的行为有所不妥，于是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提出意见。1932 年 1 月 7 日，苏区中央局在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后，认为反 AB 团仍然正确且有必要，但反 AB 团有所扩大化和简单化。周恩来对肃 AB 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李韶九进行了处罚，“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

1932 年 6 月李韶九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35 年死亡，死因不明，一说是被陈毅枪毙。

1931 年，中共苏区还发生另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白雀园肃反。

在国民政府分共后，部分中共领导及红军在鄂豫皖苏区陆续发展壮大，其中主要部队由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率领壮大。1931 年后，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陆续派旷继勋、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担任政治领导工作，新上任的领导大力推行王明路线，主张全力进攻，而与原部队将领发生矛盾。1931 年 7 月，张国焘主张鄂豫皖苏区部队进攻安庆，威胁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然而，当时红四军攻下英山后，徐向前、曾中生将东进战略改为南下。这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撤消了曾中生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此时，国民政府派遣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曾扩情送信与许，希望离间他。张国焘因此发了红四军火速从洗马畈战场退出电令，命部队撤到皖西麻埠进行整顿，随即捉捕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年 9 月，红四军全部移驻光山县的白雀园，曾中生因撤职被隔离出政治事务，而军长徐向前则与陈昌浩持续争执，亦被禁止干预政治事项。然而此时，大规模的捕杀行动开始。

1931 年 9 月 13 日起，除了已在麻埠、斑竹园和余子店逮捕的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五六十人，红四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长淶禹原、第 12 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10 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28 团政治委员罗炳刚、29 团团长沙子清、团政委李侯石、32 团政委江子英、33 团团长沙刚、团政委袁皋甫、34 团政委吴荆赤、36 团政委王天明、38 团政委任难等上百人被逮捕。另外，在地方红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亦被逮捕。之后大规模的错杀开始，其中包括许继慎在内的军级干部 17 人、师级干部 35 人、团级干部 44 人遇难。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专章叙述此事，说许身旁的吴参谋是国民党奸细，因此被整肃。张没有提到 AB 团罪名，只说吴参谋是国民党改组派。但张承认当时军中引起整肃风，被捕者约六百人，被整肃者百余人，判死刑者约三十人。

评注：富田事变发生于 1930 年 12 月初。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军第二十军都驻在那里。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以及苏区红军内部几个头头之间的矛盾冲突甚为复杂。上海的中央想控制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周在白区工作无法脱身，暂由项英代理，项与毛之间意见不和，毛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之间也冲突甚多，都因毛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又因土改方针和军事战略分歧，引起军中很多人对毛不满，湘赣两地的党和军中都有反毛情绪。

1930 年 5 月，毛由他所主持的总前委发动肃反运动，以反 AB 团之名清除异己。他企图消灭军中最高层的异己势力，独揽大权。其酷刑逼供手段非常狠毒和残暴，逼出的假供和乱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之广，在四万红军中多达四千四百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红色恐怖。

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不仅无法真实了解苏区情形，自身也正处于立三路线和国际派斗争之中。

李韶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加倍在赣西南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肃反范围之广，远非富田事变前可比，真是达到血流漂杵、日月无光的境地。蒋介石“四一二事件”所杀的共产党人，远没有共产党内部残杀自己人那么多。

富田事变后，各地反 AB 团运动被推上高潮。从 1930 年到 1934 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 AB 团达 7 万余人。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反 AB 团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运动方式杀人的一个开端。此后，延安的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连绵不绝，都是江西时期红色恐怖的后续，一脉相承。中共惯用地痞流氓为打手，组织斗争。以运动方式杀人，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这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学家郑学稼在《中共富田事变真相》一书中评论道：“我们知道：国民党人组织的 AB 团，不是后来所说的 Anti-Bolševik（反布尔什维克），它只存在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利用这个名称，发动富田事变，张国焘也利用它，发动‘许继慎派惨案’。”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指示，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会上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多方面错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开幕。11月7日7时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开国庆典，并进行阅兵仪式。下午2时，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7个苏区（中央苏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代表，另外部分来自朝鲜和越南的海外代表，共610人。

11月20日会议选举产生由毛泽东、项英、朱德等54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表明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中央苏区（包括闽西在内）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后，开展了贯通闽赣二十五县的苏维埃疆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

在苏维埃共和国，只有贫下中农、工人、红军、中共党员等无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具有选举资格；富农、地主、商人、传教士、中华民国政军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没有选举资格。1933年，毛泽东发表了《怎么分析农村阶级》，将苏区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五个阶级，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领导苏区百姓开展经济建设运动。在“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的口号下扩大红军，修桥筑路，建立合作社，同时也导致了私营经济的凋敝；在政治上推行苏维埃制度，驱赶“反动家属”，并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AB团、托洛茨基取消派和罗明路线等运动；在军事上，组织青壮年民众加入红军，先后进行五次反“围剿”战争。

评注：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纪念列宁等三位领袖发出通告，要求地方和军队开展纪念活动。在纪念会上，吴拙哉等几个战士激动地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就把喊口号的人当做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肃反委员会立即对他们进行严刑审讯，定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这些人屈打成招，诱供出

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林梅汀是特委的宣传部长，黄洪是特委组织部长，江桂华、张德宗是特委委员，并胡乱供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国民党的“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

为了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闽西苏区已先后逮捕 60 余人。3 月 1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审判大会，审判以林梅汀为首的 34 人。在严刑拷打下，他们屈打成招，林梅汀等 17 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枪决。

闽西的肃反斗争愈演愈烈。4 月 4 日，中共中央根据闽西肃反的报告，给闽粤赣边特委发出了指示信：“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红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 AB 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指示要“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中共闽西的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各团体组织都可抓人杀人，“各地以捕人最多、判处人最快的为最坚决”。6 月 5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作出《对于杭武第三区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暴动的决议》，强调“肃反要迅速坚决，要捉的快捉，要杀的快杀，要放的快放，不可犹豫缓延”。根据快抓快杀的指示精神，闽西苏维埃政府 35 人中有半数被作为“社党分子”杀害，新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也半数以上被作为“社党分子”杀害，整个闽西苏区被当做“社党分子”而错杀的，多达 6352 人。

闽西肃反中的过激做法，引起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视。毛泽东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把持领导闽西苏维埃的工作多是地痞流氓。

中共红军一边进行内部斗争，一边顽强地抵抗着中央军的剿匪，并取得战果。1931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预先设伏，于龙冈全歼中央军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

1932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辞去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职务，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赴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从 1 月下旬开始，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式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3 月江口会议后，毛泽东随军指挥，但继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也共产国际被戴上“调和主义”帽子，处境艰难。

3月上旬，中革军委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6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率东路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中央局在后方“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负责决定前方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8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向西行动，主力秘密北上，一周急行到乐安附近；8月17日攻克乐安，8月20日攻克宜黄，8月23日占领南丰；乐安、宜黄战役，歼灭国军第二十七师，俘5千多人。红军随后主动撤到宁都县东韶、洛口一带休整。

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还指责毛泽东“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

周恩来当时与毛泽东也相处不睦，但并不想如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们那样将毛泽东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试图缓和对毛泽东的批判，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且替毛泽东作了很多解释。毛泽东不愿意委曲求全，要求回后方“养病”。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宁都会议结束，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毛泽东的失势，也是因为其严厉处理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对他的反对。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时，途经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回答：“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随着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不断胜利和领导地位的巩固，毛泽东从未接到过前方电召。

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将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批判为“纯粹防御路线”，并打击和排挤了执行该路线的干部；且否定了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到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毛泽东的工作权利。

后来，在贺子珍陪同下，毛泽东到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荒凉冷清，仅有已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菜地。毛泽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与来菜地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贺子珍回忆，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毛泽

东回忆：“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此时，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实际上是整肃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受牵连者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博古对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连，长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贺子珍改任收发，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威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诉苦，说到泪下，毛泽东静听着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评注：夏曦少年就读于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24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参与筹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参加南昌起义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王明等人接近，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1932年1月下旬，在洪湖苏区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开始的两天里，万涛、潘家辰等70多人发言批评了夏曦领导湘鄂西中央分局以来半年多的工作，但王明中央支持夏曦，派尉士筠、关向应到会传达中央指示，把万涛、潘家辰等干部对夏曦的批评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等等；潘家辰气得当场晕倒。临时省委的杨光华、崔琪和彭之玉等负责人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批评夏曦；一部分人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至此大会就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结论，除肯定中央分局成立以来的错误政策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所取得的成绩，还指责万涛、潘家辰等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一部分人是“阶级敌人”等等，继而逮捕。中共中央曾通知夏曦“潘家辰同志的问题交由中央处理”，但夏曦拒不执行。1932年4月，夏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

1932年8月，夏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有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还有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红9师政委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

夏曦在位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有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湘鄂西军委会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段德昌领导创建洪湖游击根据地，在游击战中，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夏曦诬陷为国民党的“改组派”，并被杀害。段德昌临死时说：“不要用手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结果他被乱刀砍死。后来毛泽东给他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字零零零壹号”烈士证。

1934年6月，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承认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红六军团会师后，他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不久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因身体疲倦而失足落水；因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夏曦因而失救溺毙。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2月中旬，毛泽东接到命令，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3年2、3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克后，周恩来、朱德临机采纳林彪的建议，将强袭改为佯攻，采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在黄陂、草台冈接连大胜，打退了中央军的第四次围剿。周恩来由此摆脱了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在红军中威名大震。

3月，根据地陷入粮荒。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恢复集市和工商业。博古、李德要求重新查田，暗批毛泽东走“富农路线”。7月，苏维埃政府发行公债，弥补财政缺口。中共大力倡导行业合作社。

1933年，中共中央把查田运动当作是苏区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毛泽东认为“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拿中央苏区来说，这种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邬、安远、信丰、乐安、宣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县，瑞金、雩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赣县、上杭、永定、新泉的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级斗争火焰，向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他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1933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查田运动大会上说：“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文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办法。”“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就更加好做。”

1934年4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北部的广昌。又在“养病”的毛泽东，曾找到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军到湖南而消灭之，但该建议未被最高“三人团”采纳。毛泽东受冷遇的情况，直到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时才被改变。

1934年10月，国民政府围剿境内的反政府中央红军势力，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放弃中央苏区而“长征”。

评注：1933年夏，国民政府对中共苏区的封锁进入极端严厉时期。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剿匪失败的教训，对中共苏区和红军着重

在围，不急于进剿，以逸待劳，拖延时日，使苏区物资日益匮乏，从而使苏区和红军“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

蒋介石认为，“以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而将共区经济封锁，无疑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的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蝼蛄蚂蚁之通报”。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为此其制定了封锁苏区的种种办法，并严厉要求国民党高级官员“亲自出马，切实去办”。

1933年，中央军南昌行营先后颁发了十多次封锁令，对封锁事项、封锁组织、封锁办法等逐一作出详细规定，主要在物质、交通和通信三方面实行封锁。除了清查封锁区人口外，包括粮食、食盐、布匹等必需日用品和药材以及钢铁、铅等军用品的材料，是重点封锁的对象。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食盐、布、药材和火油等产品严重短缺，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现，苏区经济日益困难。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

因为缺盐，中共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也导致许多人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失生命。部分红军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据毛泽东在才溪乡的调查称，煤油暴动前每元能买7斤14两，1933年每元仅能买1斤5两，暴动前58%的人家点煤油灯照明，暴动后由于煤油价高，除了政府机关办公点煤油外，一般居民只能点松明。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两年以来，特别是1933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

严密封锁又使苏区医药来源越来越困难，药材奇缺。“绷带、贴布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绷带被越用越短，就用针线缝接起来，直到实在不能用才丢掉”。

因为中共政权的内斗不断，政策多变，对富农奸商的定义过于随意，从而导致商人多不敢在苏区做生意。物资匮乏，也导致部分士兵及民众逃往白区。“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

打土豪缴获物资和抢劫是中共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的方式之一，为了搞到钱粮，中共军队到处打家劫舍，“筹款百万、赤化千里”。为了调剂粮食，中共政权开展合作社运动，成立对外贸易总局和各地分局，鼓励赤白贸易，千方百计从各地筹措物资。为了搞到食盐，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上面装粪底下装食盐；有的打通竹子里面的关节将盐装在里面；有的把食盐化成水浸泡衣服，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再晾成盐；有的还利用出殡的棺木运盐。单单在江西苏区 7 个县，总共建成熬盐厂 580 个，用土法熬制硝盐。

第九章 民国政府五次围剿中共苏区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中正在军事上把主要力量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由蒋当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蒋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蒋希望先弭平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蒋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剿匪”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员负责。

中共苏区得到三年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张国焘说：各苏区成长之主因是，蒋专注于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间之冲突；战争使全国各地状况恶化，乡村民心背离、创造出成群游荡逃兵溃卒，极易被中共吸收；党派内哄消耗政府力量，使苏区在金钱和武器援助下有足够时间去扩张。中共游击队基地成长，也反映出毛泽东等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之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

1930年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表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蒋中正说：“惟愿我全国同胞，明其是非，别其利害，主张正义，挽救危亡，以尽国人之天职。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外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则以有纪律之行动，誓死抗拒之。内对赤匪与叛徒之变乱，则以有组织之努力，共同扑灭之。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民意所向，死生从之，誓当益加振奋，为民先锋，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

1931年5月12日，蒋中正代表国民政府向国民会议提出剿灭赤匪报告案称：“中国目前最大之祸患，厥为赤匪。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当前最急要之工作，亦莫过于扑灭赤匪。赤匪之祸患，其已发露于江西、湖南等处者，固在政府与当地人民协力扑灭之中，而其潜伏于他处，冀图使各省均为江西与湖南之续者，亦已渐露其端，而实不容吾人之忽视。”“近年以来，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与湖南，而湖北次之。江西人民被匪惨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流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万元，谷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之匪祸蔓延，虽不若江西之广，而损失亦不相上下，计被匪惨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元。”“赤匪罪恶，不仅使吾全国人民受物质上之有形损害，其处心积虑所蓄之阴谋，乃在于赤色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直接利用青年男女农民工人，以破灭吾国之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而间接亦即所以破灭青年男女农民工人自身之生命。”

193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蒋中正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称：“此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

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庐山军官训练团每期两周时间，旨在对各地及各军的军官进行政治及军事训练，提倡“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其主课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其中的《剿匪手本》是蒋中正编著。

蒋中正正在出发剿匪之际，还发出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民众书，称：“共匪惨祸，既为我民众切肤痛苦，对于剿匪军队即应尽力援助，或作向导，或报匪情，或供给种种便宜，使剿匪军队，得以顺利进行，切勿坐观成败，漠不关心。”“希望一般民众，群起联合，一面援助大军，一面亟谋自卫，务于最短期内，澈底肃清匪共，使三省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也。”

第一次江西剿共

1930年底至1931年初，蒋中正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与中共苏区红军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华民国称其为第一次江西剿共。

国民政府方面。自1927年国民党分共开始，中共在各省迅速的发展武装势力和根据地，蒋中正虽然一直视中共武装为心腹大患，然而在这一期间的他将重点指向北伐以及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和与冯、阎、李等新军阀势力，并不认为中共能成多大气候，把此事交由湘、赣地方当局负责，并以地方军进行“进剿”和“会剿”的小规模军事扫荡。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度袭占湖南岳州及省会长沙，其他各路红军则威胁著江西省会南昌及湖北省会武昌，一时造成国民政府朝野汹汹，阎锡山等人借此在北平发表“灭共驱蒋”的宣言，企图在舆论上攻倒蒋中正。因为此次的攻击，引起了蒋中正对于中共武装力量的重视。10月3日，中原大战战局已定，蒋中正立即决定以“肃清共匪”作为今后施政重要方针之一。10月6日，中原大战结束，以蒋中正一方的胜利而告终，蒋中正得以将主要兵力集中，部署于江西，用以对逐渐坐大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发动军事围剿。

1930年10月，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出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任总指挥，国民革命军参战部队总计共有12个师、3个旅，总兵力约14万人。空军随时侦察红军行动及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战方针制定为“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

中共方面。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中间经历秋收暴动、海陆丰暴动及广州暴动等多起武装暴动，终归失败，来到江西井冈

山，建立起第一个根据地。自1927年秋到1930年期间，中共根据地四出扩张，势力蔓延至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福建等地，各省县份的工农政府先后成立，并准备着手成立一个中央政权机关来统一领导全国工农政权的机构。

中共在李立三时期策动城市扩张的冒进路线，计划利用蒋、阎交战的机会制造“新的革命高潮”，企图争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等人鉴于8月下旬第二次进攻长沙均遭失利，武汉、南京等城市暴动均遭流产，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认为此时红军的实力，很难进行重大的进攻战斗。得知蒋中正准备在大战结束后调集大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于是红一方面军撤回江西中央苏区，基本上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力求巩固根据地。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中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因应当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动员根据地的群众及依据有利的地形，对国民政府部队实行反围剿战略。

中共红军由红一方面军应战，总司令朱德兼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下辖两个军团和政卫团，各参战部队总计共有7个军，总兵力约4万余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战方针制定为“诱敌深入、各个击灭”。

11月5日，鲁涤平下达第一次总攻令，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三个纵队分别向袁水两岸推进。国民政府军三路部队，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向赣南中央苏区发起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县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网，以图将红军主力压制清江至分宜的袁水流域两岸地区，企图使红军背水而战，达到歼灭红军主力于吉安、安福一带。

中共红军方面，于11月1日开始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主动放弃大部分苏区，将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由于红军先期撤退，使鲁涤平第一纵队在11月7日前进至袁水流域扑了一次空，打乱了第一期作战计划。从11月7日至12月初，由于红军有计划地实行战略退却，国军虽步步紧逼，攻城夺地，然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决战。

12月上旬，蒋中正亲自到南昌举行“剿共军事会议”，策划新的围剿计划。国军主力由永丰、乐安方面推进，并各以一部从广昌、石城及兴国方面协助，计划将红军包围在宁都以北及东韶、东固之间并加以消灭。计划虽然比较严密，但国军各部来自不同派系，难以协调指挥。

12月12日，红二十军发动富田事变，宣布不再服从红一方面军指挥，要求立即逮捕毛泽东等人，并把红二十军转移到赣江以西的永阳。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由于此事影响，以致龙冈以西和西北地区仅剩少量武装部队活动，对于反围剿造成不利局面，方面军决定主动放弃东固。

12月16日，鲁涤平下达第三次总攻令，下令各军向中央苏区实施向心攻击。各师以公秉藩新编第5师和张辉瓒第18师进展最快。12月19日，新编第5师攻

至东固附近的九寸岭大山，发起东固战役，红十二军第 35 师抵抗一阵后便主动撤出战斗。

12 月 20 日清晨，张辉瓒第 18 师在不知公秉藩已攻下东固情形下，向东固猛烈进攻，公秉藩以为红军反攻，也集中火力抵抗。因大雾漫天，在激战四小时后才得知是误战。

12 月 29 日，鲁涤平下达进攻令，以歼灭红军及收复宁都为目的。张辉瓒为了邀功，率 18 师师部和两个旅离开了东固，向龙冈前进。

12 月 30 日清晨 4 点，红三军第 7 军在小别村的小拱桥遭遇张 18 师 52 旅先锋团黄团，在击退先锋团后，乘胜向龙冈方向前进。52 旅的黄团和李团在小别村之西阻止红 7 师的前进，双方激战 2 个小时多。红三军团下令跟前的红八师、红九师向两翼迂回，52 旅两个团兵力亦完全展开，向左右伸延，前红军猛攻，战斗呈现胶着状态。中午 12 点，红十二军突然从 52 旅左侧后方向旅展开攻击。52 旅旅长戴岳急电向张辉瓒求援。由于张辉瓒所率的 53 旅及师部均在龙冈，与戴旅相隔约 4 公里，于是急电命 53 旅陈团驰援，但仅推进 2 公里，未加入第一线。张又电令东固的 54 旅经南龙驰援，第 28 师向龙冈迂回。但此二部在途中即被红军地方部队阻击，无法前进。此时，红四军和红三军团赶到，向龙冈斜插过去，越过红十二军阵地，切断了张 18 师师部和东固第 54 旅的联络，完成了对张 18 师的包围。张辉瓒一面下令抵抗，一面急电催援。下午 3 点，红军总部发出总攻令，将张 18 师压制在毛家坪、万功山一带，张辉瓒企图分路突围，但均被红军截击无法成功。红三军从正面攻击直捣张 18 师部，张 18 师警卫营见大势已去，集合全营缴械投降。红军经过激烈战斗，在当晚全歼张辉瓒师部和 2 个旅计 9000 余人，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等人全被俘获。

红军在龙岗战役之后，休整一天，在 12 月 31 日移驻小布。次年元旦举行军事会议。在侦探敌情中得知谭道源师撤退东移，毛泽东等人判断国军可能要全线退走，决定追击谭道源师，计划将谭道源师歼灭于东韶一带，然后逐一消灭许克祥 24 师和毛炳文第 8 师。令红十二军担任正面追击，经南团、林池向东韶前进；红三军团任左路，经陂头向东韶前进；红三军任右路，限于 2 日正午 12 时到达田营，以主力钳制洛口许克祥师，阻其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瑞、山下坪北瑞的高地，向东韶攻击，红四军为总预备队。谭道源 50 师在红军尾随、一路挨打下，于 12 月 2 日午后陆续到达东韶，便急忙构筑阵地，想凭借高山地形抵抗，但工事尚未完成，红军主力已经陆续到达，相继合围。在 3 日早晨从西、南、北三面向东韶展开攻击。50 师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阻止红军冲击。下午，红军攻占了黄泥这个制高点，50 师已处于红军的火网之下。下午 4 时，红军全线发起猛攻，迅速突破 50 师各处阵地。50 师陷于混乱，官兵四散逃窜。谭道源率领残部向东北方

向逃到抚州。此役国军被歼数千人，缴枪 6 千多支。毛炳文、许克祥 2 师得知谭道源师已经被红军击溃，急忙向北撤离，其余各部随之撤退。红军在半个月的时间内，经东固、龙岗和东韶三次战役，歼灭国军一个师部三个旅，毙俘 1.5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1.2 万多件，取得了第一次中央苏区战役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在龙冈、东韶两战胜利后，即转入战略进攻，向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展开攻势，扩大了中央苏区的范围。共产党经此一役士气大振，树立起了与国民政府武装对抗的信心。毛泽东也由于此一胜利，巩固了因富田事变而遭到动摇的声望，更加确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评注：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敢为天下先的民族主义者，不愿意作外国人的附庸，他们都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蒋是黄浦校长和中央委员，毛则是孙文先生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喜好读书而且成绩优异的人。毛泽东更是师从有十年留学日本英国德国的近代知名教育家杨昌济，并且老师要把女儿嫁给学生，可见对毛泽东的赏识。蒋介石从日本一回国就当敢死队的队长，这不太像江浙人的做派，其胆识确有过人之处。

蒋与毛在年轻时都曾在看过邹容写的《革命军》后而感动异常。蒋回忆称读《革命军》后不禁失声痛哭、毛回忆称读《革命军》后夜不能寐。还有林觉民的《与妻书》，哪一个革命青年看了，不会为之动容？此时的毛泽东是不主张中国统一的，他巴不得中国分裂成一千个国家才好。

两个人都对曾国藩、胡林翼的用兵与处世之道推荐有加。蒋将曾胡的治兵语录推荐为黄浦军校的必读教材、年轻时的毛在读了胡的全集后，将自己的字改为胡林翼的号一样的“润之”。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军阀。曾国藩依靠亲朋好友和宗族乡勇等复杂的人际关系，组成以湖南老乡为主的一支地方武装，剿灭了太平军。曾国藩治军有方，善于用人；他因材施教，重视精神教育。这些作风对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影响。

胡林翼作为湘军的重要首领，是平定天平军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云南将军蔡锷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把这本书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胡林翼少时风流无赖，婚后仍流连于秦淮河畔，是毛泽东的榜样。

若论军事才能，毛泽东肯定比蒋介石胜一筹。蒋介石常常依赖职业的军事顾问为他出作战方案；而毛泽东则从来都是亲自操刀，不假他人之手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私心极重之人，都极希望登大位。只是毛泽东善于把私心隐藏起来，有时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错觉。而蒋介石则私心外露，因此不仅汪精卫、戴笠、孙科、何应钦、李宗仁、宋哲元、韩复榘、杜月笙，甚至连外国顾问团成员都有相似的评价。尽管两人都胸怀大志，但心量都极其狭隘；不但他们两人水火不容，对他人亦都是有仇必报之人。

第二次江西剿共

1931年4月至5月，国民政府军与中共红军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战争。

1931年新年第一天，蒋中正为召开国民会议及选举总统一事作准备，即传来江西剿共失利的噩耗。蒋中正一面安抚谭道源、鲁涤平等下属；一面重新调集兵力，决定另派大员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同时兼汉口、南昌两行营主任，前往江西指挥第二次围剿。

除了第一次围剿原参战的部队，蒋中正增调鄂赣地区的第五路军和鲁西南的第六路军入江西参战，此外还另调3师3旅为预备队，总计共有20个师、4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0万人。作战方针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原则，将中央苏区严密封锁，遂渐压缩包围圈，并断绝苏区一切物资来源，期许一举歼灭。

1931年3月17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备战，实施坚壁清野，主力转移至宁都、瑞金地区。此时的红军主力未及休整和补充，全员仅3万余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积极进行反“围剿”准备。

4月1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行动，各路每日仅行进不到10公里，以防红军的穿插迂回。4月23日，进到江背洞、龙冈、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一线，并对占领区实施大规模破坏，以毁灭红军的经济基础。

4月，江西新淦为中国工农红军所陷。面对这一形势，4月17日，担任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中提议中央红军应该远走四川，并得到了王明派出的“三人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支持，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则认为应该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击败敌人。双方一度争执不下。次日，毛泽东请来红军各部队领导20余人出席会议，迫使项英采纳其观点，决定以五路军为目标，对围剿军实施横扫。

会后，红军主力转移至东固一带休整，寻机出击。为寻找机会，红军主力冒着被发现合围的危险，在此地区待机二十五天。

5月10日，在巩固了占领区后，国民革命军各部再次出发，深入中央苏区腹地。5月13日，五路军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离开富田向东固推进，5月15日，朱德和毛泽东作出部署，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三十五军为左路、红三军（缺红七师）为中路、红四军（加强了红六十四师）、红十二军（缺红三十五师）为右路分割包围此路部队，并且命令红七师和红三十五师阻击十九路军，其余可能出现的援军，由地方武装负责迟滞。

5月16日，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在中洞遭到红军中路军和右路军的突然袭击，很快溃散。当夜，红军左路军攻占富田，红十二军开始进攻第43师，该师连夜逃走。5月19日，追击的红军部队在白沙追上第43师以及中洞残军，将其击溃，红十二军于当日乘胜进攻第54师，该师与白沙残军逃往永丰，十九路军因战情不明，亦于同日撤回赣州。

5月21日，红军前锋在追击过程中接触第27师81旅，旋即展开进攻，将该旅大部歼灭。当晚，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项英决定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5月27日，林彪率领的红军攻占广昌，歼灭第5师4个团，击毙其师长胡祖玉。5月31日，红军主力攻占建宁，歼灭第56师3个团。

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东固、富田向东700余里，16天内五战五捷。至此，第二次战役以红军的完全胜利告终，据红军战报，国民革命军在战斗中损失超过3万人，缴枪2万余枝。

此次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苏区的范围，其势力从江西南部伸展入福建西部。毛泽东也又一次证实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更加稳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评注：民国时期服兵役，民间叫做“拉壮丁。”中国老百姓一般是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的。谚语有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蒋介石部队里的兵，但跟其他的军阀没有太大的差别。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按照法令，凡在18—45岁之间的男子，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以抽签的方式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不管是新兵、老兵，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战斗打响了还要跑路，连续行军数百英里，是常见的事情。他们还常常吃不饱肚子，严重营养不足，创伤、疥疮、皮肤病很普遍，甚至花柳病，病了也无法医治。痢疾、瘟疫流行，很多人就死在途中，连个掩埋的地方都没有。新兵逃跑是常事，所以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被当作畜生一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

中央苏区的红军，是在国统区包围下的匪军，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正规军，所以征兵就更加困难，加上红军发饷很少，或者根本不发饷，穿的多是草鞋，连一双布鞋都没有，只能靠打杀抢来维护生存，跟当时的土匪确实没有太大区别。能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地痞流氓，或者家里实在是穷得一点出路也没有了。

红军最早的队伍多是湖南湖北和江西人。湖南猛子“恰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在他们，打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喜欢直来直去，东东西西反而让人瞧不起。他们看不起东游西荡的叫花子，宁愿靠自己的劳动找饭吃。曾国藩和胡林翼是湘军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罗荣恒、粟裕、肖劲光等都是湖南人。

第三次江西剿共

1931年7月至9月间，国民政府军与中共红军发生第三次大规模战争。

1931年6月21日，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任为南昌行营主任，主持对共产党中央红军的围剿，并调集大批黄埔军校毕业，对蒋忠诚的嫡系部队，组成两个集团军，23个师和3个旅30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长驱直入”的围剿。

蒋中正任命何应钦为左路集团军总指挥，负责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右路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指挥，负责就地清剿苏区。

7月10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备战，实施坚壁清野，除诱敌的红九师和红十二师外，其余主力经过大范围转移，绕道福建西部，转移至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28日，红一方面军集结完成，全员仅3万人。

7月1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行动，但是苦寻20余日后，无法发现红军主力。7月底。国民革命军突然发现红军主力已绕道开往兴国，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标是西渡赣江，于是命令各部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意图将其主力困在赣江东岸加以歼灭。

毛泽东、朱德的初期计划是寻机从富田突破包围圈，将深入中央苏区的敌方主力部队置之不理，而扫荡其后方留守部队，待其主力回师援助的时候，寻找战机歼灭其孤立部队。但是，当红军向富田前进之时，被国民革命军发现，11、14两师抢先占领富田，将红军主力堵截在富田以南。

此时，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毛泽东立即决定改变战略，以地方部队红三十五军伪装主力准备强渡赣江，主力部队于8月4日抢在国民革命军左、右集团军合围之前，在双方部队中仅有的40里缝隙地带偷越北上，转移到莲塘地区。

8月7日，红军主力在莲塘歼灭第47师一个旅，随即在良村歼第54师大部。8月11日，在黄陂歼灭第8师约四个团。此时，国民革命军方才发现赣江边的已经不是红军主力，迅速回师北上。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再次派出红十二军向乐安前进诱敌，主力则返回兴国休整。8月下旬，当国民革命军发现红十二军并非红军主力，再度回师兴国时，已是强弩之末。9月，唐生智联合新桂系、陈济棠、石友三等人，拥戴汪精卫在广州设立“国民政府”，向衡阳进军。国民政府不得不命令国民革命军撤出战场，准备转入平叛。红军于是迅速展开反攻，9月7日，红三军在老营盘歼灭第9师一个旅，9月8日，红军主力在高兴圩遭到十九路军的激烈抵抗，被迫撤退，国民革命军战报称“红军共伤亡八千余”，红军方面的战报称“国民革命军伤亡2000余人”。毛泽东后也承认，此次战役是其一生中五大败仗之一。

毛泽东说：“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在这次战役中，国民政府军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方石岭战斗发生于9月15日，地点则是在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主要战斗之一。两方均有伤亡，国军遭到严重挫败，被全歼第52师及第9师残部。战斗结束后，红军总司令部驻在白石万寿宫里，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但在第二天下午，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军追到贺堂山的北坡，距万寿宫十余华里的六渡坳时，被国军的飞机扫射击中而阵亡。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至此，第三次战役各有损伤，以中央军半途而废告终。

此次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将中央苏区的江西部分和福建部分连成一片，其势力达到21个县，人口250万人。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消失，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和毛泽东等本土派的矛盾开始显现，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同时，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长久被牵扯在江西前线，国民革命军中各派系的矛盾开始呈现，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当年 12 月的宁都暴动都是各派系矛盾的体现。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无法继续全力剿共。

由于双方内部矛盾的上升，大规模军事行动停止了约 1 年的时间。

评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懂得的，不管他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又有几个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呢？

“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每一个军事指挥都会学习，而且多是自学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毛泽东是宣传部长，黄埔军校的课程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继以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他们两位是从来没有去上课的。对于他们两人，俄国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战术攻防，他们是不感兴趣的，而苏联红军铁的纪律，思想和精神教育，却是他们感兴趣的。

在毛泽东看来，有诸葛亮，有司马光，有《三国演义》，有《资治通鉴》，已经足够了。中国人的事情，还是得靠中国人的脑子。蒋介石见识了日本帝国的强大和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希望走职业军人的救国道路。毛泽东的军事顾问是苏共强加指派的；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自己聘请的。谁优谁劣，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

还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曹操官渡之战，截了袁绍的粮草，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诸葛亮劝刘备经营天府之国，有了充足的粮草后备，才有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彭拜是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祖师爷。1924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完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连续担任五届农讲所主任，第六任才交给了毛泽东。

彭拜早年家族兴盛，祖父彭藩精于经营，桥东社彭家成为当时海丰客家人首屈一指的富豪，拥有店铺四十多间。他留学日本时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对战时物质的保障有深入的研究。彭拜的经历成为后来中共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宝贵经验。

说到底，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非法的抢劫和偷盗合法化。中共红军是非法的匪军，苏维埃政权又是伪政权，没有办法向农民和工商业者合法收税。为了生存，共产党就只能靠杀死农村的富农和城里

的工商大户，抢夺他们的钱粮，来解决军队粮草的补给问题。另外，就是士兵闲时劳动，生产自救。

第四次江西剿共

1933年2-3月间，国民政府军与中共红军发生第三次大规模战争。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在江西对红军转入守势。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后，国民政府北方军事压力减弱，遂重新开始筹备对红军的围剿。国民革命军首先将重点放在对外围较弱的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边苏区的进剿上，在成功地将两地红军击败后，于1933年2月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

中国共产党则在同时陷入内部倾轧，前三次反围剿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已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托病隐居于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是1933年1月7日刚刚从上海迁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前线实际指挥者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政委周恩来。为了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军委将红十二军和红二十一军划归红一方面军，使其下属兵力达到三个军团和四个军，令其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整个江西。

国军方面，以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兵分三路：左路军为蔡廷锴指挥下的十九路军和福建地方部队，共计6个师和一个旅，负责福建方面的牵制作战，就地清剿红军；右路军为余汉谋指挥下的广东军队，共计也是6个师和一个旅，负责广东和湖南境内的牵制作战，就地清剿红军；中路军为主力进剿部队，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8路军12个师组成。除此之外，第43师为中路军预备队。另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任务。

红军方面，在红一方面军指挥下作战的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以及红十一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共计7万余人，集中于黎川地区。另外，红军还将地方武装合编为五个纵队，在福建、江西南部配合主力作战。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红一方面军自2月9日起开始主动出击，对南丰发起进攻，然遭到南丰守军陶峙岳第8师的坚决抵抗，红三军团红三师师长彭鳌战死于城下。红军被迫撤围，准备袭击援军。国民政府方面在得到红军动向消息后，迅速调集中路军主力南下南丰，准备与红军决战。

红军指挥员朱德、彭德怀鉴于敌强我弱，遂令红十一军伪装成为主力部队吸引国军中路军2、3两纵队往黎川地区调动，同时将其余主力部队集结于广昌以西

休息待机。国军指挥员陈诚中计，将红十一军认作红军主力，命令第1纵队集结于宜黄以南，第2纵队自南丰出击建宁，第3纵队正面进攻黎川，预备将红军包围于黎川加以歼灭。

红军在发现国军动向后，抓住第1纵队第52、59两个师与其他部队相隔较远且疏于配合之机，决定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伏击52师，由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伏击59师。2月27日，战役在登仙桥和黄陂相继打响，3月1日，52师和59师全军被歼，师长李明和陈时骥被俘，李明后因伤势过重而死。由于国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兼程来援，红军放弃了继续伏击第11师的计划，转入休整。

3月中旬，陈诚调整军事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则仍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摆出保卫广昌的态势，主力则潜入后军北方。陈诚再次中计，强令前军加速前进包围红军，造成前后两军脱节50公里。3月20日，主力红军在草台岗突然袭击后军的第11师，到次日中午，歼灭了11师的主力，重伤师长萧乾。在此情况下，国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第四次战事结束。4月，江西新淦被红军攻克。

总结中共红军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其十分灵活的作战方针，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此次战斗至1933年3月，蒋中正的直属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近三个师被全歼，使其痛心异常；随后，蒋中正离开江西进行对日本的长城抗战。

评注：在黄埔系当中，有蒋何并称的地位。何应钦1890年4月2日，何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荡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七岁入读乡塾，十一岁以考选第一名，保送入省会贵阳陆军小学。十八岁考选留日，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日本期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毕业后回到贵州，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

1916年，何应钦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21年冬，贵州省政局陷入混乱，何应钦出走昆明。

1924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任总军事教官、教育长。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任潮梅警备司令，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7年4月，宁汉分裂。蒋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反共会议，何应钦极力支持主张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下野后，何应钦与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

1931年2月，何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身份，组织南昌行营，任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军总司令，调兵遣将。1932年2月，国民政府

任命何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围剿事宜。统朱绍良、蒋鼎文、陈诚等部。

评注：陈诚是军事集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坚力量。他自到黄埔军校起就一直追随蒋，成为蒋之心腹干将，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陈诚出 1898 年 1 月 4 日生于浙江青田县，世代务农。他幼年体弱多病，因身材矮小，两次报考军校，都不被录取。后经熟人疏通，才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因征战骁勇，被孙中山点名送进这所军校进行重点培养。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蒋任命陈诚为第一连连长。蒋在指挥所从观察镜里看到炮火轰散陈炯明军，使其四处奔逃，对鲍罗廷高兴地说：“这连长不错，打得准！”

1928 年 3 月，蒋任命陈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蒋高度评价陈诚的 11 师在中原大战中的战绩。因为陈从 11 师和 18 军起家，这支部队也就成为陈系统部队的基础，18 军巅峰时期下辖多达 8 个师。蒋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陈任副团长。

蒋赏识陈诚的军事才能，派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共革命根据地。1933 年 2 月，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围剿事宜，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辖周至柔、孙连仲、李延年第 2 个师。陈诚到处筑公路和碉堡，后在湖北黄陂和江西宜黄等地被红军歼灭近 3 个师。陈在家书中称：“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

第五次江西剿共

从 1933 年 10 月 17 日，国民政府动员近 100 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 50 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围剿历时 363 天，直到 1934 年 10 月 14 日才结束；红军被迫撤退，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标志着国民革命军第五次围剿的胜利。

1933 年 5 月，蒋中正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兼任剿匪军总司令。

南昌行营提出“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之作战方针，以及组训民众之作战原则，采取构筑严密之碉堡封锁线战术，防止共军流窜，并逐步缩小包围圈，聚歼共军于赣南地区。

在调集各路地方军队以后，南昌行营参谋柳维垣首先提出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战略，他反对围剿，提出改变“围剿”为“追剿”。此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国民革命军改变作战策略，战法步步为营。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

碉堡作战为第五次剿共战术运用上的一大特色。碉堡作战指导要领包括：以逸待劳，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处处设碉，逐步推进，防止共军各个击破。前几次围剿战争红军已经破译国军的电码，但是到第五次围剿国军指挥官却大大加重了有线通讯的分量，无法再行破译。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

红军方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人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因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使得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并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博古读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

博古、李德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红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 and 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军不停的进攻。但缺乏自动武器、严重缺乏重火力的红军在国军的高大的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前遭受惨重损失。由于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错误，这次作战红军始终处于被动，以致红军损失惨重，丧失大部中央苏区。到最后只有少数城镇还在红军的掌握之中。

1933年9月25日，国军大举进攻黎川，第五次军事围剿战役拉开序幕。三天后国军攻克黎川，虽然红军成功阻止国军向黎川西南挺进，但歼灭国军的战略企图落空。1933年10月9日，红24师向硝石进攻；国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路红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惨重。蒋中正看到自己的战术成功之后，于1933年10月17日在南昌行营下达命令；彻底实施战术防守，战略进攻的原则，以求将德国顾问的堡垒战略构想发挥到极致。与之相反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仍令红军主力插入国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进行阵地战。从1933年9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反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2月11日，国军以8个纵队的兵力离开碉堡封锁线，开始第二阶段的攻势。中共临时中央却命令红军进行战略决战，继续攻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黄埔系中央军；失利后被迫南撤。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1934年4月10日，国军以11个师分两个纵队向广昌进攻。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县城，距红都瑞金百余公里，为其重要屏障。随着国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

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五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军进占广昌。在国军的绝对兵力火力优势攻击下，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丢失重要据点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阵地。1934年4月19日，红军反击延福嶂未能奏效，被逼至广昌城下。1934年4月27日，国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并于黄昏时攻占该城，红军伤亡高达5500余人；余部在夜色掩护下向西南方向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直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三人团决定6路分兵抵御国军的攻击。1934年8月5日，国军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攻占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

信号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人员项与年从莫雄处得到国军最后总攻击的计划，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各部队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然后迅速到指定地点集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人，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由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贺昌等人领导，继续坚守中央苏区。国民革命军于10月26日占领宁都，11月10日占领瑞金，11月17日占领雩都，11月23日占领会昌。

评注：从1928年5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红军，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中共红军在江西粉碎国军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贯彻的就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原则，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国军的进攻。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没有料到国民政府军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另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是毛泽东成功的地方。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最后活捉张辉瓒。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此战斗就达到了，也影响了全战役。

但是毛泽东受到苏联派的排挤。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中共红军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国军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特别是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战争打的是军事，更是经济。自1933年始，中央苏区物质资源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各种物资供应十分匮乏。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大红军工作更形紧张。人力缺乏对扩大红军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势在必行，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

在此背景下,扩大红军的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

中共红军被迫长征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五次反围剿作了如下的总结: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

(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〇)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

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

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评注：有相士如此为蒋介石算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金神入火乡，富贵天下响。走投无路投金荣，水木之年堪大用。咄咄逼人，如日中天，金水木火为喜用。摔跟斗，有下犯上，虚惊一场，多亏亲家美姻缘。胜不离川，败不离湾，一生杀业，魂归清明。”

又有相士为毛泽东算命：“木不枯，水不涸，韶山有泽名润之。杀虽当令，死神叩门，一清到底有精神。左膀右臂，逢凶化吉，处处有病处处药。看似孤军在野，实在众星拱月。刻意放纵，妻妾成群，桃花朵朵任他折。岁运并临，不死自己，也死他人。九九龙蛇三更会，霸王气象酉时衰。”

第十章 中共西逃之长征

1934年10月10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向西逃亡。这次战略转移，历时368天，行程二万余里，在中共的历史上称“长征”，在国民政府称“追剿”或“西窜”。

评说：风萧萧，雨霖铃。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英雄逐鹿，故国风云起。可悲热血青年，不作中华儿女，偏为马列子孙，背负圣教，与魔共舞。哀哀哀！瑞金非金，遵义无义，万里长征本是逃亡路。湘江两岸，赤水桥头，百般情谊错把红船渡。待到了，红魔都，荒冢累累，白骨嶙嶙，游魂遍野鬼魅哭。

9月下旬，经过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中共放弃中央苏区，这是被逼的；长征的目的在于求生存。

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的中央领导人和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该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于都）集结。

10月，于都这个人口不到一万人的小城，打破日常的安宁沉寂，有了些许的紧张和躁动。于都河依然风平浪静，渡船在河上往来行驶。中秋时节，这里天气宜人，白天暖和，夜晚凉爽，几乎不下雨。多数庄稼已经收获，只有晚稻、红薯和部分荞麦还等着收割。10月12日，中央机关到达于都，随行的有几千个脚夫，每人拿了一个银元的工钱；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静静地渡过河去。

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赣江的东源——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桃江，携大量辎重，“就像大搬家”，沿信丰油山、大庾、南雄之间的粤赣边界缓慢西行。尽管事先达成了协定，但由于陈济棠并未及时使粤

军前方部队知情，红军仍遭受了一定损失，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阵亡。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了广东仁化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并占领了宜章。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西进企图，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部队尾追红军。

11月15日，红军继续西进，攻占临武、蓝山、道县等地；25日，红军全部渡过潇水。同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此时由于蒋桂矛盾，桂军撤出湘江防线，但中央红军并未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仍然携带大量辎重缓慢前进。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建绪部占领全州，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态势；红一军团部队抢占了界首一带渡口，红三军团也前出至湘江。27日，蒋介石下令进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展开惨烈的阻击战。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至全州之间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余人。红三军团十八团、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红八军团由于损失惨重，番号撤销。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从广西龙胜翻越了老山界。此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前往湘西，但政府正规军对此已早有准备。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城的恭城书院召开会议，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获得了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认可。12月13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发展川黔边区。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红军入黔第一次会议，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发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评注：《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所谓的国民党反对派，而是为了对付共产党领导集团之反对派的，如李德、博古、张国焘等人，是党内残酷斗争的思想武器。

历史的每一句话就是一部小说。《长征》这部电视剧拍的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但是绝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生命。湘江一战，中共红军几乎在一日一夜之间，从八万多人瞬间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五万多条生命啊！他们将湘江之水染成红色。

那些经历过那场战斗的人，也许他们感悟的已经不是对生命的珍视，而是对生命的漠视。五万条生命，在战争的领导人看来，已经不过是一个

数字罢了；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生命也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面对死亡，大多数身历其境者，早已经麻木了。

如果说这样的战争，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真是太天真了。对于身历其境者来说，那只是为了生存。毛泽东需要斗争，其他人一样也需要斗争；因为胜利者可以主宰他人的生命，而失败者只能任人宰割。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被捕身亡；何叔衡在逃跑时中弹身亡，他们就是长征中的弃子，任人宰割。

1934年秋，毛泽东一连几个月疟疾缠身，教会出身的傅连璋医生想尽办法救治，却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加上他两年来被排除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之外，情绪低落，李德等曾向莫斯科提出请求，让毛泽东到苏联“治病”，但毛泽东坚持“我不走；我不离开自己的国家”。

李德和博古等，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苏俄的代言人，而中共是苏共的傀儡。要扳倒他们，谈何容易！只能用他之矛，攻他之盾，所以毛泽东拿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打到对手。

毛泽东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在中共红军刚开始长征时，李德、博古的阵地战接连遭遇失败，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在运动中打击敌人，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来解决战争中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而矛盾本身就是运动的。

毛泽东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毛泽东是重视实践调查的。所以在长征期间，他多次亲自到农村阵地调查研究。他善于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比李德和博古等高明得多的地方。他在《实践论》中引述《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世间万物，唯心所造；世间万事，唯识所变。而共产主义者只相信五官能见闻觉知的东西，所谓“眼见为实”。通过调查实践而达至眼见为实，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辩证唯物论的基础。毛泽东写道：“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引述列宁和马克思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尽管这些领袖语录在今天看来无比荒谬。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毛泽东接着说：“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毛泽东的斗争，终于在遵义会议上获得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在后来对付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毛泽东依旧通过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获得胜利。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是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毛泽东写道：“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

1935年1月，红军开始强渡乌江，突破黔军的防线，向遵义地区进军。

1935年1月7日，中共的“中央红军”武装进攻并占领了遵义县城，在城内休整。1月15日至17日，该党的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党史称为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和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已暗自结成同盟，试图共同反对博古、李德。会议上博古率先作报告，检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军事指挥错误，但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困难。周恩来随后做副报告，称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随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保守主义。随即，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召开三日，最终决定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进，24日攻占土城。28日，红军向位于土城以北的青杠坡的国民革命军郭勋祺部队发起进攻，激战一日，双方损失惨重。此战红军损失上千人，夺取赤水县和渡江的计划均未能实现。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计划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队伍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风雪里的毛泽东心情很沉重。次日，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流经土城这一带的赤水河，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滩多浪大，是川黔滇三省交通的一道天然屏障。所幸的是正值隆冬枯水期，河水不深，河面平静，在夏季汛期要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3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时值寒冬，云南扎西并不适合大军长期驻扎。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红军将领们围着火盆，吃着烤红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2月10日，毛泽东等红军领导

决定东进，二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开始进攻桐梓地区。2月25日，经过激战，红三军团夺取娄山关，并击败国军随后的反扑。随后，中革军委指示红军部队继续向遵义追击。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城。在进攻遵义作战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

红军遵义大捷，击溃王家烈部8个团，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俘敌近3000人，活捉敌团长1人，击伤敌旅长、团长3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万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使“追剿”中央红军之国军不敢轻进，国民党报纸也惊呼，国军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红军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人人扬眉吐气。

此时，国军吴奇伟纵队开始进攻，并夺取了红军控制的老鸦山。中革军委决定围歼吴奇伟纵队，吴奇伟纵队被红军击溃，其司令部遭到长途迂回的红军突袭，吴奇伟逃过乌江后，命令士兵立刻摧毁渡桥，结果未过河的一千余人被红军俘虏。吴奇伟战败后，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督战，调动黔军、川军、中央军围堵红军。

3月15日，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的国军周浑元部，经过一天激战，红军最终以失败告终。次日，为避免不利态势，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

茅台当时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坐落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拥挤不堪，街道狭窄，遍地泥泞。这里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制作地，小村镇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

在战局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决定退出战斗，指挥部队于当晚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国军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向茅台镇，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折返贵州。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镇。在这里红军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

17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毛泽东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故意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迷惑国军。

蒋介石此时判断红军意欲北渡长江，命令国军部队予以截击，毛泽东当即决定回师东渡。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牵制国军，其余部队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

评注：毛泽东笑称“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是毛泽东复出后，第一次指挥的大型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毛的红军穿插于国军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国军。当发现国军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对方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令许多历史学家困惑的是，为什么蒋中正在中共红军被打的稀巴烂而向西落荒而逃的时候，蒋中正没有将他们一举歼灭。其实是蒋中正有意放他们一条生路，而随着共匪西窜之际，一路“追剿”，从而肃清西部各路军阀和地方武装的势力。

1935年1月4日，蒋中正在浙江溪口密电《令川、黔、湘、鄂各军合力堵剿电》称，查朱毛残匪西窜，虽经追剿、防堵各军迭予重创，而该匪流窜无定，自镇远、施秉经我军克复后，似有向瓮安方面窜扰之势。至萧、贺股匪，自朱、毛西窜后，进窜湘西，遥为声援。兹为消灭萧、贺于川、湘、鄂边区，及追剿朱、毛计，决定部署如下：（一）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应进驻沅陵，指挥其主力（所部二十团以上）及薛（岳）总指挥两部应跟踪穷追，协同防堵军，务期于乌江南岸消灭该匪。并速派一部进驻酉阳、秀山。薛（岳）总指挥所部继续追剿，仍归何总司令指挥。（二）四川剿匪军刘（湘）总司令所部应派队防守赤水、鲮水、綦江、南川一线，在徐总司令源泉所部未到彭水、江口以前，须兼顾彭水、江口，另以有力部队进驻松坎，与驻桐梓之黔军确取联络，堵匪北窥重庆，西窜泸州。（三）黔军除以一部防守贵阳外，须以主力集结遵义，扼守乌山，并派兵一部驻扎桐梓，与川军确取联络。（四）粤桂军应由榕江经都江向遵义急进，协同黔军防匪逃窜。（五）湘鄂边区徐总司令源泉所部以消灭萧、贺股匪之任务，主力由石门、慈利规复大庸后，经永顺、酉阳向彭水前进，以一部由恩施、咸丰向黔江前进，沿涪陵、江口、彭水、黔水、龙山之线，统归其防守。上官云相总指挥所部移驻夔万，并派兵驻扎涪陵。

蒋中正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他一边令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的各路军马追剿西向逃窜之中共红军，一边在沿线又留下了很多口子，让红军乱窜，继而引领国军进入长期被地方割据势力占据的地区，达到统一中国之目的。

3月29日至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了国军的包围圈。负责掩护红军主力的红九军团部队由于渡口被阻断，被迫独立行动。

1935年4月2日，红军主力逼近贵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为安全计，蒋介石飞离贵阳，并命令滇军孙渡等部火速驰援贵阳。4月8日，红军突然南进，从贵阳、龙里间突破国军防线西进。4月23日越过平彝

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将主力部队收缩至昆明防守，为中央红军打开通道。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分三路抢渡金沙江，林彪所部受令从龙街渡口渡江，其先头红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因水流太急和无器材架桥设桥失败，由于林彪和师长李聚奎沟通不好，林彪骂了娘，冷静下来听取报告后他向军委反映。5月11日，林彪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的面打电话给彭德怀：“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不答应。

红军到了会理，指战员从上到下都是身心疲惫。他们已经人困马乏了，只好停留休整。红军到底该往哪里去呢？到底有什么计划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对毛泽东领导权的质疑在遵义会议不久后就出现，李德说洛浦和林彪指责毛泽东“在敌人面前逃跑”，“在军事上破产了”。让李德惊讶的是，毛泽东请他过去谈话，承认情况很严重，但同时表示对最终渡过金沙江信心十足，并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带领红军取道西康和青海藏人区去新疆，在那里可以向苏联请求支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会议，会上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领导提出批评，并决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独立行动的红九军团在贵州、四川和云南边境地区活动52天，行程1000多千米，最后在四川西昌境内与红军主力部队重新汇合。

5月20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冕宁。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号召彝民与红军协同作战。同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族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袁居海子结为兄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24日晚进至大渡河西南岸的石棉县安顺场。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十七勇士”自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然而，由于掌控的船只有限，红军无法从安顺场迅速全部渡河。因此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红一师及干部团在原地渡河，其他部队北上进攻泸定桥。5月29日，红二师四团占领泸定桥，与安顺场渡河部队会合。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向东翻越二郎山，突破川军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随后，中央红军在飞仙关前转而北上，经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约45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天气变幻无常。除了雪山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外，饥饿和寒冷也给红军带来严峻考验，一些红军死于冻、饿、无力。

6月12日先头部队在懋功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26日，张国焘从茂县赶到懋功两河口，与在此等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召开两河口会

议。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同时，两个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卓克基。由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战略争论，红军在此长期滞留，导致松潘大路被国军胡宗南部占领，红军只能穿过松潘西部的草地北上。

7月21日至22日，中共在黑水县召开芦花会议。8月，中共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儿盖召开毛儿盖会议，决定占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此地区向东发展。随后，红军右路部队通过松潘草地。由于草地一带荒无人烟，无法就地补给，结果红军面临极限危机，包括严重高原反应、饮水中毒、饥渴、湿冷、天气变化极端、缺氧、缺盐，有不少红军为此而死，或是陷入泥沼。8月26日，走出松潘草地的红军发动包座战役，击溃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共的毛泽东等人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若尔盖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南迭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单独北上。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得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的相关消息后，哈达铺会议最终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目的地。

评注：年轻的张学良吸鸦片成瘾。1933年至1934年间，张学良游欧考察，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戒毒，之后身形从过去清瘦而略发福态。蒋中正错用张学良，是中共红军能在西北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胡汉民劝他不要跟蒋中正合作。当时张认为，法西斯才能救中国。胡汉民对他说，汪精卫是办外交的人，不会说真话，而胡自己则是乱说话，因此出了乱子。张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

2月1日，蒋中正由南京抵杭州，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学良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2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张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2月9日，蒋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3月1日，张在汉口任豫鄂三省“剿匪”副司令职，3月5日武昌设立行营。

6月，正当蒋第五次围剿红军在江西激战时，张学良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6月18日，张出巡豫鄂边区，是日抵达潢川，6月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6月27日张回武汉。

10月9日，蒋中正在张学良、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达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北平抵达洛阳晤见蒋。10月12日，蒋偕张抵达西安。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4月，蒋命令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4月2日，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4月14日，武昌行营主任张由重庆飞贵州见蒋，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4月17日张回汉口。

9月13日，张学良由汉口飞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9月19日，张飞天水视察。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蒋中正再次推张学良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9月21日张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9月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

10月16日，张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0月19日返西安，10月20日武昌行营结束。同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第十七、第十八两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于8月11日进至桂东县寨前地区。在这里，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西渡湘江。由于国军封锁湘江，红六军团再次改变渡江计划，迅速向东转移，进至阳明山区建立根据地。之后由于战术考虑，由嘉禾折转西进道县，于9月4日在灌阳县界首地区渡过湘江，进占西延。

湘桂两省国军主力已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六军团北进。红六军团随即转兵向南，袭占通道。19日，在靖县新厂给尾追之湘军补充第二总队的两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后，又于10月1日袭占贵州的旧州老黄平，随后又转向黔东北的江

口前进。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军第十九师遭遇，红六军团损失惨重，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

部队被国军截断，一部由参谋长李达率领到达沿河地区，后与红三军会合；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10月24日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

两军会师后，军委命令两军分开活动，红二军团留在黔东地区；红六军团单独西进。11月，部队攻入湖南，在龙家寨歼湘西军阀陈渠珍2个旅大部，并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5月，红军部队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国军41师师部和121旅，俘虏师长张振汉。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国军85师大部，击毙师长谢彬。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国军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国军围剿，并乘胜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1935年9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采用分进合击进攻湘鄂川黔边，红军未能突破围剿。

11月，贺龙与任弼时等从湖南省桑植县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突围国军封锁，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留张正坤第十八师坚守老根据地。红军经溪口、洞庭溪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到28日，两路红军分别占领溆浦、辰溪和新化、蓝田、锡矿山等地。国民政府集中12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分路追击，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歼灭于沅江和资水地区。红二、六军团一部由溆浦出发，向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之势，吸引追兵。之后，趁着国军东调之机，大部转向西进，再向北转，于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摆脱追兵。1936年1月9日，在芷江便水发动战斗，随后占领了石阡。

1936年1月，红军到达黔东地区，由于国军围攻，红军向黔西转移。2月2日，红军在修文渡过乌江，进入黔西，攻占黔西、大定、毕节等地，并进行扩军。2月，在黔西县城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两军团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之后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与国民革命军周旋。

3月12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镇雄得章坝设伏，伏击国军万耀煌纵队第十三师，缴获大量辎重弹药，险些俘虏万耀煌。

3月下旬，贺龙、任弼时接到朱德、张国焘来电，建议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军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经云南寻甸、富民渡过普渡河，经过普渡河和六甲战斗，进占楚雄、祥云、宾川、丽江。4月底，红军在丽江渡过金沙江，攻占中甸，翻越玉龙雪山。7月2日，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评注：毛泽东说，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

1934年红四方面军击退了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但红军也损失惨重，根据地被严重破坏。10月，蒋介石派出“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督导川军作战，并专门为刘湘拨款，补充川军兵力和装备。不久，又命令中央军胡宗南派兵进驻广元、昭化地区，采取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术。

11月，红四方面军组织连级以上干部参加毛裕镇会议，徐向前制定向川陕甘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进攻甘肃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12月19日，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重新组织进攻，配合中央红军进军。随后中央又要求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高层经过讨论，决心围攻进入四川的胡宗南部队。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展开，徐向前率领主力围困广元、昭化，计划围点打援。不过胡宗南并未派援，而红军亦无法攻克广元、昭化，徐向前于是撤兵。而此时共产党中央已结束遵义会议并开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并命红四方面军集

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年2月，红四方面军经宁强北上进入陕西南部，攻占沔县。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将近十万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4月，红四方面军攻下剑门关，前后共击溃川军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在当地进行休补装备，并扩员至八万余人。

当时蒋介石为防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调遣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钰等部围攻；张国焘在江油附近召开红四方面军会议，决定撤出川陕根据地，进攻北川、茂县、理县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5月12日，徐向前率领红九军、红三十军由北川西进，在土门突破北川河谷；15日，占领茂县；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随后红军一部攻下理县；李先念西进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红军。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

两军会师后，确定统一的战略方针成为首要问题。6月16日，中央红军主张总方针为占领川陕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区为落脚点，伺机进占甘南和陕南。而张国焘和陈昌浩则主张暂时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区，以解决部队给养。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开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徐向前率领一部进行战斗。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已经占领毛儿盖，两个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以加强团结；徐向前兼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此时蒋介石指挥胡宗南部坚守松潘，并派遣王均、于学忠、马家军、薛岳等参与围剿。因为国军在松潘固守，于是红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进攻洮河，创建甘南根据地。此外，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指挥；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在两河口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增补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张国焘此时主张解决战略政治问题，并坚持红军分左右两路军，于是中共召开

毛儿盖会议，会中徐向前、陈昌浩支持毛泽东北上东进路线。会上并确定：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彭德怀负责右路军北上，并率先进入若尔盖大草原，进攻包座；而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进攻阿坝后，过草地后即与右路军靠拢会合。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徐向前率领红三十军、红四军发动快速战攻下包座，击溃胡宗南部第49师大部，击伤师长伍诚仁，歼灭四千余人。

然而，左路军则迟迟不肯北上离开阿坝、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在红军主力进军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河水上涨，命令左路军按兵不动。9月8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率原红四方面军南下，张毛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徐向前与陈昌浩只能向中央汇报；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与徐向前联合致电左路军要求北上。9日，张国焘则致电继续坚持南下，这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亦犹豫南下事宜。当晚毛泽东亲自到徐住处，问徐意见。徐向前表示，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再分为两半。

9月10日，党中央决定独自北上，并于夜间带领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离开甘南，次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才知道消息。为了坚持红四方面军的完整性，徐向前率余部南下，再过草地，在党坝与左路军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任党主席，并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会上表示反对的刘伯承亦因此降职，主张团结的朱德与徐向前只能主张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随后红四方面军攻占崇化、抚边、懋功。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攻占宝兴、天全、芦山，击溃国军五千余人。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在百丈进行决战，之后国军攻占百丈。该战役后，国军死伤一万五千人，红军伤亡亦近万。此时，薛岳、李抱冰从南部、东面进行出击，红四方面军只能转为战略防御阶段。

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等人将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林彪的堂弟）从莫斯科抵达陕北，向张国焘发电通报消息。张国焘借机致电林育英，贬低陕北红一方面军，并寻求支持。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要求注意控制争论。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再次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林育英，继续抨击中共中央，但表示服从共产国际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回电，没有直接抨击张国焘，但表示共产国际要张国焘与中央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勒令张国焘立即取消第二中央，并在党内公布《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张国焘可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此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南下作战中损失惨重，被中央军、川军压缩在芦山、宝兴地区，粮弹匮乏，张国焘的威望开始动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纷纷要求北上到陕北。1月27日，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谋求党内统一。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发展，并表示此方针受到共产国际同意。南下红军部队决定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3月，红军攻下这些地区，并就地整编补给，以等候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此时，部队仅剩四万余人。6月6日，张国焘决定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并决定北上。

评注：1935年6月25日，两河口，大雨滂沱，饱经风霜、脸色枯槁的毛泽东在路旁的油布下等候着。下午五点左右，魁梧高大而且容光焕发的张国焘骑着白马，在十多个人的卫队簇拥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张国焘下马，毛泽东相迎，两人拥抱在一起，旁观的几千人欢呼起来。

1935年9月，张国焘南下，毛泽东北上，分道扬镳。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对缩小的部队进行整编，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张国焘有武力夺权的意图。有人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被毛泽东否决了。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资历很深，长征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在中央红军之上。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彭德怀用计，取代张国焘，控制红四方面军。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脱离共产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领导人戴笠“妥善运用”。虽然张国焘对中共进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但国民党还是留了他一命。

后来，张国焘随国民党军到了台湾，又移居香港，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一个养老院病逝，终年82岁。张国焘相信是基督拯救了他的灵魂。

中共红军长征到了川陕边界，已经是损兵折将、奄奄一息了。这时，又遭遇残酷的内部斗争，共产党人为了权力斗个死去活来。蒋中正的军队没有灭了红军，而他们内部差一点就把自己灭了。

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是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 darkest 的时刻。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红二十五军 1931 年 10 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 2984 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在信阳柳林和双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红二十五军领导层认为该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决定继续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向枣阳县城佯攻，形成进攻武汉态势，随后调头东进，进入驻马店西北山区。

11 月 26 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遭遇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阻截。经过激战，红军击退国军，进入伏牛山区。随后，红军继续西进，到达了陕西洛南县庾家河。12 月 10 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发起进攻，红军经过终日激战，将国军击退。在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

1935 年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 6 座县城。2 月 5 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歼灭国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3 月 10 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备第二旅五个多营。4 月 9 日，在葛牌镇歼灭陕军警三旅。7 月 2 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俘虏旅长唐嗣桐。同时，红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部队扩大到 3700 余人。

1935 年 7 月 15 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进甘肃东部策应中央红军。8 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开进甘肃境内，相继攻占两当县城、天水县城北关、秦安县城，切断西兰公路。由于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因战略纠纷滞留川西，徐海东、吴焕先决定放弃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计划，改为进军陕北。

8 月 17 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歼灭马家军 35 师 105 旅一部。8 月 21 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县城以西四坡村渡河，遭遇马家军 208 团攻击，红军歼灭 208 团。在作战中，吴焕先阵亡。随后，徐海东兼任红二十五军政委。

8 月 31 日，红二十五军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9 月 3 日进抵合水板桥镇。9 月 7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合水东北的豹子川，决定由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9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于陕西延川永坪镇会师，

成立红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评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控制的地方割据武装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的战略转移，其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长征经历25000里（12500千米）的说法，出自毛泽东，埃德加·斯诺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引用此说。根据红一方面军1936年的详细路线图，距离是18,088里。

中共红军到达陕北时，损失了大部分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分析“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中共红一方面军在其368天的战略转移与逃亡期间，每一两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且共有15天大决战。白天行军235天，夜间行军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红一方面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进攻占领了62座县城，红军阵亡的营以上干部有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武装击溃了中国国民政府正规军数百个团。此次战略转移，这些军队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寒的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共经过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5座连续的雪山。

中国共产党的此次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与逃亡，即“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长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重点宣传内容，并得到该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称，长征其实是他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国家团结了，才可以抗战。中国那个时候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个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记中就说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是军阀势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计”，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借剿共

以收复西南”，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红军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这是他的一计。而另一方面，蒋当时认为红军势力微弱，并不足以对其政权发生威胁，所以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战略计划》，决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并率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前进。8月5日，徐向前率领部队攻克漳县。

由于陕北根据地经济情况艰苦，该根据地无法容下三个方面军，于是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行动，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进攻胡宗南部。之后因为战术考虑，中央及西北局纷纷表示放弃该计划，而改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宗南部，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进军宁夏”。

9月23日，张国焘突然决心西渡黄河，占领兰州以北地区。2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西进的困难。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而此时西渡黄河也于红四方面军不利。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黄河，按照中央指示北进。此时，红一方面军也展开策应行动。10月2日，红十五军团攻占会宁。由于当时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签订密约，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行军中未有大型交战。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界石铺，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会宁，红四方面军长征结束。

8月下旬，红二方面军通过草地，进抵甘南哈达铺地区。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红二方面军从9月11日至20日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9月下旬，国军发起反攻，企图围歼红二方面军于陇南地区。10月4日，红二方面军经中央同意，放弃甘南地区，开始渡渭河向北转移。由于红四方面军单独北进，红二方面军侧翼暴露，在渡河时受到严重损失。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宣告结束。

在会宁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红军内部、联合国民党部分友军、逼蒋抗日及停止内战。此时蒋介石刚处理完两广事件，随后制定新的剿共计划，即命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筹备通渭会战。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以国军第1军、37军、3军分兵进攻。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同日，国军占领会宁。24日，红三十军强渡黄河，并击溃马家军防线。

30日，国军关麟征部进攻靖远，致使河东河西两岸红军被割断。11月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九、三十军加上第五军组成“西路军”，约2.18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

此时，河东部队即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则回师陕北。国军继续进攻，此时东北军王以哲部队前进比较迟缓，第三十七军仍在黄河以西，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因军长王钧病故而停止前进，唯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堡地区，这为红军创造了有利战机。11月21日，红军发起山城堡战役，将第一军七十八师大部歼灭。山城堡战役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一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第一次国共内战就此结束。

评说：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宣的是什么言呢？是共产主义乌托邦之谎言。宣传的是什么呢？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播的是什么种子？是反人类、反社会、反人性的暴力革命种子。长征所留下的，对当地未来之社会和道德，贻害无穷。

1935年9月21日，毛泽东的红军进入哈达铺，总部机关设在镇里的一座庄严佛寺里。信仰穆斯林的汉族妇女看到红军队伍中有女性感到十分惊奇——这些留短发、穿军装、腰带上别着手枪的活物真是女人吗？她们好奇地把女战士请到家中仔细端详，触摸她们的胸脯，还跟着她们上厕所，听她们讲战斗中的故事。

贺子珍在长征时并没有走在毛泽东的身边。夫妻在一起不符合规定，而这个规定被严格地执行。只有朱德23岁的妻子康克清是个例外。她是一个强健的农村妇女，还是个神枪手，身上总是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毛瑟枪。长征时红军主力部队只有30个妇女干部，还有零星的一些护士和卫生员。由于有孕在身，贺子珍一直待在修养连，只有周末或休整时才和毛泽东见面。

在长征途中（1935年2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贵州生了一个女儿，被一户苗族人家收养，被称为“毛妹”。婴儿一出生就被毛泽东夫妇弃掉，这是怎么样的一对夫妻啊！为了所谓的革命事业，其实是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和权力，这对父母就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儿女，毫无人性啊！他们对待自己的骨肉尚且如此，对待其他人的生命呢？

从1929年到1938年内十年间，毛泽东和贺子珍共孕育了十胎，生了六个孩子，只存活四个。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的性生活却如此旺盛。在长征途中，妇女是被禁止随军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中共红军高级

干部带上了自己的女人。三万多名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血气方刚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他们的性生活又如何解决呢？历史没有交代，只能留待读者去思考了。

万里长征，可能唯一值得歌颂是毛泽东和中共红军在艰难困苦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征诗作，不但充满了热情坚毅，更有万丈豪情和乐观主义的气魄，这是历史不应该抹杀的。如《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忆秦娥 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第十一章 中华民国之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民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新生活运动被认为是深受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产物。

评说：呜呼！中国人道德之失者久矣！所谓道者，人走之道路也；所谓德者，得失之得也。道路走偏了，就一无所得了。无所得，反有失。失去的是人的品格，人的精神，人的尊严。

又，道德者，人心也。道德之沦丧，皆因人心之沦丧。人心之失，失在不辨善恶，不明因果，不信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心之失，便没有了礼义廉耻，则可以随地大小便也。

如何挽救道德人心呢？自古圣人之道，致良知。凡人之本性，善恶之间，是非即分。人性本善，或并无善恶之分，若循自然之理。此是人之良知，良知者，知良心之所存也。此人皆有之，则人人可知礼义廉耻，进而改恶迁善。

何为恶？何为善？利人利己为善，害人害己为恶。知善恶者，损人利己或者损人更不利己之事绝对不作也。所谓知耻近乎勇。知耻，在勇于改错；承认自己有错，进而身体力行而改之，则善莫大焉。

人的一生，是要落叶归根的。叶子一生的意义，亦是归根而已。花儿亦然。古诗云，零落成泥转作尘，只有香如故。又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道德是人之根，有根则人类生生不息。

而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的根又在哪里呢？自尧舜禹，唐皇汉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胸怀还有吗？孔孟之道，诸子百家，礼之纲常还在吗？

《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先人所说，建设国家，管理公众事务，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事情。教学有两个方面，一个在教，一个在学，教者亦学。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和自学入手。

评注：蒋中正继承了孙中山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思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佩之

意，蒋介石曾说，“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

1927年2月，蒋中正在和共产党分裂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4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蒋中正称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在于三方面：“一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二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三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

蒋中正正是坚决反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破坏乡村的地主所有制的。1932年6月2日《蒋中正日记》云：“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蒋中正特别强调，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

蒋中正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声称：“我国近奉遗教，以全民主义立国，自不容有阶级之争。”“亟宜采用劳资协调政策，对于劳资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同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规定地价，调整土地分配，促进土地使用，活动土地金融，以增加农业之生产，而谋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等主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称“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中的病态”。会议提出：“务使社会利益，相互调和，平均发达，以驯至于共有、共治、共享之域，决不纵容阶级斗争之谬说，以招致社会之扰乱。”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是：“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统称“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改良主义实践，首先在浙江推行，后来虽然夭折了，但是抗战后再度提出来，对国民政府的农业农村政策有重要意义。

1939年6月，地政学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萧铮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要求在四川选择一个地区作为“地政实验区”，进行土地测量登记，耕地重划，促进土地利用，增加生产，调整佃租制度，创立自耕农，规定地价与举办地价税，树立土地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工作。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将“实施土地政策”列为四大要政之一。宣称“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由政府调整其分配，支配其使用”。

蒋中正希望通过教育来复兴中国的理念在北伐时期已经形成了。1932年4月11日，蒋中正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讲《复兴中国之道》说：“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

蒋中正在北伐统一国家之初，就重视国民教育问题，蒋曾于1930年12月9日兼任教育部部长。1931年1月19日，蒋中正给教育部谈《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讲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乃是邦国百年大计的基础”。但他引述戴季陶在他著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从前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蒋中正说，我们要晓得总理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共产党当时祇是宣传，头一次越飞还没有来，那个俄国共产党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士人，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孙先生头一句话答复他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在北伐时期，蒋中正已经开始思考三民主义建国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1928年10月10日在《中华民国十七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谈到四

个方面的内容来勉励国人：（一）发育国民强毅之体力，以挽救萎靡文弱之颓风；（二）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三）增进科学必需之常识，以辟除愚蠢锢蔽之迷信；（四）灌进世界最新之文化，以力求国家社会之进步。他勉励国人，“愿我同胞，一致身体力行，以奠定民国自强之基，发扬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荣之历史。”

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

在1932年5月9日，蒋中正在“五九纪念会”周谈《雪耻救国之道》，谈到当时国家的灾难：“我们的国耻，在中国一部被帝国主义侵略史中，以日本给与我们的国耻为最大！除五三，五九，五卅之外，在历史上还给日本割了台湾，占了琉球，灭了朝鲜；而且割地之外，于甲午庚子两役，还索取多额的赔款；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在我们内地，还设有多处的租界；从甲午以来，同胞们给日本人杀死的不知凡几，无形的经济和文化方面，中国生命财产直接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损害，更没有数量可以计算！这些国耻，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不是日本的国土比中国大呢？人口比我们多呢？或者他们民族的精神比我们优良呢？不是的。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过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蒋中正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总理和已经死了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

蒋中正希望有一个自由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他说，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仵仵倪倪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

雪耻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蒋中正说，就是要从我们本身做起，要从心做起。他说，日本人侵略我们，他们“拿了我们什么东西呢？”他们拿走了中国的精神，拿

走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日本自从所谓明治维新以来，无论海军军人，陆军军人，从他天皇起直到他的兵士，以及凡受过教育的国民，统统拿“致良知”三个字做他们的民族精神的哲学基础。而中国人呢？“而我们中国人，自己有这样好的宝贝，有这样好的武器，却完全视如粪土，弃之如遗。”

正因为蒋中正的民国政府一直强调和致力于中国传统之道德文化建设，所以中华民国为中华血脉之正统。而这些传统道德文化，是清朝末年逐步失去的，亦正是中共的马列主义者所要坚决抛弃而消灭的。

在开展新生活运动之前，蒋中正演讲的对象，常常是大中学生，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之所在。在演讲中，蒋中正曾对当时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做出这样的描述：

“比方说，江西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都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

“你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一切食物、食具零乱、污秽，而且吃的时候，有的将身体靠着墙壁或门板上吃，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站在门外。吃完以后，菜汤饭屑弄得狼藉满地，甚至使人不敢进身。……再讲普通一般中国人的穿衣，十个有九个是钮扣不扣齐的，帽子歪戴的。还有对于自己身体不仅不知洗澡，甚至连脸也不洗的。……再讲住房子，普通一般中国人，没有几个知道住房子是怎么住的，尤其是中国人住洋房，笑话更多。就是洒扫，也只知道扫除房子中间一块，至于屋角或门后，就不堪言状，堆满垃圾，布满尘土，甚至一年半载，没有人去过问，听他发臭、生微菌。试问如此住宅，安得不发生疾疫？还有一般人随便吐痰，到处解手。”

蒋中正指出中国人今日的腐败，懒惰，麻木，颓唐，自私自利，偷生怕死，不肯牺牲，不爱国家，不知廉耻，就是不能“致良知”。中国人完全讲表面，不讲实在，讲空话，不讲实行，所以一切没有精神，所以国家弄不好，我们要雪耻，要复仇，要救国，就要脚踏实地，从精神上，实际上，内容上做起。所以，我们需要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7日，蒋中正在南昌作《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说，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之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之总理纪念周，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之序幕。蒋中正指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如狂风扫荡社会的落后状况，并以柔风鼓吹社会的生活力与正当精神。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

次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定新生活运动推向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20余万市民中有10万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出席大会，蒋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演说。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

1934年5月15日，蒋中正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蒋仍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

1936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总会下增设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发展至全国，新生活运动组织仍在扩大。

评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还应不应该传承下去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现代人讨论的命题。

根据中国传说记载，盘古开辟天地时，人寿命是一万八千岁。经过三皇五帝时期，人的寿命就减少到一千岁了。据说天皇氏一身十三头，兄弟十三人；地皇氏一身十一头，兄弟十一人；人皇氏一身九头，兄弟九人，分别治理九州。有巢氏未有宫室，冬天居住在洞穴里，夏天居住在槽巢上，食树上的果实和鸟兽的肉。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熟食。太昊伏羲氏，蛇身人首，观日月星辰、天地阴阳，始画八卦，造文书契约，制定婚嫁制度，教人织网捕鱼。他的妹妹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缺。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开始教天下人播种五谷，又尝百草制药为人治病，开始市井贸易，为祭祀制作乐器。黄帝有熊氏，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端敏，成而聪明。

信为道元功德母。断了信，人类之文明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样的历史，还有几个人相信？还应该让子孙万代了解吗？

夏商周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人类文明的开始。孔子曾经谈到《夏时》的记载。上古礼的产生，是从饮食开始的，那时的人们尚未发明陶器，他们把谷物、小猪放在烧热的石头上焙烤，挖个小坑当酒杯，双手捧起来喝，用土捻成的鼓褪，垒个小土台子就当鼓，在他们看来，用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表达对于鬼神的敬意，好像也是可以的。这便有了最原始的祭礼。等到他们死的时候，其家属就上到屋顶向北方高喊：“唉，亲人某某你回来

吧！”招魂之后，就把生稻生米含在死者口中，到了送葬的时候，又用草叶包着熟食作为祭品送他上路。

上古之时，没有宫室一类的建筑，人们冬天住在土垒的洞穴里，夏天住在棍棒搭成的巢案里；那时候还不懂得熟食，生吃草木之实和鸟兽之肉，喝鸟兽的血，连肉带毛的生吞；那时候还不知道麻丝可以织布作衣，就披上鸟羽兽皮当衣服。后来有圣人出世，才懂得火的种种作用，于是用模型铸造金属器皿，和合泥土烧制砖瓦，用来建造台榭宫室门窗；又用火来焙、来烧、来煮、来烤，酿造甜酒和醋浆。又利用丝麻，织成布帛，用来供养活人，料理死者，用来祭祀鬼神和上帝。

祭祀是教化的根本，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祭祀不可以太频繁，过于繁琐人们就会厌恶，也不可以太稀松，过于松弛人们就会懈怠。天有四时，故有春祭、夏祭、秋祭和冬祭。人们祭祀山岳河川、日月星神、宗庙祖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祭祀使人有尊严地死去。因为有祭祀，所以有父慈子孝、慎终追远，有礼仪文化、歌舞铭文。合规的祭祀，得到天地赐福和鬼神的保佑。因为祭祀天地神灵，所以历法和黄道吉日，有宗教和斋戒，有麦加朝圣和开斋节，有圣诞节和复活节，有泼水节和元宵灯节。因为祭祀孔子，有庙会，祭祀屈原，有端午节。这就是社会生活。祭祀是人类道德文明的根；懈怠了祭祀，文明就走了下坡路。

道德沦丧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类一旦上了月宫，地球上再也没有哲学家了。没有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艺术和文化随之凋零，社会变得死气沉沉。祭祀的礼器早已撤除，人只作人的事，天也只作天的事。宗教将死，哲学自然也没有了活路。

天堂和地狱只隔着一扇门，魔鬼撒旦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据称，马克思在大学加入了撒旦教会，成为信徒。1837年11月10日他给他父亲回信中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宁静”。撒旦教认为：“没有神，人就是神”，主张有仇必报，而不是容忍。其教戒说：

“除非你被询问，否则不要发表意见或给予建议；除非你确定别人想听，否则不要对别人诉苦；不要抱怨与你无关的事；当走在公共的地方，不要打扰别人。如果某人打扰了你，要求他停止。如果他不停止，就毁灭他。”撒旦总喜欢穿上上帝的衣裳，直到最后一刻才把它脱下。

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因而万恶淫为首。东方人是这样，西方人亦是这样。神职人员性侵害儿童是宗教界最丑陋的行为。以美国最大教

区洛杉矶天主教区为例，2007年就有至少500多名遭神职人员性侵犯的受害人。这说明人类道德从根子上已经败坏了。人类还有救吗？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看看梵蒂冈教宗出访时的安全警卫车，虽然仍是四面透明的，但道已经远人，已经假设与上帝的子民为敌。这说明现代主流宗教是没有道德的。教宗怕死？这是宗教界最大的笑话！

十年前，我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第十个年头，我去过做礼拜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有五个。过去教堂是热闹的场所，有很多虔诚的信徒。到此时，大多数教堂空空荡荡，虔诚参拜的人越来越少，主耶稣的信仰遭遇危机。昆士兰州图文巴市的净宗学院，曾经是一座天主教堂，二十年前改建为佛教道场。十年前，澳洲ABC电视台Q&A节目举办了一场专题讨论“上帝还在吗”；会场上，悉尼地区主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我居住的圣乔治区镇，许多华人家庭，尽管家长逼迫利诱，儿女还是不愿意学习中文。不少华人女子与白人结婚，生下蓝眼睛、黑头发的混血儿女。临近不到两公里，是一个中东人集聚的坎特比利区镇。这一带的中小学校里，都是各种肤色的学生。二十年后，这一代人可能成为中东或欧洲人的女婿或媳妇，他们的世界又是另一种色彩了。

世事重道，人事重德，世事即人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与人生活在一起，就是社会。我如此语无伦次地把这个社会的逻辑打散了，你还认得这个社会吗？

我们人类的DNA因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影响我们人生的除了自身种族家庭、肤色、饮食习惯等，还有外来的教育文化、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是中国人的，明天变成法国人；父母是英国人，儿女是澳大利亚人；这一代是日本人，下一代成越南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母亲是埃及人，自己却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有一天，你可能也会问：我还是中国人吗？

春秋者，历史也，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或者说，历史乃中正之言，真实记录已经发生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和事件。除了中国之外，中东和欧洲各民族也重视记录历史，也讲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当权者肆意篡改历史，成其“一家之言”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想象远古时候人类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从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去体会：有什伯之器而用之；有舟舆乘之，有甲兵陈之；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重死而不远徙；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不是道家和佛家在中国文化里兜着底，那儒家的孔孟之流不知道要死过多少回了。“敢者死，不敢者生”。正因为有了中庸之道，再加上人是怕死的，东方文化和艺术，多在温柔乡里求生。真理在谁的手里呢？真理会越辩越明吗？

西方文化喜欢探索人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朱丽叶殉情之前，她抓起罗密欧的匕首，说道：“啊，好刀子！这就是你的鞘子；你插了进去，让我死了吧。”

东西方的历史都是从人类互相杀戮中走过来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发动战争者要慎重。希伯来《圣经》中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无须慎重考虑的。把复仇当作理念来宣扬不可取，或许此经文只是意图揭示人类斗争的真相而已。《礼记》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复仇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历史没有善恶，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历史人物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一国之民族英雄即是他国之侏子手。历史似乎在证明，没有当权者和资本家的疯狂，任何国家是无法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世界在所谓精英阶层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艰难，早已是灭亡之兆凸显，如果继任者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胸怀，不出三五十年，灾难很快降临。终结美国梦的奥巴马总统说：“当别人捉襟见肘的时候，全球的精英们用另一套游戏规则来生活，大肆敛财而不纳税，这样下去，大规模的混乱是可以想见的。”今日，我们还在生活在人的世界吗？

作家余杰在 2019 年《今生不做中国人》中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五鬼乱华”的情况，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归属于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这五类‘鬼’。这五种‘鬼’彼此伤害，又互相融合，已然弄不清楚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他们‘五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打造这座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动物农庄’”。我想作者的意思是，中共建政七十年后，中国社会已经人性丧失，人只有兽性，成了动物世界了。

《新生活运动纲要》的内容如下：

甲 新生活运动之主旨

新生活运动者，我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

我中华民族本为“重礼义”、“明廉耻”之民族，而“礼义廉耻”之于今日之建国，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

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我中华民国有三千五百万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住行之资源，本极丰富；时至今日，反多争盗窃乞之现象，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我中华民国有四万万之人民，其食衣住行之组织，本极巩固；时至今日，反呈乱邪昏懦之现状，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今欲以优美之艺术，易其粗野卑陋之习尚，以固有之品性，化其争盗窃乞之行为，固有待于“礼义廉耻”之复张；然在此乱邪昏懦状态之下，社会秩序纷乱，邪说横行，人多沈迷陷溺，莫知所从，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风，未易见效；振衣者，必挈其领，提纲者，必挈其纲，若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自纠正其乱邪昏懦，陷溺沈迷之风始，此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为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也。

乙 新生活运动之认识

一 何为“生活”

孙总理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民生虽分为四个方面，而生活实为其他三者之总表现；盖生存重保障，生计重发展，生命重繁衍，而凡为达成保障、发展、与繁衍之种种行为，便是生活。换言之，生活即是人生一切活动之总称。

二 何为“新”生活

为欲繁衍生命，保障生存，发展生计而表现之一切行为，因时代与环境之递嬗变迁，而呈现不同之形式，演化不同之方法；时不可留，环境亦随之而异，惟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始得畅遂其生。凡民族之生活，当其蕲求适合时代与环境时，必须补偏救弊，一变其旧有生活之趋向，此即谓之“新”的生活。

三 何为新生活“运动”

人民生活之满足，固有赖于政治之教养，和各种制度之尽善推行；但政治上各种制度之推行，与社会风俗习惯之关系，至为密切；每当旧制度崩溃，新制度代兴之时，苟不知提倡与其新制度相适应之风气，以为推行之助，则新制度每为之迂回颠蹶，未由展其效能，必须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后其政始得为之治也。水流湿，火就燥，社会运动之效用，正所以为之湿为之燥而已；故任何国家于革故鼎新之际，恒以“转移风气”为先，盖其力较政教为尤大，其用较政教为尤广，而其需要亦较政教为尤急也。此种“转移风气”之工作，即所谓新生活的“运动”，此运动之进行，端赖国民人人之自觉其需要，发乎己，应乎人，由近及远，由浅入深，

能修其身，所以立一家之风；能治其家，所以立一乡之风；与政教相辅而行，而常在政教之先，与政教相得益彰，然不赖政教之力而始著者也。

丙 新生活运动之目的

一 为何需要“新生活”

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洊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若长此不变，则虽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故欲繁衍我群众之生命，保障我社会之生存，发展我国民之生计，非将上述各种病态，扫除而廓清之，并易之以合理的新生活不为功。

二 为何需要“新生活运动”

欲建立人民现代之生活，造成一个新社会，自不能无需于政治，尤其是需要教育。但过去中国之教育，乃至一切政治，皆病于虚与伪，唯其虚与伪，故法令无效，技术无用，机械无能。官守相同，效率终异；技术相同，成就各殊；机械相同，功用不一。今欲求法令与技术之有效，其关键不在法令与技术之本身，而在使用法令技术之人；欲求机械有效，其关键亦不在机械之本身，而在运用机械者之精神如何？人之臧否，固关系乎政教，而社会习尚所予人之熏陶锻炼，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实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拟。关于政教制度诸问题，政府方从事于改造，自不必赘；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吾人若不愿束手待毙者，应不坐俟其自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

丁 新生活运动之内容

一 新生活运动之规律

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故“礼义廉耻”者，乃发民德以成民事，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规律；违反此规律者，无论其个人、国家、与民族，未有不为之败亡者。持怀疑论者，约有二端：

其一、谓“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美善的行为，但恐智识技能不若人，则德行虽美善，亦不足救国，此说殆未谙本末先后之义。人因求行为之完善，而后有智识技能之需要；否则，智识技能不过为济奸作恶之具。“礼义廉耻”者，乃为社会为团

体为国家惟一之规律，反乎“礼义廉耻”之行为，其智识技能适足以损人，结果亦不能有利于己，败群害国而已；故“礼义廉耻”不独可以救国，且所以立国。

其二、谓“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节文，冻馁不给，节文何用。推此说者之意向，乃由于管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廩实而后知礼节”二语之误解而来；殊不知“礼义廉耻”为人之本，未能为人，何有衣食？盖管子此言，仅示一方，综其治平之要，仍以四维为先。盖有“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廩不实，可以人力实之。无“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争之盗之仍不得足；仓廩不实。为窃为乞仍不得实；“礼义廉耻”之行为，乃纠正争盗窃乞之行为，所谓以正当方法求其足，求其实耳；故反乎“礼义廉耻”之行为者，衣食不足，仓廩不实，终不得实；即使已足已实，而以争盗窃乞行为施于人与人之间，衣食虽足亦不能用，仓廩虽实亦不能享矣！世界最富足之都市，往往盗匪亦最多，此其明证；而今日一般“汉奸”“奴才”“国贼”“共匪”与乎“贪官污吏”等等，察其作恶之由，岂皆为饥寒所驱使？只忘其固有“礼义廉耻”之本心耳。“礼义廉耻”之重要如此，故必须以“礼义廉耻”为生活之规律。

二 “礼义廉耻”之解释

“礼义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新义；吾人应用于今日待人、处事、接物、持躬之间，得为简要之解释如下：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

礼义廉耻之解释，既如上述，可知耻是行为之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

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

义无礼则犯，义无廉则滥，义无耻则妄，此犯、滥、妄，皆似义而非义者也。廉无礼则伪，廉无义则吝，廉无耻则污，此伪、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耻无礼则乱，耻无义则忿，耻无廉则丑，皆似有耻而无耻者也。是诚所谓“耻非所耻”，则耻荡然矣。如果其礼为非礼之礼，义为不义之义，廉为无廉之廉，则“礼义廉耻”适足以济其奸，犯伪乱者之私而已，可不辨乎！

三 食衣住行之解释

食衣住行之遂行条件有二：一为物质的资料，一为精神的表现。物质的资料即食物、衣服、房屋、道路、舟、车等是也；精神的表现，即饮食、服御、居住、行走等是也。

惟“行”之一字，有广狭二义：狭义之行，训为行走，广义之行，训为行动；故以广义言之，“食衣住行”之一切动作，无一不可纳诸“行”之范畴，而狭义之行，只为“行”之一端耳。

由此吾人可知，三民主义之“食衣住行”，仍注重物质资料之解决，而“行”之一字，系从一面的名辞之解释，观于建国大纲中“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一段可以知矣；至现在新生活运动中之“食衣住行”之“行”字，乃兼有广狭之义，吾之“行的哲学”意亦在此，观于前章新生活运动内容之所述，其大意可得而知也。

四 “礼义廉耻”与食衣住行之关系

食衣住行之遂行条件，由物质与行动两事而具备，已于前章详言之；“行”之为训，有广狭之义：广义之行，其于“礼义廉耻”之关系，亦见于“礼义廉耻”之解释一章，兹俱不赘；今所欲言者，为“礼义廉耻”如何直接表现于食衣住行之中。

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与方式之运用的三个方面，今试分别言之。

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廉者明也，应明其分，苟非其分，一介莫取；质言之，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若争夺依赖，固所不可，即施让赠与，亦所不屑。先儒所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即此意也。

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义者宜也，须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因位制宜。何谓因人制宜？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宜于饱暖舒闲，而少年仅以不饥不寒为足，宜于刻苦锻炼也；何谓因时制宜？四季寒暖不同，饮食起居宜随时调节，以与气候相适应也；何谓因地制宜？南北土壤气候不齐，近山滨水，生活习惯亦异，宜依地为良，以与环境相适应也；何谓因位制宜？或临万民以执法，

或帅三军以御敌，必有一定体制，始足以见威仪自藏所事，要在不卑不亢，毋泰毋嗇，因其地位之上下以制宜也。

方式之运用应合乎礼——礼者理也，（一）须合乎自然的定律，（二）须合乎社会的规律，（三）须合乎国家的纪律，其具体事项，列举于“新生活须知”，兹不具论。

“礼义廉耻”之互相连贯，前已言之；食衣住行之必合乎礼义廉耻，其间亦互相连贯，固无待言。无论其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方式之运用，皆有密切之关系；如三者有一失礼、亡义，与不廉之事，即成为生活污点，皆当引以为耻也。

戊 新生活运动之方法

一 运动之责任

全部运动，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之，各省市县如有发起同样运动者，乃可设会，但县会应受其省市会之指导，而免分歧。

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以省党部，民政厅（或社会局），教育厅（或教育局）公安局及军事机关各派高级人员一名，社会各公法团亦公派负责人员若干人共同组织之，以资划一。

乡村农人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各业公会负责人，学生由校长教职员，军队由政训处长与主管长官或军队党部负责人员，公务员由各该机关主管官，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负责提倡，仍须由当地促进会派人指导之。

二 运动之工作

分调查、设计、推行三项。

三 运动之费用

一切费用应极力节省，由发起人与主持之人或当地政府筹给，但不得向外募捐。

四 运动之事项

由南昌促进会决定分发，先从规矩与清洁两种运动开始进行。

五 运动之程式

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

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

由简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

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作起，再行其馀。

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馆、公园、会场……等作起，再求之于全体之社会。

六 运动之方式

先以教导，后以检阅——教导是以身教、口教，再以图画、文字、戏剧、电影为教；检阅是由促进会派人查考或由其本处每年分季比赛，评定甲乙以奖勉之。二、除原有隶属之关系（如长官之于部下，父兄之于子弟，教员之于学生等）外，不得干涉；一般普通朋友性质者，只可劝导而已。

七 运动之时间

一切运动，只可在公馀及休假等闲暇之时间行之，不可耽误本业。

己 结论

要之，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国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

一、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艺术者，非少数有产阶级之装饰，乃无男女老幼贫富阶级之分，实为我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所谓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之分野，即在于此；凡人欲尽其所以为人之道，舍此莫由，故必以艺术“持躬待人”者，始能尽互助之天职。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现今反为东西列强建国主要之艺术，殊不知此即我中华民族持躬待人，修齐治平最优美之固有的艺术，现在社会之所以猜忌、嫉妒、怨恨、倾轧者，皆遗忘此艺术陶养而生之病态也；必以艺术“治事接物”，始能收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而其要旨莫过于格物致知，明辨本末，器求创造，术尚精微，能如是则粗野错乱，简陋卑劣诸弊自除。

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之生活生产化。中国之贫，由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凡不生而食者，其食之所资，不出于劫夺，必出于倚赖，而皆由于不知“礼义廉耻”为之也。故必须使生活生产化，而后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昔者齐楚之所以霸，今者意德之所以强，胥赖是耳。故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其道莫要于此。

三、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之生活军事化。国不能战，无以为国，广土众民，徒资寇盗；救国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内乱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频仍，帝国主义者与汉奸赤匪，内外勾结，皆挟其全力，以压迫我民族，破坏我国家。吾人欲救此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亦非准备全国国民之军事化，不足以图存；而军事化之前提，即在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综合上述诸义。约而言之，国民生活如何始得高尚？曰生活艺术化；国民生活如何始得富足？曰生活生产化；国民生活如何始得巩固？曰生活军事化；三者实现，是谓生活合理化。合理化所赖以实现之规律，曰“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所赖以实现之事项，曰“食衣住行”；使我全体国民以“礼义廉耻”为规律，实现之于“食衣住行”

之中，则生活之内容充足，条件具备，是谓生活革命之完成，而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亦即奠定于此。

评说：中国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思想开放，学术清明，文化界之民主风气非常浓郁，社会各阶层人才辈出，中国知识界出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汉语言大师赵元任、思想家章太炎、国学大师吴宓、语言学家王力、作家钱钟书、国学大师钱穆和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等。

1925年3月陈寅恪自德国返回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以后，陈寅恪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留在中国。1953年中共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毛泽东不允许，他就没有上任。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中央秘书长朱家骅与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与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起被学者誉为“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在国学大师的选聘上，中华民国政府还是非常看重学者的传统道德文化基础和独立思想的。没有了传统道德和独立思想，中华文明就会窒息、枯萎而消亡。

中庸者如张之洞提“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或“旧为体，新为用”，是有识之见。很多现代“学者”批评传统中国文化是垃圾，五千年提倡的“道德”是绊脚石，像康有为批“道德”、立“制度”。然而，无论民主制度或独裁制度的背后，基础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抛弃了传统道德文化，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便没有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生活运动纲要》之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提倡礼义廉耻，这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修葺祖先坟墓的事，而相反，中共一直在刨祖先的坟墓。特别是中共之“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将民国历史弄得面目全非，也将国人之道德糟蹋得体无完肤了。中共篡政七十年后，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几乎全体国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地步了。

中共文化大革命之时，鄙人正在念小学。那时的教科书是怎样的呢？中共对国民党的宣传是怎么样呢？遍布农村大道小巷的宣传标语是什么

呢？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一百年，阶级斗争就进行了一百年。国民思想里中马列之毒太深，暴力斗争之毒太烈，乃至今日已无法救赎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是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

评注：没有传统道德的中共是怎么样的？这是毛泽东语录和讲话选摘。

“武斗好”——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打起来我就高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绿林大学毕业”——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没有就去抢”——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阶级斗争”——《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登报我就走”——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超过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学文科的最差”——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操娘”——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你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国民教育中，如何做好舆论之宣传引导是及其重要的。为了做好舆论宣传，1935年11月10日，蒋中正还向全体国民发布《手订新生活标语十七则》：

一、国家之基本，全在国民之道德。（总理遗教）

二、要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总理遗教）

三、大家要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总理遗教）

四、要恢复民族地位，必须用固有的道德做基础。（总理遗教）

五、恢复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之后，还要去学新时代的科学，才可以和外国讲平等。（总理遗教）

六、修身是立国之本。（总理遗教）

七、合群就是救国。（总理遗教）

八、我们要能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做起。（总理遗教）

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中国政治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总理遗教）

十、我们在民国之内，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总理遗教）

十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总理遗教）

十二、努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十三、“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

十四、“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建国唯一的要道。

（总理遗教）

十五、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目标：

（一）积极方面：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

（二）消极方面：甲、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在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如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的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等）

十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项：（一）振兴农业。（二）鼓励垦牧。（三）开发矿产。（四）提倡征工。（五）促进工业。（六）调节消费。（七）流畅货运。（八）调整金融。

十七、新生活运动我已实行了吗？

另外歌曲喜闻乐听，是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也作为民国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错》、《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蒋中正知道，要让全体国民提高思想道德，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必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推广新生活运动过程中，蒋中正和夫人宋美龄曾经与教育界人士一道，提倡素食斋饭。1935年11月18日，蒋中正提出《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提经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员十二守则：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评注：遭受无数灾难的中华民族太需要休养生息了。就像干枯了的长江黄河，枯水期的鄱阳湖和洞庭湖，只有当河床和湖底露出水面后，鱼虾都不见踪影，我们才知道国土山河有多么贫瘠。在我看来，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就是给予中华子孙休养生息的运动。

中共批评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是“假三民主义”。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发表讲话说：“只有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给老百姓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压迫老百姓，而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实行‘唤起民众’，才叫真正的信仰民权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努力于解放大多数人民生活的痛苦，譬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实行生产运动，使大家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才叫真正民生主义，才算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决不可作一个假信徒，决不可作一个坏学生，不要光是咀上讲三民主义，我们号召全国国民大家动手实行三民主义，大家都做真三民主义者，我希望全国国民大家实行打倒日本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大家实行帮助老百姓，唤起老百姓，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的民权主义；大家实行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的民生主义，现在全国要求实行的，是这样的三民主义，是真三民主义，我们要为真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

底！”当时全场鼓掌，高呼：“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反对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现在看来，真是一个大笑话。

在国民政府实施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中共在边区开始搞合作社和阶级革命，提倡另一种“斗争式”的新生活。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的一个讲话中谈革命式的“合作社”中强调：“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合作社方式。把公社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办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以后，封建束缚削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地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区的经济有其进步的方面与落后的方面，解放区的文化也有其进步的方面与落后的方面，解放区有作为领导方向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但也有广大的落后的封建遗产，如陕甘宁边区就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封建迷信的还在经过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影响着边区的群众，反对群众的脑子里的这个敌人甚至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困难，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那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困难的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介绍说：“陕甘宁边区现在婴儿死亡率高至百分之六十，成人死亡率高至千分之三，去年死牛七千八百头，死驴四千头，死羊二十一万只，死骡二千三百匹，人民相当普遍的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机关部队的西医是不可能的，为机关部队服务是很重要，西医此中医更科学，但西医如在这种情况下，不关心人民，不为边区人民训练更多的两医，不联合和帮助改造边区的一千个中医和旧式的兽医，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帮助边区人畜的死亡，所以新形式与旧形势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

在中共苏维埃共和国里或中央苏区内，是有明确的阶级划分的，所谓的富农和资产阶级没有选举权，此外还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的不平等。与共产党重视阶级划分不同，蒋中正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人人平等”之思想。他说，“人人皆可成圣贤，则人人有责，人人皆可以参加新生活运动。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

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所以，中国要走怎么样的路，要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早已经一目了然了。

中共的“新生活运动”消灭农村的富农，打击和抢掠中农和乡绅，将中国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摇动了，败坏道德伦理的日常，从此让地痞流氓来管理中国的农村，导致世风日下。

蒋中正说：“我国数千年来，以忠孝为立国之本，修身济世，视此为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合之者则举世钦崇，违之者则骨肉不齿，此实我祖先贤哲苦心发扬，蔚为风气，特以锤链民族，齐一意志，以为生存奋斗之责也。”

民国政府的新生活运动，贯彻于“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在基于当时国家还处于战时状态，所以离不开军事化。但其重点在于生活内容，在于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不在于斗争。蒋中正的想法是希望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以达致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对于蒋中正发动的这场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虽出现了不少赞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态度的言论。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也发表文章，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胡适赞扬蒋中正的人格说：“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同时指出蒋中正的群众运动、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胡适说：“《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了这九十六（五）样，也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样子。我们现在所以要提倡这些人样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里还有许多人不够这种人样子。九十六（五）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个人的本分。”

胡适认为，很多的道德规范，应该是家庭教育的责任，政府不应该去管。因为这些“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政府管得太多了，对社会反而不好。同时，他批评说，如果用“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能引起种种揣摸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能增加虚伪而已。”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评注之一：张学良小名为“双喜”，但从小体弱多病，自认为活不了，依照民间信仰，装作被和尚收养，用一个纸人写下名字，丢在庙中，当作替身出家，“双喜”这个名字就没了。因为父亲张作霖是大军阀，从小被唤作“少帅”，却十足是个浪荡公子。

张学良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什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着回家？’”后来，他还是当兵了。

“九一八事变”，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了，他临危受命，成了东北军的统帅。但是，他自小顽劣的脾气和从母亲那里遗传的刚烈性格还没有改变，一度还被鸦片毁了身体。

日本人杀了他的父亲，又抢走了东三省，他是国恨家仇聚集在心，一刻也不能忘怀的。五年来还被迫戴着“卖国贼”、“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里更不是滋味。

张学良报仇之情太切，故很容易就上了共产党的当。西安事变之前，张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1936年6月30日，张还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起初，由于父亲张作霖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但很快中共在苏联的指示下他以“特殊党员”的身份加入。

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历史罪人。胡适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往事不堪回首，张学良不想写回忆录。他说：“历史是别人来写，不是我自己来写。”

张学良在回忆录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

评注之二：杨虎城的父母是陕西蒲城农民，少孤贫，一生识字不多，亦不好学习，自小就在家乡的一个小饭馆当跑堂，后来混迹伯父领头的当地哥老会中。

1915年，28岁的杨虎城率众参加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洪宪称帝。1921年，杨虎城部编为陕西陆军独立混成团，杨任团长。

1922年，杨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陕西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之思想对杨帮助大，曾长期在杨部任职。

1924年，杨虎城经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国民军第二军师长李云龙继任陕西军务督办，杨虎城为帮办。

1927年5月，杨部配合武汉北伐军攻入洛阳，打败奉系张学良部下万福麟部。此后，杨之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河南商丘一带与直鲁联军作战。杨见政局大变，遂于是年秋率第十军退出战场，至皖北太和休整。杨于此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麾下，表明愿意脱离冯玉祥集团，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辖部队，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命率部返回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战后，新编第十四师西归升格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3个师12个旅，6万多人，被称为“西北军”。1930年11月，西北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绥署主任。

1933年6月1日杨虎城和中共红军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935年，蒋中正调张学良东北军剿共，西安出现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首三种势力并存局面。杨虎城掌握西安市军事控制权。是年秋，中共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10月20日，杨虎城赴三原指挥所部进攻陕北红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飞西安向张学良请示机宜。同年12月，中共右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策反工作。

由于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给予杨虎城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张学良曾对记者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1935年是世界政局变化的一年。日本军队在热河战役占领热河之后，又步步进逼，意图进一步进占冀东。之前的1932年至1934年德国希特勒政权崛起，造成共产国际所属最大的德国共产党支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十三次全会，依据库西宁的报告，通过“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提纲。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共产国际七大，会前共产国际正面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上所做的伟大贡献，会后提出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保卫苏联安全。

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做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国民党的策略方针应相应变化，但“大会强烈地反对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包括在‘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之中，明确认为中共‘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明确认为只有苏维埃才‘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会议前，8月1日，王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内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1934年至1935年，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红军一直持“抗日反蒋”的口号，将所谓的“蒋贼”与“日寇”同时视为敌人。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宣言已经开始提倡联合国内一切力量，放弃内部争斗，联合抗日。这两者之间显然有冲突。

这份宣言的发表之处远离中国。为了将其内容在中国国内传播，林育英将整份宣言背下来后，化名“张浩”，于七月底绕行中亚，穿越戈壁沙漠后来中国陕西的瓦窑堡。全程历时三个月半，到达时已经是11月中旬。

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到达陕北，在瓦窑堡见到了张闻天等人，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几点指示及《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周恩来、毛泽东结束直罗镇战役后分别于12月8日、13日返回瓦窑堡听取了张浩的汇报。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与《八一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再次确立了成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同时将“抗日”、“反蒋”绑定一体。仍然称蒋介石这“卖国贼头子”，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1935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到西北后，张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余人。

1935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张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郿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余人，被俘1,800余人。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延安）。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1月21日晚，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

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

1936年3月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张之联络工作应分进行；3月4日，毛、彭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政府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中共中央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学良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覆命。

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

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

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会后，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

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1936年3月，张学良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周问张：“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此前，张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

1936年7月2日，中共领导人洛甫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余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是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得悉张学良提出加入共产党要求后，迅即讨论并决定拟许其入党。

1936年8月，从莫斯科返国之潘汉年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8月9日，毛泽东、周等联名致信张“同志”，详述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以兰州为中心发动西北大举之计划。张派部下中共秘密党员栗又文去新疆，争取苏联援助。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綫。”

此时，在共产国际指令下，中国共产党已决定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拥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建立西北抗日联军之计划，但仍寄厚望于张，请他说服蒋联共抗日。张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欣然答应“要想尽一办法”劝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纵使“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中共党中央派叶剑英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军、西北军中之中共秘密组织。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蒋游览秦始皇陵和华山后，要在3个月之内将陕北红军全部消灭。蒋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内战。张学良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全军主张；杨虎城只是委婉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

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陆续来到西安。蒋与中央军政大员密议剿共计划，部署第六次大围剿。蒋已改变用人计划，没有把剿匪重任交给张学良，而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四省边区总指挥。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决以“至诚”感动蒋，劝蒋当全国的“民族英雄”，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蒋斥责张年轻无知，受共产党欺骗和麻痹。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在张学良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

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张杨商定以捉蒋方式强逼蒋联共抗日。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警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张学良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行动，前去劝阻。当晚，张去华清池向蒋转达学生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拒绝和斥责。

张、杨从共产党处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紧急密商，决定12月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张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密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

12月10日，张、杨商定行动计划。蒋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杨参加之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进驻到咸阳。11日，蒋又召

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杨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12月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之命令。蒋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几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直到晚上10时才宣布招待宴会结束。

12月11日晚，张和杨下令行动。张、杨分别向他们之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兵谏计划并作动员。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住在张公馆里，令木匠出身涂胜华做一部一百瓦电台于这天做好。12月12日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凌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出几个十万火急电报到保安军委机要科收到，说张、杨在西安逮捕蒋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机要科长叶子龙立即将来电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凌晨2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瓚，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凌晨2时，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一起直奔华清池。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蒋，蒋守卫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双方激战。蒋慌乱中，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蒋没来得及穿鞋，为分散敌兵注意，蒋孝镇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蒋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树林。蒋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蒋踏着侍卫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伤。蒋忍痛向后面骊山逃跑，摸索前进。蒋躲藏进一个洼坑里。晨四时，张之东北军从临潼之骊山山洞里捉到蒋，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天色渐明，东北军走到大石头旁，发现蒋蜷伏在洞里，蒋被发现活捉。

事变中，共约800至1,000人遇害，包括中央委员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凤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

晨五时，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覆；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2日上午，张、杨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阐明扣蒋之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理解、同情和支持。

在西安绥靖公署杨总部新城大楼，蒋介石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坚拒与张谈判国事，以行政院长应住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拒绝迁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称张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此。

12月13日，张由清晨6时便来探蒋，前后四次，均未能尽言；张曾命孙铭九强使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亦因为蒋所拒而未果。下午5时，张召集总部全体职员讲话，表示一个月来，因为不愿剿匪，而又不能枪口对外，内心难过；继说他与蒋在政治主张上有意见冲突，他认为既不能辞职他去，又不能苦谏成功，只好最后采取兵谏。

12月12日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最早得知西安事变。下午3时，何应钦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杨之舆论；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之意见。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战派还是占上风。一时南京内外，蒋死活之各种传闻不脛而走。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事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

24时，由丁惟汾主持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之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之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有四五十人参加。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宣传“张学良犯上作乱”，“蒋介石生命危殆”等；另一方面封锁西安消息。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

12月12日上午，何应钦得知西安事变，及时电告在上海之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在上海之宋美龄。张学良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和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之目的，只要蒋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张给宋美龄电报中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等反对何之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救蒋。宋美龄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

宋美龄在上海找到威廉·亨瑞·端纳；他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宋美龄就请端纳飞西安了解情况，张表示欢迎。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之了解，相信张不会杀蒋；他欣然接受宋美龄之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

12月15日，端纳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端纳见到蒋。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

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书信完成后，蒋为黄仁霖再三朗读，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即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宋美龄。

1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为“讨逆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又决定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12月17日上午，蒋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停止军事行动3天。张、杨非常焦急。

12月19日下午，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伦、王宠惠等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下午2时，宋子文飞离南京，前往西安。

12月20日上午10时，宋子文等飞到西安。宋子文在张学良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宋子文将宋美龄之信面交蒋，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12月21日，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祥熙汇报。

12月22日，宋美龄毅然离开南京，飞赴西安。宋子文、端纳与之同行。为了蒋之安全，宋美龄严令驻洛阳之国军，在未接到蒋之命令时，空军不得飞往西安，陆军停止进攻西安。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蒋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

宋美龄会见张学良，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

12月23日和12月24日，宋美龄两次会见周恩来。第一次长谈，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但蒋始终置之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之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12月24日，宋美龄加入继续谈判。周要求和蒋见面，晚上两宋引导周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宋子文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

蒋最后接受联共抗日。蒋作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宋子文要求让蒋、宋美龄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张表示同意，并愿意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12月25日就走和由张亲自送去。

下午 2 时，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召集谈话：“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12 月 25 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张决心送蒋回南京，下午 4 时由张陪同蒋飞离西安。下午，张约杨来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杨尊重张的意见，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 3 时半，张拉杨陪着蒋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因为怕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也没有通知。

12 月 26 日下午，蒋座机到南京机场，中国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飞机降落，张遂即失去自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 20 万南京市民迎接蒋。张抵达南京，表示愿受国法之制裁。张表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很宽厚，飞机到洛阳，委员长叫我不要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蒋回到南京时，市民欢声雷动，在街头互相传达这一消息，甚至鞭炮声也响个不停。

12 月 13 日，日本报纸率先披露蒋遭监禁的讯息。日本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之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支持何应钦进军西安。12 月 17 日，日本首相、外相、海相举行会议，认为对西安事变有必要采取“注视等待的态度”。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汉口。日本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

12 月 14 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社论，称张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之团结，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

12 月 14 日，美国代理国务穆尔对西安事变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对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12 月 17 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

12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之刘少奇，提出中国共产党“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12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下午 4 时，中共中央在保安红军大学附近草坪上召开 300 余人活动份子会议，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作出报告，强调：

“西安事变是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现；他重申必须把蒋介石押解至保安，交由全民公审，以偿还十年血债。”中国共产党原执意杀蒋，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

12月25日，张陪同蒋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报告，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到飞机场去；孙连忙报告周，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腾空而起。

评注：《蒋介石日记》记录西安事变全过程

1936年12月12日

雪耻。成仁取义。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12日上午5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紧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即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为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锁，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余。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3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娘庙时，已有余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陡，东面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余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了然。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9时许。自此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见。忽闻离余穴二十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

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裡有一个是着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来”。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曰“余即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的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

声言委员长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学良）之卫队第二营 X 共产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1936 年 12 月 13 日

雪耻。住新城。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张（学良）连来见余四次，见其暗泣二次，余不知其所以然。

是夜 12 时半，孙营长逼余迁住，余坚不允。

1936 年 12 月 14 日

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虎城）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僞泣也。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

1936 年 12 月 15 日

雪耻。住同前。以至暂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子勉之。

十四夕移住张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并提出八条件，并言此事与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听决。又言余太旧太右。余问其何为右？则彼答非所问。张学良以通信社电告余，以日本第三舰队集中，及华阴方面中央军前进之消息。见其状似甚悔悟，有欲求陕事速了之意。但未知其用意果何在也。张又云“如果为此亡国，余只有二路，一则自杀，一则上山为匪”。

1936 年 12 月 16 日

雪耻。住同前。人生何为？惟留正气在人间耳。

15 日，余甚盼黄仁霖来见，携余信寄妻也。以黄昨与端纳同来，亦余妻使其来见也。张恐黄见余时将知真情，乃令黄候于机场，而将余信欲派人转送机场，言黄如再来时已不及也。余对张又贱视，不与之言，亦不写信。其后端纳出而为张言，如此太不对。然后张乃约黄来见余。事前张谓余曰“汝见黄时不必多言，只言身体甚好，以慰夫人足矣”。余不之答。

见黄时，余乃写妻信。大意爲一兄决爲国牺牲，望勿爲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爲余妻之丈夫，亦不愧爲总理之信徒。余既爲革命而生，自当爲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爲余之子，亦即爲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写毕，余爲黄朗诵者二，恐张扣此函，而使黄回京见妻时，能以此意口头报余妻也。

黄出，张果将此函劫持不发，并令黄亦留陕，不准回京报告。以张本欲求余妻来陕调解，而余函尾有‘妻切勿来陕’之句，则于其诡计不售也。然尔不敢获罪余妻，乃私属端纳飞回洛阳发电报于余妻以慰之。盖张唯一希望，爲余妻在京能阻止中央军攻陕。

1936年12月17日

雪耻。住同前。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

是日鲍文越来见，并言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余以爲此同行者必黄也。其实鲍之来见，乃张所指使，欺余以爲黄已回洛而已。是晚张来见曰“此次事，爲虎城实早欲发动，已催促再三，余始终未允，惟十日受你痛斥，刺激太深，故始允纳，然后悔莫及”。

16日下午，端纳回来。是晚张托蒋百里先生来见余，托余致函中央，勿即攻陕，不久当可出来。余答曰“如有一期限送余回京，则余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张来爲余言，前方已衝突，中央军在华县城与杨军接触，如仍向前攻，则此间军队只有退却云。余知其退却一语，乃借此恫吓余，将挟余他往之意。余置之不答。相信若彼言欲四日至七日，则此爲缓兵之计，中央必不信也。

1936年12月18日

雪耻。临难毋过苟免，庶不愧爲炎黄之子孙。

以张今晨来见余时，行色仓皇曰“昨言我已将委员会说服，本定四至七日可以送你出去，不料中央军在渭南华县突然进攻，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余闻其四至七日之期，乃知此爲逆辈欲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俄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爲，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爲人也。

17日上午，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言曰“张意即照委员长三日内回京之意致函中央，并令停止进攻，请派蒋铭三携信回洛”。余乃允之。致函敬之，属其暂停三日，至星期六爲限。下午，张又来见余曰“不管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馀事再议，故刻已送铭三上机场飞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甚急，

而一方则知张“馀事再议”一语，是其爲欲图赖三日之约之馀地。固知张爲急则求援，缓则罔信之徒也。

18日晚，张来言，今接电称，子文-墨三（顾祝同）皆将来西安。又言墨三电称，如张与虎城二人中之一人能约地相见，则墨三当可出面调解。张又言，我已複顾电，称委座望你来西安甚切云。余乃始安心墨三之不来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张对中央将领一网打尽之计更售矣。张又云，铭三到京，尚无来电云。是日铭三到京，正决定中央对西安剿抚之议。余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1936年12月19日

雪耻。住同昨。

昨日以前，上身骨髓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大痛，几不能起坐也。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複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看《墨子》完。

19日，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之约言爲诈也。是晚，张又来见，言子文-墨三未有来陕之确讯。惟铭三来电则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云。彼又言“前所要求各件，最好能实行几条，以便速了此事”。余曰“此八条件，如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行”。彼曰“现在只须四条，无须八条”。余曰“所删者何四条”？彼曰“后四条皆可不谈，所谓后四条者，即一：建立人民阵綫，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是也”。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爲之助也。

是夜，张又以警告方式言余曰“现在中央政府皆爲亲日派、贪污者所包围，你虽有御侮五分之决心，但易爲群肖六分亲日之势力所打消”。余问其所谓贪污与亲日者之证据何在？彼曰“如要证据，则现无犯罪之人矣”。彼乃指杨畅卿而言曰“夏斗寅之妻明告其妻曰，杨受其十万圆贿赂”。余乃斥之曰“杨要受贿，在余左右虽数百万圆亦不难得，何贪此少数，而且何能受彼之贿，此虽至愚者亦能辨其真僞/而竟信之。试问证据何在，且杨爲余所用之人员，皆应由余个人负责，随时可以杀，余只要你有切实指证其事实可也”。彼又无言而退。

1936年12月20日

雪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本日上午，时闻飞机声。余以爲停战期满，前方已经开战，故空军对西安不时来侦察敌情也。谁知子文不一时与端纳及张来见，余不知泪自何

来，子文即出妻函交余，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不觉呜咽，不忍出言者再。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次乃询问彼此情状。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相谈约半小时，余催其速出，盖恐久谈为张所疑也。余并将以应即速进兵之意见属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

晚傍，子文又来见余，约谈半小时。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公，而不可为私。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是晚，张来言曰“趁子文在此之际，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余曰“余不回京，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1936年12月21日

雪耻。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上午11时许，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门，余目犹迷雾，不辨其为子文也。少顷清醒，始识其真为子文，告余曰“余即欲回去，后日或将再来”。余甚骇其回去之速。以彼昨告余，约住三日再回京也。余拟欲与之私言数语，彼乃近余曰“门外有人窃视偷听，已不便言，惟京中军事计划与兄相同也”。余曰“照余之计，五日内可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虑”。彼不愿与余多言。余知其意，乃托二语曰“尔切不再来”。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兵。“其次，切属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彼乃强应之。又曰“我约后日回来”。余以手势示之切勿再言。彼曰“不要紧，彼等对余尚好也”。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舍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

晚间，张来言，称彼须离此一二日。余问何往？彼曰“前方已开战，且杀伤甚多，故推彼往前方指挥”。观其语意，似想探余对其所言者是否惊恐也。余泰然处之，彼乃拜去。

1936年12月22日

雪耻。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今日唯静盼飞机与炮声能早入余耳鼓。昨夜张之状态，叛军必于惨败，中央军进展必速也。不料待至傍晚，仍无所闻。而贤妻忽于下午4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是日爲冬至，清晨早祷告完毕，翻阅圣经，恰至“耶和華要”一节，其文句爲“耶和華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妻先告余外间各方情况，并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余曰“妻来此，须知爲公而非爲私，爲国家安全而非爲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也”。妻曰“余决不使夫君签字或违法事，夫可安心，但余来，夫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矣”。

1936年12月23日

雪耻。属子文准见周某。

清晨未起，趁监视者不能窥视时，余乃窃爲妻私语曰“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该党代表周恩来前托张要求见余，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待方针”。后子文即约彼相见，与张、杨同座会议。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以彼无甚难题，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虽不谈话亦可。余固知其有此要求，幸事前明告子文，如其有此要求时，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似不便见，蒋夫人可以代见也。约定明日10时来见余妻也。是日，妻谓余曰“吾夫不如总理之得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爲之赴难，今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余曰“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

1936年12月24日

雪耻。本夜周某来见。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爲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爲将来谅解之地也。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并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并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并声称“共党之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必对周反面”云。此张自言对周痛斥之言也。未知其后经过如何。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10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事后闻是夜杨虎城甚反对余回京，几乎与汉卿决裂，不知其果何如耶。

1936年12月25日

雪耻。本日4时由西安飞回洛阳，5时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

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故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昌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座仍

留陕缓行，然后委座化装秘密出城，先到其部队，然后再设法起飞。云：余妻既往访张，曰“如委座不离此，则余亦必不离此，余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

10 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尔等不为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

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

约至下午 2 时半，子文来言，请先准备，约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已不反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约半小时。训毕，问张、杨之意如何？有否他言？二人诺诺而退。余乃整衣而行，登飞机，余再三辞张，不欲其同行入京。彼主动强求同行。余无法阻止，乃准其同飞。到洛已 5 时 20 分矣。晚，宿洛阳分校，接见各高级将领后休息。

1936 年 12 月 26 日

雪耻。本日上午九时三刻，由洛阳起飞，12 时 20 分，与妻同到南京。晚，召集中央各要人报告陕变经过大略。

1936 年 12 月 27 日

雪耻。本日医病，下午会客。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之。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

是日腿部痛苦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张群）外交情形。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1936 年 12 月 28 日

雪耻。本日会客，徵求各方意见。本日会见各部长，徵求对汉卿如何处理之意。中央谈话会，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

于其友人，必欲任其回去，并深信张以后必能服从到底也。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也。余仍以好言慰之。

1936年12月29日

雪耻。本日约张来谈。本日病痛未减。为处置汉卿问题，想求公私两全之法未得也。乃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并缓撤西北以备叛军抗命也。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其所欲为，且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唯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1936年12月30日

雪耻。以静制动，持志养气。

预定：1，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2，特赦令暂缓发表；3，令速占宝鸡；4，朱逸民为皖主席；5，王德浦-罗贡华或吴次威为民厅；6，杨虎城免职或留任，孙蔚如为陕主席；7，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顾墨三为西安行营主任；8，逸民为XXXX；9，发告西北将士书。

注意：1，对XXXX俄态度；2，对共方针；3，对力行社方针；4，对新组织之干部。

上午，会客。往访XX。对中央再呈辞职，准假二月。下午，妻赴沪治病，以在京刺激太深，此次操急，实非常人所能担负也。

对张处置办法决定方针也。

1937年1月1日，蒋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处理陕甘军政善后问题。同日，西安各界10余万人举行庆祝大会，杨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连日来，周和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同杨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领衔于1月5日发出电报，抗议蒋扣留张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

评注：1937年1月，蒋在溪口撰写《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

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变前，蒋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本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

1月4日，蒋中正在溪口《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称：“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失去自由，过着被幽禁之生活。

2月18日蒋中正于南京市《报告西安事变始末》，报告张学良等提出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958年11月23日，蒋与张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虎城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633。后来杨回国，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离开中国大陆前夕，杨被杀害于重庆。

日本历史学者松本一男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祸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第十三章 日军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6年6月至9月，广东的粤系陈济棠和广西的新桂系以抗日运动为名发动“两广事变”，挑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政府。

1935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在驱逐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江西一带势力后，也同时削弱当地军事将领控制力，蒋介石控制地盘从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湖北进一步南下扩张到湖南、福建，一路追剿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更深入西南各省。在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华南与西南一带还有政经能力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者，也只剩下广东陈济棠和广西白崇禧的实力派。

军事上，虽然后来两广均是以反日为宣传主轴，但是与日本关系十分复杂。自1932年初起，日本军部即不断派代表赴广州与陈济棠接洽。1934年3月22日、1935年2月13日，日本第三舰队两次访粤，陈济棠曾分别与其司令今村信次郎中将、百武源吉中将会谈。1935年3月2—5日，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达香港、广州、桂林，分访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粤桂要员。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将又在广州访问陈济棠，向粤方赠送枪枝约1000支、子弹20万发及数门山炮。日本军方与粤桂要员接触目的，是希望策动两广联日反蒋。

新桂系在中原大战后，曾购买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广西空军中也配备不少日制战机，在1930年代中日矛盾逐渐扩大时，这种作法便显得相当尴尬。但新桂系白崇禧则称“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击退红军主力后，新桂系于1935年冬派代表赴西安、天津与中共建立联系，李、白两人更公开提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中共于1936年5月31日发表《我党在两广的任务》一文，鼓励民众拥护李宗仁的抗日主张。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1935年8月，日本惧蒋整顿西南，“大施威胁，纵令特务机关，到处滋扰”。蒋介石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5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因患脑溢血突然去世。次日，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条件已成熟，要求陈济棠协助国民党中央出兵广西。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吊唁团后有集会商议，中央在当时的传话可能仍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不愿坐以待毙的两广实力派军人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陈济棠于5月19日与白崇禧会于广州，两日决定借“抗日”为名公开反蒋。

6月1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西南两机关”联席会议，组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称兵入湖南。6月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之冬电，并通电全国督促中枢领导抗日。

两广部队在发兵湖南后，蒋介石忙将中央军两个军由湖北调入湘南，并蒋命令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遣兵备便，制止两广部队攻入衡阳或进攻贵州。

6月18日，国民革命军入驻衡阳，与粤桂联军对峙于郴州、祁阳一线，由于中央军控制住主要交通重镇，两广部队无法从湖南继续北上，停止进军。

7月1日，陈济棠正式就任西南两机关所任命之“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并接受印信。随即发布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之命令。第一集团军好些将领都不愿参加陈济棠以抗日为名反蒋之错误行动，密谋摆脱之计。

在7月份一开始，粤系部队便快速的土崩瓦解。南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利用情报组织牵线收买两广部队的将领，第一个倒戈的是以12万港币的代价买通的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并由他为中介向广东飞行员传达1架飞机2万法币的价格拉拢投诚。6月30日，粤空军飞行员黄志刚率7架战机叛粤投蒋。7月18日，以40万港币的代价买通的粤空军司令官黄光锐亲自带领74架军机及后勤人员经韶关飞往南昌宣告投诚南京。在蒋介石的收买之下，原本陆空实力雄厚的粤军仅半个月便分崩离析，陈济棠此时空军战力以尽数瓦解，陆军战力亦近半拥蒋。

陈济棠已经心灰意冷，决心下野，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

6月中旬，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科长云广英谈话：“两广事件”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李克农向云广英交代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广西当局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云广英从西安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中共北方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接头，得知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出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乱，王世英对云广英说，你化名“林秀先”，从香港转道去南宁找李宗仁，不必到广东了。中共北方联络局通知了李宗仁在天

津的代表，再通过其秘密电台告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6月下旬，林秀先乘西江客轮抵达南宁，在民生路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见到了李宗仁，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全面抗日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李宗仁安排由桂系政治部主任王公度与林秀先联络。

陈济棠倒台，蒋介石立即威逼新桂系，顾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逼，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新桂系形势危急。

7月底，出于对反日情绪和对新桂系的同情，中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虽然新桂系仍在加强备战，但广西空军也如同广东空军开始逐渐倒戈。8月15日，广西空军第三队副队长邓梓湘带领3架飞机飞往广东投靠南京政府；8月16日，广西空军司令兼航空学校副校长林伟成与广西空军飞行队队长甯明阶同乘1架飞机飞往广东投靠南京政府。

9月2日，蒋方代表抵达南宁与李、白正式谈判。9月中旬，李宗仁亲赴广州，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服从，新桂系与蒋之矛盾暂时得以解决。

自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而国共双方希望建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亦进一步巩固，同时粤、桂双方和日本之间本来暧昧的关系亦因为被中央收编而断绝。

评注：陈济棠是广东客家人。1926-1936年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颇有建树，有“南天王”之称。

1890年，陈济棠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县。自六岁起，陈济棠便入读村塾，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1907年，17岁的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投身清朝新军。六一六事变陈孙决裂后，他站在孙文的国军一边，攻击陈炯明。

蒋桂战争时，陈济棠表示支持蒋介石，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新桂系对广东的主宰，成为执掌广东军权的人物。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对广东发展有建树，制订《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描绘了广东1932至1935年的发展大纲。先后兴建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学校等。广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海珠桥、中山纪念堂、

中山大学、爱群大厦等等，以及 30 多条马路，皆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兴建，被称为广州的黄金时代。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繁华大都市，人口达 112 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陈济棠允许在广东公开设立烟馆。地方势力势力承办地方防务税捐，走私贩毒。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赌风之盛，殊为惊人。当时，赌博的种类很多，最普遍的有麻雀、番摊、牌九、山铺票、铺票、花会、骰宝等等；不但在城市中盛行，在乡村里也非常流行。陈济棠统治时代，嫖妓风气，极其广泛。政府当局设有“花捐”，以人为货，把卖淫通过“花捐”之征收而承认其“合法地位”。

1935 年至 1938 年存在于中华民国河北省东北部的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大日本帝国实际控制。该政权成立于日本鼓动华北五省自治期间，并由殷汝耕担任政府首脑，初期主要成立目的是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后期转为日本掠夺当地资源及摧毁华北地区经济的工具。其统治激起当地百姓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各种反日活动。

1933 年 5 月末，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的对华侵略重点开始转移到华北地区，其侵华政策也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武力解决，向非武力的“华北自治”转变。

1935 年 5 月，日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代表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通过策动宋哲元等华北实力人物“自治”，试图实现“华北分治”。

殷汝耕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娶了一个日本宪兵军官的妹妹为妻。返回中国后，在中日交涉中，他先后参加过上海“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谈判、济南事变谈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谈判，还参加过这些协定的善后处理工作。日本方面注意到殷汝耕相对其他中方人员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其在谈判当中的软弱表现。此后，殷汝耕成为日方的重点争取对象。

1935 年 11 月，殷汝耕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并且将通县、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滦县、乐亭、丰润等二十二县纳入其辖下，因此被国民政府通缉。殷汝耕的行动得到日本关东军和间谍机关的全力

支持。12月25日，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其成为满洲国之后的又一日本控制之下的傀儡政权。

1935年12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方面的行动做出反应，指派宋哲元及王揖唐等人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6日，中方将该会设置方案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交换意见。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分别予以批准。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没有公开挂出“自治”的招牌，但已把冀察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外，成为变相的“自治”。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南京国民政府华北当局请愿。1937年1月25日，殷汝耕在冀东广播电台发表讲演，以《冀东的防共使命》为题，鼓吹要联合德、意、日进行反共。

1936年1月11日，冀东政府保安队侵入塘沽，占领新河、军粮城等产盐区，并向长芦盐运稽核所索款每月60万元。1936年，冀东政府为日本低价强购长芦盐7万吨，翌年4月又强购10万吨，运往日本。据天津、秦皇岛两海关调查，仅在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的一年零两个月间，经由冀东偷运到天津的日货，计有人造丝540多万吨，卷烟纸50多万吨，砂糖8700多万吨，杂货23万多担。

为了达到分离华北的目的，日方1936年开始向华北增兵。1936年上半年，日本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4月，华北日军开始演习。5月，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在北宁铁路沿线派驻重兵。自5月起，日本不断扩充华北驻屯军。9月，强占丰台。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青岛登陆，占领中国国民党市党部以武力搜索，还赴各日营纱厂殴捕罢工工人。12月28日，关东军声称，倘中国政府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将采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之要求，仍无结果。2月1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等地驻军；3月24日，日舰70艘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蒋介石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中国活动。

4月1日，日军在上海演习。4月25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开始在北平、天津郊区及通县附近演习。5月22日，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巡查青山清偕四戈迁入汕头永平路神州行居住，拒报户口，并殴伤中国警察，遭中方拘捕，日舰开赴汕头威吓，称“汕头事件”。

6月日本集中其河边旅团于北平近郊，驻军根据《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进行军事演习。6月21日，华北日军驻屯军司令部成立临时作战课，以准备侵华战争。6月25日，日军在芦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开始在芦沟桥一带连日举行夜间演习。丰台的驻屯军第1团第3营在芦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及挑衅活动日趋频繁。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南满铁路总裁、华北屯驻军司令官在大连会议，侵华形势，日趋积极。

评注：自明治维新起，军事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导者（无论是在军事、政治或商业范畴）都是前武士或武士后裔，他们共享一套价值观与世界观。明治初期，日本视西方帝国主义为威胁，而富国强兵政策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加强日本的经济和工业基础，以便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卫日本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

德国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陆军大学和日本参谋本部密切关注了普鲁士军官雅各布·梅克尔少校的观点，该观点指出普鲁士的军事模式优于法国的体系。梅克尔认为这是普鲁士取得胜利的原因。应日本的要求，普鲁士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派遣梅克尔以御雇外国人身份前往日本。在日本，梅克尔与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山县有朋，以及陆军的战略家川上操六密切合作。梅克尔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将陆军的指挥结构改组为师和团以提高机动性；将主要的军事基地以铁路连接，从而提升军队后勤运输能力；建立了独立指挥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并修订征兵制度以排除几乎所有例外免于服役的情况。1909年到1945年，梅克尔的半身像被摆放在日本陆军大学前。

尽管梅克尔在日本的时期相对较短，但他对日本军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

明治后期政党的崛起与秘密和半秘密的社群组织的兴起相伴，例如玄洋社和黑龙会，其将政治活动、准军事活动和军事情报活动相结合，并认为海外扩张是日本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

19世纪后期，日本感到西方国家的轻视，“富国强兵”四字体现了日本官员决心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来获得力量和尊重。通过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并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罗斯，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人们以此认为，只有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才

能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从而修订不平等条约。这支持了建立强大军事力量以保卫日本海外新版图的主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据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出兵占领济南、青岛等地。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裕仁登上皇位，之后日本很快地走上军事扩张之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

1930年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6年2月26日，主张和英美中反共抗苏联的“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但在裕仁的严令下被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泛亚洲主义“统制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中央政府及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军国体制形成。

1937年初，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日本舰艇有285艘，空军飞机2,500架。

1937年，日本策动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日本很快吞并大部分华北及华中地区，并在接下来的5年攻占很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迫使其加入“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7月7日三十七师驻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在芦沟桥附近演习。驻丰台日军称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拒绝后，即攻击城西芦沟桥。当晚10时40分，结束演习之日军称演习地点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拒绝。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翌日清晨5时许，日军炮轰宛平城。随后发生了平津作战。第二十九军在之后的平津作战中战败，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区为日本占领，侵华战争随后全面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芦沟桥，战事爆发，蒋派兵北上，决心应战，并令宋哲元驻保定指挥。蒋介石时在九江庐山，正要与社会领袖举行国是谈话会。蒋介石得知事变消息，即命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尽量发布新闻，令宋哲元积极准备，就地抵抗，如果谈判，须不丧失丝毫主权。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想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

7月8日凌晨2时，日驻屯军第3营主力占领宛平城外唯一制高点沙岗。日驻屯军占领宛平城东门外1公里的沙岗。晨5时，日方仍坚持入城搜查，中方未允，日军竟突向县城攻击，中国军队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日军不支败退，由是战端乃启。

当日，日方代表樱井、日军补给官寺平坚持入城搜查。中日双方谈判，日方要求中国军队于8月11日先自芦沟桥撤退，中国方面坚决予以拒绝，谈判无结果。5时30分左右，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步、炮兵400多人，向宛平城外第二十九军阵地进攻。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代理军长冯治安）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芦沟桥和宛平城，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上午11时战斗再起。一木清直带领第3营主力向回龙庙、铁路桥阵地进攻，在回龙庙与中国守军激战。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守卫芦沟桥和宛平城，在营长金振中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互有伤亡。中国守军两个排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13时，牟田口廉从北平到达宛平城外沙岗前线；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河边旅团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函约王冷斋与守军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出城会商，王冷斋等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18时5分，日军炮击宛平专署，金振中负伤，国军步兵两连手持大刀、手枪突袭芦沟桥附近日军阵地，斩获甚众。

日军利用缓兵之计，吊诱中国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表示系地方事件，愿作和平之解决；而暗中紧急动员，分三路向平津采取包围形势。当晚冯治安下反攻令，并发表声明称，“和平固所愿，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唯有与之周旋”，日方获悉后，即多方派人疏通，又允无条件撤兵，秦、冯二人乃收回反攻令；北平市区及四郊临时戒严司令部成立，冯治安任司令，宣布每晚8时起城门全闭，11时后全市断绝交通，禁止行人通行，并封锁至通州交通。

日军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与中国方面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国军与日军在芦沟桥附近相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与日军代表谈判，拒绝日军要求国军芦沟桥方面撤退至永定河西岸；战事复起，日军向龙王庙附近等处进攻，占据龙王庙、铁路桥及丰台等地，晚上进攻宛平城，国军奋起反击。双方协议，军队各返原防。至7月10日，日军未撤，冯治安等又下反攻令，日方派人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

7月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议定停战办法。在两国谈判期间，日本持续向北平、天津增兵，日军继续向宛平城炮击。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派2个师向保定或石家庄集中；令庞炳勋第四十军及高桂滋所部也向石家庄地区集中，并命宋哲元由乐陵速回保定指挥。

7月10日，芦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日军继续进攻芦沟桥一带中国守军，扩大事态。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发秘密动员令，要求“全国各地地方、各部队仍应确实准备，勿稍松懈，以防万一”。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抵达天津。国民政府电北平市长秦德纯，对芦沟桥事变指示三点：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日本内阁决定增兵，并迅速调遣已准备好之兵力（5个师团，目前用了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进入华北战区以加强中国驻屯军之力量。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日方针为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

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下令要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日本参谋本部拟就作战计划，决击溃北平、天津附近宋哲元军。丰台、通县等地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并在天津集结飞机200余架助战。7月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

7月13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蒋介石电令宋哲元，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蒋介石下令总动员，集结中国军队于保定、沧县一带。蒋介石以时局日趋严重，令驻庐山各部、会长官及办公人员即日返南京，处理要务。

7月14日，中日双方开始和平谈判。蒋介石设行营于石家庄。日本骑兵200余人向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进攻，为国军击退。

7月16日，日军至平津一带兵力已达10万以上。7月17日，日军占据天津西站、北宁路沿路各站。日军步兵第2团及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在通县集结，

准备形成对平、津包围之势。此时，中国国民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开始，7月20日结束，讨论对日作战方针。

7月17日，蒋介石召集全国教育、文化、社会各界贤达在庐山开会，蒋介石发表主张四点，强调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战。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8日，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蒋致宋哲元、秦德纯电：“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7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策定打一场非局部而是全面之战争。当晚，第二十九军张自忠、张允荣签订就地停战协议；当日日军又炮轰宛平城。19日，蒋介石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集结地，获得增援的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宋哲元令国军第三十七师向西苑集结，第二十九军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另该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7月21日，日军控制北宁铁路，截断第二十九军联络，接下来的几天，继续由国内向中国华北增派空军，大量运送军事物资。当日，蒋介石会见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望英国调解芦沟桥事件。

7月25日，日军向廊坊驻军挑衅。国军还击，双方冲突。7月26日，日军中午占领廊坊。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二十九军退往永定河以西。日军行抵广安门时，为中国军队独立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九团刘汝珍所阻，损失甚重。这一天，蒋介石接见自北平归来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希望美国以《九国公约》发起国地位，出面阻止日本侵华行为。

7月27日，日军分别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进攻。7月28日至7月30日，发生平津作战。

7月28日晨，宋哲元下令全线总攻，中国军队一度收复丰台、廊坊。上午8时，日军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处处被动，牺牲惨重。驻守南苑之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与日军激战。守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职。日军攻占南苑，伤亡2,000余人。当晚，宋哲元等移到保定，第三十七师奉令由宛平、八宝山、门头沟一线撤离北平，日军攻陷北平。

7月29日上午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一部进攻北苑与黄寺，遭到中国守军独立第三十九旅、冀北保安队顽强抵抗。在日军空中轰炸、地面强力抵抗下，中国军队进攻失利，退至静海、马厂一带，天津失守。

29日晚，蒋介石再发表谈话，说是这不能算是战争了结，惟有一致奋斗，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月31日，蒋介石发布“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谓“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勉励全军“驱逐日寇、复兴民族”。

8月初，蒋介石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

8月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刘峙分任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反攻平津。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为战时统一指挥党、政、军之最高决策机构。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

芦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通电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从7月8日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在国民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

评注：1937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

十分单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

1937年8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讲“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时称，自从七月七日，倭寇无端在卢沟桥生事，借此横逞其武力侵略的野心，窃据我平津，蹂躏我同胞，更遣军调将，大举入寇，眼见敌人无止境的侵略，就要陷我国家于灭亡；敌人轰炸烧杀奴辱屠戮的兽行，如不加以正当的制裁，就快要临到我们全国同胞的身上来了！我们为痛惩侵略者的野心，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这一次决心要发动全国一致的抗战，要与倭寇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我全体抗战将士，对于倭寇之不断欺侮压迫，久已义愤填膺，悲怀欲裂，要求与敌拼个死活。现在大计既决，杀敌报国，雪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

蒋中正说，“平津既是我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是我整个国家命脉之所关，决不容许局部化，让倭寇随便夺去，我们决心要拼全力把他收复转来！”日本人“现在调运大批陆空军队，分布平津一带，想用速战速决方式，一直南下，攻占冀南，来统一河北，谋造成冀察伪组织的局面，以达到他一步一步蚕食鲸吞的目的。”

蒋中正手拟简要抗倭战术十二条，特为颁布，希望我全体将士精密研究，加紧习练，确切实施，一致做到，来发扬我们革命军百战百胜强大无敌的威力，达到抗战御侮救亡复兴的目的。

1937年9月1日，蒋中正在谈《最近军事与外交》中报告了华北方面的战况和上海方面的战况。他说，张家口于八月二十七日被倭寇攻陷，张家口既告失陷，南口阵地亦无法固守，前方部队就退回怀来。过去这十天，是我们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当时我们一切准备没有完成，最紧要的如部队的调动，交通通讯的调整，运输的安排等，都没有十分确切准备。但敌人狂妄夸言，要想在一两个月之内，消灭我们，他这个梦想，我们现在已将他完全打破了。

在外交方面，蒋中正准备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蒋中正解释说，我国既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大家或者以为我国又实行联俄，难免蹈过去联俄政策的覆辙，一切要受苏俄的操纵，其实此项条约绝无此种危险。我们要和苏俄订立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在制服日本的侵略，是要打破日本的侵略政策。蒋中正说，我们是弱国，是被侵略国，此次抗战是敌人迫我到了最后关头，不得已而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在北平物色了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开始组织亲日

政权。同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行政部总长，成为该政府事实上的最高首脑。

1938年初，王克敏开始和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就双方合并事宜进行交涉。同年3月28日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组织刺杀王克敏未遂，王克敏仅受伤。同年9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北平设立，成为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的联合机关。1939年6月，王克敏开始同汪精卫交涉双方合并事宜，达成妥协。

1933年3月29日，蒋返回南京后与汪精卫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汪复行政院长职。此后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的支持。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主席致开幕词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刺客孙凤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3枪。汪精卫前往法国疗养枪伤，西安事变后回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动地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十分错愕不知所措，于是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歔歔。

第十四章 中国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八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很快，淞沪战场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此前，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

1937年7月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所属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

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同时，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遣军。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日军曾炮轰厦门。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

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

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蒋对麾下称：“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

8月14日，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和广德机场。国军第四大队从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轰炸机3架。民国空军又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军海陆军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上海的战事以牵制之。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

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

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

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蕴藻滨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

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死伤极为惨烈。

评注：中共宣传蒋介石消极抗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大声呼喊奔赴前线抗日，实际上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

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 25 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辖 3 个师（第 115、120、129 师），计 3 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全军共 4.6 万人。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第 115、第 120、第 129 师各抽一部共 9,000 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共同抗日，他是遵守承诺的。此时，国民党确实希望中共能同仇敌忾，加入抗日的队伍。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辖 4 个支队，计 1 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

9 月 22 日，国民政府发表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电文。9 月 23 日，蒋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盼中国共产党真诚一致，为御侮救亡而努力。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在共产党的抗日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为进两步而退一步”之四项诺言如下：（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淞沪战场失利，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

此时，蒋介石希望即将召开的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公约》会议，西方国家能在外交上帮忙。但是结果另他失望，真正提供帮助的只有苏联。

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蒋介石决定广西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但战局已不可挽救。

1937年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

评注：蒋中正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中说，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祇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蒋中正说，自从二十四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要革除惰习，造成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使国民有所激劝，国际上也得到良好的观感，以配合我前方的浴血战斗，达成抗战最后的胜利。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金山卫登陆。日军2个师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近10万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

蒋中正在 1937 年 11 月 19 日谈抗战前途时说，抗战开始至今已三个月以上，赖中枢各同志同心一德，坚苦维持，使前方部队，勇气日增，全国同胞，感动奋发，暴日到了今天，应已知道中国的力量不可侮了，关于军事情形，刚才副参谋总长已有说明，外交财政亦均有各别报告，不待赘说。目前淞沪外围以至苏常一带的战事，日益紧张，暴敌陆续增援，似乎我们的军事应付处于更艰难的地位，北战场自敌人占领太原后，亦形不利，但就全局来观，我们并未失败，要知道此等情形，原来并非意外，而是为我方开战时所预期的。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而日军战地指挥官柳川平助的第 10 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

由于苦战之后，国军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

1937 年 11 月下旬，松井石根 5 万部队兵分 6 路，进兵南京。12 月 3 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

12 月 8 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12 日，日军第 6 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 88 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 36 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守城部队接到允许撤退的命令时，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退兵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虽然中国国民政府部署 10 余万兵力守卫南京，但日军很快占领南京东郊与南郊，用飞机与重炮轰炸市区。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12 月 24 日，杭州亦相继沦陷。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日军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在南京以外的金山、杭州、苏州、无锡、芜湖、扬州等地犯下一系列暴行，至少 3 万多人被杀，这些暴行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日军攻占南京时在战场上俘虏数万中国官兵，在日军高层的授意下，这些俘虏都被集体屠杀。数万中国平民在日军搜捕溃兵的时候受到牵连被一同屠杀。日军将捕获之中国军民驱赶到长江边和南京郊外集体屠杀；同时日军还在南京大街小巷、住宅、寺庙、村庄等处随意杀人。在占领南京后的几个星期里，日军毫无约束地在城内外游荡，随意杀害平民，被日军强奸、抢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军杀死灭口。根据 1946 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有 19 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南京慈善团体掩埋达 15 万多具。

日军报称，13 日清晨，第 6 师团步兵第 45 连队从长江上游向下关进军，途中歼灭一支正在逃离的中国大部队。第 16 师团从南京城东扑向下关，其中步兵第 30 旅团的先头部队上午 10 点抵达下关，用坦克炮和重机枪射杀在岸边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溃兵”，用光 1 万 5 千发子弹；第 33 联队前进途中歼灭一千几百名前往下关的“溃兵”；第 16 师团主力的先头部队在下午 2 点 30 分到达下关，在岸边用重机枪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溃兵猛烈射击两个小时，使 2000 多人葬身江中。第 13 师团的山田支队从长江下游沿南岸进击，下午占领乌龙山炮台后通过燕子矶向幕府山炮台前进，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长江南岸（即草鞋峡）遭遇大量溃兵和避难民众，山田支队至 14 日清晨共俘虏 14777 人。同一天，日本海军第 11 战队突破乌龙山封锁线，逆流而上向南京进发，向江上顺流漂浮的溃兵用舰炮、机枪和步枪连续射击。

12 月 13 日，《东京日日新闻》报导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从上海到南京时，谁先杀满 100 人为胜者。他们从上海杀到南京，向井敏明杀了 89 人，野田毅杀了 78 人，因皆未满 100，“竞赛”继续进行。12 月 10 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 105 人，向井谓杀了 106 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 100 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 150 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抢劫、纵火，南京城南最繁华之商业区和人口密集之住宅区是受害最严重之地区，主要街道几乎都成废墟；而在抢劫、纵火同时，日军还有组织或分散强暴妇女，甚至对在难民区避难之妇女也不放过，冲进那里对妇女强奸。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一至两个月内，约有 2 万至 8 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 12 岁的幼女、60 岁的老妇，乃至孕妇。

约翰·马吉牧师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 月 13 日，30 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东新路口 5 号，他们先杀死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摔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 1 岁婴儿，之后轮奸母亲和另一个房间里 16 岁、14 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里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 7 岁的夏淑琴和她 4 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房东的两个孩子，4 岁孩子被刺死，2 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 23.8% 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 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 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 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的几个星期，日军闯入市内的建筑大规模抢掠，有的时候他们在军官的组织下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

1937 年 11 月间，留在南京之外籍人士代表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 3.86 平方公里，最多时收容难民约 25 万人。

评注：在日军进逼南京时，蒋中正于 12 月 5 日通令抗战期间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守土责任，“凡战区各省各县地方，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执行职务，领导民众，从事抗敌；或此乡再陷，则更迁至另一乡区；或竟全境皆有敌踪，仍应迁入邻县接壤之地；但期有一寸之土，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一日停顿。”“务使敌军无论如何狂暴，决无可以久据之地，更无可供役使之民，则彼侵入愈深，兵力愈散，防范愈难，随处皆荆天棘地之场，自必有师老气衰之日。”

当日军进入南京大肆杀戮时，蒋中正《为国军退出南京发表通电》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其

唯一意义，实祇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已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移动，今已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南京沦陷后，蒋中正在 1937 年 12 月 16 日在南昌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称，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觐。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

蒋中正说，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937 年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 月 9 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 16 天，8 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8 月 31 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 1 军和第 2 军。日军进陷山西大同。9 月 13 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

平型关是内长城重要关隘。关北的恒山高峙如屏，关南矗立五台山，两山都是陡峻的断块山，海拔在 1500 米以上，是晋北的交通障碍。两山之间是一条不太宽的地塹式低地，是河北北部平原与山西之间的最便捷通道。平型岭位于这条带状低地中部隆起，形势险要。这条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接北京西的紫荆关，西接著名的雁门关，构成一条坚固的防线，自古就是北京西的重要藩屏。

中国军队参加平型关作战的是第二战区部队，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平型关战役”是“太原会战”一部分，前期总指挥是国军第六集团军杨爱源，后期总指挥为第七集团军傅作义，主力作战为国军第六集团军、第三十三军、第十五军刘茂恩和第十七军等，总共 15 万人；八路军协助防守左翼雁门关一带。

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攻占灵丘。22日，攻占平型关西北的“东跑池”制高点。坂垣第五师团21旅在团城口与第十七军高桂滋84师部展开持续血战。至9月24日晚，第84师浴血奋战3天，伤亡2700余人。25日凌晨，84师没等到援军，却等到栗饭原支队的突袭。25日凌晨2时，84师全线溃退，日军占领团城口。

9月25日晨，在平型关和灵丘之间的乔沟设伏的林彪第115师就意外的发现相向而行的两支日军后勤辎重部队，分由一名中佐率领，竟然从东西两个不同方向先后进入了伏击圈。

115师得知日军辎重行李队进至蔡家峪，于是在乔沟设伏，该地区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日军机动性大减。晨7时许，该部日军全部进入115师主力预设地域。林彪得知日军有辎重队400多人，在蔡家峪落后，“多数徒手，少数步枪”，于是袭击辎重部队。林彪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先放过日军先导部队，然后以枪械突击辎重行李队本队。日军派出一部企图抢占公路西北侧制高点“老爷庙”，掩护突围。115师本在战场东南，一部越过公路，大部占领公路东侧，伏击部队两面攻击日军，将日军压制于“老爷庙”至“小寨村”的狭谷之中。此时新庄自动车队抵达，听到枪声但与辎重队未碰面，也从西面向老爷庙所在高地反复“猛烈冲击”，遭击退。此役或有认为毙伤日军500至1000人。桥本和新庄两名中佐都在战斗中被击毙。其中日军自动车队并未遭到全部歼灭，在受到严重打击后，弃卡车与辎重车突围。日军辎重行李队伤亡占较大比重，脱逃人数为7人。此战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

平型关大捷，国内各党派团体纷纷致电祝贺，欧美、东南亚媒体也报导了第18集团军115师胜利的消息。何应钦与蒋中正对忻口会战期间八路军在雁门关战斗和夜袭阳明堡战斗中取得的战果予以肯定和表彰。

评注：平型关战役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战斗历时一个月，战场范围达数百里，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1个军共计十余万，对付日军方面2个兵团约2万，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属中等规模战役。

中共方面指该战役的第18集团军第115师林彪部在山西灵丘县西的平型关一带配合国军作战，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来的首战及抗战以来中国的首胜，为平型关战役中的一部分。

平型关的胜利对于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10月25日，《蒋中正日记》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

根据国民政府资料，在平型关战役中，国军毙伤日军2,952人，中国军队伤亡39,042人。至此日本军已经向中国战场投入26个师，共约50万人。

日本第五师团的一部兵力进攻平型关失败后，关东军从察哈尔派来的兵团就在9月29日突破茹越口，威胁平型关的华军后方。30日，平型关的中国军队向五台山、代县之线撤退。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忻口位于崞县和忻县之间，东依云中河，西侧丘陵是同蒲铁路和晋北通往太原公路的交通要冲，是日军进攻太原的必经之路。

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10月6日，日军川岸文三郎率领关东军第20师团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策应其第五师团之攻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与曾万锺率领的第3军依工事抵抗。11日，日军进攻井陉、砭驴岭，中国守军第38军第17师迎击。14日日军突进苇泽关、旧关，被中国第一战区第一军团、第三军包围，但中国军队火力不足，至22日，日军仍坚持抵抗。日军被迫于21日抽调第20师团全部及第109师团一部由冀南回援。10月26日，日军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晋东平定、阳泉相继失守，日军进逼太原。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

评注：太原会战是1937年9月11日至11月8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二战区与日本军队在山西太原附近地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包括天镇战斗、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以及广灵、灵邱、崞县、原平等战斗。

太原会战双方指挥官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寺内寿一大将，朱德第十八集团军配合第二战区作战。

这场战役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华北、西北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日军成功取得山西大同一带的煤炭资源。

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首都南京之后，继续挥军北上，而另一股日军亦从华北方向南下，中日两国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展开一系列激战。

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团另3个旅、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计划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 64 个师另 3 个旅约 60 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

1938 年 1 月 26 日，日军第 13 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挥徐州以南地区作战。第 51 军在军长于学忠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淮河两岸敌我阵地反复易手，双方数度展开白刃战，淮河被染成血河。

3 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 8 日，伤亡颇大；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 30,000 人强行军不到 24 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 月 12 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向北溃退。3 月 17 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 3,000 多人殉国。

3 月 18 日，濛谷支队约万余人攻下滕县。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 4 周。濛谷支队以第 63 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 月 24 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 3 月 31 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

中国以 4 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4 月 5 日增援云南国军切断日军运输线，800 名台儿庄日军至次晨被完全包围消灭。汤恩伯第十三军在台儿庄以北 20 英里之洪山镇俘虏几百名日本人并缴获野战炮。

4 月 7 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濛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日军向峯城、枣庄撤退。

台儿庄会战，是对日抗战爆发后国军首次取得的胜利。中国军队约 29 万人和日军约 5 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 5 万余人，毙伤日军 2 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 3 次赴徐州视察督战。捷报传到武汉，10 万人上街游行庆祝。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5 月 17 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

评注：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徐州会战的一部分。徐州会战指 1938 年 1 月至 6 月间，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防御侵华日军攻势的作战。

对中国而言，徐州会战从津浦线作战与南京保卫战后便开始。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此役，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临阵退缩，被蒋中正下令枪决。

蒋介石在山西南部发动华军的牵制作战，使得华北方面军山西的部队无法抽调。5月15日，日军包围徐州，蒋介石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放弃徐州。

1935年8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提交《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其中提及“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

1938年4月6日，日军自台儿庄撤退。7日，日军下达挥师徐州的作战命令，预定四月下旬开始。

1938年春，华北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侵占了豫北，沿同蒲铁路南下侵占了临汾、运城、风陵渡。1938年4月13日，由陈果夫与白崇禧提出在河南省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豫北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

1938年5月日军拿下徐州进而沿陇海铁路西进。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

1938年6月1日，兰封会战结束，日军进占兰封与开封，郑州危急。

6月6日，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口。7日，利用炸药在河南郑县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南岸的堤防炸毁以造成决堤，使黄河改道南流，入贾鲁河和颍河，夺淮入海。

花园口决堤淹死了最多一万日军。6月29日，日军在江苏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此次决堤直接淹死人数89,300人，冲毁民宅140余万家，造成将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因逃亡中疾病或饥荒而死者不计其数。蒋介石本人也承认此决策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国民政府还讹称此系日军轰炸所致。

评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精卫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前往云南试图获取滇系军阀龙云的支持，意与日本军部合组政府。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中正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有不快之处。

1938年8、9月间，汪开始主张对日本亲善，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主张“和平运动”。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

本重治在英属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

12月29日，汪精卫“艳电”宣布与日本合作。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

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

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2月30日，日本和汪精卫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在上海与日本人会谈。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谈判《要纲》后流着泪对夫人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3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

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8月20日，第一兵团

总司令薛岳与日军在马当要塞及江西省德安县以北爆发激战，战况陷入僵持状态。接近9月底，在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军与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日军4个师团遭受重创。

在长江以北，日军第6师团在7月24日自安庆突破了中国的第31及第68军的防线，在8月3日攻占太湖县、宿松县及黄梅县，当日军继续西进后，中国第5战区第4兵团部署兵力在广济、湖北及田家镇以迎击日军，第11集团军及第68军被命令在黄梅县布置防线，而第21集团军、第26军及第29集团军向南移动以侧击日军。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在9月29日攻占田家镇要塞及继续西进，于10月24日攻占黄陂及逼近汉口。

在大别山以北，第五战区第3兵团将第51、第19集团军及第77军部署在安庆的六安及霍山地区，第71军防守富金山及固始县地区，第2集团军在河南省的商城及湖北省的麻城，第27集团军及第59军在黄河地区及第17军团在信阳组织防御。

8月底日本军分两路从合肥进攻。8月28日攻占六安，9月6日攻占固始县城。9月16日日军攻占商城，10月24日日军攻占麻城。10月12日日本第2军攻占信阳及进至平汉铁路南面，会同第11军一同进攻武汉。

由于武汉地区的战事仍然僵持，中国自国外的战争物资仍持续自南方港口输入，日军在此时决定抽调3个师的后线部队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施加压力，故决定以两栖登陆的方式占领广东沿海港口。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21日占领广州。由于广东地区的粤军主力多抽调支援武汉会战，故占领的步调出乎各方意料的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地区沦陷。

日军在各处的攻击接连告捷，同时完成包围武汉的行动。因为广东的失守让武汉的战略地位不再重要，固守亦失去实质意义，为了保全有生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日军在10月26日攻占武昌及汉口、10月27日攻占汉阳，日军完成攻占武汉三镇的行动。

评注：1938年5月31日，蒋中正发表《我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称，至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争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于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期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

广大之外围；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

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中华民国境内分裂成两大政权，一是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二是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武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

经过四个月激战，国府空军耗损极大，海军基本被消灭，日军成功攻占除了汉口法国租界外的武汉全境，但是国军大部分主力仍在，日军被削弱。武汉战役后，日军在华中发起数次战役皆无重大斩获，中国战场陷入僵持。

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

评注：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河北北部及山东北部）、第二战区（山西及察哈尔）、第三战区（江苏和浙江）、第四战区（广东和福建）、第五战区（山东南部 and 江苏北部）、第六战区（重庆）、第七战区（保卫南京）、第八战区（蒙西、宁夏、甘肃）、第九战区（江西、湖南）、第十战区（陕西）、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

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从 1938 年到 1943 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尤其是 5 月 3 日至 5 月 4 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6 月 5 日，日军出动 24 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 5 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 1,200 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

此外，日军对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等地轰炸，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死伤无数，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 年至 1941 年，一再发动攻势。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 1939 年 3 月，日军约 50,000 人，进犯南昌，国军约 20 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 1941 年 3 月，日军约 4 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 2 周，日军颇有损失。

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 年 4 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 月，武汉日军 5 万分路进攻，为 10 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940 年 5 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 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

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 年 11 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蒋中正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1939 年 9 月日军 10 万来攻，10 天后为国军 20 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

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正面攻势。日本为军事打击和逼降国民政府，集中 10 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日军参加作战兵力为三个师团和两个支队，兵力约有 25 个师。第 9 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 30 多个师和 3 个挺进纵队，共约 24 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

日军于 9 月 17 日发起进攻，其部队从江西省北部向西进攻湖南省，但是日军的进攻由于向西过度延伸及国民革命军从南北两面反击，因而被迫向东撤退。9 月 19 日，日军沿新墙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到 9 月 23 日日军将国军逐出新墙河地

区，其第 6 师团及第 13 师团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罗江向南推进。激烈的战斗在 23 日后仍然持续，中国军队向南撤退以吸引日军，同时其增援部队到达东西两翼以实施包围，9 月 29 日日军到达长沙外围，但是他们因补给线被切断而未能攻占该城，10 月 6 日，冈村宁次宣称在达到作战目的后撤军。10 月 8 日，双方恢复原有的态势。日军公布死伤人数为 3,550 人。

长沙是对日抗战以来第一个没有失陷的中国主要城市。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流露出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评注：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39 年 9 月 1 日爆发，这样的论点是以德国入侵波兰做为起点，3 天之后英国和法国便先后对德国宣战。不过对于战争开始的日期仍然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些人便认为实际上战争早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便已经开始。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毕佛等人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应该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

1938 年 7 月 29 日，日本于张鼓峰事件中首次入侵苏联领土，苏联部队也随即与日军展开交战。在中国与德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时，中国选择与苏联迅速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也开始提供军需物资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而已经转往支持日本的德国则在年底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德国则逐步在苏联边境布署军事武力，准备在之后直接攻击苏联。

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德国、英国、苏联和日本等都有强大的海军，还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军队装备十分落后，连一支像样的舰队都没有，所以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日军在 1938 年武汉会战中期成功占领广州以后，希望进一步断绝援华路线的南方路段，也就是从越南至广西的运输路线。1939 年 2 月 10 日，日军占领海南岛；6 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

1939 年 11 月对第四战区发动新一波进攻，以第五师团为主攻部队从广州等地往北进攻。11 月 9 日，日本全部进攻部队在三亚港集结完毕。11 月 15 日，日军第五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首先从钦州湾企沙、龙门等地登陆，桂南会战爆发。日本军第 5 师团突然在广州钦县登陆，日军 70 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11 月 24 日占领南宁，12 月初占领崑仑关，至此广西交通已被日军控制大半。

委员长蒋介石决定投入刚整编完成之中央军第五军以及其隶属装甲兵团、炮兵部队，向昆仑关进行强攻。此战也是少数国民革命军为攻方、日军为守方的战役。12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在迁江附近召开团长以上之军事会议。

12月17日，今村中将认为南宁北面无战事，命令向龙州和镇南关进攻，去夺取中越边境上的两个战略要地。12月18日凌晨国军重炮兵团和师之山炮兵营，集中炮兵之火力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炮击，当日占领昆仑关。

12月19日午后，日军大批飞机出动掩护反攻，昆仑关被日军夺去。随后，国军又重新开始向昆仑关进攻，将昆仑关日军全部包围。12月20日，昆仑关日军渐渐支持不住了，频频告急。12月24日，赶来增援的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九塘被中国军队炮火击毙。

12月25日国军荣誉第一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指挥下，再次攻克罗塘南高地，全歼守敌200余人。白崇禧新调五个师全力打击八塘以南日军援军。

12月30日新编第二十二师邓军林团第三次收复昆仑关。12月31日，邱清泉师长率新二十二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国军大获全胜。

在整个昆仑关大战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以伤亡14000余人之代价，击毙侵华日军4000余人。日军第21旅团的两个主力联队第42联队和第21联队被全部歼灭，21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士官死亡达85%以上。

评注：1940年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陷入僵局。日本为了增加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决定开始优先攻占重要位置以阻止供应路线，同时与准备与西方列强展开战争。这一时期，日军也继续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并给予军事管制。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维希法国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1940年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发起百团大战打击日军部队，作为报复日本则决定在占领区内对共产党党员和一般民众实施严厉的三光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方式有效减少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力补充和物资供给。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八路军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陘煤矿亦遭破坏。北路军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根据日方战时机密资料，第九与第四这两个混成旅团于9月1日至11日总共死伤483人。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

11月19日至12月初，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正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国共产党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进行反击。

百团大战从 1940 年 8 月 15 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历时 3 个月 15 天，中国共产党宣称投入兵力有 100 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

战后八路军总部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中说：八路军毙伤日军 12645 人、伪军 5153 人，俘虏日军 281 人、伪军 1407 人，日军投诚 7 人，伪军反正 1845 人；攻夺敌人据点 293 座。八路军伤亡 17,000 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 437 个县中的 10 个县。

根据日军医疗部门内部极机密档案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机密资料研判，1940 年 8 月至 12 月整个华北方面军共战死 2,349 人，战伤 4,004 人。

评注：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发动，违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张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擅自打百团大战。对这一指责，彭德怀表示并非如此。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国民政府在当时亦表示祝贺支持。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百团大战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宣布建立统一战线。但不久，中共就开始与日本合作反蒋，并与国军争夺后方战场。日本退出中国北方战场后，把阵地基本上都交给了中共军队。中共后来自诩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随着中共势力在山西的影响不断扩大，阎锡山开始对中共产生一定提防。1939 年 11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冬季攻势初期所发生的阎锡山二战区与八路军间的国共摩擦事件。中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 120 师、129 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这起事件破坏了国军第二战区在晋南三角地带对日军的攻势计划，使阎锡山军队受损甚重，从此失去对晋西北与东南的控制权，中共正式成立晋绥和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

1940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派出 119 师、120 师及徐向前部以主力南下华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另派一部支援新四军反顽。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

1939年3月，南昌沦陷，江苏已成敌后，新四军越区自行扩大抗日根据地，与毗邻防区的国军发生摩擦，其间互有小规模武装攻击。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新四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或被俘。

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并重占姜堰。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黄桥战役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将领，要求他们学习陈毅在黄桥战役中分化、瓦解国军抗日部队的经验。

徐向前在战后记载了消灭国民党敌后抗日政权的手法：“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谈判争取合作，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反时就可以名正言顺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有些顽固地区官员只得卷铺盖走路，地方政权便成功到手。三是武装打击。”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中正，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中正担忧此举将导致苏北韩德勤所部遭到新四军报复，因此国民政府并不准备在新四军北移之前在苏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新四军方面苏北将领则激进的多，时任华东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接连取得半塔集、郭村、黄桥三大胜利后，认为以军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韩德勤，而解决韩德勤后，华中整个局面就焕然一新。因此反倒急于发起对韩德勤的进攻。

12月13日16时，八路军新四军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向驻守曹甸的韩德勤部发起总攻。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新四军虽突破国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国军的基本阵地。刘少奇军伤亡共约2000人。

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指责中共“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

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1940年12月27日，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29日，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名义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完成。

1941年1月4日夜晩，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

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

1月9日，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

1月10日拂晓，前锋部队翻过石井坑北侧山岭，即被伏击，无法继续前进。上午，新四军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前往国军谈判，被扣。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

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全军约9000人，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被俘。

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

评注：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成立军部。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对处理新四军有过波动。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白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饶从命足矣”。但是在新四军被围歼之后，蒋的态度再起变化。

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因此对此案处置更应严肃坚决”。17日，蒋介石由于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恶化。

蒋介石说，皖南事变是“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12月25日，蒋召见周恩来，以“极感遗憾的神情”告诉周：“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的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如果新四军非留在江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定失败。”

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社论在事件发生后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湖南、江西）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从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此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薛岳的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第9战区称击毙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日军虽一度攻占长沙，然仅2天便因原根据地防务空虚回撤，国军趁势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灭。

由于长沙一度失陷，蒋介石对薛岳十分不满，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又斥责第9战区“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定可打败敌人，定可俘获敌人很多官兵，定可缴获敌人无数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评注：1940年，日军趁法国战败时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引起了日美关系的紧张。1941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军队撤离法属印度支那，并连同荷兰与英国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人和陆军航空队，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组“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战斗，并同意中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贷款给中国资金来购买美国战斗机。

日本决定对英美开战，并占领菲律宾、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等资源丰富的地区以获取战略资源。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认为美国势必会干涉，因此必须致命地打击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让日本在南进取得成果、势力得到巩固后，能有机会在有利的条件下与美国和谈。为此，山本五十六拟定了偷击珍珠港的计划。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点燃太平洋战场的战火。驻台湾海军共派出了6艘航空母舰、300多架战机，分两波进行奇袭。日军在偷袭美军之下，取得了重大战果：击沉及重创了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了188架战机，共造成2,402人死亡。

在军事行动上，珍珠港的攻击行动是当年世界上最成功的一次，然而在政治上却是极大的错误。太平洋爆发战事已令北非战场的部分英军及澳大利亚军调去亚洲对付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2月底，陈纳德的飞

虎队正式进入云南昆明参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 40 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 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 年向中国提供 5 亿美元无偿援助。联军对蒋介石国民军队的武装补给，主要通过缅甸北部的交通线进入中国领土的。为了保障补给线的畅通，蒋介石抽调重兵在泰缅边境与日军激烈交锋。

日本这次先战后宣的行动，让美国公众舆论愤怒不已，全国自孤立主义转为支持参战；而德国和意大利等轴心国也对美国宣战，让美国因此加入了欧洲战场。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给予各个反轴心国阵营大量的资源，导致轴心国最终灭亡。

1941 年 10 月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上台，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战争的规模，同年 12 月 7 日，日本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攻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月，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日本中国派遣军命令华中第 11 军司令阿南惟几发动进攻以策应香港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前两次日军都未能成功攻占长沙，第十一军在日军内部也颇受指责，因此阿南惟几也急于想用攻占长沙来一雪前耻。同时阿南惟几认为，依据所获得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第九战区所部精锐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均被抽调南下，认为此时长沙防御兵力单薄，力主再攻长沙。

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其“天炉战法”，决定依据湘北的地理优势（即“天炉”），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布置防线。

1941 年 12 月 24 日，阿南惟几下令进攻长沙，当天日军第 6 师团与第 40 师团开始自新墙河渡河，且利用夜袭与炮击碾压守军防线。第 3 师团与泽支队则在 25 日早上发起攻击。24 日傍晚恰逢寒潮过境，湖南经历罕见的低温和大雪，气温从 12 摄氏度下降至摄氏零下 5 度，气温遽降不只造成进军困难，也让日军架桥与渡河都因此延迟；经过 2 天 1 夜激战后，防守新墙河的国军第 20 军和第 58 军遭日军采燃烧弹破坏防御工事，以致伤亡过半。

12 月 29 日，日军第 40 师团完成横渡汨罗江之作业；然而 12 月 30 日晚上，40 师团所辖的后勤部队一辎重第 40 联队遭到国军夜袭，联队长森川敬宇中校战死。

由于汨罗江大部地区以南原本就是田野，外加雨雪天气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湘北地区的百姓又早就把可以通行的大路大为破坏，导致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不仅很难推进反而成为累赘。

1941 年 12 月 31 日日军的第 3、第 6 和第 40 这三个主攻师团分别进抵长沙城外，并依据计划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1月2日，日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继续向长沙市区发动猛攻，中国守军按计划退守第二线阵地。

1月3日，长沙城内的战斗趋于白热化。就在长沙城内中日两军进行近身肉搏战之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利用地形上的绝对优势，对城内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打击，使攻城日军伤亡很大。

经过数日的激战，第十军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但仍旧士气不减继续与日军进行逐屋逐巷的争夺。

在日军大举进攻长沙城之时，薛岳就开始部署对日军后期的歼灭战，蒋中正不仅应薛岳请求将先前从第九战区调走第四军和七十四军调回，还将七十三军和九十九军也交由薛岳调配。

1月5日就在第九战区的反攻部队已经打到长沙城外日军背后之时，阿南惟几才被迫下令日军全线撤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掩护撤退的日军发起攻击，在伤亡4百余人的代价使日军掩护撤退的山崎大队300多人全员阵亡，山崎大队遭到歼灭给阿南惟几带来相当震撼。1月14日，日军经过苦战终于渡过汨罗江向新墙河推进。

在1月14日至1月16日，第九战区所部第20军、第37军、第58军、第73军、第78军等部在汨罗江之新墙河之间地区向日军发起拦击、追击和侧击，同日军发生四次激烈的包围与突围战斗。在12天的撤退中，日军因遭到国军的猛烈围堵攻击而伤亡巨大，仅有1.3万人成功撤回。

按照第九战区报告，此役击毙33,941人、击伤23,003人、俘虏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手枪26只、机枪115挺、炮11门。由于声称的消灭人数与俘虏军品落差颇大，薛岳在军事会议上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时，受到在场诸人笑斥之，甚至蒋介石也认为其过于夸大其词。

至1月16日，交战双方依旧恢复沿新墙河对峙的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领下，在湖南益阳县厂窖镇屠杀平民3万余，强奸妇女两千多人，烧毁房屋、船只无数，史称厂窖惨案。

评注：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潘汉年指示袁殊接受杜月笙的介绍及戴笠的委托，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上海沦陷后，撤往香港年底赴香港，与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1938年9月，潘汉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

赴港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命潘汉年组建领导设立华南情报局。

在上海，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潘汉年在中共情报人员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委书记齐庆斌。

戴笠说：“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精卫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藪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评注：日本人侵华的最大罪行，不在于屠杀和掳掠，而在于截断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历史进程，在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最终窃取了政权，在中华大地实施独裁统治，使中华民族遭受马列邪教和共产暴力蹂躏近一个世纪，使这个愚昧的民族到如今面对历史真相时仍然装聋作哑。

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道“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 170 多万，补充兵约 50 万；海军舰艇 11 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 122 页载：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日本军共有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大型战斗、38,931 次小型战斗。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 1,400 万人，伤亡官兵 320 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 3,500 万人，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据日本厚生省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 455,700 至 700,000 人。

第十五章 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4年11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

评注：刘志丹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他领导渭华起义，此后开辟陕甘根据地。

1935年10月初，刘志丹与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在戴季英主导的肃反中被逮捕，刘志丹遭严刑拷打，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遭到关押，习仲勋差点被活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博古领导的党务委员会负责解决当地肃反问题，刘志丹等被释放。

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读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193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县。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进驻延安。1937年5月1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并于同日召开了特委第一次委员会。

自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截止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1937年7月17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会议。国民党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代表，共产党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会上，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边区是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认为蒋介石先生在庐山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表示认同国民政府的方针：“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毛泽东提出了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名为八大纲领。其中强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说“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首府设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及八路军募补区共计26县，总面积129,603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之后，多次做出调整。

这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一次有实质意义的民主选举，同毛泽东的话说，是“必须要团结和进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谈民主和集中的问题，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美国人斯诺被认为是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7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斯

诺最为著名的出版物，该书纪录了从中共创建至 1930 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同年，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

评注：1937 年 7 月 30 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遇到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白求恩向陶行知表示愿意到中国。

1938 年 3 月 31 日白求恩抵达延安。4 月 1 日与毛泽东会面时，白求恩说利用他从北美带来的医疗器械足以组建一支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就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对白求恩说的伤员立即手术将有 75% 的复原率很高兴，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5 月 2 日白求恩率一批医护人员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成了一名战地医生。

1939 年 10 月 29 日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为一名腿部受重伤的伤员做手术，他把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一片碎骨刺破了中指。3 天后白求恩为另一名伤员做手术，手指创口遭到感染，于 11 月 12 日因败血症去世。

中共中央 1939 年 11 月 23 日致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白求恩医师家属电称：“白医师突于本年 11 月 12 日，因施行手术不慎，致中毒死于晋察冀边区。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宣扬他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毛泽东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

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之后，毛泽东接连提出要反对自由主义，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毛泽东说，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说“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批评一些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提出要整顿党的作风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地方非正规武装三部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一五师、—二〇师、—二九师的部分部队组成，共约 9000 余人，主任肖劲光，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双重任务。地方非正规武装，包括保安队、自卫军两部分，1938 年底人数有 224,000 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十多个保安大队，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时，毛泽东指出，要建立根据地。他说：“我们的战略反攻—日未能举行，失地—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泽东强调，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从 1937 年到 1940 年，中共控制的武装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等开始在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敌后根据地。到武汉失守前，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五个根据地。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在国民党军队里，《论持久战》也对不少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傅作义、卫立煌、冯玉祥、白崇禧等将领，自己读并让部下学习。吴玉章说：“《论持久战》

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假抗日、真反蒋”，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自行发布货币——边币。此后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

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发展很快。其中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家。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民间纺织方面，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

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法购粮，开始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41年春，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并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资源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缓解了边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实际上除生产粮食外，南泥湾也广泛存在鸦片种植现象。

评注：1940年起，有事实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

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前，晋陕地区便已是**中国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鸦片种植和贩卖历史很长。1920年代，陕西已到无村不有烟馆、人人吸鸦片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以上。另一方面，当时在整个中国，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和金、银等硬通货同样在市场上流通，八路军也的确掌握着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用以平衡陕甘宁边区进出口赤字。这在中共出版的党史，以及中共领导人回忆录中也多有提到，并无忌讳。鸦片还是那个年代军医常用的麻醉剂。

中共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提到中共犯过两个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东西，二是种植特货。《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中的“禁种特产”的秘密通知提到，烟苗烟户的处罚措施就是没收，且“特产”或“特货”必须统一销售，对群众则隐瞒销售的情况，只说是没收。如1942年，特产（鸦片）被单独列出，收入139623000元，占财政收入的40%。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津浦、京汉两大铁路或天津至上海的日军海上运输路线输送鸦片，贩售至国统区。当时，国民政府方面也在大量贩运鸦片，以压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掐断陕甘宁边区资金来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对当时受国民政府打压的回族采取宽容和怀柔政策，起到了融合各民族和化解分歧的效果。边区政府对其他民族均表示尊重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边区政府规定，“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还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

毛泽东这样谈当时边区的困难。“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九万担，1941年的二十万担，1942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1941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

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

毛泽东说，我们“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 1940 年和 1941 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毛泽东辩解道：“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评注：在陕甘宁边区，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及全部供给工作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不管战争多么艰苦，毛泽东始终让自己的弟弟紧握中共的钱袋子。

1925 年 2 月，随哥哥毛泽东回到湖南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从广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1929 年冬，毛泽民从上海来到天津，创办中共的秘密印刷厂，印刷钞票。

1931 年 11 月，在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给自己的弟弟谋一个最好的差事，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1933 年 5 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 年 9 月，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贸易、财政、工矿等方面的经济工作。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兼钨矿第一任总经理，扩大了 3 个矿场，将钨出口到香港。1933 年钨产量 1800 百吨，1934 年产值 200 余万元。毛泽民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常赴前线随部队筹粮、筹款。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十五大队队长，并任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只是名义上任主任，由毛泽民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及全部供给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 年 2 月，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7 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严重，身体虚弱。毛泽东让毛泽民取道新疆，赴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地区发生鼠疫导致交通断绝，毛泽民

被迫在新疆逗留了两年，期间用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

1939年6月初，毛泽民以治病为名抵达莫斯科，在苏联住了4个月，然后返回新疆，继续在新疆工作。

1942年，有“新疆王”之称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采取反苏反共政策，秘密逮捕了毛泽民。2月7日，毛泽民被投入监狱。1943年6月，国民党派出中央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前往审问，毛泽民连续七天七夜受到严刑拷打。1943年9月，蒋介石批示同意处极刑。9月27日深夜毛泽民等由盛世才的军警秘密处决，中统特务监督执行，并呈报重庆验证。但中共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才得知毛泽民被害。

共产党的军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根据毛泽东的记录，“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等在东征归途于黄河西岸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根据会议决策，决定创办红军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培养干部。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中梁山阎家大院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校长林彪，毛泽东兼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组建了14所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这种做法隐含了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大搞分校建设进行对垒的意味，国共双方都在积极扩充军校，准备军事干部。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中

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孰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1938年10月1日，生于澳门的音乐家冼星海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钱韵玲，一同前往延安。冼星海在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子大学兼课。期间创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39年，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称为人民音乐家。

评注：1936年11月，32岁的丁玲抵达陕北，她首先推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担任文协主任。丁玲可以说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最著名的作家，她受到热烈的欢迎，跟很多中共上层领导都保持密切的关系。丁玲曾经是杨开慧的中学同学。1936年底，毛泽东作了一首《临江仙》赠给这位湖南老乡，“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拟，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也积极地融入这里的生活，上前线、到各处体验生活，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此时的丁玲，还是有自我思想的，“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

1933年5月，身为共产党员的丁玲与同居的翻译冯达一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秘密送到南京软禁关押。1934年4月，冯达在国民党机关做翻译，国民党也给丁玲每月100元生活费，二人仍在软禁状态，但有了多一点的自由。在关押期间，丁玲在劝说之下，写了一张条子：“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判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她以为这能使她获得释放，但结果并没有。这张条子后来成为丁玲历史问题审查的核心。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这个栏目发表了一系列负面批评的文章，包括丁玲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对丁玲等人的批判进一步深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做了检讨，后来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检讨中说，《“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表现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方面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

《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中说：“据现在所有材料，国民党没有将丁玲所写字迹公布。...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拘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况，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因自己深刻反省。整风后有进步”。这样，丁玲这次算是过关了。

鲁迅要是生活在丁玲的时代，也跑到延安去，他一定会被中共和毛泽东千刀万剐或五马分尸一百次了。

1938年1月，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间通宵达旦；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之意见强加于他。这个事情给人一个错觉：毛泽东还是开明的。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指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缔造者。

（原子物理硕士毕业生王光美是刘少奇在延安结婚的第六任妻子）。同年，毛泽东在党刊《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1939年，李德离开中国回了莫斯科。他离开延安时乘坐的飞机上还有周恩来夫妇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被排除出中央决策层，成了旁观者，之后就没他什么事了。1937年，王明曾警告李德，让他待在中国不要回去。于是李德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弃掉了中国的农民妻子，娶了美丽的上海演员李丽莲。回到苏联，李德被斯大林软禁了一年，然后被流放了。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摆脱共产国际领导，转变成不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在 1942 年 2 月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 120 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邓发的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

5 月 19 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毛泽东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7、8 月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号召其党成员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该党文献，此次会议检讨了其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肯定了 1931 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 1935 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会议，整风学习从此开始。这是中共延安整风的预备阶段。

评注：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 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大台庄一个富裕的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由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书法绘画，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

1931 年起，康生（化名赵容）与周恩来、陈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下属有潘汉年。在顾顺章叛变等案件中，他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中共有关文件和人员的转移工作及处决顾顺章家属十余人的制裁行动。当情势更为恶化后，赵容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1933 年 7 月，赵容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1934 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缺席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所以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

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此前康生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康生善于洞察毛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便于公开的想法他都能予以洞察，并替领导分忧。一般认为，原籍诸城的江青与康生旧时相识，后来江青到延安与毛泽东相恋，之中得到康生帮助。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少奇与张闻天为反对最力者。康生基于各种原因，坚决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获取毛泽东信任。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

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根据学习内容的行为标准，在整风中各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病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种批评方式，中共叫做“治病救人”。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此次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中共党内军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根据该党文献称此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普遍的学习和整顿，

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但是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李克农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作法逐渐产生怀疑。康生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运用了“逼、供、信”的手法。到了后期，配合“反左”、抓“内奸”等运动的推行，更加对于各党员干部严格审查和强加自我检讨，清查出大量“特务”。

评注：刚开始实行整风时，大家的互相批评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上级鼓励大家积极对中国共产党作批评，强调“言者无罪”，并运用墙报的方式提出批评。毛泽东称之为“引蛇出洞”。

毛泽东发表《反党八股》后，文艺界马上做出回应，《解放日报》在1942年3月左右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任研究员的王实味积极参加整风工作，在整风壁报上发表几篇短文批评“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罗迈，在1942年3月23日的壁报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文章主要批评罗的家长制，压制群众的作风。

很快报纸上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文章大量涌现。6月，中央研究院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10月份王实味被开除出党，打入“反党五人集团”。毛泽东以王实味为目标，开始批评王实味的作法。王实味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在转移途中被处决、抛尸荒野。

毛泽东等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很多年轻的知识女性受到中共联合抗日的感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党组织安排成为高官的妻子。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

王实味的同学王凡西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

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1942年10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作家萧军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为王实味说话，遭到其他红色作家的批判。

1942年5月，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文艺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提出文艺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及文艺统一战线问题，将文化整风运动推到高潮。毛泽东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1942年秋以后，毛泽东开始针对高级干部来作整风，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重组了权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接着1943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示要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尤其针对国际派的相关人物；在群众压力下终于使王明检讨认错，其后国际派相关的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也被迫认错。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毛泽东说整顿党的作风，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

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泽东说：“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不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

评注：中共用抗日救亡的名义吸引了全国各地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又在延安用整风运动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題。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

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整风运动中产生大量冤假错案，诸多人士尤其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有学者指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五四运动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精神被所谓“延安精神”取代。

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1943年后，“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1943年10月开始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在此阶段，该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中共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据该党文献该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其文献此会对于该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批评和结论。至此，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结束。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说，“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桥牌和扑克牌都很流行。毛泽东对扑克牌乐此不疲。有时，他和斯诺一晚又一晚地打扑克牌。斯诺说，毛泽东打牌时“很愿意赌胜负，但是对虚张声势并不在行”。毛泽东还经常打单人纸牌，而且玩起来常常连续几个小时。

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近乎失败的中国共产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组织军队到山西、华北、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快速扩大了军队与地盘，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做好充分准备。

第十六章 重庆陪都时期

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间，中华民国迁都重庆。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其中迁到重庆沙坪坝的有国立中央大学、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山东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控制了整个清华园。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时还开办了清华研究所。临大的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还有218名借读生；教师共148人，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1938年1月，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战争吃紧，决议搬迁至昆明，临大组织师生分三路到达昆明，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设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中有820名学生随校南迁，也有600多名学生退学、转学或参加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生分清华、北大、南开、联大四种学籍，合并前学生拥有原校学籍，合并后招生为联大学籍，其中清华学籍毕业生为723人。

评注：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抗战开始以后迁入重庆的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主流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随迁的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曹禺、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欧阳予倩、袁牧之等。官营电影机构在重庆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影片，宣传了抗战，鼓励了人民。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一边学医，一边旁听文科，因诗作《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北伐战争开始时，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蒋介石清党时，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狴的刽子手”。1927年12月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他逃亡日本，十年后至1937年撤销通缉令才回国。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即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1938年3月，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武昌起义，之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年后，郭沫若在武汉、重庆期间，已经恢复了党员的秘密身份，与周恩来在一个党小组中开会。1938年胡风指出当时的文化界“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周恩来认为郭沫若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党内决定：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郭沫若结过三次婚，第二位妻子是日本人。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同居。由于佐藤富子父母极力反对与郭沫若的关系，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这时，郭沫若与安娜生已经有了五个子女。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能灵活周旋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而分毫无损，确实是个人物。鲁迅讽刺他是“才子加流氓”。

1938年7月3日，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朱自清等共同创作《校歌》唱道：“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筋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还作词勉励同学们：“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和西南等地，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那就是逃亡。其中之悲惨境况，可想而知。抗战之初，蒋中正称“川省幅员广阔，地利富饶，人口众庶，习于勤苦，在天时地利人事上，皆为天然复兴根据地，实不愧为中国之首省。”但是随着战事持续，整整一个大后方，很多百姓吃饭都是问题。

1940年9月11日，蒋中正在实施粮食管理措施时说，“四川省最近有一种极不合理而必须改正的现象，就是粮食价格的高涨，这可以说是四川省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共同的耻辱，也是四川全体同胞所必须一致努力从速涤净的一个污点。大家都知道四川省去年前年都是丰收的，但自今年二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越出常理常轨以外，最近新穀已经登场，各产米区域的收成也大多在七八成以上，并不歉收，但米粮价仍然没有减低，且有继续上涨之势，这种畸形的变态，完全不是由于天然的缺乏，而是人为所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and 人心之恶，蒋中正也无能无力。他说，“最近有某某几县的乡村富户，储积粮食特多，因为新穀登场，才把前三四年积藏起来的穀子，开仓出售，那知道日久朽腐，已成废物，这是乡村人民对调查人员所口述的。这就可以见得各县乡村藏粮的丰富，而这种藏粮的富户，不但是贪利自私，更可证明为如何愚昧。”

他说，“现在我们全国正在艰苦抗战，前线将士如何流血牺牲，战地同胞如何壮烈奋斗，这种英勇的努力，都为保障我们国家和我们后方——四川等省的人民。我们处在后方的同胞，尤其是住居内地各乡镇的同胞，要想一想，我们中国有多少同胞在战地受尽敌人的压迫残戮，忍饥忍寒，流离痛苦，男女老幼没有能够幸免；要想一想，有多少城市，在敌人炮火飞机轰炸焚烧之下，艰苦撑持；要想一想，有多少抗战军人家属为国家与你们的利益，而贡献他们的家人到前线去流血奋斗；要想一想，更有多少生产工人在冒险犯难，整天流汗的为抗战而工作。”

1938年底，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在1938~1943年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218次。1939年至1941年，因日机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9570栋31481间，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1939年5月，海军航空队接手陆军任务使用九六式轰炸机执行任务。5月3日及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由汉口机场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日本盟友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指示由陆、海军联合实施空中作战，由陆、海军联合发动“101号作战”，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到1940年9月初的统计，当年日军对重庆实施72架次轰炸，共发动4445批机次攻击，投掷了3千吨以上的各型炸弹。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

进入1941年后，日军继续执行了“三光作战”。史料显示，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第10旅的旅团长河田健太郎发布的命令是：“把能干活的男人全部绑来，一头家畜、一粒粮食不留。然后要叫他们再不能活下去。把家具、锅盆、锄锹破坏干净。”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士兵菊池义郎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表示：“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破坏所有的家俱杂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驻一夜，这个村庄恐怕十年也恢复不起来。”例如1940年10月13日起，日军大规模地讨伐北岳区的冀西和晋东北，自南拒马河上游到阜平附近，先自北向南，然后再由东向西，平行前进。在易县毁房2200多间，在该县常峪沟一带屠杀民众800多人。

冈村宁次为了隔断八路军之间的联系，阻断八路军游走的空间，缩小八路军游击战的范围，开始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将一定区域划为无人区后，区内平民会被驱离或被杀死，区内所有建筑设施房屋等一律烧毁，所有粮食牲畜物资等全部被掠走或烧毁。进入1943年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耗费巨大，尽快将中国占领区变成稳固的殖民地，解决物资供给问题成为了在华日军的首要考虑。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化学部队被派往中国战场。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一部分。此外，关东军中还有一支以进行对苏化学战准备为目的之专门化学部队——516部队，设在齐齐哈尔市。731部队将“特别输送”之人员关押在秘密监狱里，进行鼠疫、伤寒、副伤

寒、霍乱、炭疽等几十种细菌实验，还进行冻伤、人血和马血互换、人体倒挂等实验，甚至进行活体解剖，并与化学部队共同进行毒气实验。

1939年，七三一部队首次在中蒙边界之诺门罕战斗中使用细菌武器；随着侵略战争之扩大，日本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之派遣军以及南方军中，都建立起名为“防疫给水部队”之细菌部队，先后对中国之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细菌战，造成大批平民死伤；仅湖南常德一地有实名记录之死亡人数就达7,463人。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此后慰安妇制度蔓延到日本在东亚的整个战场。1932年1月中国的上海事变以后，日本军队性侵犯中国妇女的事不断发生。日本开始在上海组建“慰安妇团”。随着战争之发展，日本军中患性病人数大增，严重影响战斗力。1937年12月在南京发生大规模强暴中国妇女事件后，日本军决定在华东地区也推行“慰安所”制度。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的有20万人或更多。

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印缅战场上遭受了盟军巨大压力，不断在支那方面军中抽调部队，所以1943年初开始，华北华中的日军部队质量下降。兵团建制缩小，新兵增多，平均年龄降低。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1944年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兵力紧张，不断从后方抽调兵力进入太平洋战场。中国派遣军的素质日益低下，人数也逐渐减少，对占领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

除了国民政府军的正面对抗外，与此同时，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本侵略者之“三光政策”。由于部分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共抗日根据地采用了全民皆兵的游击战，导致日军士兵不断阵亡且不能有效占领，未得从当地获得战争资源，却消耗资源且伤亡不断。

1938年1月1日《蒋中正日记》写道：“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1938年5月，蒋中正却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蒋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65架飞机，称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复，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不久，苏联派到中国之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高达3,665人。

1942年1月3日，美国宣布蒋为同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蒋中正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1942年1月4日《蒋中正日记》写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谓战无不利，攻无不克，而独在长沙之

役受到最大惨败，于是英美政府及其舆论，方知日寇之强，乃反应我国之不弱，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非若期预想之易也！”

2月4日，蒋中正偕宋美龄，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前英大使卡尔由重庆飞往印度访问。2月18日，蒋偕宋美龄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甘地会晤，谈话5小时，蒋“希望印度国民大会改变主张，作参战的决定”。

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节节败退之时，蒋中正看到胜利的曙光已经不远了，此时的中共却因共产国际联盟的解体，而对前途忧心忡忡。

1943年7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蒋中正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

7月23日，蒋介石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国民党的对共政策。在这份《劝告中共党员书》中，蒋介石强调对共产党员“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决意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蒋又批判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出“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蒋介石还决定要进攻延安。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1943年9月，轴心国领导国、三国同盟之一的意大利王国向盟军投降，欧洲战事被盟军逆转。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会议加强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国际地位，并决定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之基本方案，蒋得到美国支持，取得外交

成功。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 1895 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评注：1935 年至 1939 年，史迪威第三度赴华履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因职责所需首度直接接触蒋中正，在华其间曾与左派人士交好，也影响后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本身的政治倾向与对国民政府采不信任之态度。

史迪威于 1939 年起任职美军第 2 步兵师副司令，1940 年起改在加州组建训练第 7 步兵师，本来的计划是投入盟军在北非的行动。然而在美日开战后，中国和美国成为盟友，故罗斯福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安排一位高级军官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他听取了马歇尔的建议，不顾史迪威本人反对，将其派至中国担任中缅印战区美方指挥官（中方指挥官是何应钦），军衔为准将。史迪威本人有三重身份：除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外，他亦要担任英军缅甸战场副司令（正职是蒙巴顿），以及蒋中正的军事参谋。

史迪威由于撤下戴安澜率领的第 200 师独自撤退，导致中国军队重大伤亡，故蒋中正对此耿耿于怀，而史迪威又严格控制驼峰航线运输量，蒋中正已大为光火，但顾及中美同盟关系，他最初并不直接与史迪威对峙，而是通过要求马歇尔和罗斯福“重新评估”史迪威的能力，以及截留史迪威的命令，来削弱其权力。

由于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最终发展成势成水火，罗斯福权衡下在 1944 年 10 月 18 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

后来解密由史迪威与戴维斯拟订的作战计划发现，史迪威要与中共合作而毁掉蒋中正的阴谋：“当美军于东南沿海登陆时应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占领沪宁地区，并以欧洲战场缴获之德军武器大量装备共军，此一方案在完成前不应让蒋中正知悉。其后应视此一共产政权为享有主权之唯一政府，并把蒋中正的政府排斥在外。”

1943 年 12 月 11 日史迪威回到昆明，暗示其副手窦恩将军：“老大以他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和蒋中正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就一劳永逸除掉他。”其后窦恩将军和两名美国军官计划，利用蒋中正搭机到蓝伽视察，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蒋中正，协助他跳机，令其意外死亡。”

1946 年 10 月 12 日史迪威因胃癌在旧金山病逝，他死前曾表示：此生不能与朱德并肩作战为憾。

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

4月5月间，日军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独山距重庆仅400公里，重庆危急。蒋中正任命总参谋长何应钦与陈诚亲自率军前往贵州。

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

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

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日军此战主要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牺牲，未告知国民政府赋予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特权、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

1945年6月3日，蒋在重庆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详谈东北问题，并明白表示中国之态度，“务须达成我抗日目的，即求得东北领土与行政之完整”。8月7日，苏联对日宣战，近75万红军涌入中国东北。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事实上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苏军分为

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

1945年7月26日，蒋中正（未被邀请与会）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

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

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作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中共将领投降。

朱德发布命令的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内容为：“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

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接着，在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帮助下，蒋中正把长期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之国军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资产。苏联把在东北地区缴获的原日本军轻兵器及部分战略物资，转移给由林彪率领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及中原部分地区，国共双方的军队竞相展开城市管辖权与战略物资的接收。双方在部分地区发生零星的冲突。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上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要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

8月1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已经发表评论说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并说：“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但是西方国家只承认蒋中正代表的民国政府。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

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中国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台湾已经光复。

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蒋介石看到“八年以来，我沦陷的同胞，或流离转徙于异乡，或颠顿病困于穷途，亟待救济；尤其是残臂断股的战士，和孤儿寡妇的遗族，未尚抚恤”。他说，“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

评注：在战争结束之际，蒋介石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日本在中国战区滞留了总数在200万以上的军队和日侨。中国政府除了将冈村宁次等200余战犯尽数无罪释放外，还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据统计，共有2711951人被遣返，其中军人有1231251人，平民1480700人。在遣返过程中，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这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国民政府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安排。

据估计，三个月内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为了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国民政府方面拨出了80%的船舶和70%—80%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都受到了影响。

1945年8月15日上午，在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投降前一小时，蒋中正在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发表演说称：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黠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后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

蒋经国10月31日日记亦写道：“吾人虽恨日本侵略，但对日本一般平民，应以人道待之”。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三次电邀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产党方面于23日决定由毛泽东率团前往参加谈判。

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关于谈判的通知，其中介绍了共产党当时谈判的筹码。毛泽东写道：“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

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8月29日，重庆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举行多日会谈，达成了多项共识。重庆会谈期间，蒋中正和毛泽东仅以主客身份相礼待，双方并未参加实质性会谈，具体谈判在周恩来和王世杰之间进行。

会议召开前，双方公开表示在谈判期间实行停火，但实际上为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双方军队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在谈判期间从未中断。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说：“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80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8月28日，《蒋中正日记》蒋自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经过43天的时间，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内容主要包括：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一切争端。长期合作，以和平、民主和团结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及其他问题进行商讨后再作决定，制定新宪法。国民政府解散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中国共产党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国民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会谈后，毛泽东回延安发表讲话说：“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

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

评注：这是蒋中正和毛泽东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刚刚成立时，蒋中正是校长，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那时，双方只是打个照面，并无谈话。蒋中正评价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阴阳怪气，绵里藏针”。

重庆谈判前，蒋在阅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评价：“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谈判后，蒋在和陈布雷谈话时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时，与蒋中正又见了一面。蒋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向蒋谈起土地革命。蒋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再次劝告毛，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对毛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1945年10月11日，蒋中正在告别毛泽东后，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毛泽东又是如何评价蒋中正的呢？毛泽东临行前在新华社的一篇社论中说，“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

经学者考证，蒋家和毛家有亲缘关系，本是一亲家。蒋中正原配，蒋经国之母毛福梅实与毛泽东同出一族，而按辈分算，蒋中正是毛泽东的“姐夫”或“姑丈”，与毛同辈或大一辈。

在重庆期间，蒋中正和毛泽东面对面会谈 8 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为 8 月 29 日、9 月 2 日、9 月 4 日、9 月 12 日、9 月 17 日、10 月 9 日、10 月 10 日、10 月 11 日。

引述：8 月 29 日，毛方记：“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1)所有问题整个解决；(2)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3)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蒋方记：“七时（下午），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普通应酬也。”“考虑与中共谈判方针，公自记曰：(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回访毛泽东于莲屋，与谈约一小时而别。公自记曰：‘普通应酬也’。”

9 月 2 日，毛方记：“晚八时半，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蒋方记：“晚宴毛泽东后，并与之单独谈话。”蒋又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

9 月 4 日，毛方记：“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商谈”、“同日，蒋介石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方记：“约见共党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其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

9 月 12 日，毛方记：“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以至诚

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

9月17日，毛方记：“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

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谈话，并摄影。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毛与周恩来、王若飞研究谈判新方案，表示对国方之让步，于9月19日向国方代表提出，要点是：“(1)国、共军队的比例为六与一之比。(2)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撤退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共军，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所有共军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3)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共方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10月17日，毛说：“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9月21日，谈判陷于僵局，休会5天，赫尔利找毛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说还要讨论。

10月9日，毛方记：“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蒋方记：“毛泽东来辞行。公自记经过及所感曰：‘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

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

其后，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后进行4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10月12日公布之。

10月11日，毛方记：“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蒋方记：“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后，……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毛回到延安当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报告重庆谈判之经过说：“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将近有一年半时间，由美国居中调解，调解失败；从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党、青年党等居中调解，调解也失败。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毛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毛说：“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

10月10日，毛方记：“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宿林园。”蒋方记：“翌（十）日午，亲至其寓所话别时。毛忽要求准彼于当晚来宿林园。公料知其必另生枝节，但仍表示欢迎之意，略谈辞出。当晚九时许，毛果来宿林园，又与

谈约半小时”、“昨夜（十）毛共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

10月12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党委之指示说：“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重庆会谈失败，蒋中正表现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之后又发生变化，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中共的方针，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毛泽东从人格上贬斥蒋介石道：“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毛泽东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1946年1月1日，蒋中正发布《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说，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开国纪念日，是我们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我们自从九一八以后这十四年间，都是在黑暗耻辱的环境下度此令节，七七抗战以后八年之间更在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度此令节；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日本业已投降，积年国耻已湔雪，我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应该都可以仰首伸眉，稍纾喘息，来庆祝这一个岁首良辰，我们每一个同胞，当然是格外的欢愉，格外的欣奋。但是我们国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攘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而革命抗战期中军民先烈的在天之灵，亦不能得到安慰。

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与民盟、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国纲领下，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但实际上双方冲突未有结束，最终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内战。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举行盛大的谒陵大典。上午八点四十五分，蒋介石夫妇抵达中山陵，蒋介石身着五星上将军服并佩戴五枚勋章，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挽着夫人宋美龄，出席典礼。蒋介石在讲话中说，“今天是我们国父二十五年前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纪念日，而我们国民政府亦于今日还都南京了。我们对日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浴血牺牲、历久弥坚，卒能获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

第十七章 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国军与共产党部队冲突加剧，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是投降日军接收，共产党部队与国军的合并，共产党战后的参政议政等问题。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接受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采访时被问到：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回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记者又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如何？毛泽东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提出的民众民治民意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同志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5年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分将于10月下旬撤出东北，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

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后，报告东北的情形是“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11月，根据中苏协议，国军进入东北接管，但受到苏联阻挠。辗转登陆后，在山海关遇到中国共产党阻击，东北爆发内战。

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

苏联一贯来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苏联红军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宪政形式，主张容纳共产党，援助少而责难多。由于苏联和美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干预东北，导致国民政府只接收了东北的城市，而允许共产党和八路军接管农村。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了共产党方面力量。

蒋介石在 11 月 7 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

12 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 1946 年 2 月。

评注：1945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给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称，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毛泽东说：“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又说，“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同月，中共热河省委颁发的《发动群众的指示》。这个指示指出：发动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应当通过这一运动，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组织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并准备在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后转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发动工人，使工人在清算汉奸、特务的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发动上党战役，意在打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增加共产党的谈判筹码。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之一阎锡山所属的晋绥军 11 个师的部队。

1945 年 8 月中旬抗战胜利，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开往上党地区接受日伪军投降。史泽波率第十九军在上党地区共收编伪军 3000 余人后，率军部及 3 个师驻守长治，其余部队和地方部队守卫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等县，企图依托长治周围这六个据点占领整个晋东南。

8 月 11 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的太行八路军部队主力集结，一边对本区周围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部武器；一边加强对阎军的进攻准备。为了集中兵力，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分散在各分区的主力团编为全局机动作战的四个野战纵队，共方参战兵力为 31,500 人，另外参战民兵和自卫队达五万人以上。

8 月 25 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从祁县子洪口一带返回上党。同日，八路军从日伪军手里收复武乡县城。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8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军委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8 月 30 日，阎锡山抵达太原，立即与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协商，由第一军命令山西各地的日军就地待命，不准向八路军缴械，等候阎军接收。

9 月 1 日午夜，八路军太行纵队及西北民主联军第 17 师向襄垣城发起总攻，激战 4 小时，夺取了襄垣县城，击毙国军 350 人。9 月 10 日，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出动太行、太岳、冀南 3 个纵队全面投入交战。9 月 12 日，共军攻克屯留。

刘、邓转而采取分兵加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截至 9 月 20 日，八路军攻克 4 座县城，歼灭 6100 余人，自身伤亡 2 千人。

评注：1940 年底，邓小平与刘伯承率 129 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后，转战太行山和大别山之间开辟根据地。1942 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成为北方局书记，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

邓小平在 1943 年 7 月 2 日《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说：“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邓小平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毛泽东要求根据地通过“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打破敌人封锁“，提出“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邓小平报告大别山根据地的情况时说：“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

邓小平是很崇拜毛泽东的。他在《我的自述》中讲到，“大约在 1943 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194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1945 年 8 月，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7 年，邓小平汇报大别山根据地时表示：“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国共内战期间，刘邓大军在太行山和大别山战场，与国民党军争夺中原地盘。大别山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又处于国淮河、长江、汉江三大水系中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伯承和邓小平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对不到 400 公里外的南京构成严重威胁。

10 月 2 日，伏击的八路军主力与彭毓斌部援军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一线开始发生接触。彭毓斌部援军经过几昼夜战斗，被歼一部，余部步

步收缩，猬集于磨盘垴、老爷山、关上地区，范围越来越小。经遭几次歼灭性打击，缺粮断水，饥饿疲惫，伤亡惨重，指挥军官之间互相埋怨，军心动摇。

10月12日战役结束，晋军共3.5万人被歼，损失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各种枪1.6万余支，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自戕战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10余名师长副师长以下3.1万人被俘。上党战役中被歼灭的阎锡山部队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对于阎部是沉重打击。

八路军伤亡约4千人。对于中共，这次战斗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使其在重庆谈判中占有了更有利的局面。从此，中共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日益巩固，成为后来中共解放全国的重要基地。

上党战役接近尾声但还没有完全结束时，晋冀鲁豫八路军主力大部分在晋东南，一时难以立刻赶到邯郸一带。刘伯承、邓小平在上党战役时特意将原在邯郸附近的冀鲁豫纵队留在那里，监视平汉铁路北段国军，担负阻击任务。10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兵力分散，到处无力。”

10月中旬，国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下属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共7个师4万余人组成的第一梯队，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新乡出发，沿着平汉线向东北移动；第32军及收编的原伪军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孙殿英部作为第二梯队尾随第一梯队继续跟进。国军按计划将进入邯郸、石家庄，以恢复国民政府统治。但高树勋与中央嫡系矛盾极为尖锐。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

10月20日，国军先头部队抵达漳河附近的岳镇、丰乐镇一线，在此遭到了晋冀鲁豫军区的攻击。10月22日，国军主力开始渡过漳河，沿着铁路东侧开始交替掩护向前行进，中共令第1纵队主力到达邯郸以南阻止国军进入邯郸。

10月24日，国共双方在沿平汉铁路东侧马头镇、磁县之间的地区展开激烈的拉锯战。10月26日，国军从石家庄、安阳向被围军队进行增援。共军一面加速对被围国军的攻击和骚扰，一面调遣部队骚扰拖延国军增援部队的速度。

10月28日，共军后续部队全部到齐，遂于黄昏时向被围国军发起总攻，同时派遣李达赴国军新八军军部，敦促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战至10月30日，国军第四十军第106师大部被歼灭，而第三十军也遭到重大打击。

战役结束后，国军除新编第八军万余人投降之外，共损失三千余人，1.7万余人被俘，包括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

11月11日，邓小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概括地指出：“上党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平汉战役现在至少可以说第一阶段已取得了胜利，这都是歼灭战，而且平汉线上高树勋的起义，还是政治上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于前后方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取得的。”

1945年9月，国民革命军陆续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调遣军队进入中共的“解放区”，但中共不允许国军进入解放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侵犯；同时，中共军队也在积极的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以扩大解放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驻绥远西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的伪军共六万余人，进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已被八路军光复的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县城，企图夺占张家口，控制平绥铁路。八路军为打破国军对察哈尔省根据地的东西夹击态势，1945年10月18日由聂荣臻、贺龙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主力部队，发动绥远战役。

八路军攻克凉城、陶林、集宁等地后，割断了绥远、山西的交通联系；围攻归绥、包头两城未克，于12月中旬结束战役，历时56天共歼灭国军一万二千余人。为纪念贺龙解放卓资山的战斗，并因该地具有龙山之险，划定命名卓资山地区为龙胜县，以便于行政管理。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边打边谈，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

评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中共的报纸在国统区包括重庆大量发行，国民政府从未禁止。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

在国统区，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

刘斐历任第五战区参谋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本部次长等要职。根据蒋介石日记考证，刘斐在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时，在日军进行淞沪会战金山卫登陆作战

时，刻意提供错误情报给国民政府，使得日军顺利登陆，造成国军巨大伤亡。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称刘斐在 1930 年已加入共产党。

1938 年 5 月初，胡宗南对熊向晖爱护有加，送他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熊向晖成为黄埔第十五期生，熊向晖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从学校学习期满，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胡宗南下达命令也都由熊向晖起草。但熊向晖将所有内容一概记下，将它偷偷送到毛泽东、周恩来手中。1943 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以 50 万军队闪击仅有中共 359 旅驻守的延安，经熊向晖的泄密，共产党通知驻重庆的董必武向舆论界泄露了蒋的命令，闪击延安计划未遂。

郭汝瑰历任国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军务部军务署长、国防部第五厅和第三厅厅长、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七十二军军长、叙泸警备司令、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等重要军职，在抗战时受到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 4 位军事巨头赏识。1928 年 5 月，郭汝瑰在綦江任营长期间，由少校团副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 5 月和 1946 年 3 月，郭汝瑰两次秘密会见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除了提供有关国民党方面作战指挥调度的最高级情报之外，还要求赴延安，并要求恢复中共党籍。董必武对他说，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需要经过考验才行，并动员他留在国民政府内，为中共提供情报。郭汝瑰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 年 3 月 19 日，400 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

此外，还有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部参议刘仲华、卫立煌少校秘书赵荣声、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葛佩琦、新编第十一旅副团长牛化东等，都是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间谍行为的人物。

评注：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这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蒋介石在戴笠的告别式中，声泪俱下，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周恩来表示：“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 1897 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年轻时就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北伐战争开始后，就被派遣离校赴南京收集情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32 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特务情报组，由戴笠领导。1938 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

1934 年 6 月 13 日，戴笠破获了日本方面自导自演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使日本出兵阴谋在国际间颜面无存。为了战胜日本，美国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被共产党深恶痛绝。抗日战争中军统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之多，而当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人。

戴笠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磨灭的贡献。戴笠死后，章士钊题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为尽快停战，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商谈停战令。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地区归属问题争执一番后，国府做出让步，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946 年 1 月 10 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 1 月 5 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 1 月 13 日 24 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2 月 1 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2 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

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 12 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 60 个师的目标。

1946 年 3 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 月 27 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

4 月 6 日苏联撤军后，中共军队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于中共军队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 4 月 8 日占领长春，导致双方在长春干线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5 月 10 日，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政府在军事上有确切而严重的弱点，共军则占战略之军事优势；且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国人士亦渴望和平。……余谨提供此一意见；即某种妥协，必须获得；且应迅速获得。否则，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及经济上，将陷于混乱之状况。”

林彪部主力 30 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国军杜聿明部迫于情形，自 5 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5 月 3 日，国军克复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 月 19 日克复四平街。5 月 22 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

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5 月 23 日，国军克复长春，5 月 28 日克复吉林，6 月 5 日直逼哈尔滨。6 月 6 日，蒋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六月停战令前后，山东和中原地区再度爆发冲突，中国共产党将此视为全面内战起始点。

评注：1946 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 1947 年 5 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

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 1947 年 10 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1947 年 5 月 30 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

此外，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 1945 年底为 9 亿美元，1946 年 5 月降为 6 亿美元，1946 年底

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

中共宣传号召打倒蒋介石。国统区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马歇尔压力下，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从6月5日起，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解放军必须退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四）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11月，蒋颁布第三次全面停战令。

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

蒋中正对此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过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

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法草案修改提案引起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应。重庆与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内，“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到1948年1月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李济琛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反对国民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此时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方式爆发。

同时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总结国共内战以来的情况时说：“三个月战争，使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了。同时，国民党恢复征兵征实，引起人民不满，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在

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国民党应美国特使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解决两党争端。中共认为国民党没有诚意，国共谈判破裂。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蒋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参谋总长陈诚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6月底，国民政府放弃谈判政策，开始全面军事对抗中国共产党。

1947年3月至9月，中共军队处于守势，宁可丧失关内所有根据地，也要死守东北。

评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7年9月14日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

1939年6月1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约翰逊，促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事作严正表示。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指责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及轰炸中国各地。

1941年后美国与日本谈判，希望促使中日议和，蒋中正电告美国政府不得牺牲中国以谋求对日妥协，要日本从中国撤兵及归还侵占中国之土地。美国政府随后停止对日本供应战略物资，并要日本只承认蒋中正领导之国民政府，无条件退出全部中国领土。

1941年8月26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派遣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以实现《军火租借法案》之目的，该团由马格鲁德为团长，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导下执行任。

1941年11月26日，宋子文偕驻美大使胡适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谈中美关系问题。1942年1月4日，蒋介石电在华盛顿之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信赖之高级将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统师部参谋长，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史迪威担任此职。中国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年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

1943年1月11日于华盛顿签订《中美平等新约》，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两文效力相同。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是中国民主化之希望所在。虽然中国推行训政与美式民主差距很大，但由于同为同盟国盟友，当时美国政府、国会、一般民众对于中国颇有好感；此时，中国抵御日本获列强正视与钦佩，国际地位提升。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实行民主宪政；马歇尔奉派来华调解国共问题。

1946年7月，美国派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在庐山呈递国书。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继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共产党破坏和平商谈，申明对华政策不变。

1947年4月8日，驻北平美军总部吉伦中将及最后一批官兵369人，上午9时离开北平赴塘沽，换乘威格尔将军号离华返美；驻北平美军总部宣告结束。

1948年1月3日于南京签定《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其中最特别是美方代表司徒雷登以中文签名。2月，美国国会通过合并援外法案，援华总额4亿6千3百万美元。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阶段》，书中表示，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中华民国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严重打击了中华民国政府战斗的士气。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全国人口4.61亿，被官府登记的选民极多，实际投票者甚少。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蒋中正对与会代表说，我们民主宪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自从抗战胜利，我们就努力于复原和建设，而共匪则到处破坏，到处阻挠，我们同时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宪的工作，而共匪则始而牵制，继而据绝，终至公开叛乱。到了去年我们颁布宪法以后，共匪更认为中国一旦实行了民主宪政，他就无法实行其出卖国家危害民族的所谓阶级专政，于是他悍然反对宪法，反对行宪的国民大会，他甘心作民主的敌人，作国家的敌人，而展开更为疯狂的武装叛变，更凶残的屠戮毁灭。

蒋中正在就职演讲中说：“实行宪政是中华民国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经历无数的牺牲困难和挫折，才能完成今日实施宪政的程序，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多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我们必须珍护这一艰难创造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责任。行宪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人民的福利，如果国家不能因行宪而达到统一、独立、繁荣，人民不能因行宪而得到幸福和进步，则行宪将失其意义。”

蒋中正说，“中正今天就职，正值国内叛乱未平，经济动荡的时候，也正在世界和平还未确奠的时候，内省职责，外察环境，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

评注：1948年3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选举正、副总统。蒋介石有意让孙科当选副总统，但李宗仁最后胜出。

苦心经营广西大本营的李宗仁，在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会战中名震一时。

李宗仁自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全军禁烟禁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李宗仁与蒋中正之间产生诸多分歧。李宗仁力谋与中共和平谈判，蒋说他是投降派。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之国共“隔江分治”，蒋中正更是不答应。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会见李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当选翌日，我偕内子郭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遗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西装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熟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这是国民

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仍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

停战谈判中断，国民政府并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内战。蒋中正在美国支持下，调动160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面对蒋全面进攻战略，毛泽东以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之积极防御战略，指示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万中原解放军。蒋中正意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攻占江苏、安徽，再攻华北，“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7月，国军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粟裕、谭震林指挥19个团3万余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灭国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

8月，解放军贺龙部开始围攻大同。9月14日，傅作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克复集宁，解大同之围。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中国共产党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收复。

四个月来，国军占领105座城市，却损失32个旅，约30万人兵力。

1947年1月，国军进指陈毅部于鲁南，由徐州绥靖主任薛岳指挥。初战，国军马励武、周敏英两军于枣庄、峄县地区，为解放军所败，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陈诚亲赴徐州指挥，激战半月，临沂遂告克服，陈毅佯败，弃守临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陈毅部反于莱芜区，将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围解决。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5月17日攻占怀德，5月21日攻占公主屯，孤立永吉、长春、四平街。

经过近8个月作战，国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解放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共军共歼灭国军56个整旅（师），迫使国军放弃全面进攻之计划，于1947年上半年将进攻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

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共军调动5,000兵力，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入延安。国军称毙伤共军1万6千余人，俘虏共军1万余人。

4月初，国军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打通，把共军陈毅部包围于沂蒙山区，但一个月后，据新华社统计，国军被解放军折损10个半旅，丢掉县城48座。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全歼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3.3万人。

5月起，共军徐向前、彭德怀等部开始围攻太原阎锡山部。6月6日，共军攻陷热河赤峰后，开始进攻辽宁沈阳。

战争第一年，共军歼灭国军112万人。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给彭德怀、贺龙的西北野战军的电报中说：“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1)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蒋中正丢城失地，损兵折将，被迫全面整训，改变战术，准备最后决战。1948年1月和8月，蒋先后采取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

评注：毛泽东自称曾17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资治通鉴》几百万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常人通读一遍大概需要好几年。毛泽东对此书确是用力甚大，而且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批词，圈圈画画，把书翻得破破烂烂，还有到处粘贴的胶带。

在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主席第一次阅读了《资治通鉴》；那时他不一定能读得懂，但却与之结了一辈子得缘分。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始终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不但是如此说，亦是如此实践的，并从《资治通鉴》里获益无量。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说话。”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箝制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战略进攻方针。

毛泽东指出，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海军、空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二十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

毛泽东分析蒋中正的兵力：“敌军分布，到今年八月底止，连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都算在内，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七十个旅，国民党后方二十一个旅，全国总数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实际人数约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警察、保安部队等约一百二十万人；敌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约一百万人。敌全军共约三百七十万人。”

毛泽东提出解放军军第二年（1948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展开主动攻势，在东北将国军压缩至几个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区则拥有优势地位，对首都南京所在的华中地区形成压迫，国共双方的武力优势逐渐反转。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解放军在东北，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在山东、河南、陕西各区，都陆续举行反攻。

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主要负责人1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分析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之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之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总结军队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准备在新形势下夺取胜利。

1948年，为国军处境险恶之一年。从本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陷于被动。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同时命令各省设保安司令部，确保各省治安。

3月间，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卫等，全为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两部攻占。国军亦于撤退途中，损失甚重，从此渭河以北地区，无力控制。5月，渤海胶东鲁中三个战场，解放军把它连成一片，济南完全陷于孤立。

6月26日，开封复被国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所收复，追剿陈毅部于黄泛区，激战十余日，解放军伤亡近8万人，乃向陇海铁路以北退却。为统一华中各省军事，6月底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命白崇禧为总司令。

7月，山东兖州为解放军攻陷。刘伯承于攻克开封后，旋即率部进袭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鄂西北尽攻陷。至此国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前苏联情报机构将军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说，苏联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德国分裂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反共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的援助力度。

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52万人，并攻克大批国军重点设防城市，为与国军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蒋中正于1948年8月上旬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编组训练。

1948年夏季，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役和兖州战役后，夺取了济南以南的铁路，济南陷于孤立。8月开始，国军被迫采取重点防御，以第二绥靖区11万余部队守备要地济南，并准备以徐州地区的3个主力兵团约17万余人随时北上增援。

9月16日，陈毅、粟裕等部，围攻济南。共军调动整个华东野战军炮兵10个团，各类火炮500余门，在火力上压倒国军，甚至有坦克大队也调到了前线。正当战事发展至高潮时，国军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在城外叛变。至25日城陷，济南国军所部10余万人全部解甲，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

战前，蒋介石亲往济南当面告诫王耀武济南必须固守。而王耀武临阵乱了阵脚，两次飞赴南京，要求撤出济南，遭蒋介石斥责，蒋认为济南必须守住。

美联社1948年9月25日南京电称：“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据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以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陈诚说：“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一失，整个

山东就全成了一块死棋，而打通津浦，连贯南北，遂全然绝望。”济南此战，解放军伤亡 27,000 余人。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1948 年秋季，解放军在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方向发动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并取得全部三场战役的胜利。

评注：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与同盟国各国于停靠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签署日本《降伏文书》，9 月 5 日中午，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即率首批八路军约 2,000 人乘专列抵达沈阳火车站，虽然遭到苏联红军的阻拦，但在沈阳城外“苏家屯军火库”收缴了首批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

同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又从各地投降的日伪军手中，和长春、锦州及辽阳的日军军火库收缴了大批日本关东军武器，苏军并未干涉。

3 月，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日军枪 3 万余支，至 6 月中共在东北共获得各种日式火炮约 700 门。6 至 7 月，驻朝苏军又以货易货方式，交换日军火炮、坦克等武器。

中共因此建立了中共第一支独立建制的炮兵部队和第一支装甲部队，由朱瑞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

1946 年 3 月中旬苏联开始撤军，苏军未举办交接仪式，低调一走了之。周恩来希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指示中共军队不要占领沈阳，但要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 月 27 日，由周恩来、张治中、吉伦军事三人组，进一步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

4 月 1 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政治报告，宣布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无效。自 4 月 1 日起，双方集中兵力在本溪、四平两处展开战斗。5 月 19 日国军占领四平。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4 月 14 日苏联于长春撤军后一个半小时，解放军对长春发动攻势，并在 4 月 18 日攻克长春。4 月 22 日苏军撤出齐齐哈尔，解放军 24 日占领齐齐哈尔。4 月 25 日苏军撤出哈尔滨，解放军 28 日占领哈尔滨。

7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通过《七七决议》，号召干部下乡，巩固农村根据地。

1947 年至 1948 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中国主权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

毛泽东说：“在重庆，柳亚子老先生向我要诗，我写了这首《沁园春·雪》给他，他竟拿去报上发表了，闹得许多人都晓得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原联军总部机关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

1948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部连续在东北发动七次攻势，2月7日攻占辽阳，2月26日攻占营口，3月14日攻占四平街，3月19日攻占永吉，国军集中兵力坚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补给全赖空运接济，因运输量有限，三地食粮燃料奇缺，长春每日饿毙者不下百人。

至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编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共54个师约70万人，加上地方军区武装，合计103万余人。

蒋介石用卫立煌替代陈诚指挥东北地区国军战事，任东北剿总总司令。1948年8月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精神训话，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之后部署东北剿总布防4个兵团约55万人；总司令卫立煌率30万人防守沈阳，副司令郑洞国率10万人防守长春，副司令范汉杰率15万人防守锦州。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南下，向北宁铁路锦州至昌黎段进攻，辽沈战役开始。至28日，解放军攻占绥中，切断锦州至秦皇岛间北宁线，关闭国军由关内至关外的陆上通道。

10月1日，占据前所城的新五军第26师第78团被歼。至此，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连续作战，歼灭国军20,000余人，完成对锦州的包围。

10月2日，林彪在列车上收到国军增援的消息后，一度产生犹豫，提出回师进攻长春，受到毛泽东批评。

10月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集结25万人扫清锦州所有外围据点包围锦州城，至13日，全部夺取锦州外围阵地。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15日晚占领锦州，此战东北野战军伤亡24,548人；歼灭守军国军第六兵团及所属第九十三军、新编第八军共10万余人，其中死伤1.9万人、被俘虏约8万人。10月15日，蒋介石派遣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事实上剥夺卫立煌的战场指挥权。

10月16日，廖耀湘与来视察的杜聿明达成共识，计划先占领黑山、大虎山，再立即向南撤往营口，或依托营口向北进攻锦州或海运回关内，卫立煌也同意第九兵团撤往营口。10月18日蒋飞临沈阳，指示东北作战计划，仍未能迅速挽回颓势。

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围攻第九兵团，林彪命令各部队以快制快、以乱制乱。在一次突然袭击中，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7师21团3营以无畏的勇气打掉了廖耀湘位于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造成整个兵团指挥中枢系统全部混乱，部队陷入瘫痪和崩溃的状态。10月26日，蒋介石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解放军攻克沈阳。卫立煌先期飞北平，部分国军突围撤至营口，经海运南下，东北尽失。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命令中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撤职查办。”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向中国东北的锦州、长春等地发起进攻，与国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卫立煌所属的主力部队进行了五十二天的作战，国军伤亡被俘共计47万2千余人，东北全境为中共所占，从而使解放军之优势显现，此战役称为辽沈战役，中华民国政府称作“辽西会战”。

辽沈战役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士气遭到重挫。此战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总兵力对比发生逆转。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表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评注：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5个多月，城内缺粮严重，国军军队士气低落，百姓饿死者数以万计，长春景象十分悲惨。

5月30日，林彪召集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并决定了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部署。6月1日，林彪签发“东总”电如下：

“五月三十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在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炮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勾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兵由炮司派归一、六纵指挥。（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团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在5月底机场失守后，国军长春守军粮食供应只能靠空投。据当时美联社分析，一天要出动四十架次飞机才能满足需要。由于空投飞机受到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射击，常常来不及空投就逃跑，或在高空乱投，不能投入城内。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到了夏天，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之居民不敢光明正大举炊，否则即会招来官兵和其他饥民抢粮，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由于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加上有人投机倒把，城内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解放军方面四野第一兵团政委肖华就下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负担。”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

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导：“（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1948年6月中旬，在城内有粮情况下，国民党军警宪特押解驱赶百姓出城。郑洞国的目标是驱赶20万百姓，想把20万人两个半月的口粮全部收归部队，供10万部队多食用5个月，从根本上使中共部队围困战流产。解放军立起封锁线不让民众离开，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

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节选：“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蒋介石评价林彪说：“当代韩信”。毛泽东这样点评林彪：“林彪这个娃娃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仅能打巧仗，还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

当时城内守军的一个共识是，“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孰胜”。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报导：“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战事导致市内万户萧疏，而郊外则是荒冢累累，白骨嶙嶙。

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刘伯承、陈毅、粟裕、邓小平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60万人，在淮河、海州一线附近与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所属的主力部队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所属的增援部队共80万人进行战略决战，以伤亡13万4千余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军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55万5千人。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控

制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粟裕在此战役中战功卓著，毛泽东评“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此战役称为淮海战役，历时 65 天，中华民国政府方面称作“徐蚌会战”。

经过两年作战，解放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 120 余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同国军总兵力对比从 1 比 3.4 变为 1 比 1.3。解放区面积扩大到 23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中国总面积 25%，人口 1 亿 6,800 万，占全中国总人口 35.3%，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农民群众生产空前积极。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于 9 月 24 日晨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举行淮海战役之建议。10 月 11 日制定《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之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打成一片；然后，华野分为两个兵团，以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在中原作战。

1948 年 9 月下旬，山东省城济南失守，成为双方优劣态势转变的分水岭。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飞返南京，拟定“徐蚌会战计划”，决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方面，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所有陇海铁路上次要城市，一律放弃。

在郭汝瑰影响下，蒋屡次变更作战方案。邱清泉在徐州花园饭店参加会议，说这个部署将重蹈项羽当年在垓下的覆辙。白崇禧发现徐州剿总早已把国军主力几个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及津浦铁路线上，各一字排开，徐州平原无险可据，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权。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于是以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实施在蚌埠集结决战之计划。

10 月 22 日，郑州失守后，国军就察觉在鲁中的华野和在豫西的中野有南下、东移动向，徐州首当其冲。蒋介石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并且批准了国防部在 10 月 29 日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作战计划。但此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担心辽沈战败再加徐州撤退会影响人心，导致政局不稳，因而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1948 年 11 月 4 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同一天，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定于 11 月 8 日发动进攻。蒋中正曾计划将郟城以西之董口黄河堤掘开，造成鲁西泛滥，5 日徐州军事会议后暂停了方案。

11 月 6 日，国军调动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 12 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东援，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 70 万人。

11月6日凌晨，解放军便发动淮海战役，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措手不及。华野很快攻占枣庄、临城、贾汪、台儿庄地区。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的第二绥靖区所属两个军部、三个半师，共2万3千余人，投向共军。原驻徐州东北枣庄、台儿庄地区之第二绥靖区所属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投向共军。

11月11日解放军主力迅速南下，占领徐州以东碾庄至曹八集一带地区，把原驻新安之黄百韬兵团隔绝包围。国军在蚌埠附近决战之计划，已经不能实施。

11月15日，蒋介石专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飞赴徐州督战，严促刘峙、杜聿明东进，以解黄兵团之围。

11月17日，王建安谭震林指挥各纵队按照第一步作战计划向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总攻，至18日全歼第一百军、第四十四军，黄兵团另外2个军遭到重大杀伤。

11月19日，王建安谭震林指挥各纵队向碾庄圩核心阵地总攻，20日晨攻克碾庄圩，全歼第七兵团部和第二十五军大部。

11月22日，战场情况变化明显；华东野战军主力在碾庄圩地区全歼黄百韬兵团。

碾庄攻克后，粟裕决定转移部队于南线会战，以歼灭李延年兵团。

11月24日15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覆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望粟（裕）陈（士榘）张（震）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11月28日，杜聿明奉召飞到南京，参加官邸会议，经过共同研商后，杜聿明为保持高度机密，又单独向最高统帅作报告请示，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西侧，经永城到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1月30日杜聿明放弃徐州，率徐州主力30万人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次日全部撤离徐州。

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逃之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华东野战军将突围之第十六兵团歼灭。12月6日，孙元良兵团主力被歼。

12月12日解放军全线发起总攻。蒋中正原来有计划在徐州使用化学武器，但最后掂量良心，放弃使用化学弹。据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称，国军存徐州化学炮弹未能先期毁灭，均被解放军虏获，转用以摧毁国军阵地。

12月17日，毛泽东写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12月26日，徐蚌战场被围困于陈官庄之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部，因连日大雪，飞机停止空投，接济断绝。

1月6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下午4时起，华东野战军以25个师分东、北、南3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河南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国军苦战到1月10日夜间，终于全线瓦解，结束战斗。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阵亡。杜聿明及其以下军、师长多人均被俘。是日，蒋介石日记写道：“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这时，华北国军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塘沽，歼灭杜聿明已不再影响华北战场之势态。

评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方面有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农民543万支援前线，河南在淮海战役期间有200多万民工支前，数量上仅次于山东。动员“民工共220余万人”；“运集粮食达4亿3千多万斤”。民工除修路运粮之外，还协助部队挖掘交错纵横之包围濠沟，使被围中之国军机械部队动弹不得，在战役中作用甚大。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扁担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在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总是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粟裕将军也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的炮弹。山东的小推车自不必说，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东北军工企业在1947-1950年4年时间里，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弹54万余发；药筒26万余个；自配M式野山加引信9.5万个，改产掷弹引信55.6万个，修理旧引信16.2万个；生产美式、日式底火60.9万个；雷管24万只，60迫击炮1430门；冲锋枪1563支；生产弹体钢3000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450吨。其中，除为辽沈战役提供百余吨炸药外，绝大部分通过大连经海路越过国军的封锁，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解放军军物资接送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浩浩荡荡推往华东前线。

解放军占领徐州后，民工以二十天把陇海、津浦线修好，做好了68座铁桥、228座涵洞、220余里铁路。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战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威逼利诱和种种谎言鼓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其作出牺牲。夺取政权后，又像对待畜生和垃圾一样将他们奴役或丢弃。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为此他们还将要付出百年惨痛的代价。

自古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已经证明，相比毛泽东，蒋中正于军事谋略略逊一筹。蒋中正常常表现出妇人之仁，而且有察人之过。蒋中正的身边充满了共产党的间谍和奸细，他却似觉非觉。蒋中正剿匪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更有甚者，面对共产党巨大而充满谎言的宣传攻势，蒋中正在宣传舆论方面鲜有作为，让共产党混淆视听，最终迷惑了大多数民众。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傅作义随即面临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11月8日，淮海战役打响，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随后淮海战局日益恶化，蒋中正才真正打起了让华北部队撤退的企划。

11月，傅作义所部60余万军队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6个军18个师守北平、5个军16个师守天津，1个军8个师守张家口，把12个军五十多万人的部队摆在东起滦县，西到柴沟堡长达五百公里的铁路沿线，组成一字长蛇阵。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主力80万人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入关内，与聂荣臻指挥的华北军区2个兵团共100余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方针将傅作义集团包围在华北地区。

中共还将150万东北和华北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了，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支前网络，保证了大清河水路和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畅行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哪里跳动着。

11月30日拂晓，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在杨成武司令员、李天焕副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向张家口外围守军发起攻击，先后占领左卫、柴沟堡、万全、郭磊庄、怀安、沙岭子地区，从东、南、西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毛泽东12月1日、2日连续电示华北三兵团，务必包围几部敌人，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

12月1日，张家口国军转入进攻。12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召集高级将领会议。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手中的王牌，只有抓住它，才能拖住整个傅系部队。12月8日，第四纵队政委王昭率第12旅在天寒地冻的野外构筑了3道阻击阵地，挡

住了三十五军向东的去路。傅作义任命安春山统一指挥第 104 军、第 16 军向康庄、怀来前进，接应 35 军突围。

12 月 10 日，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在泡儿庄一带歼灭了由康庄向北平逃跑的第十六军主力。

12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由遵化、蓟县集结地以最快的速度向北平、天津挺进。中路由东北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指挥，第 3 纵队攻克通县、廊坊、南苑机场，第 6 纵队攻占马驹桥、黄村，第 10 纵队攻占廊坊，切断了北平与天津的联系。右路由东北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指挥，第 4 纵队、第 5 纵队、第 11 纵队分别攻占南口、昌平、海淀、香山、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等地，从西面、北面包围了北平。

12 月 22 日晨 7 时，华北第二兵团 3 个纵队 6 万人对新保安发起总攻。经过 10 个小时的激战，当日 17 时结束战斗，全歼傅作义起家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 2 个师 1.6 万人，毙伤 3000 余人，俘 12600 余人，缴获火炮 164 门，枪支 5500 支，汽车 377 辆，电台 6 部。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戕。

12 月 23 日拂晓，张家口第 11 兵团向北仓皇突围。从 24 日早晨开始，解放军展开全面攻击，逐一分割围歼至 24 日上午 10 时基本结束。至 24 日下午 16 时完成搜索溃敌，除司令官孙兰峰和少数骑兵逃跑外，5.5 万全部就歼，俘虏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少将副军长杨维垣等将级军官 13 名以下共 50309 人。东野四纵共毙伤 1896 名，俘第 11 兵团中将参谋长王韶琴、少将师长韩天春、少将副旅长赵宗瑞以及张家口少将保安司令以下 36163 人。

战斗硝烟未散，部队还在打扫战场，12 月 24 日中午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要东野四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平郊，四纵即将全部缴获和俘虏交给华北部队，立即回师向北平进军。

1949 年 1 月 2 日起，各攻击部队 34 万人在天津周围集结。1 月 11 日，蒋介石决定至北平部队由空运撤至青岛，但阻碍甚大。1 月 14 日，解放军以第 1、2 纵队为西突击集团，第 7、8 纵队为东突击集团，第 9 纵队和第 12 纵队第 34 师为南集团发起总攻，第 6 纵队第 17 师为总预备队。12 时，攻城部队在炮兵和装甲兵配合下，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九个突破口。15 日 5 时，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上胜利会师，完成了对天津守军的拦腰斩断。经 29 小时激战，全歼守军第 62 军、第 86 军 2 个军 10 个师 13 万人，第 1 纵队第 1 师第 1 团攻占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据守塘沽的蒋系部队第 17 兵团部及第 87 军等部 5 个师共 5 万余人，于 1 月 17 日乘船南撤。

天津被攻陷后，傅作义和他的北平守军 25 万人已完全陷于绝境。从 1948 年 12 月中旬到 1949 年 1 月中旬，傅作义同中共进行了三次和谈。北平问题的和平解

决，傅作义将军立了大功，1955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傅作义将军一级解放勋章。从1月22日起，北平守军陆续以师为单位，开到城外听候改编。除少数学人事先由国府派飞机接运至南京外，国府官员多未能及时撤出，绝大多数北平市民实际上对共产党政权持观望态度。

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林彪、罗荣桓与聂荣臻等人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100万，包围了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主力部队之50余万国军，先后通过新保安、天津等战役，消灭了国军部分主力。

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全军覆没，除西北外，长江以北的地区几由共产党所控制。

第十八章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

1949年启始，蒋介石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指示以战求和之方针，应随时提高警觉，免被共产党所乘。是年初，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已非人力所能改变，加以政治情势迫促，为适应和谈要求，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惟其大势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国府所能接受。

1949年1月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蒋中正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付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蒋中正列为第一名战争罪犯。中共权威人士开列头等战犯名单，共计43人：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傅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勱。

毛泽东说：“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1948年12月25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毛泽东说，既然你们说“剿匪”、“戡乱”，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1949年1月1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

194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蒋中正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竟日，研究下野文告。美国政府对蒋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中国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下野。蒋在考虑下野时，也与少数亲信讨论法律问题，如何保留总统职位。蒋准备撤出大陆，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1月10日，命蒋经国赴上海转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政府库存黄金外汇密运台湾。

评注：战争打的是军事，更是经济。1949年中共财政收入达到粮食304亿斤，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千万美元。蒋中正已经把钱打光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一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到1949年2月，解放区2.7亿人口中，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1亿农民分得到大约3.75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

在广大解放区，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同时，土改意味着杀人。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低于人口百分之十。土改开始，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但悲剧远远还没有到来。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

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2月21日，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做出批评的同时，肯定了土改对战争的贡献。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

毛泽东说：“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

虽然中共杀了几十万人，毕竟大多数农民得到了土地，吃上了几顿饱饭。经过数千年的帝皇统治，尤其是满清的外族奴役，中国人早已变得自私、愚昧而不辨善恶了。奴性十足的农民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自家饭桌上的温饱。共产党对国民的德性已经摸得透透的。土地改革使得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引退，旋即发布引退谋和文告，下午蒋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蒋经国等随行；1月22日，蒋转返抵奉化溪口故里。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

2月11日，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密友戴季陶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1926年10月起，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蒋中正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为之哀诔以“痛失勋耆”。

评注：早在1947年10月0日，毛泽东就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攻势是非常凌厉的，各种极其煽动力的口号发布全中国，不断地给老百姓洗脑，让中国人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好，是真正为老百姓的。这是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

此时，毛泽东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宣称：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各项，就是本军的基本政策。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毛泽东是一个多产而高水平的写手。共产党把这些基本政策广而宣之，这一条条一道道，既打在蒋中正的国民政府心中，也打在亿万贫苦民众的心中，给全国各地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共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

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夺取全国胜利及其以后之基本政策。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

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从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指挥机关在西柏坡村驻扎了整整一年。

在这次会议以后，3月23日，中共中央就由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国共继续谈判。4月1日，张治中等飞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斥中国共产党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实。国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毛泽东说：“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蒋中正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

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总攻击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中共人民解放军随即于4月25日发布公告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与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华民国国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战役。

渡江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从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渡江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以伤亡6万余人为代价，歼灭国军11

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及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进军华东、向华南、西南地区奠定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决裂初期就开始经营重整江阴要塞，将之视为防卫首都南京最后防御线使用，但当时还无人认为共产党真能打到长江。直到国军在华北和东北战局失败后要塞开始大规模整军备战，各种防御工事绵密，还配备了德国购入的160毫米榴弹炮，在当时是国军最强火炮，整个要塞火力甚至超过一个集团军。

1949年1月，徐蚌会战战败后，国军主力部队丧失，总统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下野，中华民国政府一片混乱，军政要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唐秉煜趁乱在国防部办公室拿到长江沿线全部军力防御图，于农历年初二黄昏过江到达新港后转盐城，受到中共工委书记陈丕显、司令员管文蔚的接见并面交防御图。

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遂在荻港渡过长江南下。4月22日，解放军刘伯承部占领芜湖，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

4月25日，蒋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最后一次眺望。蒋父子离开溪口，乘车到下陈，至宁海团埂村，由象山乘竹筏驶至汽艇上太康号赴上海。4月27日，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这几年来，因为要想国家自由，民族独立之希望过切，所以用心过急，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

5月7日，蒋中正乘静江轮由上海启程至舟山，预作上海撤退国军停顿之安排；蒋旋即经澎湖飞台北。

4月24日，太原城破，国军巷战惨烈，负伤杀敌者有之，与楼共焚者有之。山西省代理主席梁敦厚率文武官员约450人集体自杀，于指挥部纵火自焚。4月底，解放军林彪部直趋武汉。5月4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杭州。

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12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国军江防阵地，国军撤守武汉。同日，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张轸率2万人起义。

5月16日，解放军四野第12兵团第四十军占领汉口，武汉国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撤走；同日夜，占领大冶、鄂城、阳新等城。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占领汉阳、武昌；同日，第12兵团第四十三军占领九江。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5月21日，解放军刘伯承部攻陷南昌。

共军攻占南京后，在江面宽阔的长江下游，国军仅余吴淞口一处门户。当时在上海市区中，拥有国府守军 25 万人、遍布市区内外的 3,000 个美式碉堡、4,000 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野战卫星工事及两万多颗地雷。驻沪的海军部队有第一舰队主力舰只、第一巡防舰队及长江各防区逃回来的舰艇，共有军舰 9 艘、战舰 11 艘，分布在白龙江口至宝山城一线的长江及黄浦江江面，主力驻扎则在吴淞口。

为了避免于市区内与国军作战以减少城市损失，上海战役一开始，第三野战军总指挥粟裕指挥下辖第九、第十兵团共 42 万人采用了双层钳形攻击的方法合围国军，第三野战军采取各种策略，将市区的守军调到了外围，从而逐步歼灭。

5 月 23 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24 日，第九兵团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国军渡江西撤。第二十七军占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进至苏州河以南市区边缘。第二十三军进至漕河泾、龙华地区。24 日晚，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路一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三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西渡黄浦江由高昌庙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各部队采取多路跃进、快速勇猛穿插及迂回包围等战术，直插市区各街道。26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部阵前倒戈。

27 日下午 3 时，第二十七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国军，占领上海。第十兵团第二十六军占领纪家港、沈家桥等地，并向绿杨桥、塘桥攻击前进。同日，汤恩伯等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国军第 75 军从高桥第 6 师抽调至吴淞，掩护撤退。残余国军主动向舟山、台湾方面撤退。

评注：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共军队培养出了铁的纪律，成为革命的铁军。毛泽东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在 1859 年 5 月 18 日的《致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苏联，列宁要创建的是一个有严格纪律、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1899 年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 and 纪律。”1920 年 3 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他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中共和毛泽东得到了马列主义的真传。

在 1903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一套围绕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党员对核心高度服从的集权化的组织模式即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制度。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保持

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不但重视思想教育，还制定严酷的法律和惩罚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并不定期进行清党运动。

解放军占领上海市后，为了遵守不住民房商铺的纪律，很多官兵直接在躺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过夜。许多上海市民首次见到解放军，与国军等其他军队之前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中共军队有铁的纪律，主帅一声令下，士兵可以对百姓丝毫无犯。这样的场面，可以起到极大的宣传效应，可以迷惑愚昧无知的百姓甚至知识分子。此时的士兵，是没有思想的机器和螺丝钉，党性高于一切，包括人性。

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国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6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25军攻占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国军损失43万多人。渡江战役让民国政府通过守住长江防线、划江而治的计划落空。

渡江战役攻下南京后，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写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评注：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宣称：“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毛泽东告诫共产党人要牢记：“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

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

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评注：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右派极权政府”，这极大地激怒了毛泽东。

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谓民主灯塔的美国基本上就没有想让这个东方大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蒋中正的美好愿望只是空花水月而已。

此时，正是毛泽东意气风发的时候。自然地，毛泽东会反驳说，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他在1949年8月18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

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离’，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7月16日，人民解放军林彪部占领宜昌。7月26日，占领株州；7月29日，占领常德。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

7月10日，蒋介石偕王世杰、吴国桢等自台北飞抵菲律宾碧瑶，与菲总统季里诺商谈组建“太平洋反共联盟”。12日，南韩总统李承晚公开表示拥护成立远东反共联盟。8月6日，蒋介石飞赴南韩，与李承晚商讨具体步骤，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成反共联盟的实现。

7月15日，蒋介石率大批随员从台湾突然抵穗。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军作最后抵抗；蒋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继续抵抗到底，但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

8月16日，第二野战军占领赣州。8月17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福州。

蒋中正鉴于局势之严重，于8月23日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月24日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9月12日飞成都布置防务；9月22日飞昆明与驻军将领会商西南局势，而大势已无法挽回。

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肃。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25日拂晓，总攻兰州，马步芳乘飞机逃往西宁，守军全线溃退。9月5日，占领西宁。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银川。

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占领韶关。10月6日蒋经国日记写道：“今日为中秋佳节，如果是太平盛事，人们必在家园共享天伦之乐。今则世乱时危，已无这清福。”

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3路向广东进攻。10月7日，右路第4兵团占领曲江，中路第15兵团进占翁源，左路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占领和平、河源等地，直插博罗。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粤北守军纷纷向广州撤退。

10月8日，解放军占领衡阳。10月12日，国府宣布自本日起西迁重庆办公，广东省政府则移设海南岛。10月13日放弃广州，至10月底广东为解放军所占领。

10月15日，第4兵团以6个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分3路向粤西追击，西路由三水经高要、阳春迂回阳江西侧，切断国军入桂道路；东路由佛山经鹤山、台山插

向阳江南侧，防止国军由海上撤退；中路由三水经高明直出恩平，向阳江追击。10月24日将第二十一兵团部及4个军残部共4万余人包围于阳江。26日将其全歼。

10月17日，国军自动放弃厦门，集中兵力固守金门。10月25日，叶飞兵团挟胜利余威，向金门发起攻击，但在抢潮登陆时出现若干超越原来想像之逆势，潮高浪大，木船失控。国军飞机、舰艇、装甲战车一齐出动，使已登上岛之解放军，坚持战斗两昼夜后，终因弹尽粮绝，退回大陆。10月26日，蒋经国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11时半到达金门上空。

评注：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长期受日本影响的台湾人被指责是“奴化”，而被政府要求“中国化”。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官民矛盾与族群矛盾持续恶化。

1947年2月28日，台湾各大都市因罢工罢市爆发暴力事件，军队开枪镇压，死伤多人，其后各地展开戒严和清乡，至少上万人死亡。史称二二八事件。

随着国共内战局势转变，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移往台湾，因为怀疑台湾人民忠诚、担忧中国共产党份子潜伏，政府透过情报布建、逮捕侦讯等手段，追捕、清查、清理参与事件的民众，出现许多冤狱案件。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地方士绅或知识分子遭到计划地逮捕、暗杀。有16家官民营报社遭查封或停刊，或发行人、记者被逮捕杀害。

这次事件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加深族群隔阂与对立。由于随后台湾实行长期戒严并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对台湾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1月14日，蒋中正自台北飞到重庆。11月29日，主持军事会议，指示重庆外围作战计划，入夜林园行邸已闻枪声，兵工厂爆炸，始至白市驿机场；翌日晨飞抵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重庆于同日下午陷落。

12月7日，蒋中正指示阎锡山作好当晚离开成都之准备。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等，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密谋，欲扣留蒋。12月10日，侍卫人员对蒋介石说，刘文辉便衣人员已经布满军校大门附近，不如从后门出去。但是蒋介石却拒绝他们建议，严正地说：“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父子俩从军校大门走出。下午2时，蒋中正等人自凤凰山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升空，经海南岛，于下午6时30分抵台北松山机场。

12月31日《蒋中正日记》写道：“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

评说：史家没有自由的环境，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就算有独立的花蕊萌芽，也会很快被摘掉，不可能自由绽放。历来史家质疑中共修改中国历史以及其自身党史的做法，使真相难以重现。

我不敢标榜自己为作者，历史不是我能杜撰的。我的评注也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这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能成为炸弹，将中共邪恶政权炸个粉碎，地球人是不会在乎它的出处的，哪怕这个炸弹是美国制造的。但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

1921年7月23日实为中共建党之日，毛泽东大笔一挥，将其定在7月1日，看似事小，以讹传讹之风，实则贻害无穷。红军“飞夺泸定桥”，本来就那么一丁点的事，中共宣传得神乎其神。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也明说了：“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

中共长期宣传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蒋介石不要脸地下山来“摘桃子”，其在纪念抗战时恶意扭曲史实，抹杀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贡献，其影响是十分恶劣的。蒋介石说其“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其“七二一方针，最早可见于抗战时国民政府的宣传：“毛泽东向其部队训话，指出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之绝好良机，其策略：七分发展实力，二分应付政府，一分抗日”。美国史丹佛大学教授 Lyman P. Van Slyke 的评论是有没有这个“七二一方针”指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确在执行这一策略。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指出，伪党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运动产生的“党史编纂学”；政治学者阮铭称为党史伪造学派，奉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之命伪造党史。没有自由的思想，是不可能写出公正的历史的；在中共暴政下写真实的历史，那就等于自寻死路。

一个政权最邪恶的地方，就是以言立罪，并阻止真相的传播。清朝有文字狱，但只是阶段性的。中共建政七十年，一刻都没有停过。以一国之力量来打压和掩盖真相，这个政权真的是邪恶之极了。

史家是允许批评的，司马迁将三皇五帝的神话故事作为历史记载，就有不少史家提出批评。史家笔下，求事还是求理，重言还是重义，其中分寸，确有不同。《史记》《通鉴》，亦有论曰。此二司马，亦于言语之中求义理也。但恶意伪造而误导世人者，却为史家不齿。从下卷起，本书直

接称“中国共产党”为土匪帮、共匪等，并不是以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是还原历史之真实面目，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具备土匪帮和邪教的基本特征，而且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就直接称呼其为“共匪”。中国共产党是窃国大盗。这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问题，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偷来的，欺骗来的；而且窃国后逆世界潮流，弃民主政治，宣独裁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中共政权只能与王莽篡政列为同等地位。

清史论曰：“是非论定，修史者每难之。然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所见之世且详于所闻，一朝掌故，乌可从阙。傥亦为天下后世所共鉴欤？”虽然是一家之言，亦是肺腑而出。

我们生活在地球，看地是平的、天是半圆的；我们必须飞出地球，才能看见地球是圆的，太空是广阔无边的。我们生活在地球，看夜空里的星星闪烁，是那么的渺小；只有发明了太空望远镜，或者乘坐宇宙飞船上了太空，才知道那些不显眼的星星，原来比我们的地球大千万倍。

古人早就说过：“明察、聪闻、深识，肚内才学、胸中甲兵，对社会对自己皆是祸根”。唉！让过去告诉未来，不是为了揭示，而是为了宽恕。

《百年中国史鉴上卷之民国风云》于此终，请继续关注下卷《百年中国史鉴之中共乱国》。

关于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的书籍和资料等，自古史家，从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乃至《二十四史》都是没有列出史料来源的，我因此从古，将这部分内容省去，否则这本书要增加三分之一的分量，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是非曲直，任由世人评说。特此说明。

2020年3月于美国纽约

中国百年史鉴

下卷

中共乱国（1949-2021 年）

第十九章 中共政治协商之骗局

北京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当山之半，右倚层岩，左瞰远岫，亭榭略具”，院内有一处小池塘，池旁有一座六角凉亭，周边林木茂密，颇为幽秀，两股清泉流过，尤揽香山之胜，故曰双清。

评说：双清别墅的主人，一直是蚂蚁，而不是人。人类一直自傲地将自己视为地球的主宰，但蚂蚁并不这样认为。它们无处不在，数量更加庞大，把人类最后的一点骨髓都吞噬掉，包括人类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述古之历史，可为现代人之资鉴。我们从古人活动的轨迹，探索和认知人类发展的历程，启迪和推动人类未来的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伟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时势造英雄，历史造就了无数风流人物。

讲人民和历史，孔子在《论语》中的这段话是应该引用的。尧帝在禅让时说：“唉！你啊舜，按照天道之历数，我要将帝位传给你了，我现在命你忠实地执持中道。你要为四海之内的广大民众解除穷困之苦啊。我祝福你，上天所赐给你的禄位，将长享于汝身。”舜帝也同样以禅让的方式将帝位传给大禹。

古代尧帝禅让帝位时，舜帝并不是当时道德最高尚的人。尧帝本来是想让位给许由的，许由感到太可怕了，携家逃亡。后来，尧帝又想请子州支父来当坐他的位子，子州还是宁愿做个隐士。尧帝不得圣人，退而求其次，找个贤人，就让舜来当那个差事。过去，别人不愿意当了，为王的也只好不了了之。春秋战国之后，老子让你当王，你不给面子，只好把你干掉了，哪里容得你归隐而去？

中国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当权者荒淫无德，民不聊生，乃至官逼民反；虽然时代交替之间各有国破家散的过渡期，但历史的主线是张弛有度、致力中和。当今时代是中国历史的怪胎，人民无论贫穷富裕，皆生活在恐惧之中，缺乏人性之尊严，政权没有道德，正义不得伸张。影视作品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的真相被一点一点地歪曲。“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真相。有真相，谣言不攻自破；没有真相，谣言就瞒天过海。”写出如此金句的宣传部高官张文雄却因贪腐锒铛入狱。因反抗强拆而终被杀头的草民贾敬龙，也吟诵如此激昂的绝命诗句：“今当刑离，半梦消断，一往无前。纵万般洒脱，玉石莹莹，清白颠覆，自有堪堪。”这是一个多么

扭曲和令人悲哀的时代，如此才情和心智生长于何种土壤？有识者皆知，这样的时代必须尽快终结。

纵观《史记》和《通鉴》，人民是没有历史的。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能记录在历史档案的不会有人民，人民是进不了历史的“《封神榜》”的，但凡有史也只是野史，制造的“人民”如梁山好汉等。《史记》除了年表之外，就是本纪、世家、列传等，哪里有普通老百姓的席位？《资治通鉴》294卷三百万字，皆是君王、公侯卿大夫的事迹，普通百姓是连坟墓也没有的。皇帝家是养着史官的，如司马迁，但史官一般不下访民间。所以，人民没有历史。人民一旦进了史传，他就不是人民了。正如鸡蛋变成鸡后，它再也不叫做鸡蛋了；矿石冶炼成金子，金子再也不会成为矿石了。毛泽东熟读《通鉴》，深知谁才是历史的主人。

中共建政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承认。二十年后，联合国才正式承认了其合法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华民国才是继承了中国历史的正统。

中共常说“建国60年、建国70年”之类的话，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就立在那里了，它建个什么国？要说建，也只能是建了一个马列独裁的新政权而已。而且是欺骗得来的。亿万百姓和仁人志士的牺牲，他们为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也是中共许诺过的。现在他们建立了一个独裁的政权，成了窃国大盗。还要说“打江山、坐江山、永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之类的话，是谁为他们打下了江山？为什么中国这个早已存在了数千年的江山从此就成了他们马列子孙的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世纪大骗局！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旁边的来青轩。为了保密，对外将此处机关称为“劳动大学”（简称为“劳大”，与“老大”谐音）。从西北坡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上午，毛泽东乘坐的火车徐徐停靠在北平清华园站。毛泽东下了火车，改乘汽车，直接来到颐和园。毛泽东顺着画廊走到昆明湖边。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步子，问道：“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啦？”随从人员答说：“为了首长的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毛泽东听说把游人赶走是为了安全，很不高兴。“你蠢么！”

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他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不游了！”

快到中午了，毛泽东说：“肚子饿了，搞些吃的来。”随从人员弄了好一阵子，也没有把火生着。毛泽东又发脾气道：“你们怎么连炉子都生不着？统统撤职！”

25日下午，在西苑机场有个阅兵仪式。阅兵结束，毛泽东与前来欢迎的160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袖会面。傅作义将军握着毛泽东的手感慨地说：“方队威武雄壮，气宇昂然。解放军不愧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胜利之师。”

25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被邀赴宴的有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张奚若、许德珩、张东逊、俞寰澄、张志让、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彭泽民、马叙伦、蔡廷锴、李济深等。

晚宴结束后，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乘车转移到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居住。当时，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是辆破车，上山的半道上，车坏了，又换了辆吉普车，才开到双清别墅。

评注：1943至1945年间，中共《新华日报》社论和毛泽东有几十篇高度赞美国民主：如《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纪念杰斐逊先生》、《真实的民主战士》、《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为了人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其中有言：“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年）

“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按中国人民的素质，实行民主后，中国不但不会乱，最终会富强起来，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新华日报》，1945年）

“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诉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毛泽东，1946年）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白纸黑字就在那里；我们在本书的上卷《民国风云》还记录了更多类似的言论。中共坐了天下后，开始了大变脸，不再说什么美国式民主了。中共完全是背离这些承诺了。

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告开始。抗战期间，中共在战时陪都重庆设置八路军办事处，以周恩来为主任。在这段时期，国共在合作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就中国政治制度和未来社会和平协商，这是中共从以前彻底否定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而转向试图在此民主宪政之政治阵地下寻找有利于中共的具体方案的转变。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中共的说法是最早出现于周恩来至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声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国民党反对联合政府主张，尤其反对党派政府的提法，理由是联合政府并非民选，所以这种政府是暂时的，建立在军事实力上的，自然与其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建立民选政府的理论矛盾。

1945年8月，蒋中正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美国顾问赫尔利作出安全保证。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并在同一天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承认解放区、承认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召开党派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筹备国民大会。停顿已久的国共谈判迅速恢复，双方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问题广泛协商。

赫尔利提出叫做“政治会议”，到9月10日，张治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默认接受。10月10日，王世杰等与周恩来签署《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署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在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军队整编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军事小组会议讨论，并同意国民大会有关问题应先行召开政协会议解决。但是这次谈判也留下巨大的问题，即解放区问题和双方如何防止冲突的问题。

10月20日，周恩来与张群等人预定在11月初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因军事冲突扩大，不得不延期。美国调停失败，赫尔利于11月26日辞职，杜鲁门总统改派马歇尔任驻华大使调停国共冲突。

赫尔利是把国民政府当作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竭力维持其存在；马歇尔则把中共与国民政府当作竞争对手，平等看待，目标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以为，只要联合政府建立，中国就统一，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发布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此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序幕。

1月10日，政治协商大会开幕，代表首先恭读《国父遗嘱》，然后大会主席宣布国共已经下达停战令即刻发布，会场上掌声雷动。随后，蒋中正亲临主持并致词。蒋中正致词完毕后，又继续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四项承诺：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施政纲领部分，主要由中共提出草案，而政府代表几乎毫无准备，甚至于直到政协闭幕日，蒋中正才对施政纲领提出两点意见，其一是纲领中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国统区要做，解放区也要做。其二，军队国家化是国家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五方面达成协议，分为五个决议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决议案、国民大会问题决议案，改组政府问题决议案和宪法草案决议案；和平建国纲领是这五个决议中最核心的决议。关于政府组织决议案，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总共40名委员，中共提出三三三制原则，即国民党，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各三分之一，国民党不肯。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2席。这一问题最终演化成为国共破裂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共坚持认为国民政府应负内战责任的主要凭据。

国民党评价这次谈判，说“中共占尽国民政府的便宜”，“凡中共所要求政府者，无不立即解决，政府所要求中共者，则均悬而未决”。中共也认为“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

1946年4月8日，中共谈判代表博古、叶挺、邓发、王若飞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中共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但没有证据，驾驶这架C-47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也一起遇难。

由于中共拒绝在改组政府之前提交国大名单，政府不得不宣布原定于5月5日的国大延期。由于双方战事升级，国共谈判的形势极度恶化。从4月底到11月中，国共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和民盟未能交出名单，国大仍其保留名额，随时等待其参加。这种情况下，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国共产党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马歇尔的提议遭到中共的怀疑，他们显然倾向于把它看成仅仅是国民政府的又一次和平攻势。1月29日，美国宣布撤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方人员，同时中止三人小组的关系。国共美三方关系解除，马歇尔调停彻底失败。

1948年底，蒋中正准备宣布引退。此时中共已经胜券在握，只待春天水涨即渡江，因此恰好可以利用此段和谈时间部署渡江事宜。中共开出条件等同于最后通牒，1) 惩办战争罪犯。2) 废除伪宪法。3) 废除伪法统。4) 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5) 没收官僚资本。6) 改革土地制度。7) 废除卖国条约。8) 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已经准备另起炉灶，不再与国民党政治协商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天经陕北的新华社对外发布，同时经新华广播电台广播。

劳动节口号称，“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并发出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潘汉年收到“五一口号”电讯后，立即在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华商报》刊登。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表示希望早日召开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各党派和各界于5月5日联名发表了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

5月8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接连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多人演说，认为“五一口号”对团结各党派，动员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5月14日，盛康年从香港带着沈钧儒致张澜、黄炎培的信抵达上海，介绍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口号”。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

李济深曾于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期间支持蒋中正的四一二事件，之后又多次反蒋，曾于福建事变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1944年8月，李济深乘湖南战局危急，暗通美国顾问史迪威，密谋另立政府，迫蒋介石下野。1947年5月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荣誉主席，李济深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原中国国民党党员被推为委员。同年5月，接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赴东北解放区。

1948年6月，中共中央委托邓颖超，带上毛泽东、周恩来之信专程至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评注：1925年孙中山病故后，宋庆龄坚决反对其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并于1927年7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蒋介石决裂。8月，宋庆龄和陈友仁赴苏联莫斯科，以后又旅居欧洲多年。10月21日，上海的主要报纸刊载评论，猜测宋庆龄日前出国到苏联，是与陈友仁“私奔”，这个未经证实的谣言，对于宋庆龄的政治生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使得她消沉了许久。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共再次合作后，她也没有重新加入国民党。

1945年9月，在重庆会谈时，宋庆龄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双方相谈甚欢。

根据已解密的档案，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在 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5 月之间。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 年 6 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致使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此时，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出特工、德国人佐尔格参与营救，并计划扣押在苏联的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共产国际代表找到了宋庆龄，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期间，宋庆龄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意愿。

1931 年 12 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 1931 年 12 月 16 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据廖承志在 1981 年回忆，1933 年 5 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

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 50 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1 月，共有三批民主人士自香港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指派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先后组织了两场座谈会。

按照原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由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乃决定改在北平召开。

1949 年 6 月 11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双清别墅举行。会议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 23 个，各民主党派的排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

6 月 15 日至 19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时，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七人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
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
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共有 23 个单位，134 位代表。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产业、文化、教授、华侨，十个单位，每个单位七人，共七十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内少数民族四个单位，

每个单位六人，共二十四人。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四个单位，每个单位五人，共二十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五个单位，每个单位四人，共二十人。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六个小组。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额，组长是李维汉。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组长是谭平山。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长是周恩来。第四小组的任务是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是董必武。第五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长是郭沫若。第六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长是马叙伦。

评注：1934年秋，田汉写了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在1934年至1935年之交写了主题曲歌词，取名《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2月，电通影片公司把电影剧本改名《风云儿女》，主题歌改名《义勇军进行曲》。

此曲是知名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歌曲。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定为该师军歌，该师在1942年远征缅甸也有奏唱。1947年2月8日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广播及灌制。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会代表提出诸多建议，最后经过毛泽东拍板，委员一致赞同《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被打成“右派”，于1968年含冤去世。其作品亦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所以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变成实际“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23日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推荐了曾联松设计的32号图案；周恩来对该设计感到满意，

并要求彭光涵绘制较大的图样。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说明了他赞成红地五星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9月27日，会议正式决定采纳红地五星旗方案，并将其改名为“五星红旗”。

国旗左上角镶有五颗黄色五角星的红色旗帜，红色象征革命，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设计者原意是因为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旗帜图案中的四颗小星环绕在一颗大星右侧呈半环形，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颗星的排列图形象征中国领土海棠的形状，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毛泽东相信，五星联珠会给中国带来好运。

第六小组的组员是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

评注：毛泽东在对待民主人士方面，也表现了他人性良善的一面。毛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那时毛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泽东和蔡和森。

1955年的一天，晚饭后毛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

毛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泽东。毛知道就说：“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买什么礼品呢？毛泽东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之类的。

1920年章士钊为毛泽东筹措了两万大洋，并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以酬谢章士钊两万大洋资助的名义，1963年后毛泽东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直到去世。

6月16日，由民盟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日报《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对象出版。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等87人为联合会委员。23日，委员们推选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

7月21日至26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徐悲鸿任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茅盾任主席）、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吕骥任主席）、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田汉任主席）、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阳翰笙任主席）先后在北平成立。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把中共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讲解得十分清楚明白。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根据中共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参政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进行“政治领导”，即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方式说服民主党派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不得命令、干涉或者控制民主党派，应当保证民主党的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不得干扰民主党的独立性及日常事务。八个民主党派一直被认为是花瓶党。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其中团体代表235人、区域代表116人、党派代表165人、人民解放军代表71人、特别邀请人士75人。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团结起来，以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受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称：“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9月27日，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30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六人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由56人组成，林伯渠为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方针；下午3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欢呼由马叙伦、林伯渠等人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立法机关，后改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承担立法与决策职权。

毛泽东在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离开双清别墅，迁居中南海菊香书屋。

评注：中共百年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政治协商只是一场骗局。“民主”只是中共宣传话语中的说辞，“人民当家作主”只是幌子，“人民共和”更是谎言。民主选举，连一丁点的影子都见不着。

1944 年 6 月 13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谈话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1945 年 9 月 27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1946 年 6 月以后，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之前，中央办公厅机构和人员已经首先进驻了。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办公而得名。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所有党内给毛泽东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毛泽东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毛泽东，秘书室都不能看。后楼研究室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 1939 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

1953 年夏，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质问，是谁将师哲安插在他身边。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随即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取代。江青由此打破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开始介入政治。

师哲因犯了男女关系错误，1958 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下放陕西扶风。戚本禹在《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中回忆师哲说：“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

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

当时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毛的私人事情。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毛泽东直接交办的事情，还管理毛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南海的淤泥刚刚清理不久。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

1949年6月15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于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里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后来周恩来表示：“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只用了“人民共和国”。且在7月9日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人认为名称过长而应去除“民主”二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张奚若的观点，周善培和司徒美堂则主张要用“民主”二字。8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并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其中新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且周恩来向政协代表等人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其中表示“民主”与“共和”有共同意思，且这两个都已有民主含义，故去掉“民主”二字。去掉“民主”二字，是符合历史的，这个国家根本就是窃取的，没有“民主”的实质内容。

评注：共同纲领提出“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自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墨迹还没有干就都成了骗人的谎言，一天也没有实现过。

在中南海的正门，是毛泽东书写的五个金色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要建立的政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型的独裁政府，不是一个自下而上

的服务型的民主政府。管理型的政府，官员由上级任命，官员只对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服务型的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人民不满意可以由手中的选票撤换官员甚至政府。

所以，中共之“为人民服务”只是谎言。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人民从此成了奴隶，他们被迫为这个独裁政权服务。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6日，新疆解放。当天中午，周恩来紧急宴请二十多位元老，讨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此时，中共已控制中国北方长江以北全部领土。

9月21日，中共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9月22日，政协会议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宣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时代的开端。”“全国人民早已渴望着召开这样的一个真正由人民自己做主人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中国人民真的当家作主了吗？他们连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该社论说，“这个国家的政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残余势力实行专政的政权。”共产党继续阶级斗争，剥夺“部分”人民的民主权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社论写道：“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评注：此时，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谁站起来了？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呢？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看，中共新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圈子选举，是自己选自己，先商量内定好谁当主席、谁当委员，没有人民参与，或者根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和主要中共领导人没有到过西方；就算周恩来等到过西方，也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民主政治。他们满脑子里只有数千年的帝王思想、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所谓的政治协商，还是独裁专政的那一套；这是他们认识上的缺憾，也是中华民族无福之故。

公告全文：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来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谭平山、张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再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北平为首都，改称北京。毛泽东几乎满票当选（99.83%），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党政军等一切大权在握，完全是一个独裁政权，没有任何民主之真

意。参加政协会议的一干“民主派”糊涂虫，连“什么是民主”的基本含义还没有弄明白，就自动或被动地当了电灯泡。

第二十章 中共参与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以反击挑衅为理由，越过38度线侵略韩国，朝鲜半岛的内部战争爆发。当日星期天凌晨，在猛烈的炮击准备后，朝鲜人民军全面攻击三八线以南的大韩民国国军。四小时内，朝鲜人民军的t-34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国国军防线，直趋汉城。

背景：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将原本朝鲜王国的宗主国满清逼退，又在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迫使俄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1910年8月22日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与大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8月27日大韩帝国正式灭亡，成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统治朝鲜共35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并撤出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被美国和苏联分为南北两块分别占领，并分别建政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为由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一般以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

韩国的军事部队创建于1946年。李承晚声称要北上统一朝鲜半岛，但美国只希望韩国国军能够抵御北方的攻击，因而限制其主动对北攻击的装备能力。韩国国军中配有500名美军顾问，武器仅装备轻武器和轻型火炮，没有飞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

1948年2月，朝鲜北方正式宣告朝鲜人民军创建，并在平壤举行第一次阅兵式。

在金日成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部队将朝鲜族的2个师的兵员包括其最基本的轻装武器交给访问中国的南日大将。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后并改编入朝鲜指挥，人数约三个师，成为朝鲜人民军得以南下的主力。

朝鲜人民军在苏联帮助下组建，有几千名经苏联培训的军官、及苏联提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每个师约配有15名苏军顾问。

朝鲜人民军以装备精良的苏式武器与过倍的兵力优势，三日内攻陷韩国首都汉城。

金日成为了掩饰战争是由朝鲜一方所发动，于是在广播中声称是韩国侵略朝鲜：“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朝鲜人民军

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而事实上，当时韩国国军不但装备贫弱，又在三八线的军队约二分之一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四个师中，每师只有 1 个团 2 个营进入战备），也缺乏对全面战争的准备。这同时导致韩国国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

朝鲜战争初期，韩国国军节节败退，朝鲜人民军不到 1 个半月时间，就占据朝鲜半岛百分之 90 以上地区和百分之 92 以上人口。在朝鲜军队的猛攻下，长期在日本驻扎、松懈怠慢又对亚洲人抱以轻视的首批前往韩国的美军很快便被击溃。整个 7 月美韩联军只得以人员和空间换取时间持续撤退，直到 8 月 2 日美韩联军以马山、大邱、浦项作为抵抗线，组成釜山环形防御圈固守。

美国将事件提交联合国。苏联则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6 月 27 日美国正式参战。

6 月 28 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6 月 30 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参战。7 月 2 日，美军在釜山登陆。

7 月 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84 号决议，由联合国成员国的 16 个国家的军队和 5 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同时杜鲁门命令美第 7 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7 月 8 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承晚也将韩国国军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

评注：李承晚 1875 年出生在朝鲜国黄海道平山郡，曾就读于培材学堂；受家庭影响，李承晚早年接受的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教育。

1905 年李承晚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士学位，1910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1912 年后流亡海外三十余年，期间于 1919 年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同年受任临时政府总统，1921 年赴美推动韩国独立运动。1945 年日本投降后，李承晚归国。

1947 年，美苏就朝鲜半岛建立统一政权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加大，朝鲜半岛问题开始联合国化。美国为防止苏联控制整个半岛，提出先在南部举行大选。1948 年 7 月 20 日，李承晚被制宪议会选举为韩国首任总统。8 月 15 日，大韩民国宣告正式成立。

在李承晚执政期间，他标榜反共，与美国联盟，不断屠杀、镇压国内共产党和左派人士。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 27 日，李承晚下令逮捕并处决由共产主义同情者及政治异见者组成的保导联盟之成员，是为保导联盟事件，事件共造成数十万人被处决。

1949年8月，蒋介石应李承晚的邀请访问韩国。1953年11月27日，李承晚访问台湾期间还与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倡议建立亚洲“反共联合战线”。

李承晚执政时期，处在冷战不同阵营的韩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长期处在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两国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直接对抗外，在黄海海域也多次发生海事冲突。

1950年5月，韩国进行新一轮大选。李承晚的政党只保住210个席位中的22席。1950年6月7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朝鲜半岛南北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8月5日至8月8日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为此目的于6月15日至6月17日在海州市召开协商会议。6月11日，北方的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韩国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被韩国政府逮捕。随后三名代表因拒绝发表变节声明而被处决，北方视为挑衅，加上准备多时，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

5月13日，金日成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当晚，毛泽东才被告知苏联已经打算援助朝鲜，他对此突变十分惊讶，甚至还质疑金日成是否有此能力，虽然可能会打断北京的规划，但鉴于斯大林本人亲笔去信已经同意全力支持，毛泽东就未有积极阻止军事化风险。

评注：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平定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则相继撤退至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最终于该年12月7日撤退至台湾。1950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把“解放台湾”的任务放在当年的“四大任务之首”。

在东南沿海，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军残余部队在进行岛屿争夺战。解放军在1949年8月发动舟山群岛战役。由于解放军以陆军起家，缺乏足够海军、空军专业部队与武器装备，登陆战经验不足，1949年10月在金门战役被国军全歼，11月登步岛战役失败，一时之间不敢贸然作战。

1950年春天，解放军发动海南岛战役，经多日交战，解放军攻占海南岛。3月28日，毛泽东给粟裕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之方针，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

1950年春夏几个月，解放军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岛屿，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为渡海攻台做准备。

1950年前后，彭德怀正在指挥西北战事。彭德怀领导的由西北野战军改编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开辟西北战场，先后攻克西安、兰州、西宁、银川，扫荡河西走廊，消灭数十年据有甘、宁、青三省的回军，迫使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

在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被任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2月2日，彭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委员王震等41人。12月17日，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负责恢复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交通建设、调查研究、团结少数民族等工作。

在西南战场，刘伯承、贺龙等正在消灭国民政府军的最后据点。彭德怀也正准备协同进藏作战。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1月1日，解放军展开西南战役，从湖南、湖北进军西南。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西南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围歼国军93万，国军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被消灭。

1950年1月，刘伯承、陈赓、贺龙等部10余万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连攻陷雅安、康定等地，与国军激战于宁南、会理一带。到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

1950年10月6日至10月24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贺龙、彭德怀、陈赓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云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灭藏军万余人。解放军打通入藏道路。

至此，除西藏外，中国共产党基本控制整个中国大陆。

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后，毛泽东急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要适当选择，不能不准备。8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切断人民军退路。为配合美军在仁川登陆，大韩民国国军在长沙里登陆，对朝鲜人民军所进行扰袭作战。人民军被南

北夹击，损失严重。美军随后迅速扭转战局，并使朝鲜在军事上陷入不利，开始全面溃退。9月25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

北京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就会出兵。10月4日，美国国务院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0月9日，美军第一骑兵师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0月19日，美军进占平壤，金日成的朝鲜政府迁往江界市。

背景：金日成出身于朝鲜一个农户家庭。他13岁（1925年）随父亲逃亡到中国，在吉林省抚松县第一小学和毓文中学就读。

1931年，金日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主要活跃在吉东地区和长白山一带。1932年春，受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创建安图游击队。其后历任汪清游击大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损失惨重，部队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同年他率部撤往苏联境内。1945年，从苏联乘坐军舰返回朝鲜北部，建立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

1946年2月8日，苏联在朝鲜半岛北部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扶植金日成成为委员长。1948年9月9日，他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被选为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和朝鲜内阁首相，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

1949年以来，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间要求联合发动战争“解放韩国”。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请求协助，苏联也积极施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

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日后在其著作中称，1950年5月中旬，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当时金日成被迫按照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的要求，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对南朝鲜开战的意图，而毛泽东认为此时打仗时机不好。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大陆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

中方忙着处理国共内战的收尾阶段，毛泽东对开战兴趣缺缺，因为他正将兵力集中于南方之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兵力还在中国西南部进内联战，并准备继续南下攻打台湾，虽无暇顾及此事，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向联合国喊话，警告若连联合国军也都越过 38 度线侵入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坚持的中立政策那就有可能改变。10 月 3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美国，若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则“我们要出兵”。

10 月 1 日，金日成致信毛泽东，提出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同日，斯大林向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

10 月 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 10 月 4 日召开扩大之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在安排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中，有很多是国共内战中俘虏的国民党兵。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出兵援朝。同日，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挂帅出兵之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 月 8 日，毛泽东签发命令，组织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进行动员。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根据当时的有限情报，美国知道中国不会出兵，时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更有驻华经验，遂放心指示麦克阿瑟改成直接消灭朝鲜。10 月 19 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

20 日，平壤被联合国军占领。朝鲜人民军至此基本被消灭殆尽。绝大多数联合国领导人，包括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认为朝鲜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

但事实上，10 月 16 日，志愿军先头部队已经由集安秘密进入朝鲜。19 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部队通过鸭绿江入朝，不宣而战。当天志愿军第 40 军第 118 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用了一个多小时夺回温井。

在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击败韩军与联军，推至清川江一线。联合国军从俘虏中看到中国人，美军错以为此次只是跟往常一样的小股“志愿军”。实际上中国初期出兵达到 30 万。

联军并未料到中国秘密出兵，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李承晚政府与

军方将领的贪渎侵吞物资，40 万以上的韩军于缺乏给养的寒冬中撤退，演变成一场死亡行军，导致 9 万军人于沿路上因饥寒而死。

10 月 23 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 13 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德怀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

11 月 4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11 月 5 日，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

11 月 6 日，志愿军 42 军受命向北撤退，意图将联合国军诱至长津湖。

麦克阿瑟在元山登陆后，命令陆战一师为主的第十军向北推进，终于被打得措手不及。原因正是毛泽东急令的第九兵团 15 万人秘密入朝，进入长津湖水库准备围歼美联军几万人。此次发现遭遇战，为第二次战役。

11 月 24 日，志愿军在彭德怀的命令下主动放弃阵地，采取主动示弱，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故意采取“增兵减灶”的战术引诱美军深入，而误以为是对志愿军后方的空袭产生了效果，迫使志愿军后撤的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韩军展开全面进攻，以左翼的美第八集团军与右翼的美第 10 军为首发起了全线进攻。美军第八军团被彭德怀军队阻击，美陆战一师才明白过来自己要在长津湖面对十倍于己的中国士兵展开鏖战。

毛泽东派其精通俄语、英语及法语的儿子毛岸英担任彭德怀的机要秘书兼翻译，任职于大后方的本部内。11 月 25 日，美国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炸毁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司令部翻译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二人当场死亡。

评注：毛岸英是毛泽东与其第二位妻子杨开慧的长子。1930 年，杨开慧被杀后，毛岸英被保释出狱，并带到上海进入中共地下党所办的“大同幼稚园”。1932 年寄养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家中。1933 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省瑞金，经济资助中断，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流落街头。

1936 年，因与董健吾有私人关系，张学良派部下李杜带毛岸英兄弟俩到法国马赛，数月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带往莫斯科，进入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一直到长大在莫斯科上了大学。

1946 年 1 月，毛岸英乘飞机回到延安。1947 年春，国军进攻延安时，康生带他去山西临县发动土改。进北京后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1949 年 10 月与中共早期重要领导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结婚。1950 年 8 月中旬，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

1950年10月下旬，毛岸英随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毛岸英在朝鲜隐姓埋名，被称作刘秘书，只有少数人知晓其真实身份。

根据38军军长梁兴初之子梁晓源回忆，毛岸英曾经向梁兴初要求到38军带兵，梁兴初说必须得到彭德怀同意，毛岸英便表示要去找彭德怀谈。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P-61战斗机在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进行侦察，志愿军首长因此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防空洞。11月25日上午11时，联合国军四架南非的B-26轰炸机轰炸了大榆洞，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茅屋（司令部作战室）而燃烧，毛岸英未能及时逃出，当场死亡，尸体无法辨认，靠他生前戴的苏联手表残骸才确认，年仅28岁。

当彭德怀得知毛岸英有危险时，急得立即想跑去，被警卫员抱住，他说“再不放手我毙了你”，警卫员说“你毙了我也不放手”。

毛岸英遇难当天下午16时，彭德怀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正副司令员高岗与贺晋年去电，汇报了当天的情况：“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毛岸英阵亡当天，周恩来在收到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并同刘少奇商量后，决定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只告诉杨尚昆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写信并附上志司电报向毛泽东和江青告知情况。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毛泽东决定不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而留在朝鲜。

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透露，当天拂晓前，毛岸英、作战处参谋高瑞欣和作战处副处长成普三人违反必须进入防空洞的防空纪律，在彭德怀办公室中“炒米饭”。

时任志愿军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的副总司令的洪学智在199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描述：“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我们一道上山疏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跑回屋里去了。”

11月25日，在西面战线，志愿军第13兵团于清川江战役攻击并击退韩国国军，然后击退美军第2师。联合国指挥部、美国第八集团军在土耳其旅掩护下成功撤退。

11月27日，在东面战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突袭美国陆军第7师第31团级作战队（3,000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12,000-15,000海军陆战队员）并一度加以包围；但美军仍在空军和第10军掩护下成功突围循海路撤退，此战美军战死、失踪、受伤及冻伤约15,000人并迫使其展开大规模撤退。志愿军第9兵团20、27军各师也在美军优势火力与后勤不继之下遭到重创，死亡近五万人，其中冻死冻伤减员高达9,000余人。

11月28日拂晓时，中国军队和美国守军在柳潭里防御圈周围相持不下。联军第7陆战团第1营在12月1日还在设法突破中国军队在1419高地的阻截，志愿军不顾严重的战斗伤亡、饥饿和严寒，投入最后5个排坚守不退。在长津湖东面，经过多次激战的联军在航空联队提供空中掩护下，于12月1日开始突围。

此战中，受到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长津湖地区的最低气温极其罕见地降到了零下38度，导致交战双方均出现了大面积的非战斗减员，而其中中国军队由于后勤补给不足，一部分军队必须进行急行军穿插，在行军过程中丢弃了棉衣，其受气候影响的程度远远甚于美军。

11月3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第13兵团驱离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至12月中旬，退回三八线以下。12月6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美军海军陆战队尽管在长津湖首尝建军以来的挫败，但美国第10军成功撤退，依然保住了大部分兵力。美国第10军从东部前线撤离的时候，总共有193艘满载人及物资的船只从这里离开，当中包括105,000名士兵、98,000名平民、17,500部车辆及350,000吨物资被送往釜山。

长津湖战役后，毛泽东给宋时轮的二十军全体指战员发了一封电报写道：“看到东线战斗的报告，我的心情也极度的沉重，东线伤亡4万多人，其中冻死冻伤就有3万多人，教训惨痛啊！大伤了我们的元气。”

1950年11月1日，先期进驻沈阳的苏联空军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朝鲜境内与美空军首次交战。1951年1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参加空战。苏联空军的米格机对联军飞机造成相当威胁。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在朝鲜战争中参与轮战的苏联军人为40,000人。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第64航空兵军战斗出动共64300架次，参加空战1872次，击落飞机1106架。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会上答问，美国会采取一切步骤围堵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包括使用原子弹。但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存在重大分歧。

评注：麦克阿瑟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于1930年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担任重要角色。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职位实质统治了1945年至1948年的日本。

战事开始时，韩美军队节节败退。麦克阿瑟认为不宜自朝鲜半岛南部向北进行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推进，因此计划于朝鲜军后方的仁川实施一次两栖登陆，借此截断朝鲜军主要补给线、收复韩国首都汉城、形成对朝鲜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一举将战局扭转。8月29日，联参会同意仁川登陆行动。

然而麦克阿瑟却刻意对华盛顿方面隐瞒行动具体计划和时间等，此举使麦克阿瑟严重得罪联参会的各军种参谋长。

八个月后杜鲁门之所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得到联参会的一众支持，而后者便是以此报复麦克阿瑟在仁川对其先斩后奏的作法。

9月15日，美军陆战第1师成功登陆仁川，当天仅21人阵亡。登陆后半个月内联合国军共造成朝鲜军近4万人的伤亡，失去三分之一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坦克、火炮和车辆，残余兵力几无秩序地溃退。此役之成功使麦克阿瑟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以致联参会之后都怀疑他们是否应对麦克阿瑟的决心存有任何疑问。

麦克阿瑟的自信心因仁川登陆的成功而膨胀。10月15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威克岛会面讨论朝鲜战争的局势。杜鲁门原想指定在夏威夷，但麦克阿瑟不愿意，称不喜欢在夜间飞行，也不想去很远的地方。会中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中共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战争也将在感恩节前结束。

但是，中共志愿军的参战，打破了麦克阿瑟的美梦。

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向五角大厦发出电报称，“本司令部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目前的局势已超越其职权和兵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我们正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

美第十军与第八军团会合后，全部10万人加上武器装备、9万多朝鲜民众等，撤退到兴南港，乘军舰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中国志愿军领北朝鲜并跨过三八

线，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于1951年1月4日攻占汉城，1月5日渡过汉江，1月8日占领仁川，此时双方的格局与底细才明显浮现。

至1月2日，志愿军已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将联合国军部署打乱，联合国军被迫全线撤退。彭德怀认为联军是在有计划地南撤，企图诱敌深入，重演仁川登陆故伎，故命令志愿军停止追击，战役遂于1月8日结束。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战争双方均未对此回应。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反击志愿军，使战线再次回到三八线并陷入胶着。

彭德怀多次向毛泽东陈述志愿军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后勤供给在完全没有空军保障的情况下遭受美军轰炸损失严重，前方战士的粮弹已经出现短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因为入朝鲜作战的仓促，很多士兵没有发到冬衣，在朝鲜的严寒环境下出现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导致战损比增大等实际情况，甚至亲自到北京向毛陈述不能继续深入的理由，然而被毛拒绝，要求必须继续进军，无奈之下彭只得命令志愿军继续深入韩国南部。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上将12月23日死于车祸，美国委派李奇微中将接替任第8集团军司令。

李奇微接任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

2月，联合国军组织23万人和大批飞机、坦克、火炮，向志愿军全线进攻，在双子隧道战役中战胜了中国军队。

2月11日晚，志愿军发起横城反击战，迫使联军开始不同程度的后退。2月13日，志愿军发起砥平里战斗。温玉成将军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军五个师中的八个团约6,000人，向美军第二步兵师23团（约4,500人）发动猛攻。志愿军的八个团遭受重大伤亡，至少是联合国军伤亡的两倍多，进攻失败。

2月21日清晨，彭德怀抵安东，下午1时乘专机抵北京西郊机场，赴西郊玉泉山毛泽东别墅。彭不顾毛泽东午睡、警卫人员劝阻，唤醒毛泽东并汇报前线战况及志愿军的许多严重困难，请中央迅速设法解决。毛泽东称：“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支持，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中朝军队节节抗击，3月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移到三八线以北，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离开桧仓前往平壤与金日成告别。4月12日，彭由天津乘火车到北京，4月15日至5月5日秘密住进北京医院治疗。毛泽东任命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4月8日，志愿军位于三登的后勤仓库被美机发现猛炸，大部被毁，共损失口粮300万斤，豆油33万斤，军衣40多万套等。

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出兵攻击中国在鸭绿江一带的军事基地，在必要情况下，更可以动用原子弹。杜鲁门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观点，担心他的方案会使苏联加入，使大战升级，最终有爆发核子战争的可能。于是麦克阿瑟在总统反对的情况下，公开广播出他对战事的意见，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由世界现在为此以鲜血和灾难付出代价，而且更不服从杜鲁门的指令。

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

中国军队增援兵团于4月16日陆续抵达后，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总兵力首度超过联合国军，在数量上处于上风。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

经过5天激战，击溃韩国国军第五师和第七师，歼敌1.7万余人，中国军队也遭受重大伤亡。

5月20日，美军和韩国国军凭借高度机械化，很快堵塞志愿军打开之缺口，5月21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指示各部队停止追击。联军则用“磁性战术”大举反扑，最终，志愿军全线撤退约40公里后在铁原一线拼死阻止住联军的进攻，联合国军第二次跨进三八线。

志愿军奉命孤军断后的第三兵团60军180师陷入重围，损伤过半，剩余5,600余人突围至三八线以北，分散突围失败，数千人被俘，占朝鲜战争中全部志愿军被俘人数1/3以上。

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杜鲁门总统表示希望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951年5月18日，为了制止朝鲜侵略，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50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行禁运。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赞同。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覆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地点为三八线以南之开城。由于双方的条件悬殊，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两年。

1951年5月30日，大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2万多人被俘，有6,673人返回中国大陆，有1.4万多人到台湾。

至1951年6月，志愿军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建设的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由于严寒、极度的物质匮乏以及美军战俘中普遍的心理崩溃，在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阵地相持阶段，即静态战争阶段。5月，克拉克接替李奇微担任总司令；6月，板门店谈判因战俘遣返问题陷入僵局，克拉克推翻了原来李奇微的立场，下令对朝鲜发电设施进行轰炸以便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在国内也面临重大挑战，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政府害怕公众压力会迫使美国在谈判桌前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两党候选人都同意尽早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朝鲜战争，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更是把尽早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其未来新政府的第一项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倾向于通过军事冒险，即是以军事上的主动或给对方以更多杀伤，争取在谈判桌前取得有利地位。

自8月18日起，韩国国军第1军对丁字峰、美军第10军对喋血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同时开始攻击，这是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

朝鲜人民军与大韩民国国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整个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到8月27日，韩军被迫撤退，所夺取的各个山顶又被朝鲜人民军占领。美军第2师第9团接替韩国军攻击喋血岭，9月5日喋血岭终被美韩联军攻下，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依美军估计，中国、朝鲜共伤亡15,000人。

美第10军转为夺取喋血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此高地群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志愿军一向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后来为了迂回作战，主动放弃这片高地。此役美军第2师伤亡3,700多人，美方估计中国大陆、朝鲜此役伤亡25,000人。

白马山是由一群以395高地为主的丘陵组成，地势为西北向东南延绵2英里（3.2公里）。主要制高点是395高地（中方称394.8高地）和281高地（箭头高地，中方称281.2高地），与志愿军三十八军项里北山阵地相望。越过白马山，南面就是联合国军重要后勤基地铁原，该地连结了通往汉城的补给线。

从10月3日起，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对志愿军炮兵阵地位置实施集中轰炸。美国第八军团迅速重新进行兵力布署，增调韩9师第30团第3营，支援第1营加固阵地。

10月5日，志愿军第38军114师340团派6个连大约800多人的突击队于半夜潜伏到韩方阵地前沿，在潜伏一天后于晚间6点发起进攻。在三天的作战后，395高地的主力守备队30团与支援的28团都蒙受大量损失。

经过5个小时的持续作战后，韩军在10月12日下午13:20重新夺回白马山的395高地山头阵地。中共方面认为，志愿军第38军战前作战计划泄漏，造成重大困难。志愿军在敌预有准备的火力优势下，强攻稳固阵地，遭受了不必要的伤亡。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之战。双方在表面阵地上进行拉锯战。多次反复争夺的结果，两方面皆死伤惨重。

10月13日，联军开始炮击与空袭，并隐蔽向出发阵地运送兵力弹药。14日，双方展开白刃战。第一天战斗，联军伤亡600人以上，参战4个营中3个营被迫撤下休整。志愿军伤亡500人以上，表面阵地全部被摧毁，储存弹药基本用尽。

15日入夜，志愿军45师在炮火支援下进行反击，很快夺回全部阵地。

16-19日双方反复争夺，白天联军利用优势炮火夺取表面阵地后，志愿军在晚间利用坑道和后方兵力夺回。在19日凌晨的反击中，中国人民志愿军135团2营通讯员黄继光在爆破美军火力点的过程中，“在多处负伤，爆破器材用尽后”，用身体挡住了美军的射击孔。黄继光阵亡后，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的称号，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东线美军第7师首次于19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表面阵地，而韩军第2师在白天发动反击，将19日晚失去的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夺回。至此，联军占领全部表面阵地。志愿军虽仍在反斜面坑道中保存一定不成建制兵力，但已经失去反击力量。

21日起至10月30日，志愿军上甘岭地区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剩余人员进入坑道防御作战。双方都在调整战略和兵力部署，整个战场相对平静，却酝酿着接下去的更大战斗。

10月30日至11月28日，志愿军展开反击，收复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开战以来进行的最大炮战。双方再次陷入拉锯战，并在猛烈炮火下，均付出重大伤亡。战至11月14日，志愿军92团伤亡严重由93团接替。93团投入作战仅4天便难以支撑，18日由志愿军34师106团接替。

11月28日，美第8集团军命令韩2师停止争夺537.7高地北山，美军结束了这场叫做“摊牌行动”的战事。

上甘岭战役是 1952 年规模最大最血腥的对抗。志愿军阵亡 4838 人，伤 6691 人。美军阵亡 365 人，伤 1174 人和一人被俘。鉴于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伤亡过重，联军远东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任何兵力多于一个营的战斗计划。

评注：为了掌握世界局势和前线的战况，毛泽东每天都要看各种报摘。原来，中南海秘书室的田家英、彭达彰等看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毛泽东看。新华社知道了毛泽东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就由新华社办了一个《内部参考》来为毛泽东搞报摘。

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要朝鲜打仗用的军用地图，田家英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打电话，最后由警卫骑摩托车到地安门的军委办公室去取，那里有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丹东的地图，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是日本人绘制的。

1948 年 11 月 2 日，杜鲁门竞选总统成功。11 月 28 日，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对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龄前往美国，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

国民政府迁台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50 年 1 月 5 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杜鲁门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可以容纳资本主义思想，认为有可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出苏联阵营，更试图在 1949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将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目前局势，或进行足以使美国牵涉于中国内争的措施。”

到了 1952 年，艾森豪威尔发起一连串运动，指政府混入了不少苏联特工，再次使杜鲁门政府备受困扰。

由于放任中国赤化，而造成朝鲜战争这场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战争与解除迈克阿瑟的职务，使杜鲁门在国内变得极不受欢迎，更促使他在 1952 年的大选不再寻求连任。

1952 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刚当选美国总统之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

1953 年 1 月 20 日，反共立场坚定的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声称为结束战争，不惜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格洛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覆函格洛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4月底，在毛泽东指导下，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构成纵深防御。

5月13日，朝中军队发动夏季进攻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志愿军出动20兵团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在火炮掩护下从西线、中线、东线、三路出击，从正面突破联合国军地下坑道防御工事。至6月中旬志愿军共毙、伤、俘联合国军4.5万多名，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6月16日，李承晚覆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韩国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

7月13日至27日志愿军展开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这次进攻以打击韩国国军为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13日发动金城战役，几天内歼敌5万人。志愿军在朝鲜金城以南地区，对韩国国军防守的坚固阵地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志愿军第9、第19、第20兵团及人民军对韩国国军作战45次。在7月13日展开进攻至16日转入防御，仅3天时间便将战线从正面向前推进192.6公里。联合国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出动8个师兵力反击1000余次。中国大陆宣称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予韩军汉城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联合国军3个师，共歼灭联合国军52783人，志愿军伤亡2.3万人。

金城战役给李承晚及韩军以严重的打击，有利配合了停战谈判。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韩国施压；随后韩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5月，中朝军队发动夏季第五次战役失败，双方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只是美军并未主动向北进军。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中国，如果继续拖延和谈，联军将与美国开战并不保证不使用核武器。恰逢苏联斯大林去世，新政府也要求中国签署和谈协议。双方磋商战俘问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返回中国大陆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64人被集中到位于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者管理处。但在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战俘的原有方针发生了大幅转变。截至1954年3月，回国

战俘中有 91.8% 被开除党籍，6,064 人中约 700 人被开除军籍，4,600 余人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除此以外仅有 30 多名连以上干部和少数人因伤残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余人一律复员。此外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并在文件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还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 1 月 23 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审查和思想改造。在战俘营时，中华民国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美方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 34,686 人、受伤 103,284 人和被俘 4,714 人，共约 14 万人。战争也使改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两国相互隔绝长达 25 年，直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才得以改善。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十分复杂，苏联借此势力范围进入中国东北，而且战争随后扩大化，并也趁机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给中朝赚取资金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力参战，直到 1965 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183,108 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阵亡于朝鲜半岛，西方估计阵亡人数为 400,000 人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直接导致中（共）美关系破裂，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西方世界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当时仍在联合国并代表“中国”保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对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中共再难以发动对台湾的战事了。

第二十一章 中共入侵新疆和西藏

1949年9月25日-26日，中华民国国军驻疆部队和新疆省政府相继倒戈。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新疆，收编起义部队、接管政务，至1950年初将其全境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之下。

评注：新疆原称西域，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公元前60年汉朝首设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年左宗棠驱逐了入侵的阿古柏军队；清廷下诏，设立“新疆布政使司”，新疆正式建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被中华民国取代，革命党人湖南人刘先俊等在伊犁策动起义，杀死伊犁将军志锐，成立伊犁临时军政府。1928年6月，蒋中正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国民政府设置“新疆省”，7月1日杨增新自行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7月7日被刺身亡。11月17日省政务厅长金树仁成为新疆省主席。

由于不满金树仁的政策，各地民变迭起。1933年4月12日在一些不满金树仁的军官利用流亡新疆的白俄归化军发动政变，推举盛世才为新疆督军。

1933年盛世才掌握新疆省大权之后，为了依靠苏联稳固统治，长期实行亲苏亲共政策，惟双方彼此互不信任。

1937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约400人在盛世才的允许下进入乌鲁木齐，开启了中共在新疆革命运动的序曲。

为了抵御英国和日本的势力向新疆渗透，苏联政府与盛世才商定，在新疆建立一个专门侦察境外敌情的机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开始组建，即为“先锋社”。1939年，中共选派数十人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学习结束后刘庆南、杨文先、王振坤、杨天云、张明敬和谭政文等人又被共产国际先后派到新疆边务处工作，受苏联顾问领导，从事对美英的情报工作。

盛世才前期依靠苏联支持巩固政权，进而控制了新疆全境。为表示其亲共，盛世才前往苏联考察，还邀请中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到新疆工作。后期和中共决裂，将这些共产党人逮捕；1943年国民政府人员随同国军部队进入新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新疆相对独立，是抗战的大后方。盛世才还派军支持了绥远抗战等战役。

1944年9月，盛世才因试图再度投靠苏联斯大林而被国民政府调离新疆。他的调离使新疆暂时出现权力真空，新疆北部爆发了多起事变。

苏联趁中华民国进行抗日战争之机，于1944年11月7日在新疆省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策划的分离主义叛乱，中共和苏联称之为“三区革命”的开始。此为中华民国时代最主要的新疆民族冲突。事变后苏联扶植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在其控制区内“杀回灭汉”。后“三区”势力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合流。毛泽东的评价“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

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后，蒋介石改派吴忠信就任新疆省长，并把下属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员。蒋介石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平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45年期间，国民政府屡次与支持叛乱的苏联政府交涉。1945年7月5日，蒋介石在一次中苏会谈上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保证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对中共和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会后宋子文继续与苏联谈判。斯大林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宋子文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

1945年10月，双方同意派代表赴迪化进行谈判。1946年6月6日国民政府和苏联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签下协议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取得绝对优势，夏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甘肃省一带的河西走廊，夺取了通往新疆的道路。

此时的新疆分别由两股势力控制着：一股是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中华民国国军，另一股是苏联扶持下的、割据伊犁的三区政权。在苏联的要求下，三区政权决定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带领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但途中不幸坠机导致十七人全部遇难。

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是国军驻疆部队的主官，他与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主张投降中共。

陶峙岳是湖南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任营、团、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他和张治中是同窗，到新疆赴任之前，在兰州与张治中倾心交谈，两人分析国共内战，对新疆及河西走廊的出路问题双方都已有默契。

1949年8月26日，兰州宣告解放。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向他介绍了中共在西北战事的发展，请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期间已经投向共产党一边的张治中在中斡旋，而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邓力群。

9月10日，张治中分别致电陶峙岳和鲍尔汉，劝勉他们说：“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各族人民和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陶峙岳提出起义应注意的问题。

9月17日，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赴兰州，同彭德怀商谈新疆与河西起义事宜。曾震五途经酒泉、高台，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等人传达了陶峙岳的指示，让他们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曾震五路过张掖，又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

9月24日晚12时，陶峙岳正式通电，率领河西警备司令部3.8万名官兵起义，是为酒泉起义。25日，解放军和平进入酒泉，酒泉易帜。

9月25日晨，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的叶诚、马家军的重要将领马呈祥师长等中华民国军官拒绝投降中共，他们携带家眷离开迪化，取道南疆前往印度，再到达台湾。陶峙岳特地为马呈祥、叶成、罗恕等人设宴饯行。

9月26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迪化市政府市长屈武通电易帜，标志新疆易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王震宣布10日开始向新疆进军。11月，第一兵团机关在王震的率领下进入迪化。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三区民族军于12月20日正式被收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30日，国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日后，他们大部分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其后，解放军通过新疆剿匪战役，迅速控制了新疆省的局势。王震在新疆大肆屠杀维吾尔族人，声名狼藉。

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1955年，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改新疆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0年代初，在新疆的反叛势力主要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和泛突厥主义、伊斯兰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1950年代的新疆剿匪，以军事手段消灭了大部分反叛势力，中华民国政府在新疆的残余军事力量被清除。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对西北局和西南局作出指示：“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在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

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

评注：“西藏和平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而中华民国的学者、西藏流亡政府的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入侵西藏”。

西藏自吐蕃王朝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本土宗教是苯教。640年，松赞干布派噶东赞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携来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饶摩齐（即今拉萨的“小昭寺”），两国互相修好。

自唐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佛教也随而导入西藏。后来崇佛思想隆盛，迎请莲花生入藏，莲花生善于咒术，莲花生的咒法与地方旧有宗教结合，成为红教宁玛派。因为受了印度无上瑜伽部密教的影响，形成了其他不同宗派。其中的葛尔玛派，经长期演变，形成了化身喇嘛的制度，延续至今。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藏族地区形成群雄割据、互不相属、没有统一政权的分裂状况。清朝自1720年代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以实际控制西藏地区，视其为中国领土。

从清初到18世纪末清廷对西藏的控制呈逐步加强的趋势。1751年，乾隆皇帝颁行策楞所奏的《西藏善后章程》，扩大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驻藏大臣、达赖与班禅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

1903年12月，由于对噶厦政府拒绝执行中英藏印条约不满，英国军队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4年7月27日率亲信被迫途经青海逃往蒙古。英军在拉萨大肆劫掠，抢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清政府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同英方谈判，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1907年《英俄条约》承认清朝在西藏的宗主权。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清末，国家出现分崩离析的时候，蒙古和西藏等地纷纷出现分离倾向。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余名川军抵藏，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钟颖川军抵拉萨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藏人无不痛恨。

驻西藏地方的清军军队，很多是四川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播到西藏地区，驻拉萨清军发生内讧。其中有拥护共和，有主张勤王，也有自行返回内地以自保。各派自相残杀，军饷也断绝了，清军在西藏地

区开始大肆抢劫。清政府派驻的大臣联豫、钟颖等人只知道借机谋取私利，西藏地区极度混乱。部分官兵囚禁了末代驻藏大臣联豫，更有士兵乘机钞略百姓，攻击寺院。拉萨陷入混乱状态。1911年冬天，清朝驻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革命党人尹昌衡斩首，局势剧变，西康地区也发生严重动乱。至1912年底清军及驻藏大臣全部撤出西藏，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

1913年2月14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宣布解除西藏与清朝皇帝之间的供施关系，在英国的协助下推行现代化，建立英式训练与装备的藏军，送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划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区在内）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省节制。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先后数次向驻在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占领了原由川军控制的大部分康区，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

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刘曼卿以国府代表的身份赴藏，是国府首位进入卫藏的官员。

1931年，藏军又进攻青海玉树地区，遭中华民国政府青海军队击败，中华民国政府川军也趁机在康区发动反击，藏军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同意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华民国政府和西藏当局谈判解决。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1934年热振呼图克图被公举为西藏政府摄政。

1935年7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该委员会迁至康定。当时，该委员会名义上管辖康定地区的20个县，以及已经被西藏噶厦控制的13个县。

1936年8月，英国驻拉萨使团抵达拉萨，成为此后16年英属印度与西藏关系的中心。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重申金瓶掣签制度。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按照西藏的传统方式，开始寻访转世灵童，并于1938年在青海省湟中寻得幼童拉木登珠，1939年迎到拉萨，取法名丹增嘉措，确认其为转世灵童，1940年举行了坐床典礼。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康定，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实际仅能管辖金沙江以东的康区。

1941年1月，热振活佛辞去西藏摄政的职务，并推荐自己的经师达扎继任摄政。达扎倾向英属印度当局，并积极推动西藏独立。1942年7月，西藏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通知中国、英国与尼泊尔此后与外交局交涉，英国表示同意。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了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但噶厦一直不承认其地位，另外认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令其住在拉萨，并宣布其经过了西藏独立国的批准。中华民国政府因噶厦反对，直到1949年6月3日才“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举行了坐床典礼。

1947年冬到1948年，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团长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一些国家。

1949年7月，中共取得扶郿战役的胜利后，开始准备进攻甘肃及青海地区。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借口占领西藏，西藏噶厦驱逐了中华民国政府驻拉萨的代表处，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为了阻止共产党于西藏以外，在共产党进藏以前驱逐在藏的一切汉人，噶厦还举行了以诅咒汉人、共产党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等重大宗教仪式。史称“第二次驱汉事件”，以便谋求西藏自主独立。

1949年8月兰州战役爆发，正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8月26日派人赴西宁探听消息。9月10日，两名派赴西宁的喇嘛回到香日德，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及寺庙的政策，并且携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当时十一岁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宣布：“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

9月12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派计晋美赴西宁表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表达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愿望。随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率属下回到西宁，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的欢迎。这也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次同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贺电，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认为该复电“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兴。

1949年11月，西藏噶厦向美国、英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信，表示决意保持独立状态，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入行动作出毫无保留的抵抗。中共政府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中国统一事业”。

1950年1月噶厦政府预备派亲善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各国支持“西藏独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乃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这一行为“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并且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950年3月7日，西藏噶厦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印度噶伦堡，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展开对话，并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保证尊重西藏噶厦的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北京当局负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以少年丹增嘉措，即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核心的噶厦政权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7月10日，西康省甘孜县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自告奋勇，愿赴拉萨劝说西藏噶厦同中央人民政府议和。但是当其到达昌都后即被扣留，既不能前往拉萨，也无法返回甘孜。8月22日，他在昌都突然被害身亡。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分四路进军西藏。四路以康藏方向为主攻，由第十八军负责。在滇藏方向，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于7月上旬进驻云南贡山，后到达门工东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组建的骑兵支队600余人，于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在新藏方向，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135人作为进藏先遣连，8月底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

当拉萨方面仍然在议论时，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五个地方越过了康区由噶厦控制的西部和西康省控制的东部之间的临时界线金沙江，进入了康区西部。这次行动不是为了占领整个西藏全境，而是为了歼灭在康区西部首府昌都的藏军主力，降低西藏噶厦的士气，从而迫使噶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

解放军于1950年10月7日开始进攻康区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的城关镇。10月11日，藏军第九代本在格桑旺堆的率领下向中国解放军投降。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20多场战斗，击毙藏军的主力部队5700余人，俘

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 2,600 余名士兵，藏军于 10 月 21 日投降。

在占领昌都城关镇后，中国解放军停止进攻，释放投降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阿旺晋美随即赴拉萨重申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要求，希望西藏噶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合作。

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政府一片混乱。1950 年 11 月 7 日，噶厦政府决定向联合国求助制止中国的侵略，由印度代递的要求于 13 日送到纽约联合国总部。

12 月初，噶厦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求援，表明请求来自西藏的统治者达赖喇嘛，西藏愿意向联合国派遣代表团，协助大会讨论，并欢迎联合国派遣真相调查团到西藏。

达赖喇嘛于 1950 年 12 月 18 日离开拉萨，次年 1 月 2 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亚东，噶厦政府也以数百头骡子载运金银，寄存在锡金首都甘托克。噶厦政府在内部经过强烈争论后，决定放弃向国际求援，而与中国政府谈判。

1950 年昌都战役结束前，时年 15 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实权为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拥有。1950 年 11 月 8 日，昌都战役结束，藏军惨败。西藏噶厦内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摄政达扎·阿旺松绕被迫辞职。

1951 年 2 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

虽然没有得到丹增嘉措的授权，西藏政府代表团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确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

1951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说：“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的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

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10月26日，三千余解放军进驻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统治权。

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柳霞·土登塔巴率领的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时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说：“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的了，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前往北京市，两人先与毛泽东会面；随后以西藏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27日，丹增嘉措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之后，中共政府在西藏地区引进所谓的“民主改革”，由此展开的阶级斗争造成严重影响。1955年5月，趁着丹增嘉措从北京市返回西藏之际，西藏民众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递交请愿书，要求丹增嘉措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同时，丹增嘉措的经师还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召集当地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反对共产党的“民主改革”。

在1955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四川、青海等不受达赖管辖的藏区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由于当地藏人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安多和康区先后爆发武装冲突。

解放军官兵和共产党地方干部由于受到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往往认为藏族非常宗教化的传统，如藏族服饰、占卜等习俗，是“落后”的表现，共产党地方干部改革心切。然而藏族群众则对这些传统非常自豪，由此引发了一些宗教、民族矛盾。

1952年，循化县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族乡外，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嫌农业合作化速度太慢，指责某些干部是“小脚女人”。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1958年4月，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学习班”，不准离开。4月17日，岗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次日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

4月25日，中共解放军出兵镇压。在4小时内，民众死伤719人，其中435人被击毙。战事结束后，中国政府展开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循化县当时人口仅有11,000人。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

到了1957年，西藏地区的骚乱局势已经无法控制。1958年11月2日，丹增嘉措召集噶厦全体噶伦、三大寺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全体西藏政府官员采积极态度来处理，噶厦官员认定丹增嘉措不宜到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2月7日，中共邀请丹增嘉措观赏文工团演出。达赖出行按传统礼仪有25名藏军警卫团全程随行仪仗，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丹增嘉措坚持出行，两名僧官蓄意曝光其保密行程，致使消息经谣传变成“汉人准备带走达赖”。藏民群众控制了罗布林卡内的三位噶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起义。

在西藏骚乱爆发之初，由于担心生命安全，丹增嘉措和随从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帮助下，准备在3月17日离开西藏拉萨，出逃印度。

3月17日，解放军运输站民兵向罗布林卡北门方向发射两枚迫击炮弹，造成极度恐慌。达赖喇嘛依然未下定决心，决定请求神谕。乃琼护法执行神谕舞蹈，并给出了当夜就走的神谕后，达赖喇嘛携带母亲、姐姐、姐夫彭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经师林仁波切、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护法及随行藏军等600人随马队逃离拉萨。

3月26日，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宗，噶伦赤巴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定稿的《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认定此次事件为噶厦政府与“地方反动集团”所策划。

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八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噶厦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逼迫下与之签署17条和平协议的。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噶厦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

评注：佛教戒妄语，关于事实的真相，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记录了上述的过程。

一九五〇年夏天，就在藏剧节庆之日，有一天，我正好在诺布林卡宫，甫从浴室走出，发觉脚底下的地开始在动。已是深夜，我正和一位随从闲谈，并一边进行睡前盥洗。盥洗室位于住处几码外的附属小屋里，所以地震时，我正在室外。首先，我想到我们一定还会再碰到另一次地震，因为西藏位于地震频繁的地带。

既已十分确定，我一回到室内，就注意到好几副挂在墙上的书已东倒西歪。随之远处发生一起可怕的灾殃，我再度冲出去，后面跟着好几位洁役。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我们猜想这就是震动和轰隆声的肇因：可能是西藏军方正进行某种演习。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

翌日，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军事演习，而的的确确是某种自然现象，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随着这件事情的真相逐渐沉寂，人们自然开始认为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对科学深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为这件异象找寻科学依据。几天后，我遇见哈勒，询及如何解释此件异象；不仅是视之为地震，更重要的是视为殊异的天象。他说，他确定这两者相关。一定是整个山脉的上升作用造成地壳的爆裂。

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似乎可信，但不尽然如此。为什么地壳的爆裂以一阵伴随着轰隆声的夜空光亮显示？何况，隔着如此无穷尽遥远的距离，如何能为人目睹？我不认为哈勒的说法能说明一切。直到今天，我还是如

此认为。或许科学另有解释，但我觉得，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在这个个案中，我发现接受“目睹之情景为超科学现象”的说法，较为容易。无论如何，从高空或仅是地底发出的隆隆声警告，暗示了西藏的处境将迅速恶化。

异象就在藏剧节庆之前发生。两天以后，这个预兆（假如它是的话）开始被赋予实象解释。一直到晚间，表演正在进行当中，我发现一名传讯人朝我跑来。一直到帐下，他突然转向摄政塔汤仁波切，他坐在帐里的另一边。我蓦地警觉事情不妙。在正常的情况下，公事都必须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处理。我好奇到几乎忘形。这是什么意思，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是个小孩，又没有政治权力，我必须等待，直到塔汤仁波切酌情告诉我究竟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早已发现另一个实时得知的妙方：我站在一个有抽屉的柜子上，透过分隔我们房间墙上的高窗窥视。当传讯人到的时候，我往上蹬起，屏息侦察摄政的举止。他读信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脸色肃穆。好几分钟后，他才稍展神色，我听到他下令召集内阁。

我又发现这封信事实上是在昌都的康省省长打来的电报，叙述一起堡垒遭到中共军人突袭的事故，主事的军官阵亡。这的确是件重大新闻。早在前一年秋天，那里即遭中共越境入侵，他们高举将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意图——不管那可能意味什么。尽管事实上，所有拉萨的中国官员已经在一九四七年被驱逐了。

而现在看来，中共似乎足以肇至威胁。果真如此，我十分了然藏人正陷入重大险境，因为我军总共不到八千官兵，远非新近夺得政权的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对手。除了心头充满悲伤，我不太记得那年藏剧节还发生什么事。甚至最奇妙的舞蹈演出，鼓声节奏放慢，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们皆着精致的妆扮（有些穿着像骷髅，表示死亡），庄严而合拍地依照古代的舞步舞动。

二个月后，十月，我们极端的恐惧达到顶点。消息传到拉萨，一支八万人的中共人民解放军队伍已经穿越昌都东边的翠处河。中国广播宣称，中共建国一周年，开始“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斧头已砍下。再不久，拉萨势必沦落。我们不可能抵御这样的屠杀。除了缺乏人力，西藏军队的困境是拥有的现代武器太少，而且几乎没受过训练。整个摄政时期，完全忽略这些。尽管一些特定军团从驻地匆忙开拔，新的一支又招募齐了。由于历史背景影响，藏人基本上爱好和平，

从军被视为最低下的生活形式：军人被视为屠夫，派去与中共短兵相接的军队素质并不高。

去推测事情可能的结果，否则情况会改观等等，皆无补于事。不过，仍要说明的是，中共在进攻西藏时，大量损兵折将。在某些地区，他们遭逢强悍的抵抗，除了战争的直接为害，他们的难题大部分是补给不易，以及恶劣的天侯。许多人死于饥饿，其他的大抵也难逃高山症的考验。这种病总是折腾外来客，有时确能致人于死。至于这次战争，不管西藏军队数量多大、装备再精良，结果其努力终将赴东流。因为，即使中国的人口都比我们多上一百倍。

这个威胁西藏自由的举动，并非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并声明中共入侵，对和平无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西藏噶厦及政府向联合国求援，盼其代表西藏出面调停。但是，不幸地，西藏依照其和平孤立的政策，从未寻求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而且未曾致力于此——除了在年底前发出两份电报。

随着冬天逝去，局势越来越坏，要达赖喇嘛即位之说甚嚣尘上。人们拥护我全面掌权的行动开始出现——距离正常秩序，我还得等两年后。据说海报贴满拉萨市，批判政府，呼吁我立即即位；还有一些歌也有同样的诉求效果。

有两派立场：其一是视我为危机中的领袖；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负担这样的责任，我还太年轻。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没有共同商量的机会。政府决定将之付诸神谕。这是非常紧张的场合，最后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贡巾（哈达），放在我的膝上，并说“他的时代到了”。

扎滇金刚（Dorje Drakden）已经明示了。塔汤仁波切立刻准备从摄政位置退下来，他仍旧是我的资深亲教师。剩下来的就是占卜国师挑选即位日期的事了。他们选中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因为这天是年底前最吉利的日子。这样的发展令我非常沮丧。一个月以前，我还只是无忧的年轻男子，热切地期盼一年一度的藏剧节。如今我要面对这样紧迫的景象：在国家准备开战时，领导我的国家。但是，在回溯中，我知道这不是突如其来。迄今好几年来，神谕对政府显现出公然的轻忽，对待我却十分礼遇。

十一月伊始，大约在即位典礼前两周，我的大哥来到拉萨。我几乎认不得他。如今他是塔泽仁波切——古本寺的主持。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时，曾在古本寺里过了一年半初始的寂寥生活。当我定睛看他，我知道他受了极大的苦。他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非常紧张焦虑。他在告诉我

过程时，甚至口吃。我们两个的出生地，也是古本寺所在地——安多，毗邻中国，很快地落入中共的掌握中。他立刻受缚监禁。喇嘛的活动都受到限制，而主持本人却沦为罪俘，被关在寺里。同时，中国人全力对他洗脑，用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试图改造他。他们有个计划，如果塔泽仁波切愿意劝服我接受中共统治，他们会让他自由前往拉萨。如果我拒绝，他就杀了我，他们随后会酬报他。

那真是个怪异的提议。第一，任何杀生的念头对佛教徒皆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这个要他为了个人私利，而暗杀达赖喇嘛的建议，显示中国人对西藏人性格了解之肤浅。

经过一年，其间我大哥目睹自己在家园遭中国人颠覆，他逐渐了解他必须逃到拉萨来警告我以及西藏政府，如果中共进攻，我必须贮存粮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驯服，所以他终于同意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他喘着气告诉我经过。一直到现在，我对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共产党我更是几近完全无知，尽管我知道他们曾经严厉地迫害蒙古人。除此，我所知仅是手边刚巧看到的过期的美国《生活》杂志。但是我大哥现在明白告知，他们不仅是无宗教主义者，事实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塔泽仁波切告诉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得到外国的支持，以武力对抗中共。我听了，非常害怕。

佛陀禁止杀戮，但是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得已而为之。而按照我大哥的想法，当前的状况正是如此。因此，他要破了僧戒，脱下僧服，以西藏特使身分出国。他希望与美国联系。他觉得他们当然会支持让西藏自由的想法。我乍闻之下，吓了一跳，但是在我反对之前，他警告我离开拉萨。虽然有许多人也提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大哥恳求我接受他的建议，不管大多数人怎么说。他说，我的处境危殆，绝不能冒落入中共手中的风险。

我们会面过后，大哥在离开拉萨前，和许多政府官员讨论过。我和他再见过一、二次，但无能劝服他改变心意。他在过去一年来的可怕境遇使确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没细想这些事情，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还有几天，即要举行我的即位大典。

为了纪念这个典礼，我决定全面大赦。当天，所有狱囚都会被释放，意即萧村的监狱将会一空。我很高兴有机会如此做，虽然也有懊悔的时候。回想当年与狱囚之间似有若无的友谊，我不再拥有这种乐趣了。当我在庭院中透过望远镜遥望萧村，我看见监狱里空空如也，除了几只狗觅食残渣。那一刹，彷彿有一些东西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十七日的早晨，我比平时早起一、二个钟头，天色仍黑。着衣时，我的服饰总管交给我一件绕在腰上的绿巾。这是按照占卜国师的指示，他认为绿色是吉祥色。我决定不吃早餐，因为典礼冗长，我可不想被任何生理讯号干扰。不过，占卜国师坚持在典礼开始前，我必须吃一个苹果。我记得那真是难以下咽。诸事妥当后，我到佛堂，破晓时，即位典礼将在此地举行。

这是个政府官员全员到齐的场合，还有各外国驻拉萨官员随同壮声势，大家都穿上最正式、最绚丽的华美服饰。不过，当时天色很暗，我无法看个仔仔细细。典礼中，我接受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我记得不太多，只除了一阵强胜一阵的释放膀胱尿液的急迫需要。我责备占卜国师。他们要我吃苹果的主意无疑是问题的根源。我对他们从没有太大的信心，而这次又强化我的坏印象。

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日子，如生与死，不必听占卜国师的意见，不必劳动其他人。不过，这只是在下鄙见。这并不意味我认为藏人习惯的占卜实务应该中断。从西藏文化的观点而言，占卜是很重要的。不论如何，在这个场合里，我的情况愈来愈糟。

最后，我传讯下去给侍卫总管，请他加快节目进行速度。但是节目繁冗，我开始害怕它永远不会结束。最后，节目终于结束。

我发现自己成为统帅六百万人民的当然领袖，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而我只有十七岁。这是个难以自处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尽各种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是我的责任。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提名两位新总理。

提名两名是源于西藏的政府制度，从总理以下的各个职位都是双轨并行，每一个职位各由一名在家人与出家人担任。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是首位在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是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如我先前所述。

不消说，改革也从未进行过。即使是达赖喇嘛也无能为力；因为无论他提出什么，首先，他必须照会两位总理，然后是内阁，其次是行政部门的每一位成员，最后付诸国民大会。如果有任何人反对他的提案，这件事便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改革由国民大会提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除非程序颠倒。比如一件法案最后提陈达赖喇嘛，也许他希望做点修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写在羊皮条纸上，钉在原先的文件里，送回国民大会表决。但

是他们深信各种外国影响会危及西藏佛教的恐惧心理，则是煽动性的改革难以推展的原因。

由于心理有底，我选了罗桑扎西作为僧官总理；另外选了干练的俗官行政人员鲁康瓦，作为相对的俗官总理。

诸事停当后，我决定和他们及内阁商议出访美国、英国及尼泊尔的代表人选，希望说服这些国家代表我们和中共调停；另一方面，则派人赴中国协商撤兵。这些特使团直到年终才出发。之后不久，由于中共军队卫戍在东方，我们决定我应和最高级的政府官员移到南藏。这样，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同时，两位总理依旧留在拉萨，我则带着国玺走。

达赖喇嘛说：“（流亡）的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竭”。

第二十二章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从 1947 年开始土地改革，至 1953 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 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部分地租。从 1953 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推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等运动，又收回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1947 年 7 月至 9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到 1949 年 2 月，解放区 2.7 亿人口中，有 1.5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 1 亿农民分到到大约 3.75 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

1949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在《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逐步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

毛泽东认识到，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走私、囤积、投机，企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反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家庭成员成为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强奸、轮奸、性虐待的事情时有所闻。

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苏南 200 多个乡发生了乱斗乱打；一共有 218 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 1950 年 6 月 2 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 20 天里逼死七个人。

抗日爱国士绅牛友兰在 1947 年的晋绥土改时被斗得死去活来，有二流子将他的鼻子用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牛友兰不堪忍受，绝食身亡。

当时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新上任的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 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杀。

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 年 2 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土改之初，毛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

泽东还提到中共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大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据不完全统计，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剥夺了 100 万-500 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毛泽东在 1948 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低于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 83 万人，毛泽东估计 2-3 百万人。中国共产党通过杀人，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评注：中共建政之初，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征粮问题。因为前方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在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 and 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

共产党的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旦掌握了政权，对老百姓更是肆无忌惮。学者刘练军认为，土改中以人民法庭镇压，是法律政治化，违背了法治。

中共建政后的种种政策都是承前启后的，其残酷的斗争理论一以贯之，使人们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不能讲真话，连自由思想和表达也成为罪恶，从根子上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用，从此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信任，甚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一家人信任机制也被瓦解，这个社会里人性开始退位，中华大地一步一步地变成人性荒漠，变成大监狱和人间地狱。

学者颜昌海认为，“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所有。”

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在长期研究后，认为“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他指出，土地改革“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作家陈沅森认为，土地改革“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1949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进入尾声，解放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的边沿地带、偏远山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剿匪”的重点地区。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中共用三年时间基本消灭了东北地区国府势力。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要求各地继续清剿残余国

府势力。中共要求“所有剿匪区域，必须发动群众。因此应有计划地抽调千余干部组织工作团，经过动员、解释，使大家深切了解东北的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其后台老板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还有力量。”

1950年1月至10月，发生试图推翻新政权武装暴动816起。效忠中华民国政府的武力在西南地区攻打、攻陷县城计百余座，近四万名中共党员及新政府干部、支持者被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39个军140多个师的150万人开展剿匪，1950年至1953年间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部分完成剿匪任务的解放军被派往朝鲜战场。军事行动持续至1953年，消灭、投降者260余万人。

评注：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作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讲话。

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清洗出去。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给公安部作出指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毛泽东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将罗瑞卿、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10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12月19日，毛泽东说：“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会议上做报告说，以一贯道为主的会道门是当时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来中共在老区要直接镇压会门，在新区则先针对会门领袖，为直接镇压制造条件。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又说，“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

评注：一贯道是新兴的中国民间宗教。清末王觉一是一贯道实际创始者。其教义源出先天教为主，并融合儒、释、道、基督、回五教教义，认为现今末法时期，世人迷失根本，因此上天降道，挽救善男信女，唯有求道授记，才能超生了死。

一贯道有以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事，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冀世界为大同。”经过一贯道的求道仪式者称为“道亲”，指“因道而亲”，也是信徒间的互称。

原本仅在大陆山东省流传，民国年间，张天然将之传布开至全中国大陆。民国年间，一贯道各地的道堂公益慈善事业做得很多，如施粥、施茶、舍药、助葬、济贫、救难等善举。

广泛吸收和培养传道人才，传道与经商结合，大力发展传道组织。一贯道先后在济南、天津、青岛、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建立了总坛和若干有影响的支坛，不断向外扩张，而在各省，又以县、市为单位，每县、市设一总坛或总柜，道务先传入各省大城市，再由各大城市传入各县、乡、村，连成一线一线，相互交织，形成一贯道组织网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度下令取缔一贯道，但不久改为控制利用，授意改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变换形式，继续公开活动，在解放战争期间，配合蒋介石政权，做了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事。

1950年底，中共中央下令全面查禁反动会道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指出取缔一贯道既是一场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思想斗争，不仅须要摧毁其组织，还要摧毁其思想影响。

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立即予以逮捕；中共下令枪决一批一贯道首领。据统计，西北区退道者已有10万人，山东10万人，察哈尔10万人，皖北3万多人，苏北2万多人，天津16万多人，北京17万多人。

经过这场打击风暴，一贯道自此在大陆销声匿迹。

评注：虚云老和尚以一身而兼禅宗五宗法脉，是中国禅门泰斗。1951年春，虚云老和尚拟在广东云门山大觉寺传戒。正值全国各地开展镇反运动，广东省乳源县民兵包围寺院，以该寺隐匿反革命分子，窝藏军械及金银为由，将虚云老和尚等二十六名僧人囚禁起来拷打。已经112岁高龄的虚云和尚被拘禁于方丈室内，门窗封闭，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并遭四次毒打，虚云和尚肋骨折断，遂阖目不视，闭口不语，呈入定状，八日后始苏醒，虚云和尚呕心沥血所撰《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著作毁失殆尽。事发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斡旋，事件至1951年5月下旬，历时三个月才告一段落，震动海内外佛教界，称之为“云门事变”。

根据《虚云老和尚年谱》记载：

春戒期中。“云门事变。”

三月初三日。师病重时。即跌坐入定。闭目不视。不言。不食。不饮水。惟侍者法云。宽纯。日夜侍之。端坐历九日。十一日早。渐倒下。

作吉祥卧。侍者以灯草试鼻官。气已绝矣。诊左右手脉亦已停矣。惟颜色如常。体尚温。

迨辛卯岁春。开戒期间。四众云集。寺中有僧众一百二十余人。夏历二月二十四日。忽有百余人。前来围困本寺。禁止出入。先将虚老和尚拘禁于方丈室中。以数人守之。复将各僧分别囚于禅堂。法堂。大搜寺内。上自瓦盖。下及地砖。佛祖尊像。法器经藏。微细搜检。竭百余人之心目手足。经两日时间。一无所获。遂将监院明空。及职事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去。复将册籍部据来往书札。及虚云和尚百年来之精注经籍法语文字。尽用麻包捆载而去。加以种种罪行。其实情则误听外间传说。谓寺内藏有军械及发电机。又藏有金条白银。其目的固在此也。数日之间。共拘去僧众二十六人。施以种种楚毒。逼令供出军械及藏金。众称不知。于是妙云被打死。悟云。体智等。亦受多次毒打。手臂断折。此外复有数僧失纵。扰攘十日。终无所获。遂迁怒于师。

先是三月初一日。将师别移禁一室。门封窗闭。绝其饮食。大小便利。不许外出。日夜一灯黯然。有如地狱。至初三日。有大汉十人入室。逼师交出黄金白银。及枪械。师言无有。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继用铁棍。打至头面血流。肋骨折断。随打随问。师即跌坐入定。金木交下。扑扑有声。师闭目不视。闭口不语。作入定状。是日连打四次。掷之扑地。视其危殆。以为死矣。呼啸而出。监守亦去。侍者俟夜后。扶师坐于榻上。初五日彼等闻师未死。又复入室。视老人端坐入定如故。益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十余众以革履蹴踏之。五窍流血。倒卧地上。以为必死无疑矣。又呼啸而去。入夜。侍者复抱师坐榻上。端坐如故。初十日晨。师渐渐作吉祥卧下。经一昼夜。全无动静。侍者以灯草试鼻孔。亦不动摇。意圆寂矣。惟体尚温。颜色怡然。侍者二人守之。至十一日晨。师微呻吟。旋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卧睡时间。师徐语侍者法云等。神游兜率听法事。夫甚深禅定境界。苦乐俱捐。昔憨山紫柏受严刑时。亦同此境。此非未证悟者所能代说也。

经此数日。行凶各人目睹师行奇特。疑畏渐生。互相耳语。有似头目者。问僧曰。“为甚么老家伙打不死的。”答曰。“老和尚为众生受苦。为你们消灾。打不死的。久后自知。”其人悚然。从此不敢复向师施楚毒。惟事情扩大至此。所图未获。更恐泄漏风声。故仍围困。及侦查搜检。对各僧人。不准说话。不准外出。即饮食亦受监视限制。如是者又月余。时师所受楚毒。伤痕并发。病势日增。目不能视。耳益重听。弟子虑有意外。促师口述生平事略。随录为自述年谱草稿。正此时也。

夏历四月间。云门事变渐渐传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鉴寺僧人。通知在北京之师门弟子。及海外同门。联同救援。于是北京方面。电令地方政府严查。围困始续渐松懈。而所有粮食衣物。大部掠夺去。师自重伤后。不进粥饭。日饮清水。继知粮尽。白众曰。“老人业重。带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应分向各方。求生续命。”而僧众皆不愿离师去。乃集众往后山采樵。量为轻重。挑往十余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钱买米回寺。煮粥同食。朝暮课诵。及坐香不辍。

五月上旬。北京政府派专员数人至粤。会同广东省政府人员。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乳源县署。二十三日。（即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抵云门寺。实地调查。携有技术人员。及录音机。摄影机等等。先慰问 师法体轻安否。是时师病卧榻上。耳聋目瞶。并不知是京粤所派之大员。及见地方官警。更不欲有所说。问师曾受虐待否。财物有损失否。师均言无。及后各员表明身分。师只言请诸君切实调查。回京报告。各员再三安慰。并饬地方有司。查明将先所拘之僧人释放。计云门寺自夏历二月廿四日起。至五月廿三日止。始脱苦境。事后北京友人复编者书曰。“虚师事。公只知其概况。所以复安之故。可成一书。今亦末由奉告。”其中情形。曲折可知。秋冬之际。师于重伤重病之后。从事休养。僧众百人。亦以采樵耕植。及手工业度日。附近百十乡村。闻云门解围。咸来看和尚。而师之弟子在京内外者。多方设法。欲师离开云门。且时有函电致地方有司。殷勤劝慰。云门事变。至此告一段落。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南京、上海方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0000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该在南京多杀！

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请各地党、政府和军队机关注意，提醒说：“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话，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

同年4月2日，毛泽东谈北京市委的镇反经验时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办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

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国民政府残余势力、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代初，由毛泽东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对中共势力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镇反运动对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工以及传统会党、帮派、土匪等地方武装势力进行了镇压，具体方式包括处决、劳改、送监等。据中共官方统计，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诸多冤假错案。外界则估计有100-200万人遭处决。

镇反运动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1951年底后，镇反运动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

评注：“三反运动”的高潮是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执行枪决。

据中共官方公布，1950年至1951年间，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在担任天津专区领导的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亿9151万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亿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亿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亿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

从事非法经营。以上挪用公款、骗取贷款共计 155 亿 4954 万元（相当于今币 155 万余元）。

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 1.84 亿元（合今币 1.84 万元）、张子善贪污达 1.94 亿元（合今币 1.94 万元）。

11 月 21 日，中共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会议上公开揭露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问题。11 月 29 日，河北省公安厅在天津地委出席省党代会驻地饭店逮捕了正在吃饭的张子善。当时身处苏联访问的刘青山被电召回国。12 月 2 日，刘青山随团乘火车抵达天津时被捕。

1951 年 12 月 8 日，毛泽东作出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952 年 2 月 10 日，河北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2 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当天下午，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

1951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说：“对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他说：“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5 月 15 日，毛泽东指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毛泽东还为反革命分子定了指标：“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少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说：“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的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的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的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1951年至1952年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开展了一场叫做“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在于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消除中共取得政权后干部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权力寻租，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瓦解、失败的覆辙。

“三反”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给各大军区的电报中称，“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2月11日，毛泽东又给军区发出批语，“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三反运动”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内部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级部门。三反运动开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共产党干部的信息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一些工商业人士开始响应政府号召，写坦白信和检举信。

“五反运动”则是因为三反运动在进行中，寻找贪污腐化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将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腐化的私人工商业阶层，其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认为，私人工商业者对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财产，于是需要在工商界开展整肃运动。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针对城市里的“五反”说，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说，“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

“五反运动”开始时，同样是报刊铺天盖地的刊登检举揭发信件。上海开始逮捕工厂经理、市面经理、商店经理、行商掮客等工商界人士。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累计

有两万工人失业。部分地区动用各类私刑逼供，包括打人、骂人、捆人、戴高帽子、挂牌、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坐老虎凳、不准睡觉、火筷烙手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自杀。亦有许多人士被处决或折磨致死。

仅上海市一地，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受迫害而自杀者达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商人和资本家是全家多口人一起自杀。

三反五反运动对上海、天津、重庆等地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一定冲击，也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亦有许多人士被处决或折磨致死，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消亡。

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公安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刘少奇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杨剑雄处决了。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总结一年的工作称：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评注：1949年8月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设立“政治课委员会”，开设政治思想课，支持学生创办民众夜校，倡导“工读运动”，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始。

在中共的提示下，教授们开始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提出自我检讨。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自我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评，称“决心按照马列主义与新社会的需要改造自我。”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界纷纷展开自我批评。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经过谈话和了解，马寅初认为“北大的大多数师生的思想够进步，唯职员的思想较落后”，遂用佛教史专家汤用彤、语言学专家罗常培等意见，举办暑期职员政治学习班。

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20所高校的3,000余名教师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己改造思想的经历，要求知识分子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再经过学习和实践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

周恩来规定，思想改造运动“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曾经在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被迫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实施者”。教师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接受“思想洗澡”，进行自我批评。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发起交代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对分子。

《武训传》本为一部普通电影，1948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公映后受到全国各界广泛好评，各地报刊纷纷刊文肯定“乞讨兴学”的武训精神。特别是广大教师看过电影后，纷纷表示要热爱本职工作，关怀下一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武训传》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下子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毛泽东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江青在武训调查团赴山东调查前传达毛泽东本人的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结果，导演孙瑜、演员

赵丹都为这部电影写出了自我批评的文章，还有相关的数十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 1950 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

1945 年 1 月，胡风筹办的文学杂志《希望》第一期刊世。创刊号上刊发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呼唤个性解放，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不一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批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2 年 9 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刊登于 1953 年第 2 期和第 3 期的《文艺报》。

作为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 年 3 月至 7 月，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过当时负责文教工作的习仲勋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系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在会议快结束时，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将斗争的风向转向胡风。

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中宣部对 30 万言书进行研究后，于 1955 年 1 月 20 日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指出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

胡风进行彻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中宣部的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芜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中国文联常委巴金也发表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与胡风划清界限。

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按语说：“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目。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毛泽东说，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

毛泽东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7日胡风被拘捕。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声讨的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 揭露胡风》的大标题。

因胡风案所牵连，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

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包括：华岗、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

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延续，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一级党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机关开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将各团体中镇压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五，造成了数十万人被逮捕、5.3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第二十三章 大鸣大放 大跃进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评注：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秘书室里，秘书也分成派系，相互斗争。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结束。

“八司马”是指秘书室的八位科长，以英文秘书林克为首。毛泽东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毛泽东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周恩来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所以杨尚昆想把他拿掉。

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很受刘少奇赏识。何载取代田家英当权后，骄傲而且自以为是，待人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

1957年3月，大鸣大放开始时，戚本禹、林克带头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大字报，但没有点杨尚昆的名。刘少奇来看过大字报，表态说这样搞不好：“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干部，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词尖刻，语气强硬的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开始了揭发批判。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把八位秘书科长打成反革命集团。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毛泽东5月3日回到北京。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毛泽东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泽东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

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等18位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位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人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历经磨难，饱尝了阶下囚的苦楚，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致病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

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就“如何收和如何放”，毛泽东想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先找教育工作者谈话。他提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他在座谈会上说：“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中说：“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毛泽东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对全国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干部说：“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毛泽东谈整风，“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195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鼓励群众和党外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其中提到“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过程中，《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提出要“鸣放”。对此毛泽东予以支持。随后不满此前“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针的人士主张改用“大民主”，提出“大鸣、大放”。

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毛泽东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开始出现。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始孤立右派。6月7日，毛泽东召见“秀才秘书”胡乔木和吴冷西，随

即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包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毛泽东表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

中共中央在10月15日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并导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代表。北京大学当时约有八千位学生，其中约1500名师生被归类为“右派份子”。

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1957年4月30日，章伯钧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章伯钧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章伯钧，一定要出席座谈会，提些批评意见。章伯钧表示：“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些言论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章伯钧被认定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底，章伯钧被撤除包括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九个职务。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

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29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

1957年6月罗隆基被划为“右派”。1957年7月，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开揭发罗隆基，指其为“披着羊皮的狼”，与其断绝关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储安平出身望族，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储安平在其著作《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说：“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回到北京工作，他在赴任之前借用主编的身份说服许德珩，接过了《九三社讯》的主编，在他手中这本杂志也变成了九三学社鸣放和整风的阵地。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

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指《光明日报》是资产阶级的，将之定性。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1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取消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

毛泽东说反右派这样的运动要常常来一次。他说：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

评注：1938年，梁漱溟第一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给了他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以为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第二次。可是他错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梁漱溟说，中共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等等。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

毛泽东以嘲讽的语气说，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一党那一派！

毛泽东的话讲的杀气腾腾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毛泽东说：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嘴上说得很重，下手却很轻，这真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最后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在7月23日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

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需要一个他信得过的狠角色来协助他的镇反运动。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他前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过目。7月，周恩来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

195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会前，邓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他说，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

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对象轻则遭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道：“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评注：中共建政后所谓的公私合营是共产党披上合法外衣的抢劫行为。

中国数千年来本是个农业大国，重农轻商，文化底蕴丰厚。广大农村乡镇具有庞大的乡绅和士族阶层，藏富于民，构成社会最坚固的文化和道德基础，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所在。这一切都毁灭在中共之手。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刘少奇说：“现在，资本家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情绪也不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两种所有

制：要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所以，牵涉的人很多，农民牵进来了，小手工业者牵进来了，小商小贩牵进来了，资本家牵进来了。要改变他们的所有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动荡不安，感觉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不晓得明天怎么样。毛泽东同志讲，现在资本家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54年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暂行条例》。

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

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让资本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持有，失去家族传承。

1958年8月在毛泽东的肯定下，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推广。

“人民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闲聊中产生的。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毛泽东说道：“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1958年9月，浙江舟山蚂蚁岛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决定把决策中心由公社转回到生产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工资重新按劳动量和所挣工分支付。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要交公，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有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农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饭，企图建立按需要免费供应食物和必须品的制度。

从1953年到1957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主持制定。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其中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以及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安排总投资766.4亿元人民币，相当大的部分用于电力、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以及基本建设所需的资源勘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器材储备等。计划所规定的建设任务，于1957年底完成，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

年增长 10%，超过计划 4.1%。农业产值增加了 20 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 4.9% 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 3700 亿斤。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

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写道：“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之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之主要武器。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毛泽东很不满意，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刘少奇噤若寒蝉。

评注：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

当时周恩来在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党内的冒进思想，周恩来说“用冷水洗洗”，刘少奇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于是，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少奇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

毛泽东在 1953 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主要就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表达了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高岗和饶漱石便想乘机夺位，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随之恶化。

1953 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等人以批财政部长薄一波来对抗刘少奇、周恩来；而饶漱石则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来对抗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注意高岗等人的举动。

1953 年 10 月，高岗借休假之机，到杭州拉拢林彪加入其阵营，林彪没有上钩。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12 月 24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高岗：“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

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陈云发言暗批高岗搞“独立王国”，刘少奇附和。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1954年8月初，高岗试图触电自杀但未成功。8月17日，高岗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在社论中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鼓励各地将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一线生产。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来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

1957年11月2日，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率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评注：中共建政后，苏联是唯一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国家。除了斯大林外，毛泽东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随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12月16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12月2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次日刘少奇起草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电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诸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吕东、张化东、欧阳钦等一行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轰炸上海，中共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但提出苏中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远东边疆和中亚地区、

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

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不少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1951年2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

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并提供相应技术。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对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认为三七开比较合适。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1956年底，波兰和匈牙利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苏联和中共都非常紧张。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林加宁3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时还说：

“我听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访华。这是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3次会谈。毛泽东对印度客人说：“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

1958年7月，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封锁金门岛。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

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指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3月22日，刘少奇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说：“不少青年读书读到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和农民，看不起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就认为自己比工人、学徒和农民‘高一等’，比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高一等’。他们读了几句书，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不是更尊重体力劳动者，而是更看不起体力劳动者。有个女同学来信说：‘要年轻白嫩的姑娘去种地，去担土、挑大粪，太不象话。’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劳动把自己的子女养大起来，送到学校去读书，而子女读了书，就说种地、担土、挑大粪‘不象话’。这样去培养青年，对劳动人民有什么用处呢？少教出一些抱这种错误态度的人，对劳动人民的事业不是更有好处吗？”

刘少奇说：“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正在精简机构，抽调干部，层层下放，深入农村。成千成万的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县长背粪筐，有的县委书记挑大粪。人们也知道，全国五亿多农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积极生产，为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难道全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群众，这样重视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都是在做着没有前途的事业么？不，他们都是在做着具有伟大前途的事业。”

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评注：1953年，毛泽东指示陈伯达等集中力量编写大中小学教材，尤其注意语文、历史等原则问题。鉴于教师的缺乏，毛泽东说：“教师只要不是现行犯，不做反革命宣传就可存在。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们的重点任务。”毛泽东指示：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学生建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减轻负担。

毛泽东说：“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毛泽东指示郭沫若等进行文字改革。“毛主席认为现在的简体字不够简，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划仍多。”“毛主席认为我们用的拼音字母，笔划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还难写。”“毛主席认为何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总起来说，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真正作到简单，如果不简单，就不能推行。”

毛泽东在 1956 年 1 月 20 日“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据说我们中国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我看不见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1954 年 7 月 30 日，毛泽东对于中医工作，也作出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毛泽东说：“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识），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评注：郭沫若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又被称为“五毛鼻祖”。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在文学方面，郭沫若被官方

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列为“鲁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在史学方面，被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郭沫若也是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专家之一。郭沫若写诗赞美斯大林；1951年获颁苏联国际斯大林奖。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郭沫若在苏联作访客五十天。8月20日回到重庆。9月3日，与文化界人士拜会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旧怀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给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长期戴这块手表。文化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1958年，其诗《太阳问答》中唱道：“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山顶上。”1967年，郭沫若赞美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打倒四人帮后，他又写诗骂江青：“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事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文革中，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1958年4月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

邓小平说：“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

“河南提出一年做到普及小学教育，也以提两年为好，即使两年实现不了也不要紧，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所有的省都照河南那样办。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刘少奇 1958 年 5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那些也是需要的。”

刘少奇举自己的例子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

1958 年初，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几次会议，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承担反冒进之责任。1 月 2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3 月 9 日至 3 月 26 日，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插话：“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目标。李富春提出 1962 年钢产量 3000 万吨，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计划。

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工业则“以钢为纲”，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

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各地迅猛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干部、群众、专家、教授被打成“白旗”。毛泽东又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 36000 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 46000 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1958 年 10 月，毛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新立村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 12 万斤。”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1958年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讯报道，报道中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泽东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毛泽东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不过，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也开始对浮夸风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1958年1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1958年底，中共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

由于炼钢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报导称，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刚刚从“八司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八位中南海秘书，那更是热情高涨，干劲冲天。他们响应党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在中南海里垒起了炼钢的“小高炉”。那个时候，在中南海里面一共垒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一座是机要室垒的，一座是秘书室的，还有一座是后楼研究室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小高炉旁边来看过。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赞扬秘书们干得好。毛泽东也来看了。但毛泽东看了之后就只是朝他们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十四章 三年大饥荒时期

1959—1961年间，中共和国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饥荒。据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时收割，大片田地荒废。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当时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在浮夸数据影响下，粮食净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1959年的420万吨。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借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考察一个养猪场时，饲养员说“牛粪拿来养猪，猪很爱吃的”。毛泽东说：“真是新鲜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大家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没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1959年10月，毛泽东鼓动发展养猪业。11日，毛泽东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11月19

日，毛泽东又有批语：“请各省市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9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之浓厚氛围中召开，估计形势和确定指标都不切实际。

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等；纠“左”工作中后退，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

4月，当时河南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史称“信阳事件”。

评注：为响应1957年中共提出的‘大跃进’号召，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嵒岬山乡则发动村民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

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欠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

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

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之补充计划；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和城市缺粮状况日趋严重；问题是积累起来，最初被假象掩盖，一旦发现大面积问题，事情已很难办；没有棉花供应，4月上海纱厂停工。

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

苏联政府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

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

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之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暴露出来；加上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之粮食产量下降到 2,870 亿斤，比 1957 年减少 26%以上。

进入 10 月以后，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死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越来越多严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问题使毛吃惊。

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评注：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分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 年 6 月底至 9 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 3 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

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在广东也引发了大饥荒，许多临近港澳的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对此默许。多数逃港者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持有县级证明的逃港者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有些逃港者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攀越梧桐山进入英界；或从盐田、大鹏和南澳一带游过大鹏湾，由于湾内有很多鲨鱼，逃港者往往被鲨鱼咬死。

珠三角西部的难民多先以澳门作中转，再利用快艇或渔船进入香港。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 1967 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

1962 年 4 月 26 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 62 个县（市）及全国 12 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 4000 人，参与逃亡人数 8000 人，但是，51395 个来自 12 个省、62 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1962 年 4 月 29 日，宝安县公安局的 14 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 19 岁到 40 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啞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

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香港黑社会强奸、斩杀，最后大约 200 万至 250 万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

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 1957 年、1962 年、1972 年和 1979 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 56 万人。

1962 年 5 月 14 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

1960 年 10 月 26 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

11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1960 年 12 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 1 万 8 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 8 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 10 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嵯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 600 余人，现揭发死人近 4 千，占总人口 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 30% 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 12 个中学，有 8 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对信阳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评注：刘桂阳是湖南衡阳县人，祖辈三代务农。1960年7月，她在鲤鱼江火力发电厂当运煤车间工人。母亲来信说家人因饥饿得水肿，村里饿死人。刘桂阳回到老家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后，证实情况属实。

1960年7月22日，刘桂阳书写了“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等12幅标语，7月24日，刘桂阳乘火车北上。7月26日抵达北京，她将“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贴在国务院北门外的墙上。

刘桂阳随即被抓，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公安局。6天后，她被押往郴州。同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入狱五年。

全国性饥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1988年，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干活。’”

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

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

根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杨继绳执笔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评注：根据《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的报道，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

“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 120 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 1100 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 1300 多人。

1959 年 11 月 3 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 14 个劳教队，集中劳教 1637 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 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 50 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 11 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 79 人。42 个公社主任中，有 3 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 22 人。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据通渭县委 1960 年 3 月 10 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 人进行揭发批判。

1960 年 3 月 1 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 17 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 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 1959 年的 3.86 倍。1960 年 12 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 250 人的工作组和 128 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 3370 多万斤，救济金 330 多万元，药品 136 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 8 万多人抢救过来了。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 1961 年 1 月 13 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 1960 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 339.7 斤，油 23 斤，鸡蛋 260 多个，粮食 473 斤，糖及糕点 62 斤，红枣 320 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 2010 年 9 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 4 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 4500 万人非正常死亡。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冬到 1960 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 65 万人，外流 109 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 23 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1960 年 5 月 13 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 300 多起。

张仲良 1954 年 5 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是治下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 100 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

评注：夹边沟农场最初为 1954 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上。直到 1960 年底，陆续有 3 千多名右派分子被送到该农场接收劳动教养。1959 年 11 月发放冬衣时，共有 3136 人，其中女性 32 人。

夹边沟农场环境恶劣，营地地区的农业仅限于被盐沼和沙漠环绕的绿洲中的小片草地，再加上劳教人员过多，农场无法自给自足，1960 年下半年，农场开始有人饿死。

为了生存，囚犯吃树叶、树皮、蠕虫和老鼠，甚至包括粪便和死人的肉。死者的尸体未被埋在营地周围的沙丘上。

1961 年 4 月 23 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 1959 年以来，共发生 1289 起吃人事件”，“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据对 1144 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 36 起，其余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让少数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并且要销毁有关档案。

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 1700 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 1000 万人”；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 940 万相吻合。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 1959 年至 1961 年实际死亡人数是 548 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 500 万人。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 1960 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 年）人口为 5500 万，不到 3 年的时间，现在（1960 年冬天）还有 5000 万，减少了 500 万。

评注：为什么四川省会死 1000 多万人呢？杨继绳在其《墓碑》中说，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1958 年，四川省狂刮“三面红旗”的浮夸风。7 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郫县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 3752 斤的“卫星”。接下来全省各地是密锣紧鼓的放卫星比赛，各个公社放出了一颗又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刚从北戴河开会回来，对郫县普遍而又严重的浮夸风不但没有制止，而且鼓励更多的“神仙数字”。于是，“共产风”成了大兵团作战，反复的折腾使得社员一无所有，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毛泽东形势所迫，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李井泉最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能揣摩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乃坚持“不降温”，继续顶风冒进。

1959 年 4 月 9 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喜欢高指标，所以，四川的高指标不变。所以，庐山会议 7 月 23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到公共食堂时，不但不批评，还表扬了四川的做法。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 1958 年冬，结束于 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 125 个食堂，除有 8 个食堂的口粮因种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 65 个食堂、15146 人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 1 月底先后断粮。有 25 个食堂、4644 人于 1959 年 2 月 25 日断粮；有 25 个食堂、6708 人于 2 月底、3 月初断粮。

李井泉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说，这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12.56%。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人口大量死亡，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500万斤救济粮，可是110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1961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少了26万，除去1958年底11个人民公社6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8.7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5.7万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1960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李井泉1952年担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主持四川工作。李在大饥荒时期，在四川粮食储备极少的情况下对于中共中央派给四川的粮食征购任务全力完成，虽然保障了中共中央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给，但反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民众因饥荒死亡。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其本人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在这五人的领导下，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但是李井泉则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现。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田家英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然后毛泽东就把李井泉找来。田家英也在场。毛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毛泽东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李井泉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毛泽东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出来，总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自己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核查。出乎李井泉意料，罗世发说了真话。李井泉这才在毛泽东面前认了错。

1960年8月20日，中央还了解到，四川的材料揭穿了一个“秘密”，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农村活路重，生活苦，城镇劳动轻松，又能拿现钱，便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农村”。“城镇占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基层干部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和舅子，老表，亲戚朋友，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使自己家庭生活舒适，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他们的家属从农村搬到镇城，安插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逃避农业生产”。因此，中央认为“从这次清理劳动力的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其上调粮食救急表示赞赏，终在大会上派到四川组了解情况的邓小平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

1962年，毛泽东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

在庐山会议上，毛对李井泉的批评给会议的震动很大。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虚了，因为他们都虚报过粮食产量。特别是吴芝圃，大跃进的时候他最能

吹了，所以在会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讲话前，他说自己“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至3000万人。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

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里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不过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高级干部其饮食均受到按级别分配的“特需供应”保护，生活影响并不大。

从1960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毛泽东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评注：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毛泽东得知后表示“麻雀是害鸟，最好要消灭”。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毛泽东在12月21日的手稿意见是“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谈农业问题时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1958年3月起，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1958年初，中国杀死了近20亿只麻雀。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

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这样，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评注：195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首先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生死与定居迁移、社会变动等事项做出管制。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

城市居民购买副食品、家庭日用品皆需票证。城市居民日常使用的的票证，有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普通民众所希望拥有的四大家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及收音机，皆需要凭票购买。

在这种凭票配给制中，除粮食、布料外，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除在供给体制外。困难的家庭只能使用布票换购，而当时人均全年定额仅够制作一身衣服。

1958年1月9日起入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官兵不设有户籍，在入伍时须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

簿以及入伍通知书或军校录取通知书至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军人退役时，户籍将被恢复并在居民户口簿中标注其兵役状况，恢复后的户籍可以是入伍前的户籍所在地，也可以根据相关政策携随军家属异地落户。

1958年1月9日起入狱的罪犯以及劳动教养的人员，在服刑或劳教期间，其户口会被注销，待刑满释放后，可凭监狱或劳教场所开具的释放证明书根据犯人的自身和家庭条件在原户籍所在地、直系亲属户籍地或其他亲友户籍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并在当地落户。

户口制度控制了人口流动并强化了控制，使独裁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根据人口对各区域合理分配资源，给日后的各种城乡不平和权力寻租等埋下了祸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存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他特殊人群的特定物品的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为特供体制。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特权供应除了提供特定物品供给外，还提供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医疗待遇服务，高级干部终身可以享受此类特殊待遇。

1941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严格的等级供给制。

1950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在北京建立香山农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为高级干部提供农产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长食品特供制。

34号供应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系的一部分。34号供应部是北京市食品供应处所属的首家企业，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而得名“34号供应部”。起初是在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来访以及国宴等重大国事活动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为保证安全，中南海特需供应站的工作人员出身和家庭成分均经过严格的审查，并且政治可靠、思想过硬。

1955年12月，北京市市长彭真成立了特种供应领导小组，特供任务从公安部移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食品特供系统。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

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物资缺乏。

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

此时，毛泽东的月工资大约四百元，中南海秘书室的一个秘书科长的月工资三十到四十元。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费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

中央明确规定：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物资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

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泽东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

有报道称，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其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

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的雪茄。毛泽东喜欢游泳，进北京城第一个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后毛批评其夫人并说建造费五亿元（旧币）由其个人承担。中南海内著名的室内游泳池，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保持温度的，其耗资非常巨大。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

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六种造型，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长沙来电话说毛泽东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泽东制作茶杯。最后共作40个。从此，毛泽东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评注：1962年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人人在大饥荒中饿死。她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时说：“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第二十五章 中共恶斗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

1955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几十米外的街上，路人都可以听到彭德怀骂的下流话。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讲过，毛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评注：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

毛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也没有这个经验。但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去不了。林彪装病是不愿意去。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师，那半个是叶剑英。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墙倒众人推”，是有道理的。

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经济遭受空前的浩劫，饥荒蔓延全国，造成了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

评注：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毛泽东这样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毛泽东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195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谈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之问题：“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在党内，邓小平领导地位更为突出。

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4月27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10月下旬，刘少奇在接见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时，对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称：“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年12月28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称：“党的根本队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要相信这一点。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则是不要比赛，划不划，都要慎重。”

1958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访问北京时，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1959年4月24日，彭德怀应波兰、德国等7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国邀请，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与王树声、杨得志、肖华等20余人出国访问。5月29日至30日，彭德怀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和赫鲁晓夫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出席了在地拉那“游击队宫”举行的宴会。

在庐山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贸然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受到了毛的抵制，使得赫鲁晓夫对毛大为不满。而彭德怀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是很暧昧的。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把解放军的服装一律改为了苏式的军服。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敌视和攻击的态

度。但他对彭德怀却是大加赞扬，就是在举行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也公开地赞扬了彭德怀。而就在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苏联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停止在核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这显然是一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表示。

期间彭德怀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份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备忘录。7月17日，赫鲁晓夫再次在波兰发表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评注：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大家反映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拥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毛泽东于1959年6月29日前往庐山途中，本以为存在的问题在郑州会议后已逐步解决。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与会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举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天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和经验教训，同时提交十九个问题与会讨论。

毛泽东首先要求大家多读书，“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是谈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接着是未来四年的任务。还有宣传问题、体制问题、公共食堂问题等。毛泽东要大家学会过日子，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之，“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7月5日，关于粮食问题，毛泽东要求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同志的报告让大会讨论。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10月2日到9日，大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组讨论。所以，庐山会议一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之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

彭德怀在参加讨论过程中先后七次发言对左倾错误提出极为尖锐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引起大家太大的反响。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讲话，就各方面形势总结。由于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之意图，彭德怀感到十分担忧。7月1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

7月12日张闻天同住在旁边的彭德怀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7月14日，会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三面红旗”政策再次受到肯定，同时指出了“大跃进”中政策的一些偏差。

当天，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接着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客观上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存在很多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总妄想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

《彭德怀的信》摘录：

1959年7月14日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

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与会全体成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说“本人未对这封信做任何评论。”会议便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同日，毛泽东又调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参加会议。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里10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说：“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上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

7月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了议定记录上讲到的之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等，并谈到了可能造成的后果。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称

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词句可以斟酌。他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在肯定成绩后着重总结经验，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7月20日凌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支持彭德怀。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还从哲学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

当天，上海书记柯庆施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7月22日，柯庆施等人向毛泽东提出“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和毛泽东的。

彭德怀上书后，庐山会议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讨论会中彭德怀跟毛泽东起了冲突，彭德怀忍不住粗言顶撞：“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

毛泽东之前就对彭德怀有怨气。毛泽东喜欢与年轻女性跳舞。1953年毛泽东成立中南海文工团，选调歌舞演员的标准是“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斥责毛“选妃子”。1958年后，中南海文工团被撤销。毛还在小组会中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毛泽东引了孔子的这段话，愤恨自己的“无后”，他认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他的儿子毛岸英，使毛岸英战死、导致毛泽东“无后”。

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称他们“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

当天夜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聚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还说，毛泽东不应在一线指挥经济建设，应该退到第二线，等等。

7月26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在这之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明显升级，批判内容由会议发言转到包括清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揭发与批判。许多人在发言中指责彭德怀等人要在庐山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彭德怀等人在高压之下不得不在小组会议上检讨。

7月31日、8月1日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宣称彭黄张周四人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毛泽东说彭德怀历史上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从哲学问题上称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

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在全会开始时的讲话中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首次提出了“军事俱乐部”。

“闻天同志：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泠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忧心。毛泽东。”

8月4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介绍了前一阶段开会的情况。林彪第一个发言，指责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对毛泽东，这是事情的规律，从长远说他是党内的一个隐患。

此后，小组会和大会进一步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清算他们的历史，宣称他们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指控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8月11日，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的角度，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8月13日至15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

8月16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

全会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

毛泽东总结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为都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批评，但是毛泽东都把他们保了下来。陈伯达当时就马上转了过来，他在庐山上就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还被毛泽东引用过。胡乔木也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可是从庐山会议以后，胡乔木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觉。本来他写东西笔头很快的，可那时哪怕让他写点小的东西，他都觉得吃力了。这一直到文革发生以后，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毛泽东倒是很关心他，还专门写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安心

养病，好好休息。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和陈伯达的关系却都不好，他们碰在一起就老要说陈伯达的坏话。

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去见陈毅，并要求与他个别谈话，陈毅就把秘书都叫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司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苏共领导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层，想支持反对派把毛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时，也企图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可以把毛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不再出席会议，回国了。彭德怀后来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8月18日至9月12日，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为内容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还牵连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8月24日，召开全国外事会议，对张闻天进行批判。

毛泽东于8月27日回到北京。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罗瑞卿为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央军委被改组，毛泽东继续担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罗瑞卿为军委秘书长。

1959年9月30日，彭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1961年10月下旬，杨尚昆转达毛泽东指示：“他（彭德怀）愿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之后，彭德怀屯田六年，自食其力。

后续：1965年9月23日，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毛对其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彭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1965年11月10日，彭离开北京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月21日，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又说，“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天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2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说：“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一篇文章名为《十年总结》：“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说对中央的领导干部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

毛泽东希望精简中央机关，他与1961年6月22日给邓小平写信说：“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

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主要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验进行“初步总结”。

由于遍地饿殍，毛泽东的威信大为降低，各地领导与中央离心离德，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原本是要求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以顺利推动粮食征购。

当时北京过完元旦不久，仍是天寒地冻，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由于人数众多，杨尚昆将7118人出席人员按省划分为35组，再按地区划分为400多个小组。

1月9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依照惯例先行召开小型工作会议审议书面报告。1月11日，在不举行开幕典礼的情况下，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这份书面报告由刘少奇起草；第一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并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邓小平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

自1月11日到24日，整整讨论了14天；一面又于1月16日在毛泽东指示下又成立一个21人起草委员会，包括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和修改。

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说“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人发言，最后，由刘少奇作总结。

刘少奇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定性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早在1月13日毛泽东指示国家主席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要有口头报告。

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称不能到处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毛泽东经常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之关系。

刘少奇根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的提纲作口头报告，并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他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1月29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林彪讲话，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

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宣布散会，预定1月30日或31日结束，31日晚代表即可回家过春节。

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于是七千人大会进入第二阶段。由于许多地方干部不满，毛泽东最后决定召开“出气会”，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并号召发扬民主。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说：“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家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在召开出气会的同时，曾经穿插了几次大会，中央政治局有几位常委上台讲话。毛泽东说：“谁都能讲话，就是彭德怀不能讲。”

毛泽东将林彪请出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直言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林彪身体向来不好，不耐繁剧，但当场足足讲了二个小时之久，林彪讲完话，毛泽东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1月30日毛泽东接着林彪讲话，在七千人大会发表即席演讲。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毛泽东的警卫员说，毛泽东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毛泽东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粮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粮食都不够了，武汉面临了断粮的危险。他就派人去把长江上从四川经武汉运往上海的粮食抢下来。后来上海把这事告状一直告到毛泽东那里。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是书记处的负责人，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

2月7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天，周恩来讲国民经济存在困难和克服之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刘少奇书面报告之决议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2月11日举行闭幕大会，闭幕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

然后，毛泽东请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他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接下来，毛泽东请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讲话，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立马语带讽刺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2月21日至2月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之继续。刘少奇认为：“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充分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

1962年，陈云发现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累计有50亿元，这个情况让中央领导人大大为震惊，刘少奇同志获悉此情况后表态，“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党组成员的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

会议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了毛衣继续讲。陈云讲话时，热烈掌声不断。

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亲自到武汉向毛泽东报告情况。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党内一部分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

评注：1953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中共中央确定在北戴河夏季办公，实际带有半休养半工作性质。为保障中央领导办公，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1957年，北戴河别墅区有新旧楼房183处，总建筑面积超过12.5万平方米，占地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北戴河召开。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会议，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期间毛泽东还作出炮击金门的重要决定。

1962年北戴河会议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期举行，会议起初讨论的重点是怎样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但毛泽东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的讲话，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该讲话是针对会议各组只讲经济问题，不讲阶级斗争问题作出的批评，也是对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批评，邓子恢背后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毛泽东讲话后，会议立即转向，柯庆施点名批评陶铸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说，陶铸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与邓子恢的包产到户不同，这为陶铸解了围。会议用部分时间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其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会议期间，因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反映《中国青年报》连载的小说《刘志丹》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会议乃将连载《刘志丹》小说的《中国青年报》分发到各大组讨论。天气转凉后，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结束，没作会议总结便散会。会后随即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1984年，北戴河办公制度恢复。2003年7月19日胡温政府宣布：“中央已经决定，今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北戴河办公制度自此一度中断十年。

“包产到户”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 1961 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毛泽东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 1962 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不但支持搞“包产到户”，而且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田家英也是支持“包产到户”的。

毛泽东并没有强调提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毛告诫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党内存在“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批评邓子恢，也间接批判陈云。

评注：1905 年 5 月 11 日，陈云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与胞姐陈星由外祖母抚养。1919 年，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经小学老师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了解、学习书局的商业运作与财务交易。

1925 年五卅运动时期，陈云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与沈雁冰等一起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随后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10 月，受中共派遣，离开商务印书馆，到青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1930 年 7 月，兼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自此陈云一直跻身中央委员会长达 56 年。

1931 年 3 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变节，陈云协助周恩来处理后续事件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开始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1934 年 10 月，陈云以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参加长征，军团长为董振堂，政治委员为李卓然，参谋长为刘伯承。期间参加过湘江战役。

1935 年 9 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陈云、潘汉年在上海难以立足，指示他同陈潭秋等赴苏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滕代远一起受到斯大林接见。

193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建西路军，试图打通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陈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说服盛世才带领部队，援接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1937 年 11 月，陈云返回延安，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管理中共党员党籍、入党、筹建学校及培养干部。1944 年 3 月，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首次担任重要经济管理职务，积累了大量的金融和财经经验。

在延安期间，陈云反对江青转入鲁迅艺术学校；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问题上，他也表达了反对意见。

1949年以后，陈云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上海战役结束后，因上海面临煤炭粮食短缺、金融物价波动，加上十五万国军投诚，上海经济面临崩溃。陈云发动了著名的“银元之战”，采用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等方式打击投机，通过经济及政治兼顾的方式稳定上海金融市场。

1954年4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9月，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着手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对公私合营等经济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1957年1月，陈云还兼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领导全国的经济。然而其反冒进的行动招致了毛泽东等人的反感。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评价陈云：“我不能搞经济工作，我不懂。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更好。”1961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评价陈云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七千人大会基本上仍肯定三面红旗，刘少奇的报告对毛泽东仍是尊重的，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刘、毛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一般认为大会期间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已为1966年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

了伏笔。据闻江青在文革初期宣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第二十六章 四清运动 毛刘矛盾公开化

“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下，全国数百万党员干部下到农村乡镇，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运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被迫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接受惩罚，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63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这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据不完全统计，四清运动期间 77,560 人被逼死，共整肃了 5,327,350 人。四清运动于 1965 年基本结束，与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联系紧密，常被视为文革的预演。

背景：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毛泽东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同年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农村群体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按此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让农民分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的问题，是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问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谈农业问题时说，“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他指出：“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损害，经济权力旁落在刘少奇之手。毛泽东没有政治运动折腾，脑子觉得空落落的。于是，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60年起，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11

月 13 日，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毛泽东希望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次教育，要结合农村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但是，一定要做到深入普遍，做到家喻户晓。

1962 年 9 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

196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 1960 年，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他在庐山时就给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

从国内形势看，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1962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当时在某些地区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错误的批判。7 月 7 日，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作了一个“怎么恢复农业生产”的报告，举了刘伯承在战争时期说的例子“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面对经济困难，邓小平说：“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

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

邓小平谈到，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

邓小平说，“所谓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考虑过多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以外，不管钱，不管粮；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商业也不管。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总之，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减少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此时国内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全党上下正集中精力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之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之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

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经验。至4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东北局宋任穷和湖南省委的报告和4月4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报告。

毛泽东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之起草工作，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1963年5月杭州会议，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会中指出“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套。”5月10日和5月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四稿，决定草案共10个问题。

5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指导文件。“四清运动”初步展开。

根据许多地区试点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例如在湖南省麻城县，共斗争331人其中被打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同年3月15日，帅孟奇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中》提到二月底全省因为斗争自杀76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

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报告中写到：“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防止出差错；

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的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

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后十条”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

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决定工业起草委员会上讲要“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1970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

《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双十条》）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两本，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向全党全民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

试点后，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四清”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首先就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如何发动群众？当时王光美发明的“桃园经验”，是通过搞秘密的所谓“扎根串联”，瞒着大部分的群众。等到他们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后，由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对那些排查出来的“坏人”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很残酷，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

评注：1963年11月末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试点，总结出桃园经验进行推广。毛泽东作出批示肯定。

桃园大队党支部从1959年成立到1963年“四清”前，一直是抚宁县先进支部。1963年11月底，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桃园大队蹲点，任桃园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八个县属干部，十二个省级各机关干部。工作组进驻桃园后，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组“扎根串联”，从群众中找依靠对象（被称为“根子”），并凭借他们建立贫下中农协会。随着运动深入，工作组发现桃园大队打骂成风、赌博成风，决心拿吴臣开刀，将其成分从“贫农”改为“游民”，撤销其书记职务。同时通过攻心、查账、揭发等，查出干部贪污多人（被称为“干部洗澡”）。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同时150名社员被整。随后是向群众索回公家物品（较温和，被称为“群众洗澡”）。然后是“追根子”，工作组调查了苏长吉（抚宁县榆关区副区长）和赵学瀚（桃园大队现金和仓库保管员）的问题。最后工作组重新划定阶级成分、重建基层组织，工作组放弃不配合的第一生产队队长赵品三，让卢伦当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至1964年4月，桃园大队四清基本结束。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未经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出吴臣党籍，定为“坏分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中共抚宁县委召开大会开除苏长吉党籍，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工作组总结的经验概括起来是：先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系统地进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会上说：“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暗指刘少奇，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1964年6月2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6月17日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后十条”。

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陈伯达的提议，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介绍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此后王光美随同刘少奇视察时在多省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杨尚昆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8月19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信推荐王光美报告，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信建议：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几千上万工作队员搞一个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 6 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 2 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 54000 人；浙江全省共抽调 31378 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 29138 人。

评注：1964 年，邱学信参加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他写道：

1964 年春节过后，我跟随由十局一名副局长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济南，在车站前宾馆稍事休息后，转车到津浦线泰安——兖州间姚村站下车（距离曲阜县城最近的火车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与共同编队的省公安厅的同志们汇合。当天，我们就进村住进了贫下中农家里。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际上，地方给工作队员安排的住处，并非是村里的“贫农”，因为薛村真正的贫农，是腾不出单独的一间住处的。我的房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村里除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以外的第四号人物。

接下来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要求通过串联贫下中农，形成可靠的阶级基础，孤立富裕中农。工作队费了好大劲，收效却不大！

忆苦思甜更是难以发动，我找了几位看上去较老的贫下中农（当时农村四五十岁的人已显得很苍老），请他们讲讲旧社会所受的苦。多数人都不愿意讲，个别的讲着讲着，就说起困难时期没饭吃饿死人的事。我遇到过两次这种诉苦，真是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干部下乡搞运动或开展某项工作，历来都要实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是入户吃派饭，一天换一家，不是什么人家都可以去，一定得去贫下中农家里。去的时候带一斤小米和三角钱，后来发现吃“派饭”的人家很欢迎这种安排，因为当地太穷了，我记得每餐饭就是玉米面糊糊

和煎饼，没有煎饼时，糊糊里面放一些蒸不熟煮不烂的白薯干。几乎没有什么菜，有个凉拌或清炒藕片、白薯粉皮就相当不错了。

“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当时，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多数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队名义上辖附近的三个生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开会、平时总是一言不发，我离开时建议劝其退党。大队长只管派生产队的农活，没见他管过大队部的事，而会计主要负责生产队的工分、很有限的财物和账目，仓库里好像也没什么储备。

刘少奇挂帅以后的运动中，工作组的人数和权力都被大大增强。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区通县，死了 2 万多人，有 110 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 70 多起。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在基层富裕农民与群众，而毛泽东提出，先不管下层，而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1964 年 12 月 15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当刘少奇说：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吗？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最后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可见，毛泽东是话中有话，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所流露。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泽东“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

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 23 条，1 月 14 日正式发出。

1965 年 1 月，王光美又参与河北新城县的四清工作，但这次却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28 万人口，“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1 月 3 日，毛泽东对四清工作作出指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人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4 月 21 日，毛泽东对东南局负责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

1965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指示：“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到了 1965 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他认为，“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而筹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评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位于太行山西麓，境内多石山，当地称为“七沟八梁一面坡”。

1953 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

池，时称“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重视。

大寨村境内有一条名叫狼窝掌的干河沟，总面积 87912 平方米，是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中最长的一条，沟深且坡陡，到了雨季来水面大，水土保持不易，难以种植庄稼。

1955 年冬开始，大寨人在狼窝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筑水坝 30 多条，不料第二年夏季被山洪全部冲垮。1956 年冬大寨人深挖坝基，重新筑坝，但到了次年夏天又被山洪冲毁。面对两个冬春的心血都付之东流，陈永贵带领下的党支部不灰心、不气馁，总结教训，于 1957 年举全村之力再战，共筑坝 16 条，分 6 层布防，动用土方 42.82 万立方，石头 7621 立方，终于成功治理了这条干河沟，累计造地 150 亩，这就是著名的“三战狼窝掌”。

1959 年 12 月，晋中地委、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具有指导示范作用，决定在全省宣传推广。

1963 年 8 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 100 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 180 亩，冲塌了 113 孔窑洞，倒塌房屋 77 间。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村最终奇迹般地闯过了年关，夺取了好收成。

1964 年 3 月 28 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这一年，在党和国家的强力推行下，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1969 年，半文盲的陈永贵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央政治领导层。1975 年 1 月，陈永贵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64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准备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使学校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另外，还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例如糖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都是这样。”

刘少奇说，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利用乡下的剩余劳动力分散办。新开工厂厂址的选择，要就原料、就市场，还要就劳动力。看劳动力在什么地方，就办到什么地方。我们国家人很多，乡村里面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有些工厂办在农村，农民就有事做了。这样，对工人有利，对农民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他说：“城市里面有的工厂，我看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如城市里面的纺纱厂，就可以农忙时开一班，农闲时开三班。纺纱厂可以这样，其他许多轻工业工厂也可以这样，制造机器的工厂也可以这样。”

“合同工当了多少年以后，也可以当厂长。每年做几个月工，熟悉技术了嘛。所以厂长也是亦工亦农。不开工时，留个副厂长就够了。为什么合同工就不可以当干部呢？教育一下，一样能当。现在我们很多县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的很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农民可以当将军，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什么当厂长当不得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么看。不要认为工人可以亦工亦农，干部就不可以亦工亦农。这件事，干部要带头。你们广西不是有个工厂已经有八个干部转为合同干部了？这个好。只是这种干部现在还太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

刘少奇接着说：“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

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是要把经济组织起来，要有计划。不管中央的、地方的，都要组织起来。中共认为，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管经济的部分干部认为，“托拉斯”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1965年6月，刘少奇还提出要“办托拉斯”，就是信托企业。考虑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征求意见说，“要不要办托拉斯，在认识上是否一致？听说总的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现在中央只办了十二个托拉斯，地方也办了一些。托拉斯办起来以后，哪几样要统一？计划统一？价格统一？物资调拨统一？”

刘少奇要求“要全面考虑一下，哪些托拉斯由地方办合理，哪些托拉斯由中央办合理。有些由中央办合理的，也不一定马上就办，可以让地方先办，将来再成

立总公司。有些将来也只能是地方办的，中央就不要办。托拉斯还包括商业，包括物资。盐在历史上就是统销的，烟、酒在历史上就是专卖的。当然，托拉斯把商业全部拿过来不行。但是有些行业的大批发站，归托拉斯比较合理。”

评注：在1959年9月26日上午，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附近，地质部松辽石油勘察的“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源。因为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根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提议，将大庆区和大同镇合并改为大庆镇。

1960年初，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申请，调集全国数万石油职工以及急需的3万新增劳动力（转业官兵）会师大庆，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因此大庆市的人口组成较黑龙江省其他地区较为丰富，除初期由各省市调入的职工及解放军转业官兵外，还有逐年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调入大庆油田。

王进喜出身于甘肃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0年春，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全队月钻井进尺5009.3米，创当时中国大陆最高纪录。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劳动模范。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组织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称为“铁人”。

4月29日，王进喜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7月1日，在油田万人大会上，王进喜被树立为“五面红旗”之一。

1960年6月1日，首列满载大庆原油的21节油罐车组成的铁路列车从萨尔图站开车运往锦西第五炼油厂。1960年大庆生产原油97万吨，这使得石油部完成了全国全年的生产计划。

大庆石油会战基本解决了中国石油自给的问题。1963年12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并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庆去看看。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通知。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到大庆的参观者每天数百人至上千人。

评注：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是个孤儿。1956年初期，雷锋在该乡政府当任通信员，后参加泅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建设，当拖拉机手，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同年入党。

雷锋当时身高1米54，体重不足55公斤。本来不符合当兵要求，辽阳市市委书记曹奇被雷锋的经历和志向打动，认为“政治上的合格比身体上的合格更宝贵，可以考虑破格送他去当兵”。

1960年1月8日，雷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10团，由新兵营分配入团直属运输连第四班当汽车兵。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启用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入伍只有10个月的雷锋被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选拔在军内外作忆苦报告。雷锋开始是沈阳军区在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教育活动中，作为忆苦典型而推出，并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

同年11月雷锋被树为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认为“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在我的一切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

1961年4月29日雷锋日记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1961年，《解放军画报》第2期第22至第23页以两个版面刊载了《苦孩子好战士》千余字和四幅照片，介绍了雷锋。雷锋于是成为林彪治军树立的榜样。接着，《前进报》、《辽宁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纷纷写出专栏文章，介绍雷锋的事迹故事。

1961年2月20日，雷锋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人”廖初江所在部队作报告时，住在一个寝室里，互相交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互相勉励进步。廖初江和雷锋曾先后见过五次面，在一起生活过将近一个月，此外还互相通了几次信。雷锋的专题报道再一次出现在1962年6月号的《解放军画报》上，总共用了十八个大版，图文并茂。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的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驻地营区内，在路面指挥战友乔安山向前开车时，因汽车不慎压倒晾衣杆，遭柞木杆在铁丝的反弹作用下击中头部而倒地，不省人事，后送至

当时的抚顺西部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治，雷锋因头部右侧太阳穴被木杆重击，造成颅骨骨折，脑内大量出血致死，年仅 22 岁。

1963 年 3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学雷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的全国性教育活动和政治任务。

第二十七章 中苏交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毛泽东还于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

评注：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毛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的著作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援朝战争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中方比较有利了，毛泽东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斯大林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尤金曾专门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1950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

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除了二十四史和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他还读《心经》、《金刚经》和熊十力的佛教著作，虽然看不懂；毛泽东试图用马列的辩证统一来解释“此波罗蜜非波罗蜜”，请教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不对？”。毛泽东还读很多苏联和西方的作品，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等。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毛泽东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还担任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江青虽然1949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

在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都是“国际派”的。刘少奇原来也是苏联派的，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泽东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

1952年毛泽东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东北王。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很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所以，毛泽东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高岗和周恩来相处有些别扭。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毛泽东那里，另一个是周恩来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交谊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说高岗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为此还批评了高岗。

朝鲜战争后，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问题成为两国友好协议谈判的重点。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为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并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主张东西方缓和。毛泽东很不高兴。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

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毛泽东之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

7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抵达北京。8月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同日台湾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评注：1949年6月来台后，蒋中正热切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蒋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的理念，拒绝中共提出之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之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抵制美国、日本等势力觊觎台湾。

中共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蒋积极在东南沿海发动小规模武装突击，如福建湄州岛、南日岛、东山岛战役。蒋认为朝鲜战争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数度游说美国援华，开辟第二战场，或由李弥率领的滇缅游击队反攻云南。1951年李弥用2千人两度反攻云南。

1951年初，美国于联合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但同时建议联合国成立调停小组与北京继续协商解决，蒋对此大为光火。蒋不满杜鲁门决定将台湾和中国大陆合法分治。

1953年9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北，明确“表示美国兵力不能用来支持（蒋）可能发动的任何反攻。”

1954年，毛泽东高调宣传“解放台湾”，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马。九三炮战发生时，国军轰炸厦门港口及周边设施，9月12日曾深入80公里攻击目标，突击队也进攻沿海。12月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突击一江山岛，激战一日过后攻下一江山岛。由于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屏障，中华民国政府决定自大陈岛撤退，撤退前毁坏岛上所有设施。

1955年前后，蒋经国加紧暗杀和破坏中共高层。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从香港转机，中情局与国军刺杀周恩来未果，蒋中正在日记中记载：“匪人全部覆灭，惜周恩来未在该机”。

1958年，蒋中正认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已濒于失败，必须积极备战并促进大陆反共革命，于是下令制定“武汉计划”，主要内容为组训空降游击部

队，支援缅甸的柳元麟部队，期在西南边区建立第一反攻基地，再逐步扩大至整个大陆。由于美国的反对，计划无法实施。

1958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之陆海空部队，共有459门大炮、80多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各路部队在8月21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持续大规模炮击2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3万发，毙伤国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2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第二天，炮兵和海军重创国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之“台生”号货轮。

8月24日又第二次大规模炮击，发炮9,000余发；9月8日，因美国军舰护航，解放军第三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万余发；9月11日美舰又护航，解放军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5万余发；10月20日，第五次大规模炮击，发炮8,000余发；1959年1月7日，因1月3日金门炮击大嶝岛，托儿所中弹，儿童31死17伤，经毛泽东批准，彭德怀第七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6万余发。1月15日，解放军突又作零星扰乱射击。自此以后，每逢单日，则仅有小规模之射击，或发射宣传弹，国军亦常利用单日对大陆进行零星射击，或发射宣传弹，至于大规模之炮战，则从未再发生。

此外，1958年7月29日至10月10日期间，双方还有台海空战。国军空军先后与解放军战斗机遭遇共发生12次空战。解放军击落国军飞机18架、击伤19架；击沉敌大小舰艇7艘、击伤17艘；国军击落共军米格十七型飞机32架。

在一百余次大小炮战中，金门当地的部队伤亡2,412员。大陆方面伤亡官兵460余员、民兵群众218名。

8月23日炮战前，美国在台海已有2艘航空母舰。炮击金门使美国急忙调太平洋第7舰队主力和第6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9月后，一度将7艘航空母舰集结于台海。到9月初，共集结各种类型飞机430多架，舰艇60余艘。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也有一半含1艘航空母舰被调出。炮战开打后两个月，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在10月28日研判其动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想试探美国，并无取得台湾外岛坚决目的。

曾任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志绥回忆毛对他说，赫鲁晓夫要和美国拉近关系，中国大陆就炮击金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个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李志绥认为毛泽东不但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要以武力占取，对毛泽东来说，金门炮战只是一场表演，一场赌博，一场游戏。

台湾作家朱和之认为，毛泽东炮击金门，是出于对苏联的反感、对美国的试探、对中国内部士气的凝聚，也是大跃进最高潮时狂妄心态的发泄。”

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S·惠廷（Allen Sues Whiting）认为，中国大陆对金门的行动事先对苏联没有任何交代，打乱了苏联外交安排，因此激怒赫鲁晓夫，进一步引发中苏外交关系破裂，是后来苏联取消对中国大陆核援助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击坠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

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

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共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大部分债务是军事贷款，因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产生。小部分为经济贷款，亦直接或间接用于朝鲜战争。债务总额约在86亿人民币左右，已归还33亿元人民币。周恩来表示中国还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表示要勒紧裤腰带，争取

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0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缓解了中苏关系。

1961年苏联部分恢复对华援助。2月，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度过困难时期。中国政府接受蔗糖，是否借用粮食日后作决定。

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地加入了红色联盟。苏联为应对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弹道导弹的举措，在古巴部署了类似的弹道导弹，进一步导致对抗升级。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

1962年5月29日，新疆反共势力领袖乌斯曼率领群众攻击当地政府机关，伊宁市政府被民众严重破坏，超过6.1万名参与暴动者得到苏联驻伊宁使馆庇护进入俄境中亚。由于饥荒，当时有6.7万中国新疆公民通过以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主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邻国苏联。马尔果夫少将在苏联接待了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苏联当局还于5月31日封闭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区的边境，并将驻伊宁和乌鲁木齐的总领事馆关闭。

在新疆各边境地区中，塔城地区的逃离者最多，共外逃4万多人，并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得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瘫痪及解体边缘。

1962年6月，印度军队武装入侵中国，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段组织总兵力3万余人，准备自卫反击。10月20日凌晨，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发动攻击。

经过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击毙第62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毙、伤、俘达尔维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由于印度军队在东线藏南、西线新疆失败，11月19日印度朝野提议要求美国介入。肯尼迪下令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紧急驶往孟加拉湾。

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停火、后撤。最终，中国占领了中印西线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印度则重新占领绝大部分中印东线争议的藏南地区，两国皆宣布胜利。

中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有给养困难、美苏的压力等多方面原因。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来自四川和青海，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到西藏，然后靠人力畜力搬运物资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藏南地区。中国政府当时实施大跃进的激进经济政策，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国无力维持长期战争。

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周恩来于 10 月 8 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指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中国前方战士有影响。”10 月 13 日奉调回国的驻苏联大使刘晓辞行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卖米格飞机给印度一事解释称：“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印度的影响增加了”。

随着中苏分歧重新加剧，赫鲁晓夫在和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二次会面中，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批评态度，而向印度提供军援显然有教训中国的意思在里面。到 1962 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中苏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

1963 年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 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6 月 14 日，中共在给苏联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7 月 5 日至 20 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 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开文便说“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指出“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公开信说：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公开信还说，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指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评击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时说“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4]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会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

8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

刺激了毛泽东。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曾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同一天，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

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1969年3月，中苏两国于珍宝岛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评注：中苏支持的北越和美国支持的南越进行了延续了二十年（1955-1975）的越南战争。最先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从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约翰逊将战争扩大。

冲突从 1955 年 1 月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后，美国派驻印支军事顾问团就开始了。

1959 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进行煽动，武装颠覆。1960 年 1 月 17 日夜，槟榔省北越支持者首次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南越政府的一个据点。1960 年 12 月 20 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并发布十点纲领，纲领号召成立一支人民的军队，推翻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统治，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南方实现独立民主、改善民生、和平中立，进而和平统一祖国。

1961 年 1 月 20 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宣称将率领美国军队在越南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

1961 年 6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面。赫鲁晓夫肆意欺凌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试图通过恫吓的方式使他在某些关键争端上向苏联让步。

1962 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转而都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的人民战争。

1962 年 2 月 8 日在西贡设立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特种战争指挥，大量向南越运入美军人员和作战物资。至 1962 年底，在越美军人数 1.2 万人，飞机约 240 架。

1963 年，由于特种战争不顺利，美国决定支持南越军方于该年 11 月 1 日发动军事政变，军方推翻并枪杀吴廷琰，由杨文明组成军政府控制南越政权。1963 年 11 月 22 日，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扩大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角色，标志着美国对越政策进入全面战争的新阶段。

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在北部湾轰炸北越海军基地，以报复北越鱼雷艇袭击。“北部湾事件”是越战的重大分水岭，北越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强硬反应。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北越 325 师进入南越领土集结，标志着北越人民军对南越的公开进攻。

1965 年 2 月 26 日，约翰逊批准向越南南方派出首批美国地面作战部队。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1965 年 4 月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访华，与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达成中国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的原则协议。6 月 9 日，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部队开进越南。

1965年11月27日，五角大楼要求提升美军数目至40万人以便执行计划中的大规模扫荡行动；到了年底，美军在越数目已高达18.4万人。

战争的惨烈状况在美国公众中造成震惊，国内反战浪潮日益高涨。

1968年5月13日至10月3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在巴黎举行双边会谈。

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表示要推行“越南化”政策，让美军逐步撤出越南，并于当年6月撤出首批25,000名美军。但在美越谈判进行的同时，战争仍在继续。

战后统计，北越军队110万人死亡，南越军队死亡20万至25万人，美军死亡5820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北越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援助者。1966年和196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越南6亿元、7.5亿元无偿援助；援助北越约160万吨物资，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共给予越南超过二百亿美元的援助，客观上加剧中国大陆经济的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甚至包括北越军的军装。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从1965年到1970年累计32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往北越，巅峰时1967年有17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援越部队及援越工程技术人员等在越共计1433人牺牲、4200余人负伤。

第二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正式揭开序幕。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直接导致约两千万人死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中遭到惨重的失败，三面红旗的挫败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死亡，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毛泽东担心大权旁落后，如斯大林一样被党内同志清算，于是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名义攻击“走资派”，尝试重回党核心。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中共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所谓的民主协商只是谎言和骗局。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就感觉到了威胁，于是提出反修正主义。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与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姚安排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此前该剧一直被认为是宣传官员刚正不阿精神的历史剧，用以批判大跃进时期各级官员虚报生产成果等歪风。但是姚文元的文章突然把该剧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

此评文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扩大会议,发表《二月提纲》: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2月8日,五人小组负责人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撤消《二月提纲》。毛泽东称:“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戚本禹一些人。

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评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还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是江青跟毛泽东商量来改的。毛泽东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毛泽东改的；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江青搞京剧革命还争取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和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唐纳拼命地追求江青。江青说，他实际上爱得是俞启威。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江青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江青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文革初，上海红卫兵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戚本禹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当时周恩来也在场，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周恩来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周恩来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他拿

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其中说：“林彪同志：只有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5月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批驳，但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评注：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

毛泽东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泽东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对毛泽东的忠诚，康生比陈伯达坚定。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有点投机心理。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和田家英一样，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

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66）277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

评注：田家英从小喜欢读书，辍学之后，依仗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并且在床头书写了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3岁的田家英，就在报刊杂志坚持不断地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四川被誉为“神童”。

1946年，田家英被毛泽东看中，聘为其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师。1948年，田家英在胡乔木的推荐下成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1954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秘书室的工作。

田家英参与了《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注释的撰写。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诗词等编写工作，并主笔草拟中共八大上毛泽东的开幕词。

60年代初，毛泽东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调查，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执行情况和问题。田家英的报告质疑亩产万斤不可能，支持包产到户，批评大跃进，引起毛泽东不满，田家英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

田家英是被逢先知揭发的。逢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

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逢先知被隔离后，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就报复他。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田家英恨死李锐了。

1966年5月21日，审查组来到田家英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毛泽东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周恩来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毛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有一次毛泽东还跟下面的人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泽东。

就这样刘少奇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

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厉害了，斗得很凶。康克清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评注：1962年秋，林彪病重。毛泽东指定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称：“军队的工作，以后靠你了！”之后，中央军委内部日渐分裂为贺龙、罗瑞卿为首的一派和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的一派。双方在林彪病情、“大学空军”运动和全军大比武等事件上不断发生摩擦与斗争。

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由昆明临时调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毛泽东首肯下，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随后，被调离军事工作领导岗位。

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上，罗瑞卿被挂上“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批判。

3月18日，罗瑞卿从三楼跳下导致双脚跟骨受伤，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1967年，叶剑英就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其中“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叶剑英是太高兴了，幸灾乐祸。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

评注：1949年秋邓拓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

1956年邓拓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

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

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他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评判。

1966年，伴随批判的升级，邓拓家人被迫与其决裂，子女回家不进他的屋子，不想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再叫“爸爸”。

邓拓死后，市委又来抄家，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邓拓之死也被要求绝对保密，丁一岚甚至只能告诉子女他们的父亲因病住院了。直到两年后，子女们从社会上得知邓拓已死的消息，找母亲证实，丁一岚在请示北京市委后，才敢向子女们说出真相。

林彪、康生等人开始逐渐获得实权。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见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

这时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杭州，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

评注：工作组派下去以后，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刘少奇、邓小平很喜欢使用他们新提出的“反干扰”、“抓游鱼”这些新名词。毛泽东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三个浪”。游鱼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

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

7月22日，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邓小平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陈伯达后来说：“要邓小平跟人平起平地地讨论问题简直难如登天。”

邓小平以前曾经是“毛派”，他的政治组织能力很强，所以毛泽东很器重他。邓小平讲话很有水平，他能提纲挈领地归纳，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他听一次就能

够抓住要害。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的心思。毛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他有一股狠劲，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

邓小平不像毛泽东、周恩来等喜欢跳舞，也没有太多的文艺爱好。他唯一喜欢的就是打桥牌，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有吴晗、万里、吕正操等，都是他的高参。

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敌我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等等。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在检讨时直接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等大城市，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

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进行大串联，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还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

评注：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

自北京“红八月”起，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仅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 6843 处，“破四旧”中毁坏了 4922 处。据统计，从 196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7 日，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 6000 余件，烧毁古书 2700 余册，各种字画 900 多轴，历代石碑 1000 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 70 余件，珍版书籍 1000 多册，这场浩劫是“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8 月与 9 月，北京市共有 33,695 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 5.7 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在上海，仅 8 月 23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就有 84,222 户家庭被抄家，其中 1,231 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人民币现金或凭证。

评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中国境内遭到毁损的文物古迹主要不可胜数，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单凭这一点，毛泽东作为千古罪人足应受炮烙之刑。

湖南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陵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伊金霍洛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明太祖朱元璋陵前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四分五裂；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明神宗万历皇帝及两名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焚毁。包括袈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在内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

曲阜孔庙遭毁，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骸不知所终。霍去病的陵墓受到破坏，霍去病的塑像被毁。河南南阳“诸葛草庐”的‘千古卧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合肥“包青天”墓，遭到毁坏。杭州岳王庙遭到破坏，岳飞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张之洞坟被刨开，红卫兵遂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康有为墓被刨开，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生母之墓被上海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的墓遭到破坏。

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万寿山顶，千尊琉璃浮雕佛像尽毁。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欧阳脩所记醉翁亭，内有苏轼手书刻碑。乱民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

白马寺被毁，包括有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两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稀世珍宝玉马在内的所有佛像、经卷、文物都被破坏，寺庙也差点被烧掉。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红卫兵将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毁。四川什邡县慧剑寺，藏有宋代画像和明代五百罗汉像，被抹除。陕西周至，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亲自加持的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被捣毁。四川乐山乌尤寺的五百罗汉泥塑被砍头。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

众多姓氏宗族家谱被焚，破四旧运动导致全国各地农村宗族家谱被焚毁不计其数。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湖

北通城县焚毁十万余册古书，其中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藏族《格萨尔王传》手抄本一律没收销毁。

道家早就预言说，“尊敬贤德，任用材干，表扬善良，赏赐伶俐，这一套玩艺儿不可能使人心淳厚。利之所在，不必你去动员，人群蜂涌而上，争啊抢啊，子敢杀父，臣敢弑君，白昼敢打劫，太阳底下敢挖墙洞。听我说，天下大乱，尧舜种的祸根。那一套玩艺儿绝不会断根，惨祸将远贻三千年之后！三千年之后，争啊抢啊吃人肉！”

觉林菩萨言：“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据民国时期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记载，有一百一十七万余件宫廷遗留的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陶瓷、珐琅器、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另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几乎涵盖整个古代中国文明发展史和几乎所有文物门类。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艺术，如书法、国画、工笔画、音乐、戏曲、诗歌、饮食文化，另外还包括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族风情、民族信仰所延伸的宗教文化等，极其丰富并且辉煌。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哪里能说得上得尽呢。文革期间，这些珍宝都被抢掠或丢失个七七八八了。

8月22日，毛泽东反对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恶化。

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八月”的打人无罪时间内，至少 33695 户被抄家、85196 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北京大兴县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 325 人遭屠杀，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更残忍，除了摔死外，还对部分婴幼儿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官方统计在北京市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打死，后来核查北京屠杀事件中的实际死亡数为 10,275 人，包括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有学者将红八月的重要节点“8 月 18 日”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开端“水晶之夜”以及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相比较，认为“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

评注：老舍，原名舒庆春，满洲正红旗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北京市文联主席。因其代表长篇小说为《骆驼祥子》、《茶馆》，有文学语言大师的称号。

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侮辱、毒打。

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而被加挂“现行反革命”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北京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8月24日清晨，伤心之至的老舍独自离家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拿着《毛泽东诗词》在岸念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当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四旧”，达到了“天下大乱”。

大串联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到开始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联，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评注：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是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之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4月15日，团派蒯大富等人策划绑架了4名与罗征启一起支持414派的清华中层领导干部，从而引发两派武斗，双方动用各种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坦克等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占与争夺，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

清华的武斗影响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蒯大富当场投入毛泽东的怀中痛哭。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肖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叶剑英、聂荣臻跳起来，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徐向前说肖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手掌骨折了。

事情发生后，叶剑英又到林彪那儿去告状。肖华是林彪的旧部，林彪要保肖华。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去大发了一顿脾气，把一个小茶几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辩白，林彪就是不听。叶群跪下来哭求，才劝住林彪。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6年12月13日，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周恩来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周恩来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周恩来说，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周恩来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让戚本禹去安排。

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又一次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号，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

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 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评注：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有古文功底，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陶铸和陈伯达这两个文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

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得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1966年国庆节，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毛泽东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操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周恩来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陶铸领导的广东省公安厅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

陶铸的生活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

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

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

陶铸有个哥哥，也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揭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刘少奇这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8日，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

一月风暴爆发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等会面后于当晚向毛泽东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道：“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

5月16日，“百万雄师”（全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武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据不完全统计，6月4日至30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108人，伤2774人。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武汉解决问题。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抵达武汉。同日晚，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

15日，为纪念毛泽东渡长江一周年，“百万雄师”提前一天组织渡江活动。造反派则组织了几万人的游行，结果被“百万雄师”袭击，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17日凌晨，谢富治和王力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

18日晚，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开会，亲自劝说军区领导转弯子。19日上午，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召开，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

20日早晨，“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部分人和8201部队部分战士涌进东湖宾馆，把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百万雄师”开始大规模示威，占领湖北大学，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被拔除。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

7月22日，江青在湖南接见群众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评注：1967年1、2月，在重庆驻军五十四军支持下，八一五派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建立“革联会”。反对“革联会”的一派在2、3月间被镇压，其大批群众被拘留、批斗。

1967年6月5日至8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数千人参加西南师范学院武斗，被视为重庆大武斗的序幕。7月7日，两派武斗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打响了“第一枪”。7月8日，两派在红岩柴油机厂武斗，死9人，抓走近200人。7月25日，两派在重庆工业学校武斗，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了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得知后，决定下发枪支。由于局面不利，有五十四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开始从军队“抢”枪。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亡22人，伤者多人。8月8日，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沉船3艘，重创12艘，长江航运因此中断。当时被称为“重庆八八海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直接参战人员上千名，支援人员上万。动用枪炮、坦克、战车，死亡数十人。8月13日，望江机器厂武斗，打死3人，伤1人。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武斗，炮击上清寺，打死11人，伤多人。8月18日至8月20日，两派在沙坪坝潘家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死亡128人，伤者无数。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武斗，死22人，伤数十人。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8月23日，北碚区歇马场武斗，打死40人。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40人。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武斗，杨家坪半数房屋被毁，死亡200余人。9月上旬，《九五命令》发布后，武斗有所缓和。10月27日，解放军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武斗，打死32名学院成员及群众，受伤53人。

1968年3月中旬，长寿县云台处的川东北石油处本部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打死40人。4月28日，长安机器厂因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大火，重庆市消防大队救火途中被枪击，打死9人，打伤30余人，3辆消防车受损。7月，江陵机械厂武斗，大批人员伤亡。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九五命令》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全部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就强制取缔。由此，两派的专业武斗队陆续解散。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宣告自即日起撤销两派各自的总部。历时一年半的重庆武斗自此基本结束。有资料称直接死亡人数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

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攻击周恩来。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中国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评注：1960年代初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缺少出路，还有人也是希望通过参加上山下乡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年至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里。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留在城中，失学、无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

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因此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据国务院知青办的数据，自1969年以来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到70%。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领导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件，据中央军委在《国发（1973）104号》通报，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有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有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

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

评注：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把人性之恶演绎得淋漓尽致。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 2000 万不等，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亦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造成 8.56 万人死亡。众多中共领导人被划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彭德怀及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陈云等人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监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外，中国的文化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

截止 1968 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 171 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 131 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 229 人被迫害致死。而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就牵连了 14 个研究单位、1000 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 607 人，2 人被打死、另有 6 人自杀。数学家熊庆来 1969 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 3 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 8 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梁思成、熊十力、田汉、老舍、翦伯赞、傅雷、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川东杀俘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 65 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 43 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 15 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 1000 人，而广东 57 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 28 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 6 个县屠杀超过 1000 人。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 30 万人死亡。

文革期间，自 1967 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

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20万人自杀。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万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说10万6百59人，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

1966年10月，蒋中正在《告中共党人书》中表示：“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所谓‘社会革命’，就变成了残害人民、斫丧民族、荼毒社会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它自己亦就揭开了它‘马列主义’的外衣，暴露出它黄巢、李闯、流寇和晚清义和团拳匪的本来面目与野蛮手段，抹煞了你们共产党内‘行政’的和‘军队’的组织，撤销了你们‘宣传’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统，根本上乃是要摧毁中国文化，扫除知识分子，破坏现代文明，并想以其‘人民战争’的法宝，来统制亚洲和世界人类，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为，这就是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的本质与作用。”

第二十九章 刘少奇之死

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审查王光美的专案小组，负责调查刘少奇、王光美，谢富治任专案组长，江青、康生是决策和指挥者。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不得离开中南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问候刘少奇的家属情况，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毛泽东只是让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几天之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失去人身自由。

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8月8日，刘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

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0月31日，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年初，刘少奇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刘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4月中旬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场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7月上旬，刘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7月24日，刘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

10月9日后，刘后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刘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39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称：“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

1969年10月，毛泽东依照当时世界动态估计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决定全国大规模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10月17日，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10月17日晚，刘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抵达开封后，刘少奇被囚禁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刘病情再次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治疗。12日凌晨1时许，刘出现异常症状，值班护士6点38分紧急呼叫其他医护人员。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的心脏停止跳动。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刘少奇去世情报逐级上传，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人到开封处理后事。11月13日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职业为“无业”。刘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11月14日，刘遗体于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评注：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李用胡讲述、吴志菲记录《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摘录如下。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那天晚上，天气有点冷，风也很凉。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

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象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的抗议。

11月10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孔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床白被单。

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其在桃园经验而遭到造反派批斗，被冠称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梅花党的党魁”。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接受红卫兵批斗，举国轰动。同年7月中旬，被控“美国特务”，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王光美只被允许坐在铺上不许走路，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放风。至1972年，王光美入狱后，第一次见到孩子之前几小时才得知刘少奇已经被迫害死亡。文革中，林彪、江青等力主处以王光美死刑，但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评注：王光美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延安，那时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已经8年了。当年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与江青“约法三章”，对她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江青约王光美一起上天安门。因为白天她们都上不了天安门，晚上江青打电话来，要王光美和她结伴去。

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经有过真心实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处去，聊聊家庭、服装。王光美生下平平时，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听说后，就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送给王光美一些衣料。回国后，江青经常给王光美打电话，约王上她那儿去聊天，给王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一起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常看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于是王光美也就随着江青的兴趣陪着她共同欣赏，说说笑笑，很是亲密。

1962年后，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的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这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来到了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从宴会、茶会到各地参观访问都在官方新闻中进行报道，陪同的刘少奇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而他的夫人、颇具有魅力的王光美，也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的焦点。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步下飞机舷梯，踏进北京机场时，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主意。由于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江青说：“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穿着天鹅绒套装样的衣服会热得要命。她对王光美说：“你在国外戴什么首饰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她当时劝王光美不要戴别针。

据《王光美访谈录》记载，王光美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泽东学的，所以后来毛泽东有时游泳会邀请她。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时常去芦林水库游泳，还多次邀约王光美一起去游泳。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陪同游泳，但从来没有当面反对。

有一天毛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通知王光美去游泳，正好她不在住地，徐业夫还坐汽车来找她。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毛泽东留大家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先用餐，我们等江青来了再吃。毛说：“咱们一起吃吧！”

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哈哈一笑，没说什么。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那时候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

3月15日，邓的弟弟、安顺县财政局长邓蜀平受到红卫兵批斗和折磨，因为绝望而跳湖自杀。

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连续对他批判和攻击。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毛泽东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到1967年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喷气式的发明者是“四清运动”中桃园经验的工作组。在批斗会上，受害者被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不太愿意搞冤案，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下属帮助分析。他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张云逸、谢富治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他们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张云逸说，邓小平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邓小平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

平的一块心病。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邓小平不听刘伯承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邓小平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等等。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

9月，刘少奇与邓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毛泽东把邓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和邓质方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5月2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6月3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68年初，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被北大造反派监禁在北大东门外的灰色大楼达四五个月，其间常遭虐待。5月时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圈由背部先着地，他的脊椎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从此半身不遂。

1969年，邓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小平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赣州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他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作了专门研究，要周亲自去落实。贺龙跟刘少奇走得很近，两家儿女是要准备成亲家的。1月10日，贺龙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安排，被转往西山，随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审查”，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对贺龙不保了。”1969年6月8日，贺龙在糖尿病恶化的情况下病逝于301医院。

1966年12月，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王大宾等红卫兵在江青的授意下，前往四川成都把彭德怀强行绑架后，乘坐火车押回北京。在康生和陈伯达的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1974年9月，彭因患直肠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拒绝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52分，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去世。

评注：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和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自治区主席韦国清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和周恩来支持的造反派群众“4·22”阵营。

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在灵山县的统一行动中，共杀死2,900多人。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农村地区“4·22”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大部分已被消灭后，掌权者和其所扶持的“联指”随即向城市开刀。7—8月，广西军区调动大批部队，围攻南宁，造成万余人死亡；接着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

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刷、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蒙山县一个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西地区发生了大规模人吃人事件，至少有29个县发生过吃人事件。依据中国作家郑义私下偷运到海外的部分官方档案显示，至少137人在1960年代末被吃，而参与食用他人尸体的人数可能达数千人。档案记载，吃人的方式包括晚饭后点心、将肉切成片并举办大型聚会、将人肉分成几大块给每个人带回家煮、烧烤人肝。

依据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特别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调查研究记录：“广西民间学者一个一个县统计，421个人被吃掉。吃人的事情遍布广西27个县，三分之二的县发生吃人的事情。有一个所谓的五类分子，活活被打死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4岁，那些党员干部、武装民兵说一定要斩草除根，竟然把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杀了，还吃了。在浦北县，这个县总共有35个人被杀、被吃，大多数是地富及其子女。有一个叫刘正坚的，全家被杀绝，他的女儿叫刘秀兰，当时只有17岁，被9个武装民兵轮奸19次，然后被剖腹取肝，还割下她的乳房吃掉。这些事情太多太多。”

调查结果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

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在过去这个世纪里甚至更久远，广西事件很显然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吃人事件。这些人与其他食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没有受到饥荒或者精神疾病的刺激。相反，这些行为看起来是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档案记载的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人吃人，经常是当地共产党官员组织的，而很明显人们参与其中是想证明自己的革命热忱。”

2001年，美国的《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狂热、群众歇斯底里以及直观暴虐行为的大爆发，导致了大约1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毁坏了至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现在，有关1966年-1976年间更恐怖的极端行为的描述已昭然若揭——对于人吃人行为的指控，数百名男人和女人以“革命纯净”的名义打破了全人类的最大禁忌。”

2016年，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可怕的故事比比皆是。譬如在广西省就有人吃人的故事，‘坏分子’被公开屠杀、70多名受害者在武宣被吃。”

1967年1月起，广东省各党、政机构被夺权，陷入瘫痪，社会大乱；3月15日，毛泽东决定在广东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广东省的造反派群众联盟（“红旗派”）与支持军管的人（“东风派”）多次发生武斗，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于4-11月期间曾多次出面调停，年底，广州地区的两大派虽然实现了大联合，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但各组织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旗号。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1968年5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广州市即有至少数万人遭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尤其是归国华侨及亲属、有海外关系的人。

1968年7-10月间，由广东省革委会领导的集体屠杀达到高峰。有28个县发生过集体屠杀（10人及以上死亡）、平均死亡人数为278人，总共造成至少7784人死亡。

1967年8月初，广州公检法机关陷入混乱。广州郊区茶头的亚岗农场中，五百多名“劳改犯”走掉四百多名，劳改犯暴动并要洗劫广州城的谣言四起。8月11日-12日，广州市区街头出现大量不明来源的尸体，许多被吊尸于广州许多街道两侧的树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尸体遍布广州中山路、海珠广场、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白鹤洞等地。事后点算尸体，估计有187-197人死亡。

1967年9月23日，广东省阳春县发生“乱打乱杀”行为；1968年1月，阳江县也开始出现乱打乱杀现象。截止1968年6月1日，在阳江县县军管的支持下，25个公社有17个开始乱打乱杀，枪决178名黑五类及其子女。6月1日至15日，阳江县召开2800多人参加的“反三右一妖风”四级干部大会，进一步组织群众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导致全县形成了乱打乱杀高潮。至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204人被枪毙、274人被打死，另有95人被逼自杀。阳江大屠杀中的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锄头锄死、开枪扫射、捆绑淹死、匕首刺死、禾叉插死、石头砸死、鞭炮炸死、煤油烧死、活埋或打得半死后活埋，还用铁线穿鼻子。在阳春县河口公社的上双、龙门等生产大队中，不用经过批准就可随便杀人，杀人者用长麻绳将黑五类及其子女绑成一串，勒令他们站在河边，然后开枪扫射或是用棍毒打，并把尸体或毒打后的活人推进河里，致使漠阳江上遍布浮尸。

1967年8月26日，海丰地区爆发大屠杀。在海丰反彭事件几个头目的策划下，当地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造谣彭湃的支持者们破坏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枪械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其中一名行凶者洪桂文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闹市区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最终，大屠杀共造成160余人死亡，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文革期间，位于海南岛的儋县、东方县等地发生了大屠杀，当时该地区属于广东省的行政管辖范围。1967年3月，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该县的3个大型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1968年4月，“海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海

南岛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包括炮兵）、民兵利用中共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对儋县各个人民公社、国营农场及 198 个老区村庄实行针对“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剿杀和烧杀。最终，儋县共有 5 万余人被关押，共私设 500 余所监狱，700 多间民房被烧毁，数千人伤残，大屠杀共造成 700 余人死亡。

除了阳江大屠杀中的阳春县和阳江县外，广东五华县、廉江县、梅县、广宁县、连县的大屠杀事件亦造成县内 1000 人以上死亡。

评注：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是文革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弟等 21 种人要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

邵阳县大屠杀又称邵阳“黑杀风”事件。大屠杀中使用的杀人手段包括活埋、石砸、淹死、打死、勒死、烫死、压死、火烧、分尸等等，不少女性死前受到凌辱。屠杀的尸体顺着资江河漂流，引发河两岸群众聚集观看，漂流死尸曾堵塞邵阳市自来水管的抽水机，导致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

1967 年 8-10 月，湖南道县发生大屠杀爆发，杀戮多为贫下中农等人所为，主要针对当地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其中属于保守派的红联成员常将四类分子与革联成员捆绑定义，并将杀害四类分子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革命行动。

道县和周边县市的屠杀在当地政府包括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策划支持下，经当地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县人武部、县委、革委会、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实施的。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包括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药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烧熏死、摔死未成年婴幼儿。此次大屠杀共造成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宁远县在内的 10 余个县市共 9093 人死亡。

江西瑞金是中共共产党的红色大本营，是共产党的红色摇篮。瑞金大屠杀发生于“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屠杀的杀人方式主要包括枪毙、石砸、木棒打死、刀子捅死、梭标刺死、推下悬崖等。

1968 年 8 月 5-10 日，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主持召开全省革委三次全会，在全省发起“三查运动”（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大搞阶级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三查”运动展开的 1-2 个星期内，江西全省有超过 5,000 人被逼自杀。截止 8 月 20 日，瑞金县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 5,319 人，其中叛徒 830 人、特务 266 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48 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

右分子 2,354 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 94 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 49 起 331 人。

1966 年 8 月，红色恐怖从北京（红八月）蔓延至全国，云南边境地区的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3000 余人遭毒打，共造成 10 人死亡。

1967 年 12 月-1968 年 1 月起，在昆明、大理州下关等地，“八派”和“炮派”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打死数百人。

1968 年 1 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持续混乱，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1 月 21 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会后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 8 年之久。

1968 年 1 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下令大搜捕。“案件”所引发的大屠杀导致 1 万 7 千余人死亡，另有 6 万 1 千多人致残，共有 138 万 7 千余人受到牵连。

1 月 27 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调集 13 军、14 军部队的若干个团，试图将“滇挺”成员围歼于一平浪镇矿区，共打死工八团成员 184 人，以及当地炮派群众、煤矿职工及家属 59 人。

1968 年 8 月 13 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调派军队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文革期间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云南革委会对民众大肆抓捕、揪斗，被迫害民众逃往沙甸，而云南造反派称沙甸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并宣称要武力清扫。解放军对回族民众的屠杀镇压发生于 1975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共造成了约 1600 名平民的死亡（866 人来自沙甸）、包括 300 名儿童。

1967 年 5 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11 月 1 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同年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革委会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复活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68 年 2 月 4 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央政治局常委

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

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 200 人中，就揪出 180 个内人党，其中 10 个人被迫害致死。

1968 年 11 月以后至 1969 年的 5 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 1969 年 3 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6 月至 7 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中共高层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1969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宣布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

以内人党为借口的这场肃反运动，在内蒙古产生了灾难性后果。通过刑讯逼供，革委会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此次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

1967 年 2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 13 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一天内解放军打死造反派 169 人、打伤 178 人；而解放军中有 4 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 46 人受伤。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该事件后共有 13,414 名群众被逮捕，17,293 人被捆绑吊打，5,968 人被搜身抄家，4,279 人参与集中劳动。

23 日上午 8 时，西宁全城戒严。205 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率部 13 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 3 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 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口号。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 名工人死在枪口下。二十几分钟，

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1967年8月25日，兰州军区接到宁夏支左领导小组报告，报告称，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还扬言要炸青铜峡大坝。兰州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请示后，要求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8月28日晚，186团向群众开枪，打死101人，打伤打残133人。

当时主持兰州军区事务冼恒汉的说法，指康生是受周恩来的委托，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兰州军区关于青铜峡事件的处理，是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

1967年7月6日，四川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7月18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冲突，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

1967年9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都、重庆市和宜宾地区18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州、纳溪、合江等县。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亡惨重。

1968年3月3日，泸州市再次发生剧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4月8日，泸州百货站和人民北路被炮弹击中，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7月4日，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7月28日，城郊大驿坝1163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州、纳溪、合江、叙永、古蔺等县武斗仍继续进行，并未停息。

仅此三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即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内8,000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3亿多元、粮食6,840万余斤，损失汽车1,000多辆和大批物资。

第三十章 林彪之死

1949年中共建政后，林彪虽然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但一直离群索居从不介入将帅圈子，“他不串门，不见客，登门来拜访的人多数也被叶群挡驾”。

叶群告诉过身边的人，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提议林彪挂帅入朝军队，多次劝说下林都称病推辞，并坚持反对出兵，认为“国家刚刚解放，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不如美国，不能引火烧身”。

1954年林彪任国务院副总理，位于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9月27日，林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和刘伯承没有到场出席毛泽东的授衔仪式。至1958年，林彪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 and 参加社会活动。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林彪同样少于理事，但将其部下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黄永胜等人安插在中共军队的重要位置。

1960年2月27日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1961年10月，张爱萍向林彪汇报不少中央领导人要求原子弹下马，林指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1962年1月29日，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都在检讨大跃进错误，林彪抛开军委办公厅为他准备的讲话稿，脱稿发言：“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毛泽东更当即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写信关心林彪的身体：“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

1965年5月18日，在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长篇谈话，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12月2日，毛泽东批评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革正式开始。由周恩来提议，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还去看望过他。

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说“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9月10日，贺龙去见林彪，使林的妻子叶群极为紧张，但林还是见了贺。林彪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表示支持，林彪每一次都能站在毛身边出席。身边人说，林彪“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9月9日，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成为美国杂志《时代》美国版的封面人物，照片右上注脚写着“中国人的噩梦”。毛泽东有意让林彪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的《范晔传》。郭嘉是曹操的功臣，38岁就去世；范晔因“谋反”被宋文帝杀掉。

12月29日，毛泽东用教育的口吻对林彪说：“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到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林彪说：“现在全国都在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不愿照抄照传，要突破，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创造。”林彪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作种子。”毛泽东说：“好。”林彪说：“不能满足于经济建设，要搞精神建设。”

1967年夏季，林彪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出版物，不要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关于群众、军队和干部三个问题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并作了三点指示：“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

时年国庆，林彪做了讲话。毛泽东说：“这个讲话是很好的讲话，气势磅礴，又没有夸张，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好的总结。”

12月17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共中央3月22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林彪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事实上是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珍宝岛反击战”。苏军先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BM-21火箭炮进行威吓。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整个冲突持续了九个小时，期间该岛由两方反复易手达八次之多。中国边防军声称毙伤苏军230余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中国边防军伤亡92人。事件以中方胜利告终，中方在事件后实际控制珍宝岛。

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应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国性战备运动，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10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武汉。10月18日林彪刚到苏州，向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

（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后自己拿起火柴一划，焚烧传阅件。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加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70年3月开始，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设立国家主席，遭到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的集体反对。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称：“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在8月13日的宪法草案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并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引发林彪部下吴法宪的强烈反击，和随后林彪、周恩来的不满。

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首先发言，“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后来小组会上公开批判张春桥。林彪讲话之前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引发了毛泽东震怒。而陈伯达说已经请示过主席。8月25日，毛泽东通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为了保护张春桥，毛泽东只好打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停止了小组讨论，并批评了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开始分裂。毛泽东态度多有反复，时而说“问题不下（庐）山”。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10月14日，毛泽东对吴法宪书面检讨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林彪在文革期间，重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他们四人掌管军委办事组，实际操控军队。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刺杀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政治后果不好收拾，尽可能不暗杀。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

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根据《571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

1971年4月，军委办事组四人和叶群先后多次给毛泽东写检讨。7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8月5日，叶群回北京301医院检查身体，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8月16日，周恩来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奉毛泽东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见林彪。

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形容，当时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脚”。“抛石头”是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如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应该向中央作检讨。“掺沙子”是指指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

经过五个月短暂平静之后，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经过各省市，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下毛毛雨”，公开他与林彪的矛盾，宣布“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斗倒林彪作准备。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上述这些谈话，毛泽东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保守谈话秘密，但又说可以透露给常委；刘丰不置可否，最后告知了邱会作，并辗转传到了林彪耳中。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9月6日晚，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来北

戴河。9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手令上亲笔手书：“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毛泽东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9月3日他离开南昌到达杭州。毛泽东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

9月6日22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通知华国锋参加会议。9月7日天亮后会议结束，华国锋向周恩来递交了毛泽东南巡在武汉、长沙的谈话记录稿，并告诉周恩来：“主席要我回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9月11日凌晨，周恩来约见华国锋谈话，并把主席谈话记录稿退给华国锋。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谈话过程，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谈话记录是如何整理的。周恩来知道了林彪问题的发展程度和毛泽东态度，交了底。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达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坐车直达毛泽东专列。毛泽东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来，毛泽东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

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传达命令，计划中有三个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泽东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

9月12日胡萍等人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其中256号专机当晚被指派送林立果去山海关。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叶群下令刘吉纯坐车去接。22时，叶宣布他们一家在明早7点乘机飞到南方城市广州。林彪这时已在另一个楼里的个人住处就寝并已服了安眠药。

9月12日毛泽东到天津后，让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李德生按照命令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南口。

林立衡、刘吉纯得知出逃计划后按正规程序托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中共中央。晚上十点多钟，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9月12日十五时，毛泽东抵达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吴忠等人。除周恩来等人外，在京中央委员对毛泽东突然返回均不知情。当天下午，因不明途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返京，他从西郊机场乘坐256三叉戟赶回山海关。当天晚上，林立果密告8341部队，叶群企图劫持林彪。消息传至毛泽东处，引起周恩来警觉。随后周恩来与叶群通话，询问飞机，周恩来劝林彪不要夜航，并说要去北戴河看望副主席。

约23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

9月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等人乘红旗轿车急速由北戴河驶往山海关机场，警卫李文普从车上跳下受伤。此时，周恩来又打电话告诉法宪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周恩来命令吴前往西郊机场指挥；李作鹏则转达周恩来指示，阻止飞机起飞，但事后李作鹏暗示周恩来无意阻止飞机起飞。

林彪他们抵达山海关机场跑道时没有时间安放登机舷梯，所以三叉戟驾驶员放下绳梯。林彪仍然软弱无力，于是司机用肩扛，叶群用手将林拉上机。

零时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在机场熄灯、导航关闭、没有夜航灯光照明以及机组人员不到位的情况下强行滑出并起飞。

23时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计划，最后决计向北逃往国外，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向西北方向逃去。

凌晨2点多以后，在三叉戟飞机即将飞出国境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掉脑袋。”

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去向；后来周又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当飞机至有中方歼击机的赤峰附近，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称：“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飞机先向大同方向飞行，后转向进入蒙古，凌晨3时，因不明原因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9人全部丧生。

评注：周恩来派出的李耀文将军和杨德中为首的调查组，作出油少迫降，机腹着地，残油致燃的结论，这个结论成为中共官方结论。中方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以及 256 号原副驾驶的认为：飞机在迫降时没有完全按照迫降要求耗光机翼油箱内的燃油，加上迫降时飞机弹跳，摩擦地面的火花引燃剩余燃油发生爆炸解体而致；机上人员大都在爆炸中昏迷，最后窒息而死。

林彪死后被中国驻蒙大使馆草草土葬，后苏联克格勃特工察觉将其挖出，头盖骨送往苏联检查，确认死者身份为林彪无疑。

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描述：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 56 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 58 楼时，中央警卫团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 58 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李的说法成为中共官方各种出版物都引用的“证据”，并就此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

周恩来在广州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参与了谋杀毛泽东的任何阴谋活动。

林彪女儿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被立案审查，至 1974 年 7 月才毛泽东下令解除审查。

1972 年 5 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了防止林彪死亡对解放军以及各地拥林势力产生不良影响，林彪事发表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以及中共官媒都没有播发任何消息。1973 年 8 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共首次对外正式公开了林彪出逃坠机死亡的消息，此时距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接近两年。

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林彪死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尚未解除职务，甚至还协同周恩来参与了对林彪座机的跟踪和事件处理。十天之后，9 月 24 日，周恩来奉

毛泽东之命，在人民大会堂以召集政治局会议的名义诱捕了四人。四人被转移至京郊军营接受审查。毛泽东批他们是“绿林大盗，蛇鼠一窝。”

10月1日国庆，中共仅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庆祝活动。和往年不同，当天天安门前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焰火晚会都被取消，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之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林彪之死，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10月7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毛泽东时隔多日终于露面。

评注：林彪兄弟姐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外，中间是四兄弟，他们从大到小名字分别是庆佛、育蓉（林彪）、育菊（林程）、向荣。这四兄弟的字、号按照“正、大、光、明”四字排序，林彪字“祚大”。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和林育南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从小接受孔孟教育。

1986年，拍摄《大决战》时，杨尚昆指示拍摄组：“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根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的口述：林彪生活简朴，没有特别要求。林彪没有玩儿，也不玩儿，也不讲吃穿，林彪的厨师是冀东人，同时是个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技术却不行，但林彪从来不说。林彪最大的苦恼是睡不好觉，失眠。林彪喜欢腊肉，因为他在书上看到吃腊肉可以帮助睡眠，但是实际上吃腊肉也没什么辅助睡眠的效果。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林彪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林彪不爱运动，不会跳舞，也不爱玩，他的运动就是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林彪的另一个兴趣是喜欢游车河，经常调车四处转，而他则静坐在车中思考一些问题。

林彪死后，受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指示，相关人员对其抄家时搜出的各种书上有林只言片语的手笔。其中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提道，“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我在收

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语录。在 20 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表面，怎么可能一个国家还会相信巫医和不可思议的怪诞偶像呢？中国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医生只要记住毛的话就能治好病人吗？依我看，毛的身上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他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

1971 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描述：“‘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1972 年 9 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3 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

1973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指出：“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9 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4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毛泽东的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江青在“批林”、“批孔”口号后面加上“批周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迅即被毛泽东制止。

1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74年7月1日，由于运动影响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就偃旗息鼓了。

第三十一章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实行“一边倒”策略的决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中苏交恶后，中共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国际地位，开始大力支援和拉拢东南亚与拉丁美洲等地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政权。

1960年代起，中共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老挝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使其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亦导致部分地区排华情绪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65年，泰国共产党开始对泰国政府展开游击战，军事高峰期拥有一万四千余人，在泰国东北部的依善地区、北部的泰国高地和南部地区形成国中国的局面。泰共自成立就将毛泽东思想定为指导思想，在中共的影响和支持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对中共革命经验亦步亦趋。在泰国国内局势混乱时，泰共在农村获得了极大发展，大批大学生、知识分子争相走进丛林加入泰共，一如曾经的延安。

缅甸共产党在1960年代失去位于缅甸中部的根据地之后，很快就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一批缅共领导人在北京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后分别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野战军挂职学习。中共在四川省、贵州凯里、云南昆明对一部分缅甸人秘密进行培训，其中有815军区司令丁莱、东北军区参谋长余剑、果敢彭家声、克钦邦丁英、佤邦赵尼来等，后来他们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建立反政府武装。

一直以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仅在1975年，中共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的“礼物”，此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波尔布特，中共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还亲自访问柬埔寨并进行了“指导”。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几乎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才得以生存，中方人员帮助柬埔寨重建工厂、修复基础设施，同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包括数十万华裔，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70年朗诺政变后，西哈努克被推翻、

流亡中国；在中共的协调下，波尔布特改变策略，并与西哈努克合作，共同对抗亲美的高棉共和国政权。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执政政府发展得越来越蓬勃。同时在 1965 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已几乎无处不在，得到众多民众支持。

1965 年 10 月，九·三〇事件后，陆军将领苏哈托架空了总统苏加诺并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全国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 50 万人被屠杀。数以千计的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数量难以统计，至少 4.2 万名华人被屠杀。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流亡到香港、台湾或海外生活。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1967 年 4 月 22 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因为被印尼怀疑支持印尼共产党，遭到印尼军警与民众包围攻击，印尼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人物。中共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公开宣布准备从印尼接侨 60 万。到 1967 年 10 月 30 日中国大陆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为止，中国大陆共接侨 9 万多人。从 1960 年到 1967 年，共有 20 万人回国，使用了邮轮飞机等手段，在东南沿海各地开设了大量的华侨农场。

1965 至 1975 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的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强奸。七十年代，印尼华人被指控帮助共产主义，因此对华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政变后，苏哈托独裁统治多年，因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当地吏治亦因此长期败坏，令不少印尼华人的国籍身份，得不到合理解决，至今仍有后遗症。

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当地华人无法享有与葡萄牙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1966 年 11 月，澳门离岛氹仔的基层工人因小孩贫穷无法读书上学，故向当时的工务局申请扩建校舍，然而经过多次交涉和申请后无果，故民众按照惯例先行搭棚动工。派出警察前往劝止，工人不听劝告，更发生警民冲突，造成 24 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菜农工会成员及一名爆竹工会成员被打伤头颅，他们后来因后遗症去世，亲北京社团代表的抗议行动继续升级，引发一二·三事件。

12 月 3 日中午 12 时许，总督府门前发生冲突，事件开始演变成大规模骚动，一些左派人士闯进澳督府，高唱红歌、朗读毛语录，又推翻警车，警察先使用警棍，后出动防暴水车试图驱散示威者。消息传出后，前来示威的群众愈来愈多，下午 3 时后，群众摧毁位于议事亭前地、在关闸事件中带领葡萄牙士兵占领关闸的美士基打的纪念雕像并将之掉入内港，又破坏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险家欧维士的石像，市政厅和位于仁慈堂大楼地下的公证署也遭冲击。4 时半左右，群众沿龙嵩街前往警厅，警厅立刻关上榄闸，因群众冲击警厅，警厅内防暴警察在闸门缝隙

向外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 2 人死亡。警方又出动防暴车驶往市政厅前扫射水喉，驱赶示威者。总督随后在傍晚 6 时颁令戒严并实行宵禁。由于戒严紧急，许多居民并无心理准备，其后几天又有数人在街上遭乱枪射杀，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观望被流弹击中。据官方统计，有 8 人被打死，212 人受伤，62 人被逮捕。

葡萄牙政府和澳葡政府在事件发生后随即实施新闻封锁，澳门葡文报刊被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报章也被下令禁止报道事件。此外，中国政府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布防，部分澳门葡人躲进加思栏兵营，部分前往英属香港避难。在经济方面，澳门元开始贬值，银行出现挤提，市面一片萧条。

澳门暴乱后，共产党势力在事实上控制了澳门，左派势力得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扎根，亲共华商权贵及社团抬头，导致现时澳门社会普遍倾向亲共；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则被完全肃清。

受澳门左派“一二·三事件”成功所影响，中共支持的香港左派亦于 1967 年初藉劳资纠纷，制造多场“政治工潮”，企图支配工厂之内部行。

1967 年 2 月 14 日，香港棉系产业职工总会南丰总干事黄剑雄等多人在厂内围殴“左派”工人陈佛振、叶炳昌。厂方报警处理，后来更开除这两名工人，左派工会迅即将这宗打架事件政治化。

4 月，多间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机发动怠工，威胁公司恢复聘用全数被开除的左派工人。其中港岛“中央的士”及“上海的士”两间受左派司机怠工影响，宣布结业，并将车辆售予没有怠工的非左派司机。

4 月，位于新蒲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厂分厂发生劳资纠纷。当时工厂颁布极为严苛的规定，包括损坏生产机器的工人不会发放工资、厂方不允许工人请假等。劳资双方谈判不果，厂方更在 4 月 28 日以“生意收缩”为由解雇 92 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并关闭分厂的注塑机部。

工潮在 5 月 4 日开始升级，部分工人强行入厂要求资方谈判，左派工会介入，煽动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警察训练分遣队到场戒备，封锁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厂方出货。5 月 6 日，约 150 名工人在厂外集会，抗议资方解雇，并要求与资方谈判，下午 4 时许厂方再度被在场工人阻止出货，管工与示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调停不果，局面更趋混乱，防暴队采取行动，逮捕 17 名工人，过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5 月 11 日，香港工联会和各行业工会派员前往新蒲岗人造塑胶料花厂慰问罢工的工人，工人围驻在新蒲岗街道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警方派出由 620 多人组成的防暴队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工人则以石头和玻璃瓶袭击警员。

中共政府把骚乱事件定性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又指“港英当局利用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对中国居民和工人进行迫害”。北京支持的消息对左派产生鼓舞，《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章广泛报道，左派阵营更在 16 日于土瓜湾工联会工人俱乐部举行会议，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员有 104 人。

在中国政府组织下，北京 40 万群众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抗议。5 月 18 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

6 月 7 日晚，天星小轮，油蔴地小轮和九龙仓三个机构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 100,000 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群众游行。

6 月 13 日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发表谈话，指中国人民有权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国，但绝不容许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将香港同胞递解出境。

6 月 19 日维园维多利亚女皇像被泼漆油、涂标语。6 月 22 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

6 月 23 日晚，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拘捕 70 余人，工人邓自强袭击两名探员，期间被探员开枪自卫射杀。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送院治理期间死亡。次日的 6 月 24 日，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收买工人，发动“联合大罢工”，约 60,000 名工人响应。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强硬手段对付罢工，将旷工雇员即时解雇。而不参与罢工的工友，往往会遭到左派机构恐吓，甚至袭击。

6 月 28 日，广州海陆空三军和群众八万人集会，声称准备给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7 月 8 日上午 10 时，约 300 名中共民兵持轻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入侵香港边境禁区包围沙头角警岗，并且向警岗掷石头及使用渔炮等爆炸品发动攻击，驻守警岗的香港警察先施放催泪弹及以木弹尝试驱散入侵的数百名中共民兵，但并未成功。10 时 30 分，当中的约 100 名民兵开始使用机枪或是冲锋枪攻击警岗，香港警察先向天开枪警告，但民兵却向警岗扫射，双方因而爆发枪战。

1967 年 7 月初后，冲突不断升级，左派工人在斗委会指挥下在街头多次袭击警务人员，香港警察开枪还击，击毙多名暴徒。7 月 16 日，以斗委会、油漆工会为首，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7 月 12 日，香港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是暴乱发生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8 月 20 日北角清华街两名年幼儿童被土制炸弹炸死。

8 月 22 日下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代办被红卫兵殴打，并强迫其给毛泽东像下跪，被其拒绝。

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暴行予以批评，谴责左派香港各区街头周围放置炸弹。8月24日，林彬离开窝打老道山寓所前往商业电台上班，途中遭到伏击，伤重不治死于医院。

《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面对“六七暴动”，金庸的态度很明确，在报章内表明反对文革及六七暴动，左派则将金庸称为“汉奸”、“走狗”、“卖国贼”。金庸一家受到暗杀威胁，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根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警务人员，一名驻港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死难。包括200名警务人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怀疑炸弹，以及1,167个真炸弹。

暴动期间同时造成经济损失，使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波移民潮，许多生意人远走南洋。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都在地产领域开始低位买入，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

评注：1967年5月，香港发生的六七暴动，是中共煽动的赤色恐怖主义暴乱。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煽动造反派夺了中国外交部的权。因为《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独立营运的左派报纸刊登煽动性文字、意图引起警队成员不满，8月17日港英政府勒令停刊。

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十九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8月22日下午48小时时间到，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参赞柯利达被红卫兵殴打，并强迫其给毛泽东像下跪，柯利达坚决拒绝。当晚在代办处的23名英国外交官与职员中，有数人日后出任要职，如柯利达爵士（1978年任驻华大使）、艾博雅爵士（1994年任驻华大使）、约翰·韦斯顿爵士（199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雷·惠特尼爵士（1978年任国会议员）。

《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由于周恩来亲自正式道歉，英国因此了解中国的底线是不会轻易提前收回香港。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采取不按牌理出牌的反常外交手段，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期间中国在已建交或半建交的 40 多个国家中，与近 30 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导致中方许多合作与援助暂停，同时造成形象受损。

196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发布《九九批示》，指示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此后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亦遭到批斗迫害、患病致死。

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1967 年 6 月，中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甸的不满和干涉，历史上缅甸曾制定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6 月 27 日、28 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部分人士冲入了大使馆，导致中方一经济专家被杀害；从 6 月 29 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7 月初发生“午门抗缅大会”，双方处于断交边缘。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喊“万寿无疆”。1968 年 5 月 29 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批语：“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人民运动。”

1967 年 8 月 9 日上午，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的夫人及另外两名外交官夫人乘大使专车，赴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将汽车停在马路边，观望来往的红卫兵队伍。队伍中有人发现该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着毛泽东像的海报。蒙古大使夫人等三位夫人自商店离开后进入汽车，司机踩油门开动汽车，其脚踏上了海报。红卫兵当即将蒙古司机拉出汽车进行恐吓，蒙古大使夫人等人因受惊而重新跑入商店。

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出来称，蒙古大使夫人正在打电话求救。红卫兵恼羞成怒，有人高喊：“把汽车烧掉！”红卫兵们合力将汽车掀翻，并点火焚烧，围观群众齐声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后来消防车开来时，这辆海鸥牌高级轿车已经被完全烧毁，只余外壳。

1972年10月14日，由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组成的17人罗马尼亚私人旅游团经香港前往北京。罗马尼亚游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中的半天是去逛王府井大街和购物。

部分游客在“新中国第一店”北京市百货大楼首先遭遇围攻。据事后中国方面的调查，最先注意到罗马尼亚外宾的，是3名东城区反修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他们误认为罗马尼亚外宾是“苏修”。小学生的言语马上引起了其他中国顾客的注意，大家也将罗马尼亚外宾认作是苏联人，对后者进行了言语攻击，二男一女共3位罗马尼亚游客被愤怒的中国民众逼到了一个角落。此后，百货大楼安保向罗马尼亚外宾要护照查看，证实不是苏联人后，罗马尼亚游客才离开百货大楼。

另外7位罗马尼亚游客在“东风市场”也经历了相似遭遇。最先是一位女营业员发现了罗马尼亚游客，并误认为是苏联人，而后引发了众多中国顾客的围观，其中有人质问罗马尼亚游客“珍宝岛”的归属问题，还有人欲伸手动武。此后，有人将纸板箱拆散了并在上面写上“打倒苏修”的大字，准备挂在罗马尼亚游客的脖子上举行一个现场批斗会。但被中国方面的接待人员发现后制止。

1970年代，因中苏交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与美国、日本和其它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并取代中华民国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直努力使国际社会承认其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1970年代之前，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被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广泛认可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为了拉拢亚非拉国家，中共政府罔顾无数国民百姓忍冬挨饿，从60年代起，就大规模向外提供无偿捐款、无息贷款、经济和技术援助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数百个水电、公路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仅在柬埔寨，1956年2月，西哈努克首次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友好条约，中国无偿援助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物资和商品，援助建设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1958年，中国又援建贡布省的乍格雷丁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在马德望省的第二纺织厂。又帮助柬埔寨建设特大型桥梁，包括上丁省西公大桥、北克丹桥大桥、白电目大桥、达克茂大桥、新水净华大桥、上丁省横跨湄公河大桥、桥干拉省哥通县跨百色河大桥、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几十万吨粮食、时值2.5亿元人民币外汇的援款，以及19个成套项目。其中，部分粮食还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短缺，计划从加拿大购入。在阿方要求之下，中共政府下令将粮食从加拿大运往阿尔巴尼亚。

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在中国自身医疗资源十分缺乏的状态下，从1963年起，中共政府先后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派出医务人员约21,000人次。

1970年11月召开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了阿尔巴尼亚等提出的“驱逐中华民国的提案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均未通过。

1971年7月15日由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首的18个共同提案国（后增至23国，其中11个是非洲国家）又发起这个提案，故又称为阿尔巴尼亚提案。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老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备忘录，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提案。美国总统尼克松设想“双重代表权”可以“两全其美”地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送顺水人情，又同时通过“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双保险，让中华民国仍能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7月19日，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步，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知到美国政策趋势改变，遂同美方马康卫大使进行谈判，表示接受于双重代表权安排，但不公开承认的意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8月20日就“双重代表权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联合国同时接纳海峡两岸双方为会员国。

10月19日至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进行“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总辩论，期间有70多个会员国的代表参与了关于中国代表权辩论的发言。

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当中共所谓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传到蒋中正耳中时，正在花园散步的蒋泪流满面，微微颤抖的手无法为自己戴上帽子，帽子掉到了地上。

10月2日《蒋中正日记》写道：“退出联合国问题经两月来之考虑，今日形势共匪闯入联合国与侵占我安全理事会席次罪行已定，尤其美尼之毒计无法忍受，故决心以汉贼不两立与毋为瓦全之精神实行退出联合国也。”10月18日写道：“联合国已成为叛国奸贼与侵略罪犯的渊藪，吾人应洁身自好，再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决定自动退出联合国，保存光荣历史。”

在1960年代，中苏决裂，美国政府认为可以联合中国对抗苏联，这成为尼克松访华并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1970年4月，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都向蒋经国承诺，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台湾或与毛泽东妥协，尽管尼克松确实含糊地谈到了他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970年10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说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

去”。1970年10月，尼克松请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的关系。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称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毛泽东愿意和他谈。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通过巴基斯坦政府的居间斡旋，中美就基辛格访华达成一致。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和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握手寒暄，并送他一块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第二天，科恩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和“Let It Be”字样的运动衫，专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队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庄则栋，回赠他并与他拥抱。此情景被在场记者抓拍，成为爆炸性新闻。

4月3日，毛泽东睡前看参考消息，读到外电对回赠礼品事件的报道，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次日，美国国务院接到美国驻日大使《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即向白宫报告。理查德·尼克松在深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同意中方的邀请。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协会运动员4位官员和格伦·科恩、雷塞克等9位运动员还有2位配偶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经英属香港抵达北京，科恩等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美国运动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

作为回报，美国乒乓球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1972年4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队员参观了底特律的工业基地，游览了迪士尼乐园。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

7月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出发去北京的前夕，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商讨会谈策略。谈话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尼克松定了这样的调子：总的来说，应当让中国人对美国愿意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意愿“捉摸不定”，不能看起来像是“抛弃了老朋友”。

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飞抵北京。

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基辛格急于成事，很快就交出了撤退在台美军和美中建交的时间表，但他并没要求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还没讨价还价，他就把尼克松的底牌掀了。

基辛格的信誓旦旦，仍不能让周恩来放心。周追问：“贵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是什么态度？美国政府的一些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否给予了支持？”对此，基辛格出人意料的回答“台湾人？我们不会支持。在世界上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央情报局的能力都被夸大了。”基辛格向周恩来保证，他会努力“管好”美国的情报部门，美国不会支持“台独”。

基辛格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

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周恩来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并且在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签订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在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能让日本的军事力量进驻台湾，并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基辛格同样给出了令周恩来满意的回答。

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代表团11月9日离京，当地时间11月11日抵达纽约。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提出并通过以毛共匪帮代替中华民国的席位的议案，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非法行为，标志着联合国自身的堕落与变质。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中国人民，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1971年10月26日下午总统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称：“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尼克松对华访问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夫妇一行人乘坐空军一号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飞往夏威夷卡内奥赫停留，2月19日从卡内奥赫海军陆战队机场飞往关岛，于当地时间2月20日下午5时抵达关岛机场，当地时间2月21日7时离开关岛，于北京时间上午9时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短暂停留后飞往北京。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尼克松、罗杰斯和基辛格一行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尼克松还在没有举行会议期间参观多处建筑奇迹，包括故宫、明十三陵和长城等。

当天下午尼克松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之通知，在周恩来陪同下到中南海毛泽东之住处。下午，尼克松一行到来中南海的游泳池住所时，年迈体弱的毛泽东由张玉凤搀扶着起身迎接。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话，当尼克松称“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评注：张玉凤1945年1月9日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一个清贫之家，父亲曾是牡丹江铁路局的铁路搬运工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

1960年代张玉凤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和广播员。1962年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成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张玉凤是毛泽东众多的性伴侣之一。苏联汉学家潘佐夫通过借阅苏联中央党部档案馆封存的绝密卷宗文件，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历史，出版了《毛泽东传》。根据他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张玉凤是一位美女，而毛主席性欲旺盛，所以他和张玉凤两人常在专列上发生性关系。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私生活混乱，跟多名年轻女性如张玉凤有性伙伴关系，染上男性滴虫病且传染多人。

张玉凤工作极为细心，毛泽东晚年对她的依赖日重，很多事情都靠她传话，甚至晚饭也是由张端进毛的房间，然后在第二天早些时候端出。张玉凤脾气耿直倔强，生气的时候，连毛泽东都敢当面责骂，毛也要让她三分。毛泽东评价：“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周恩来曾给张玉凤附上便条，央求“玉凤同志”在“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张玉凤掌握毛泽东的保险柜钥匙。毛去世后江青曾向她索要，她拒绝交出并将此事报告华国锋。

毛泽东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张玉凤回忆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张玉凤说：“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主席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毛泽东的卧室就是一个书房，陈设非常简朴。一张大木床，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床头和床边摆满了书本，很多是半卷着打开的，有不少红色的批注。毛泽东喜欢文史著作，尤其是二十四史。尼克松和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的私人住所外的会客厅会面一小时，探讨双方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会谈的气氛是轻松的。

毛泽东之后告诉自己的医生，他对尼克松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是个直率的人，不像那些左派和苏联人。当天晚上，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尼克松一行。

抵京后次日，尼克松夫人帕特·尼克松即赴北京动物园参观，同大熊猫进行了亲密的接触。中国方面根据美方访问人员及美方先遣组对大熊猫的关切，判断美方有意要大熊猫。此后在该访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熊猫牌香烟递给了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尼克松，表示将向美国赠送2只大熊猫。

2月26日，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8从北京飞往杭州，美方空军一号专机紧随其后。

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2月28日公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统一问题。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月21日至28日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和他的最高级幕僚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包括会见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尼克松和众多美国媒体一起参观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学校、工厂和医院。

2月27日《蒋中正日记》写道：“匪、美公报在上海发表，其内容皆由共匪一方面的一面之词，美尼不敢提其所应有之立场，对我中华民国皆以台湾代之，尼丑之无耻极矣。”2月28日写道：“阅尼丑与周匪所发表之‘联合公报’不胜愤慨，此为尼丑手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枪下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

访问中国后，尼克松也决定前往苏联谈判。为了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中国和苏联都削减对北越的外交支持，并建议河内在军事上达成协议。

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1974年，毛泽东公开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年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这也是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大会议期间发言。

邓小平在联合国会议中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提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之死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

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赞赏华国锋道：“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华国锋因主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建设和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等，受到毛泽东赞许。斯诺回国后将此事写入文章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关注。

1971年毛泽东秘密访问南方各省，并在武昌提醒华国锋，暗示在中央内部中他与林彪的矛盾。林彪在出逃身亡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毛泽东借此提名华国锋出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的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也未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往往保持中立，只忠于毛泽东。

1971年快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响心脏。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初曾发生严重休克。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称：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9月29日，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日本客人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田中角荣说：“我们打算按照中国的习惯改。”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

通过姬鹏飞和大平正芳的进一步会谈，在最后的公报中改成“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同中华民国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免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起战事的官方战争赔偿，对此日本政经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时中国的

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于是中日政府双方达成默契，以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经济损失。

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4月12日，邓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正式提议邓出任总参谋长，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3年，毛泽东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渐至双目失明，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视力。

1974年6月，毛泽东健康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医疗组存在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7月，身患多种疾病之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7月1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进行眼病会诊。8月间，经来自各地之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病重住院治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发难，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0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长沙，在长沙生活近四个月。然而中央政治局随后陷入新的对抗，17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发生激烈对抗。会后，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又提出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1974年，毛泽东两腿和双脚浮肿，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4次，到12月5日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

1975年2月，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医生建议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毛泽东之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时间多。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第二天毛泽东之左眼能看见东西。

评注：1975年8月4日，台风尼娜在福建登陆，跨越江西、湖南两省，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8月4日到7日暴雨中，河南省泌阳境内各水库、河道水位急剧上涨，大中小水库均达到蓄水极限。暴雨后，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水库溃坝。京广线上一列火车被洪水推出轨道，沉落在马庄河。

河南省约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500余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驻马店境内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

驻马店地区多处地方受浸，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尸体长期浸泡在水中，导致疾病传播；而空投的大部分食物落在水中，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灾后第21天，遂平县革命委员会恢复运转并发出“遂革发75(30)”号文件“关于当前防病治病的通知”。文件说“由于灾后环境污染严重，人群抵抗力下降，乙脑、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日趋上升。”空军从9月1日至6日连续出动飞机248架次，喷洒可湿性“六六六”粉248吨，覆盖了宿鸭湖以西250平方公里的地区。

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对事件详情长期不公开报道。大跃进运动中，仅在1957-1959年间，河南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100多座水库。溃坝的水库大多是苏联援助，重蓄水、轻防洪，品质低劣、偷工减料。驻马店地区的各派力量忙于“革命”和阶级斗争，无暇防汛事务，没有准备任何防汛设备和物资。

8月20日，河南省委初步统计数字，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河南省委认为这个数字

比较准确。中央慰问团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引用了这个数字。

到了9月，毛泽东病得很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毛泽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两两饭，行走更是困难。1月8日，周恩来去世。

评注：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的周家宅邸中，其家族祖籍为浙江绍兴。周恩来与鲁迅（周树人）同为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后人。

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命途多舛，其出生之际，家族已然濒临败落，年幼的周恩来曾随家人多次迁徙住所。

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校特免了其学杂费，这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名额。1917年秋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回国后在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处做秘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亦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在旅欧的岁月中，周恩来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回国后由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组成三人团，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生性好酒。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

1949年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历任国务院总理、国家副主席、政协主席等职。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

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钱其琛评价：“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他一共进行了13次手术，身心和工作都备受折磨。

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周恩来先和众人一起露出久违的微笑，在只剩下纪登奎和周恩来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邓小平称：“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赫鲁晓夫说：“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灵活的当代人物，同他能进行切合实际的交谈。”

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周恩来有同胞兄弟两人，名为周恩溥与周恩寿。夫人邓颖超，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两人没有亲生子女，但收养了包括孙维世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内的数名烈士遗孤。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因膀胱癌于北京三〇五医院逝世，享寿77岁。出殡当日，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百万首都群众聚集在长安街道路两边，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

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受到政府压制。从1月9日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

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中央送审之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之悼词稿，毛泽东失声痛哭。毛泽东已经病得十分严重，无法参加追悼大会。

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整个会议气氛极其悲伤和庄严肃穆。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被火化，并不保留骨灰，撒向大海。

在追悼会闭幕后，毛泽东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小平，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邓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月21日，毛泽东听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4月4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4月5日晚上10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之群众。随即，华国锋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之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四人帮攻击邓小平为幕后主使。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毛泽

东通过毛远新传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访华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爵士，华国锋陪同接见。马尔登走后，毛泽东留下华国锋一起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经病重，开口很不方便，因此他一般会在纸条上写下要说的内容。给华国锋留下三张纸条内容分别是：“照过去的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和“你办事，我放心”。

据毛泽东秘书张玉凤透露，1976年5月初，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泽东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向张玉凤“核实”此事的真伪，要她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她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还拿出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她确认。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1976年4月10日以后，毛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5月起，毛泽东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中央保健组医生李志绥回忆说：“5月11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老挝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李志绥说：“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6月初，毛泽东又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感冒、心脏衰竭、糖尿病多种病症并发，在北京逝世。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师，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和丰南县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唐山市全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唐山全市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时，正值毛泽东病危、国营经济濒临破产、集权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惧怕和排斥外国的影响，以“自力更生”为名，拒绝国际援助。虽然尽全力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救灾，救援效果并不好。

7月，毛泽东许多时间处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进入8月，毛泽东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昏迷状态。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之最后一份文件。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1976年9月8日中秋节，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内，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泽东；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

当天16:00，新华社发布通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同日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担任了其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9月11日起，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举行了长达6日的吊唁活动。9月18日下午，其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共计约有几十万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参与了此追悼大会。

在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世界主要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都报道毛泽东的死讯。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方面只在官方报纸的角落简短提及毛泽东去世，并通过塔斯社批评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9月10日的头版以标题“祸国殃民·百死莫赎毛匪泽东毙命”刊登毛泽东的死讯，并在副标题称“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文章称，“为祸中国六十年的匪酋毛泽东，于今天凌晨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毛匪泽东毕生迷信权力，强调“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煽动暴乱，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暴虐的极权主义者，窃据大陆以来屠杀了七千万的大陆人民，他自以为制造矛盾、发动阶级斗争可以巩固他的极权统治，但终于在无情的斗争下丧生。”台湾民间，则在报道翌日，街头有人放鞭炮、贴标语、挂出中华民国国旗等不同的方式表示庆祝。

评注：蒋中正当比毛泽东早一年去世，但寿命比毛泽东长6年。1975年4月5日蒋逝世，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两个人都是越老越变得多疑，心量越来越小。

1969年9月16日，一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开会后下阳明山急驰，蒋车队紧急刹车，导致蒋伉俪遭遇车祸均受伤；隔月健检时发现蒋胸腔遭撞击致心脏瓣膜受伤，健康状况从此欠佳。

1972年3月，蒋因前列腺肥大做手术。宋美龄曾提出要蒋到美国做手术，但蒋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必要时可能暗杀他，因此不愿去美国求医。最后，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手术，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健康一蹶不振。

1973年底，蒋宣布避不见客，实际是退休。尽管蒋仍是总统，但工作基本由严家淦与蒋经国处理。

1974年12月1日，蒋流行性感冒致肺炎复发。至1975年1月9日，蒋肺部炎症终无法根治，致时有轻度之寒热症状。蒋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975年3月26日晚，蒋病情恶化，经3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清晨蒋经国往卧室请安，蒋已起坐。于午后感腹部不适，情绪极度不安，小便量减少。晚上8时原已就寝，不意忽发生突发性心脏病，虽经急救，终回天乏术，于晚上11时50分与世长辞。最后不幸

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享寿 88 岁。宋美龄及蒋经国和蒋孝武、蒋孝勇等家属随侍在侧。

蒋经国当晚日记载：“忆晨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寿诞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 时许，稍事休息。8 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甚效果。”

4 月 16 日，蒋经国灵柩暂厝桃园县大溪头寮宾馆，“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张玉凤不认为“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向华国锋交代后事。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党内出现权力真空，出现以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实力派”，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为代表的“文革派”。三派在路线上存在巨大分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

1976 年 9 月 10 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指示其工作人员米士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9 月 11 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值班人员请示；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华国锋同各省、市、自治区之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华国锋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电话中得知此事，同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之“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在事前电话约定后，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到西黄城根 9 号院李先念临时住处，谈话不到十分钟。华国锋谈到：同“四人帮”斗争不可避免，是时候解决了。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请求叶剑英意见，又同他研究此事；当天华国锋又请求汪东兴给予协助，汪东兴同意了。9 月 14 日，李先念假借去北京植物

园的名义外出，转往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李先念传达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谈话内容和叶剑英的态度。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华国锋以此将中立的纪登奎排除在行动以外。

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9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主要议题为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以及毛远新是否需要回到辽宁。四人帮与华国锋及叶剑英发生争执。之后，华国锋又获得了陈锡联与苏振华的支持。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讨初步方案。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方案，吴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决”的形式，经商议确定采用逮捕。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

9月29日深夜23时，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主要讨论国庆节的各项活动安排。期间江青要求散会，留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六人。江青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人去处理；但华国锋没有回应。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10月2日，毛远新调派沈阳军区1个坦克师开往北京，同时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学民兵和清华大学民兵做好准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向叶剑英报告

毛远新出动部队，叶立即下令军队退回原地。四人帮住宅戒备森严，每个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备。同日 15 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当晚，汪东兴、华国锋、吴德三人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交谈；华国锋之后秘密召见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获得了支持。10 月 4 日下午，华国锋等三人最终敲定了方案。10 月 4 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原定部署国庆节后准备 10 天视情况再动手；叶剑英提出改为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之行动方案周全可行。

1976 年 10 月 6 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 8341 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则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 201 号楼被宣布隔离审查。

四人帮都被拘捕后，华国锋在玉泉山 9 号楼叶剑英住处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晚上 10 时许，出席会议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 11 人。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华国锋正式成为继毛泽东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会后，即下发关于华国锋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会议开到 10 月 7 日凌晨 4 点多才结束。李德生根据华国锋、叶剑英命令逮捕毛远新等人。

1977 年 8 月 12 日，华国锋于中共十一大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评注：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在日记中评价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林彪在笔记中记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评价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曾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的聂绀弩评价毛泽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张闻天在 1959 年 7 月 12 日对彭德怀说：“会（1959 年庐山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张闻天在长征时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但是文革时被毛泽东整得很惨，在广东肇庆度过了六年的软禁生活，高血压和心脏病没有得到治疗，1976 年 7 月去世时没有追悼会。张闻天被红卫兵批斗时，妻子刘英也被安排在场。

王稼祥曾经是毛泽东的伙伴，长征时，他们共同进行了“担架上的谋划”。1943 年 7 月，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阐述。文革时，王稼祥屡遭批斗，被送去信阳改造，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下病危。1974 年 1 月去世时，毛泽东送了花圈。

毛泽东研究专家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曾经在访问韶山时评论：“毛善于打天下，但不擅于治天下。”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认为，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在 20 世纪世界史上，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评价其“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并不否定该评价的字面意义，反而借此阐述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早在 1956 年，毛泽东曾在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希望死后归葬湖南湘潭。后来，毛泽东曾在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虽然毛泽东生前鼓励火化、并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名，但出于政治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他的遗体做防腐处理，永久保留。1976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正阳门北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半年后完工，中共将毛泽东的水晶棺从人民大会堂移至纪念堂，并正式对外开放。

第三十三章 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欢声沸腾，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沉闷局面一扫而空。随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党中央的正副主席，叶剑英继续担任副主席。

1976年10月12日，在怀仁堂事变抓了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中兴建议，后人也称赞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1977年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1976年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解放军总医院按照叶剑英批示，将南楼病房五层腾空，秘密安排邓小平入院治疗。1977年2月3日，叶剑英安排病愈出院的邓小平及全家进驻中央军委服务保障部门管理的北京西山25号楼。

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

同月，邓在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号文件，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和聂荣臻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还让自己的儿子去找陈云、王震等人，一起呼吁邓小平复出工作。5月14日，叶剑英在住所过八十寿辰，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粟裕、余秋里、杨成武、邓小平前来祝寿，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师嘛，你是我们老师中的领班。”

5月24日，邓小平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邓小平还对来访的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7月16日至7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在全会上讲话：“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为契机，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此后，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阻碍党内对彭德怀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在1977年举行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公开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强调：“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四十个人，至少搞二十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首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

1977年3月，胡耀邦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后，他一边开始准备平反冤假错案，将干部从批斗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准备培养新的年轻干部。1980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大量中层干部逐渐崭露头角，其中包括田纪云、尉健行、胡锦涛、杨晶、沈跃跃、周强、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等。

12月，邓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郭玉峰，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历史功绩，在组织上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最终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预备工作。

1978年初，邓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

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和“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主张，学习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发展经济的经验积极发展工农生产，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况。外交上，华国锋积极发展与美国、红色高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的关系，继续敌视苏联，奉行“三个世界”的外交路线。华国锋时期，中国与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开始交恶。期间华国锋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日本、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等国。华国锋主政期间，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大举外债，以实现高速度发展。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和华国锋之间存在明显的路线分歧。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说，“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邓小平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

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

1978年5月，经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和各省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了真理

标准大讨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那等于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要维护。他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纠正。”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两个凡是在大讨论中被否定。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被逼在会议上作检查。会议平反1976年4月5日发生之天安门事件，表明邓在现阶段之斗争中已占上风。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解决政治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反对“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邓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华国锋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党内元老们取代，凡是派的主要人物被逐渐排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抓捕四人帮的主要人物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取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华国锋过渡时期之终结与邓改革开放时代之开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向全党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说，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还说，“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评注：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但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并未结束，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职后福特继任美国总统。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地区的军心土崩瓦解。4月23日宣布越南战争正式结束。

1975年越南统一之后，将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致使不少华侨华裔财产被没收，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迫使许多人抛弃财产甚至携家人逃亡。约一百万越族人及越南华人逃出越南，不少移居美国及泰国。越南国内的排华事件频频发生，华侨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大量越南华裔返回中国。

1978年8月25日，正值中越双方就华侨问题举行副外长级别谈判时，中越边境发生“友谊关事件”。当日上午十时左右，越南出动军警拆除友谊关越方一侧的难民草棚，并殴打、驱赶华侨。中国官方统计称此次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九人重伤，并致使1600余名华侨从友谊关逃入中国境内，另有“数百名”华侨从山地逃入中国境内。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

越南统一后，河内政府接收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其对南海诸岛的归属权的官方立场亦开始改变。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越界。

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首都金边，推翻了民主柬埔寨，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在1978年12月7日，由华国锋担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决定对越南诉诸战争。

越南在1978年12月25日发动大规模侵柬战争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全线增加3个野战军投入作战，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加大对越南的有限惩罚力度。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奉命重新制订作战计划，调整兵力火力部署，所属参战部队于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准备工作。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

战争分别由中国的西线云南省和东线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方向作战先期由杨得志，后期由张铨秀指挥；广

西方向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部队，约22万人，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

3月5日，东线42军126师攻占下琅，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广宁省高巴岭。当日晚，中国宣布已达到惩罚作战目的，开始从越南撤军。

在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越北地区的大量越南军政设施，以破坏其战争潜力。中国军队撤军后，越南军队又相继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并占领了老山、者阴山等地区。之后，越南和中国又在中越边境发生了数千次的冲突，中国军队最终收复这两个地区，还占领了越南一些战略山丘和阵地。

战后统计解放军和民兵共6,954人牺牲，14,800多人受伤；预计越方总死亡人数共超过80,000人。对越战争帮助邓小平进一步巩固了权力。

战争对越南方面的伤害是持久的。中国军队进入北越的工业区，在撤退回中国的过程中运走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门物资，包括大批此前援助越南的物资，并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施行完整且有系统的破坏，迫使越南保持相当大规模的陆军。越南记录的损失包括了428家医院、735所学校、8万顷农田被毁和40万头牛被抢走或杀掉。

中国军队撤退时，无数越南男女军人，伪装成无武装的越南百姓，对解放军进行不间断的偷袭，导致中国军队分辨不出是普通百姓还是反击越军，造成大量误伤，这反而造成了越南百姓更加仇恨华人。

越南反击战之后，邓小平开始整顿军队，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邓小平说，“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的措施比一九七五年更进了一步。比如，各级指挥员人数，过去保留得多一点，这次要力求少一点。很多同志提议，一个团两个副团长、一个副政委就可以了，这个意见好。师也可以这样做嘛！现在领导班子实在太大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果断处理，再过几年，不晓得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大家对比一下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情况。一九七五年时，军队要包起来的干部已经相当多了，现在，相隔四年之后，要养起来、要退休的人就更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下决心解决，再过几年，问题会更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不下这个决心不行了。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过几年，统统老了，

不但不能到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这是自然规律。在座的同志再过五年怎么样？恐怕到那时不说所有的人，就说大部分人，要坚持工作也困难了。再过七年八年，都七十岁出头了，你还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啊？真正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行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我们下面的干部之所以上不来，就是因为上面盖住了。这不只是军队，地方也一样。今天，主要的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再过几年总不行了嘛！所以，这次精简要把盖子揭一层，包括团级的、营级的、连级的都要揭，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一个条件。”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在军队里，也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社会风气逐渐恢复。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泽东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之后十多年，实行“摸着石头过河”。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因文革期间许多年轻人没有学习与工作，并热衷于批斗运动，使得治安严重败坏，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80年，中央结束了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许多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治安恶化。当时根据全国调查，要求回城及复职的人员共有9类，除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还有1960年代初被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及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等等。城市积累了大批待业人员，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这使就业形势进一步困难，社会治安恶化。

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重建了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拐点，改变了众多人的命运。

在此期间，中国文坛还诞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相关文学流派。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知青文学。产生较大影响有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白桦的《苦恋》等。邓小平给他们评价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10月，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为省委书记主政四川。赵紫阳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1978年下半年，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签署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行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并在全省推广，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先锋。

邓小平设计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农村改革从1979年在全国范围展开。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修正了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设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条文。

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时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有的实际上部分地修改了我们的宪法，比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邓小平说：“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召集中共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谈经济问题。邓小平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邓小平说：“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华国锋亲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格局。

在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替。10月20日，胡耀邦掌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四年的执政问题。陈云认为，华国锋不适合当主席。胡耀邦认为，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全盘继承的态度，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并要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对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为诸多文革时期受到迫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中包括陶铸、薄一波、习仲勋、贺龙、彭德刘少奇等。

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透露，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复查二十四万一千余件，并已纠正十三万余件。之后，全国共平反达三百多万件案件之多。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加强藏文化的地位；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胡耀邦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宽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并制定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胡耀邦制定的一系列优待少数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国共产

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作为拨乱反正的最关键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见。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邓小平认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又提出意见说：“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

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10月25日，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邓小平又说：“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评说：邓小平在为文化大革命定性方面，作了片面性的主观判断，没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邓小平没有做到的重要一点，就是不敢开放报禁，没有把真相告诉中国人，让中国人充分了解事实后，一起来参与评判。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脑子里没有平等的思想，私心亦是很重的。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邓小平就没有可依附的旗帜了，因为他们作为共产独裁集团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一体的。邓小平虽然倡导改革开放，投身经济建设，但还没有开放思想，还没有放弃阶级斗争，更没有勇气牺牲自己的“小我”，成就“大我”，跟过去一刀两断，使中国从此告别独裁，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此时，中国仍与苏联交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本决裂；相反，开始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建交，邓连续出访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具备转弯的土壤，人民亦普遍有趋向西方民主的愿望。但是，邓小平等选择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作马列子孙，不作中华女儿，不与世界文明之洪流相汇合。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奴性更重了，思想更加愚昧了。毛泽东虽然死了，愚忠的力量仍然很大，任何改良风险都很大。所以，真相很重要；只有真相，才能让人醒悟。但共产党不可能让中国人知道真相。不是邓小平错过了这个历史机会，而是共产党政权不可能给与人民自由的机会。这是邓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第三十四章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1978年9月8日至12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平壤出席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活动，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参观万寿台金日成雕像，看到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

从朝鲜返回北京途中，邓小平还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理论界将这些重要谈话与邓小平1992年春发表的南方谈话相对应，称之为“北方谈话”，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邓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四座城市，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0月22日，邓小平抵达东京。10月23日清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为邓小平举行欢迎仪式，并共同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28位来自驻日主要国家使馆的大使也参加了仪式。在园田直外相和黄华外长签字并交换了官方文书之后，邓小平出乎意料地同福田拥抱，福田看上去有些慌乱，姿势也颇为僵硬，但很快恢复常态，并将拥抱看成是友好善意的表示。

23日中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在皇宫内的丰明殿进行午餐会。

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之后，邓小平与福田首相举行会谈，并出席了欢迎晚宴。10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邓小平在会谈时说他访问日本的目的之一是“像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随即引起了日本人会意的笑声，日本人比较熟悉徐福的故事。在2200年前的秦朝，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以寻找长生药。邓小平继续解释说，他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他希望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

访问期间，邓小平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座间工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茨木工厂和日本造币局大阪本局等企业，乘坐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光号列车。邓诚恳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要向日本学习。”

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访问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当地时间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邓小平副总理和中国访问团举行欢迎仪式。

邓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邓试探他们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邓小平对卡特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个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鉴于中国对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限制，卡特对在场的人说：“既然邓小平要给我提供1000万个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1万名新闻记者。”邓小平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在华盛顿之外，邓小平在2月1日还访问了卡特总统的故乡亚特兰大，在当地参观了可口可乐总部及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并在2月1日举行了千人午宴。邓小平还在休斯顿参访了林顿·约翰逊太空中心，前往西雅图参观了波音公司的飞机生产线。

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是冷战期间中国大陆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而时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使得中方安全人员如履薄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知情者，指邓小平访美虽由美国警方负责，但为保万全，中方事前与跟台湾有关连的竹联帮负责人联络，一是摸清当地黑社会人士没有受雇伤害邓小平，二是要求对方协助。承诺协助保安的黑社会人士，据闻动员八百人沿途保护。陶驷驹完成保卫工作后，曾向同侪赞扬美国华人黑帮有爱国情操，信守承诺，义助他们的保安工作。

评注：1980年代是香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时代。在这10年间，中、英两国为香港前途问题作出决定。在经济上香港全面起飞，成为亚洲其中一个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城市，并与韩国，台湾及新加坡合称为亚洲四小龙。

鸭脷洲大桥于1980年3月通车，鸭脷洲来往香港岛无需再依赖渡轮。香港仔隧道于1982年3月通车，大幅缩短香港仔来往香港岛北岸如中环、湾仔及铜锣湾等地的时间。1980年2月12日，香港地铁尖沙咀至中环段通车，成为香港首条过海铁路。1982年5月10日，荃湾线通车；1985年5月31日，地铁港岛线通车。香港的空运在1980年代发展迅速，成为亚洲的空运枢纽。

香港乐坛人才辈出。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影响力遍及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地方。从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初，个人风格强烈且能独当一面的经典粤语歌手辈出，配合幕后音乐人才涌现，成就了经典巨星的时代。演唱派如关正杰、徐小凤、甄妮、罗文，唱作型如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以至中期冒起的超级偶像谭咏麟、梅艳芳和张国荣等，都同时大放异彩，至今仍拥有跨时代的影响力。而新晋歌手如张学友，陈慧娴，林忆莲等，开始在乐坛的黄金年代崭露头角。

港产电影于1980年代进入盛世时期，粤语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电影院在各区扩展，在东亚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对香港电影的关注都成为本年代的特色。1980年代，邵氏兄弟渐渐退出电影制作。以九龙巴士雷氏家族为首的金公主影线，拉拢奋斗公司的黄百鸣、石天、麦嘉改组成新艺城公司，新艺城在1982年的最佳拍档大收旺场，击败了嘉禾的龙少爷，于是嘉禾领先的劣势被新艺城所威胁。新艺城制作了《最佳拍档》系列、《英雄本色》系列等知名的电影，在整个八十年代风光一时。

港产片风靡全球，成为华人文化的一大代言。八十年代的港产片无论产量、票房，还是质量、艺术性均创作出惊人奇迹，形成庞大的电影工业，电影总产值更超过亚洲电影强国印度，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泱泱美国的好莱坞，香港更成为亚洲第一的电影生产地，被称作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让全球观众第一次近距离地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冲击，也让华人电影文化走出家门。

1980年代，电视广告已经成为商品推广途径，为争取收视率及商业广告，当时两家电视台的竞争极为激烈。亚洲电视在1980年代中期仍能与无线电视平分秋色，但无线电视较早注重人员的培训及发掘，其效果在198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无线电视开始处于领先。无线电视最早发掘的五名年轻男艺人名称为五虎将，包括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及梁朝伟，其中刘德华更成为现今大中华最著名的歌星及演员之一。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电视开始在中国内地普及。珠三角地区因邻近香港，民众纷纷自制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其中也包括无线电视。此种行为被广东政府视为非法，但屡禁不止。

1978年实施九年免费教育后，令1980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大量增加，连带对专上教育都有大量需求，但香港当时只有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只有考试成绩最顶尖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大学。香港在1980年代面临经济

转型，工商业对服务业及适应高新科技的人才有殷设需求，政府于在 1980 年代中期筹办新的大学。

自 1980 年代起，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以至邓小平决定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而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信任，因此对香港前景感到不明朗，忧虑香港日后能否继续维持其自由金融地位，以至自由的政治制度会否被取代。

1984 年 12 月 19 日，英国与中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立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由于不少香港居民曾经在中国大陆经历政治动荡，也有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感到抗拒，因此部分香港人开始有了移民之打算，1980 年代中后期平均每年约有 20000 多个港人移居海外。

1979 年 3 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提出香港前途问题。邓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29 日，邓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明确提出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

1980 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邓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 1982 年 6 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于 9 月 22 日抵达北京。9 月 24 日，她在北京与邓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 1898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邓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会谈结束离开时，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外摔了一跤。

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广播公司之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

1982 年 3 月的电话民意调查访问 982 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希望结果和预计将发生结果，以希望而言，70% 香港人希望香港维持现状，15% 希望成为“托管地”，希望中国收回香港的只有 4%。

中英谈判期间，香港市民对经济局势出现信心危机，港币兑美元大幅贬值，恒生指数大跌，触发 1982 年 9 月恒隆银行挤提事件、1983 年 9 月香港抢米风潮。局势趋稳定始于 1983 年 10 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但仍出现香港移民潮。

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前英国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之局面。

1983年10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致函，双方可在中国建议之基础上探讨香港之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之共管，并理解中国之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之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此前提之基础。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之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会谈两小时。杰弗里·豪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达成一个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5月25日上午，邓在人民大会堂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委员，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席上，邓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锺士元等谈话称：“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1984年7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果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

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反复磋商。至草签为止双方共进行了22次的谈判。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最后文件。至此，为时两年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之谈判圆满结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仪式上，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6月12日，中英两国政府将《联合声明》送交联合国登记。

此时，澳门回归的谈判亦在进行中。虽然对香港的未来存在担忧，港澳台同胞热情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富起来的港澳台华人以巨大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程。

邓小平的改革从农村开始。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邓小平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坚持强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划给了农民。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

在责任制下，农户不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集体生产，而是通常与村镇签订合同，在特定的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收获后，必须以预定价格将一定数量的作物出售给该单位，超过该数量的任何产量都是该家庭的财产，不论是在市场上销售还是自行消费。除了交付集体承包的额度外，农民还可以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

1978年4月，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派往香港调研。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得到批准，袁庚任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工业区的开发。袁庚领导的招商局开启了工程招标、住房商品化、公司股份制和劳动合同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习仲勋和广东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改革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等人作讨论。广东之方案于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之“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在试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区域，可以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试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邓小平对特区的负责人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讨论雇工是否算剥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认为，根据资本论的定义，雇工达到八个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属于剥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出现较多雇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1年，陈云提出“鸟笼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反对冒进式的发展。1982年2月2日，陈云要秘书转告中宣部：“现在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和美女的像太多。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要特别严格地掌握这个问题。”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讨论雇工是否算剥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认为，根据资本论的定义，雇工达到八个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属于剥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出现较多雇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

为了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试行退休制度，从企业中开始，逐步推广到党政机关职能部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机构。

邓小平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邓希望中央顾委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正式职务；邓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到15年；他解释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经验。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八二宪法》，是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象征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正式确立。

1983年起邓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次严打维持了3年5个月，在提升社会治安、经济安全的同时，诸多冤假错案也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邓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

1983年9月起，在“严打”三大战役中，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32.1万人，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严打”过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严打期间办案效率非常高，但不讲诉讼程序、诉讼职能，造成了诸多冤案、偏离法律轨道，部分人只是因为道德问题就被制裁，并且严打的犯罪学效果渐渐失去，未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引发了一定争议。

评注：80年代初，交谊舞舞会悄然在私人住所兴起。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取缔家庭舞会。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公告，禁止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

有些在83年严打中被定罪流氓罪，甚至判处死刑的案子，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只是性观念过于开放、超前。在完县看守所的狱友中，一人因偷看女厕所被判死缓，一人因强行搂抱女青年被判4年。

1983年时，西安妇女马燕秦42岁，离异有二女，已从西安民生餐厅病退。马燕秦喜爱交际，经常在家中举行私人舞会。9月前后，马燕秦被警方逮捕，马燕秦家的家庭舞会被认定为涉案人员上百人的流氓犯罪团伙，马燕秦的舞伴韩涛、惠利名等人也被逮捕。马燕秦被法院认定“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勾引男女青年教唆诱发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等罪名，马燕秦与韩涛被判死刑，惠利名等被判有期徒刑。马燕秦等人上诉无效，1985年4月15日，马燕秦被押至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公审大会，开往北郊刑场，两枪毙命。

迟志强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严打开始时年仅24岁，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与刘晓庆、唐国强、陈冲等演员齐名。1983年，迟志强

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期间参与了一些高干子女组织的私人舞会，舞会上放着邓丽君的歌曲，青年男女一起跳贴面舞。迟志强还曾与一名高干女儿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1984年，私人舞会后被邻居举报为聚众淫乱活动，在河北拍戏的迟志强还被押回南京受审。迟志强等八人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流氓团伙，主犯王某被判15年，其他7人被判1-5年不等。迟志强获刑4年，演员前途从此中断。

1984年，在北京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西瓜小贩哄抢贩瓜农民的事件。事后，小贩们都被定以抢劫罪逮捕，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个小贩仅抢一个西瓜，被判了15年。当年一些群众在马路边打麻将，只是带1毛钱的小彩头，也被抓起来当做赌博处理。

与此同时，受港台文化的冲击，大陆文娱事业也勃勃向荣。金庸等武侠小说风靡国内。1982年电影《少林寺》曾在中国掀起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热潮，并使李连杰这个年轻的武术冠军一举成为国际级影星。中国女排在袁伟民的指导下，在80年代开始腾飞，1981、1982、1983年三连冠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中央电视台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的热播，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剧中多名角色，如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邓婕扮演的王熙凤、欧阳奋强扮演的贾宝玉深入人心，红遍全国。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届。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关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之《大决战》系列电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场面宏大壮烈，电影虽然卖座，但片面追求树立共产党领导人之伟大形象，许多片段并不尊重史实。

共产党歪曲事实，给老百姓洗脑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把党来比母亲”，说是因为党的领导才让老百姓吃饱了肚子。事实上，什么时候共产党不管老百姓了，老百姓就会有活了活路；什么时候共产党严管老百姓了，老百姓就遭殃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完全是他们艰苦劳动的结果，跟共产党的领导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一段思想解放时期。政治、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松动带来了文艺、新闻、理论界的相对自由。对文革的反思与对自由的宣扬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是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后翻拍为电影。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备受折磨。他女儿在逃亡国外前曾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主人公无法回答，以“一个

硕大无比的问号”为剧终。1981年3月，邓点名批判白桦写《苦恋》，并指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尽管解放思想成为改革方向，但是解放程度依旧是在控制之下。1978年的拨乱反正时期，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张贴持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此时民众被允许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尔后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作者名为“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对所谓的“人道主义”给予肯定。这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发表后，人道主义成为了一个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从1979年开始，他就党报应该坚持“党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开始批评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言论，成为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前奏。

以光明日报1980年10月连续三天登载的若干政治改革文章为例，知识分子开始可以发表敏感尖锐的政治改革建议。如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

1983年3月7日，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该演讲稿实为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人起草。第二天，报告会组织方突然要求延长两天，理由是中宣部有反对意见。之后的两天会议中，出现4个针对周扬的批判发言。

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发出清污指示。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于是展开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由胡乔木、邓力群和王震领导。

在活动的高峰期，《瞭望》周刊封面因为刊登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在一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被收缴。有地方将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定性为“淫秽照片”。

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邓因为担心继续批右会导致“左”倾回潮，严重影响快将上马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这实际上标志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结束。

1984年，邓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养，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

1984年1月24日，邓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广东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还视察中山和顺德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之县。邓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

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开展。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5年5月，邓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陈鼓应教授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陈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胡耀邦指派两名中宣部官员到上海与陈破空等研究生对话。这被视为八六上海学潮的预兆之一。

1986年5月，作为元老代表的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谈到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认为：“实行人民监督是政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人民代表至少应拥有质询权和弹劾权”。

1986年上半年起，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8月18日，胡耀邦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今年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讲过，后来我也讲过。为什么今年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改不动，改不了。”

8月22日，邓小平过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

10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此时，胡耀邦仍然着手于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却加剧酝酿罢黜的事情，而对此胡耀邦却毫无察觉。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邓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之迫切性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但他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并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

邓的这个表态之后，部分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986年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时，具体工作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

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1986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大、小字报鼓动师生抵制不久后的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自荐参加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竞选。

12 月 4 日晚，方励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内竞选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12 月 5 日，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 4000 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

12 月 7 日，上海同济大学出现第一张介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2·5”游行情况的小字报，接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校园内也相继出现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共青团上海市委在闻讯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并将情况上报。之后几天，同济大学校园中心出现大量宣扬民主、批判专制的大字报。

12 月 9 日，由于政府方面封锁消息，也不对学生的主张予以回应，合肥市的高等院校发生学潮，5000 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武汉市两所大学约两千五百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学生在游行中高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独裁”、“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

12 月 18 日，同济大学 1000 多名学生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举行街头游行。12 月 19 日，上海财经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六张“要人权、要自由”的大字报。傍晚 7 点多钟，部分参加游行的学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造成外滩一带交通阻塞。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赶到市政府大楼，劝在场学生返校。

12 月 20 日，上海天气严寒，却成为学潮最高峰的一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强行驱散近千名静坐示威的学生，用汽车把学生分别押送回学校。由于强行驱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学生的不满，随后约有六、七万名学生与上海市民集结在人民广场。

12月23日，在北京，清华大学近千名学生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走上北京市街头声援合肥及上海的游行。

学潮由合肥爆发，得到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兰州、郑州、西安、成都、衡阳、扬州、杭州、南京、上海、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湘潭、重庆、武汉等20城市150所高校学生的串联响应。

“八六学潮”中“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僚，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面对激烈学潮，邓小平遂于12月30日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李鹏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他们未能平息学潮。

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逐渐展开。邓小平认为：“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

1月6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王震、宋任穷、邓力群等纷纷痛斥批评。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赵紫阳并表示如果邓小平陈云不在了，他无法再和胡耀邦共事，必须辞职。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生活会结束后，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

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宣布开除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的党籍。

中共元老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党中央一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共产

党的领导。在这场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巴金等人受到公开批判，当时资历较浅但作品前卫的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

邓继而作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并导致一系列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他推动过快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由于他过多干涉国务院工作，就连支持改革一派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颇为不满。当时政治局胡乔木的儿子挪用公款，数额不大，但是胡耀邦要求将其逮捕。很多共产党内元老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担心会查到他们自己的子女身上。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厌恶。特别是保守派陈云指责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顾及具体情况。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评胡耀邦后接受他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政治局又将一批进行“自由化”活动的党内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到1月底，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以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属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左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严峻。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最终由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8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约见电力工业部的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苏修特务案的情况。胡耀邦要李鹏写出21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19人。胡耀邦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举行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讨论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李鹏参加，陈云在会上说：“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

1987年4月28日，赵紫阳向邓小平作出汇报，提到有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

1987年4、5月间，当邓觉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反资运动来攻击整条改革开放路线时，他便公开表示“搞四个现代化……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1987年5月13日，“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中，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对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赵紫阳在讲话中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化了，局势已经控制了”。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职务；陈云获准取代邓成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线工作则交给赵紫阳。

代总书记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中央 5 号文件中去除了雇工数量的限制，“三不”原则改成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1984 年和 1988 年时，中国政府将它称为国家部门的“补充”。1988 年 4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 11 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78 年前，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由党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资源。从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进行的改革，主要涉及废除农业集体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资开放本地市场和允许本地企业家开创事业，但大部分工业仍然由国家拥有和营运。

改革开放后，市场活动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农民能够在农村或城市自由市场上出售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并可以购买以前由大队或生产队提供的许多产品。新的经济环境和放宽对农村居民流动的限制，为农村盈利企业创造了无数机会。农村和合作社建立了小型工厂、加工业务、施工队伍、餐饮服务以及其他非农业服务。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收入也随之增加。1986 年，农村非农企业雇佣了农村劳动力的 21%，并首次创造了农村产值的一半以上。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工业的改革也开始实行。政府引入了价格双轨制：1979 年国有企业改革展开后，即便超过了计划配额，国有制工业依旧可以按照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价格销售商品，这一措施解决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短缺。此外，80 年代开始实行的工业责任制允许个人或团体通过合约管理企业，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被中国共产党收购的私营企业首次被允许经营，它们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价格的灵活性业有所提高，服务业规模扩大。

1982 年 9 月 1 日，共产党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982 年 9 月 18 日，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

1983 年 3 月 2 日，邓小平从南方视察后回到北京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他讲了六个方面的成绩：“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

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又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时，华莱士问：“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邓回答：“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说：“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1988年，邓的经济顾问警告说，物价改革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应求。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26%。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当时太子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

邓朴方一直担任中国残联主席。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邓朴方建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1987年6月，邓朴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陈云家族、叶家，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

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的广泛愤怒，邓小平的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赵紫阳的儿子也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中共无视学生的民主诉求，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学潮。

第三十五章 六四事件江泽民上位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中央曾试图以行政手段控制信贷发放，但未能奏效。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以上，农业增长近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7.3%。

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商品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商品价格由国家计划控制，另一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由国家控制商品价格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城市农副产品等的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工人发放的工资过低、购买力不强；而企业生产又没有积极性，无法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改革，从而获得真正的竞争力。这导致国家、企业和人民三方面都不满意。同时，一部分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套利，以各种手段通过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既影响国家控制价格，又造成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

8月15日至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此次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开放，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会议要求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

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此时，全国各地通货膨胀不断严重，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反映强烈，而另一方面价格严重扭曲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大的改观，价格双轨制带来的权钱交易和“官倒”令百姓非常不满，在政策面上也备受批评，中国社会又出现动荡的迹象。

当时，中共中央高层认为， these 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价格双轨制引起的，应当使物价尽快回归市场调节。邓小平也提出，要下决心进行物价改革，“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赵紫阳认为，既然价格扭曲现象没能得到根本改变，而物价又在不断上涨，索性在一定时期如两三年内，通过承受一定物价上涨指数如物价上涨 30-50%，来有计划地全面调整价格，从而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现状。

价格改革准备实施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物价急剧上涨的风气提早出现，城市和农村普遍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银行各类储户蜂拥挤兑，银行纷纷告急。在湖北某县，银行因无钱给储户，银行柜台被储户掀翻。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布什。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各大中城市均发生了严重抢购。时值盛夏，杭州市市民抢购毛衣毛裤；气候温和的昆明市，人们抢购通常滞销的电风扇；广州市有位女市民抢购了10箱洗衣粉；南京市有位市民抢购了500盒火柴；武汉市有位市民抢购了200公斤食盐。在疯狂的抢购风潮中，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农村也发生的争相收购农副产品的风潮。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告诫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些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1988年9月，赵紫阳决定，推迟价格改革，并转向治理整顿。此前赵紫阳曾找姚依林谈过暂缓价格改革的问题，姚依林认为可推迟到1989年下半年再看。后来赵紫阳认为当前经济环境不利于价格改革，遂决定推迟改革，先搞治理整顿以

使经济环境转好，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再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强调：“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

八十年代末，中国掀起全民经商热潮，军队和政府机关单位皆纷纷成立公司企业，官员同时在企业任职，通过各种方式寻租创收，与民争利。高干子女经商、官商勾结，更是一时盛行，欺行霸市，民怨很大。新闻媒体唯利是图，“有偿新闻”屡禁不止。1989年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今后各级党委、政府不再审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到公司(企业)兼职，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在3月底以前辞去公司(企业)职务，或辞去机关职务。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开始对各种公办企业进行清理。至11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撤消公司1,016个。

1989年春节，胡耀邦离京去湖南休假，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后经抢救病情稳定，之后转移到广西休息。3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返回北京，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胡耀邦明显消瘦。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中央办公厅马上找医生。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下午2时，将胡耀邦送至北京医院，情况虽没度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4月15日，胡耀邦在如厕时，因用力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早上7时53分逝世。

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权钱交易、财富分配不公、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

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严惩殴打

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

4月18日上午，在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

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着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知市委书记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500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400份已批发给报摊，还有大批报纸已送往北京。最后虽然追回两万份，但报纸的发行已经造成影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整顿《导报》。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数千人出席。

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至八宝山的道路上，默哀的群众挤满两旁。他的猝逝在学生中形成了强烈的回声，并且成为首都民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各大学校园陆续出现赞

扬胡耀邦的海报，并呼吁中共中央重审胡耀邦观点。数日后，这些呼声扩大到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腐败问题等。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小规模自发性集会，悼念胡耀邦。而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 1987 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

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他们跪了 40 多分钟，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出现。

4 月 22 日下午 1 点 30 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4 月 23 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选举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和北大学生杨涛。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

4 月 24 日，北京 35 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

国务院总理李鹏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4 月 23 日，赵紫阳按计划前往朝鲜访问，由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

4 月 24 日，李鹏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会面，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 月 25 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4 月 26 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对抗。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

4 月 27 日，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集结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沿途受到市民广泛支持。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 月 29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党政权力。赵紫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对江泽民提出批评，认为江泽民的做法

使事态扩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

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指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北高联宣布《新五四宣言》，呼吁推广民执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这些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有些学校已经陆续复课。

六四事件中的天安门绝食始于1989年5月13日，当天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23日，有些香港学生也向六四运动学生领袖提议绝食，吾尔开希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绝食抗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有40个人报名参加。柴玲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呼吁大家参与。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于5月15日成立，指挥部由柴玲担任总指挥。到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时，已有800人参加。据学生表示，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引起政府的关注，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

尽管学生们于5月14日与政府进行了对话，但没有任何效果。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已计划好于5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盛大的欢迎仪式，政府将不得不对学生绝食作出回应。到5月16日，共有3,100名绝食抗议者。

因为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机场内进行。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赵紫阳后来得知邓小平的家人及邓本人对讲话非常恼怒。这一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决定性的分裂。

政府无视学生的诉求令北京市民感到沮丧。北京市对学生绝食的支持导致 5 月 16 日至 5 月 18 日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超过一百万人参加了北京市的抗议活动，包括工人，青年，老人和其他市民，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

5 月 17 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遭到批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等支持出兵。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

5 月 18 日，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成果。

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赵紫阳在凌晨 4 时 50 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绝食于当天结束，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北京红十字会和当地医院已获得政府的许可救助学生，以确保没有学生死亡。在参加绝食抗议的学生当中有至少 1,000 多人最终住院。

5 月 19 日，中共军方领导人以及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决定将赵紫阳隔离在中共高层领导会议外。

5 月 19 日，李鹏在电视上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引起部分首都大学生不满，他们有组织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更加激烈的抗议行动。5 月 20 日，李鹏以总理身份签署国务院令，决定自 5 月 20 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在此期间，李鹏多次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缺席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5 月 20 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 5 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 30 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24 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 14 个被要求部署军

队。其中多达 250,000 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此外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政府于 5 月 24 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 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

5 月 23 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当天下午 2 时，3 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

5 月 27 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 150 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

6 月 1 日，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同一天，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国安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5 月 29 日，江泽民被紧急调入北京。邓小平赞扬了他对上海事态的处理。5 月 31 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6 月 2 日，中共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 4 名平民并且造成 3 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

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

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碎裂，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第38集团军装甲运兵车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被激怒北京市民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

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

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大约凌晨0时15分，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凌晨0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

凌晨约 1 时 30 分，第 38 集团军和空降兵第 15 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 27 集团军与第 65 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 24 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 2 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

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他们与第 38 集团军 336 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

凌晨 4 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凌晨 4 点 30 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红色信号弹，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大约在 4 时 40 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

大约早晨 5 时 10 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

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伤亡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单是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百余人至上万人都有。6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 300 人死亡。2014 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 10454 人死亡、40000 人受伤。

北京市区自 6 月 4 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不过在 6 月 5 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一。

评注：1989 年 6 月 5 日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名示威者尝试阻挡约 18 辆 59 式坦克车队行进。尽管领头的坦克驾驶一度试图转向绕过，但是仍然遭到拦阻而不得前进。该名示威者其后还爬上坦克炮塔，并试图和车长沟通。

他似乎被说服而离开，坦克队伍则继续往前行进，但由于该名示威者又跑向前，驾驶员再度紧急煞停，对话一阵子后，在僵持之际，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前来劝说，最终他被几名身穿蓝色制服人士带离现场。示威者独自阻挡坦克队伍行进的过程，被杰夫·怀德纳等摄影师及国外媒体记录下来。很快地，相关照片和影像随即在国际间各大报纸头版与新闻媒体中广为流传和引起讨论。

“坦克人”视为六四的标志性象征。外界一直流传该示威者姓名为“王维林”，该名最早是以英文拼音“Wang Weilin”出现在英国《星期日快报》上，但该示威者的确切身份及下落至今依然不明。

事件发生后，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借用国际新闻讽喻国内时事。6月3日，《人民日报》以粗黑字体刊出题为“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的文章。尽管中宣部已要求媒体“噤声”，《人民日报》仍然在头版用花边框刊出《北京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严部队进城的消息。6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不仅以醒目文字报道波兰领导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在播报6月4日晚《新闻联播》时双眼浮肿，语速缓慢，身着黑色衣服。

6月5日，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

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西安市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参加游行示威的平民，至少有300人丧生。

上海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6月6日晚上有六人在上海光新路道口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民众。武汉当地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另外示威群众也分别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

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报导事件表现悲痛情绪的四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分别是杜宪、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事件之后，杜和薛的态度不改而离职，而李和张屈从了中共压力。《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则被中国大陆当局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报导中共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相关机关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加强警备，其中除了穿着制服的公安机关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员外还有数百名便衣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被拒绝进入广场内。中国共产党严格限制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且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信息。

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邓小平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大陆当局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或者是送往劳改营，并且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

王丹和赵常青则是少数几位被列为通缉犯并遭到逮捕的学生领袖，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处 4 年的有期徒刑，在 1998 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赵常青因为被视为一名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获得为期 6 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共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

6 月 13 日，中共政府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开始通缉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同时也陆陆续续针对事件参与者展开搜捕行动。

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等人创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数个小时内开始策划名为“黄雀行动”的营救行动；并且由牧师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人负责策划以及支援。

在黄雀行动中至少有 100 次派遣行动小组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共当局正在搜捕的情况下寻找并且安排营救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小组携带有干扰装置、夜视镜以及红外线讯号接收器等，甚至安排化妆师以及准备假证件前来帮助逃犯进行掩饰工作。而小组执行任务的地点包括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兰州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

黄雀行动共救出约 800 人。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包括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便透过香港组织的黄雀行动，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之后则被中国大陆当局长期禁止返回中国大陆境内。

不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则是在 1989 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 1990 年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通过武力镇压处理抗议活动的方式引起来自西欧、东欧、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一些西亚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批评，其中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更是对此严厉谴责。许多西方国家亦一度实施经济制裁，实行武器禁运。日本政府在 6 月 4 日当天决定对中国和睦，并反对西方对中国制裁。

朝鲜、巴基斯坦、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一些中东及非洲国家则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的作法，谴责相关的抗议活动。

台湾李登辉总统于 6 月 4 日当晚发表声明：“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

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香港社会大众恐惧，担心主权移交后中共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展开政治改革，但这让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发生摩擦。六四事件过后，澳门在中国政府秋后算账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高调争取平反“六四”的组织被暴力袭击，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由于澳门当时亲共势力已控制澳门社会，被打压人士有的突然失业、做生意的突然被断供货、铺位被收回、银行户口被冻结，部分人妻离子散甚至露宿街头。

6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党中央要有新的核心。他对中共元老们说：“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

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赵紫阳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果要到外地去，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同时，胡启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严家其、陈一咨遭通缉流亡美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判刑；胡绩伟、阎明复被撤消一切职务；杜导正被免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务。

美国之音引述何清涟的博客文章称，赵紫阳被撤职后，邓小平试图将赵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钩，决定将赵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任副主任王任重领导一个专门小组，对赵紫阳及其子女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只因索罗斯从《华盛顿邮报》上得知消息后，给邓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邓意识到，若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初邓小平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

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评注：李先念 1909 年 5 月 6 日出生于湖北黄安李家大屋，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12 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7 年 11 月，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称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1941 年 12 月，李先念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 5200 余人。1942 年，李先念指挥部队坚持鄂豫皖地区抗战，并在鄂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国共内战时，李先念协助刘邓在中原地区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开辟大别山根据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 年 9 月，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1968 年，李先念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文革后期，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李先念长期在计划经济年代主持经济工作，具有计划经济保守思想，反对大幅度的改革开放，是保守式的人物。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回忆李先念对他的反对，不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而且表现出的是一种仇恨。

对于李先念仇恨赵紫阳，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马若德分析了李先念的性格和野心，随着华国锋在毛泽东晚年的崛起，李先念也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国务院副总理，但随着华国锋的失势，原本要升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先念却被邓小平看中的改革派人物赵紫阳取代，而李先念只是被安排为“国家主席这种安抚性的位置”。因此李先念要把赵紫阳拉下马，甚至提出要把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也取消。

江泽民曾经把李先念在上海的小老婆照顾得很周到。六四事件中，李先念支持武力镇压，此后被认为是江泽民崛起的坚强后盾。

陈云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早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又和潘汉年在上海从事地下组织，对上海很有感情。陈云酷爱苏州评弹，年轻时，就经常和姨夫去看评弹；之后也经常过问上海、苏州的评弹业行情和新闻，与爱好文艺得江泽民有共同语言。

文革后，陈云拥护邓小平复出工作的立场。1987 年 11 月，陈云接替邓小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当时主政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是保守派领袖。1989 年 5 月 26 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会常委会议，主张对学生运动以军事手段镇压，并且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江泽民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时，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陈云1995年去世时，江泽民陪护他到最后一刻。

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评注：江泽民的祖上从徽州旌德县迁居江苏江都县。祖父江石溪本以行医为生，1915年弃医从商，后受聘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驻扬州协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长子江世俊乃江泽民的生父。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江都县城内田家巷。江世俊与吴月清共有子女五人，江泽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泽君、二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和弟弟江泽宽。

江泽民7岁时，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经济情况转而窘迫，迁往了较为贫穷的地区，同年江泽民进入了当地江都县立实验小学学习。1937年夏，江泽民入读扬州中学。

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曾任中国共产党皖东北特委委员，1938年，赴安徽工作，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盛子瑾督察专员的秘书，并兼职“第五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书记”。江上青在安徽时与张爱萍、汪道涵过从甚密。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在泗县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地主武装袭击身亡。

于常理相悖的是，江上青去世后，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将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当时江泽民13岁。1940年11月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考入”汪精卫国民政府复办的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二年级。江泽民在南京生活优渥，积极参加各种社团和文艺活动，参加青年救国社，组织清毒运动抵制烟馆。

江泽民于 1946 年转入上海临时大学就读，1947 年转入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1946 年 4 月，在同学王嘉猷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临时大学、国立交通大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示威；师从朱物华、顾毓琇，主修发电和运输，和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在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上海海宁洋行工作，后来洋行改名益民食品一厂。

汪道涵对江泽民有知遇之恩。汪道涵是安徽省盱眙县人，七七事变后去了延安，后在新四军工作。江上青将一批上海、江苏等地的地下共产党员安排到盛子瑾下属的各个县里担任行政职务，汪道涵就是其中的一个。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1949 年后，汪道涵历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浙江省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江泽民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他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并兼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食品厂的董事长则是汪道涵的妻子。不久，负责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总经理。1951 年 1 月 6 日，江泽民同王者兰的姨侄女王冶坪结婚。

1953 年，随着汪道涵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也随之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1954 年 11 月，江泽民被调往新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 年 3 月与 12 名技术员同赴莫斯科培训。江泽民能歌善舞，至少可以摆弄钢琴、二胡和吉他三种乐器，在苏联很受欢迎。1956 年 7 月江泽民升任动力处副处长兼动力处党支部书记。

1962 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文革期间被停职两年，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1970 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1977 年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1979 年 4 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汪道涵向谷牧举荐了江泽民出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 年 5 月，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 9 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3 年 6 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任期届满，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芮杏文是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汪道涵退出领导岗位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和中顾委委员。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被推举为会长。1993年4月，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

1987年11月2日，芮杏文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也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接替进入中央的芮杏文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1989年8月7日至8月31日，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三十七次会议，正式讨论关于中国的流血事件，在8月31日，通过决议决定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予以关注。中共指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

同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原则上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该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武力镇压学潮给遇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邓小平要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共军队以武力实施清场的消息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部分外国政府都要求暂停给中国提供贷款；而除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外，1991年，中国的旅游观光业收入也从原先的22亿美元减少至18亿美元。

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江泽民在左派势力的支持下，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联合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1989年六四事件后，由于外国制裁，中国GDP增长率在1989和1990年大幅下跌，分别为4.1%和3.8%。

邓小平也表示了他的担心。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

这次风波后，中共党内强硬派抬头，改革开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恢复；原先在1980年代逐渐开放的人权、民执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暂止进行。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出台特赦政策，给予当地华人和留学生合法居住的权力。由于霍克政府的庇护政策，1989年有四万多名“六四”前后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大多是留学生都以人道理由，得到了澳大利亚的永居权。布什总统拒绝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而且要保持改善关系的前景，认为避免长久地损害美中关系，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美国政府发放在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1992年，美国政府通过《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目标是为了使中国学生在六四事件之后免遭政治迫害。

第三十六章 一切向钱看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时年62岁的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执政。

因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历任接班人结局均不佳，主流西方媒体并不看好江泽民的继任，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周围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经验均比他丰富，在军队和政府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对下也没有个人的班底。

江泽民还需面临六四事件后停滞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被打乱，外国投资几近干涸。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

1989年8月，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江泽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由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接任。期间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后他的秘书贾延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江泽民的努力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了”。

9月4日，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1月9日，时年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退休，江泽民被选举为新一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不过邓小平仍是中国的领导中枢，他安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

1990年3月14日，江泽民选择朝鲜作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出国访问的对象，平壤数十万市民载歌载舞夹道迎接。江泽民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两次举行会谈，中国开始关注朝鲜的核计划并给予支持。之后，朝鲜在经济、贸易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

1990年7月30日，苏联正式将珍宝岛交还中国管辖。1991年初，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16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东段边界协定，确定成立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进行勘界工作。后来，中国实际上放弃了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要求，换取俄方转交两个很小的江心岛的控制权。

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囚禁，随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

评注：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就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上台执政后，推动政治改革，将部分中央权力下放给予苏联加盟共和国。而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二与七成的土地。

1991 年 6 月 12 日，尚为苏联加盟国的俄罗斯进行了首次俄罗斯总统全民直选，已退出苏联共产党的叶利钦以无党籍身份获得 57% 的得票率当选首任俄罗斯总统。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属意的苏联共产党籍雷日科夫仅获得 16% 选票。而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才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首任苏联总统，非人民直选，正当性及民意基础较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足。

八一九事件之后，平息政变的当时苏联最有权势的地方首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下属各党组织自寻出路。四个月后，已无实际权力的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苏联解体。

八一九事件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1991 年 12 月 8 日，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北方 50 公里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会谈，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三国退出苏联，并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旧苏联，其国家继承为独立国家联合体。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并加入独联体，苏联在此时已名存实亡。

1991 年 12 月 25 日，为了避免苏联境内爆发内战，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评注：1989 年 11 月 9 日晚，柏林墙开始被陆续拆除，民众利用各种工具剥下墙砖留作纪念，或是砸出大口，打造多个非正式过境点。

1989 年 12 月 22 日，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打开。当天，西德总理科尔穿过勃兰登堡门，与东德总理莫德罗会面。自 12 月 23 日起，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可免签证前往东德。

围墙的倒塌预示着两德统一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1990 年 10 月 3 日，东德正式解散，德国最终统一。

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反对推倒柏林墙、德国最终统一，他们担忧随着德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德国可能会对邻国图谋不轨。1989 年

9月，撒切尔私下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倾诉，希望戈尔巴乔夫尽其所能出手阻止。撒切尔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不想要统一的德国，这会改变战后的边境，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的事态发展破坏了国际局势的稳定，可能危害我们的安全。”

但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倒下，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六四事件中，中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亦出现危机。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江泽民上台后，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一同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93年任期届满后退休。

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维稳”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1989年8月，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为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非法色情出版物稽查。1990年，10月22日，全国“扫黄”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之后成立的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隶属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等26个部门组成。1991年6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透露，过去6年间，全国共逮捕毒品人犯2.08万人，判处刑罚1.6万人。

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深圳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1981年3月的一天，蛇口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在船上写下来6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很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评

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观念，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特区成立早期深圳精神的观念。

评注：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港资、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多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广东本省的人口，是远远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因而为内地各省年轻人南下广东提供了前提条件。“孔雀东南飞”，于是，湖南、四川、贵州、湖北等内地省份的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打工者，来到广东寻梦。

广州有一条闻名全国的“高第街”，从清代开始直至民国，广州人婚嫁要办嫁妆的，女性需要的胭脂水粉，衣服鞋袜，以至嫁妆用品，在这一应俱全，故又俗称“大姑街”。改革开放后，高第街率先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条个体服装街，因个体经营和批发来自香港的电子表和牛仔裤等时装而闻名全国。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可更方便进出内地，大部分香港人会携带一些日用品、小型电器等物品赠送给大陆亲友，由于当时大陆海关检查十分松懈，大多物件都可以顺利过境。私人和走私团体通过夹带烟酒等过关而逃税图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不少洋酒公司都透过走私的方式运送洋酒进中国大陆。同时赃物走私也增加，不少在香港被盗的右舵车及投影机，都是透过内河船走私到大陆转售。

1973 年，广交会（春季度）在当时广州顶级的东方宾馆举行的闭幕酒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约 200 位宾客及服务人员就医，后调查后发现是由于宾馆落后的卫生设备及不当的管理所致。1975 年，一组刚入驻当时广州最高级、用于接待外宾宾馆的法国旅行团，因不满宾馆许久不换的床品、床铺下的蚂蚁窝、7 点半就打烩的早餐，将布草扔下楼进行抗议。1979 年春季广交会开幕，又发生住宿爆棚、客人无房安排的混乱情况，客商对广州当时的接待条件非常不满，可谓怨声载道。

随着 1978 年夏，国务院成立了廖承志领导的“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广州成为了响应最为积极的一城。计划引外资建设并容许外国人经营管理 8 座五星级宾馆，广州占其中 3 座。

白天鹅宾馆由广东省旅游局与霍英东旗下的维昌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霍英东、彭国珍两位港商分别出资 5000 万港元和 1250 万港元，霍英东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贷款 3631 万美元。广州市设计院自行设计，经省委领导杨尚昆、习仲勋审查设计。

1983年2月6日，全国首家对外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开业。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梁威林担任白天鹅宾馆首任董事长，时任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朱一明兼任首任总经理。

白天鹅宾馆在当时不仅是最高标准和定位，而且是中国大陆最早实行“完全开放制”的酒店，绝不会因为不在酒店消费而拒绝民众入内，也无需凭介绍信或各式证件。白天鹅开业即引起轰动，开放首日，大堂里捡到了几箩筐的挤掉的鞋子、厕所里用掉了400卷抽纸、甚至还打烂了数个抽水马桶。

1990年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8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11月，销声匿迹了四十年的证券交易所又在上海重现。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张营业。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就引发极大的争议。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评注：1975年，牟其中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并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而被判死刑，但死刑未被执行，最终入狱四年。

1979年平反后经商，后来成为前南德集团总裁。1989年，曾带着刚跳槽的潘石屹等人前往海南省进行投资。

1989年，牟其中得知四川航空准备引进较大客机，而正处于解体危机的苏联存在轻工业产品短缺、图-154飞机等重工业产品滞销的情况，牟其中遂向中国七个省的300余家工厂征集500车皮的滞销轻工业产品和食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购4架苏制图-154飞机，这四架飞机在民航总局的注册号依次为B-2624、B-2625、B-2626、B-2629，这些飞机于1991年至1992年陆续交付牟其中的南德集团，随后被牟其中售予川航。此举后来被传媒称为“罐头换飞机”，并成为当时盛行的“倒爷经济”的一个极端案例。

此时，全国就“姓资还是姓社”仍处在争论中。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讲话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邓小平在与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上海开发晚了”。他解释说，1979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邓小平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4月12日，在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正式任命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5月，邓小平为了表示对朱镕基的支持，带着他一起视察首钢，并且当面由衷的夸奖说：“我党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还不多，像朱镕基这样懂经济的同志，应当提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来”。

1991年6月，邓小平重新启用赵系人马胡启立、阎明复和芮杏文。胡启立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为赵紫阳复出做的铺垫。

邓小平准备让赵紫阳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紫阳日后为“六四”翻案。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鼓吹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并且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即指向朱镕基以及邓小平。江泽民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讲话获得台下左派们的热烈掌声。

1991年8月31日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题为《论干部精神状态》的文章，提出：精神动摇是最可怕的事情，干部必须解放思想。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

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两篇文章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唱反调，“对改革开放要必须先问姓‘社’姓‘资’”，对“皇甫平”进行全面性的批判。邓小平后悔错用了江泽民。

1991年12月25日，商业部公布10城市10类商品质量抽查结果，平均合格率只有59%。12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923.18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57.7%，占全国社会总产值四分之一。

评注：“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其所有资产皆国有化。

1957年荣毅仁任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人提出吸引外资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

1979年7月1日，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成立，荣毅仁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包括马万祺、王光英、孙孚凌、李嘉诚、茅以升、经叔平、霍英东等。

中信公司成立后首先通过租赁方式给北京汽车出租公司引进了200辆汽车，以杠杆租赁方式为中国民航引进了一架波音747客机。

1980年6月2日，由中信公司、北京机电公司与日本东方租赁株式会社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开启了中外合资租赁行业，八十年代前期全行业为中国的纺织轻工家电利用外资引入了10多亿美元进口设备。

1986年，中信利用杠杆租赁收购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10%股权，被评为“1986年世界十大融资案例”之一。1987年1月27日，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1988年8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国五大“官倒”——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涉嫌腐败遭到国家审计署审计。

1990年代后，中信发展成更大的企业集团。1986年底，荣毅仁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后悔之余，思前想后，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对抗在中共党内升温的保守主义，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中。

当邓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夫妇和4名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一行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不管是那一站，邓小平首先关注的是当地的经济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南巡期间，邓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在深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认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历时两年的“姓社姓资”争论由此以改革派的胜利结束。

邓小平走了广东几个城市后，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邓小平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邓小平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江泽民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2月20日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开始传达邓小平讲话。但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尤其是“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内容，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在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

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

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此时，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

江泽民在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面临了数次危机，军方高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泽民，后通过争取邓小平支持后，逐渐获得军权。

江泽民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协助下，通过俞正声、刘京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联系。江泽民力陈“杨家将”掌握实权危险，声称“杨尚昆在六四前曾公开反对武力镇压，六四后又总是不分场合地说要为六四事件平反，杨尚昆是唯一一个反对六四镇压却留在台上的政治人物”。江泽民在陈云、薄一波等元老的支持下，终于说服邓小平决定削弱杨尚昆兄弟的权力。在中共十四大上，杨白冰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被免去军权。第二年，杨白冰正式退役，杨尚昆也在十四大后离休，“杨家将”从此消亡。

评注：198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因此军费开支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军队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允许经商。4月2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军队经商之事遭到了以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的极力反对。他们历陈“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在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一封信中还说：“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人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说：“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有人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说：“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

张爱萍指邓小平的作为是“饮鸩止渴”，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据统计，全军有企业 15327 个，从业人员 86 万多人。

不出张爱萍所料，军队经商很快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经贸集团，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 OK，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当时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的乱象，不一而足。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执法部门面对来自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无可奈何。军队经商，侵蚀了军队的肌体，损害了军队的形象，恶化了军政、军民关系，同时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

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后，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的建议下，开始采取了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办法。1991 年，军委规定师及师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营企业。1993 年 9 月 19 日，中央军委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

1992 年 2 月 24 日《人民日报》做出响应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迫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支持已无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年 3 月初发布相关的正式决定，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

中共中央遂于 1992 年 2 月底整理南巡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 1992 年 2 号文件下发全体党员，由此结束历时 3 年半的“治理整顿”，并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热潮。

邓南巡后不久，全国掀起搞“翻番”狂潮，追求当地国民产值或工业产值成倍增长的高速度发展。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 12.8%，远高于此前估计的 6%。

1992 年 8 月 10 日，深圳股市引发骚乱。晚间，几百人聚集在深圳市政府门前，表示对深圳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的不满，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近期炒股热在全国迅速升温。深圳最近决定发行 5 亿元面值新股票，采用买表抽签方式认购，1 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中签后可认购新股 1000 股，预计中签率为 10% 左右，每个购表者最多可持 10 张居民身份证。消息公布后，全国各地有 150 万人涌向深圳，邮往深圳的居民身份证多达 320 万张。7 日晚 8 时开始有人在各发售点轮候，午夜时各点已达千人以上。许多人露宿街头，发售点前垃圾遍地。8 日，在酷暑天排了 1 天 1 夜的股民有百余人中暑倒地。至 9 日晨，排队者将各发售点挤得水泄不通，打斗和挤伤人事件一再发生。9 日上午，各点开始售表，由于秩序混乱，许多发售点不得不暂停。下午 3 时，一些发售点通知“表已售完”，而一些人走后门营私舞弊的行为更加激起苦候的股民们不满。深圳事件影响了股民信心，上海股市狂跌 450 点，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此次党代会形成了更年轻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了新晋的副总理朱镕基和书记处书记胡锦涛。

江泽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此他可以直接负责决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使沉寂 3 年多的中国经济再度活跃，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大步迈步；然而，由于市场法规未能及时建立，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之调控经济措施，致使中国在 1992 至 1993 年间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及金融秩序混乱的失衡现象。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

赵紫阳的政治理念是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加强法

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由于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主张在其下台后成为泡影，他所担心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扭曲型的市场经济所容易产生的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加重的现象逐步在中国变为现实，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

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

1985年—1993年间，中共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各省给中央上交部分财税收入，剩下的都是地方的。在这种制度下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各省大力发展经济，扩大税收来源。于是，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涨。但是这种财政制度使得中央越来越穷，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中央开始分税制改革，使中央税收比例逐渐增大。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 2909 票的支持接替杨尚昆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 3 月，他提升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总书记的首席幕僚；7 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全国人大任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 年李鹏连任国务院总理时有 210 张反对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属少有。

1992 年 3 月，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的议案，4 月表决时竟有 177 票反对，664 票弃权，更有 25 人未按表决器，为历史上绝无仅有。1993 年 1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李鹏出任主任，负责监督整个三峡工程的建设。

李鹏原来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现在倒成了江泽民的下属，二人见面的时候总有些尴尬。江泽民当时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有意和李鹏并排而坐，共同主持会议，江泽民每每看着李鹏的脸色行事，外界称其为“江李体制”。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江泽民不得不讨好李鹏。江泽民第一次出外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一心想上马的“三峡工程”，并积极策划使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的预案。

江泽民、李鹏等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受到广泛质疑。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

评注：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 50 元，民间俗称“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

1991 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

1992 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 9000 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

据官方估计，截止 2004 年，吸毒者及血祸受害者在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占中国大陆全国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则保守估计至少有 30 万人感染艾滋病。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 140 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

当时主事河南的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的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刘全喜在 2002 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仍担任省人大代表；而李长春则于 1997 年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于 1998 年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于 2002 年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 年顺利退休，而据《亚洲周刊》报道，4 名河南纪委长期以来联名举报李长春，但一直未能成功。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虽然

是临危受命，首次进行了省级的艾滋病普查，最终缓解了艾滋病疫情，但任内仍然封锁有关艾滋病流行的消息。

香港的治安在进入 1990 年代后多次受到持械劫匪的挑战，这些劫匪大部分原籍中国大陆，并偷运大火力武器到香港犯案，再将抢劫得来的赃物运回中国大陆，劫匪的跨境犯案令香港警方难以追缉。1991 年 7 月在启德机场附近发生解款车持械行劫案，三名劫匪劫去相当于 1.7 亿港元的的美金和港币钞票，其中一名疑犯张子强虽然被捕及被判监 18 年，但后来以证据不足及供词矛盾成功上诉改判无罪获释。

六四事件后，大量香港人选择移民。1990 年计有 62,000 名香港居民移民外国，即当时总人口 1%。1992 年则有 66,000 人；1993 年 53,000 人，1994 年 62,000 人。其中不少香港人透过居英权计划移民往英国，也有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的家庭。移民的不单止是普通居民，也包括不少城内富豪大亨。当中，怡和集团率先宣布从香港撤资，改以新加坡为集团第一上市地区。之后，汇丰集团亦宣布在伦敦成立汇丰控股，并对汇丰集团进行全面收购，变相迁册伦敦。此外，香港的娱乐界钜子邵逸夫家族亦把资产移往加拿大。

1990 年 3 月 21 日，李登辉经国民大会选举为总统，5 月 20 日就任，结束他从 1988 年蒋经国去世后两年的代理总统时期。台湾开始发展出政党政治的雏型，为日后的民主深化奠定基础。

1993 年 4 月，海峡两岸政府分别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峡交流基金会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在新加坡进行了汪辜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促成海峡两岸沟通交流，这一主张也长期影响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也是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美国恪守上海联合公报，坚持一中原则。老布什总统上任后相当重视两岸间的军力平衡，其执政期间曾核准大批的对台军售案。至克林顿总统上任后，其对台政策转趋保守，始终不同意出售先进武器。

1993 年 11 月 17 日，江泽民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与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尽管双方的首次见面非常拘谨且无多少成效，但也客观上促使了双方的互通。

两国元首的会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同一天，江泽民还会晤了印尼、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日本和泰国的领导人。20 日，又会见了新加坡、菲律宾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其中好几位都是第一次和江泽民见面，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无疑是有意义的。

江泽民访问美国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火炬计划也得以加速进行。1988年8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作为一项政策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政府部门营造了一个让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等知识要素进入到市场成为生产要素的环境，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

随着火炬计划的实施，民营科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壮大，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火炬计划完善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进了投融资体系的建设，为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海外的科技、金融、企业、商业等各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高新技术企业走向世界。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坚持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确立科学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89年后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从1990年起产生了阶梯式增长。1991年5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共有490余名百万富翁。1992年3月1日，1991年中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排定座次，浙江省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居榜首。

与1988年出版、代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河殇》等书籍不同，1990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赞扬中国的书籍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

评注：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名山寺院收取门票的做法。在中共建政之后，各级胆大妄为的无神论官员，就打起了名山寺院这块唐僧肉的主意。

历史以来，天下名山为世人共有，丛林是修道者向往的圣地和传承文化的宝库；寺院不但是宗教修行场所，还担负着教化众生、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天下丛林，以无事为兴旺。

1979年7月，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应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万里之邀，携全家大部分成员来到黄山，展开一次“休养式出巡”。从7月11日抵达至7月16日离开，邓小平在黄山一共待了6天，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登黄山、发表“黄山谈话”，其中包括要大力开发黄山旅游，借名山圣地创收。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其中说道：“名山胜地的重要寺观教堂，不仅是宗

教活动场所，而且是具有重大历史文物价值的文化设施。对这类寺观教堂，一定要责成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执业人员，精心加以维护，使文物得到良好保管，建筑得到妥善维修，环境得到充分保护，使之成为清洁幽静、环境优美的游览胜地。”

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从此，各大山门作为旅游胜地，中共各地政府通过高门票大肆敛财。一张简单的门票，就这样把天下丛林收入共产党各地政府的衣兜里。这张票子还层层加码，将广大信教群众阻隔在寺院的山门之外，从而大大弱化了天下丛林的主要功能。

更有甚者，中共打着复兴佛教的幌子，一场大兴土木的造城运动在天下丛林展开，一条条现代化的公路盘山而上，终于开到了寺院的山门口。从此，天下丛林不得安宁，宗教的神秘消失了，道心并不坚定的僧人纷纷堕落。中共各级官吏还与腐化僧人联合起来，为了门票和香油钱，或承包寺庙，或建设子孙庙，或竞相建设大佛，或天价香，贩卖如来，公开分赃。

有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费了很大的劲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菩萨，但是到了门口没有钱买门票，悲苦之下就跳海自杀了。

老太太的故事没有人记得，但人民记得了邓小平。“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这首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自发行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其手稿被收藏在深圳博物馆。

邓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六四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自此重新提速。

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邓小平因身体原因自1994年开始就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

第三十七章 以贪治国 以黑治国

1994年3月31日，观光船“海瑞号”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发生的命案，24名台湾观光客、8名大陆船员和导游在船上遭到抢劫和烧死。犯人为淳安县人余爱军和胡志瀚，和相邻的建德县人吴黎宏，三人当时22-23岁。在抢劫5000美元、15万余元新台币、3000余元人民币以及部分首饰、照相机、摄影机后，劫匪将“海瑞号”开往预定沉船水域黄泥岭深水区。劫匪离开游船前，在船内倾倒整桶汽油，纵火焚烧游船。

千岛湖事件对当时的两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在案侦破期间，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专门指示要迅速查明起火原因，处理好善后工作。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了要严惩凶嫌的讲话，并指示中共浙江省委等有关单位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件真相。

由于遇难者主要是台湾游客，刑案成为政治事件。50多名死者家属抵达杭州淳安县，台湾海基会要求中国大陆政府，派人协助死者家属到事发现场，但被大陆的海协会拒绝。台湾政府及媒体认为大陆公安故意将“纵火劫杀”淡化为“火灾”不满浙江当局的采访安排和侦案沟通。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因此事而抨击中共政权“像土匪一样害死我们那么多同胞”，并指骂中共‘不讲道理’，指处理事件的行径“像土匪一样”；“这样的政府，老百姓早该不要了！”

1994年8月8日早上，石家庄液压件厂一名年龄34-35岁左右的女工康菊花被报失踪，次日中午，在工厂后方的玉米地里发现了已高度腐烂的受害者尸体，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死者生前曾遭强奸。

聂树斌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综合职业技术学校校办工厂工人，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案件侦查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传唤，9月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作为案件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0月9日被正式逮捕。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3月3日以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死刑判决，未满21岁的聂树斌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枪决。之后经复核为冤假错案。不久有说法在网上流传，称聂树斌被枪决，是因为当时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章含之寻找可移植的肾源，且聂树斌的肾脏可以匹配。

此案定罪于 1995 年“严打”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被认为是中国“严打”这一特殊时期司法不公正的代表性案件。媒体指同为冤假错案的 1996 年呼格吉勒图案至 2016 年 1 月已经追责 27 人。

1994 年 12 月 8 日，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的 25 位官员，组织了全市 7 所中学、8 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 796 人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举办了专场文艺演出活动。领导没有准时到场，学生老师们下午入场等候了至少 1 个多小时，约四、五点钟，本市及上级领导才陆续进来。

18 时 05 分演出开始。约 18 时十几分，在表演第二个节目即克市第二小学的节日时，舞台后端的幕布因附近灯光过热而被烤燃。不久，火引燃了后幕的装饰用呼拉圈，热气使幕布膨胀如气球。

大火造成的 325 名遇难者中，有 288 名中小学生，其他为教师、工作人员、家长、官员等。另外，还有受伤住院者 130 人。医生鉴定表明，死因除了烧伤、窒息，还有近百名孩子是被踩踏身亡，孩子尸身上有成人的鞋印。据二小校长黄文华回忆，此时馆内“没有一个人指挥”，“火光冲出来后，一下子全都乱了”，“喊谁谁都听不见”。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灾难发生 20 多天后写了一篇通讯《人祸猛于火——克拉玛依“12·8”惨案的警示》，其中提到有人在火灾发生时喊道“让领导先走”，引发轩然大波。此后，“让领导先走”几乎成了此次灾难的代名词。

在撤离过程中，克拉玛依本地官员全部生还，其中 3 名市局领导和 17 名教委成员，除副市长赵兰秀外，均及时脱险，赵兰秀面部严重烧伤，但最终生还。

事件之后，学生墓碑上刻着因公牺牲，也有当局的承诺，但因公牺牲证也同样一直未发。连官方祭悼活动都没有进行。有家属到其他城市进行维权上访，但由于上级部门的压力，他们遭到了重重阻挠和拒绝。

王宝森是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1995 年因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等问题被查处。

无锡新兴实业公司总经理邓斌是事件的中心人物。1991 年 8 月，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邓斌累计筹集资金 3.86 亿元人民币，亏欠数千万元人民币。新兴公司成立的当年，向某政府部门上缴 1000 万“利润”。

根据中纪委的案卷，王宝森违法犯罪的主要事实有：贪污公款 25 万多元人民币、2 万美元；挪用公款 1 亿多元人民币、2500 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 1300 多万美元的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1995年4月4日，王宝森使用手枪自杀于北京怀柔琉璃庙镇崎峰茶附近。根据法律规定，王宝森畏罪自杀，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995年7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

1995年，随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案爆发，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因受贿案被撤职；江泽民也借此案对政务系统的贪腐案件进行清查。

陈希同1992年10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任北京市市长，曾参与和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表示自己的子女是普通工人，自己除工资外没有任何收入。1990年代，陈希同依靠北京建筑业发展分配的施工许可获得了2400万美元，并为许多年轻的女主持人备了许多私人住宅。之后，陈希同涉及金融案件金额达20亿美元。

1995年4月27日，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1995年7月4日，中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后来陈因为王宝森事件，暴露出巨额贪污而被捕定罪，1995年9月被以“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之后，被撤销党籍，关进秦城监狱。

陈希同在前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员姚监复根据陈希同本人亲叙而撰写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纪录》一书中声称他的贪腐案是文革以来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错案。他说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夺取权力。

评注：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和江泽民态度不同。江泽民一面镇压《上海经济导报》，态度强硬，一面又讨好赵紫阳，做深刻检讨。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自认为是拥护邓小平的改革派，维护江山有功，本想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便宜，心理十分不平衡。

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主政北京，根底必上海来的江泽民要深厚，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最大障碍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上台后偏向保守，陈希同则逆流而动。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邓小平南巡后，陈希同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对比陈希同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泽民的僵化和保守。

陈希同在 1995 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薄一波把信交给江泽民。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称是。于是，王宝森首先落马。

日后，薄熙来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朱镕基 1988 年竞选上海市长时说，“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1989 年六四事件后，他接替江泽民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主政上海期间，朱镕基解决了上海人的菜篮子、交通、住房三大民生问题。他铁腕治吏、高压反贪，刮起“廉政风暴”；大刀阔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推出财权、事权下放等改革举措，推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高效廉洁政府；坚持“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理念，推动浦东开放开发。

朱镕基在各个市、县区设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的接待室。广大的市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检举贪污受贿的官员，例如：打电话、匿名信、当面举报等这些途径。仅在 1988 年，上海就揪出了 29 名贪污腐败的贪官。

邓小平评价朱镕基，“有些同志是文武兼治之才，既能滔滔雄辩，也能冲锋陷阵，这种人才难得，求之不得。”1991 年，朱镕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

刚上任，朱镕基赶赴东三省处理三角债问题。朱镕基通过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措施，只用了一个月，就基本解决纠结了多年的“三角债”。

1993年3月29日，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领导中国经济决策。同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朱镕基提出银行不再是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他把银行专业化，成立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贷款的任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物价取消双轨制，和市场接轨，消灭官员利用特权的寻租空间。这些强力推行改革使得朱镕基在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之时，优秀的政绩及强硬的作风，备受国内外赞扬，也就因此被冠以“经济沙皇”的名号。

为了加强中央的调控能力，朱镕基在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让财税收入更多流入中央政府的口袋，而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允许地方通过搞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来捞钱，从而推动了地方基建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迎来首次爆发浪潮，房地产公司数量翻了三番，商品房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80%。新兴的经济特区海南更掀起房地产热，最高峰时曾聚集5600多家房企。

评注：恩平是广东省江门市代管县级市，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广东省定位的珠三角西岸现代产业基地和温泉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是中国麦克风行业产业基地、中国演艺装备产业基地、中国温泉之乡、地热国家地质公园、中国避寒宜居地。中国著名侨乡恩平是我的家乡，我在鳌峰山下的恩平县第一中学念了六年书。

恩平市领导非法集资案，是指1990年代该市发生的局部性金融风险事件，曾两次出现严重的银行挤兑事件和多次群体性事件，一度引发广东省全省金融瘫痪。

1992年开始，中国大陆全国范围内出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和集资热的“四热”现象，在经济指标方面表现出高固定资产投资、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的“四高”现象，在经济秩序方面则表现为乱集资、乱拆借和乱设金融机构的“三乱”现象。

1987年，恩平县政府开始以“金融体制改革”的名义，擅自制定违背中国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地方性政策。1990年12月，恩平县委县政府提出“各经济战线、镇成立财务公司”“今后20年平均贷款余额递增13%以上”等不合实际的政策目标，制定《恩平县1992年鼓励发展经济奖励办法》鼓励

高息揽储等违规行为。时任恩平县委书记邝仍提出了“四千四万”的激进工作方针，即发动当地群众以“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施尽千方百计”开展引资活动。

1987年至1993年11月，年仅28岁便出任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县支行行长的郑荣芳躲避监管，擅自突破上级部门规定的放贷指标，超规模发放了15.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导致贷出款项利息无法收回，且出现2,021万元的巨额经营亏损。此外，郑荣芳擅自违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各级金融机构均不得为企业进行贷款担保的规定，以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县支行的名义，为恩平市华侨住宅公司、恩平工贸实业总公司等恩平7家企业提供担保，向海南省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市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市洪桥城市信用社等机构借款人民币共1,820万元。上述企业均未能偿还贷款。

1993年6月，中央政府要求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恩平县政府违背上级政府禁令，再度颁布《1994年企业发展经济奖励办法》，进一步明确对银行增加贷款的奖励，鼓励高息吸存、非法拆借及超规模发放贷款，使当地金融秩序进一步恶化。1994年2月，恩平撤县为市。1994年2月至1995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市支行下辖7个办事处通过高息贴水吸收存款和账外拆借资金的方式，违规吸收存款32亿多元，以发放流动资金的形式向企业违规发放账外贷款349次，总计超过25亿元人民币。

侯春幸接替郑荣芳继任建行行长后，在高息揽储、非法集资上变本加厉，中国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如法炮制。最终，1995年6月，恩平爆发银行挤兑事件，建设银行恩平支行违规发放的贷款大部分无法收回，造成经济损失超过36亿元。

1995年5月5日，中共恩平市委书记李光辉在恩平市社会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成立恩平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的设想。1996年3月，恩平市政府成立了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市长方振湛任组长，副市长郑荣芳任第一副组长，所辖17个镇也都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任组长的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直接干预金融活动。7月15日，方振湛主持召开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动员银行和信用社带头高息吸收资金，按照引入资金利率奖励引资人员，以25%作为控制标准。1996年8月，恩平市再度爆发严重的银行挤兑事件。

1996年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广东省恩平市政府领导人违法干预金融活动造成严重金融风险的通报》，直指“恩平市政府领导人违法干预金融活动”的性质严重，决定对干预金融工作造成严重金融风险的恩平市政府给予批评，责成中国人民银行

会同监察部、审计署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全面调查恩平市政府及金融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

1997年3月，侯春幸出逃，成为重点抓逃对象之一。4月3日，时任恩平市政府干部梁某通风报信，透露国务院工作组进驻恩平的消息，导致多名涉案人员提前或准备出逃，梁某因此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机密罪而被判刑。4月10日，恩平市原副市长郑荣芳携老婆和情妇，带着3本护照和70万港币现钞准备偷渡越境潜逃。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亲自指挥，封锁了所有出入境口岸，动用1,500多警力，最终在珠海市靠近澳门的海边将其逮捕。郑荣芳被捕后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8日，广东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郑荣芳作出改判，由原判20年徒刑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1999年8月19日，江门市原副市长、恩平县原书记邝仍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江门市国际信托集团原董事长郑旺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三埠卫生检疫局原局长张凤鼎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同年11月18日，恩平市委原书记李光辉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000年3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市支行原行长侯春幸潜逃数年后，在广州市被捕，因犯玩忽职守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广东恩平金融风波平息后不久，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爆发，两起事件性质不同、发生后的震荡范围也不一样，但在涉案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在恩平金融风波中负主要责任的江门市原副市长、恩平县原书记邝仍被判刑后，其女儿女婿牵涉入江门市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并出国潜逃。

广东恩平金融风波的持续发酵，除短时间内造成恩平地区金融危机外，甚至一度造成广东省全省金融瘫痪，在地方经济、金融改革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广东恩平金融事件极大损害恩平市乃至江门市的经济发展，使得恩平市从中国大陆经济最为发达的“百强县”一度跌落为广东省最落后的八个县之一。事件发生后，恩平市政府各级机构及事业单位连续多年无力支付或拖欠工资。恩平市的企业多年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难以发展。恩平市被金融机构列入“金融高危地区”达十年之久，在恩平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迅速收缩甚至退出市场，特别是银行业，使当地银行服务网点也由发生风险前的266个锐减至不足50个。数十家属于当地支柱产业的水泥厂、纺织厂、铝材厂均处于关闭状态，厂房破败。恩平市原

市长顾士明评价“金融风波使全市经济水平至少倒退了 10 年。恩平所欠的债，全市人民不吃不喝 100 年才能还清。”

1988 年 4 月 26 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海南的房地产正式拉开序幕，并且迅速进入到膨胀时期。到了 1992 年，海南的房地产一路飘红，只用了三年时间海南省的房价就增长了 5.4 倍。

1993 年海南岛在岗平均工资只有 293 元每月，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 26 倍。这期间，就有超过两万家房地产公司在海南落户，当时海南城市人口不到 655.8 万，平均每 300 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

遍地的房地产公司炒地皮，建楼卖房，在银行大量贷款，为了快速从银行贷款到款，房子还没建拿着图纸就高价抵押给银行，空手套白狼，一个敢要，一个敢贷，炒房大军中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但无一例外，他们的钱都来源于国有银行。

1993 年 6 月 2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突然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海南房地产泡沫随即破灭，遗留下大批烂尾楼和银行坏账，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一度陷入低潮。

1993 年 6 月 23 日是海南房地产的至暗时刻。银根被控制，热闹的海南房地产瞬间入冬，大量开发商纷纷跑路。“烂尾楼”高达 600 多栋、1600 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 18834 公顷，积压资金 800 亿元，积压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烂尾楼就像一块块伤疤留在了海南岛上，狂欢之后，一切都归于寂静，只是这种平静付出的代价太大。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施财政包干的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央财政陷入了危机，朱镕基在财政体制改革中被委以重任。1993 年 9 月至 11 月，朱镕基连跨 17 个省、市、自治区，同各省谈判，争取各省对分税制度改革的支持。1994 年，朱镕基一口气推出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个方面的改革。财税制度上推行“分税制”，使中央取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

1996 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 70% 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会被拖垮。对此，朱镕基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务院体制改革。

1996 年 2 月 2 日一则爆炸性新闻迅速在全国流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住所被杀，凶手居然是专门护卫他的 18 岁武警执勤战士张金龙。

官方的说法是犯罪嫌疑人张金龙在执勤时屡次进入李沛瑶家中行窃，某次入室盗窃时被李发现后杀人。坊间传言，张金龙把自己的妹妹推荐给李沛瑶做保姆。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张金龙出于报复而杀人。

这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强烈关注。中央高层对武警部队进行整肃，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退役，政治委员张树田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同年4月，开始了第二次“严打”。

自邓小平执政后，1983年第一次严打以来，中国已发动了十多次全国性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严打已形成以共产党各级组织为核心的有组织的，定期的群众性运动。但是中共的严打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社会治安，并减少犯罪。相反，中共的严打是最破坏社会法治的，其中普遍存在严重的超越刑事法律程序现象，许多刑事嫌疑犯无法享有正常的辩护权，无数嫌疑人被长期羁押而处于无助的地位。

1995年12月6日的宁波市中山东路，是当时该市精华商业区，路上的大型银楼绿洲珠宝行不但占地面积广大，在全省珠宝业界也是名声显赫。当天凌晨有一男子透过大楼结构攀爬闯入，制伏两名保安后撬开保险箱，盗走价值160余万人民币的11公斤珠宝。犯罪嫌疑人在逃跑时开枪杀死两名保安。

此案被称为浙江第一悬案，因为案件牵涉当红影星刘晓庆。1990年影视明星刘晓庆开始涉足商业，最鼎盛时旗下有二十六家公司，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的亿万富姐”。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名列第45位的刘晓庆有七千万至九千万美元的身价。

宁波绿洲珠宝行特大抢劫杀人案后，被抢的绿洲珠宝行由于损失巨大，加上办案期间店面被封锁一个月无法生意，经营出现危机，但老板陈春明尚有家底于是隔年意图透过商请明星刘晓庆来店中购物进行广告宣传，除了高额价码外在参访现场诸多媒体前还赠与了16万元的珠宝，不料当时在场的一名记者将此报导作负面处理，认为明星对社会有何贡献，逛一趟街拿到许多农民半生所得，并暗指国家演员身份刘晓庆是否有受贿嫌疑，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引起大量不良影响，珠宝店被检察机关和税务机关调查后黯然倒闭。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从严从重从快处于极刑的犯人。同月，广州市也召开了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

在北京，鹿宪洲曾因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4年2月越狱潜逃，纠集其他刑满释放人员郭松等结伙实施盗、抢、杀犯罪，手法老到。鹿宪洲在中越边境购买了一些军用枪支弹药，潜入北京，专抢银行。

在鄱阳湖北岸的都昌县，34岁的黑老大邵银初在当地就以党、政、军、人大、政协、纪检以外的“第七套班子”、“邵县长”自居。邵银初原本是当地农民，从小练习散打功夫，身高体壮，自称曾当过村里的治保主任，以练武为幌子，纠集了刘

光华、陈建华、邵川海、周明宣、余祖波等同伙，喝鸡血酒结盟，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犯罪团伙，经常率领团伙成员组成摩托车队到处碰瓷敲诈。

在河南，从1994年开始，被成为“铁道游击队”的盗窃头子范金明纠集了一伙两劳释放人员，在焦枝铁路沿线利用列车暂停或者慢行，剪铁丝、撬车门，盗窃了彩电、摄像机、录像机、音响等80多种紧俏物资，案值超过50万元。洛阳铁路公安和地方干警联合行动，抓获了这个12人的特大盗窃团伙。

90年代，由于中共独裁专政腐败治国，导致社会普遍的拜金思想和道德沦丧，又出现了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比当前混乱的社会治安状况提出意见，要求中央用行动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中央决定开展全国性的严打行动。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亲任“严打办公室”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严打。

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福建省还把“严打”团伙的任务层层分解量化到各实战单位，落实到民警身上，并对立功的民警进行物质奖励。

4、5、6三个月，全国司法机关统一行动，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流窜犯罪，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新疆严打暴力犯罪团伙，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枪支和毒品犯罪。这次严打行动，全国共打掉了9万多个犯罪团伙，抓获42万余名团伙成员。在“从快从严”的要求下，又制造了无数的冤案。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发生一起奸杀案，毛纺厂年仅18周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发现女尸并报案，却被认定为凶手。仅仅61天后，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还被列为内蒙古严打期间成功案例。2005年10月，连环强奸杀人犯赵志红落网，交代96年毛纺厂奸杀案实为自己所做，呼格吉勒沉冤得雪。

1995年的3月和8月，杭州市萧山先后发生两起出租车劫杀案，两名出租车司机遇害。10月，车匪路霸田孝平在萧山欢潭乡岳驻村公路上持刀抢劫农用货车，被当场抓获。田孝平被认定为两起出租车劫杀案的嫌疑人，田孝平又将门卫陈建阳、厨师田伟东、水电工人王建平、轧钢厂工人朱又平四人指认为共犯。庭审中只有田孝平认罪，田伟东等其他四人均不认罪。不肯认罪的田伟东、陈建阳、王建平三人一审被判处死刑，三人上诉，终审改为死缓。田伟东回忆，审讯时遭到电警棍、粗木棍的刑讯逼供，两度咬舌自尽。2013年，经过审讯，有盗窃前科的

项生源承认 1995 年 3 月遇害的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为自己所杀。此时，田孝平、田伟东等五人已经在萧山、新疆等地的监狱服刑了 18 年。

1996 年 12 月 12 日，邓小平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中央电视台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氏症晚期的邓小平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 12 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

1997 年春节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小平向前去探望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

2 月 19 日正月十三，邓小平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呼吸；当晚 21 时 08 分，医疗组宣布停止抢救，邓小平以 93 岁高龄逝世。邓小平退休后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真切：邓小平没有能够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1997 年 2 月，随着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对中国大陆党和国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领导力。

1997 年，由于美国对亚洲的经济管控，致使整个亚洲，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汇率危机使得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因为亚洲金融风暴日本、韩国奉行混合经营模式的企业相继陷入困境，朱镕基的改革开始转为国有资本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

1997 年 9 月 19 日，69 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由第五上升为第三，仅次于江泽民和李鹏。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朱镕基取代李鹏成为国务院总理。

1997 年 9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重审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并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在具体改革中，他强调要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并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

新一届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泽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强的变革，朱镕基主导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并裁撤了 11 个部委以及近 50 万的地方公务员。

朱镕基主政时期，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许多企业采用诱骗和威胁形式，一边迫使工人下岗，一边将国有资产贱卖。例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大约有 70 万人下岗，大庆油田在工人强烈抗议下没有执行下岗。许多下岗工人失业以后，原

来企业低价变卖给这个企业的厂长和书记，下岗工人以远远低于原来工资继续给新的老板工作。

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工人则大量下岗失业。下岗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失业，虽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与下岗工人任何补偿。因此多数下岗工人生活十分艰苦，并且连同生活的宿舍也被原单位变卖。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为2115万人。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官员贪污腐败问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工人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对于大部分只有工厂经验而没有其他技能的工人来说，使这类人群的再次就业存在极大的困难。于此同时，伴随着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的多重打压，使这类人群生活更加困难，成为中国大陆现阶段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农民工一同被称为“弱势群体”。

评注：几万块啊，就把自己给彻底“卖”了！（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刘心惠）

东北国营厂下岗职工自述：二零一六年八月，我们作为东北一家重型机械制造厂的集体工人，买断金终于获得了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下岗，二零一六年八月拿到这笔钱，签了字摁了手印，几万块，把自己给彻底“卖”了。最多的工龄有四十几年，最少的也有十几年。

一刀切，那种疼痛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好像做手术，麻醉师没有打麻药，手术师不管不顾地一刀切下去，就像切萝卜土豆似的。饭碗就这样没有了。

我们这里是重工业区，初下岗时找工作比上天还难，女工多数又没有什么技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也基本上是体力活，工资只有二百块钱左右，什么待遇也没有。

到了这把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莽撞不得，钱对于我们太重要了。买断伊始，我们几个姐妹的策略是等等看看，有一小部分人跑到厂前，工厂的大门紧闭，警卫把守，这是我们父辈贡献了一生的地方，也是消耗了我们的青春的地方，现在多么陌生，把我们拒之门外。

中间有一段听闻总经理发话，说每人可能领一部分钱，消息还没有坐实，总经理在办公楼自杀了。此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买断也被暂时搁置。到了八月又重新启动了，动作很快，等到三分之二的人签了字画了押，我们也慌了，挺不住了，一起去把字签了——我不敢看我手指上余留下的红色印泥，它太醒目了，我也不敢看那些还在坚持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个叛徒。

工厂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十几岁就上班，工作是分配的，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好像世袭一样。很多人在厂办的幼儿园毕业，直接升到厂办小学，初中，然后高中，有少数人上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技术学校，看病去职工医院，有食堂，电影院，少年宫，洗澡堂，住的是工厂盖的楼房，小时候我很爱喝我们厂汽水厂产的汽水，有橘子味和草莓味的，非常正宗不掺假。

现在，我们像是被硬生生地撕掉了商标的商品，就像一个人失去了故乡——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工厂比之于居住地，更像是故乡。

1998年夏季，长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江河的干支流发生的特大洪水。长江流域泛滥，为中国带来严重的损失。连日来持续的大雨令洪灾更为严重，造成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这场灾难，受灾人数上亿，4150人死亡，近500万所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的中国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人民币。此次洪水暴露出许多水利工程质量低劣的“豆腐渣工程”，当时朱镕基巡视发生水灾的江西省九江市时，因九江新筑的防洪大堤不堪一击，被朱镕基斥责并创造“豆腐渣工程”一词，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围湖造田”等环境保护问题的讨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大洪水同时来袭，朱镕基将形势比作“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中国政府方面也罕见承认土地的错误使用是导致洪灾的原因之一，并承诺进行政策调整。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一切毁林开垦行为，并切实做好退耕还林工作。此次洪灾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大批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参与了抗洪抢险。

1998年8月21日晚，文化部、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携手筑长城”赈灾义演。香港在1998年洪灾捐款少于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晋光说：“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同胞捐了好几亿；1998年是百年大灾，灾情明显比当年严重，可善款却少得多。为什么呢？报章上和电台广播里，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年年水灾？为什么一年比一年严重？庆祝抗洪胜利值得高兴，还是无须庆祝抗洪胜利更值得高兴？”

1998年，新华社分别以《合浦有条“腐败街”》、《合浦县“买官卖官”现象触目惊心》为题，向中央反映原合浦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以阮永明为首的正副主任、调研员等一批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在合浦县为他们自己建造超出正常工资负担能力的高档奢华住宅的问题。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及罗干等中央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严肃查处。2000年11月30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贪污公款269万元、挪用公款225万元向县委领导行贿的“腐败一条街”案主犯、原合浦县建委主任阮永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蒋远球等6名同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没收非法所得。收受阮永明贿赂的合浦县委书记何建林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99年8月，刚刚参加完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私下单身飞往广州，其乘飞机、在广州入住宾馆均使用假证件，行踪诡秘。8月9日中央决定调其回京接受调查。北京市公安局对胡长清执行刑事拘留。从依法逮捕、开除党籍、执行死刑，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胡长清成了中共建国后第一个因贪腐罪名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干部。中共说胡长清善于伪装，在家庭生活中表现极为孝顺。胡长清喜欢读书，但品味特殊，多是《肉蒲团》、《素女经》、《金瓶梅》等香艳题材。据赵紫阳说，胡长清之所以被枪决，是因为他说了不少对江泽民不满的话。

1998年9月，中央纪委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开始调查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

湛江地区的走私活动由来已久，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年底陈同庆任市委书记之后，湛江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更是日益猖獗，搞乱了经济秩序。据查，以李深、林春华、陈励生等人为首的走私团伙，从1996年初至1998年9月，大肆走私汽车、钢材、成品油等货物，案值达110亿元，偷逃国家税收62亿元。在办案期间，工作组收缴扣押涉案人员的赃款赃物及不动产约47亿元。尤其是陈励生，凭借其父亲陈同庆任湛江市市委书记的权力和影响，通过关系成为香港居民后，返回湛江成立合资公司进行走私活动。湛江市主要党政领导，海关、港务、商检、船务代理、公安边防、海警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人员，或充当走私分子的保护伞，或与走私分子同流合污。海关、港务、商检等政府机关单位先后有163人主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

结果，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原调查处处长朱向成被依法判处死刑；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原副市长杨婚青，茂名海关原关长杨洪中，湛江边防分局原局长邓野及原政委陈恩，走私团伙头目和骨干陈励生、姜连生、李勇、林柏青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在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反走私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

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全数完成脱钩，军队和武警部队正式退出商业领域。与此同时，两院三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所办企业脱钩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

1998年7月26日，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一艘四千吨运输舰，对四艘来自北欧的装满七万吨成品油的走私油轮，进行保驾护航。走私船队撞着了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来的十二艘缉私炮艇。缉私艇向海军喊话，要求海军配合其执行公务，也就是搜查。海军回答，除非有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的命令，否则你们不可造次！双方对峙了约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为走私油轮护航的海军紧急向岸上领导请示，上司不敢作主，又向北京军队高层请示。命令很简单，也很干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给我打，打他个稀巴烂！”于是，海军一艘炮舰迅速对准海关和公安的指挥艇，发射了数发机关炮。几乎同时，海军的运输舰和其它三艘炮舰，开足马力，撞向缉私艇。整个战斗，历时五十九分钟。此次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事过之后，不了了之，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

1998年撤销了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后，原经济实体的资产就在军中瓜分了。已经钻到钱眼儿里的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更频繁爆发武斗，用枪、用炮甚至动用装甲车，拼个你死我活。从1999年2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2月8日自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

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上讲：“光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他们还动用军方气象台来服务，冒用总理签字，随便盖上军委副主席大印就冒领20亿，事情到江泽民那里就被压下了，军队的这些行为真使海盗、响马、地方贪官皆望尘莫及。

福建商人赖昌星1991年迁居香港。1994年成立厦门远华集团并涉嫌从事走私活动。到1999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

1999年，一封长达七十四页的举报信被送往了中纪委和海关总署。这封举报信撕开了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丑闻。

远华公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向大陆走私各种商品，该公司在表面上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在背后却拉拢海关人员。有了政府部门的包庇，他就肆无忌惮地开启了走私。当时远华公司和厦门的很多机要部门都有合作，身后有强大的势力作为他的保护伞。

此案由朱镕基亲自督办，审查中牵扯至六百余名涉案人员，其中近三百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案涉案金额之巨，办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案件涉及面之广，堪称 1949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经济大案，从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公安部副部长兼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纪周因卷入厦门远华案而被判处死缓。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被指控出谋划策劝告赖昌星尽快出逃而判处死刑。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二支队队长张永定被判处无期徒刑。

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詹少敏被开除党籍、公职。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开除党籍、公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被判无期徒刑。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和副市长赵克明均被判死缓。

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判无期徒刑。厦门海关副关长接培勇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厦门海关调查局副局长杨上进被判无期徒刑。厦门商检局副局长罗良玉被判有期徒刑 8 年。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陈国荣被判无期徒刑。

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姬胜德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总参情报部五局副局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卷入赖昌星案，但判刑未明，未予法律追究。

评注：远华走私案中，江泽民真正要整治的人实际上是中共情报头子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儿媳妇。姬胜德是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和赖昌星私交非常好。而刘华清的女儿是姬胜德的下级，所以江泽民把他们串起来打。

1999 年 3 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就被抓起来了。姬胜德出事后，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曾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等请求宽恕独子姬胜德，免其一死，但遭到拒绝。姬鹏飞绝望之下于 2000 年 2 月 10 日 13 时 52 分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于姬鹏飞的死讯，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江泽民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中央军委、军方的四总部、国防部也没有送花圈。

邓小平在 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安排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时，担心江泽民与军队毫无渊源，因而特地安排刘华清、张震两员老将出任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保驾，以稳定军心。

江泽民在翅膀逐渐变硬了之后，开始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破格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将领。刘华清、张震对江泽民过于插手军队不满。1999 年，中共建政五十年大庆，江泽民传令不许退休老军头穿军装，但见刘华清依然穿戴上将军装帽徽，跟自己叫阵，憋着火问道：“不是说不准穿军装吗，你怎么搞的？”刘华清没有买账，冲口而出：“你一天仗没打过都可以穿军装，我怎么就不能穿！”江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

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牵涉很多案中案，其中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情妇李沙娜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1995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间，被告人梁耀华纠合被告人李沙娜和同案人陆和志、古伟强、颜小青等人结成走私团伙。在梁耀华的组织、策划、指挥、操纵和直接参与下，该团伙利用李沙娜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特殊关系，拉拢李纪周滥用职权为其实施走私向执法部门疏通、施压；并通过贿赂、腐蚀、串通海关、边防、公安等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其护私、放私。该走私团伙在梁耀华的组织、策划和指挥下，借以梁耀华为董事长、李沙娜为董事的广州新英豪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多次从香港组织进口汽车货源，采取串通海关人员假查扣，偷换货柜，对查扣执法部门进行疏通和施压，串通武警和刑警护送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管，将进口汽车从香港走私入境后销赃牟利。三年间，共走私入境各类型进口汽车 262 辆，偷逃应缴税额 51,324,278 元；其中，李沙娜参与走私 2 次，走私偷逃应缴税额 15,397,179 元。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被告人梁耀华积极组织、策划、指挥该团伙的全部走私活动，走私偷逃应缴税额的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肆意拉拢、贿赂腐蚀、串通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走私犯罪活动向执法部门疏通、施压、护私、放私，影响极其恶劣，其所犯走私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被告人李沙娜受梁耀华指使，拉拢、串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向执法部门疏通、施压，为走私活动提供方便，其两次参与走私犯罪所偷逃的应缴数额特别巨大，在整个走私犯罪活动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

在远华案中，江泽民的心腹、江办主任贾廷安就曾向赖昌星通风报信。赖昌星透露，他和江泽民五个秘书中的三个都很熟，包括大秘书贾廷安。赖昌星对《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说，虽然他和江泽民本人没有直接接触，但他曾有意给中央军委捐款。江的秘书便报告给了江泽民。赖昌星披露，“江泽民说：不用了。

他（江泽民）叫我留着钱好好做生意，还说谢谢我。他本来也知道我是他秘书的好朋友。”

远华案案发后，专案组在赖昌星公司里搜出贾庆林到远华公司和他的合影。贾庆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的太太林幼芳在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任党委书记。林与远华撇不清关系，有严重贪腐行为。为此，2000年江泽民让贾庆林与她离婚，用来表明贾跟林幼芳“划清界线”。2003年，中纪委四位副书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贾庆林资格政审、组织程序进行复核，各民主党派和政协人士纷纷提出反对贾庆林任政协主席的同时，国务院审计署又爆出了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的特大经济丑闻。江泽民不但保了贾庆林，还把贾庆林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但远华案始终是贾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朱镕基在针对这起走私案件说道：“我们准备好100口棺材，有1口是我的，99口是他们的，大不了就是同归于尽，用我们的牺牲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何乐而不为呢？”

可最讽刺的是，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朱镕基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又成了中国最大的贪官之一。

第三十八章 通向世贸之路

1997年，是香港回归的日子。

6月30日，港督府举行了降旗仪式。下午4时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专车在警察摩托车的开路下，正式告别港督府。日落时份，英国和香港的旗帜徐徐降下。

英国军方告别仪式在6月30日晚上6时15分在添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主礼嘉宾包括王储查尔斯、首相托尼·布莱尔、外交大臣罗伯特·库克、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卸任在任的港督彭定康。仪式举行时一直下着滂沱大雨，令嘉宾及表演者甚为狼狈并添上几分伤感。23时59分48秒，在即将踏入午夜时，随着《天佑女王》的乐声，英国和香港的旗帜再次徐徐降下，象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

午夜12时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香港的主权正式从英国转移到中国。中国国旗和新的香港区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升起。中国大陆的大型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在天安门广场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509名先遣士兵由熊自仁少将率领，在6月30日晚上9时进入香港；凌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四千人部队抵达香港，接收了原驻港英军的各项军事设施。

7月1日凌晨1时30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主持就职仪式。在仪式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在座4,000多名嘉宾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上午10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首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将维持50年不变；继由行政长官新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其就职演说。15时50分，江泽民率中央代表团返抵北京。16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致辞。18时，香港、中国大陆和国际名流在香港体育馆进行节目表演。20时，香港烟花表演。

19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没有变得更加繁荣；相反，贫富悬殊问题加剧，民生及政治议题均未获悉时解决，多次超过百万人上街游行。

在1997年之前，欧美国家已经普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劳动保障情况下，中国大陆得以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国内外投资骤增。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香港资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贡献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

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占了重要的印记。在改革初期，以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

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广东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强有力的支持，离不开港澳投资企业率先进入广东，率先投资、率先发展。香港人澳门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

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 1000 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 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

港资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快速发展。当时，由四名港商投资的华南城国际工业原料城是占地 1.5 平方公里的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配送以及金融结算功能于一体，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之最。

香港很快就成为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资金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并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台商亦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有更多台商以港资或香港注册公司名义进入中国大陆投资。台湾实际开始大规模投资始于 1993 年邓小平南巡后。1992 年到 1994 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 2.3 万家，协议金额 200 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 75.8 亿美元。从 1993 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 6 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 2000 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朱镕基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凸显，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国走上“世界工厂”的道路。

评注：1989 年，因为预期亚洲经济可能以超级高速发展，在全球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近一半的资本净流入亚洲地区。南亚经济体为了集资，以提高利率的方法，尤其吸引追逐高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因此吸引该区

域流入巨大的资金，带动资产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经历 8%至 12%的高 GDP 增长，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1990 年代，一系列事件冲击着经济和政治环境：1991 年 12 月老布什解除美国就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制裁、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美国利率的上升及进而走强的美元、半导体价格的骤降，都影响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美国经济在 90 年代早期从衰退中恢复时，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开始提高美国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相较于东南亚一直以较高的短期利率吸引热钱，这使得美国成为比东南亚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抬高美元的价值。对于那些把货币锚定美元的南亚国家来说，走高的美元使得它们的出口更加昂贵、失去国际竞争力，也造成东南亚工厂搬迁到成本更低的中国，所以 1996 年春季时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滑，使他们的经常账户更为恶化。

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正式引燃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港币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进一步波及至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及其他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

金融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幻象，而随后资本的投资减少，导致亚洲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长期混乱。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其波及广东损失为中国大陆最高，广东省多家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汕头商业银行等，先后出现严重的财务问题，使香港多家银行对有关贷款作出庞大的呆坏账拨备，影响盈利表现。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 50%，大多数香港及外资银行均暂停对中资企业的新贷款。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广东分行行长肖钢被派至广东，而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王岐山亦被任常务副省长分管金融工作，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资不抵债的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在金融风暴期间，主要的操作是由时任香港金管局主席的任志刚和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处理，中央并没有插手干预；香港亦有报道称“中央应港府要求，调拨巨额资金到港，彻底打垮了索罗斯”。

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多个政权倒下，韩国、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在韩国，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新千年民主

党首次取得政权；在泰国，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在印尼，执政 32 年的苏哈托倒台；在马来西亚，执政 17 年的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把其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革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灾后秩序政府管控能力大幅提高，此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主倒退。

1997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是显著。印尼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在内斗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无辜牵连华裔。印尼在 1997 年起出现多起暴动行为，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

1998 年 5 月 14 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 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 5000 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

黑色五月暴动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遇难和蒙受损失，仅仅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 5000 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近 1200 名华人被屠杀。

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

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抗议和欧美国家纷纷伸出援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 1998 年 4 月访问印尼期间，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暴乱期间有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拒绝提供帮助。

1997 年，西方国家弥漫着“中国威胁论”。6 月，美国国会辩论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很多议员以中国人权为由投了反对票。这一年的头 7 个月里，美参众两院议员先后提出了 66 项反华提案，创历年之最。

1997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共领导人六四事件后 12 年来首度访美。从夏威夷、威廉斯堡到华盛顿、费城、纽约、

波士顿和洛杉矶，江泽民同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一路表演他的多才多艺和平易近人的风格。

26日晚，夏威夷州长卡耶塔诺在官邸设欢迎宴。州长夫人张美智唱起《祝愿歌》时，江泽民兴致勃勃地拿起六弦琴为她伴奏，博得阵阵掌声，给美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克林顿在白宫草坪为江泽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说江泽民很有趣：“与他相处越久就越喜欢他”。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访了他的老师顾毓琇，表达他重教尊师的“优秀品格”。顾夫人王婉清还亲自下厨，为江泽民煮了莲子银耳羹，让在场人员十分感动。

之后，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从战略高度阐述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而不懈努力的美国朋友表示赞赏，还表达了中国要融入世界文明的美好愿望，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打气。

世贸组织的前身为关贸总协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恢复”席位，根据《关贸总协定》，北京方面本可以顺理成章加入关贸总协定。龙永图说：“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那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就决定不加入了。”为了当时的决定，中国后来花了十几年才反应过来，并在1986年正式递交申请“恢复加入关贸总协定”。九年之后，“恢复”之路遥遥无期，关贸总协定却升级扩展为世界贸易组织，也就转而变成“入世”，之后又走了六年。

美国一直以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1990年12月18日至19日，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希夫特对中国进行访问，标志着中美人权对话的开始。1990年到2002年12月一共举行了13次人权对话。用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同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但同时美国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实情况是，中国在人权方面连续出现严重倒退”。

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期望先通过区域性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合作、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年，吴仪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不久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中方团长突然患病，刚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4个月的吴仪，临危受命替补上阵。由于当时美国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势和国内保护现状，此次谈判的任务极其艰巨。1992年1月17日，中美双方终于在知识产权谈判中达成共识，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名。

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说，“美国自己不在经济上强大就不能在国际上强大”，他将经济摆放在军事之上，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开拓世界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因而获得了选民的支持。但两国在地区安全方面的摩擦总是不断发生。

1993年7月23日，美方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将其截停于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则坚持称船上并未装载任何化学武器原料，并拒绝美方提出的使“银河号”返航或者接受美舰人员登船检查的要求。双方最终让步，同意在第三方（沙特阿拉伯）以沙特人员的名义美方人员跟随对船进行检查。9月4日，三方最终签订调查报告，确认银河轮没有运载化学武器原料。银河号被迫中止正常航运长达33天。中方要求美方赔偿，但美方态度强硬，坚持拒绝道歉，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和海军的失败。中国国内的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处理此事上表现出的软弱和退让令人失望。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进行更新，设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1995年1月1日，75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了WTO的创始成员。刚刚就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负责中国加入WTO的谈判。

中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最早由吴仪负责，她因作风强势果敢而闻名，得到了“铁娘子”的称号。1997年2月，龙永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成为中国复关及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从1995年起，中国逐年大幅降低关税；到了1998年4月，中国代表团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份将近六千个税号的关税减让表。

在世界政治经济稳定的大背景下，江泽民坚持并丰富了市场经济体制再加上精通经济的朱镕基总理的努力，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开放，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1997年秋，江泽民访美以后，第二年克林顿便来到中国访问。1998年6月的克林顿总统访华是当时历史上人数最多、阵容最强的一次，前后共有1200多人参与了这一次中美两个大国的访问活动。这次访问，除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是标配之外，还动用了三架客机和几架运输机。

美方为了达到全程记录的目的，甚至不惜从美国带来60多吨的通讯器材，使用专机运载。克林顿一家三口和47名美国访华代表团官员一同乘机前往中国。随团的还有保护美国总统的10辆防弹车、防弹架。白宫的一名内部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戏称：“大半个白宫都快要被搬到中国去了。”

克林顿1998年6月29日在北大的演讲恰巧与在5月4日刚刚举办的北大百年校庆完美接档，所以他在演讲的开场前用中文说了一声“恭喜”，瞬间将全场的热

情点燃。北大经济学院金融专业的刘丽娜向克林顿发问：“您的演讲一直在推崇美国的民主和人权，难道美国就不存在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方面的问题吗？”她的提问被多家媒体报道和转发。

此轮互访以后，克林顿下定了让中国入世的决心，开始大力劝说国会给予中国永久的最惠国待遇，以保持于中国建立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克林顿政府估计，让中国加入世贸，通过经济合作，帮助中国经济改革的同时，有利于占领中国市场，加强安全对话，并加速中国的政治改革步伐，这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

但是，台湾问题还没有办法绕得过去。1995年6月，李登辉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公开演说，被中国大陆方面认为鼓吹两国论，而使此前友善的海峡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渐行渐远，并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1996年时，解放军一份“联合九六一”演习计划被间谍刘连昆（解放军少将）泄露给中华民国。1999年事败被捕，刘连昆遭解放军军事法庭以通敌罪处决。江泽民下令严厉查处中国人民解放军遭到间谍泄密的问题。

1999年4月，朱镕基出访美国，在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记者会中被问到美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两岸统一要不要有时间表，愿不愿意访问台湾？朱镕基回答“关于中国对台湾统一的政策，我们国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的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比这个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国的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能不能当正首脑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票。”

朱镕基喜欢装腔作势、语出惊人。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朱镕基说：“贸易逆差不是什么大事，它不仅有利中国，对美国也许更有利。”朱镕基还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的原料、设备、技术都是从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是从美国来的。说到最后，朱镕基语气明显重了不少，“中国只赚了小头”、“大部分钱是上述那些国家和地区赚去的。这笔账都算在我们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关于“政治捐款”、“盗窃核机密”等问题，朱镕基还幽默地说：“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个总理了，中国有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要贿赂什么人的话，至少拿几个亿出来不是问题，几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那也太少啦。还有，刚才你们的市长夫人给我提了个很好的建议，今年是新中国五十大庆，我们将要举行阅兵式，展示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导弹，她建议我们在这些导弹上写上‘Made In China’，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

有记者问：“朱总理，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诸多新矛盾，你为什么仍然如期到访？”朱镕基说：“你是要我说实话吗？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想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告诉我，他要先回美国，到我将要去的地方介绍我、介绍中国，他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我说，他是一个美国人还要遭到这样的待遇，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 **New Face**（新面孔）将要变成一个 **Blood Face**（头破血流）啊。”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问题。朱镕基回答：“我们今年将有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中国最新式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向我建议在那些武器上标明：**‘Made in China, not from America’**（中国制造，不是从美国偷来的）。”

1999年，美国中情局（CIA）获得情报，南斯拉夫与中国合作在该大使馆建设雷达信号接力站和无线电监听站，以便监视北约军机。

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23时45分，从美国本土直接起飞的美军B-2轰炸机投掷五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新贝尔格莱德樱花路3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其中一枚炸弹在使馆东南角斜穿大楼，并在使馆一层墙角下爆炸，导致使馆高级外交官宿舍被严重破坏，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当场死亡；第二枚炸弹从使馆中央穿透楼顶，破坏位于三层的大使办公室及其中的卧室、位于二层的会计室以及位于一层的大厅；第三颗炸弹落在使馆的西北角，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妻子朱颖所住的西北角客房炸毁，墙壁向室内倒塌，导致两人死亡。第四颗炸弹钻进地下室，并在俱乐部大厅爆炸，地下室的五个煤气罐以及车库内的战备储备汽油被炸弹引爆。使馆内约30人中，多数在第二次爆炸时逃生，20余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大使馆建筑在轰炸中严重损毁。第五枚炸弹落在大使官邸中央并钻到地下，未当场爆炸。北约和美方解释这是误炸。

中国官方声明谴责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袭击和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大学生群情激愤，到美国驻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使馆前举行反美示威。游行在后期出现了失控的苗头，包括焚烧美国快餐店、破坏美国使领馆等，一些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懦弱的言论也开始流传。事件后一个星期，江泽民拒绝接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最终在5月14日接受了一个30分钟的道歉电话，克林顿在电话中对这一事件表示“遗憾”。示威活动持续了四天，中国政府才叫停，最终在电视上播放了克林顿总统的道歉，并命令警察约束示威者。1999年5月起中国爱国黑客（红客）开始大规模攻击美国网站，双方各有百余个网站被插上了对方的国旗。

朱镕基访美前，国际舆论普遍就认为中美两国将会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关键性的协议，这是中国梦寐以求的。但朱镕基为了表示自己“大国风范”的尊严，却说：“很抱歉，我们不能签订协议。”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当时克林顿总统后悔了，他认为自己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应当在当时就签订协议。总统在美国工商界的劝说下，一度再次要求签署协议，但中方认为，如果此时要求签署协议，那也应该回到北京再签署。”

时任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方面谈判代表班子听到消息后，很多人都哭了，显然他们的失望比中方还要大。此事让美国工商界强烈不满，克林顿后悔之余，立即打电话给朱镕基说：“你能不能把谈判班子留下来，我们作最后的一点修饰，达成协议。”

朱镕基继续昂起他“高傲”的头回复说：“你们美国人想达成协议的时候就达成协议，不想达成协议的时候就不达成协议，我们不能那么轻易地听你们摆布。不谈了，要谈就到北京谈。”

其实，为了尽快加入世贸组织，江泽民和朱镕基不但连连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还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等等。

1999年11月15日，经过了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就此正式结束双边谈判。

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15年中，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双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业和服务业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

最后的谈判，克林顿下了最大的决心，他向负责谈判的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下达指令：适当掌握条件，争取达成协议，不要空手而归。

中共政府对入世作出了两项从来没有兑付的庄严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办事，逐步开放市场。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第143个成员。

从全球角度出发，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造就了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入世以后，中国真正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大大利好了经济，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实现了工业的进步升级。

入世以后，美国并没有成功占领中国的市场，反而是中国内部庞大的劳动力得以释放，廉价丰富的商品抢占了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十倍多。

中国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世界工厂，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 GDP 的增长速度。

经济数据造假现象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夸大了经济增长数字。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问题。中国大陆还出现了“农民工问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社会低收入人群逐渐构成了新兴的“蚁族”阶层。

中国大陆发展过程中也缺乏自主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对外依赖度过高，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遭破坏，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

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更被忽视了，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出现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至少尚有 2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江泽民当政以后，中国太子党形成的利益集团在中国不同的领域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形成瓜分中国之势，中国一旦出现新的有利可图的新领域，这些太子党就会抢先一步、占为己有。比如江泽民的儿子垄断通讯领域、李鹏的子女控制电力等。这种分赃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根本挑战。同时由于太子党在中国经济上的盘根错节，使得以权谋私的现象难以改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毒瘤。进入 90 年代，中共各大权贵家族垄断主要行业、控制国家财富；中共高层存在大量“裸官”，许多中央高层的子女或亲属移民海外或拥有外国绿卡。

六四事件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继续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近 400 家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

日本通过其政府开发援助计划，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援助国。1982 年 10 月 13 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1998 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制定的《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普及教育四个领域为其援助重点。截止 1998 财年，美国对华援助达 1941 万美元。而对中国建设最慷慨的援助始终来自香港。

评注：1987 年，香港首富李嘉诚首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1989 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外资企业大举撤资的时候，李嘉诚反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成为了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最大投资者。北京的大型综合物业项目“东方广场”就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得意杰作”。李嘉诚把在

广东省投资的交通基建等大陆投资项目组成长江基建，在中共政府的支持下广泛参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李嘉诚是贩卖塑胶花起家的，他自己说“当年的长江塑胶厂只是生产一些普通的塑胶玩具和家庭日用品，经由出口洋行运销欧美。在最初十年间，他每星期都要工作七天，每天至少工作 16 小时，晚上还要自修，加上工厂人手不够，自己要身兼买货、接单等工作，经常睡眠不足，早上必须以两个闹钟起床，可说是每天最难过的时刻。”

据美国《福布斯》2004 年 2 月号的排名，李嘉诚在世界富豪榜里排行第 19 位；2006 年，李嘉诚的总资产值高达 230 亿美元，居世界第九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成就了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江泽民政政时期，李嘉诚家族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一直红火，虽然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在中国大陆变相囤地饱受诟病。

1985 年 6 月 18 日，李嘉诚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9 年 6 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沈弼致函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朱利安·埃默里，请埃默里协助李嘉诚取得英国公民资格。

星岛新闻集团主席何柱国在《星岛日报》登文说：李嘉诚“生冒着承受蜚短流长的风险，坚持挺身而出解中小企于倒悬，皆因明白到作为爱中国，爱香港的社会领袖，有责任为社会稳定出钱出力”；李嘉诚“是个百分百的爱香港、爱国家的人”。

朱镕基被外界认为是王岐山的“教父”。1988 年，王岐山开始获得重用，先是被任命为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1993 年 6 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4 年，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在此期间，王岐山推动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兼任董事长职务。1997 年底，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负责处理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1998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命令，禁止高层干部子女任职外资公司。朱云来于是回到香港，由王岐山安排加入由中国建设银行控股、摩根斯坦利参股、王岐山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即中金公司）香港分部。2000 年，朱云来进入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2004 年，出任中金公司 CEO。

自从其进入中金公司之后，该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国有大公司海外上市的市场。据悉，朱云来在中金的薪酬 2007 年高达 1700 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内金融同行高管。

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 5,000 个帐户，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大老虎”级别的人物。据《中国事务》早前透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存有 3.5 亿美元的秘密帐户；在印尼的峇里岛买了一栋豪宅，1990 年就值 1,000 万美元，由前外长唐家璇替他办理。”

香港《开放》杂志也曾披露，国际结算银行 2002 年 12 月发现一笔 20 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之后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在狱中爆料称，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维基解密“中国密件”曾披露重磅消息，其中几条值得关注：一、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 5000 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共中央官员。目前还有 150 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分。二、香港是中共高官国际洗钱的主要途径。北京充分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法律特权，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银行和经手处理的人，如江泽民与唐英年友好，曾庆红与曾荫权友好等。三、2002 年之后，在香港工作过的中共局级官员，甚至副局级官员，来自中联办、港澳办、国台办、统战部，大多有瑞士银行账户。他们的收入与权力有限，金钱可能来自海外利益关系的贿款。四、有一位知名杨姓女关系人在香港开设珠宝行，协助某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儿子洗钱。

1998 年 6 月 26 日，瑞银作为海外公司在香港登记。瑞银香港分行作为瑞银集团子公司是一家持牌银行，位于香港中环。中共腐败官员找到了最理想的“安全”藏钱的地方。

瑞银管理著全球最大的私人财富，占全球亿万富翁数量一半的富豪是其客户。瑞银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附近及国际某些地方兴建了大量地下金库、掩体及仓储设施用于保存其所控制的金条。瑞银客户顾问会通过和高净值个人沟通了解其财务状况和需求，针对私人客户、中介和机构的资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其投资银行作为中介人，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流动，包括一系列证券的销售、交易和做市，为筹资者寻找直接融资机会，为投资者寻找投资机会，并提取佣金。

瑞银以其对客户资料的严格保密政策和银行保密文化而著称。由于其银行保密政策，瑞银集团一直是美国、法国、德国、以色列和比利时等国政府当局进行避税调查的主要目标，同样也因为其促进税务不合规及离岸金融而饱受批评。

达沃斯是瑞士东部的一个小城镇，是瑞士最大的滑雪胜地之一。每年一月末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吸引上千家论坛会员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到来，同时还有来自政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宗教界和媒体的众多代表。达沃斯论坛被誉为“富人俱乐部”，会员企业需是年收入额在 50 亿美元以上的国际企业和其行业或国家中的佼佼者，并对于该行业或区域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只有收到世

界经济论坛邀请的人士才可参会。政治领导人也使用达沃斯论坛这个中立的平台解决他们的分歧。摇滚歌手 Bono 打趣说，这是“雪地里的肥猫们”的聚会。

论坛的目标是“致力于改善世界经济状况”。世界经济论坛还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1979）对各国和各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估。基金会会员可以选择称为“行业合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更深入地参加论坛的活动，并发挥其影响力。

1990 年底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网页浏览器和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各种新的商务模式成为可能，对贸易全球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90 年代后期，世界经济论坛连同 G7、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受到来自反全球化激进分子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加重了世界贫困，破坏了地球环境。

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参与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诸多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但没有一个真正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组织。论坛旨在探讨增进亚洲各国协调和参与世界其它地区交流与合作。1998 年 9 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亚洲论坛”这一概念一经推出即获得了有关各国的一致认同。

亚洲各国对成立“亚洲论坛”作出了积极反应。在此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于 2001 年 2 月 26 日—27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大会第一届秘书长为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的龙永图。他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时最出名的话是“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2001 年 4 月 1 日，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海专属经济区上空执行侦查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派出 2 架歼-8II 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在中国海南岛东南 70 海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王伟少校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政府确认牺牲，年仅 32 岁。而美国的军机则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

中国指责美国侦察机故意撞向歼-8 战斗机，并且在没有通知和许可的情况下降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并就此严厉谴责美方。美国则认为 EP-3 是被失控的歼-8 战斗机所撞击，中方应负主要责任。

中美双方就事件责任僵持不下，更演变成为了一场外交危机。经过谈判，事件最终以美国表示遗憾，中国释放人员、交还飞机告终。

撞机事件惹民愤，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地时间 4 月 17 日发布消息称，他们已经证实美国一些网站在过去十几天里遭到了中国黑客的袭击，并表示类似的攻击事件可能还会发生。

第 112 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于 2001 年 7 月 12 日至 16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国际奥委会委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奥运会主办城市，计票工作于 18 时 08 分结束，北京最终获得 2008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轰动新闻。

在中国“入世”与“申奥”两个时间点正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甚至更大的事——“911 事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恐怖袭击让美国将资源和精力都投向中东和泛伊斯兰世界，并同时与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握手言和，使中国意外地在“入世”之始又喜逢一扇“机遇之窗”。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晨，19 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 4 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飞机分别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北塔及南塔，两座建筑均在两小时内发生渐进式倒塌，并导致临近的其他建筑被摧毁或损坏。另外劫机者亦迫使第 3 架飞机撞向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临近华盛顿特区。在劫机者控制第 4 架飞机飞向华盛顿特区后，部分乘客和机组人员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最终第 4 架飞机于宾夕法尼亚州索美塞特县的乡村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

除了五角大楼及联航 93 班机外，世贸现场包括劫机者在内，总共有 2,749 人在这次袭击中死亡或失踪。死难者来自美国 43 个州以及 87 个不同国家。世界贸易中心废墟的大火持续三个月。

恐怖袭击后，美国连续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报复和惩罚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九一一事件在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上产生重大及即时的影响。许多设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大型投资公司丧失大量财产、员工与数据资料。全球许多股票市场受到影响，一些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还不得不进行疏散。纽约证券交易所直到 9 月 17 日才重新开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第一天下跌 14.26%。当时美国经济已经放缓，事件则加深全球经济的萧条。

南斯拉夫使馆轰炸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激化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2001 年美国被九一一恐袭，中国网络的新左派和中国民族主义者将九一一恐袭联想到 1999 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网络论坛上，就像是炸开了锅，众说纷纭，其中不乏幸灾乐祸者，认为美国被袭是咎由自取，甚至表达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和同情，并以美国无情轰炸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偏袒以色列以及炸中国使馆和撞机等为例证，说明美国执行双重标准，被袭属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由于不久前发生的银河号事件、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以及南海撞机事件使得中国民间普遍产生反美情绪，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民间出现反美声浪，另有中国网民透过互联网联系亲友庆祝反美战争的一大胜利。

2002 年 11 月 19 日，朱镕基首度以国务院总理身份访问香港。朱镕基为香港打气说：“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

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结果，在共产党的手上，香港真很快就成了臭港。

第三十九章 人心向善 道德沦丧

1992年5月气功修炼师傅李洪志于在家乡吉林省创立法轮功并公开传法。法轮功除功法动作之外，还要求修炼者必须在行为上要求自己做到“真、善、忍”，强调个人心性和思想道德上的修炼，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1995年1月，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开始在中国官方出版社发行并成畅销书。到1999年，估计全国有7000万人到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共产党是不可能容忍任何非共团体如此发展壮大。

1996年开始，法轮功受到政府国安机构越来越多的批评与监控。在中共政府发动镇压前一年，刚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发起并亲自率团独立调查法轮功数月，作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国家体委声明说，他们“确信，修炼法轮功的效果是卓越的，法轮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道德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江泽民试图箝制气功的影响力，政府主管的媒体开始发表文章批评气功。于是，法轮功在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协会。1996至1999年，李洪志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德国和新加坡讲法。李洪志于1998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定居于美国。

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评论将法轮功描绘成封建迷信，中政法委书记罗干令中宣部召集各大媒体开会，命令媒体发文批评法轮功。7月24日，中宣部宣布禁止所有法轮功书籍的出版。中国佛教协会也要求佛教居士不要修炼法轮功。

1999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麻在《天津科技》杂志发表文章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称法轮功“伪科学”，对青少年健康有害。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诉求撤回该文章，遭遇300名防暴警察殴打，45人被捕。

1999年4月25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访，要求结束中国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正在增强的骚扰，并释放天津被捕的学员。此事令江泽民感到震怒，并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尽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缓解，法轮功迅速被取缔。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最初对于是否支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有严重分歧。赵紫阳也炼过法轮功，并两次写信给江泽民反对镇压，但江没有回答。

1999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历任组长李岚清、罗干、周永康，下设常设机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央610办公室。在公安机关的指令下，教堂、寺庙、清真寺、报纸、媒体、

法院和警察都迅速整队配合执行政府“粉碎法轮功”的计划，以任何手段都不为过。几天之内一波逮捕席卷全中国。

维权律师高智晟在与北京大学学者焦国标亲自调查后，于 2005 年在给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中形容 610 办公室是“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指控“以‘610’为符号化的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并描述了 610 人员及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性器官的“极其下流”攻击。

为确保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指示被依循，610 办公室实施了一个延伸到社会基层的责任制。在这一责任制度下，地方官员对其辖区的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结果负责，对于未能充分迫害法轮功的地区及官员实行惩罚性罚款制度。

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妖化，是以大规模宣传来驱动，包括电视、报纸、广播与网络。宣传战的转折点，是 2001 年中国除夕 1 月 23 日，新华社通报有五人在天安门广场试图自焚。这场由政府策划导演的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对待法轮功学员的铁证。《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报道，两名自焚死亡者实际上不是法轮功学员。

评注：高智晟律师于 1996 年起执业即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被誉为“中国良心”。作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先行者，他也遭受当局最严厉的迫害。

1995 年，31 岁的高智晟在新疆乌鲁木齐成为律师，1996 年开始执业，在乌鲁木齐的两年，约四分之三的案件都是帮助弱勢的免费义务官司案件。因应全国各地弱勢者的请求，高四处奔波办案，不收弱勢者一毛钱，高自付路费，一度四处欠债筹路费。高也因此受到些同业的忌恨，遭受不少污蔑举报及攻击。

2000 年，高智晟从新疆搬到北京，成立“晟智律师事务所”；2001 年获司法部选为“中国十大杰出律师”。中国有十多万律师，而在勇于承接人权案件极少数律师中，敢于触动维权运动的最危险禁区的高智晟是最勇者，他是“维护中国法治的良心和脊梁”。

高智晟曾多次被中国共产党、610 办公室以黑社会手段骚扰，遭受“难以言表的酷刑”迫害。高智晟 2005 年 11 月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与妻子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他表示“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的道德沦丧、权力对人民的这种毫无底线的残暴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高智晟多次被拘留，受尽酷刑；他至今失踪，下落不明。

高智晟在《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一书自序中说：““我们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已经历和见证了世间任何民族都不堪经历和见证的苦难！”

中国民众在中共邪教的奴役下，没有正常的信仰，道德沦丧，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形成极端邪恶的政治生态。尽管中共政府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事实上却是依恶法治国、依邪法治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基督新教、天主教必须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动，并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管制与干涉。

1999年11-12月，中共地方当局在浙江沿海城市温州附近地区捣毁或没收数百座教堂或祷告场所。2000年8月19日，福建省宗教局和公安局人员到福建省长乐县金峰镇上陈堂逮捕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高依华神父和与会教友。2001年冬，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邪教”等罪名，将“华南教会”17名负责人判刑。2002年8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位于顺和镇的主要接待家庭被当地警察抓捕。2005年2月25日，中国警方驱逐了十几位海外福音派教会领袖。

江泽民2000年8月15日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时，华莱士说：“独裁者是指强行压制者，无论对像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现在您有点开始接近了。父亲知道的最清楚。如果你挡你父亲的路，父亲就会教训你。”江泽民回答：“你说到宗教自由，我告诉你，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你们的。在你们的祖先在欧洲进行宗教战争和利用宗教裁判所杀人的时候，中国就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建议你到北京的各种宗教场所去看看，在天主教的南堂、北堂，在西四和王府井的***教堂，在白云观，在雍和宫，在遍布北京的佛教庙宇，那里士多得可以用「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来形容了。”

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大会上阐述了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仰宗教，同时坚持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宗教，努力认识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

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中共政府表示要打击以宗教名义为掩护的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行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这个时候，民间流传的笑话是：中共官员“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挂牌成立，但中共反贪却贪官越反越多，而且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

1999年7月，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与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等人，在澳门葡京酒店、东方酒店等处的赌场内豪赌遭人举报而被“双规”。随着案情的步步审理，一层层黑幕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马向东的一批下属应声落马。马向东嗜赌成性，每次招商引资都要顺带赌博，都是当地商人提前买好筹码，赢的装进自己腰包，输的由商人买单。他还热爱赌博书，经常随身携带《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和《赌术实战108招》三本书。马向东被判死刑。同年，辽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落马，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01年10月10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4年6月15日早上9点，在经历了近两年与世隔绝的羁押后，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终于再次面对摄像机的镜头出现在公开场合。尽管已成阶下囚，刘方仁显然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整齐的黑色西装，配上红色的领带，如果不是身前“被告人”的标牌提示，旁听者也许会怀疑刘是在出席一次重要的会议。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刘方仁悔罪：“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盲。我现在非常懊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在民主法治国家，省委书记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不懂法，就抓不到点子上，不仅不利于省委书记本人的工作，更不利于全省人民。”

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对学生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培养与灌输。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在中等以上学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

1957年，由中共中央发动的一场“大鸣大放”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直到1978年才被彻底恢复。

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度开始淡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又重新加强了对思想教育科的重视程度。

1992年，全国中小学调整了思想政治课程，小学一至三年级设立“品德与生活”课、小学四至六年级设置“品德与社会”课，初中设立“思想品德”课，高中设立“思想政治”课。1998年，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也作出了调整，设7门或6门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

2016年，中国教育部宣布调整中小学思想政治公民教育课程，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级课程合并为统一的“道德与法治”，而高中的课程仍称“思想政治”。

陈至立是在1988年进入中共上海市委的，在担任宣传部长时，曾发挥重要政治力量，被外界认为是江泽民的姘头，所谓“上海帮”的重要成员之一。1997年8月，陈至立被任命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一年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教育产业化是由陈至立推行的政策，以弥补国内教育经费不足，主要围绕经营、市场化、收益等方面展开。教育产业化”实质上引致了明目张胆的“乱收费”、“学费暴涨”，此举引发广大学生与家长的不满与反对。

教育产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学扩招。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建议被中央采纳之后，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很多高校在扩招之后大规模扩建，掀起了高校基建热。结果因为基建规模太大，导致很多学校背上了巨额债务。为了偿还贷款，一些学校不惜提高学费，降低分数录取。由于扩招政策造成的严重的就业问题，民众对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普遍持否定态度。

中国教育腐败，情况是极其严重的。教育不公、特权阶层垄断优质教育资源、政治洗脑、校园暴力、教师队伍道德沦丧、招生腐败等等，说不尽，道不完。中共政权特有的“红色幼儿园”等，从小就灌输阶级斗争，培养马列后代，在教育领域的政策和所作所为祸及千秋万代。

教育的腐败直接导致的就是学术腐败。中共教育产业化这也是学术腐败在中国大陆泛滥的原因之一。从2000年开始，新语丝上平均每年揭发近百起学术腐败案例，受到处理的只有大概1%。《中国青年报》揭露高官们凭借权力制造假学历。

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现在的官员们一窝蜂地‘攻读博士’，那些手握重权的省长、市长、司局长、县处长们、甚至有实权的乡长科长们，什么都不放过。过去的以权谋私只在金钱、职位和美色上，现在又扩展为以权谋学位，不仅要权财色应有尽有，更要用高学历的知识标志来包装，这样才算真正的功德圆满。至于由此造成的“学术造假”，则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列。反正腐败已经深入和普及到所有领域，高校和学术界有什么理由保持清高！”打假斗士方舟子说：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赠送的。

北京市长孟学农是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官员在职博士招集起来“考一下”，杨帆教授干脆直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要承担取消假学位的责任，甚至建议法院也应该受理这样的诉讼。这是否会触怒习近平，端看他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是否有“注水”之嫌。

2000年，以《新语丝》为基地，方舟子开始在互联网上进行学术打假。他创立“立此存照”栏目，专门揭露科学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和新闻界各种不实报道。

评注：中共历来重视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中不惜肆意篡改歪曲历史对年轻人实施洗脑教育。如对中共描绘成“伟光正”；把世界强国之一的清朝末年说成是“积贫积弱、弱国挨打”。把经中共烧杀抢掠后的具有数千年深厚文化遗产的国家说成是“一穷二白”。中共以考古和发展旅游的名义，掘祖宗的坟墓，大量挖掘古代帝王坟墓，其中珍宝多为中共权贵所瓜分私藏。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颁发《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大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

1991年4月25日，国家教委《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动员学校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辛亥革命周年，庚子赔款周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等重要纪念日，进一步深入开展以热爱中国共产党为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对学生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使他们不忘任人宰割甚至当亡国奴的屈辱和苦难生活。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中共中央委员会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主要对青少年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在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前者基础上，充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论述，将新时代、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习近平提出的思想融入到纲要中。

中国各地中小学暴力横行，学校是中共邪毒污染的最基础的土壤，特权学生进“红色幼儿园”或“国际学校”等特权学校，普通学校里学生待

遇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意识。中共官员子女享受特权，随意欺压普通民众的子女，欺骗洗脑老师和学生，培养一代代魔鬼和奴隶，邪恶的教育制度祸害整个中华民族。

中共每年召开两会时，中央委员和政协委员基本上都是外国国籍或其直系亲属持有外国护照。越是职位高的中共官员，越确信中共这座大厦要倒，所以早早地都把贪污的赃款和老婆孩子一起送往国外，取得外国身份，在西方国家置业投资，准备好后路。

在包括江泽民、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权贵绝大部分家人和亲属均取得外国居留权或外国国籍的同时，中共一方面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一方面纵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娱乐至死等以弱化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其无力无暇对中共独裁构成挑战。1990年至今，除了制作大量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等文艺作品外，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大陆各地方卫视纷纷播出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如《正大综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非诚勿扰》等，在娱乐观众的同时，宣传所谓的“正能量”；乃至出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这就是中国》这样的脑残节目。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课程原本即有公民教育内容，在2004-2007年期间“爱国主义教育”出现并为优先受补助的项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因为要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内容中加入由中国政府提供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和内容，引发一系列的抗议和民间反弹。2012年8月9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调查显示，在是否同意将国民教育设为必修科方面，有70%的反对，18%同意，12%则无意见。2012年7月29日，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等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万人大游行”，以迫使香港政府撤回国民教育。

1998年3月16日，广东《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广东、湖南追踪暗访，发现当地存在使用潲水油（地沟油）的乱象。2003年，北京通州工商分局发现地沟油加工厂用地沟油炸麻花、江米条等食品，查扣了地沟油两千多公斤与大量加工工具。

2003年以来，在中国安徽省阜阳市曝光的一系列劣质奶粉事件。此事件也揭发出中国大陆各地制造、销售劣质奶粉和一系列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导致婴幼儿生病、死亡的相关事件。

2004年1月5日，湖北省荆州市一家调味品工厂用“氨基酸液”加氢氧化钠、盐酸、红糖、色素等原料勾兑酱油。而湖北省另一家专门生产“氨基酸液”的公司所采用的原料是各种富含蛋白质的废物，主要有人的毛发，医用棉等。原料不经任

何处理直接进行酸解，还原成氨基酸。而毛发水酱油大肆流行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2000年代，台湾《苹果日报》指中国大陆不断出现之劣质食品为黑心产品。虽然说世界各国都有不肖商人生产黑心商品，但由于比例上的差异，连许多大陆人都认为中国大陆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且其层出不穷的黑心产品亦引起了全球（包括中国大陆）抵制中国大陆产品的风潮，尤其在台湾及欧美国家甚至出现了以“非中国制造”（China Free）标签来提升产品形象及安全性的做法。

中国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山寨食品”的最大危害在于生产环境恶劣、卫生条件不达标，甚至含有超出国家允许剂量的添加剂等，威胁民众健康。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张景岩认为：“急功近利的‘山寨风’愈演愈烈，将加剧中国文化原创力的脑萎缩和脑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

2003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3年5月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决定从2003年开始按照“财政支持、农民自愿、政府组织”的原则组织进行试点。

评注：在1980年代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封闭式福利，工人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享有医疗等福利待遇。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覆盖了80%以上的城市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减少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全国1.35万家公立医院必须自负盈亏，公立医院的收入依赖药品销售、高价药品和检查等技术服务。

到90年代，公费医疗制度陷于瘫痪；部分企事业单位拖欠职工医药费严重，医疗保障基本名存实亡。

1994年中共卫生部门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1998年在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成功试点后，将公费医疗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合并，建立统筹水平很低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2004年开始，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至2013年，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到2.99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的筹资标准。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基本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商业健康保险等为补充，以社会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全民医疗保障格局。

2013年，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有媒体称，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引起争议。2013年有媒体报道，新华社调查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时发现，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江泽民退休后，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其服务的人员600人至1000人，耗费纳税人约两亿人民币。

中共有一个“981首长健康工程”，又被称为“150岁长寿工程”。“981健康工程”课题组是2005年成立，并于5月正式启动，是一项旨在为“社会精英”健康服务的“重大工程”。2019年9月15日，中国微信上热传一条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其中重点宣传中共领导人的“健康工程”，透露中共领导人延寿目标为150岁。北京301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共高层的医疗和保健。

2013年底，由于医保资金使用逼近超额底线，在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了只收自费患者不收医保病人的现象。医患矛盾和药价黑洞是常见现象。

根据2017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十三五发展纲要报告，截至2016年末，全国卫生相关人员总数达1117.3万人，年增长率约4.5%。全国医疗技术人员共845.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319.1万人、注册护士350.7万人、管理人员48.3万人、工勤技能人员80.9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约100.0万人。

中共建政后，在农村并没有建立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农村医疗第一级，改革开放前是通过赤脚医生、2004年之后通过乡村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第二级是乡镇卫生院，提供基础性的医疗服务。合作医疗制度下，公社承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和“赤脚医生”的工资，个人就医支付少量费用，政府在防疫、低价药品等方面提供十分有限的财务支持。

1980年以前，广大农民则只有互助互济的所谓农村合作医疗。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名存实亡。2012年起，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毫无实际意义。中国2012年人均寿命73.5岁在185个国家中列第83位。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共召开了有700多人参加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政府做出了“预防为主”、“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公营医疗机构实行合理分工”、“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农村、面向工矿、照顾少数民族”四项决定。其中，“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含

义是，在全国推广西医和把中医中药纳入所谓的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医疗可分三个阶段，78-80年是一个分界线，98-99年又是一个分界线。但不管医疗如何改革，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大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借助仪器化验才能诊疾断病。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

在中国，中医教育西医化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生在学习、考试、工作、科研的过程中，都离不开西医。西医已经成了现代中医的一部分，纯中医的诊疗方法基本上只能在民间医生中看到。西医的部分技术和理念的可能会给中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全盘以西医的标准来实现中医现代化，是错误的。

中共政府虽然提出中西医并重、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宪法里给予肯定。但长期以来，政府配套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使得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巨大困境。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

在某些时候，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健康和医疗特权，对中医给予正常上扶植。比如，1980年卫生部制订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医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但从来没有让中医之歌瑰宝发挥最大效用，为民众造福。

两千年来，中医药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府常年都配丸药，林黛玉服用的是“人参养荣丸”，薛宝钗服用的是非常复杂的海上方“冷香丸”。其实在古代，尤其宋元以后，中国人的家庭保健中，中药的丸散膏丹，是常年必备，样样都不能缺少的；富贵家庭更是如是。

外国人甚至华人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人有病了一般是看中医的。其实，在现代中国，中医很不受待见。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底发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医类医院共有5232个、中医类门诊部共有3267个、中医类诊所57268个，中医类研究机构只有9个。

中医类机构主要集中在四川、山东和广东三个省份，其中四川省的中医类机构达到 7004 个，占全国的 10.64%。很多省份的县城连一家像样的中医院也没有。

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 1949 年 27.6 万人，到 2002 年还是 27 万余人，53 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 8.7 万和 157 万人，增长 17 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 3.2 比 1 变为 1 比 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 520 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 50 万人，不足 10%。

多年来，中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中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穷。

目前全国有 2800 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是中医人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

师徒传承是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家。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 300 人。

北京平心堂张晓彤说：“中医多神奇啊。但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为什么？政策。你们这些东西，全都不让人家行医啊。这限制、那限制，说你没有学历、没有这个那个的，不给你发医师证。行医都是非法行医，你就别说再传承带徒弟了。民间那么多医生，一个医师法下来，一年，还成绩呢，报纸上登的，查处了十二万非法行医。一共你中医底下基层有多少啊，你一年查处了十二万，你不是把基层中医灭完了么？现在一个乡一个乡的，没有中医了。”

2000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全国 30 万名党员思想状况调查。在调研中发现许多理想信念动摇、领导干部腐败、基层组织涣散等问题。这些反映出的问题被领导层警觉。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上，提出了在党内开展一次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建议。中国百姓调侃这是江泽民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评注：王沪宁 1955 年 10 月 6 日出生于上海，籍贯山东省掖县。1972 年从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毕业后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

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1981 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84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王沪宁留校任教；1989 年任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 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沪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是学术界的知名青年学者，成为当时《半月谈》等时事杂志的封面人物，受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关注，曾经参与了从中共十三大以来的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

1995 年 4 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力荐下，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拔进京，以“特别助理”身份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2002 年 10 月接替滕文生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并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作为主要策划者，王沪宁直接参与、起草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政治理论与思想，辅佐了三代总书记，是中共高层的重要理论智囊。

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熟读王沪宁的文章。王沪宁创造的“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称为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但全国上下对“三个代表”普遍抵制、厌恶和讥讽。民间有讽刺“三个代表”是“三个婊子”还有顺口溜：毛泽东代表工农乞丐，邓小平代表地富反坏，江泽民代表贪污腐败。

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用色迷迷的眼睛瞟看倒水的女服务员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一贯反对民间选美，但对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的选拔比选美还要严格，因为这是为中共的老色狼高官物色性伴侣或孙媳妇准备的，必须做到万里挑一、一丝不苟。

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他是 2001 年 3 月接到中央某直属机构的局长电话约见，指定他参与写作《江泽民传》。在当局安排下，他为这项被当局命名为“001 工程”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策划，列出了 3000 字的提纲、15 页的江泽民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但在最后，当局却以这本书“由外国人出面写比较合适”为由，拒绝他与库恩联合署名。这当然是江的意思。叶永烈终止了与库恩的合作，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被库恩拿走。

2000 年 2 月 25 日，是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初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要求，并相继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共产党认为，“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000年，江泽民开始将中国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中西部，并因此产生了西部大开发决策，产生了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四大项目，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评注：200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包括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十项重点工作。西电东送分三条通道：将黄河上游的水力发电和内蒙古、山西的煤炭火力发电，送往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形成北部输电通道；将长江三峡大坝和金沙江上游和其支流的各梯级水电站所产生的电力，送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形成中部输电通道；将云南、贵州、广西各水电站所产生的电力，送往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形成南部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被列为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工程项目。

2010年初的中国西南大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总工及灾害与环境研究中心总工刘树坤对南水北调工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西南这次出现百年难遇的干旱，应该对水文资料重新修订，对干旱出现频率，可能性都要重新评估。他认为这些评估的结果都会影响水利调度，重大水利工程何时开始做，做多大，影响程度有多大，都应重新评估。

南水北调的工程自提出后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反对者主要认为南水北调工程耗资巨大，调水量太少，发挥不了经济效益，也造成水资源污染；调水量过多，枯水期可能会使长江的水量不足，影响长江河道的航运，长江口的咸潮加深，更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南水北调工程造成河南省和湖北省33万人搬迁，搬迁给移民生活带来颠簸动荡。南水北调工程也将沿线的水生动物大批量地运送到了北方，加速了外来鱼类的扩散和沿线鱼类跨区域入侵的风险。

2000年，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因涉嫌违法违纪而没有参加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成克杰在1994年7月—1997年7月主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曾涉及多宗收受贿赂款物合共4,109余万元人民币。成克杰于1999年初随广西一代表团出国考察后途经澳门，代表团成员偶然于下塌之五星级大酒店之咖啡厅看到成克杰与一名女子态度亲密。后证实为其情妇李平。返抵后该成员将这些情况上报中央，中纪委随即开始调查，始陆续揭发此大案。成克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被处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000年6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浙江反腐第一案”，曾向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及原宁波市副市长谢建邦、孙炎彪等人大笔行贿的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吴彪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若干罪名并罚后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彪担任负责人的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和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在许运鸿等人的纵容下长期违法经营，先后违规拆借资金近20亿元，最后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1.97亿元。

从1989年到1990年，仅仅一年间，中国有243,183人涉嫌性服务活动遭到逮捕。与此同时，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万亿人民币。在1997年的一项研究中，46.8%的北京本科生承认曾经考虑过接受性服务。许多中共官员认为，性服务业是娱乐事业，鼓励性服务业可以带动旅游和接待产业的发展，继而使经济和税收显著增长。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GDP因而减少了1%。中共政府腐败的方式之一就是官员滥用公共资金来支付性服务的消费，“以权谋性”和“以性谋权”。

在中共查办的高级官员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包养情妇或嫖娼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多位异见人士在中国内地被政府以涉嫌嫖娼逮捕。异见作家刘水常曾因为要求平反六四事件而在深圳以嫖娼为由被送劳动教养。1998年，异见政党中国民主党上海支部创办人韩立法及蔡桂华以嫖娼为由送劳动教养。2002年9月20日，异见人士姚振祥被上海公安以嫖娼为由送劳动教养三年。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九龙东候选人、民主党成员何伟途在东莞公干期间被公安以嫖妓为由拘捕，及后被送入劳教所。

《苹果日报》的评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往往会透过桃色敲诈、插赃嫁祸或诬告的方法对异见人士作出拘留，以达到打压和污名化的效果。法轮功信徒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

2000年年底，王岐山回到中央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重用，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两年后，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海南期间，他又担负着处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难题”；并为海南确立了“生态立省”的工作方针。在2003年2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王岐山提出“要把海南建成全国人民的度假村和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的目标。

评注：根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介绍，2001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突然发出《关于立即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通告，并成立了

领导小组督办。朱镕基任组长，迟浩田、罗干、傅全有、周子玉、于永波等任副组长。

11月2日，国防部、总参也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央通告，整顿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场所》的通知。这次被中央下令查封、停办、整顿的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大多是90年代初江泽民当军委主席后兴建的，到了97年达到了高峰。这些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分三个档次：特级、高级、次高级。特级的，全国约有8所；高级的，全国约有30多所。特级的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全年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高级、次高级的，一年365日，天天“客满”。持不同证件进入这类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寻欢作乐，享受招待的等级、待遇是不同的：持永久证，即某俱乐部荣誉会员证者，吃喝玩乐只要签字，不用支付分文。

特级的、高级的场所，还配备医务所，并有高资历的军医服务，还有急救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特级俱乐部还配备有急救用的“直九”型直升机。内部设施都十分讲究、豪华。“服务员”“协理员”“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全部是未婚女青年，都经过“政审”从军警文工团、军警卫生学校、中小城市党政机关中挑选出来，再经过文化、文艺、礼仪、社交等培训过的。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军方有很多档次不同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度假村，都与时俱进、争先恐后地给高官提供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场所。

1999年12月2日，学术上毫无建树的江绵恒当了中科院副院长，成为中国科学界的大耻辱、世界科学界的大丑闻。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打造他的“电信王国”。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宣布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借着父亲江泽民的权力，江绵恒大发横财。2001年5月，香港举行全球性财富论坛，江泽民带儿子江绵恒出席，介绍给国际政要和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江绵恒与这些外国大亨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是中国第一贪，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2000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到京向时任江泽民述职。27日，江泽民和董建华正式会谈前会见记者时，香港记者张宝华追问江泽民是否钦定香港特首选举，触怒江泽民，江泽民当场怒斥之。江泽民走近电视镜头前，当众发脾气用英文教训这位女记者，形容她“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评注：江泽民接见董建华时，初期气氛良好，两人更握手笑让记者拍照，记者问江关于董建华连任好不好时，他还是轻轻松松的边喝茶边以广东话回答：“好呀！”又表示支持董连任。不过，他没有回应有关中央是否过早表态惹来“钦点”的批评。

当记者再就钦点的问题作追问时，江泽民在座位上已显得不高兴，他说：“按基本法、选举法去办。”记者欲再提问，但问题还未说完，江已抢先说：“你要问我，我说无可奉告，你又不高兴，怎办？”此时，记者未及追问，江泽民已经霍的站起来，步向记者群，抢先以高八度的语调、凶相毕露地说：“我说不等于我是钦点他，你问我支不支持他，我便说支持，我是明确告诉你！”

江泽民意犹未尽地继续说：“我感觉你们新闻界非常熟悉西方的一套，你们 **tooyoung**（太年轻），明白这意思吧！我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然后，他提高声调地指责香港传媒水平不如西方传媒，他说“西方哪一国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华莱士（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节目主播）比你们不知高到哪去！我跟他谈笑风生。”

江泽民要求媒体应该提高知识水平，他还以半调子广东话问：“你识得唔识得？”他叹了一口气后，又再以高八度的声调说：“你们有一个好处，全世界跑到甚么地方，都比西方记者跑得快，但问来问去的问题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是无知）。”他又以广东话问“懂了没有？”

记者未及回应，他又续说：“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我见得太多，有必要告诉你们一遍人生的经验。”

正当他转身拟返回座位时，有无所畏惧的香港记者还想再提问，江泽民又立即转过身来，走到记者群前，紧握拳头激动地说：“每次碰到你们，我总想起一句话‘闷声大发财’，有时候不说话比较好。但看见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也不说不好，在宣传上，将来若你们的报道有偏差，你们要负责任，我没有说‘钦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他又提高声调说：“但你问，你一定要问我对董先生支不支持？他现在是香港的特首，我们怎不支持特首？”语毕他又转身欲返回座位。

不过，刚有记者还想提问，江泽民又转过头来、扯高嗓门阻止记者说话，大声说：“你们想严格根据香港法制，对不对？但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香港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他更警告香港记者“你们不要起哄，说甚么大新闻，明天写成‘钦定’了，就把我批判一番，**I am angry**（我感到愤怒），这样不成。今天算得罪你们一下。”前后历时四

分钟的国家主席训香港传媒才告一段落。香港记者从那天已经明白“一国两制”的意义重在“一国”没有“两制”。

堂堂一个国家主席公开斥责一个女记者的这段“表演”，震惊当时香港广大的群众，他的这句英文名句亦从此不胫而走，爆红网上。之后，膜蛤文化在网络流传。江泽民生日到来时，人们常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用各式各样的玩笑段子、语录、图片、表情包，发送生日祝福。

后来北京大学展出 4 副书法作品，部分以网络流行语为题材，当中就包括了“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单纯）”，但报导引起大批网民热议之后，校方连忙将作品撤下。

2001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年 2 月 1 日起施行。中国大陆实行公映许可证制度，进口电影需取得许可证才能在院线上映，国产电影未经国务院审查部门审查也不得发行碟片或出口。一般认为由于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越级电影的情况，故未实施电影分级。中国大陆过度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遭到许多电影工作者的诟病，甚至许多中国本地导演的电影，都必须在国内外发行两种不同版本以通过电检。有时就算剧本审查通过，电影拍摄完成后还是有可能被禁。

评注：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机关陆续被国有化，书刊的发行渠道被统一操控，作家也被作家联盟监控。严密的审查制度生效，而文学作品则以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原则，强调作品的思想性。

中共政权下作家受到粗暴的压迫，鲜有高质量的作品。文革后出现一些愤世嫉俗的“伤痕文学”。文学试验的精神在 1980 年代后半繁盛起来，试图触及一些敏感话题。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开始偏向商业化及逃避现实。七十年来，扼杀了自由的思想，文学界没有任何成就可言。在文化界比较敢揭露人性的贾平凹、莫言、王蒙等也只是乖乖地钻到中共的臭裤裆里找屎吃而已。

文化革命时期，电影文化受到严重打击，郑君里、蔡楚生、上官云珠等很多影艺人士受迫害身亡。

1973 年，正规的电影创作得到恢复，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开始改编和拍摄故事片《艳阳天》。随后又拍摄了《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创业》和《海霞》等一批优秀影片。

1980年代电影的拍摄，随着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吴子牛、黄建新、李少红、胡玫等第五代导演的出现，1984年伴着《黄土地》中摄人心魄的大西北旋律，一种中国特殊民俗风情的选材风行了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

1980年代开始，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进入了电影的拍摄工作，由于他们的电影具有与以前五代不同的风格，题材多涉及覆盖弱势群体所需的人文关怀和制度问题衍生的社会问题，由于作品大胆创新，起初多为地下作品，进不了正式的发行渠道，人们称之为地下导演，也有人称他们为第六代导演。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贾樟柯、路学长、王小帅、张杨、章明、李杨、王全安、张元等。

1990年代末期，以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大腕》为代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诞生。

踏入新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电影文化市场空前繁荣，总票房不断翻倍飙升。内地院线雨后春笋般建立，尽管电影高票价比比皆是，看电影成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齐集大牌明星、场面宏大、投资过亿的电影成消费主导，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都蜂拥加入拍摄大片，如《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衍生了中国畸形的大片潮流。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等引人注目。中国电影人开始走向世界。

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0亿美圆，超越英国和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市场。2012年，中国每年出版电影500多部，仅次于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三。

评注：192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被称为时代歌曲。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是该种音乐体裁的创始者。他创作于1920年代的作品《毛毛雨》被视为最早的中文流行音乐。

中华民国时期最初的“七大歌星：周旋、白虹、龚秋霞、姚莉、白光、李香兰（山口淑子）、吴莺音”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在亚洲社会中的地位。

1949年中共建政后，开始在文化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政策，推行的其中一项政策便是将流行音乐宣布为色情。流行音乐被严厉压制，只容许中国民族音乐与中国革命音乐，严重打击中国音乐发展。

70年代初，随着青春校园电影及琼瑶电影热，台湾流行歌曲开始受大陆欢迎。改革开放后，华语流行音乐重新开始流行于大陆的年轻人中间。邓丽君的歌曲一度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靡靡之音”，引起了当时“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说法。

80年代，香港“三王一后”张国荣、谭咏麟、陈百强和梅艳芳火遍大江南北，林子祥、Beyond 乐队、陈慧娴、叶倩文等也掀起串烧歌风潮。

进入 1990 年代后，两岸三地大融合。香港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的影响力席卷华人地区。王菲是华语乐坛的天后。享誉华语乐坛的女歌手还有林忆莲、张惠妹等。杨钰莹为大陆女歌手代表。

2000-2010 年是台湾流行音乐辉煌的 10 年，最为代表歌手为周杰伦和孙燕姿。比较知名的中国大陆流行歌手有许巍、朴树、郑钧、羽泉、汪峰、杨坤、胡彦斌、花儿乐队等。选秀热潮兴起，其中湖南卫视的第二届超级女声大获成功，李宇春成为当年最红的内地女明星。

2010 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开始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网络数字音乐平台的繁荣，如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QQ 音乐、虾米音乐和抖音短视频，各类电影、电视剧主题曲，综艺音乐节目如：《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明日之子》和《火星情报局》等，其中《中国好声音》挖掘不少新晋歌手，而歌唱事业重心转往中国大陆的歌手如杨宗纬、彭佳慧、林志炫、A-lin、邓紫棋等歌手更因《我是歌手》这节目获得大量关注。

2004 年 3 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撰写的《讨伐中宣部》一文，出现在电脑网络上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瞩目。焦国标说：“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老百姓另一个深恶痛绝的政府部门。城管暴力执法主要针对小商小贩和弱势群体，民怨极大。执法中主要采用罚款、没收、强制执行等土匪式的抢夺方法，执法者轻者没收财物，重者暴力殴打，肆无忌惮。据报道，一名老太太正在街边摆摊时，有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上前抢夺其杆秤，并与其发生肢体冲突，老太太被拎起后甩翻在地。在江苏南通街头一名老人骑车沿街贩卖甘蔗，被三星镇雇佣的市容管理人员团团围住，车上的甘蔗全部被收走，老人急得大哭。在许多地方城管也成了各类社会矛盾的焦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事故连年不断。

2001 年 7 月 17 日，上海沪东造船厂龙门吊特大坍塌事故，造成 36 人死亡。事故发生瞬间犹如地震，现场惨不忍睹，有的尸首分离、有的被压成几截、还有

的被压成了肉泥。遇难者中还包括了 9 名同济大学机器人中心的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副教授 1 名、博士后 2 名、在职博士 1 名，令中国高校界感到震惊与悲痛。

2003 年 12 月 23 日，中石油位于重庆市开县的罗家天然气水平井，在起钻过程中发生天然气井喷失控，导致 243 人硫化氢中毒死亡、两千多人因硫化氢中毒住院治疗、六万五千人被紧急疏散安置、直接经济损失达六千余万元人民币的严重后果。

2005 年 11 月 13 日，中石油所属的吉林石化公司 101 双苯厂化工车间发生连续爆炸，有 5 人死亡，数万居民紧急疏散。爆炸使约 100 吨化学物流入经过的松花江，导致松花江江面上产生一条长达 80 公里的污染带，主要污染物为致癌物质苯和硝基苯。

2000 年-2010 年，中国大陆每年因矿难平均死亡 4870 人。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因为违规开采，加上体制腐败，经常导致一些大的矿难事故，死亡人数位居世界首位。矿难事故大多为人为因素导致，缺乏监管，并时常出现瞒报。

2000 年 9 月 27 日，发生于贵州省水城县的木冲沟矿一起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事故造成共 162 人死亡。2001 年 7 月 17 日，广西南丹矿难发生时，地下水淹没了与之相邻的七个矿井，井下作业的 81 名矿工遇难；在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县长唐毓盛、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等的支持下，矿主黎东明动用了包括黑社会组织在内的一切手段对这起特大事故实行了严密的消息封锁，致使事故长达 12 天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2002 年 6 月 20 日，黑龙江鸡西城子河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124 人死亡。2004 年 11 月 28 日，陕西省的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166 人死亡。2005 年 2 月 14 日，辽宁省阜新市的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 214 人死亡。

2001 年 8 月 2 日，朱镕基总理在《信息专报》送上的关于南丹 7·17 矿难的材料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请邦国、罗干同志批示，并报锦涛、健行、岚清同志。看来可信。如此重大事故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勾结官员，草菅人命。当前首先要排除一切阻力，查明遇难人员。请经贸委、公安部牵头组织力量坚决贯彻落实。”收受龙泉矿冶总厂贿赂 318 万元并要求瞒报矿难的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撤职查办，最终于 2002 年 6 月 5 日被判处死刑。

2003 年，江苏南京玄武区拆迁办在没有与翁彪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用推土机铲平了翁的房屋，翁彪来到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翁彪中度 3 级烧伤，拆迁办 6 人烧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并未改变，因此

在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仍是强硬的一方，强制拆迁不可避免。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村镇，由于土地国有且不断升值，在物权不清晰或在租赁有分歧的情况之下，经常以强拆方式“解决”。当中以河南省及浙江省问题最严重，经常有非法拆迁的新闻出现。

中共十六大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2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76 岁的江泽民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最高权力位置上退下，由胡锦涛接任。江泽民则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 2005 年。

2003 年 4 月 20 日，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杨秀珠一案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2.532 亿元，被定为特大贪污受贿案，在中国涉案外逃的高级官员中处显目位置。杨秀珠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 2 人，处级以上官员 11 人，科级官员 7 人，曾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她在海外接受专访为自己喊冤，并爆料她担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时，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曾向她要 5 百亩土地被拒，得罪江泽民才被查。当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此事感到脸上无光，耿耿于怀。

1998 年 12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并在 1999 年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3 年 5 月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并于次年 5 月又出台《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将灵活就业人员、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以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2006 年起医疗保险制度将农民工列为覆盖人群。但目前农村地区提供全民医疗卫生服务仍有很大困难。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在 2002 年 11 月初在中国广东顺德和河源市最早出现。由于病者出现肺炎病症，所以当时将之归入非典型肺炎。2003 年 5 月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广州医学院钟南山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救治方法，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患者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受到中共高层重视。

2003 年 1 月，孟学农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接替已经出任市委書記的刘淇担任北京市市长一职。2003 年初，SARS 疫

情已经“悄然”入京；新任市长孟学农没有如实向外界透露疫情的发展状况。不久，北京的一名退休军医蒋彦永透过海外媒体，揭露了北京市 SARS 疫情的真实状况，世界为之哗然。中国政府的诚信度开始受到外界质疑。由于蒋彦永提供的情况，与早前孟学农以及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言论大相径庭。为了挽回政府的形象，中共中央决定，以处理 SARS 危机不当为由，免去了孟学农和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在海南工作仅五个月的王岐山，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并在 2004 年 2 月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2001 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业，2003 年 2 月 24 日被广州市达奇服装有限公司雇佣。由于刚来广州，他未办理暂住证。3 月 17 日晚上他出门上网，也没有带身份证。在当晚 11 点左右，他在路上被查暂住证的警察送往黄村街派出所。在这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要求对方把他的身份证明文件送往该派出所。可是当对方携带保释金及孙志刚的身份证到达派出所之后，疑因孙志刚之前顶撞警察，仍被当事民警无理拒绝保释。孙志刚随后被转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莫名其妙说其是三无人员，符合收容条件；而事实是孙本人有正常住所、有合法工作、有合法的身份证件，并不符合收容条件。3 月 20 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死亡。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一事件，并曝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 8 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2003 年，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随后一些城市的收容遣送相关条例和制度也陆续废止。中共收容遣送制度以“有罪推定”的方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行动自由和择业的自由，违反了上述的法律条文，引来各方质疑。

1982 年 5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根据办法，城市行政部门可以要求检查该证件，若发现没有身份证、务工证及暂住证的外地人口，得以收容并遣送回原居住地。此办法执行了 20 多年。

1985 年 6 月 2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在全国率先实行暂住制度。2000 年以后，上海等部分城市开始尝试将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制度。此后随着孙志刚事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暂住制度受到质疑，此后部分城市开始将暂住证向居住证转变。

一般认为，暂住证与暂住制度对外地人口带有明显的歧视且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2003 年起，全国很多省市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2004年9月30日香港记者程翔在《明报》以“江泽民要向中国人交待的一件事”为题发文称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叶利钦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单方面放弃对被苏联侵占领土提出要求，以新的‘平等条约’来合法化旧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约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对于这些土地，苏联领导人列宁曾三次（1919年至1923年）发表政府声明要归还中国。程翔故认为江泽民在此问题上不如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而且江泽民放弃那么多领土从谈判到最后签署条约的过程从未公开。程翔认为江泽民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有义务和责任向人民详细交代出卖中国领土的理由。程翔因此被判入狱。

2004年10月18日，在重庆万州区，俗称棒棒的搬运工余继奎肩上的扁担碰到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庆容，引发后者恶意打骂。曾庆容丈夫胡权宗不仅夺过扁担朝余继奎的脚连续击打，而且自称是公务员，扬言出事可以花钱摆平。该言行引起围观群众公愤，致使交通堵塞，并有冲击政府的行为。

据称，胡权宗扬言不怕告状，“老子10万元钱就可以把你的命除脱”。不久，当地警方接报到场，警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话后，就强行驱散周围的民众，并将两人送上警车。警方的做法令围观引起群众公愤，大批民众聚集在太白路，堵塞交通，要求政府对此“官官相护”事件做出回应。到傍晚时分，聚集的民众近10万人。

新浪网称，事情发生的原因因为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这里的许多居民是三峡移民，移民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难。万州又是一个交通、工业和旅游业都不发达的地方。而1999年国家对于三峡库区实行“两个调整”，关闭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导致了本来基础就落后的三峡库区工业基础更加薄弱，形成产业空心化。田晓明认为是当地民众对政府官员积累怨气所致。

重庆特钢厂是有1.8万职工的大型国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官员腐败严重，造成巨大亏损。2005年7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其破产。工人被迫下岗，生活艰难。厂职工离婚率达65%以上、生病不住院的比率达90%以上，职工由于绝望而自杀的事件也发生过多起。由于上访没有回音，8月初工人开始采取各种维权行动，他们自发组织数千人，在厂房附近、212国道及重庆市政府大楼外等地静坐请愿。10月7日，数千工人在重庆市政府附近集会，重庆政府出动数以千计的警力，抓捕工人代表，随即发生严重的冲突，许多工人被殴打，不少围观者亦未能幸免，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2005年6月，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发生了严重的财务问题，村民委员会已失去村民的信任，被质疑贪污腐败。7月底，村民启动罢免程序提请罢免村委会主任。8月，村民进入村委办公楼并与警方长时间对峙。9月5日，番禺区政府收到村民的五百余个有效签名，罢免程序正式启动。9月12日，番禺区政府动用上千警力对村委办公楼进行清场，拘捕了几十名村民，以及几位帮助村民

的维权人士；番禺区政府旋即否认该村存在贪腐问题。事件因维权人士和学者的参与、大量媒体的曝光评论与当地政府的使用武力而广受关注。

1993年至2002年，器官移植手术每年增加超过1000例的速度增加。于2004年达到了峰值13000例。从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对于强迫死刑罪犯同意器官移植的关注，使得医学和人权团体开始谴责这种做法。

2005年7月，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发言引起了轰动。

2006年《大纪元时报》第一次报道，有证人指证，在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内有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的行为，即苏家屯事件。这件事随后导致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应当立刻停止这种行为。

2000年美国华人唐忠联合当地法轮功华裔学员于亚特兰大创办《大纪元时报》，其报名标志与新唐人电视台标志同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亲自手书。二十年来，《大纪元》帮助华人社会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共真相，功不可没。

2003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赵月枝撰文指出：“《大纪元时报》网站和《大纪元时报》集团已成长为中国以外最大的中文新闻网站和报业集团之一，在过去的两年来，已在美国30多个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尼、台湾、香港，以及西欧主要国家发行。”大纪元很快在海外华侨及反共势力之间获得重大的影响力。

《大纪元时报》是独立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外的极少数中文媒体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大纪元时报的编辑立场为反对中国共产党。该报涵盖了一些中国新闻和受关注的人权议题。该报称，为所有弱势及被压迫的中国大陆人民发声，包括长期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天主教徒、法轮功学员、西藏人；房子被强拆的拆迁户和投诉无门的上访户；高智晟律师、胡佳、陈光诚以及无数维权人士；受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和各种毒品所害的中国人民。

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九评》主要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政治观及宇宙观与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评价。书的扉页上这样介绍：“它全面揭示中共建政以来的一切谎言邪说，帮助世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九评是：评共产党是什么？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九评》说，“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一般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是靠杀人起家的，又靠杀人维护的。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江泽民在 1999 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数以百万计的《九评》透过电子邮件、传真、地下印刷厂传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省汕尾市东洲镇红海湾开发区发生的一次流血冲突事件，冲突的双方为当地民众与地方政府。台湾亲中媒体《中国时报》的报道指，村民以事先准备的燃烧瓶和石块袭击武警部队，村民向风力发电厂主控楼投掷爆炸物品和燃烧瓶，炸毁变压器并在厂区纵火，袭击被困在主控楼的警察。武警被当地民众围困后使用手枪、自动步枪扫射，造成至少14人死亡，50人受伤。

针对这个事件，高智晟在2005年12月15日发表《这个政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一文，指出“现政权的残暴、愚蠢及无法无天的时间与它存在历史一样长。”

高智晟写道：“关于广东新近发生的中国政府枪杀无辜民众的事件，网上多有说：‘这是一个靠杀人起家、靠杀人来维持其统治的残暴政权。’这实际上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现实！但关于这次杀人是：‘因为它（指中国政府）觉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杀人了，老百姓好像胆子大起来了，无视它的统治地位，它必须杀人；’及说这次的杀人是‘它既有的杀人本性的再现和复苏。’证明持这种观点者对今天中国发生的现实还不甚了解！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尽可在最新的《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的真相调查中释疑——即中国的政府，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只是在一些时期，它不像这次在汕尾那样，不得不把杀人的地方选在光天化日之下罢了。”

高智晟说：“中国政府的杀人从来就没有止息过，发生在广东的射杀几十名和平抗议的公民的事实，因杀人的过程是亮在光天化日下，就为这个，确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诧和愤怒！这也是正常的。我们的调查证明，这个政权在过去的六年来，在野蛮镇压法轮功信仰者的过程中，至少杀死近3000名我们的同胞，事实上，大多数人，尤以国内知识阶层为例，对这种持续性的虐杀事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对之反应及表达方面大相径庭而已！”

高智晟公开推崇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价值，指出“《九评》是中国人民用血和泪写成的；《九评》是终结中国共产党罪恶生命的死刑判决书”。

评注：中共邪恶的户籍制度是制造社会不公的直接原因，是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恶制度，它不但将中国人分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还把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毒化人心，歪曲人性，是制造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社会腐烂的根源之一。这个恶制度不但至今还存在，而且围绕着它还编织了一张张更加庞大而复杂的网，继续作恶，天理难容。

1994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建成“国家犯罪信息中心”。1995 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颁布了 60 多项法规来规范互联网活动。199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要求通过 ISP 接入互联网的的个人与单位在公安部门备案，留存个人与单位信息。

1998 年 4 月 3 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考虑，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联网。要考虑远一点。实现全国联网要包括省市以下的二、三级网。”“要创建一个对因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1998 年 4 月，上海网络工程师、上海正方软件有限公司经理林海被捕，以“煽动他人颠覆国家”罪名入狱两年。

在 2000 年代初政治状况比较敏感的日子，政府要求网管对法轮功和六四等题材的政治网站进行严格封锁。2000 年 3 月 31 日中国政府关闭由黄琦创办的大陆网站《天网寻人》；关闭《公民维权网》《宪政论衡》等网站。黄琦 2000 年 6 月 3 日被捕，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2001 年 4 月 25 日，“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俗称“金盾工程”。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很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关键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当局称，该工程旨在提高公共安全部门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和侦查破案水平，并增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大纪元》认为金盾工程是由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网通董事的江绵恒所筹建与负责。而实施网络审查最重要的设备防火长城，其关键部分的设计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他也被网民称之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1999 年 5 月，政治异见人士王小宁开始独立编写网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反腐败。2003 年 9 月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年徒刑。

2003 年 2 月，蔡陆军被指控以笔名“盼民主”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政府。10 月 30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蔡陆军有期徒刑三年。蔡陆军成为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被逮捕的中国大陆人。

2003 年 10 月，杜导斌因在互联网上张贴多篇文章，抨击中国农村税负过重，社会保障不保农民，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压制言论自由等范围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被拘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四年徒刑。

自 2004 年中，大陆以打击网上色情为由查封网站。2005 年关闭成立于 2002 年的自由中国论坛。2005 年后，中国部分高校 BBS 只对校内 IP 开放。中国也限制了一些有激进行为的网站的活动。

2005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南大小百合，水木清华，北大未名等一系列高校 BBS 开始实行实名制，禁止校外 IP 使用论坛。

2005 年 4 月，由哈佛法学院、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比起其他有些国家的类似系统，中国的网络过滤范围广，手法细致，并且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

中国体坛的腐败亦是触目惊心的，无数金牌、每一次国旗升起背后都是无数运动员的血泪故事。中共体制下的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社团和企业等，政企一家，管办不分。在“金牌至上”的观念下，体制的邪恶无处不在，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和政府行为。

说到体坛腐败，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而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圈内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在中国，体育竞技早已背离奥林匹克精神。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

13 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 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 10 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她说：“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近年来，尽管多位体育界官员和裁判员被查处，但潜规则、暗箱操作、私相授受、虚假比赛依然普遍存在。

中国是个美丽而令人不舍的国家，但人心坏了，空气也变得有毒。2006年9月4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网易（www.163.com）旗下的网易文化在网上开始了一项中共统治50多年来最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5日下午六时的投票结果是，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1%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35%！这个初段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投票原定于10月11日结束，但投票连同非常热烈的网友讨论随即于9月15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9月16日，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

作家钟祖康在《来世不做中国人》一书中说：“在一个自信可以睥睨全球，号称是英明领导爱民如子的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中国，居然有65.1%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大笑话大丑闻，极大的国家机密。特别是，尽管中共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强制全民洗脑和封锁资讯，但依然有65.1%的人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确是令我颇感意外，而且也肯定令中共领导人更感意外，而且面目无光。来自中国的朋友说，他对投票结果不感意外，只对有人有胆量做这个调查感到惊奇。”

如果你再看看这些网民的留言，你就看到这些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人士并非戏言，而是态度相当认真，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无限讨厌、无奈、苦涩，对中共领导有咬牙切齿的愤恨。请细读：

“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罚做受***的愚弄和欺骗的.....哭.....”。

“不用来生，如果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就不愿意做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我无法继续去爱，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的贪官比哪都多，两级分化太严重了，如果有可能，现在就不愿做中国人!!!!”

“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

“制度不好，但愿来世的时候，中国是民主制度，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那些成天说谎言的人，以人民为敌的人，早日死去。”

“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

“生为中国人，我没有尊严我感到悲哀！中国的文化都是虚伪的文化！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我找不到爱这个中国的理由！请指教。”

“愿意不愿意我还是中国人，但我会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这个国家的人。”

“来生我决不做中国人，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没有理由要求自己的人民爱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愿意来生作中国人，因为不愿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

“我痛恨我为什么是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我的土地却要我办暂住证?????????”

2001年2月，中共驻悉尼总领馆成立专门反法轮功小组，由总领事亲自领头，在美国等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中共对法轮功的战争蔓延到海外。

2005年6月，中澳人权对话结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在北京，面对澳洲广播公司记者询问“610办公室，是在侵犯中国人民及澳州人民的人权”时，记者询问“610办公室”、“您的意思是610办公室不存在”，沈国放的反应“疑问、笑”，并拒答“中国当局在澳洲从事特务活动并骚扰民众”的问题。

江泽民下令取缔法轮功，使其得罪法轮功组织及其成员，成为他们的宿敌。海外的法轮功成员在多次游行中呼吁法办江泽民，并在美国多个城市以及其他国家递交诉状，起诉江泽民。

第四十章 胡温时期

2002年11月15日，59岁的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领导人。2003年3月，温家宝当选为国务院总理。胡温新政从此开始。

评注：1942年12月21日，胡锦涛出生于江苏省泰县，其为胡家长子，其下有妹妹胡锦涛蓉与胡锦涛莱。胡锦涛父亲名胡静之，自清朝道光年间始家中便在泰州一带从事茶庄生意，在当地有一定规模，但他本人没有继承祖业，而是选择了教师职业；母亲名李文瑞，出自当地富裕家庭，毕业于南通通州的师范院校，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师。两人经人介绍相识，又有相同的职业和志趣，很快便结为连理，且感情很好。婚后第二年，长子胡锦涛出生，后又生育了两个女儿。1943年，胡静之赴上海求学，李文瑞便一直在泰州娘家抚育子女。毕业后，胡静之便开始打理家中茶庄的生意。

由于从事教育职业，李文瑞谙熟教育之道，从幼时便给予了胡锦涛兄妹不错的教育。但不幸的是，李文瑞因患病不治，于1949年不幸逝世，时年仅7岁的胡锦涛和年幼的妹妹自此失去了母亲。

1953年，胡锦涛进入当时的私立泰州中学就读，1956年高中时进入江苏省泰州中学借读。根据其家族人回忆，胡锦涛年幼时很文静、喜爱读书、性格随和。他曾在履历表籍贯栏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训导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安徽绩溪”。多年后，胡锦涛在一次全国团代会上，他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地区，我是绩溪人”。

1959年胡锦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求学期间，他结识了之后的夫人刘永清。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期间较为活跃，热衷于舞蹈等活动，曾担任学生文工团舞蹈队团支部书记。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胡锦涛前往位于甘肃的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参加工作劳动。1969年至1974年，在水利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历任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调任甘肃建设委员会秘书，此后历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此间胡锦涛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赏识，并把其引荐给了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胡锦涛进入共青团系统，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仅数月后，便赴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5年7月胡锦涛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86年，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为461元人民币，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排名倒数第一。

胡锦涛开展了大规模扶贫工作颇有成效。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胡锦涛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1989年1月，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推荐及邓力群提名，1992年10月19日，时年49岁的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越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成为正国级领导人。1993年2月，胡锦涛接替乔石，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令江泽民很不放心，故不时地给胡锦涛“穿小鞋”。胡锦涛主政时被江泽民干政，当了十年“小媳妇”，受尽窝囊气。根本原因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向来强调“军队要听党指挥”，谁握有枪杆子谁老大，所以胡锦涛这个总书记还是要听江主席的。许多人知道江在卸任总书记后仍担任两年军委主席，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使退任军委主席后，江泽民还能继续干政八年的隐秘原因，在于他仍然掌控着军队。

2003年，在胡锦涛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个春节，两岸首次开通春节台商直航包机。胡温新政开了个好头。

2003年1月26日：清晨3时55分中华航空公司编号CI585波音747客机，由正机长张以松、陈蓓蓓带领机组人员，空机从中正国际机场起飞，中途停香港，并在上午8时52分成功降落上海浦东机场，为54年来中华民国航机首次合法降落大陆地区。推动台商春节包机的台湾立委章孝严，因为本身不是台商身份，不能乘搭他一手推动的春节包机，要转折地经香港往北京参与首航庆航。当时他笑称，要在北京开豆浆店卖豆浆，做个台商好了！

2002年10月27日，由台湾立法委员章孝严提出《大陆台商春节返乡专案》，提议在春节时段，专案容许台湾的航空公司航机，以定点、定时、定对像方式，专程接载台商往返上海和台北，专案获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10月30日，国台办发表声明，表示愿采取积极措施，让台商以各种便捷方式返台过春节。

两岸包机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地区建立政权、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两岸的政府处于内战状态至今，至1979年前断绝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50多年后，再度重现的两岸交流是目前非正式和平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

在主权移交后，香港在社会及经济上遇到一连串的难题。2003年初，政府提出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禁止颠覆中央政府的立法。很多人担心议案会侵害新闻、宗教及结社自由。基于对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及其管治，以及对经济衰退及

疫病控制的不满，估计有 50 万人在 2003 年 7 月 1 日上街游行，是自六四事件以来，香港最多人上街游行的一次。SARS 期间，学校被迫停课，金融活动大受干扰，酒楼食肆及购物广场空无一人，连旅游业也陷入了停顿。直到中国大陆开放“自由行”到香港旅游，加上香港推行多项措施，香港经济及金融业复苏，于 2004 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超过 10%，经济复苏势头良好。

2003 年 4 月，胡锦涛视察广东，此时广东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香港连在一起。14 日上午，胡锦涛来到了广州市北京路商业步行街。北京路刚刚经过改造，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更舒适方便的购物环境，平时逛步行街的市民每天有二三十万人次，节假日更达到 50 万人次。得知北京路一年有 40 多亿元销售额，胡锦涛连连说好！在广东考察时，胡锦涛首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

6 月 29 日和 7 月 17 日，中国内地准备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进一步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合作注入新活力。2003 年末，中国大陆与香港及澳门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保证三地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同年 7 月 28 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的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一词的首次出现。10 月 14 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该次会议将胡锦涛的讲话精神写入最后决议，科学发展观概念得到了完善，并正式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之一。

评注：2003 年起，陕北油田维权大案被称为“中国民间企业维权第一案”。牵连上千家民营企业、六万名投资人、十多万利害关系人，资产超过一百四十亿人民币。

1994 年 4 月 13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资源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陕西下属单位划出约大片油田区域交由所在地、市、县组织开发，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可采用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其中包括私营企业。由于地方各县钻采公司大都已严重亏损、破产，地方政府便出台“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投资商来陕北投资开发石油资源。地方政府给投资者办理了可以直接从事石油开采的营业执照和相关手续，与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发石油资源合同书》，合作年限 8 年、10、15 年不等，甚至到井干。

投资者的灵活商业路线使得陕北油田的石油开发取得突破，使得石油工业成为当地发展最快的行业，油区各县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定边、靖边、横山三县财政收入的约 90%来自石油，石油产业形成支柱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地方政府和民营石油企业主在资源争夺、利益上产生矛盾并加剧。中国人的贪婪使中共感受到“亡党亡国”的危险。

2002 年 9 月 11 日，国家经贸委、监察部等有关部门到陕西，要求立即收回原招商引资联合开发油井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陕西省政府运用行政能力，在 2003 年 3 月起开始强制收回民营石油资产。

6 月中下旬，榆林市各县都组织了大量干部抢占油井，仅靖边县就组织了 1600 多人的干部队伍，加上各种警察共计 2000 多人。他们开进产油区，驱逐看井人，稍有不服从者，就会被铐走关押。光是靖边县就有 30 多位民营投资人被关押。

6 月 28 日，定边县定于 28 日下午 3 时由县钻采公司进驻井场，接管油井。在 100 多名县级干部的配合下，要求公、检、法、司所有在机关的干警共 500 多名，以及 110 巡警、交通警察、武警全部出动。官方和在开往油区的张天渠、店房洼、樊学、姬塬等油区的近数千名群众发生严重对峙，堵截的车辆达 1 公里之长，双方对峙 10 多个小时。

从抗争之日起，遭受损失的部分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开始寻求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但遭遇想像不到的困难。中国人再一次以血的教训见证了中共政权不讲信用、以黑治国的真面目。在此次事件中，地方政府贪婪在先、毁约在后，强制驱逐民营投资人，对拒不服从者施以暴力，甚至抓捕监禁，让人心寒。

自 2002 年以来，中国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三农问题对中国建设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调整农业地区的政策。

2003 年 9 月 19 日，温家宝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全国还有 431 个县没有“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很低、基础不稳，不少地方存在学生因贫辍学、拖欠教师工资、学校危房年久失修、公用经费短缺等突出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农村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等，也存在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

为此，国务院决定：到 2007 年，力争使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 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5%以下。承担西部“两基”攻坚任务的 372 个县，国土面积达 345 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 8300 多万，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

评注：1953年，中国大陆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6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曾鼓励生育，并效仿苏联给予生育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光荣母亲”的荣誉称号。

1970年代初期，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发生转变，中国大陆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95年起，中国大陆进一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199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从11.3亿增长到13.4亿。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其强制性举措（譬如强制引产、结扎、强制上环、查环以及公开节育措施遭致诸多批评。

2015年10月26日到29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加速开展全面二胎，在中国大陆实行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年轻女性的怀孕率持续出现创历史新低的下跌现象，经历连续三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据统计，2010年中国失独老人达到200万人。有媒体报道称，按常规死亡率计算，1975年~2010年间，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死亡，这就意味着，中国或达2000万父亲和母亲成为失独者。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由农村移居城市。至2010年代，六成人口居住于城市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住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医疗、教育、住房问题成了压在中国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由于医疗及教育产业化，住房私有化，导致医药费、学费连年暴涨，住房价格在房地产囤地以及地方政府暗中支持下，不断上升。人民对此实为无可奈何。房价与工资的极端比例、住房资源的难以获取、楼盘烂尾等问题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所谓居者有其屋在中国是难以实现的幻梦。

2003年，温家宝推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收拢土地放贷，抬高土地价格。但是他亦颁布国务院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突然将房地产业规划成“支柱产业”，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疯狂滋长，仅仅几年内，房价暴涨5到10倍。

2003年1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州大厦发生特大火灾。火灾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但20名消防队员丧生。衡阳火灾暴露了建筑施工质量问题以及涉嫌腐败的问题。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飞船，载送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在随后几年中，中国陆续将数位航天员送入太空。

200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在政策的带动下，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耕地总量保持稳定。

2004年4月，温家宝赴河北考察农业。温家宝来到定兴县究室村、高里店村时，农民反映希望粮价高一点，农资价格低一点，收入多一点。温家宝说，中央了解你们的愿望，为了支持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今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保证农民种粮受益；降低农业税税率，减轻农民负担；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给农民更多的实惠。

2004年3月和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大力加强大学生和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004年江泽民辞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际，再一次在军队安插亲信。9月2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

评注：官媒新华网博客栏目曾转载《南方周末》2006年旧文称，1989年11月，江泽民就任中共军委主席后，于4年后的1993年12月，首次晋升6名上将；至2004年在任内11年，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超过中共1949年后总共164位上将的半数以上。

据《江泽民其人》中说，江泽民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军中毫无威望。和平年代，军人没有军功是难以晋升的。自从江泽民上台以来，拍马屁成了中共军队里的晋升捷径。张万年、郭伯雄、由喜贵的提升典故，在军队中广为流传。最典型的是47军的少将军长郭伯雄，在掌党政军三权的江泽民午睡时，因亲自给江泽民站岗而站出了一个军委副主席！

1996年1月23日，江泽民一时高兴，对旁边人说，今天，我们来封它几位上将，高兴高兴，怎么样？左右趋炎附势，答复当然是再好不过。

1997年10月24日江泽民提升了152名将军。高干子弟和有裙带关系的更

成了江泽民拉拢的对象，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四人帮”垮台后才去参军，不过当了十几年的兵，一升就是海军中将副司令。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2005年3月，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与其见面并会谈，这是60年来国共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同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访问大陆，胡锦涛以同等礼遇接待。

评注：借孙中山逝世80周年之机，3月28日到4月1日，由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路，拜谒广州黄花岗72烈士陵园，南京中山陵以及北京孙中山衣冠冢。访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代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向连战发出访陆的正式邀请。

连战于4月26日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为55年来首位重返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主席，也是国共领导人1945年之后的首次会晤。连战的来访，是中共统战国民党的巨大胜利。

4月27日上午8时50分，连战等一行人拜谒中山陵，有逾30万南京市市民自发前往欢迎，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称连周恩来逝世亦无此盛况。4月28日上午连战搭专机自南京飞北京，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午宴后，下午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晤。

4月29日上午9时50分，连战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发表题为“坚持和平，走向双赢”的演讲，内容涵盖自由民主思想、民族前途、国家发展、两岸和解共创双赢等议题，其间援引中外的历史名言，并以“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勉励北大师生。连战的演说获得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过程中掌声不断，北大师生曾两度起立鼓掌。

下午15时左右，连战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晤。此次会谈经中外媒体争相报导，多将这次旅程定位为“和平之旅”。

连战参观西安兵马俑后，5月1日上午，到清凉寺旁其祖母“沈太夫人之墓”祭祖，场面悲怆，后连捐了1万人民币加2000美元给清凉寺住持。下午搭机赴上海，下榻于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晚上在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陪同下游览黄浦江和观赏外滩的建筑群，并题字“滚滚黄浦南流水，浪花造出英雄。”

2005年，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制定双边贸易额到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或更高的目标，到2006年双边贸易达到248.6亿美元，提前实现预期目标，印度成为中国第15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俄印启动三方外长对话。2007年，中俄印三边外长对话升格为年度正式会晤机制。这个三边合作机制成为三国加强战略沟通，在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寻求共识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2005年10月中旬，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铺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对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青海、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沿线各族群众生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12日至10月17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实现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航天飞行到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重大跨越，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国民经济继续在健康持续稳定的轨道上发展，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首次进入世界贸易前三强。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保护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这个《非公有制经济三十六条》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等。国家支持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实力，发展成为主业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集团，有条件的可向跨国公司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和表彰非公有制经济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2005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提出，“十一五”期间内地经济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板块。

2005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6年总体工作要求中，提出“着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

标，其核心内容是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包括乡村道路建设，强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基本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2006年，中国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终于结束，经改革开放农业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6年5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是自浦东新区获批时隔十余年后中国的第二个国家级新区，定位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滨海新区立足高端制造业是大都市“退二进三”的典范是。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支持天津滨海新区在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涉外经济体制、金融创新、土地管理体制、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农村体制、社会领域、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管理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十个方面先行试验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服务业被解释为可开放的，外商投资获准；零售、批发和分销的限制也已经结束。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和电信业也向国外投资开放。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03年末成为焦点，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故意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而中国方面则不愿意让步，批评布什政府面临选举年，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其自己的选举。2004年初，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将会改变其货币政策，与美元脱钩，曾经有中国媒体报道过，将会在2004年年内使到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但是立即遭到当局的否认。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初始化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兑美元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换8.27元以上。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进入一波长线大升值阶段。

在此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甚至成为一些城市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建筑材料价格也大幅度上涨，这引发房地产泡沫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房地产泡沫和银行巨额呆坏账增加了金融风险。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导致非法占地、拆迁纠纷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试图进行调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从中作梗，这些调控措施并没有受到预期效果。

2005年，国务院要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相继出台《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八条”）和《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条措施》（“新

国八条”）。2006年，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和重点转向调整住房供应结构，规定新增的住宅供应必须符合“90/70标准”。但在密集出台的调控政策下，房价仍然呈快速上升趋势。2007年9月，央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将购买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提高至40%以上，并提高相应贷款利率，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楼价开始出现松动。

房地产业自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早在2004年房价开始上涨之时，学术界就对中国大陆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各方各执一词难有定论，随着房价进一步上涨社会多数都认为房价已经超出了居民收入的合理承受范围之内，中国大陆房地产存在泡沫。

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控制措施以期达到平抑房价平息民众不满情绪的目的。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规定对持有不足2年的房地产转手交易时以交易全额征收营业税，对2年内未开工的住房项目，要再次进行规划审查。此政策对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的冲击非常明显，大量消费者持币待购，对市场有很强的下降期望。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分组讨论时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2006年，温家宝借“违规动用社保基金投资”为名罢免并惩处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并宣称“社保基金是高压线”。9月，陈良宇被免去职务并接受调查。

评注：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市区曾经有大片的棚户区和老式里弄，大量居民居住于内，住房紧张，生活环境不佳。陈良宇领导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进行上海旧区改造，同时配合市政工程进行合理的动迁安置。陈良宇执政上海时期，上海市住房建设速度大大加快，2006年房屋竣工面积近5000万平方米，比2001年成长了近50%，大规模的城镇化建房建屋配合旧区改造和动迁使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陈良宇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久，中共十六大进行了中央领导班子换届，陈良宇一直不被新掌权的中央政治局信任，另外，时任总理温家宝上任后即推行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政策，而陈良宇却认为经济发展应当尊重各

地具体情况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反对过多予以行政干预，并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予以抵制，陈良宇认为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将令中国错过发展机遇，要温家宝为此负上政治责任。另一方面，新一届政治局也意图削弱打击与不属于自己派系但却握有一定实权的“上海帮”。以上两点，被视为陈良宇遭罢黜的诱因。

2002年，新任上海市长的陈良宇意图通过投资以扩充上海社保基金从而抵偿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于是便通过社保局长祝均一以借款合同名义委托投资者张荣坤利用约34.5亿元的社保基金进行投资活动，但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挪用社保基金。

2002年至2006年，张荣坤通过买断长三角一带多条高速公路的经营权等方式使其名下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的从约40亿猛增至超过136亿。2006年初，在原上海市委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因病不得不离职休养后，中共中央开始调查上海社保基金案件，6月中纪委陆续派出130多人的强大调查组进驻上海，并采用安插卧底、隔离讯问、个别谈话等手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逐步深入，祝均一、张荣坤等相继落马，案件嫌疑便渐渐指向陈良宇。

陈良宇案判决书中指出：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并且收受贿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在担任领导岗位期间生活作风腐化的，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致其中一人三次怀孕，并要求对方做人工流产。

陈良宇既无红色家庭背景，也没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突进机会，是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中共官员。陈良宇被认为是当时更具国际视野观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其上海主政期间出版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书中极力淡化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的痕迹，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指导科学，主张要尊重所有的科学，这与当时政府在不同场所强调的保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性说法格格不入。

上海社保案造成一大批长期在上海市任职的官员遭调离、免职及查处，而许多未有上海本土执政经历的外地官员被委任到上海。从全国层面看，中共中央高层通过陈良宇案所达到的震慑效果，使地方官员等不敢再对中央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从2006年陈良宇遭免职后，中国很长时间未出现具有改革性的地方政策或发展思路，直至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推行重庆模式为止。而另一方面，在陈良宇被免职后温家宝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得以在全国畅通。

2006年5月，已经接任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到黄海视察北海舰队，乘坐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巡视，两艘军舰突然同时向该舰开火，打死驱逐舰上5名海军士兵。载着胡的导弹驱逐舰惊慌失措，立即调头以发疯的速度急速驶离舰队演习海域。为避免再遭暗杀，胡换乘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未作停留，也未回北京，而是直飞云南。一个星期后，才回北京露面。

评注：江泽民的“上海帮”对胡温处理陈良宇十分恼怒，一直伺机报复。2012年，随着中共内斗日益激烈，大陆百度曾一度解禁“刺胡事件”。11月13日，大陆济南热线网站的军事栏目里，出现了一篇标题为《张定发黄海刺杀案》的文章。文章异常详细描述了胡锦涛2006年在巡视海军北海舰队遇刺的过程。

文章还透露，2006年12月14日海军司令张定发去世，官方罕见没有吊唁，也没有悼词，新华社、解放军报都没有报导，只有海军在2006年12月17日在《人民海军报》头版刊出一则简讯，报导了张死亡的消息，履历非常简单，甚至连黑白遗照都没有配上。

文章还直接点明，张定发是江核心的死党，外界怀疑其与暗杀有关。此后，海军军头紧急表态，向胡锦涛表忠，以期胡锦涛手下留情。

海外媒体也曾披露，事后，据被拘捕的舰艇官员供认，暗杀命令是江泽民下达的，由江泽民的军中心腹、海军司令员张定发执行。

胡锦涛自上位以来至少遭遇了三次暗杀。据香港《动向》杂志的报导，2007年10月2日，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出席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保卫部门在胡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发现在食品专车的司机坐垫下藏有2.5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港媒分析，上海滩是江的老巢，此次暗杀应该是江泽民集团布置。

2009年4月23日，江系人马再次预谋在黄海海域的阅兵仪式上击毙胡锦涛。胡锦涛接到密报，抢先瓦解了这次暗杀行动。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三峡大坝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核心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重力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以及6月6日混凝土围堰爆破和9月20日开始的从135米向156米水位蓄水，标志着三峡工程防洪、通航、发电三大效益提前发挥。

三峡工程自开工以来，就一直有媒体报道其中存在部分贪污腐败现象。到2004年末，查处的贪污资金已有4000多万，大部分都是挪用或者侵占移民款。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国务院三峡工程验收组在大坝表面发现了80多条裂缝，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上对三峡工程质量的纷纷议论。2004年1月30日，美国之音报道指，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曾表示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但大坝是倒不了的。

三峡工程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非常广，其中对库区的影响最直接和显著，对长江流域也存在重大影响，中国工程院的评估报告认为，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会改变当地气候，不过至今为止该现象尚且有争议。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于1984年投入运营。2001年6月开工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最高点海拔5072米，经过连续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工程项目。工程破解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世界铁路之最。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作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若干原则和战略部署。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任期横跨中国国家第十、十一和十二个五年计划，其领导的中国当局注重社会经济的平衡和中国内陆地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其任内，中国经济整体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趋势。在民航、钢铁、汽车、房地产等领域，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靠政府政策倾斜及直接注资，大规模吞并民营企业。

2007年，国务院将社保基金投入目前高速红利中的京沪高铁，试点成功，并以此推广。在成功扳倒陈良宇之后，温家宝的经济政策才勉强得走出中南海，然而地方势力过于庞杂，利益集团相互交织，多数改革未得到落实。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罕有地发表以温家宝个人名义署名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5000字政策性宣示文章，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遭到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的批评。

5月27日，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窑虐工案，成功解救出31名被非法拘禁、强迫劳动的农民工。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惊和愤怒，国务院高度重视，要求彻查“黑砖窑”事件。检查中，共查出无照经营的各类用工单位36286户，涉及农民工34万人；查出无证照砖瓦窑3186户，涉及用工8.1万人。其中，

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砖瓦窑 17 户；有 13 户无证照的砖瓦窑非法使用童工 15 名，其中最年轻为 13 岁。在清理整治砖瓦窑过程中，共解救了农民工 359 人。大部分人员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自行回家，其中，救助智残人员 121 人，除送返原籍的 76 人之外，有 10 人由劳动保障部门在当地福利企业集中安置，有 35 人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救助。黑砖窑事件中 95 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07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于任内病逝，享年 69 岁，成为继李先念任内病逝后又一位在任期内去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

黄菊长期在上海工作。黄菊主政上海期间，在房地产商周正毅垄断市场、强占居民土地等不法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正毅案中涉及的野蛮拆迁等行为曾在当地引起极大公愤。周正毅最终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据称是由于法院受到了来自黄菊的压力。另据律师郑恩宠透露，黄菊在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仍力挺接手上海的陈良宇、韩正等，打压揭发周正毅的群众，阻挠对周案的深入调查。另外，有关黄菊妻子余慧文参与了挪用上海 30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的传闻也令黄菊的声誉受到打击。

黄菊因为牵扯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而被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他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因此政府就对其减少了曝光度。最终黄菊未等到陈良宇宣判便已不治病逝。逝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官方讣告仍给予其高度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并充分肯定了其在上海的政绩。

6 月 25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7 月 10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郑筱萸 2006 年 12 月 28 日因涉嫌受贿被中纪委“双规”，2007 年 5 月 16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7 月 11 日，为了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实现基本生活救助制度方面城乡困难群众同等待遇，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的目标任务、原则要求、保障标准、对象范围、操作程序、资金筹集、组织机构等内容进行了规范。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农村低保工作，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到年底前将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农村低保标准一

般是由县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维持当地农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同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变化等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习近平与李克强等一起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外界视两人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同年12月22日，习近平又从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手中，接过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

10月24日，中国首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之后顺利进入绕月轨道并传回月球三维影像，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成功。

12月7日，决定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家法定节假日总天数由10天增加到11天，取消五一黄金周。同时将除夕、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四个民族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民意调查显示，八成网民支持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九成网民支持全面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2008年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胡锦涛声称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指标。

胡锦涛提出包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社会等理论，其中科学发展观已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共十八大上，科学发展观更被列为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200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交通运输严重受阻，电力设施损毁严重，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温家宝亲自到灾区慰问，鼓励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事件明显增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多次发生恐怖性质的袭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袭击事件、库车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2008年8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发生一起针对武警的恐怖袭击案件。在案件中，两名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7月30日23时45分和7月31日16时，在喀什市又连续发生两起暴力袭击事件，造成14名平民死亡，42人受伤。8月10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发生连环自杀式袭击事件。袭击发生在当地政府办公楼、公安局和武警哨所，一名维吾尔族保安丧生，两名警察和两名平民受伤。2011年7月18日，和田地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袭击事件，暴力恐怖分子先后袭击了税务所和和田市纳尔巴格街派出所。在袭击派出所时，暴力分子劫持人质6名，杀害1名

联防队员，杀害 2 名在派出所办事的群众，重伤 2 名无辜群众。由于时值北京奥运期间，事件格外引人关注。

2008 年 3 月，西藏发生骚乱。部分藏族示威者为了纪念 1959 年 3 月 10 日武装起义 49 周年，在中国的藏区、藏南的部分藏族激进人士集体抗议。但后来演变成藏族抗争者袭击汉族、回族平民和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并直接造成 18 名平民死亡。

评注：2008 年 1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达赖喇嘛在早些时候接受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的讲话定性为“分裂”立场并进行了强烈抨击。

2008 年 2 月中旬，西藏人民起义运动的几个非政府流亡组织发起北京奥运返乡运动，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丹增宗珠说，这次行动将由几个非政府流亡组织组成的队伍分几路前往西藏，预计 6 个月后到达中印边界，在北京奥运举行之际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境内。这次效仿印度国父甘地不流血、非暴力精神的返乡运动，参加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中。丹增宗珠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多次派人和中国政府谈判，但是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他还说：“我认为中国不配举办声望很高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抵制北京奥运。”

3 月 7 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记者发布会时，严词谴责达赖喇嘛发表的“支持藏族人士在北京奥运期间举行的一些反对北京管治的和平抗议”言论。张庆黎认为，达赖此声明是企图对奥运会“搞破坏”。

3 月 10 日，达赖喇嘛再度声明不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但批评北京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尼泊尔也禁止“徒步返乡”活动，并逮捕了多人。同日，拉萨三大寺院之一哲蚌寺约三百名僧人游行，被警察阻截；色拉寺也有僧侣游行，并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并展示雪山狮子旗，旋即遭警方逮捕。

3 月 11 日，近 600 名僧人在拉萨警察局外集会，要求释放前日和平抗议中被抓捕的僧侣，但遭武警拦截，武警并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而后武警部队将哲蚌寺、色拉寺、大昭寺包围封锁。

3 月 14 日拉萨市内的冲突升级。一些僧侣和藏族示威者在布达拉宫东面的大昭寺附近的市中心四处破坏，包括推翻在马路上警车、私人车辆，燃烧杂物，店铺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建筑物起火，救火车和学校被烧毁，亦有人燃烧中国国旗以示不满及反对，及后中国警方施放催泪弹。

据英国《卫报》报道，拉萨的外国游客目击骚乱中的藏族人士用石头和藏刀袭击当地的汉人和回人等不包括外国人的非藏族人士。根据《每日

电讯报》，两位当时在拉萨的西方游客亲眼看到至少七八位汉族平民遭到藏族示威者的暴力攻击；另有一平民被打死；并看到成箱的石块被提供给施暴暴徒。中共官方录像显示，藏族示威者放火燃烧汽车、消防车，抢劫和燃烧商铺、银行等房屋，造成许多无辜民众被烧死、砸伤。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此次事件中藏独分子直接造成 18 名无辜平民的死亡。

3 月 15 日，拉萨市内大致恢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而全副武装的武警则把守在五个大街的路口外，也严查经过的车辆及行人。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特派西藏采访队报道，当日有几十辆装甲车被派遣入藏，而路面不断有装甲车巡逻。

骚动后的第二日，即 3 月 15 日起，西藏自治区政府开始拒绝外国人、外国记者等进入西藏。同日早上，由于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香港媒体是“非法采访”，所以在次日早上 9 时把 15 名香港记者（包括无线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亚洲电视、now 宽频电视这 4 家电视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这 2 家电台、1 份报章《南华早报》）带离拉萨，在 11 时到达成都。互联网方面，除了大量永久屏蔽的网站外，中国政府又在 3 月 16 日屏蔽了知名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随后于 3 月 23 日重新开放。

据中国官方说法，截至 3 月底，西藏公安机关已抓获涉案人士 414 人，另外还有 289 人自首。2009 年 4 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参与纵火案导致多人死亡的 5 名藏人判处死刑。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等一批执业律师在网上声明，愿意为最近西藏骚乱中被捕的藏民提供法律援助，滕彪律师被取消律师执业资格，江天勇律师被延缓执业证年检。

骚动发生之际离 2008 年北京奥运不到几个月，时间点十分敏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此事件声称，此次骚乱是由分离主义分子挑拨，并由达赖喇嘛的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并说此次骚乱是由藏人广泛不满引起的。自 2008 年藏区抗议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藏各地展开爱国教育运动，并增派工作组人员和驻军，同时袭击的风险导致入藏的观光客减少。

2008 年 3 月 18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两岸经贸往来和即将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询问温总“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温家宝再次提到了尽快实现直接“三通”对于两岸经贸往来的意义，并表示“为了台湾同胞的利益，我们甚至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他最后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脑子里总是在想，‘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度尽劫

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将继续扩大同台湾经贸交流的范围，包括投资、贸易、旅游、金融，提高合作的层次。

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两岸政策取得一系列实质性进展。2008年6月，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北京共同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并于同年7月开放中国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在原有的“小三通”基础上，两岸开通了周末直航包机。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共遇难69227到300000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受到严重破坏。

地震专家普遍认为引发地震的原因在于龙门山断裂带。印度板块往北推进，向欧亚板块挤压并不断地向亚洲板块下插入，导致青藏高原迅速上升，并在高原的边缘形成了地震多发的断层，其中就包括龙门山断层。汶川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上，这一地震带非常活跃，半个世纪以来已发生7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多达10余次。也有专家推断中国推动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修建的大量水库包括三峡大坝可能诱发地震。

地震后，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公众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汶川大地震使四川各地的少数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北川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灾情况严重。北川97%以上的羌族民居倒塌，汶川县雁门乡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古迹遗址萝卜寨，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

汶川大地震产生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陷等地质灾害造成四川、陕西、甘肃境内生态系统大面积损毁、岩土裸露、河流阻断、地貌改观，使灾区的水源涵养功能、土壤保持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受到严重损伤。

因为地震损害严重，灾区部分灾民抢掠救援物资及商店。也有灾民在抢掠过程起争执而打斗，或抢掠物资再出售图利。2008年5月21日，四川地震重灾区德阳市发生大规模骚乱，数千愤怒的民众怀疑有人侵吞转卖赈灾物资而进行抗议，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更多的心理问题与自杀案件反映出地震后的负面影响。因丧子之痛加上高度工作压力，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在自己寓所内自杀。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寓所自杀。此外，都江堰市、安县、绵阳市、平武县等接连发生民众自杀。

地震造成约 21.6 万间房屋倒塌，其中包括 6898 间校舍，工程质量也被认为是影响因素之一。日本地震学者亦认为中国建筑抗震标准偏低、中国一般建筑物的支柱较细、混凝土质量较差、钢筋数量较少、建筑技术过旧。

地震灾情引起民间强烈回响，全中国以至全球纷纷捐款援助，累积金额超过 5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军队调动了和平时代以来规模最庞大的队伍进行救灾，中国民间的大批志愿者和来自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的专业人道救援队伍也加入救灾。

据报，当年时任中共总理的温家宝，因不满军队救援迟缓，曾一度怒摔电话，当时因江泽民按兵不动，胡锦涛也难以调兵，错过黄金救援时间，导致了大量灾民死亡。5 月 12 日，总理温家宝赴灾区救援时，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四川私设军队抗震指挥部，拒绝听从抗灾总指挥温家宝的命令。据 2015 年 5 月 2 日大陆《中国企业家》杂志在《总理们痛批过哪些事》一文中披露，温家宝在汶川地震时要调军队进灾区救灾，但军队不听指挥，温表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2008 年 12 月 9 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在新华网撰文《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许多海外评论认为陈总参谋长在这篇文章中提示，震发 72 小时黄金时间内，胡、温无法调动军队赴灾区进行救援，因为军方一切行动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据报，地震发生后，有数十万被压在废墟下的灾民等待救援。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下令打通通往汶川的道路。但是中共军队行动迟缓、甚至以“天气不好”为由按兵不动。

地震发生 42 小时后，进入汶川县的救援官兵，只有徒步急行军，20 多小时后疲惫不堪、赤手空拳的 1000 人，远远比不上 36 小时内从江苏、浙江等地赶来的一支民间救援工程队。

尽管温家宝向国务院救灾指挥部提出一定要在 13 日午夜前，打通灾区道路，并要求武装部队“全力以赴”把食物和药品空投到灾区，然而这一切也都没有实现。

官方派往灾区的直升飞机只有 20 多架，直到 14 日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后，才决定“要求空军 15 日以空投方式”将部队送达。即震后第 4 天直升飞机才增加了 90 架，其中还包括运送食物和伤员。

新华社记者的博客中透露了温家宝在灾区两度发火。震后第二天（13 日），彭州市由于桥梁倒塌，10 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借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

当温家宝得知这一情况后，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 10 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

《胡锦涛文选》的第三卷里，也记载有关汶川发生大地震后，胡锦涛部署调动军队救灾的一些内情细节。胡锦涛其后得知派去救援的军人迟迟未能进入灾区，只好亲自命令成都军区十三集团军陆航二团的两架直升机进去查看情况，寻找往灾区运送救灾物资的方法；同时命令十三集团军、武警三十八师，省武警总队约5000人“徒步前进”赶赴灾区。

灾后的头七，中国政府首次对公众设立了全国哀悼日。震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省帮一县”的原则，用三年时间进行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2008年汶川大地震69,227死17,923失踪。温家宝赴灾区指挥时，在学校黑板写下“多难兴邦”成为著名一幕。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中国境内传递，为了向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居民表示深切哀悼，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活动5月19日至21日暂停了3天。此后的火炬传递活动缩减规模，简化程序，传递前默哀，传递路线上设立募捐箱等，将火炬传递与抗震救灾紧密结合。因受灾严重，原计划在绵阳、广汉和都江堰的火炬传递取消。

截至2009年4月30日，中国国内捐款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人民币。境外踊跃捐款，其中香港大幅超出以往捐助大陆的量级，胡锦涛在北川县时特别对香港记者说：“感谢香港同胞对内地抗震救灾的支持，这体现了我们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请你向广大的香港同胞转达我的谢意。”

英国BBC在此次事件中的一系列报道中，对中共突发事件处理持正面评价，并认为“地震使中国获得较为宽松环境”。不过，部分境外媒体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只作正面报道，不提灾民对政府的不满，不提负面消息。地震发生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李长春要求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在地震新闻中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评注：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三鹿集团捐了值900万元的奶粉给灾区孩子，5月20-21日王远萍在天涯社区以《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发帖控诉。5月31日，三鹿集团浙江总代理以价值2476.8元的四箱新奶粉为代价，取得王远萍的账户密码以请求删帖。

2008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在甘肃）泌尿外科主任张伟首次接到“问题奶粉”结石患儿病例，随后不到10天内，泌尿外科又陆续收治3名来自甘肃省内的结石患儿。8月1日，三鹿送检的16个婴幼儿奶粉样品，15个样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的成分。

至 2008 年 9 月 11 日，甘肃全省共发现 59 例肾结石患儿，部分患儿已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同时已死亡 1 人，这些婴儿均食用了三鹿奶粉。而且人们发现两个月来，中国多省已相继有类似事件发生。

国家质检总局在 9 月 16 日公布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件迅速发酵。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事件重创中国制造商品信誉，多国禁止了中国乳制品进口；当年有 7 成多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粉。

温家宝 2010 年探视北京医院病童时说：“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 3000 万，国家花了 20 亿。同时，给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上了保险，为期 20 年。这个教训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地方，是我们整个民族应该汲取的。”

2008 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8 月 2 日三鹿集团董事局决定召回毒奶粉，但列席的中共石家庄市党组成员兼副市长赵新朝、市政府秘书长赵文峰否决召回，官员建议“拿钱堵嘴”并指示要“等过了奥运会，再请河北省公安厅打击”。结果毒奶粉事件被拖延揭发。

2008 年 8 月 8 日晚 24 时，前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作为最后一棒主火炬手飞天点燃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奥运主火炬点燃仪式，是由“体操王子”李宁以钢线吊到高空，“空中漫步”绕场一周后，燃点“祥云”造型的主火炬，象征为期 16 日的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始。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2008 年 8 月 8 日晚上 8 时整在北京正式开幕，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举行，9 万 1 千多名观众以及多国元首政要参加了开幕典礼。典礼由张艺谋担任总导演。表演开场由 2008 名工作人员打着会发光的缶，缶每被打一次就会发一次光，构成中文数字及阿拉伯数字，倒数开幕秒数。随后由永定门至主会场，沿北京城中轴线连续燃放 29 个脚印造型的烟火（在现场观看可发现烟火都有燃放，但对电视转播画面则可能由于拍摄技术无法真实将烟火的盛况记录下来，只有最后一个奥运开幕当天是真的烟火，其余皆透过电脑修饰且为预先录制的画面，此事后被附会误传为全部焰火均由电脑 3D 制作。），象征“第 29 届奥运会一步一步走进北京”，开幕式正式展开。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名为《美丽的奥林匹克》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展示出中国四大发明、文字等中华历史，下篇展示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景象。之后，中国歌手刘欢和英国著名歌手莎拉·布莱曼演唱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后，各国选手进场，出场顺序按简体中文名称的笔划顺序。

是次奥运会的会徽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中国印、汉字“京”与奥运五环结合在一起，演变而成。运动会吉祥物为福娃，由五个形象组成，分别是：贝贝（鲤鱼形象）、晶晶（大熊猫形象）、欢欢（奥林匹克圣火形象）、迎迎（藏羚羊形象）、妮妮（北京燕子风筝形象），是“北京欢迎你”的谐音。此次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开幕式是历史上电视转播的高潮，在中国有8亿多观众通过电视媒体观看了开幕式，其它国家地区转播的收视率也创造了历届新高。

此届奥运共设28个大项（38个分项），302个小项，小项比赛中男女子分别有165项和127项，混合比赛有10项。本届夏季奥运会共有87个国家或地区赢得奖牌。中国以48面金牌居冠，是奥运历史上首个亚洲国家登上金牌榜首，而美国金牌数目不变，但金牌排行榜较上届奥运下降一位。奖牌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特点：它的背面镶嵌了中国传统双龙蒲纹璜图案的玉璧，被称为“金镶玉”（金牌是白玉、银牌是青白玉、铜牌为青玉，昆仑玉质地）。

在全球范围内有45亿人次的观众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相关比赛和接收到奥运会信息，是目前为止奥运会历史上转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5000小时的报道和转播，报道规模是雅典奥运会的三倍，悉尼奥运会的四倍。

规划中的各奥运场馆设计方案都耗资巨大，引起社会公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与很大争议，30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2004年7月联名上书，在经费、设计和安全等方面对许多工程的方案提出疑问。

在开幕式中，林妙可站在升旗台上，“演唱”《歌唱祖国》。然而，据导演陈其钢事后表示由于一名中央政治局领导嫌林妙可的声音不够理想，林妙可只是对嘴唱歌（假唱），声音属于另一位女孩杨沛宜。

2008年4月1日，维基百科外文版和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英文版）被率先解封；7月初，陆续有雅虎香港、《星岛日报》、《明报》、台湾中央社、香港赛马会、TVBS电视台、东森电视、美国在线中文版、《中国时报》、《世界日报》、《亚洲周刊》、《星洲日报》、《亚洲时报》、Google Blogger和Flickr图片社区网站被解除屏蔽；7月底，大批外国记者们在北京的奥运新闻中心发现即使中国大陆已解封大批网站，但仍然有很多新闻媒体网站无法自由浏览，其他有关西藏独立、六四、法轮功及色情网站亦都无法登录。

7月31日下午，一些相对于中国政府的敏感网站也开始被解除屏蔽，包括中文维基百科、香港《苹果日报》、台湾《自由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记者等。

奥运会结束数月后，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封锁部分海外新闻网站，包括德国之声、BBC、美国之音、法广、澳广、加拿大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中文网站。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总体上是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某些网站确实存在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此次收紧舆论控制是为了防止经济危机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与政治危机。

评注：2008年7月11日，全美最大的受押公司瓦解，金融市场急剧下跌。8月9日，美国开始浮现金融危机。9月7日，联邦政府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但危机仍然继续加剧。

9月14日星期日，雷曼兄弟在美国联准会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援助后提出破产申请，而在同一天美林证券宣布被美国银行收购。这两件事标志着接下来2008年9月全球股市大崩盘的序幕打开。

因市场忧虑美国经济衰退、美国次级按揭风暴无法受控，2008年1月21日，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巴黎CAC40指数、法兰克福DAX指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海上证综指跌幅均超过5%。从2007年的历史高位比较，香港恒指一年内已回落超过两万点，跌幅超过65%。

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衰退。

2008年9月19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公布了一项法案计划，以改善次级房屋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困境。

对于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纾困案，有65%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民众指出，大银行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救大银行的资本家们，民众却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

直到2008年9月，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开始蔓延至其他经济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通常它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二严重的衰退。但是，世界各地对危机的感受并不相同。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北美、南美和欧洲陷入了绝对衰退，但许多较新兴经济体所受的冲击要小得多，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波兰，其经济在此期间大幅增长。

2008-09 年间，中共政府为抵御金融危机推出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但巨额的投资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和国企，使得民营企业在危机中受到市场和国企的双重夹击。胡锦涛任内中国的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首条高速铁路（武广高铁）等重大工程均在胡任内竣工。国防科技事业也有所突破，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神舟五、六、七、八、九号载人航天飞船均实现成功发射与着陆。嫦娥、天宫等航天工程也陆续将其飞船发射升空。

2008 年 3 月 18 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共十一届人大上指出：“网络技术的发展，助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是不争的事实。表达自由是人的自由重要的方面，若公民表达的内容不能畅通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那么依据有损信息作出的决策，往往会违背良好的初衷。去年福建厦门市在 PX 项目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府和市民最终达成一致。首先是因为民众的意见能够得到较为自由、畅通的表达，真实全面的信息传输到决策层，而决策层又真正重视了民意，才做出了正确的决断。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厦门市民不能真实地表达意见，或者表达后有关部门置若罔闻，那么恐怕不是大禹疏导洪水那样的后果，而是像他父亲鲧用息壤围堵助长洪水肆虐”。

2008 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 2009 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

2008 年 11 月，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用于应对 2008 国际经济危机、稳定经济的一系列财政、货币等政策，大体分为十个大类，总规模约 4 万亿元人民币。

评注：为应对 2007 年-2008 年环球金融危机，温家宝于 2008 年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当时外界普遍将之视为“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所作出的最大动作”。

2009 年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出台后，很快便引发了吴敬琏、厉以宁、许小年、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因为四万亿带来的货币泛滥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房价飙涨、巨额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低效投资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等一系列负面效果，使中国错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造成长期型结构性破坏。林毅夫则是少数对该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

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资金实际上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地方融资平台及产能过剩行业，还有部分资金被用于还本付息，这些资金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部分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如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相对容易，资金流入到这些机构的低效高风险项目之中。

以炼钢行业为例，2011年以后，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负面作用开始对中国的炼钢行业构成严重冲击，产能过剩导致炼钢行业出现大规模亏损。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危害表现在，其一，中国在四万亿投资前已处于资产泡沫状态，四万亿方案又向市场继续注入无限流动性，导致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地价、房价、物价的虚高一方面抬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加速了制造业向国外迁移，伤害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以劫贫济富的方式让民众手里的储蓄贬值，这种洗劫民间财富的手段伤害了中国普通民众。其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还存在重复投资、低效投资、无效投资乃至权力寻租以及豆腐渣工程，严重浪费了中国资源。其三，中国很多过剩的产能都是本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四万亿投资计划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企业明知亏损还要生产，引发同行业恶性竞争。

这项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巨额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为此遭到了长期破坏。

但得益于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十年，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4倍。

2009年开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扩大贸易量化测试等，以促进海外人民币流动。2010年后，包括俄罗斯卢布、日圆、澳洲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英镑、加拿大元等同意能与人民币直接兑换。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阅兵仪式及群众游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庆典大会。胡锦涛检阅部队。参加庆典的受阅官兵和游行群众超过20万人。

群众游行时新增的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队，是在9月18日长安街最后一次大预演之后才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经过慎重讨论，最终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语，并将方阵底色定为红色。为了让阅兵仪式能够顺利举行，北京市公安局在国庆前夕发出通告，要求长安街沿线商业区内商店商场停业封闭，禁止任何非许可人士进入，故宫博物院也同时关闭。

2009年春季至2010年8月间发生的一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另据美国CDC估计，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2009年5月，中国政府将21名美国学生和3名教师隔离于他们的酒店房间里，而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就中国的“抗流感措施”发出外游警示，警告患病者不要前往中国。在香港，一间有240名住客的酒店被隔离。

2009年，中国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第29位。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谈到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他说：“我一直是支持互联网开放，不赞成内容审查，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美国我们拥有自由的网络，也就是无限制上网，就是社会力量的来源，我认为这应该受到鼓励。”当时的官方媒体新华网做了同步文字直播，文章被四大门户网站刊登并被其他中国资讯网站广泛转载，但此新闻在27分钟之后即被新华网移除，其他门户网站的相同文章也被要求删除。中共中央宣传部也下令各报需一律刊登新华网通稿，中国中央电视台当日只简单报道了奥巴马抵达北京的消息，并没有提到他在上海的讲话。而《人民日报》网上版简短地总结奥巴马告诉全场观众，网络“具有帮助传播信息的强大力量”，但他对网络监控的报道就只字未提。当天，平时遭到长期封锁的海外新闻网页在上海地区被短暂解封，直至他离开。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的自由传播对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构成挑战。为了应对来自网络发展形成的影响，中国建立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网络审查制度，审查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内容，封锁服务器位于境外的政治敏感类网站，以达到其舆论控制的目的。谷歌、雅虎等公司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开始雇佣大量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来控制舆论导向。

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司声称遭中国的黑客攻击，暗指这些黑客攻击具有政府官方背景，并透露在中国业务方面与中国政府的冲突。长期以来以接收中国政府行政命令标志的红头文件的形式配合审查让Google相当不满，一直对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消极执行。华裔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2010年1月13日敦促中国确保谷歌和其他美国公司的营商环境安全。

3月23日，谷歌中国声明因“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和“网络审查”决定退出中国市场。谷歌退出中国事件成为中国2010年重大互联网新闻，谷歌不服从中国当局信息审查退出市场的行为，引发广大关于网络自由、言论自由的讨论，中国网民表达了对此事的不同看法，有不少互联网从业者的惋惜声音，间接表达对中国防火墙的不满。

2010年代初，中国因国内贷款问题而经济增长放缓。在全球经济因次贷危机陷入困境后，中国出口量与国际市场需求亦遭削弱。

2010年4月14日上午，玉树发生7.1级地震，地震造成2698人死亡，失踪270人，12135人受伤。县城结古镇全部停电，由于大部分建筑都是土木结构，重灾区结古镇附近西杭村的民屋几乎全部（99%）倒塌。此外整个玉树州的70%学校房屋垮塌。

日本《朝日新闻》英文版称，中共中央宣传部已下达“救灾报导禁令”。西方媒体则批评中国救援人员消极对待救援，称中国政府少报或“操纵”了伤亡人数，并估计死亡人数应超过一万人。美国之音同时指责中国政府婉拒其他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派遣专业救援队伍援助青海地震的请求，指称中国政府拒绝境外救援力量是为了“严防境外敌对势力”。

2010年5月5日，重庆两江新区获批成立，定位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两江新区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沿海转向内陆的标志。

2010年，重庆市以“打击黑恶势力”为由，制定法规要求强制执行网络实名制，并监控腾讯QQ群，民众短信等内容。此举引发广泛争议。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举行。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盛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184天时间里，来自246个国家、国际组织的参展方，通过展示、论坛、表演等形式，共同谱写了一曲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激情乐章。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数达到7308万人次，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

6月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重庆举行第五次领导人会谈，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推进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进程，明确了两岸经济往来自由化目标，构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平台。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大进展，也是两岸关系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5月7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广州地区，暴雨造成城区严重水浸，广州市有6人死亡，许多地下车库被雨水灌满，逾1.8万辆汽车被浸。6月22日，南京军区派出直升机到江西抚州市唱凯堤决口处勘察灾情，由于灾区一片汪洋，只有高速公路仍可通行。7月27日起，吉林省局部地区遭特大暴雨袭击。省内饮马河、岔路河、温德河等多条河流发生大洪水。据水利部门测算，其中温德河为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口前水文站为1600年一遇洪水。

2010年8月7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持续40多分钟的暴雨使得土石冲进县城，并截断两条河流，形成堰塞湖。一村庄300户房屋被掩埋，几乎无人逃生。县城被淹，5万人受灾。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此次灾害共造成1557人死亡，208人失踪。此次灾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大洪涝灾害之一。8月15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

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于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在广州市举行，总理温家宝宣布亚运会开幕。广州市政府为迎接亚运会，耗资73亿元人民币为市区主干道和道路两旁的楼宇进行“穿衣戴帽”的整饰工程。广州市政府期望通过申办亚运会，加速广州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和城市的文明程度，提高市民的文明素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和城市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但亚运会为广州市财政带来沉重债务。

2010年，中国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国家统计局12月3日发布公告，201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4641万吨（10928亿斤），比上年增产2.9%。这是我国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是战胜严峻自然灾害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我国粮食总产已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水平。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进入世界银行前十名，并有111家银行列入世界前千家银行。随着海外需求增加，中国银行业积极向外扩张。

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2.85兆美元，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元资产，包括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外汇储备名义上作为国家资产，实际上是中共的私产，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实际业务操作由中国银行进行。

国务院2006年5月批复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后，国家级新区的概念开始逐渐被关注。此后，2010-2012年，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相继获得批复。

由于国家级新区往往被赋予先行先试的特殊权限和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开发建设初期呈现超常速的增长态势，普遍快于所在省区市及全国平均水平。而服务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人气聚集不足，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并加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带来的风险，容易造成开发初期城市建设遍地规模过大、短时间内形成“空城”的局面，不利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和平衡。

201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2011年GDP增长为9.2%，2012年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3%。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实现东西部发展的平衡，并克服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胡温执政以来，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胡温执政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与主要的外交关系国间总体相处平稳，没有相对大的波动。胡锦涛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主张全方位外交，重视对东南亚的中国周边邻国改善关系。中美、中日、中俄、中欧间的关系也大比较平稳。

此时，中国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系统与高速铁路系统。中国铁路总公司经营的铁路里程数共计10.3万公里，为全世界客运和货运最繁忙的网络，每年春节等假期都会出现人潮。2009年各国铁路利用列表显示中国占世界25%，运输周转量则占世界24%。中国在21世纪初建立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混凝土的消费国，分别消耗三分之一和超过一半的全球供应量。

2011年7月23日晚上8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上，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前方由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同向追尾事故，后车D301次四节车厢碾过D3115次车尾16号车厢坠桥。铁道部最终宣布40死、172人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亿9,371.65万元。

评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前，中国经历了六次铁路大提速，中国高速铁路也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拥有非常庞大的规模与速度。然而跨越式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票价升高、级别较低的车站消失导致居民出行不便等，而不断提高的火车运营速度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忧虑。

2011年2月，力主推动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铁道部部长的职务。盛光祖接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职务。盛光祖在接任之后对于铁道系统调整内部人事架构，众多技术干部被调职，使得铁路系统处于较混乱的状态。

本次事故发生前，中国高速铁路曾多次发生运营故障，特别是2011年6月30日通车的京沪高速铁路投入运营后，频频发生故障造成停运，导致多趟列车空调关闭、晚点。2011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院士简水生曾提出京沪高铁接触网的动态接触和防雷技术不过关。

2008年，事故发生地的甬台温铁路附近线路建设施工时曾发生造成7死的桥梁坍塌事故。

此次事故，掉下桥的 3 节车厢都是压过了 D3115 次车尾 16 车厢之后落下的，16 车厢受撞击最严重。

事故发生后，各界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猜测，分别指向了雷击、列车信号系统故障、司机人为因素、调度失误等。经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缺陷，遭雷击后发生故障。

有媒体称，当局在次日早上开始迫不及待清理现场，用铲车将坠落车厢碎片碾压后挖坑就地掩埋。亦有新闻称这是由于四节坠地车厢因体积太大，无法运出现场。此举引发民众激烈反应，认为车厢中可能还有幸存人员、遇难者遗体及遗物，并认为此举是为“毁尸灭迹”，试图掩盖事件真相，毁灭问责证据。

7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要求“公开透明地进行调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的交代”。

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调查结果否认了铁道部所称信号技术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事故形成的主因，报告认为刘志军、张曙光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处分铁道部、通信信号集团在内的 54 个相关官员。

评注：刘志军被誉为“中国高铁之父”。在铁道部部长任内，刘志军动用多种资源，引进和发展高速铁路技术，开展大规模铁路建设。任内修建了长达 1.8 万公里的铁路，在建的铁路则高达 3 万公里。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1972 年 2 月，初中毕业的刘志军赶上铁路招工。19 岁的刘志军遂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的一名养路工。因为字写得好，后来当了队里面的文书。至 1981 年 9 月，刘志军历任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养路工、武昌工务段团委干事、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武汉铁路分局团委书记。1973 年 8 月，刘志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军的聪明与勤奋得到时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黄从全的赏识，黄把自己的女儿黄立平许配给他。

2003 年 3 月 17 日，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名，刘志军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勃勃雄心为他赢得了“刘跨越”的绰号，甚至有人称其为“刘疯子”。

刘志军任内，铁路建设投资达到历史最高峰。2003 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仅有 533 亿元人民币，2010 年已达 7075 亿元人民币。铁路投资超过了军

费。温家宝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 1.5 万亿被用于修建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

自 1990 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自主研发高速列车，“蓝箭”、“先锋”、“中华之星”、“长白山”等高速列车先后问世。由于整体技术不成熟，2004 年 4 月，中国政府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引进少量原装、部分国内散件组装和大批量国内生产的项目运作模式。

2010 年 12 月，世界高速铁路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刘志军在大会上称，中国高速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 7531 公里，是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称，新线路开通后，刘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哪个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刘志军的同事称：“在列车所有的创纪录实验中，为了测试安全性，刘部长几乎每次都在驾驶室内亲自指挥。作为一个部长，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检验高铁的安全性，的确让人感动。”

刘志军亦被称为工作狂。刘志军声称，自己从在铁路工作起，就没有在家过一天春节。高速铁路的发展，成为刘志军的政绩之一，但铁道部长期处于政企不分、改革滞后的状态，以及数起重大安全事故和腐败大案亦令刘志军备受争议。

官方称：刘志军滥用权力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书苗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并且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

2011 年 7 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刘志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建议另案一并处理。”

温州动车事故 40 死 172 伤，温家宝慰问家属：“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刚才听到有人为理赔款而争执感到非常难受，因为人的生命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遇难者家属还是讲道理的，说我们要命，不要钱，应该说我们无言以对。”

2011 年 9 月 14 日，世界经济论坛 2011 年新领军者年会（简称“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世界经济论坛首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于 2007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在中国大连举行。当时，温家宝同样出席并致辞。温家宝说，这次会议定名为“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并继续把“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作为主题，既反映了世界对快速成长的企业和地区的高度关注，也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建立世

界经济新秩序的迫切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家宝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2007 年至 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于其他八国集团国家总和。中国从 1990 年的 8 家上市公司加至 2010 年的 2,062 家，另有 1.3 亿户投资者、106 家证券公司、62 家基金公司和 163 家期货公司。

80 年代，超过一半的出口为原料等初级产品，机电产品只占 7.7%。2012 年国际贸易总额中，一般贸易占 52%、加工贸易占 48%；出口美国最多的商品，依序为手机与广播设备、电脑、电脑设备、影音设备、玩具等。

中国汽车制造业增势迅猛。2009 年，中国生产的汽车销量突破 1300 万辆，2011 年汽车销量达 1850 万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资本市场已有上市公司 2062 家，投资者 1.3 亿户，证券公司 106 家，基金公司 62 家，期货公司 163 家，股票总市值全球第二，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居世界第一位。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大力发展制造业及出口加工贸易，2000 年-2010 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10%，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6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产业在 2012 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件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这领域最近十几年发展迅速，规模从 2000 年的 593 亿人民币增长到 2010 年的 18400 亿人民币。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36.65%。

2011 年，中国中央政府初步确立了在青岛、天津、上海和深圳等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划与设想。

五年之后，温家宝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他的演讲题目变成《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温家宝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2012 年 3 月人大记者会上温家宝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财政部在 2012 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 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 2009 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 5700 万人，到 2012 年，中国财政供养的吃皇粮人口已超过 6000 万！平均二十个人养一个当官的，这是历史之最。

评注：2012 年 11 月 11 日中国网络购物全日销售额超过美国网络星期一，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的购物节日。

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开始，购物网站淘宝及其子品牌天猫为首的商家将该日宣传为“双十一狂欢购物节”，随后其他电商也纷纷加入，光棍节逐渐演变成犒赏自己的网络购物节日。

“双十一”的发起者阿里巴巴 CEO 张勇将双十一称为“商业界的奥林匹克”。2011 年 6 月，淘宝商城业务正式分拆，时任淘宝商城市场总监应宏提出要把双十一从“光棍节”变成“网购狂欢节”，正式打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旗号，将双十一固定为每年大规模的常规促销活动，淘宝的主要竞争对手京东、当当、亚马逊也开始加入双十一促销的行列，将活动日期扩展到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双十一成为各大线上电商平台竞争的主要阵地。面对“双十一”的火爆场面，阿里巴巴又顺势在 12 月 12 日为淘宝网的中小卖家推出“双十二”主题促销。

自 2012 年开始，阿里巴巴集团开始大规模投资媒体，包括陌陌、新浪微博、虎嗅、文化中国传媒集团（京华时报）、优酷土豆、光线传媒、四川日报集团、芒果 TV、南华早报等，成功构建了一支实力巨大的“公关喉舌”队伍。而阿里巴巴不断干涉被投资媒体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2012 年 9 月，阿里巴巴集团完成了回购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额为 76 亿美元。其向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及博裕资本、中信资本，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

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电子游戏开始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随着电脑、掌机、家用游戏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推广，PC 游戏、掌机游戏、电视游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至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 4.9 亿游戏玩家，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831.7 亿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电子游戏消费大国。

2000 年后，宽带网络的出现以及后来价格开始下降，用户接入数量开始快速攀升。一些大城市也开设网吧等的服务机构，加上网络游戏流行，令中国大陆互联网迅速发展。受到 ICQ、Google、YouTube、维基百科等的启发，中国大陆企业开始自行发展相关的产业。

中国经济数据以 GDP 为首多次遭到外界质疑是否造假。地方政府普遍搞攀比、争位次，在源头上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漏报、重报等问题严重，导致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为此，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相关部门曾多次发现并处罚地方政府经济数据造假。

评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是亿万中国人心中的英雄，是使中共恶政胆颤心惊的梁山好汉。

2008 年 7 月 1 日晨 9 时 40 分，杨佳携带 8 个自制的汽油瓶前往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杨佳首先在天目西路处的警车停放场投掷两个汽油瓶，但并未燃烧，其又在闸北分局正门西侧三米左右的花坛处投掷了剩余 5 个汽油瓶。在汽油瓶燃烧后，正门处的保安前往救火。杨佳利用保安离岗之际通过大楼的便民服务通道进入警局大楼。

杨佳在进入大楼后，对大楼门的民警和保安进行袭击。导致六名警员死亡、四名警员和一名保安人员受伤。事后杨佳被逮捕，案件在经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杨佳死刑。悲哉，杨佳！

杨佳袭警案的起因，源于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杨佳骑着一辆租借的自行车途径上海市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因被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的巡逻民警意图找碴叫停。过程中，杨佳要求民警出示证件才会出示个人证件和车辆来源证件，引发路人的围观。民警强制将杨佳带离现场，并带回派出所后，经历了六个小时的盘问和殴打。

此后，杨佳一度返回北京，但至案发前，杨佳曾多次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分局的监督部门致函投诉，并且在信件中要求开除当值警员，并向警方对其在公众场合被调查等情况索要精神赔偿。杨佳不认可警方处理意见，并最终决定采用刺杀的方式进行意见表达。

杨佳母亲王静梅被视为是杨佳袭警案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她了解杨佳在 2008 年 7 月 1 日到上海闸北区袭警之前，为向警方讨说法而展开的 9 个月的整个申诉过程。王静梅在杨佳被捕后不久，便被送入北京市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中共警察查证违法！把好人关押违法！司法程序违法！审判结果违法！整场悲剧都是中共黑帮恶意制造的。

中共就是这么一个杀人不见血的黑帮，与其讲法律就是与虎谋皮。中共以恶法治国，是不在乎什么程序正义之类的。对付它的方法，十亿人之中，只有杨佳是正确的，就是灭了它。“他不给你一个说法，你就给他一个

说法”。如果中国有 100 个杨佳，中国人就不会受独裁奴役了！中华大地就会重见光明，成为真正的和谐社会了。善哉，杨佳！历史会记住你。

胡温本是良善之人，但是为了维护中共邪党的专制统治，也自觉不自觉地吧魔鬼邪灵装进了自己的良心。高智晟律师说：“中国和法制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小小的案件，最终都能反映出深深的制度问题。它真实的存在而且非常沉重，但你永远不知道在甚么环节上去改变它。实际上当你有改变它的愿望的时候，你已经很危险了。”

胡温在执政期内讲求“和谐社会”、“维稳”、“不折腾”、“五不搞”，在不做重大改革下总体保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快速上升。同时，其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回避或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

在中共领导人中，胡锦涛是第一个在正式讲话中使用“不折腾”这个词的，据报，当时“不折腾”三个字刚落音，大会堂观众席随即传来一片会意的笑声。

大陆网民创作了“草泥马”、“雅蠃蝶”等诸多虚拟动物或人物形象，究其根源是出于对政府为了创造“和谐社会”而进行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和推行《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等一系列举措所进行的讽刺。

无国界记者指责胡锦涛以“和谐社会”为借口阻止中国出现自由媒体，把胡锦涛列入“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2012 年，“无国界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下令囚禁 68 名网民和 30 名记者，是囚禁新闻自由捍卫者最多的领导人之一。

评注：温氏家族世居天津市郊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 8 号，相传温家先祖 6 代人都居住在此。1948 年底，温家宝一家迁往天津市区。

温家宝被媒体称为 1949 年以来中国最具争议的总理。争议性主要集中在地质学出身且没有丰富的地方主政经验，被称为经济门外汉，担任总理后没有抓住相对有利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大刀阔斧改革，反而使用政策手段在国内制造分化和仇恨，一方面政策性压制河南和上海等地，阻碍其发展，另一方面过度政策性扶持家乡将巨额资金投入天津造成鬼城经济泡沫的后果饱受质疑；批评观点指温家宝政策性腐败对国家造成的伤害甚于官员个人贪腐。

温家宝执政的 2012 年，财富 500 强中国上榜排名靠前企业全是石油、电力和银行等垄断行业。其经济刺激计划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巨额地方债务等，致使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进而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问题加剧。

在个人品行方面，温家宝被指曾出卖赵紫阳、是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罪魁、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获得一路高升，且其惯于伪装、作秀和煽情，因而民间戏称温家宝是影帝。因此被人评价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温家宝的家族财富问题和滥权腐败问题也饱受挞伐。温家宝被《纽约时报》曝光拥有巨额家族财富。与温家宝平日苦心维持的“一件羽绒服穿十年、视察民间时候穿平价旅游鞋”的节俭朴素形象相比，妻子张培莉显然奢华享受。2007年11月2日，中国时报报道张培莉酷爱珠宝，曾向台湾珠宝商买珠宝，一出手就是单价6524万元新台币一条的宝石项链（合人民币1400万元）。英国金融时报于2010年3月，于一篇“China: To the money born”的报导中，批评中共的太子党竞相参与私募基金，并举新天域资本公司为例，表示这家座落于北京不起眼小办公室的外资公司，拥有的最大资产就是温家宝之子温云松。

温家宝多次口头提出中国要搞政治改革，更不能走文革的回头路；他说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被葬送；尽管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对其个人也是阻力太多、风险太大，但温家宝在这一点上还是应该肯定的，他的观点也代表了中共内部越来越多人的态度。

2012年3月人大，温家宝在记者会对王立军事件表态：“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2012年3月，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并接受调查。

2012年3月18日凌晨，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携两名女伴驾驶法拉利跑车，行至北京保福寺桥东辅道时发生严重车祸，令谷当场死亡，两名女子身受重伤被送入医院抢救；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任内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接受中共的组织调查。

第四十一章 薄熙来政变

2002年11月，薄熙来在中共十六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因薄的年龄、任职领域和背景符合成为2012年掌管大权的“第五代领导人”潜在候选人资格，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时任河南省长的团派领袖李克强被认为是他的竞争对手，是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接替胡锦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主要候选人。

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同年4月10日被停止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接受中共中央纪委调查。

评注：薄熙来1949年7月3日生于北平，山西定襄人，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的次子。80年代，薄家重获政治影响力。薄一波直至2007年去世，一直是党内的显赫人物，为儿子职业生涯的塑造带来影响力。

1956年9月，薄熙来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同班。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和二姐薄洁莹随父母前往广州避难。1967年1月父母先后被红卫兵抓回北京。

1968年1月至1972年11月关押在北京市立水桥北苑少管所，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参加劳动。1972年成为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工人。1976年，薄熙来和中共高级干部李雪峰之女李丹宇结婚，第二年生有一子薄望知。他们在1984年离婚。之后与解放军少将谷景生之女谷开来结婚，于1987年生子薄瓜瓜。

薄熙来1978年参加高考考进北京大学，于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本科学习，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大学毕业后，薄熙来被调到中南海工作，就职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不久后调任辽宁省大连市金县党委副书记。1990年成为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和大连市副市长，1993年成为大连市市长，党内地位不断提升。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大量吸引外资，积极改善大连的自然环境、市容市貌和基础建设，致力于将大连从传统计划经济的工业城市向旅游城市和国际会议及展览中心转型，使大连在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北其他城市，并使大连成为了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大经济城市，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中国东北地区、乃至中国大陆的最宜居城市之一。

薄熙来任职大连期间，大笔投资修建星海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等项目。有报道称，当时大连市的市长办公室里安装有一个控制台，薄熙来可以通过按钮控制全市各处音乐喷泉的灯光颜色和曲目。星海广场修建了雕刻脚印，其中包括薄熙来的脚印；星海广场中心修筑了 19.97 米高的华表，后来成为大连市的地标。这座华表雕有九条龙，建成后是中国大陆最高的华表。历史上华表象征着皇帝的权威。薄熙来在大连修筑中国大陆最高的华表，当时就引起了议论。

薄熙来还组建了女骑警队。大连在他治下，创建了大连足球节，大连美容美发节等，使大连在原先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上，成为了一座北方的国际会展中心，也被称为“北方明珠”。

1999 年，大连被评为中国首批旅游城市，国家旅游局给大连旅游定位为“浪漫之都”；到 21 世纪初，再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国家旅游局共同授予中国最佳旅游城市。2001 年，薄熙来调离之时，大连市民蜂拥而至为其送行，200 米的路，薄熙来走了 1 个小时。

尽管中国表面上不赞成建立裙带关系，但薄一波对儿子的野心街知巷闻。为了在十五大期间扩大薄熙来的影响力，确保薄熙来晋升为中央委员会成员，薄家开展了一场全国性运动，宣扬薄担任大连市市长所做的“成就”。他们委托作家陈祖峰把薄熙来描绘成是“亨利·基辛格一般的政治家，有着阿尔·戈尔的环保意识，获得民众对戴安娜王妃般的爱戴。”虽然有宣传活动，但薄熙来在辽宁代表团却没有席位，最后要由薄一波帮助他在陕西代表团获得席位。

根本的原因，是作为太子党的薄熙来破坏了中共的一些潜规则；加上薄熙来的老婆薄谷开来没有能讨好江泽民的色泽。他们俩人的组合在中共红二代中没有好的“群众基础”。

1999 年 9 月薄熙来改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大连市市委书记。2000 年，辽宁省省长张国光身陷腐败丑闻，这为薄熙来带来了升迁机会。2000 年张国光被逮捕和撤职后，薄成功担任代省长，2001 年正式出任辽宁省省长，并于 2002 年当选中央委员。

2004 年据官方媒体报道，辽宁省的外国直接投资自 2003 年振兴东北战略推行以来增长了近一倍，但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据报曾曝“开发的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是沈阳市“慕马案”及其相关案件的审理时期，期间一批省市级腐败官员落马，而任内在处理仰融案时引起争议。

评注：仰融是华晨中国汽车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在 2001 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名列第三位。

仰融在沈阳建立的政商平台依赖妻子邹凯丽二姐邹凯岚的丈夫姬强（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大姐邹凯玲的丈夫（德国宝马集团总裁）、慕绥新（辽宁省副省长）、马向东（沈阳副市长）等官员体系。2000 年至 2001 年，“慕马案”发生，上述官员体系倒台，仰融失去了政治依靠。当时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了仰融，华晨的投资战略乃逐步转向浙江省宁波市，并向董事会提交了移师宁波的方案。虽然仰融控制着华晨中国董事会，但华晨是辽宁省政府的重点龙头企业，也是辽宁省经济的一大支柱，辽宁省政府和省长薄熙来不愿放走华晨。为此仰融和薄熙来闹翻。

2002 年初，在薄熙来指示下，辽宁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省长助理领导的工作小组。3 月，工作小组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包括仰融在华晨中国的权益，均属于国有资产，要求仰融将这些股份转让给辽宁省政府。仰融拒绝后，工作小组通知仰融及华晨中国董事会，基金会将不再承认华博在华晨中国的受益权。

2002 年 3 月 11 日，财政部下发（2002）第 5 号函，认定华晨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6 月，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华晨中国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

6 月 3 日，仰融通过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曾是华晨汽车纽约上市的首席律师）的协助下出境离开中国，自称受到“迫害”出走美国。8 月，仰融等在美国起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

2004 年 2 月，因时任商务部部长吕福源罹患癌症、难以履职，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进京出任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同年 5 月，在吕福源病逝后，薄熙来接任商务部党组书记一职，开始主持商务部全面工作。

薄担任商务部长期间限制外商在华投资的持续增长，他制定计划保护中国产业在国内的竞争地区，以防被外资企业迅速排挤，此举显著抬升他的国际形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薄保持着自信的态度，与美国同行进行实质性讨论，签署知识产权、服务业、农产品、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协议。

薄熙来每天的日程主要是接待外国来宾和政要。他外表英俊、口齿伶俐、处事豁达，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受到媒体的大肆夸耀；他年轻活力、亲近民众，受到女记者欢迎，俨然是一颗闪亮的“政治明星”。在跟美国官员会面时，据称薄告诉纠结中的口译员不要翻译了，中国官员听得懂英语，翻译简直浪费时间。

2004年5月，薄陪同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五国。5月3日，在巴黎工商会举行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上，薄熙来说：“中国最近购买了三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五架是空客380，由于中国出口纺织品利润较低，中国出口约八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薄熙来常常喧宾夺主，他的政治形象被认为背离了北京领导层的严肃和保守。

薄熙来还监督部委的结构调整，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合并。但有报道指当时分管商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薄熙来交恶，并在2007年以“裸退”阻止薄熙来接任其副总理职位。

评注：吴仪是公认的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的谈判专家。2005年，吴仪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第二有影响力的女性”。吴仪一直未婚。她曾这样解释道，说自己当年看苏联小说太多了，把爱情过于理想化了，因而错过了婚姻。而她本人经常谦称自己为“小女子”，与她共事的工作人员都称吴仪和蔼慈祥，且不失男性的果断变通。2004年2月起，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以遏制河南等地的失控局面。此前吴仪已经前往河南，和高耀洁询问基层的艾滋病问题，并将由于政府刻意掩盖的问题揭露。

2007年10月22日，薄熙来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但薄熙来的两名主要竞争对手，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则越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他卸任商务部长，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而薄熙来的前任、竞争对手汪洋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当时的重庆面临着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民众失业、公共卫生条件差、三峡大坝并发症等问题。有关人士分析，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想赶在问题愈演愈烈之前将盟友转移出重庆。薄起初不愿意前往重庆，对新职务很不满意。他反而希望成为副总理，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吴仪反对让薄上任副总理，吴仪也对薄的粗鲁与自我宣传反感。

薄熙来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经济之所以能在金融海啸时期获得巨大飞跃，得益于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尤其是原本在沿海地区开厂因成本上涨搬迁至内陆的外商企业。重庆市政府采用贴息贷款、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补助出口创汇等政策，将这些企业拉拢过来。

薄熙来主政以后，提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等政策，合称为“五个重庆”。

薄熙来大力推广其在重庆实施的政府公租房政策，该政策与在汪洋主政重庆时期开始执行的廉租房有所不同。公租房申请条件要大大宽松于廉租房，“凡年满18周岁，在主城区工作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人员及进城务工、外地来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根据薄熙来的“宜居重庆”规划，在2010年，计划未来10年，当年开建500万平方米，3年时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并全面改造城市面貌。

为改善重庆市交通状况，重庆市政府提出“畅通重庆就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到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运力的高速铁路网和完善的市内轻轨网，实现“半小时主城”、“4小时重庆”、“6小时周边”、“8小时出海”目标。

2009年第一季度，金融海啸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此相比，薄熙来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的2008年重庆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成长了170%，达到27亿美元，从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跃升至第2名，2009年吸引40亿美元的外资，成为西部第1名。2008年重庆市的年经济成长率为14.3%。对此关注的媒体，开始将重庆的发展体系称之为“重庆模式”。

提倡合理地‘分好蛋糕’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薄给予全市外来务工人员居所，让他们与城镇居民享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同等待遇。薄推行共产主义的“红色GDP”的概念，实施一系列旨在缩短贫富差距、缓解城乡差距的平等社会政策。

薄的社会政策在2008年11月引发出租车罢工，8000名出租车司机上街两天抗议高收费、恶性竞争和燃料成本上升；官方媒体不时指责工人骚乱触犯煽动罪。

薄熙来自2007年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以来，重视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秩序管理，推广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文化，并将其政敌视为黑帮势力予以扫除，俗称“唱红打黑”。一些观察者认为，薄熙来2007年争取国务院副总理职位失败而被调至较偏远的重庆市，为返回中共最高层而进行“唱红打黑”，以获得声望和支持。

薄熙来任职一年多后，2009年7月10日起，重庆市人民政府展开一系列的打击黑社会的行动。在此之前，2008年6月，经公安部研究，决定任命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武警第一政委。

评注：王立军1959年出生于吉林洮南，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六七岁时随父母移居内蒙古阿尔山林场。王立军曾入选过内蒙古少年拳击队，当时其就读于海拉尔一中。1978年4月至1981年3月，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基本建设工程兵第 41 支队任司机、文书。服役期满退伍后，回原籍林场当工人。

1984 年 8 月，铁法市公安局公开招收 10 名交警，王立军被破格招收。入警后培训一个月，即被任命为铁法市公安局治安科下属的治安队队长，管理领导 20 余名各企业抽调的治保员。当时辽宁省铁法市的晓南地区黑恶势力猖獗，晓南派出所所长被杀，王立军担任新晓南派出所副所长，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身份。

1988 年 10 月，被任命为晓南派出所所长。经过一系列逮捕行动，彻底改变该地区治安，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派出所所长。1991 年 3 月，调任大明派出所所长，使得该区治安从全市最差转为最佳。1991 年年底，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管理班脱产进修学习一年，同时挂职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明派出所所长。

1994 年 6 月，王立军被越级提拔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当时铁岭市有四个主要黑社会组织。1994 年初，其在任期间曾遇到办公楼被安置炸药、并身负重伤，一次中枪昏迷长达二十余日。经过两年整顿，王立军率众肃清此四个组织，其中亲自生擒黑社会头目、前辽宁省拳击冠军杨富等二十余人。

王立军曾被授予铁岭市十大杰出青年、铁岭市优秀共产党员、铁岭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廉政标兵、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2000 年 5 月，王立军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1999 年播出电视剧《铁血警魂》，以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为原型。

2000 年 8 月，他升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2003 年 5 月，王立军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2008 年 6 月，薄熙来把这名得力干将调来重庆，帮助他“唱红打黑”。

2009 年 7 月 10 日，重庆市掀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代号 091 专案组，其中累计立案侦办涉黑恶团伙 375 个，抓获 5789 人，破获刑事案件 4944 起，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达 700 亿元；破获历年命案 1109 起，抓获杀人犯 1209 人，上网逃犯 1.7 万人。陈明亮、岳村、黎强等 67 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先后被警方执行逮捕，常仰仗黑恶势力撑腰的商业秩序消亡。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局长 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渝中区公安局局长彭长健、原经侦总队总队长赵利明、原市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的政府官员亦相继落网。

文强是自贺国强和汪洋任上表现突出的市政官员，却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行动的重点对象之一。文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长达 16 年，因一连串的罪名被审判和定罪，最终在引人注目的审判中被判死刑。中国观察员林和立认为，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可能已经得到包括总书记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批准，薄更加注重让重庆成为其他地区的榜样，好让自己从成功的政治领导中获益。

2010 年 2 月，重庆宣布将原本的交警、巡警合一，组建新的交巡警体制，以更好地维持治安环境。3 月，重庆市公安局进行机构改革：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同时大规模扩充警力，以“整肃警察干部队伍”。

截止 2010 年 5 月 1 日，重庆方面称，打黑行动已抓获涉黑涉恶人员 4781 人，14 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多名涉嫌腐败的警方人员、中共及政府官员落网，包括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杨天庆、谢才萍、张波张涛兄弟等的当时被认为是涉黑团伙的组织者被判刑。2009 年-2011 年间，大约有 5700 名在清扫行动被诱捕，包括商人、警察、法官、政府官员和薄的政敌。

2011 年 1 月 14 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补选王立军为重庆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5 月 27 日，王立军在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评注：薄熙来以“整肃警察干部队伍”，同时大规模扩充警力，外界称其为“大换血”。《时代杂志》将此次行动形容为“中国的 21 世纪大审判”。

重庆市公安局的资料显示，王立军任职重庆期间共处理 5600 名警察，这些民警有的被撤职、劳教、判刑等。

对打黑除恶最大的争议在于打黑后对犯罪嫌疑人审判的公正性问题，一些媒体如《南方周末》、《财经》、《三联生活周刊》都表达了这种忧虑。

薄熙来当局在行动中随意拘留个人，大约有 1000 人被送去劳改。有律师收到恐吓和骚扰，至少有一个律师在案件中被判 18 个月的有期徒刑。在逃商人李俊声称他成了薄熙来的反腐败行动的对象，因为他曾和政府有过土地纠纷。被绑架后受尽折磨、其产业中价值 700 万美元的财产被没收后，他放弃了向政府要地的要求。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庄案，作为一名“黑老大”龚刚模的辩护律师，他因“涉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证言、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被提起公诉，被判 18 个月有期徒刑。他宣称自己的当事人遭到警方的虐待，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认为他

是被当局迫害的。另一位律师朱明勇也证明龚本人遭到了酷刑逼供。最后他还公布了录像带详细描述他的当事人樊奇杭（2009年6月被逮捕）如何被折磨了半年。

王立军在职期间，有数百名重庆市公安局警察遭到黑打被以莫须有罪名扣上“黑社会保护伞”帽子打击；王立军倒台后，警方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中，有900名不同程度被错误处理的重庆警察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和工资待遇。其中王立军的秘书仅因顶嘴，即在没有任何司法手续的情况下被关300天，被吊起来用警棍打。

2009年11月12日，重庆人谢苏明在天涯论坛帖子《王立军说，对待困难群众要像对待亲人一样》中回帖“草，虚伪的政客，别个和xx公司老板是干亲家得嘛，干亲家（也许）有干股份撒。”后第二天被抓，劳教一年。

2010年，网络曝光赵本山起步时期曾是搞煤炭生意涉黑，以15万元人民币行贿王立军，王立军和赵本山给予否定绝无此事。2012年12月15日，网易、21CN等网络媒体曝光赵本山、小沈阳、王立军、雷政富等人在2010年的合照，被微博网友调侃和批评。

2011年4月22日，重庆涪陵区居民方洪于腾讯微博发信息：“勃起来窝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坨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坨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吃。”4月24日，方洪被重庆市公安局涪陵分局网监警察治安拘留。4月28日，重庆市劳教委以方洪“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决定对方洪劳教一年，此案被称为“一坨屎”劳教案，该案于薄熙来、王立军落马后被平反。

打黑期间至少没收数百亿人民币资产去向成谜，包括黎强案资产约10亿、陈明亮马当案约30亿、王能案约20亿、彭治民案约80亿、李俊案约60亿等，涉及资产近200亿元。

2008年5月30日，薄熙来前往幼儿园、小学视察，其间问到在场的学生会不会唱《歌唱祖国》，学生表示不会，薄熙来表现出了失望之情。视察结束后，薄熙来要求随行人员重视思想教育，“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2008年7月24日，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即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唱红歌活动正式开始。

主政重庆期间，薄推行一系列宣扬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重振“红色文化”，提升公众士气。活动要求宣传传颂毛主席语录、唱红色歌曲、播革命电视节目和歌剧，鼓励学生参照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工作。运动期间薄和市文化局发起“红歌活动”，要求每个区、政府部门、商业企业、教育机构、电台和电视台唱

“红歌”，赞美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薄表示要用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重振城市。

2008年8月起，重庆市的各党政机构、公有制企业、公立学校即开始组织红歌演唱活动，亦有市民自发组织红歌队在公共场合演唱，至2010年9月底已进行了14万场，共8400万人次参与，至2012年2月，共进行25.16万场，共1.82亿人次参与。

中共60周年国庆日前夕，薄向全市1300万手机用户发送“红色短信”。新华社报道，薄的短信一般来自毛泽东的红宝书，包括“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等。薄还让市政管理员建立新的毛泽东塑像，同时为底层人物提供社会保障住房。有学者将其称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中复苏的范例。

2011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奥体中心举行的（重庆）中华红歌会，来自全国的108个合唱团参与表演，全场演员及观众共计10万人，俗称“万人红歌会”，薄熙来和黄奇帆率领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出席，到访重庆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前来捧场。

2008年11月，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在重庆市开展经典阅读活动，读经典活动正式开始。2008年12月起，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西南大学共同编写，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读点经典》陆续发行，是为读经典活动指定书籍，薄熙来亲自为该书作序。

2009年4月28日，重庆市举办薄熙来亲自倡导的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启动仪式上薄熙来发出了大赛第一条红色短信，传箴言活动开始：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据统计至2011年1月，重庆共有400万独立用户参与传箴言活动，参与人次达2亿，短信转发量达2亿条。

对红色文化的反应两极分化。薄对毛时代文化的复兴和相伴而行的社会福利计划，受到重庆社会中下收入阶层的欢迎，使得薄成为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透过强调物质财富，薄把城市变成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遗产”而受到赞扬。一些退休干部极为受鼓舞，表示希望向后代传播“革命精神”，其他人则将它当作歌颂共产党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在贡献的手段。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批评者声称好像让人觉得文革回忆再次涌上心头。批评者讥讽薄是“小毛泽东”。

2009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电视调查栏目播出薄熙来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焦点报道，表达出对其明显无视法律程序的关切。对此，薄利用他的关系让该节目的

主持人暂停转播，导播被迫切换到另一节目。其他公开反对薄的行为也遭到报复。来自北京的律师李庄 2009 年因为薄的打黑目标抗辩而被判处 2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

2010 年 0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薄熙来等陪同下，观看重庆市“唱读讲传”汇报演出。李长春对合唱团说：“我们要推出一批适合儿童传唱的经典红歌，在全国的少年儿童中推广。希望在中央电视台上，能够看到我们谢家湾小学合唱队的表演！”李长春说，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唱读讲传”活动，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好载体。

11 至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来到重庆，在薄熙来、黄奇帆等的陪同下，深入社区、学校、工厂和基层政法单位调研。周永康仔细查看了打黑除恶资料：各个涉黑组织的犯罪证据，保护伞组织体系图，警方查获的各种犯罪工具及其赃款证物等。

周永康说，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打掉了一批涉黑犯罪团伙，侦破了一批积案，铲除了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纯洁了政法队伍，维护了社会稳定，这是一项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重庆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010 年 12 月 6 至 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来到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的陪同下，深入企业、学校、医院、社区，访民情、听民声。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充分肯定重庆市委市政府打黑除恶取得的成就。

评注：2011 年 4 月 6 日，完成改扩建的杨闇公烈士陵园正式向公众开放。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杨白冰等杨闇公烈士亲属代表，与潼南县 1000 余名干部群众一道，参加陵园开放仪式和清明祭扫活动。

这一活动是薄熙来精心策划、有针对性的红色感情投资。其父薄一波 2007 年已死，薄熙来在中南海失去了保护伞，以前的贪腐和枉法都留下了把柄，而对立面的习近平等早把他盯得死紧，如果不能于 18 大冲进常委，就难逃被整肃的可悲下场，所以，他竭尽全力寻找靠山和同盟者，而江泽民、李鹏、杨白冰等都是最佳人脉。所以他先把毛泽东的招牌扛在肩上，再于 2010 年 6 月，不惜重金修一座“死人墓”，启动了所谓的“杨闇公烈士陵园”改扩建工程，占地面积 50.5 亩，是原来的 4 倍大，成为重庆又一个红色教育基地。薄熙来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红色接班人”。

在开放仪式上，杨白冰代表杨闇公烈士亲属说，杨闇公是我尊敬的四哥，他一生信仰坚定，文武兼备，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忠肝义胆，正气浩然，是值得敬重的革命楷模。在他的影响下，杨家叔侄两辈、男女八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献上我们最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监事会主任蒋省三，市领导张轩、何事忠、马正其、范照兵、徐鸣、卢晓钟、谢小军，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等也参加了活动。

2011年11月14日，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客房。当时地方当局宣布其死因为饮酒过量，但他的家人表示尼尔并不嗜酒。正式死因并未仔细勘验，直至几个月后尼尔·海伍德确定为死于他杀，薄熙来牵涉其中。

评注：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于1935至1938年是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海伍德曾担任商业咨询顾问与中间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与薄熙来一家关系密切。

1990年代初，海伍德前往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之后，他与朋友在大连开了一家顾问咨询公司，以帮助外国公司进入与调研中国市场。在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期间，海伍德曾向其致信愿意帮助他吸引外资入大连，从而与薄建立联系。

海伍德曾任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的英语教师。他是薄家的长期助理，据称他跟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有过亲密关系，并帮助夫妻俩的儿子薄瓜瓜取得英国哈罗公学的学位。海伍德还涉嫌充当薄家的中间人，协助他们将大笔资金秘密转移到海外。

薄熙来2004年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后去了北京。海伍德也搬到了北京工作，他生前一直常住北京市郊莱蒙湖别墅。2007年他代表谷开来持有法国一栋豪华别墅的50%产权。

2011年10月，据报道尼尔·海伍德与薄妻谷开来有商务纠纷，尼尔要求为他的服务提供更高的佣金，否则公开薄家的业务往来和预计总额超过1.36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其子薄瓜瓜的人身安全。

根据2013年8月23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薄熙来时谷开来等提供的证言，海伍德与谷开来爆发矛盾源于2011年谷开来要求德某某和海伍德名下所持有的法国别墅所有权给徐明指定的姜丰。海伍德于2011年5月11

日提出希望得到补偿 140 万英镑，并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全部揭发”。

2011 年 11 月 12 日，王立军在与谷开来商议后，准备待海伍德到达重庆后，以其涉嫌毒品犯罪为由，安排对其实施监控。

11 月 13 日，海伍德在张晓军的陪同下被紧急召集前往重庆。在谷开来在场的情况下，海伍德在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一房间内被张晓军按倒强行灌入氰化物后死亡。

11 月 14 日中午，王立军前往谷开来的住所，谷向其讲述投毒杀害海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当时私下秘密对谈话录音，但其向谷开来保证善后，并让其忘记此事。王立军指派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处理案件，但未有告知其自己已掌握的案情细节。

案件发生后，谷开来继续采取一系列的毁灭证据行动，由于担忧知情面扩大，王立军逐渐不满。12 月 14 日，王立军因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参与活动，前往北京。当天谷开来命令郭维国进入王立军的办公室，强行搜查海伍德案的证据资料。还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搬到谷开来家 3 号楼。事后谷开来向王立军解释：“听说中纪委要查你，为你把东西搬出来，是保护你。”但是王立军不相信。

2011 年 12 月底，王立军身边的 4 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2012 年 1 月 28 日，王立军向薄熙来反映谷开来在案件中的重大嫌疑。第二天遭到薄熙来掌掴，当时郭维国亦在场。根据后来薄熙来庭审自辩，他扇王立军耳光是因为他发现了王立军与谷开来有不正常关系。2012 年 1 月 7 日，徐明飞重庆，来劝和谷开来与王立军和解，但是效果不大。

2 月 2 日，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工作分工被调整，不再兼任公安局局长职务，该调动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允许。不久，王立军身边的另外 3 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王立军开始考虑脱身办法。

2012 年 2 月初，王立军突然与英国外交人员联系，并与英国驻重庆总领事用电话预约会面，但是最终未赴约。2 月 6 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取消原定的公务安排，驾驶王鹏飞所提供车辆到成都，携带着指控薄熙来家族的文件于 14 时 31 分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有报导指，王立军情绪激动，语无伦次且思维混乱。其后，他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领馆工作人员立即与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取得联系，而骆家辉又马上同美国国务院高官联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决定拒绝向王立军提供庇护。此后美国官员

同中方进行联系，中方同意派出国安人员将王立军带回北京，而不是由重庆方面将其进行逮捕。

2月7日，王立军离开美国领事馆。有美国官员称中国国安部高级官员将王立军带出走出总领事馆的时候，与守候在外的重庆高官黄奇帆、陈存根、徐敬业等重庆市领导和市政府秘书长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重庆方面的官员希望将王立军交予他们，但最后王立军仍随国安部官员前往北京。

2012年2月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由此，“休假式治疗”一词在中国大陆网络窜红，也引起各方纷纷猜测王立军的真实动向。

评注：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后，忙中抽闲到云南视察属于成都军区的第14集团军军史陈列室，一时轰传海内外，成为薄熙来要搞兵变割据的一大罪证。

2012年2月8日，王立军事件爆发后的第3天，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带领重庆市代表团，去云南滇池“喂鸟”。

2月10日，薄熙来率团到考察云南，期间参观其父薄一波创建的第十四集团军军史陈列室。

香港《明报》报导分析说，14军的前身与薄熙来之父薄一波创办的山西“抗日决死旅”有关。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1总队（即山西新军），同年10月，扩编为决死第1纵队，鲁应麟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1979年对越作战，14军得其云南地利，作战时间最长，因战功卓著而涌现出来的高级将领颇多。除了现任总后勤部长廖锡龙上将，还有曾任北京军区司令的朱启上将，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前成都军区副司令兼西藏军区司令蒙进喜，前广州军区副司令兼驻港部队司令王继堂等都是14军成长起来的。

2012年薄熙来落马前曾到访该军，被视为拉拢之举。但据说该军军长周小周和政委黄集骧事先请示过中共中央，并按正常惯例接待薄，并无逾矩之处。但薄熙来此时造访便有“造反”嫌疑。

薄熙来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被控制。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免去解放军第38集团军军长王西欣的职务，由许林平少将接任。3月15日，与薄家关系密切的原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据称，徐明和人和商业集团的戴永革关系密切，徐明出事后其资产多落入戴永革手中，而戴永革“以地下服装商业地产”闻名，在陆港两地

黑白通吃，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连中共真正的组织部长曾庆红家族对他也礼让三分。

有消息称，3月19日周永康动用武警部队抢夺薄熙来案的重要证人徐明，新上任的许林平军长调遣驻守河北的第38集团军进入北京，与周永康的武警在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区对峙。军方称是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派来，武警要求军队立即撤退，威胁消灭“叛军”并警告性地对空开枪，但很快被军队制服。周永康控制的武警的行动被38军挫败后，在顾问和亲信围聚中的胡锦涛接到了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江泽民声称周永康没有政变动机，要胡锦涛不要听信海内外敌对势力的谣言，并要胡锦涛停止对薄熙来同党的清除行动，声称这样做对国家、对所有人没有好处。江泽民表示周永康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

胡温在任期的最后时间，打垮了薄熙来集团，为习近平顺利接班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一年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七常委领导集体亮相。但中国人越来越明白，这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暗箱操作的结果，是中共内部斗争、利益平衡、就地分赃的结果。

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2月11日，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访问重庆，对比前日哈珀在广州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会面时的情况，中国官方媒体选择以相对低调的方式报导了哈珀与薄熙来的会面，这现象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纷纷对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作出臆测。2月14日，薄熙来会见了访问重庆的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乐威。2月16日，重庆召开年度执法会议，薄熙来与市长黄奇帆双双缺席。

2012年两会，薄熙来没有与重庆代表团一同到达北京。会议期间，他依然继续宣扬重庆的管治经验。

纽约时报表示，3月7日的内部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均支持免除薄熙来职位的决定，但是该决定受到了另一常委周永康的抵制。在此之前，胡锦涛与温家宝与多名省部级领导、党内元老会面寻求支持免除薄熙来职位的决定，其中包括乔石、李瑞环、李鹏、江泽民和朱镕基。江泽民甚至称薄的问题已突破了人类文明的下划线。

3月9日是重庆代表团开放日，重庆代表团第一次与记者见面，记者会上薄熙来也第一次正面回答了王立军事件，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的采访时表示对王立军的“出走”自己完全没有想到，“非常突然”；“出了这个问题，我很痛心，我感觉我用人失察”，该反思；但强调“打黑英雄”的称号不是官方给的，而是

人民群众给的，人民群众有给称号的自由。当天，薄熙来在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上，称有人说其儿子薄瓜瓜开“红色法拉利”是“一派胡言”，并表示上哈佛大学的学费来源是“全额奖学金”。

2012年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就王立军事件进行反思并吸取教训。3月15日，即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评注：2012年3月18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携两名女伴驾驶法拉利跑车，行至北京保福寺桥东辅道时发生严重车祸，令谷当场死亡，两名女子身受重伤被送入医院抢救。

《南华早报》爆料称，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的中石油高官蒋洁敏将数以千万元计的金钱从中石油集团汇进两名受伤女子的家属银行账户，让其封口。而就在此前的二天（3月15日），发生了薄熙来被免职事件，令车祸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在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后的两天时间中，北京安全部队出现异动，也使得军事政变的传言在新浪微博等社区上流传。后来有报道称，是令计划出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车祸现场。亦有外国媒体称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四人组成了“新四人帮”，图谋透过政变等方式阻挠习近平、李克强接班，或经由人事安排将习近平拉下马并以自己人取而代之，最终失败。

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0月2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移交司法。11月7日，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薄熙来开除党籍。

2011年10月，中纪委就启动了对王立军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腐败问题的调查，并开始对王立军进行询问，薄熙来最初为王立军说好话并试图保护他。之后由于来自中央的压力，薄熙来立即转变。之后，王立军两次向中纪委举报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向海外转移巨款，第一次为匿名，第二次为实名。在举报中，王立军指责薄熙来在管理重庆的过程中试图抵制党中央的权威，其中包括对其他领导进行窃听活动。

数年来，在薄熙来的策划下，王立军与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重庆创建了一整套监视、监听系统。为了了解其他官员对自己的态度，薄熙来通过此系统

对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官进行了监听活动。其他监听活动还涉及胡锦涛与中纪委副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马、重庆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光磊间的通话。

据《纽约时报》报道，窃听行动不仅针对当地罪犯，还涉及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通信。消息人士表示薄熙来企图监控所有到访过重庆的中央领导人，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2011年8月，胡锦涛与纪委官员马之间的电话通话被薄窃听。据报载，薄熙来对胡锦涛的窃听活动触怒北京领导层，并引发中纪委的关注和调查。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可移交司法。同年11月7日，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薄熙来开除党籍。

2013年7月25日，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提起公诉。

庭审首日，济南市检起诉书称，薄熙来受贿金额为2,179万元，贪污金额达到500万元，数额巨大；薄熙来当庭对公诉人的受贿及贪污指控予以否认。

8月23日（庭审第二日），上午庭审期间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相关书证，播放了2013年8月10日询问证人薄谷开来同步录音录像，宣读了其妻子薄谷开来、法国人帕特里克·德维利耶等证人证言，播放了相关视听资料，证明谷开来用其收受徐明给予的购房资金，以231.86047万欧元在法国购买房产，薄熙来对此知情。

2013年8月24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进入第三天，法庭主要围绕公诉人指控的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进行调查。证人王正刚、王立军出庭作证证人王立军与薄熙来对质。在法庭上，坐在轮椅上的王立军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记得大约三分钟之内，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骂得差不多了，走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必须把此话收回去，谁是杀人犯？’他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是杀人犯吗？’。”画面中，王立军左手捂着耳朵说，“他后来一拳打过来，打到我的左耳朵，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

庭审第四日，法庭继续审理此案，薄熙来当庭称王立军“品质低劣”，表示他从未学过拳术。薄熙来承认自己处理相关问题有错误、有过失，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把责任都推到谷开来、吴文康等人身上。

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月23日，薄熙来提出上诉。10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薄熙来上诉。

10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评注：2012年9月1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叛逃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等罪名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王立军选择不上诉。

王立军在刑事科学方面也有所造诣，为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被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法医专家。

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代表“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在北京领取了其“车辆爆炸现场重建研究”和“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两个研究项目的资助者——中国共青团中央直属单位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颁发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

王立军在颁奖会上慷慨自述其进行死刑犯器官摘取、处理、移植研究的体会，并表达了对资助方光华基金会的感谢：“大家知道，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这些姑且不说，就是这次基金会的考察，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令我感动的，因为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里面有更多人艰苦的劳动，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是一家于1999年8月在中国大连注册成立的德资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人类尸体加工，通过解剖、脱水、切片定型等程序将人的尸体制成标本，尸体少量来自志愿者捐赠，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工厂”。

1999年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期间，哈根斯投资1500万美元成立哈根斯公司，隋鸿锦任总经理。2002年，该公司被大连市人民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003年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当时有647具尸体，每年从中国以外地区进口100多具尸体，制作至少40具人体塑化标本。

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后，当局迅速查封了大连市的人体标本厂。奥地利国家新闻社报导，薄熙来与掌管公安武警系统的中央政法委周永康主导了强摘囚犯器官系统与利益链。

谷开来是北京开来律师事务所注册律师。薄熙来案爆发后，记者姜维平向美国之音透露，谷开来至少拥有香港身份证和新加坡绿卡，在香港出席社交场合时以薄谷开来之名示人。

2012年4月，《亚洲周刊》报导，谷开来不但涉及伍德命案，还可能涉及大连市前副市长袁宪千女儿的死亡案，以及大连电视台女主持人张伟杰（据传她曾是薄熙来的情妇，目前已经失踪很久）失踪谜案。

谷开来案，在初步庭审之后，法庭宣判押后宣判。期间，曾经传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下指示要求判处谷开来死缓，并且要谨慎处理案件。

2012年8月20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关押于燕城监狱。

第四十二章 习王反腐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随即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执掌军权，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代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一次交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个最高权力位置“裸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评注：1953年6月15日，习近平出生于北京。当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已经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年幼时曾寄宿于北海幼儿园，逢年过节才回家。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牵涉“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而失去职位，且被监押到北京卫戍区。习家受到严重冲击并被抄家，因此习近平随母亲齐心迁居中共中央党校。

1966年12月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但因当时父亲习仲勋被打倒，习近平被归类为“黑帮子弟”，并没有很深地涉及联动的活动。后来，习近平被抓到中共中央党校集中观察审查，并被送往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

1968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属于被号召之列。次年，被下放到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习近平初期很不适应当地生活，“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年少的习“却很随意”，老百姓对他印象很不好，认为习近平是个游手好闲、不爱劳动的浪子。习近平才待几个月后，便因受不了苦，偷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听从姨夫魏震五的建议又回到延川县安驿公社梁家河。回到了梁家河后，习近平很快成为一名壮劳力，并以苦干、实干的精神赢得了农民的认同。

1974年，习近平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因为父亲习仲勋的问题，习近平的入团申请与入党申请屡次被驳回，在递交十余次后才被批准。此后，因突出的表现，习近平当选为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2003年11月10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时空》节目专访，回忆在梁家河插队的岁月时自称“我那时候扛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一时成为笑话。

1975年，习近平经由工农兵学员推荐制，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父亲习仲勋亦已经复出，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79年4月毕业之后，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其父好友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耿飚的三个秘书之一。

在父亲习仲勋的帮助下，1982年3月25日，习近平上任正定县委副书记。83年底，不足30岁的习近平升任并成为正定县最年轻的县委书记。1985年4月28日到5月9日，身为河北省玉米加工考察团团团长，并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食品协会主席的身份访问美国艾奥瓦州。

1985年6月15日，习近平32岁生日当天履新厦门市副市长。由于在副市长任内并没有什么政绩，并且名声不佳，习近平未通过厦门人大的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被调到宁德当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惩治官员腐败四百余人。

1990年6月21日，升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其任内兴建长乐国际机场、建造福州至厦门公路、开发马尾新港区、引进外资企业600多家，其中台资企业占五成。

199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1996年5月9日，习近平晋升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1999年8月9日，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2000年1月27日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协助中央处理朱镕基总理督办的厦门“远华案”。

习近平在福建差不多有18年时间，其中在福州居住了13年多。在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亲自提出了福州3820工程：要把福州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福建省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习近平认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缺乏一个大城市，而这个城市就是福州，因此提出口号要超越广州，上报国务院申请福州为副省级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

2002年10月12日，习近平转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11月21日，随着浙江省委原书记张德江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调任广东，习近平升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2003年1月22日，兼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深圳弘法寺本焕法师告诫习近平四个字：“忍登大位”。

2007年3月24日，习近平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习近平与李克强等一起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外界视两人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同年12月22日，习近平又从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手中，接过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2008年3月1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习近平为国家军委副主席。

2009年2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发表讲话时称：“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BBC中文网刊文反对此言论，BBC中文网认为，这种观点经由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口说出来未免有失一个大国的风范。

习近平的首任妻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柯华之女柯玲玲。二人于1979年结婚。结婚两三年后，柯玲玲想与习一同移民英国，但习坚拒前往，两人随即离婚，离婚时间在1982年习离京赴冀前夕。

1987年9月1日，习近平和歌唱家彭丽媛结婚。1992年女儿习明泽在福州出生。习近平进入中央之前，彭丽媛的知名度比丈夫更高。婚后习近平偷腥不改，他与彭丽媛就各玩各的，很快从感情夫妻变成政治夫妻。习近平让彭丽媛拜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为干妈，彭丽媛与江泽民的关系比宋祖英更密切，因而帮助习近平在政坛上步步高升。

习近平喜爱足球，曾是学校足球队成员。他也喜爱游泳和围棋，并将此作为日常休闲活动，有时还专门找好友聂卫平学下棋。习近平曾有吸烟的习惯。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演讲时引经据典，通过并列式长排比句念书单。知识是复杂的，智慧却是简单的；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2016年9月4日，习近平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G20峰会）开幕演说时，把先秦史籍《国语·晋语四》中的一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错读为“通商宽衣”，被戏称为“包子不读书。”

在担任浙江省副省长期间，习近平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以《农村市场化研究》为学位论文题目，获法学博士学位。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广受质疑。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对其学历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真实水平只有小学程度。香港作家锺祖康认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与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刘慧宇的博士论文有三处雷同，怀疑习的博士论文由刘代笔。

“习包子”源于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北京月坛北街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事件。“习大大”这一称呼始于习近平2014年9月9日视察北京师范大学之时一贵州教师给其起的称呼。2018年，习近平被评为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第一位。2017年7月16日，《金融时报》表示，北京在

该周周末禁止一切有关小熊维尼的照片出现在中国的任何社交媒体上;“小熊维尼”、“维尼熊”等亦成新禁语。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后发表讲话,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17日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2012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现场的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提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更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专家座谈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新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他表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013年5月4日发行的《经济学人》杂志曾以穿着龙袍、手持香槟的习近平作为其封面,并在内文说习近平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好像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接见马戛尔尼时所流露出的自大。

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北京月坛北街庆丰包子铺吃包子。中午12点20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的陪伴下,身穿深色风衣和西装,内穿一件黑毛衣,走进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习近平点了6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人民币21元。点餐后习近平自己端盘找到空位置坐下,并与周围群众解释说:“今天我们去外地调研晚了,所以顺道来这里吃中饭。”就餐的20分钟期间,习近平不断和旁边的店员及顾客交谈,边吃边笑着说:“包子很好吃,卫生也非常干净,一定要重视食品安全。”并与周围群众握手、合影。习近平将所有菜都吃完后坐面包车离开。虽然之后习近平的走访都使用群众演员和严格耗时的交通管制,但此次特地不设交通管制。

此举体现了习近平亲民的形象,也有新闻媒体表示,此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表演。部分媒体会以调侃的口吻用绰号“习包子”指代习近平。基于同样原因,习近平还有“庆丰帝”这一绰号。2013年底,习近平到访庆丰包子铺吃包子,部分人士

开始以“庆丰”指代习近平，网络盛传一个段子比喻“庆丰（清风）就是两袖清风”，附会习近平选择的餐馆、菜式和账单有其深入寓意，暗示习近平“反贪”的决心。

评注：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下放插队劳动2年，而同时习近平在离延安县冯庄公社康坪村65.8公里外的梁家河插队，两人自此结为好友；王岐山与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独子姚明伟是中学同学，王岐山得以结识相恋姚明伟大妹妹姚明珊。姚明珊随王岐山下乡插队2年，后结为夫妇。

1982年，姚依林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1982年王岐山被安排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一直都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于1986年9月出席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莫干山会议。

1988年，王岐山开始获得重用，先是被任命为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1993年6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4年，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97年底，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00年年底，王岐山回到中央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重用，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两年后，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海南工作仅五个月的王岐山，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

2007年10月22日，59岁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08年3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王岐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第二届温家宝政府中，主管金融和商贸工作，同时还负责质检、工商管理、海关、旅游等工作。

2012年11月15日，64岁的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并接替贺国强出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晋升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王岐山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职后，积极地处理贪污腐败。在2013年1月23日中共的“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之后的数个月内，其领导下的中纪委采取了“查办、约谈、巡视、抽查、信息公开”的一系列积极反腐措施，并要求官员在婚姻状况、出国等个人事宜出现变化时要及时报备。

王岐山上任五年内，共 440 位省部军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和苏荣等六位副国级以上的官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43 人、中央纪委委员 9 人，此外还有 8900 余名厅级高官。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王岐山在总结讲话中讲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意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

习近平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共中央八项规定”。该规定主旨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此一规定的提出，可以视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上台后掀起的“反腐风暴”的先声。

习近平掌权后的反腐行动迅速扩大，各地众多腐败窝案被集中查处，一大批包括现任及前任的正副国家级领导人在内的各级涉腐干部被查处、问责及判刑。同时实施中央巡视组、派驻纪检监察组等举措。

2012 年 12 月，1000 多名律师、学者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 205 名中共中央委员公布财产，该信件被转交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希望能在 2013 年人大会议上表决。

评注：2012 年 3 月 18 日凌晨 4 点，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一条因下雪而变得湿滑的环路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很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令计划儿子令谷驾驶的一辆法拉利跑车严重损坏，车上一男两女，男子当场死亡，两女重伤送医。

重伤的两名女子皆为 25 岁、藏族，其中扎西卓玛为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杨吉为著名活佛之女，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最后因严重烧伤而于 7-8 月之间去世。2012 年 9 月 3 日《纽约时报》报道，官员向该报记者，死者是令计划的儿子和两名美女，车祸时三人全为裸体。

《南华早报》爆料称，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的中石油高官蒋洁敏将数以千万元计的金钱从中石油集团汇进两名受伤女子的家属银行账户，让其封口。《环球时报》英文版第二天也报道。报导说，该

撞车事故令中国共产党感到难堪，中共对于有关党内高级官员的子女享有特权、过着奢华生活的外界看法很敏感。

因在薄熙来被免事件于 2 天前的 3 月 15 日发生，令车祸事件变得扑朔迷离。在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后的两天时间中，北京安全部队出现异动，也使得军事政变的传言在新浪微博等社区上流传。后来报道证实，是令计划出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车祸现场。

据太阳报、苹果日报、美国之音等媒体报道，令计划在任期间，善于运用爆料等手段，打击其他中共政治人物，包括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并制造冤案，迫害整垮了政绩和口碑颇佳的中共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此后令计划为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伙同周永康、郭伯雄、薄熙来等人结盟为朋党集团，该团伙意图通过政变推翻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并篡夺中共最高领导权，而这个政治团伙的核心，并不是周永康而是令计划，若这个团伙的政变阴谋得逞，令计划将在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取代习近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最终他们的政治阴谋因王立军事件而破产。亦有消息指同属团派的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了升任总理与令计划结盟，以“令李体制”取代“习李体制”。

令计划一度是 2012 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中获得晋升的热门人选。然而，他却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被调离中办主任职务，改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法国《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这一职务传统上排名较低，因此这一任命显然不是仕途的晋升，更像是被搁置一旁。一位退休的中共高官则说，法拉利车祸事件令中共中央领导层感到难堪，认为是重大丑闻，因此令计划不能得到晋升，即便是总书记胡锦涛也无能为力。《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是“令计划倒台的开端。果然，在十八大召开后，他未能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未能进入政治局的中办主任。

令计划于 2007 年建立的西山会是一个神秘组织，由山西籍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除官员外，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资格。西山会的会议地点位于北京西郊，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聚会期间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如果官员手握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则可以有机升职机会。西山会的部分主要人物丁书苗、刘铁男、金道铭等在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后被捕入狱。

2014年12月22日20时，中共中央纪委发布通报称，根据中共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对令计划立案审查。

2015年7月20日22时，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评注：1998年3月的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在原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土资源部，周永康被任命为首任部长，结束了32年的石油行业生涯。

周永康在从政道路上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被认为是“上海帮”的重要成员。江泽民为了在退休后继续掌握实权，除了安排亲信周永康控驭公安系统外，同时安排由喜贵执掌中央警卫局，安排郭伯雄和贾廷安控制军队。由此胡温政权时期的武装力量尽在江系的掌控之中。

2007年10月22日，64岁的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进入最高领导层，接替退休的罗干，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2011年周永康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权力人物排行榜》，被认为是中国除胡温以外最有实权的领导人之一。

2012年8月29日，中国高层协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得入常，使政治局常委人数恢复为2002年十六大以前的7人，旨在削弱政法委系统的权力。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正式决定，政治局常委缩减为7人，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入常。11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不再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2015年1月15日，据信与北京官方联系密切的香港媒体《凤凰周刊》在其第531期《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中报道称，周永康曾在重庆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谈话主要内容是彻底否定前中共核心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报道还指，周、薄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表示要“大干一场”。而周亦在回北京后对亲信表示应该利用薄熙来这样的人来完成“大事”。报道评论称，此一行为严重违反中共党章，或是对周违反政治纪律指控的原因之一。

2015年4月20日，彭博社援引熟悉周永康案调查的人士的话称，对周的调查发现，周曾经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通过电话监听和其它方法秘密

搜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庭财产、私生活和政治立场等信息。

法新社报导，周永康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任内以强硬派建立“声誉”，包括强硬执行打击被查禁的“法轮功精神运动”，法新社引述法轮功的支持者说法“周永康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自己的升迁之路’”。

2015年3月上旬，中国外科医师、曾揭露当局掩盖 SARS 的解放军少将蒋彦永在向香港媒体揭露解放军在徐才厚主政任内的腐败内幕时，称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还与周永康治下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所掌控的政法机关相勾结“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就会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周永康家祖墓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西前头村以北数百米外。1995年左右，厚桥镇政府派人为周家扩坟，周家填了祖墓旁一个水塘，以为水塘主人家里装自来水作为补偿。周永康职位显赫以后，大量非亲属的政府官员前来扫墓。

周永康与原配王淑华在1997年离婚。两年后的1999年，王淑华和石油勘探学院其他教职工一起，到十三陵附近的石油疗养院开会，会议休息期间王淑华外出散步被军车撞死。其后不久周迎娶小他28岁的中国央视女主播贾晓晔。此事引发外界怀疑，包括其手下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可能曾策划杀死王淑华，周永康本人设计杀害等。事件据称也让二儿子周涵坚信周永康是杀母的幕后黑手，与周永康断绝关系，甚至阻止其探望孙子。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用知情人士透露，周永康早在1988年至1998年在中石油任职副总经理和总经理时期，他强烈的性欲赢得“百鸡王”的外号。周其后晋升中央领导层后，薄熙来和王立军频频向他提供美女，包括歌手、女演员、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的女生。为方便淫乐，周在北京等地有六处行宫。

2014年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女主播叶迎春、前任女主播沈冰因涉周永康案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两名央视女主播“被认为是周永康的情妇”。

2014年3月2日，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向发言人吕新华提问外界关于周永康的传闻，吕答道：“我和你一样，从个别媒体上得到了一些信息……我们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职位有多高，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的追查和严厉的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随后全场大笑。

2014年12月6日凌晨0点整，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宣布周永康被开除中共党籍。消息指，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日，周永康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

2014年6月30日，中共正式宣布将徐才厚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并承认在同年3月双规徐才厚的消息属实。多家海外媒体在2013年12月底报导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涉嫌贪腐被双规。徐才厚是继中共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后，又一个被双规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涉及贪腐案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香港经济日报》称徐才厚是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一手提拔，也是江泽民在军中最为信赖、最得力的人；被外界视为江泽民的“军中最爱”，在军中买官卖官、影响力大。其落马震惊各界。

2014年3月20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3月15日有数十名武警将在病床上的徐带走。当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豪宅进行查抄，在这座2000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中，查抄的现金足足有1吨多重，而徐宅内各种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包括上百公斤的和田玉。由于财物堆积如山，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

同一天，《苹果日报》报导，22岁女子赵丹娜利用在香港多家银行的八个账户替徐才厚家族的100亿港元洗钱被查，2014年初赵丹娜在徐才厚女儿协助下弃3,000万港元保释金潜逃。

徐才厚的名言之一“解放军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徐还曾对另一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说：“让他（指习近平）干5年就滚蛋！”徐才厚亦被亲法轮功媒体指是执行江泽民意志，镇压、活摘法轮功等犯人器官的主要责任人，由其控制的总后勤部协调并执行。《解放军报》以“国妖”、“叛徒”重批徐才厚政治投机主义两面人，善于表演、伪装，“用假面具掩盖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行为。”

2015年3月18日，《解放军报》发文《徐才厚对官兵“三观”造成极大毁伤》，称“徐才厚曾长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对军队建设的损害绝不是一般的局部的，而是带有全局性的源头污染。可以说，徐才厚在我军最高层的10年来，把部队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规矩搞没了，对党和军队形象、对官兵“三观”造成极大毁伤。”

2015年3月15日，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终年71岁。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

评注：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演员汤灿被誉为中国民歌女歌手“四小民旦”之一，号称“军中妖姬”、解放军头号公共情妇，涉嫌性贿赂解放军高级将领。

2011年12月底，传出汤灿因涉贪腐、性贿赂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后，她就再也没有露面，但有关其消息则不断曝光。比如她的豪宅和珠宝、奢华和糜烂的生活，与周永康、薄熙来等有染等。

周永康被剥夺中国共产党党籍后的2014年12月8日，多家香港媒体对汤灿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根据这些报道，汤灿犯有间谍罪，为了达到获取机密信息的目的而与多名高官通奸。汤灿过去在美国学习声乐时被间谍机构发展为美国间谍。而后则利用民歌歌手身份作为掩护当上多名高官的公共情妇，并将获取到的军事、经济等机密信息秘密送往西方国家。另外，汤灿还将中南海内部的具体结构等做成地图，但在外传之前其人便被抓获。

2015年4月2日台湾苹果日报报导，《博讯》杂志4月号披露，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军旅女歌手汤灿被证实患上艾滋病。

2016年6月，腾讯网“探针”专栏刊文，据接近湖北某女子监狱人士透漏，汤灿因涉嫌经济犯罪，以化名“邹艳”被关押在湖北咸宁女子监狱，并已于当年年初出狱，之后去向不明。

2016年7月6日，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在国防大学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七一”讲话理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称，徐才厚在弥留之际说了两句话，一是“郭伯雄的问题比我严重得多”；二是“大区正职的将领中，没有给他送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他还称，“谷俊山给徐才厚献了女歌星、献了女演员、献了女服务员，这还不算，他居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徐才厚。更令我感到‘敬佩’的是，徐才厚和他女儿在里面巫山云雨的时候，谷俊山就坐在外屋坐着。这是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啊！我曾开玩笑说：王进喜是什么铁人呀，谷俊山才是铁人呢！我曾经讲过：目前在中国，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共产党内。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军队。我看八九不离十。”

2015年7月30日晚10点左右，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突然刊登消息，宣布郭伯雄涉嫌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郭伯雄的党籍，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郭伯雄曾获得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提拔，与徐才厚同为江在军中的重要亲信。香港报章《南华早报》2015年3月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称，徐才厚和郭伯雄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卸任后继续施展决策影响的代理人，架空而使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陷入孤立。

2016年3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出席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时强调：“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响。”

2017年8月7日，张阳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抵达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8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对张阳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题线索。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家中自缢死亡，终年66岁。他是1990年代以来，首个在职接受组织调查的中央军委委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个被证实自杀身亡的上将。

2017年8月21日，房峰辉上将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在八一大楼会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素拉蓬，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房峰辉的落马据信与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有关。10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房峰辉处理决定》，强调坚决拥护中央正确决定，严厉批评房峰辉，指对他进行依法处理，是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和徐才厚流毒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7月，调升北京军区司令员，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中年龄最小的司令员。曾在2009年国庆阅兵中担任总指挥，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部队。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时，房峰辉被指大发横财，卖出不少军产地皮，其中292医院的地皮就卖出47亿。

习近平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以反腐败的名义，清洗了军队中大量的高级将领。2016年，习近平推动军队改革，改变了解放军的负责和指挥结构，在对手势力被清除后，军队最高指挥权被习近平个人掌握。

习近平又在党内设立多个领导小组，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习近平将经济决策从政府（国务院）手中收归于共产党，自己对关键经济政策进行最终拍板。其权力不断集中。在2016年10月举行完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表述标志着“习核心”的出炉。

2012年11月20日，新浪微博上开始流传男主角疑似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截图和举报材料，称其包养二奶的言传并经由媒体转载报道。雷政富对媒体回应时称不雅视频是造假的。当天，雷政富打电话给爆料人朱瑞峰，希望能解决此问题，

遭到朱的拒绝。11月21日，中共重庆市纪委表示注意到有关不雅视频内容。11月22日，中共重庆市纪委确认该视频截图并非作假，并将核实视频主角身份。11月23日，中共重庆市纪委表示不雅视频主角确系雷政富本人，同时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对雷政富免职并立案调查。当天，举报材料爆料者纪许光受重庆市纪委之邀，前往重庆配合调查，后因担心接待、安全等问题返回北京。11月23日，朱瑞峰称，雷政富不雅视频等贪腐证据的提供者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干警。雷政富执政期间，曾多次在党风廉政、反腐倡廉的会议上发表言论。在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后，媒体对其自任中共垫江县委书记、北碚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至区委书记时曾经发表过的反腐语录进行了总结与讽刺。2012年的杭州公务员考试中，将雷政富事件纳入考题内容。

2013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李东生为官处事以“一脸正气，两袖清风”的形象为标准，但被外媒称为“中南海最大皮条客”。而明镜新闻报道“李东生靠投机取巧溜须拍马一路升迁，仅向周永康就‘贡献’出数位央视美女，并变成周的死忠爪牙”。

2014年4月29日，原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成都市官员申勇实名向刘奇葆、李源潮举报李春城，没有回应，李春城反而带病提拔，这件事受到中共中央的追查。据称，最初被带走的理由是李春城与多名官员聚众淫乱。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2年，李春城利用其担任成都市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市长、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3979万余元。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李春城在担任成都市市长、成都市委书记期间，违规为特定关系人在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造成公共财产损失5亿7282万余元。

2014年6月26日，万庆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议上强调，“自我批评，要怕不辣，互相批评，要不怕辣。”第二天，他在参加省政府会议时被调查人员带走，原定的调研广州大学计划被取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宣布万庆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月30日，万庆良被免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职务。万庆良在广东官场素以喜欢大拆大建而“闻名”。在其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广州一系列新城的规划在调整后相继公布，包括金融城、医药城、教育城、生态城等16个新城。这一系列规划遭到了诸多人士批评。据媒体报道，中共广东省纪委在查办原中共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案时，发现陈有情妇并育有一子。在询问该涉案女子时，其最终供出与万庆良亦秘密育有一子。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透过官方网站宣布，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财经》发表的《刘汉朋友圈》一文，白恩培与刘汉关系密切。也有媒体曝出白恩培与2014年7月受处分的原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过从甚密。据媒体披露，2001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在调任中央前，曾致电白恩培照顾其子周滨公司旗下的矿产生意。2015年1月13日，中纪委发布信息，白恩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白恩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据港媒《明报》报导，在2015年3月4日的全国政协侨联小组会上，香港宣威集团董事长浦江在谈到白恩培时说：“（白恩培）家中查到37个亿呀，外面才报一、两个亿！”

评注：烂！烂！烂！烂透了！大贪官查小贪官，烂到了根里，这就是中共。

中共反腐挖出来的贪官，一个县级的、处级的官员，他贪污的那个钱，都是上亿、十几亿、上百亿的，房子都是几十套、上百套，车和现金，都在地下室一堆一堆的，那个点钞机都烧坏了。而且这种事情不是个别的，已经是非常多见。

中共查出来的贪官，本来是十亿、百亿的赃款，但最后确认报道出来的只有几千万，一两个亿，只是个零头。贪官认罪时少报可以免死罪；缴获的赃款被更大的贪官拿走了，“神不知鬼不知”。其实，哪些赃款哪里去了？不用想也能明白，中共还有王岐山等“盗国贼”级别的更大贪官。

中共罚没贪官的万亿、十万亿、百万亿财富，无数的珍宝财物，从来就没有向中国百姓交代过其去向。其实，它们大部分都以各种形式进了中共权贵家族的私人腰包。愚昧的中国人都被瞒在鼓里。

肖建华只是中共权贵贪腐的代持者之一。据多家媒体报导，2017年1月27日，肖建华被不明人士从其所在的香港四季酒店带走，并被押解回内地，关押在北京配合调查。肖建华的明天系一度控股、参股6家上市公司、6家商业银行、6家证券公司以及浙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多家公司，旗下关联公司有数十家之多。2009年有业内人士估计，如果这些公司都成功上市，肖建华的资产将达上千亿元人民币。他的巨额财富被认为是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密切相关，此人是曾伟巨额财富的前台操作者。

2020年10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该事件引发外界对王岐山地位的猜测。2000

年以后，董宏跟随王岐山至多地任职，曾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产业司司长、中共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被视为是王岐山的“大秘”、“大管家”。起诉书首次提到了董宏除中央巡视组组长以外的其他职务。

2014年11月28日，中纪委通报，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报道，“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

2015年1月4日下午，正在主持中共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的杨卫泽会中接到电话，被通知去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会议中途休会，杨卫泽赶往江苏省委。杨卫泽在江苏省委处所内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后被摁住。杨卫泽和季建业作为南京市党、政一把手时，两人间的矛盾近乎公开。矛盾高潮出现在季建业落马前夕，杨卫泽对于季建业主导的“雨污分流工程”进行公开批评。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杨卫泽反复三次打回季建业就雨污分流工程所做的自我剖析报告。在季建业受调查后次日，杨卫泽公开指斥季建业主导的雨污分流工程“劳民伤财”、“搞花架子”。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客户端发消息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2005年宿迁开始招聘网络评论员，就时政热点引导舆论。宿迁是较早招聘网络评论员的城市，而仇和则被部分网民讥讽为“五毛之父”。他在宿迁市委书记任内曾发出过《限桌令》，限制市内居民的婚宴不能超过8桌，党员更只可摆5桌，否则，就会被罚款。而且，他更声言“欢迎举报”，而有党员就因为违规而被罚款。事件引起了“行政干预私生活”的讨论。

2015年7月24日上午，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本顺率领河北省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会议，有报道称，会后周本顺被中共中央纪委的调查人员带离接受调查。当日上午出刊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还刊登了周本顺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调研的消息。2015年7月24日下午18时10分，中共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指周本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周本顺成为中共十八大以后被查的首位在职中共省委书记，也是周永康秘书中最后落马的一人。

2015年8月，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奚晓明因涉嫌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奚晓明的妻子吴建伟和儿子奚众也被带走调查，办案部门在其儿子家中抄出三亿现金。

2014年3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天津市进行两个月的巡视，由时任安徽省政协主席王明方任组长。在巡视反馈11天后的2014年7月20日中午，中纪委发布公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3月，天津政法系统通报，武长顺涉案金额人民币74亿多元，天津公安系统给武长顺行贿者23名；武长顺本人贪污4亿多元，卖官收入8400万元，行贿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收受礼金33万元，违反财经纪律涉及15亿元，其中4亿元为违规发放。武长顺家人名下有70余家企业，有连带关系公司40余家。武长顺采取查案、抓人等打压竞争企业。四名公安系统女性为其生育私生子女。孟建柱表示，武长顺白天当公安局长，晚上当董事长。

评注：2015年8月12日23点34分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串爆炸。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大爆炸引起了全球关注。

2011年，时任天津公安消防总队政委徐豪元曾多次批评天津港存在的火灾安全隐患，并要求推动整改，但遭到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阻挠。

最初火灾发生于8月12日22时51分46秒，最初起火部位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运抵区南侧集装箱区的中部。事故当晚22时52分，天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物流危化品堆垛发生火灾，消防大队紧急赶赴现场。23时30分左右，火场发生两次强烈爆炸。国务院事故调查报告称第二次爆炸当量为430吨TNT。“天津塘沽、滨海等，以及河北河间、肃宁、晋州、藁城等地均有震感。”爆炸当时扬起烟尘高达数十米，造成12名消防官兵牺牲，36名消防官兵失联。现场灭火的30辆消防车在事故中全部损毁。

爆炸炸出一个大坑，150米范围内的建筑尽被摧毁，大量普通集装箱和罐式集装箱被掀翻、解体、炸飞，爆炸点附近3千米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个居民小区，房屋受损的一共17531户。由于爆炸中心临近进口汽车仓储地，造成12,428辆商品汽车在爆炸中被毁。事故现场有危险化学品40多种，总数约为3000吨。8月28日，爆炸点周边空气内检出甲硫醇超标30倍。8月16日，天津市出现爆炸事件后首次降雨，有消息称被雨水沾到的皮肤有灼烧感、关节处热痒，大量鱼类缺氧而死。间接损失不可估量。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结果，调查组另对123名责任人员提出了处理意见，建议对74名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省部级5人（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天津市人民政府

党组成员、副市长孙文魁，天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何树山，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何建中，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鲁培军），厅局级 22 人，县处级 22 人，科级及其他 25 人。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司法部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大老虎”。2017 年 5 月 26 日被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违法问题和线索移交司法机关，经查他的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中央纪委处分通报中首次用到了“金钱开道”、“亦官亦商”等措辞，指其从私营企业主一路以买官的方式晋升为副部级干部，并以手中权力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2017 年 7 月 24 日傍晚六时，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由于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立案审查，成为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调查的在任中央政治局委员。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与同龄的胡春华一同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1 月 20 日，接替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纽约时报》分析指，如果胡春华和孙政才在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后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么他们将在 2022 年竞争党内的两个最高职务，赢得这两个职务意味着，他们会被委以两个党政的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主任令计划与同样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中共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涉嫌违纪遭查后，传媒报道称二人妻子均参与了民生银行的“高官夫人俱乐部”。有传媒报道指孙政才妻子胡颖也在民生银行有兼职，与令妻谷丽萍、苏妻于丽芳都是该“俱乐部”的核心成员。

2017 年 11 月 21 日晚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纽约时报中文网称鲁炜为“中国互联网的守门人”。2015 年 4 月，因被称为“有权决定亿万网民看什么”，鲁炜入选《时代周刊》2015 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公告以不同寻常的严厉措辞称“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

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2013年7月，新华社记者周方以《人奶原来是道“菜”！？》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文章，称当时宣传口一副部级高官在北京会所色情哺乳，即在裸体少妇身上吃人奶，且不止一次参加类似的宴会，自由时报、法广、NOWnews 今日新闻称该副部级高官为鲁炜。

评注：湖南长沙一家餐馆推出中国第一桌“人乳宴”，所谓“人乳宴”是指以哺乳期妇女的乳汁为原料制作的菜肴。

根据餐馆老板的说法，他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创新开发了60多道“人奶菜肴”，他们的人奶来自哺乳期女性。经过严格的筛选，他们将健康的奶用于菜肴。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桌“人奶宴”价格为28万元，太令人震惊了！

2013年7月，新华社记者周方在网上发表文章《人奶原来是道“菜”！？》，指有宣传部门现任正部级高官，当年还是副部级时曾参加一位大老板在北京高级会所的宴会，不仅跟着享用人奶，而且还做了“很过分的事”。

文章披露，人奶是作为宴会的一道菜上来的。每位客人身边都来了一位全裸的美艳少妇，请客的大老板说：“大家请随意，想喝奶请喝奶，想‘吃人’就‘吃人’。”在座者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全心全意对付这道“菜”。

2014年7月底，作家铁流发表文章，点名批评原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仗后台支持，公然设置障碍，阻挠反腐。9月13日，警察突袭了铁流在北京的家，铁流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捕，被判入狱四年。

2014年9月15日，网上署名庄丰的文章《挺铁流！吁习近平尽快处理“淫棍”刘云山》指，有人举报刘云山曾在北京高级会所的富商宴会，当众吃美女的人奶。据曾把刘云山当后台的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交代，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

2013年3月30日至4月2日，第四届海天盛筵活动在海南三亚举办，共吸引了近万名全球高端圈层客户参加，近200人是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四天活动期间，展区客流量超过20000人，总订单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4月3日下午，一个名叫

曹思阳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布多张照片，并在对话内容中透露三亚海天盛筵涉嫌淫乱。图片显示，现场满地卫生纸，安全套散落。之后有网友爆料牵涉其中的有徐峥、孙兴、杨子等明星，许多富豪名流、嫩模及其他娱乐明星也被牵涉其中，因而引起轩然大波。在海天盛筵事件被曝光之后，有知情人称，此次参与淫乱派對的嫩模陪睡有明码标价，且有许多明星涉入。新华社甚至指出，在2012年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力推中国梦执政理念之时，海天盛筵却演绎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极乐梦”。

2016年2月4日晚十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称，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据媒体报道称，2014年2月，东莞掀起扫黄运动，即与有关部门从外围着手调查刘志庚在东莞的违纪违法行为有关。在刘志庚任职期间，东莞被称为“性都”，被指是东莞色情产业的“保护伞”。当时东莞的色情服务行业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阶梯化经营，吸引着港澳和全国各地的男性争先恐后的前来买春。

评注：2011年6月，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炫富，其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郭美美“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高调炫富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

8月3日郭美美母女接受了郎咸平独家专访。在采访中，郭美美称中红博爱的王军是“干爸”。其在网上炫耀的豪车，一部玛莎拉蒂是王军送的，另一部Mini-cooper是其母亲送给她的18岁生日礼物。

郭美美事件令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受到社会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调查小组进驻商红会查账和调查。事发一个月后的2011年8月，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慈善捐款锐减、信誉受到质疑。北京、山东、广东等地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均称，募捐工作受到了影响。有报道称，郭美美事件加剧北京市“血荒”，无偿献血人数降低。新周刊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5%的网友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谈，仅2%的网友表示会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2013年4月25日，网爆郭美美的声明“敢动我一根毫毛，我立即公布红会很多不为人知的贪污内幕。”

2014年4月，郭美美被爆出在澳门赌博欠下两亿六千万元赌债。7月14日，郭美美等人因涉嫌赌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依法刑事拘留。7

月 28 日，网传郭美美的干爹王军也被警方带走。郭美美在狱中向警方供认，她签约南方某演艺公司参与商业演出活动和从事卖淫活动。

8 月 4 日，新闻称郭美美承认参与赌博活动、从事性交易、发布虚假信息。她称自己因虚荣心犯下大错，并对因此而造成红十字会声誉受损致。在郭美美被抓捕的消息传出后，新浪微博已经将郭美美一词列入敏感词列表。

2014 年 8 月 6 日，参考消息转外媒报道，称郭美美被看作是中国最厚颜无耻的“职业情妇”。新民网评论说，“贪念太炽而又不以低调为美德，有时看起来差点毁了谁谁谁，实际上到头来只不过是毁了自己而已。”

此时，中共贪官的子女和“富二代”在海外炫富，开豪车、炒房地产住大别墅、开大派对和“买买买”的新闻连续不断，丑闻也时有出现，不仅毒化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并且使得西方人十分反感，加深其排华心理。

2014 年 1 月，中纪委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到年底，公安部部署执行猎狐行动，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澳门）人员。根据新闻媒体 2014 年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逃贪官数量介于 4000 到 18000 人之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贪官隐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并且出现了中国特色的“贪官腐败子女村”。

2014 年 1 月 7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称：“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014 年 12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消息称，“猎狐 2014”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即行动开始后 135 天）已从 60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 428 名，其中 231 名为主动投案自首。这 428 名外逃经济犯罪人中，涉案金额千万以上的共有 141 名；逃往境外超过 10 年以上的共有 32 名。共有 231 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为主动投案自首，占全部缉捕数的 54%；其中，四部门联合通告发布以后投案自首的 173 名。2015 年 1 月 1 日，猎狐行动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宣布从 69 个国家和地区逮捕了 680 人。

2015 年 3 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会议在北京市召开，会议部署追逃追赃任务，同时决定启动“天网”行动。这是一个逮捕外逃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政府官员的反腐败追逃追赃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追逃追赃。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掌控贪官转移资金；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清查贪官护照。

2015年3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大使馆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联合缉捕工作组把躲避在老挝的贪官原天津市国家税务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原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缉捕归案，首战告捷。

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百名红色通缉令”，追捕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

2016年11月10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18年10月5日，孟宏伟妻子高歌向法国警方报案称丈夫于9月底前往中国后失踪。10月7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通报中称孟宏伟“毫无党性原则，毫无组织观念，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特权思想极其严重，公权私用，滥权妄为，肆意挥霍国家资财满足家庭奢靡生活；家风败坏，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利用其职权搞特殊、谋私利”。

2015年8月，奥巴马政府警告北京政府，指中国政府的特工正在美国各地秘密行动，以迫使侨民回中国，其中有许多人表面上是在因腐败指控而通缉。美国官员表示，中国特工利用各种强硬手段诱使逃犯返回，而这些特工不是从正规渠道在美国从事公认的政府业务，而是使用旅游或贸易签证，其中包括对目标的家庭成员进行威胁和骚扰。

新华社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铁腕惩治腐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夯实制度体系，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推动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在中国内地民间的舆论场上，绝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绩给予肯定态度。2015年3月4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拿着自拍“神器”与王岐山互动说：“王书记我想发言。我在这儿吧，没事。特别高兴见到王书记，我刚刚见到您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紧张，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您还紧张，我是希望所有的有事的人见到您都紧张。这是老百姓的想法”。王岐山笑答：“今天你不是把扩音器打开了吗？你还拿着自拍这个，《东方眼》吓人哪，你到时候把我这个讲话出去了，就是你（播出去的）。”

2012年6月，彭博社曝光了习近平家族拥有超过3亿美元的资产。2014年1月和2016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布报告，从泄露出来的文件透露中国多个高官亲属设离岸公司隐藏巨额财富，报告中参与者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其

中 2016 年泄露的巴拿马文件显示，邓家贵于 2009 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两间空壳公司，邓家贵是空壳公司唯一董事与股东，用途不明。

2018 年 10 月，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拥有价值 6 亿港元的物业，其中包括习近平外甥女张燕南拥有的浅水湾丽景道 4 至 10 号逍遥居独立屋。

2015 年 11 月，在《纽约时报》披露习近平家族曾持有万达集团的股份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公开课承认，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她的丈夫邓家贵曾经持有万达集团的股份，但在万达公司 IPO 的两个月前已经出售了其所持有的股份。根据《纽约时报》报道，齐桥桥和邓家贵是在 2013 年 10 月把控股公司的所有权转给了徐再生。王健林称习近平家族持有股份和腐败无关，他们在上市之前卖掉股份，失去大赚的机会，是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表现。据查证，齐桥桥和邓家贵是把股权转让给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徐再生，徐再生与齐桥桥和邓家贵一同工作 13 年，因此美国之音推测徐再生是为齐桥桥和邓家贵代为持股的‘白手套’。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总结 2014 年的反贪工作指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3664 件，同比上升 42%。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4040 人，同比上升 40.7%，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 589 人。以对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理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姚木根等 28 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针对惠民资金和涉农补贴申报审核、管理发放环节“雁过拔毛”、“跑冒滴漏”等问题，深入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查办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扶贫救灾、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三农”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 9913 人，查处了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等“小官巨贪。”中共无耻地将腐败治国当作政府工作的成果。

评说：中共为什么越反腐，腐败越严重？因为中共是腐败的总根源。中共以恶政制造腐败，又以恶法惩治腐败，恶上加恶，其目的只有一个：维护独裁统治。习王反腐，五年内抓了数百万贪官，不但使数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牵涉数以千万计的人际关系以及财产纷争，使人心变坏，使人性向善，其社会危害和恶劣影响难以估量。

据中纪委办案人员透露，在办案过程中，如何处理贪腐的赃款完全是黑吃黑的过程。比如某贪官贪污 10 个亿、100 个亿，最后核定公布的可能只是一个亿或几千万，而其中的 80-90%以上的赃款都进了江泽民、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等家族或主要办案官员的私人腰包，处理过程完全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过程。在中共这个绞肉机里，腐败

家族之间既互相利用，又相互绞杀，连中办主任栗战书这样位置的人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像杨澜、宋祖英等明星也只是他们互相玩弄的性工具而已。所谓反腐，都是演戏、互掐，跟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丝毫关系。所有中纪委办案的官员自身都是糊涂蛋和习王孟曾等家族的被利用品或牺牲品而已，最终他们也是这些腐败家族和这个邪恶制度的刀下鬼，这就是为什么像董宏这样的王岐山大秘、中央反贪巡视组组长的中纪委高官，最终也进了监狱。因为办案人员也是知情者，他们知道的太多了，最后必然也会被灭口。

一百年前，孙中山面对腐败的清王朝和北洋政府，向国人痛斥道：这样的腐败政府，我们不推翻它、消灭它，还留它做什么！今天，我们面对更加腐败的中共政府，我们不推翻它、消灭它，还留它做什么！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岐山等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行动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政治运动，一方面因其“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而广受质疑；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共无官不贪、习王自身就是最大贪官的真相。

第四十三章 习近平倒行逆施

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以所谓的全票连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开始第二个任期。

评注：习近平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就职讲话上表示：“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同月 29 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并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3 年 1 月 4 日，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2013 年 1 月，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发布献词，原名《中国梦，宪政梦》，但随后有部分《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声称，在发布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压力下删改，至发布时出现多个常识性错误，引发《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抗议，进而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国梦”是习近平自己的梦，与中国人实际上是无关的。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宣布“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0 年 10 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宣布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完全是谎言和中共假大空的真实表现。

2015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英国伦敦演讲时提到“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还有 7000 万人没有脱贫。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 2 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提出继续减贫的计划。2015 年 10 月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2020 年 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学者提问的过程中提到，中国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低于 1000 元。这组数据如一声惊雷，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李克强有意无意间讲了真话。

2016 年，甘肃农村妇女杨改兰 8 月底用斧子将自己的 4 个年幼子女砍死后，服毒自杀。事发后 8 天后，杨改兰在外打工的丈夫李某英也在本村树林服毒身亡。据报，杨改兰一家六口依靠丈夫外出务工的三、四千元收

入生存。而当地官员根据硬性规定于三年前取消了他们的低保资格，因为低保资格标准是年收入两千三百元。中国经过多年的超速经济增长，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和富裕家庭，但处于天平另一端的贫困人口也在激增。根据联合国的数字，中国仍有约 5 亿人口处于贫困状况。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更令人担忧。中国有无数个“杨改兰”。

中共独裁近百年，中国早已道德尽丧，没有了人性和天良，人民连真话都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哪里还有什么“中国梦”呢？

小悦悦事件发生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 17 时 25 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2 岁女童王悦在阴雨天黑夜独自跑出家门百米外后，先后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 18 名行人未及时施救，惟第 19 名路人陈贤妹（本地清洁工）救起王悦，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无效而亡。这次事件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冷漠、折射出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路人的无情和冷血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已经荡然无存。中国有无数个“小悦悦”式的悲剧。

2006 年 11 月 20 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彭宇案发生后，类似讹诈搀扶者的案件越来越多地被报道出来，抑或是遇到摔倒的老人不敢上前搀扶。彭宇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网易新闻称，“大部分网友认定彭宇是好心没好报，无辜受害，对他充满了同情。”这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梦。

习近平任人唯亲，上台后提拔他在福建、浙江的旧部和清华同学为幕僚，逐步形成江湖上所谓的“之江新军”，他们对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官员主要包括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公安部部长王小洪、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钟绍军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

习近平上台后借反腐打贪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建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中国国内媒体随后铺天盖地为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宣传，先后有“学习粉丝团”，《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包子铺》，《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东方又红》等出现，特别是“定于一尊”的提法，被认为是中国出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表现。

2017年8月28日，围绕习近平定制的纪录片《大国外交》在央视首播后，被大量密集播放于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过去300多年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2016年9月13日，多次吹嘘习近平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再强调“习核心论”。他说：“要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第二年，他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年5月，在胡锦涛卸任国家主席退休后，安排腐败经商的儿子胡海峰进入政界，任中共浙江省嘉兴市市委副书记。胡海峰在当地电视记者访谈中，十分露骨地向习近平表忠心，大赞“习近平科学思维方法”，称是“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精神财富”。

台湾《苹果日报》认为，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官方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香港《东方日报》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甚至极其夸张地以“最高领袖”、“最高统帅”、“总设计师”称呼习近平，令其地位直逼拥有“四个伟大”的建国领袖毛泽东，被认为有献媚邀功之嫌。

评注：2018年7月4日，清晨6时左右，湖南女孩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实施的脑控压迫...反对（此时向习近平画像泼墨）...我对他恨之入骨...看到没有，这是我的行为，反对习近平专制、暴政，反对共产党对我实施的脑控压迫。我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进来，我会配合调查取证。因为很多脑控迫害取证是需要才能介入的。...对，我今天就泼墨他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习近平，我在这里等着你来抓我。我就一个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独裁、暴政、专制。我今天就站在这里，我让你来抓我。后面就是海航大厦，习近平你的资产，好吗。我就在你的资产面前，泼你的墨。看到没有，看到你丑陋的脸没有？”

下午3时30分左右，董瑶琼在Twitter发出其账号被不明人士注销前的最后一则推特PO文称“现在我的门外有人一群制服的人。待会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和组织。”之后推特上的文章开始被删除，接着本人便失去联系。上海的国内安全保卫向董父表示董瑶琼泼墨的行为是“攻击国家领导人”。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此事时标题是“岂有此理？泼墨涂污变攻击国家领导人”。上海警方将她送回老家湖南省，并让她住进湖南省的精神病院。院方表示董瑶琼是以“政治犯”被送院。不久，董父董建彪也被捕。

泼墨事件随即在网络上快速散播，并引起网民回响。有网民贴出对习近平肖像泼墨、掷泥土的照片，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之不满。

中共政权对付董瑶琼这类“觉醒者”有一套规范性的迫害操作。公安部门与指定医院黑箱勾结，强迫给当事人吃药打针，污蔑他们患上精神病，然后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

2018年7月4日董瑶琼泼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洛杉矶时间依然是7月4日，美国非盈利组织“美国价值守护联盟”率先发起“第一届704泼墨节”活动。从此，每年7月4日这一天定居美国的华人及少数当地美国人，来到中国驻美国领事馆门前，开展泼墨节娱乐活动。用墨水洒向预先印制好的画像，以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

201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包含确立国家监察机关，赋予地级以上行政区地方立法权，确立宪法宣誓，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等内容。习近平破坏党内规矩遭到中共元老背后共同抵制。

2018年3月，习近平首次审阅各中央政治局委员提交的报告，并对各政治局委员提出重要要求。习近平也多次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领导一切”，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毛时代的口号在中共十九大上被写入党章。

习近平上任后，在他的任期内，举行过5次重要的阅兵，分别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2018年南海海域海上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是继1959年之后，举办阅兵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领导人。

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中央电视台，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当日晚上，任志强在新浪微博发帖质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说道：“彻底地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任志强的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评注：任志强以敢言闻名，多次以犀利语言评论中国房地产走势和政策，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总书记习近平，有“任大炮”之称。

任志强历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董事长、华远集团党委副书记兼董事长、北京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前身）监事、新华保险董事、北京市政协委员。

持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父亲任泉生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与王岐山关系良好。

任志强以经常对楼市发表激进的言论而著称，例如“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房子像钻戒，低收入者不该拥有”，“中国的房子太便宜了，年轻人就应该买不起房”，“北京不必抑制房价，连农民工都买得起”，2016年1月底又发表观点称“炸掉楼市过剩库存”，而引起媒体关注和广泛争论。

2020年2月，网络流传一篇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批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严格管制加剧了冠状病毒的疫情。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还称习近平“丝毫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同年3月，任志强失联。据香港南华早报的独立调查，这篇文章确系任志强所写。南华早报记者试图拨打任志强电话，但显示关机。据任志强的朋友透露，2016年以来任志强一直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但还能经常和朋友们见面。美国之音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任志强在3月12日被中共北京市纪委带走，其长子、秘书亦被纪委控制。“任志强”的名字成为网络敏感词。

根据媒体报道，任志强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还包括“八荣八耻不符合现代的价值”，“习近平班子‘让车轮倒转’，军队‘枪口对内’”、“习近平‘连续出臭棋’”、否定习近平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共产党极权、不合法”、“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中央极权”等。此外，他还大量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同时还支持宪政，支持“台湾（中华民国）政权”合法。

2020年4月7日，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对任志强的批判被一些北京市民称为“十日文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论更指，对任的这个“依法审判”就是政治对抗的结果。

2018年5月4日，中共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称“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在中国大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一个无神论的执政党，有关的宗教体制经常被指出现争议和丑闻。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受到政府体系以外、国际社会及多间媒体与宗教人士的指控，指责中共打压及控制国内宗教及反对声音。其中，国际组织自由之家于2017年2月发表了名为《中国灵魂争夺战：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的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指出，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近年中国的宗教管治打压问题恶化。

2018年4月，中国共产党下令宗教要“中国化”、“媒体、宗教、企业都要姓党姓”。7月31日，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在京举行，发出《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悬挂国旗的倡议》。

2018年8月27日上午7点整，少林寺在山门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建寺，这是1500多年来的首次。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力，登封市宗教局长吴松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有关领导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参加了升旗仪式。而五台山亦有异常尼姑。她们拜毛泽东画像等争议，遭到两岸三地纸媒大力报导。这是中国佛教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评注：2018年11月29日，全国政协会议决定惩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免去其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接受其请辞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2018年8月1日，曾任龙泉寺都监的释贤佳、释贤启实名发布了一份95页的汇报，其中列举了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的诸多不法行为，包括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寺庙违建、巨额资金去向不明等。

8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官网发布《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指出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问题、北京龙泉寺违章建筑问题、大额资金去向问题均属实，性侵问题正在调查中。

历史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有早已编写好的剧本，凡人既是这出大戏的旁观者，又是剧中人。佛陀说，末法时期，魔王的魔子魔孙，会穿上袈裟，混入僧团，败坏佛教。如《楞严经》言：“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此言不虚。

2020年9月，中国大中专的教科书，道德与法律，把圣经的原文改了，改成了耶稣是个有罪的人，他可以杀掉那个卖淫妇。然后法律的概念是超越道德的，因为完美无瑕的人，是没办法执行法律的。所以法律的本身，就塑造今天，掌握

法律的人是可以有错误的。他的错误可以被耶稣背书，暗指今天的习近平是当代的耶稣、中国的耶稣。

这一年末，外媒特别关注中共进一步推动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中共在 11 月 26 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会议上宣称，将重新编译和修改《圣经》和《可兰经》等，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建立“中国特色宗教体系”等内容。

政协主席汪洋在讲话中指示，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是管方向、管根本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必须遵循习近平关于宗教的论述，对宗教经典译本进行重新评估，对不符合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重新编译，修正和增加注释，以做到“与时俱进”。会议还指出，重译和修正宗教教义是为抵御“极端思想和异端邪说”。

圣诞节前夕，法国《费加罗报》和英国《每日邮报》都就中共当局将重新编译和修改《圣经》和《可兰经》发表评论性报道，指出中共当局在镇压宗教团体的背景下，继续发动新一轮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习近平的用意何在。

宗教人士担忧未来中国只有一种“共产教”。美国旧金山华人牧师刘贻表示，中共改变了原先暴力的封禁宗教策略，变得更有欺骗性，习近平目前已不满足在教堂唱红歌，画像进教堂，现在要把“习近平思想”变成教义，加上爱国教會的助纣为虐，未来一个可怕的前景是：所有宗教变成“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宗教”。刘贻说：“中共要重新翻译《圣经》，或者是撰写很多《圣经》注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到这些注释里去，他们一直在这样做，现在是汪洋公开指示，那种爱国宗教团体一定是会非常努力的完成这个任务。在习近平时代他更狡猾，他允许有，但他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改造，使它变成共产党的宗教、习近平的宗教。”

西方媒体很早就留意到，习近平这是特别针对新疆的穆斯林的。2014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习近平前往新疆考察，在习近平视察新疆最后一天，发生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力恐怖袭击案件；5 月 22 日，发生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暴力恐怖袭击案；7 月 28 日，再度发生莎车县暴恐袭击案。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讲话，会议提出新疆是反分裂、反恐怖、反渗透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改变治理新疆的政策。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和“宗教中国化”，开始限制各种宗教关系。2014 年 7 月，中共新疆党委统战部、组织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公职人员不信教、不封斋等；也禁止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封斋、进清真寺做礼拜等穆斯林宗教活动等。

2016 年 8 月，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一把手后，终于具体的把“再教育营”纳入新疆政策。这期间培训制度刚刚设立，起初政策还未有太大动静，后来新疆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点名为圣战对象，承包案随即规模化的迅速扩大，

有研究称认为那时起，新疆当局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反恐的名义，大量修建或扩建再教育基地，投入几十万甚至百万人到“再教育营”里进行封闭式教育改造。与此同时陈全国进行一系列维稳行动。新疆当局引进最新科技、打造全面覆盖的网络监控系统，扩大强化安防监控。新疆当局先后增加招募 3 万多名警察，设立遍布新疆全境的 7,300 个安全检查站。新疆各县市当地政府在大街小巷设立了成千上万个“便民警务站”，中国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市就要建设 949 个“便民警务站”，中国消防网报道仅在和田地区就有配备 6,780 位警察或协警的 1,130 个“便民警务站”，新疆当局在 2016-2017 年间为这些警务站招聘了 9 万名协警，2017 年新疆被拘捕人数猛增，2017 年遭刑拘人超 2016 年的 7 倍，虽然新疆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5%，但 2017 年在新疆遭刑拘的人数占全国总刑拘人数的 2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有一个集中营的数据库，存有人数、地点、照片、数量等信息。2020 年 9 月，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卫星成像技术发现，中国新疆地区存在约 380 余个可疑营地，至少 61 个从 2019 年 7 月起已扩建、其中 14 个还在扩建。

“再教育营”中接受再教育的人员数量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多家媒体、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研究人士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估计再教育营的人数已达到 100 万甚至更高。有媒体指出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报道称“再教育营”破坏了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强迫他们唱红歌、吃猪肉、喝酒，拒绝照做的人会被罚禁食、坐老虎凳以及不让睡觉等。据报道，再教育营内还发生了强制分离孩童父母等行为，一些妇女表示曾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否则就会被送到集中营。

2021 年 3 月 9 日，美国“新线战略和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内容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报告声称新疆再教育营至少监禁了 100 万人维吾尔族，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受到强暴、性虐待、剥削、公开羞辱等凌虐及残忍对待，违反所有种族灭绝条款。

2021 年 1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卸任特朗普政府前夕发表长篇外交声明，罗列事件属于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的“罪证”和指控，为美国政府历来首次如此表态。1 月 20 日，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候选人的安东尼·布林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候选人听证会上，认同蓬佩奥的声明。1 月 27 日，在白宫记者会，已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再度同样表态。

加拿大下议院、荷兰下议院、英国下议院、立陶宛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亦分别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群体成员做出种族灭绝的暴行。

评注：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也要求“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015年1月《环球时报》发表作者单位为安徽省委宣传部，署名“安轩平”的评论，称中国好网民应该是：一、国家的衷心拥爱者；二、主流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三、低级趣味的坚决抵制者；四、网络秩序的自觉维护者。还称做好网民就要敢做“五毛党”、多做“点赞党”，乐做“自干五”。

普通网民常以“五毛”、“五毛党”、“七毛”或“七毛党”来称呼中共的网络评论员，以讽刺网评员每发一文“能赚五毛钱或七毛钱”。网络评论员通常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内容，围攻批评政府的网络声音，或采取其他网络传播策略，来试图达到影响、引导和制造网络舆论的目的。

作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是五毛党的总代表。他认为中国媒体应主动回应西方媒体的误读，主张中国媒体应主动掌握报道主动权。胡锡进和其主导的《环球时报》在网络上被批评者批为“叼盘”、“接飞盘的小丑”。在香港TVB于2019年8月30日《时事多面睇》节目对胡锡进的专访中，被主持人问及为什么胡锡进可以在Twitter留言看信息，而一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民众没有这个权利时，胡锡进回答道是“我的工作需要”。2019年9月18日，胡锡进在新浪微博发表帖子称“国庆节快到了，上外网极其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建议还是要在我们的社会和外网之间多留出一些缝隙”。但该微博立即无法评论，随后胡锡进自己删除。

中共还制造了无数的受极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影响的“小粉红”网民。对于这些被洗脑和煽动的年轻无知少男少女，《环球时报》在微博上发表的一篇称赞“小粉红”的文章说：“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旅游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但却是这个上甘岭上的生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和美腿，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半月谈》杂志也形容她们“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

2018年以来，中共政法委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正规的“政法网评大军”，认为“建好用好政法网宣铁军是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建好用好政法网宣铁军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等。

根据《中国中共高校工委的招聘意见（暂定）》，各高校网络评论员主要从高校共产党党委宣传部、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网络中心、招生就业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和教学院等单位工作的干部和部分学生干部中选任。

而对于招聘规模，则没有具体数据，各个高校、地方政府、网站数量不一。比如淮安市清河区法院，就组建了12人的互联网网评工作队。甘肃将建650人网络评论员队伍，形成以50名网络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络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络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

2011年5月，法新社北京分社社长 Pascale Trouillaud 援引一位博主认为政府雇佣兵至少有几万人。2014年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网信办的工作信箱被黑，邮件显示2014年章贡区网宣办专职工作人员一人，外围网评员287人，骨干网评员5人。法广从中国省级、地级、县级政府数目推算，中国政府在册网络评论员在五十万人以上。

习近平政权培植的以网评员为核心的数以千万计的“五毛党”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毒瘤，其祸害将影响深远。许多互联网用户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应当为了金钱利益而发表自己原本支持或者反对的观点。

《南都周刊》评论则指出政府领导和网评员之间的这种关系，非简单的拍马，而更像是互利的“合作性互骗”。

中国作家韩寒指出，网评员的设立只会拖累政府和官媒的形象：“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赞美和拥护必须要靠花钱收买别人的嘴才可以，那说明这个人肯定够丑的。”整天喊着爱党爱国拥护习近平的中共另一个大五毛司马南不但承认妻女在美国，还承认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消息，在媒体追问下被迫向全国人民认罪并忏悔道歉。无数在网上支持爱国、给司马南频道打赏的小粉红纷纷情感崩溃。

海外华人曾经出了个“中国恶人榜”，影星成龙等位列榜单之上。任何了解了中共历史真相的人，如果还为中共唱赞歌，必然是良心大大的坏，地狱之门也必然为其打开。

蔡奇在就任北京市委书记后召开的首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动员和部署大会上提出，由于北京是个严重缺水城市，这决定了必须控制人口规模，这是自己主政北京期间首当其冲的硬任务。总的要求是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减少，中心城区以外平原地区人口规模有增有减，山区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在蔡奇的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全市开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清理、拆除外来人口聚居的出租大院是该项工作的核心，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拆除。大量廉价公寓和出租大院被查封、关停导致许多“北漂”一族一夜之间被迫搬离住处，无家可归。无钱租住正规租赁企业建造的高价品牌公寓的“低层次租客”们只能是要么搬到更远的郊外居住，要么离开北京。

2017年11月18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17年11月20日起，北京市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其中大量在京外地工作人群流离失所，或居所被停止供应电力和暖气。

北京市官方则回应称，“专项行动”是为了防止大兴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再次发生排除火灾安全隐患的行动，并不存在驱逐低端人口，且否认“低端人口”的说法，称人群不分“高端”“低端”，并称专项行动针对的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厂，仓库，出租屋等场所，但一些“外来人口”在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居住且不了解风险，称专项行动是为了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

“低端人口”这一词语在北京市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亦在媒体及学者中广泛使用，但因涉嫌歧视穷人而引发争议。2017年12月13日，在网络上流传一封公开信，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近日的驱赶行动，影响范围广大、手法残忍、忤逆背量、违法乱规，甚至是“北京建城3062年以来最恶劣的行政作恶事件”，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名校友联署要求蔡辞职下台。

从1983年到1999年，蔡奇曾经在福建省委与三明市工作长达16年，官至三明市市长。在这段时间内，习近平也曾经在福建省工作。而后，蔡奇与龙岩市市长黄坤明一起被调往浙江省任职，习近平也在2002年11月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蔡奇先后主政衢州、台州两座城市，是习近平的下属。

201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多个地方传出退伍老兵示威上访的消息，山东烟台、江苏徐州、河北大名、湖北麻城等地相继发生老兵集会，要求保障退伍军人的权益，遭当局围堵、拦截和打压。

6月下旬，江苏镇江老兵上访维权遭殴打而引起的抗议冲突引发广泛关注。当时从各地赶来支援的数千退役军人在镇江与安全力量对峙数日，当局从外地调来警力，采用暴力驱散，双方爆发冲突。7月24日，山东烟台数十名退伍老兵计划乘火车进京上访，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及维稳人员在烟台火车站围堵。他们阻拦欲前往北京的退伍军人上路，不准火车站卖票，最后把这些老兵原地驱散。而在首都北京，在2016年10月和2017年2月，分别有数百名退伍军人在北京的军委八一大楼和中纪委门前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就业安置、抚恤津贴等问题。

在中共治下，退伍军人也成了弱势群体。中国退伍军人的安置和社会保障，一直是一个令北京头疼的问题，甚至被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2018年3月中国人大会议通过国家机构改组方案，新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协调为这一群体解决就业、生活和退休补助等问题。

香港人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享有言论及出版自由，但某些香港出版的书籍会被大陆视为禁书（下称“大陆禁书”），禁止在中国大陆买卖及流传，此类书籍多与中国政治或中共高层有关，除了披露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内幕，也针对当代的领导人丑闻等极敏感的类别，因而偶获中方口头警告，但总体来看过往中共当局多对此采取宽容态度，2000年代时出版此类书刊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官方的态度渐趋强硬。

铜锣湾书店原计划出版有关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英国《卫报》指神秘书籍名为《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主要叙述习近平婚前和一名女电视主播之间的关系。失踪前受访的李波称桂民海因写领导人高官情妇而屡收警告，“我想有些人不想看到那书流出市面，他们捉走与该书有关的人士，确保书籍不会出现。”熟悉中国时政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则根据消息说桂民海计划出版的新书名是《习近平的六个女人》或《习近平的情人》，指中方除了要阻止他们出版习近平情史，还要取走该批令习近平尴尬的资料，指当局“可能问了早前掳走的4人几个月都问不到这些资料，所以连负责管仓的李波也要抓起来问”。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于1月4日刊文，指责有关书店的书籍“成为一些政治谣言的源头”，又认为少数港人不应当动辄质疑“一国两制”，并指港人应该“相信国家，相信基本法”。该报1月6日又刊文，承认中方有调查铜锣湾书店，又指内地警员不能把李波“五花大绑”带过边境，但“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这篇文章被部分香港传媒以及其他国际传媒视为默认或变相承认是中国执法人员违法到香港将李波掳走。

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之事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事件轰动国际，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本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关注，并要求中国解释及释放失踪人士。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引起多方质疑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透过“港区国安法”挫败香港的民主运动，对各国的反对毫不在意，显示他按照自己的独裁方式重塑香港的决心。

评注：中国人应该问自己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建政七十年了，甚至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有那么多贫穷人口？

2013年初，习近平曾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指示。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十三五”期间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坚持精准帮扶与区域整体开发有机结合，大力推进实施一批脱贫攻坚工程。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中国地大人多，资源丰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向美国呛声，“我们老百姓吃草都能过一年没事！”不过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不只草原面积减少近半，草原质量也大幅度下降。国家统计局2008年曾指出中国人吃草可以活一年，若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的数据来计算，中国人吃草最多可以活200天，或者只有一半的中国人可以靠吃草活一年。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说：“假如中国过去的草原可以提供13亿人吃草，但因为草原质量下降，只够不足一千万人的吃草，最后的结果不是吃草，而是吃人。”

近三十年，中国创造了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创造了基建奇迹和“经济奇迹”，无数个卫星上天，高速公路和高铁延伸至每一个省份和城市，桥梁建设举世瞩目，大国重器闻名遐迩；然而，每一个给中共官员脸上贴金的高速度背后，皆是无数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辛酸血泪和生命付出。人类真的需要这样作死的“高速度”吗？中共虽然是基建狂魔，但航天技术、高铁、

核电厂、通信 5G 等的关键技术和芯片等都依靠西方七国，今后一旦与西方闹翻，中共的“高科技”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2020 年 5 月 28 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按惯例出席了总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李克强交代了中国当前有 6 亿人口的每个月收入只有 1000 元人民币左右。2020 年正值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收官之年，李克强的言论引发外界广泛讨论。

2020 年底，《纽约时报》称在没有政府监视的情况下走访了六个甘肃省村庄，认为中共在扶贫上付出了高昂成本，称其为“运动式脱贫”。报道称：“这种扶贫方式依赖于大量的、可能无法持续的补贴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建造条件更好的住房。”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说：“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所订立之贫穷标准低于国际水平。联合国所采用之贫困线为日收入 1.9 美元，而中国官方之农村贫困标准为年收入 3218 元人民币，即日收入 8.8 元（约合 1.3 美元）。台湾苹果日报称，有农民工表示，其原所在地贫困户的认定，需要“讲关系”。北京清华大学政治系前讲师吴强认为，宣传“脱贫”之目的，在于为国际舆论服务。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认为，习近平 2012 年上台时认为“必须要做一些事”，但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只能向毛泽东学习。林培瑞说：“他接受的教育很少，对现代世界也没有什么认知，知识上的贫乏让他除了回到毛时代之外没有任何创造力。（他）增加的只有技术监控，毛时代则没有这个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 BBC 说：“一个区别是，习近平使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制（人们）遵从；毛泽东进行社会动员，让党员和公民互相对抗；毛制造了混乱和恐怖，而习创造了令人窒息的秩序和统一性。”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发表的 2017 年新年贺词提到了“只要我们 13 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撸起袖子加油干”随即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

2019 年秋，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开班讲话中使用了 58 次“斗争”一词，新华社就此发表《“斗争”！习近平这篇讲话大有深意》一文，指出“这篇重要讲话的

核心关键词就是“斗争”二字”。9月，胡少江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评论文章，认为中共“以如此“好斗”的姿态发表主旨演讲，这如同公开宣示，习近平意欲超过了建国领袖毛泽东，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好斗”的领袖”，胡少江分析指出习近平不顾海内外各阶层的不满，“要沿着自己的那条一条极左的疯狂路线走下去，也表明了他将不惜一切手段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坚决的镇压”，胡少江表示“当下中国的政治荒谬和舆论一律几乎与文革前毫无二致”，并表示是习近平在营造文革 2.0。

2019年7月，中国共青团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计划将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共青团中央文件宣布，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在三年之内动员一千多万青年下乡，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为振兴农村发挥作用。消息传出之后，中国民间议论纷纷，外界不少报道也把这项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较，认为是习近平回归红色正统的又一体现。

2020年中共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并已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包括由数家科技公司对消费者进行信用评分，以此作为发放信贷的指标。除财务信息外，该体系还评估和收集公民社会行为、网络活动等个人信息。据《光明日报》6月22日报道，试点以来，733万人因失信购买机票受限，276万人购买高铁车票受限。

中共政府对因特网的审查很严格，技术也很成功。中国社会在信用和互信方面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关键的原因在于独裁统治和道德沦丧。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条公路上，中共已经安置了无数个摄像头；中共政府尽力想将自动获取的信息融入该系统中，包括交通摄像头获取的信息。人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信用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公民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监控，但可以想象的恐怖景象是国家进行全面监控并采取制裁措施。其实，这种担心已经成为事实。中共独裁政权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对百姓的监控。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已经变成一所大监狱。

评说：2020年开始，习近平向全国人民作了一个《元旦献词》的讲话。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迎接2020年的到来。但在世人面前，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所作所为，都是逆时代的潮流而行的。

共产党篡政70年来，三反五反，文革整风，拨乱反正，一茬又一茬；中华大地群魔乱舞，鬼叫狼嚎，与天斗，与人斗，翻天覆地，日月确实换了篇章。虽然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很少使用笔墨纸砚了，“罄竹难书”这几个字还是能恰当地描绘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犯下的累累罪恶。

习近平说，“2019年，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江南北披上红色盛装，人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和我的祖国》在大街小巷传唱。”这是真相，也不是真相。真相的另一面是“以假治国、以贪治国、以警治国、以生殖器治国”。当今中国，是个小人当道的时代。习近平就是那个小人。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央大国，是如何的真相呢？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佛陀的话或许描绘得更为确切：“一时佛住俱焰弥国金刚山顶，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尔时如来即嘘长叹，普视众生都无差途。善哉众生当何所救！思惟已讫。一切诸佛世界及诸菩萨境界，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金刚际及魔宫殿悉皆震动。复有诸金刚领诸眷属执金刚事，不安其座，游行十方；复有诸天仙魔众，怖走无处。”

当今中国，黄色大地早已是一片火海，中华百姓生活在缺乏基本人权和没有言论自由的红色魔宫里。十四亿人民被邪恶绑架，正义不得伸张，就连恶首的爪牙每天都活在恐怖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因为研制原子弹和核武器的重大杀人犯成为了“国家元勋”，申纪兰这样的“活化石”（投票机器）获得了“共和国勋章”。这是人类的耻辱。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华文明是漫长而深邃的，思想是百花齐放的。习近平想用马列邪教来一统江湖，真是太不自量力了。他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圣经·创世纪》开篇：元始之初，上帝创造天地时，大地一片混沌，无形无样，深渊之上是一片漆黑，上帝的神在水面上运行。上帝说：“要有光！”光就有了。上帝看见光好，就把光与黑暗分开。上帝称这光叫昼，称黑暗叫夜。晚上过去，清晨来临，这是第一天。

“这么美妙绝伦的言语，非世间人可以妄作，早已铭刻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你小小的习猪头，你想如何改，你敢如何改？！不管你如何下笔，地狱的门都为你打开。”

“在那些开天辟地的时代，走过耶稣基督，走过释迦牟尼，走过穆罕默德，也走过孔子。他们的言语，你要如何改，你敢如何改？！不管你如何下笔，地狱的门都为你打开。”

中国虽然有独裁的政权，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抱独裁的国度。尧舜不用讲了，春秋战国也不用讲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有哪一个不是胸怀广大之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总在开放、包容和融合中，不断地演绎伸展而伟大。

“习近平，你倡导‘一带一路’，你的高峰论坛、文明对话，妄言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然而，你筑起高高的防火墙，你严控新闻媒体，强迫他们统统姓党，如此的狭隘心量，如何又谈‘开放、包容’？如此思维，你如果不是精神分裂，即另有邪恶用心；如此颠倒，教世人如何信你！”

煌煌中华大地，正义之气不存，人民却没有说话的地方；是非善恶，完全颠倒，共产党以人民政府的名义作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独裁政权变成一所大监狱，十亿中华儿女，被当成奴隶，肆意践踏。中共处处建设“有为政府”，却处处瞎折腾百姓；一个个跃进式项目上马，一个个官员只求GDP和乌纱帽，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对普通百姓，除了物理性折磨，思想和精神性折磨更是变本加厉。

习近平政权的肆意妄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说“党是管一切的”，所以他可以“管天管地、管拉屎放屁”。它可以随时封杀公民说法的权力，封你的微博微信账号，甚至银行账号，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而不给出任何理由。这比流氓土匪和法西斯邪恶多了。

无神论者是不相信因果的，然而因果报应、分毫不差。中共制裁美国官员，结果的中共权贵子女们的赴美签证受阻；中共制裁澳大利亚的煤炭船，结果是中共的炼钢厂纷纷停工；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咄咄逼人，中共的外交官却如过街老鼠；习近平强力反腐清除异己，自己却处处躲藏、夜难安寝。中共和习近平平等，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从不反省认错。

毛泽东的时代讲独裁，似乎还有一点说得过去。包子的时代，还要独裁，就是要天诛地灭了。将习近平定义为“民族罪人”或“千古罪人”，我想任何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反对的。习近平和共匪帮最大的罪行是：他们在作恶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以维护法律的名义，并且在罪证确凿的时候，还坐在位子上。

人心如流水。当民心尽失，他和共产党就是河岸上的一条死鱼！

2020年2月1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媒体发现她的官方推特帐号赞了由唐柏桥发出的，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台并向中国民众谢罪的帖子，事件引起了香港《经济日报》等报道；这些媒体同时也猜测这可能是“手滑误操作”，并注意到之后该帐号所有的赞好/喜欢推文已全部清空。

2021年初，网路流传一张图片，为中国某处文宣标语上书“提高文明卫生水平革除陋习”。该图片引发争议，因其中之“陋习”不知所云，甚至被部分网友认为这

是在“避讳”习近平姓氏的简体字“习”。同时，若在微博之类网站上搜寻“陋习”等关键字则查询不出结果。

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在致词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突然重复前面已经念过的讲稿，并数次低头翻阅稿件，一度低声询问“我这说完了吗？”在秘书指正后，才跳回结尾段落恢复致词，并作结语。

由于害怕被暗杀，习近平让自己的亲信王小洪掌管公安部和特勤局，贴身卫队由其姐夫吴龙直接领导。进入2022年，习近平在党内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习近平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形成反习派，出现了“习下李上”的呼声，但李克强的软弱给他带来什么结果还是未知数。习近平倒行逆施，在党内也遭遇不小的反对声音。李克强多次指出，“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然而习近平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他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如果经济能搞好，当然好，但是为了保住党的执政地位，抓好共产党这个掌权工具，搞不好经济也无妨。大不了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今天了，饿不死人。不会搞到朝鲜那么差。再说朝鲜怎么啦，不要信道听途说，你们自己去朝鲜看看，照样过好日子。我看朝鲜除了经济差一点之外，其他都挺好的。人民对党热爱，对领袖崇拜，党内高度忠诚团结，再执政一百年都没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向人家好好学习的地方。”

2022年，中共二十大将会召开，习近平意图打破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潜在地谋求第三任期，甚至恢复中共十二大后不再设立的党主席职务。

第四十四章 中共在亚太和西方的渗透扩张

大纪元 2013 年 10 月 15 日《再揭中共对海外渗透的面纱》网文报道，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六十多年来，从韩战的武装战争，到印度支那的赤化，从海外统战到文化输出；整个世界的风风雨雨、浪涛涟漪，大多有着中共的背景；层出不穷的世界乱象下面，中共的黑手如影随行。对海外的渗透中共已是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无孔不入。世人其实正面对和身处一场没有硝烟而暗藏着杀机的战争却浑然不觉。

2009 年，脱离中共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对媒体揭露：“长久以来，中共不惜下大力气、耗费巨资、人力物力，通过中领馆、国安等机构，并试图或是派了大量特务和发展线人，在美国等国家建立特务网络，想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包括渗透和收买西方政治人物、华人社团、学生组织等。对于所需要的情报，或者偷窃，或者套取，或者打入内部，或者利用线人获得。中共运用全部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企图从整体上配合和支持由国安部或外交部所从事的所谓对外工作，不计代价，不择手段。”

前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早在 2005 年就将数份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内部的秘密文件曝光。这些密件显示，中共在海外利用扶植留学生会、亲共社团特务组织把仇恨散布到华人社会。其中也揭露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是以栽赃和诋毁作为包装，向西方主流社会、媒体、政要等灌输对法轮功团体的仇恨。密件详细记述了中共利用中国留学生组织，充当特务机构为它们收集情报、打压异议人士，进行海外渗透。

在大纪元的报道中，陈用林说，“对西方政府的渗透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给那些高级官员好处，比如到中国去免费旅游。第二、利用文化交流项目，给加拿大留学生奖学金的名额，但不是公开招收和评估，没有任何的公开竞争，实际上就是贿赂、行贿的行为，让那些国会议员的孩子免费留学中国并提供生活费。”陈用林还指出中共对西方官员使用“施压”手段。“对于那些帮助异议人士的西方官员，中共会打着破坏两国关系理由记录在案，如果哪一天他们要去中国，就会特殊审批，或是拒绝给与签证。”

2010 年 7 月，加拿大卡尔加里西区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以自己为例，披露中共收买、贿赂、施压西方政要官员。“他们先投下第一块饵——商业合同，如果你不为所动，他们接着放第二块饵——青春美女，如果你仍然没有落入彀中，他们再尝试酒类或其他。如果还无法得逞，他们将变换更为复杂的策略，从意识形态上

接近你。他们会说，噢，你反对极权，我们也反对，或许你能够帮助我们，请告诉我们那些憎恨极权的人的名字和情况……所有这些伎俩中共都在我身上施展过。”

评注：2009年10月22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又引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发言，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院章程》称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自己力量。截至2020年5月，中国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由于“孔子学院”被指是以教学和文化交流的名义，渗透他国教育体系，干扰校园言论自由，避免批评中共政策，还被披露执行情报收集和促进军事研究等不适当的秘密间谍活动。

孔子学院在美国招致越来越多批评。美国政府曾积极施压各国抵制孔子学院，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大外宣”，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并认为其试图影响大学学术自由、干扰其运作。2017年5月3日，美国全美学者协会发表《外包给中国：在美国高等学府的孔子学院及软实力》调查报告，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海外国家地区，输出其意识形态，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情况，并呼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

加拿大政府亦对孔子学院持反对态度。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称，孔子学院是中国意图渗透西方的一步。2013年9月，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及里昂第三大学关闭孔子学院，有报道称是因为孔子学院是中方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孔子学院干扰西方学术自由，中方以政治立场来影响学术。2019年8月22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宣布终止在新南威尔士州教育与社区部进行的孔子学院合作项目。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指，法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因贪腐被实名举报。七年期间，中方院长和教师均由无任何相关学历、教学经验的人员担任。并且存在虚报学生人数，通过虚假项目、伪造契约骗取资金等行为。

哈佛大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学校之一。但是许多中国侨民给它封了另外一个名字“第二中央党校”。中国人在哈佛人数众多可以从2009年秋天哈佛大学附近一个酒店举办的晚宴看出来。来自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和学者450人参加了这个晚宴并高唱中国国歌。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1 年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在哈佛培养中共领导人。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作为倡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由中共资金支持的这个项目提供各种课程，某些课程持续八周，有些持续几个月。每年，大约 40~50 名中央党委或地方党委之下的高官被派往哈佛学习。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的成员。

据《泰晤士报》报导，剑桥大学的教授近些年来一直在为中共培训官员，甚至包括中央党校的官员。这个培训每年进行一次，大约 30 名中共大型国企的老板和政府部门的高层官员参加，人选当然都是中共选定的。他们都是“政府、商界和学术界的关键决策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培训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和商业管理发展”。

这个培训班的全名是“世界一流企业核心竞争力对标研究培训班”，由剑桥大学和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联合举办。《泰晤士报》从英国外交部获得的名单显示，参加过剑桥大学“镀金”培训的中共高官和国企老板包括肖钢、樊大志、余斌、赖小民、李建华。

中共政府通过与西方各大著名院校和智库合作，除了镀金取经外，主要以金钱腐蚀的方式，实施文化侵略，培植红色基因，协助习近平推广“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进而“为世界把脉、为世界开出中国药方。”

评注：根据大纪元报道，在 2001 年，美国独立非盈利机构詹姆斯通基金会 11 月 21 日一期中国简讯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的文章披露，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介入北美的中文媒体。

这篇文章说，目前美国主要有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这四种报纸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据詹姆斯通基金会这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的文章披露，中国政府介入海外中文媒体的主要策略有 4 种：其一，以全资或控股方式直接掌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其二，利用经济手段影响于其有商业来往的独立媒体，突出的表现是任何对中共不利的消息都被删除。其三，买断独立媒体的广播时间和广告，用于登载明显来自中共官方的宣传内容。其四，让来自政府的专业人士受聘于独立媒体，伺机发挥其影响力。

《大纪元》评论员认为，作恶的人最怕自己的恶行被曝光，也最怕舆论的谴责。因此中共大力加强了对海外意识形态和媒体上的渗透，他们对内封锁消息，对外输出舆论宣传，不仅操控了国内的新闻，也试图操控国

际媒体。而众多海外华人媒体对人权问题一律鸦雀无声，这都与中共势力的渗透有关。

2005年9月，应所谓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组委会”邀请，彭丽媛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首次演出中国歌剧《木兰诗篇》，并获得林肯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颁发杰出艺术家奖。名义上这是联合国在邀请彭丽媛，实际上是彭丽媛在为习近平捞取政治资本的同时，中共的海外代理人为讨好中国未来的主子而特意安排的一场政治秀，这个奖项也是他们这些江湖骗子杜撰的。之后这些中共代理人在美国政商两界活动，并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到处诈骗，在华人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如今，中共在西方的渗透和腐蚀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政界、司法界、学术界、媒体界和金融界等都受到中共恶势力和蓝金黄等广泛深入的渗透和腐蚀。中共与世界各国邪恶势力勾结在一起，结合成利益共同体，共同作恶，对人类文明乃至人类生存的威胁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016年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发布了中国环球电视网筹建的消息，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于2017年新年前夕统一更名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作为中共大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CGTN是一个多语种、多平台媒体集群，它将由6个电视频道、1个视频发稿通讯社和新媒体机构等组成。

2021年6月19日，德国《世界报》推出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媒体的可怕渗透。文章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野心是把中（共）国伪装成一个进步、民主的国家。专家估计，其每年至少投入100亿美元用于海外宣传。

据《世界报》报导，这笔“宣传费”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文章称，CGTN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有限，因为其各种运作尚在明处。中共在隐秘之处所做的宣传，才更加危险。在持续数月的研究中，《世界报》汇编了中共秘密运作的部分手法。

《世界报》还披露，中共在欧洲的媒体战略中最善于伪装的部分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比如那些在Twitter或YouTube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充当了中共的网络宣传者。

2020年2月18日，CGTN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外国使团”，并作为北京当局的“宣传新闻机构”。2020年初，英国通信管理局亦对CGTN英语频道在英国落地许可发起调查。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2020年9月投书《人

民日报》被拒，随后美国政府公开批评“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习近平总书记的政府就会尊重西方外交官直接与中国人民对话的权利，允许外国记者回到中国，停止恐吓和骚扰调查记者。中国拒绝这样做，表明未经选举的统治集团多么害怕他们自己的人民有自由思想”。

2020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官方媒体机构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认定为“外国使团”，视作中国政府的一部分。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再将《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周报》和《经济日报》列为外国使团。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对中美贸易不对等关系大加抨击，痛批中国正在用商业手段“扼杀美国”，指责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货物征收进口税，每年税额约600亿美元，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尽管双方于5月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两国达成不打贸易战、暂停互征关税的共识，特朗普依旧于6月15日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被指针对中国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朗普还警告将对中国采取惩罚性关税，并把它列为“汇率操纵国”。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系列措施，完全颠覆了中共政府与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建立的友好关系。特朗普在竞选连任时连续揭露拜登跟中共的丑闻。

评注：据大纪元10月21日报导，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乔拜登（Joe Biden）就是美国国会中，支持中共加入世贸的亲共派的主力。

2008年拜登被时任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选为竞选搭档后，拜登家族开始尝试撮合国际生意，包括从中国吸金，帮助中企完成获取美国资产和技术的交易。

2012年2月17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在加州与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正式会晤。

就在两人会面的当天，《华尔街日报》新闻“China,U.S.Start-Up Team in Coal-Conversion Deal”（中美两国创业团队达成煤炭转化交易）报导说，美国能源公司GreatPoint获得了中国万向集团高达12.5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4.02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笔交易不但是当年美国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国风险投资，同时也是拜登家族拿下的第一笔中国大生意。拜登之子亨特的Seneca咨询公司，在成立后拿下的第一笔大单，就是促成中国万向集团2012年对美国GreatPoint公司的投资。

2013年12月4日至5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其子亨特随同出访。在这次出访10天后，亨特·拜登敲定了拜登家族与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公司的第二笔大生意——中方提供募资的10亿美元投资基金。12月16日，私人股本基金渤海华美（BHR Partners）在上海注册成立，起初基金规模定为10亿美元。半年后，据《华尔街日报》2014年7月10日报导，BHR基金规模已从原计划的10亿美元上调至15亿美元。

2019年，拜登家族丑闻被美国媒体曝光后，亨特在2019年10月表示将辞去渤海华美的职务。

2019年7月1日，《纽约人报》报道，中国商人叶简明的公司华信能源曾在拜登的帮助下，拿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猴岛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液化石油气投资项目。

随着中国崛起趋势明显有美国国内声浪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日渐大的利益损害，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和奥巴马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会谈，中方正式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愿意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于国际事务合作。2017年4月7日，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承诺尊重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关系稍有缓和，但仍然互不信任。

评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川普总统的坚定盟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基本上追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安倍认为“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并称中国高层绝对不能误判，否则等同于走经济自杀道路。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上任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质疑日本二战“侵略”之性质，再次修改教科书，这些新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也促使中日关系的恶化。

此外，钓鱼台列岛主权问题和东海油气田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分歧和争论和焦点。2019年8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公告称中日双方将于8月10日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双方自2012年6月以来，时隔7年以来的首次战略对话。

如何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焦点。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明确表述，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曾经历一段蜜月期，在中国官方宣传中，“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是基调。8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

引发民间右翼排外思潮不断兴起，使得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甚至仇视不断加深，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时有发生。而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损，被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是没有言论自由、肃清异议人士、提倡仇日思想和民族主义狂热。同时，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不断兴起，加之日本在各个敏感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使自发的反日和仇日宣传不断增多，网络上时常流传各种或真或假的“日本辱华事件”，每每激化中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反感，出现了大量“抵制日货”的呼声。中国政府对于反日宣传，一般采取低调放任的态度。

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 1979 年。截至 2006 年 6 月，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约 32078.54 亿日元，用于 242 个项目的建设。2006 年 3 月 23 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计划。

近年来，日本的流行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日本的电影、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等对中国几代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引发的排外情绪及日本右翼团体兴起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由中日建交时的睦邻亲善，转变成对中国人抱持观望或不欢迎态度。

一直以来，“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寻求中国根据其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地位，挑战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2013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在同年 10 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2015 年 2 月 1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领导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首任组长为张高丽，副组长为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资 400 亿美元，于 2014 年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7 年，习近平再宣布向该基金增资 1000 亿人民币。

2013 年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同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东南亚时，紧接着

再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

为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联络，中国政府和铁路总公司与中亚和欧洲各国铁路系统协作，开行从中国西安、重庆、郑州、成都等地到达米兰、莫斯科、明斯克、汉堡等地的国际联运列车——中欧班列。截至2017年5月19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000列，中国国内开行城市28个，到达欧洲11个国家29座城市。

为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中共政府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进程。在西亚等地区积极开展“高铁外交”，并将之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承接点。

在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和政法委书记期间（2007-2017年），中共公安部门与海内外华人黑帮勾结成利益集团，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恐怖主义和蓝金黄渗透，扶植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等国独裁政权和黑恶势力，对其政治和经济命脉施加影响，这些国家的军政动乱和民族矛盾中皆可以见到中共黑手在背后搅动。中共的狼子野心是要搞乱东南亚进而从中渔利。

2017年，曾受中共警方通缉的赌博大亨余智江高调宣布斥资150亿美元，在缅泰边界开发赌城，称为“亚太新城”，占地十分广阔，号称集“科技、赌博、娱乐、旅游、文化、农业”的“智慧城市”。尤其引起外界关注的是，这个开发案宣称是在“中泰缅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性旗舰项目”。

继2021年中共政协委员、澳门“小赌王”周焯华被捕之后，余智江因涉嫌经营非法跨境赌博2022年在泰国被抓捕。余智江曾任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被称是中共在东南亚侨领，而且在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期间，余智江是习近平“欢迎晚宴”的座上宾。中共支持的黑帮在东南亚疯狂开赌，专门吸引中国大陆赌客和地产投资，单单围绕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赌城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就有一千多幢建筑成为烂尾楼。中共还将活摘器官的罪恶在东南亚国家重演，将东南亚作为中东杜拜的中转站，除了当地人和中国大陆人，数以千计的台湾人亦成为受害者。

然而，截止2022年3月为止，已有146个国家或地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当中139个国家已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港口、铁路、公路、发电站、航空和电信设备等。支持者称赞“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提高全球GDP，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能受惠。反对者则批评倡议有机会侵犯人权和影响环境。另外，也有国家指控“一带一路”是通过债务陷阱外交的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

在中东，中共与伊朗等独裁国家结成邪恶轴心，帮助伊朗发展导弹技术和核武器。2005年，7家中国公司被怀疑向伊朗出售核武器，并因此受到制裁，在两年内禁止与美国交易。2005年，中国货品占伊朗整体进口市场的8.3%，中国成为

全球第二大向伊朗出口的国家。习近平上台后，借“一带一路”努力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逐步扩大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自毛泽东起，中共政权长期支持巴勒斯坦和中东恐怖组织活动，名义上调和巴以冲突，实际上是中东地区和平的重大障碍和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之一。

2008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开始在亚丁湾巡逻护航，此后其一直在吉布提港进行补给和休整。2015年3月底至4月初，因也门内战引发中国撤侨行动，吉布提在该行动中发挥了战略中转作用。习近平霸权野心膨胀，但除了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还有军队的腐败，中共的海陆空军只是纸老虎，中共的核动力航母和大型飞机项目，也只是摆摆样子，毫无战斗力而言。

2014年，电影《战狼》放映时，吴京喊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让无数中共“小粉红”观众听得热血沸腾。本片拍摄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动员了多款新式武器装备，采用近万发子弹，上百辆坦克以及武直-10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由于电影的民族主义情绪浓厚，“战狼”日后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代名词。

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举行，标志着基地正式投入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田中，中国驻吉布提大使符华强，吉布提国防部部长巴赫敦、总参谋长扎卡里亚，有关国家驻吉布提使节、驻吉布提部队代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26批护航编队官兵代表等300多人参加了仪式。

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领土。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海南省三沙市（意为西沙、中沙、南沙），行政机关驻扎在永兴岛，管辖南海各岛屿，但实际上仅实际控制其中部分岛屿。同时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南薰礁、赤瓜礁、华阳礁、东门礁、永暑礁、安达礁等扩建岛屿形成机场。

南海的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海上一带一路”的一环，也是国际航线的重要枢纽，据2017年的估计，每年有价值3.37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会通过南海，占全球海上贸易的三分之一，中国80%的能源进口和39.5%的中国贸易也会通过南海。日本与韩国90%以上的进口石油得由此区域进出，台湾更有高达98%的进口石油船只得通过南海海域。

南海也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在军事及经济上支持其他沿海地区国家，以压制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在亚洲的势力扩张。美国战后一直承认中华民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2013年，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段线主张和海洋执法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6年7月，仲裁庭5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中国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

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前夕，美国川普政府国务卿与白宫发言人表态，声称南海所有岛屿是“国际领土”必须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2018年5月23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声明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会将原有邀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去除，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争议上的军事扩张造成区域局势不稳。

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的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这是美国首次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九段线”的主张。2020年8月26日，美国将24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对部分人员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声称这些公司和个人参与了南海争议岛礁的建设和军事行动。

2021年4月24日，欧盟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危害南海和平，坚决反对破坏地区稳定的单方面行动，敦促各方遵守2016年仲裁法庭的裁决。欧盟又发布了新政策，增强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的势头。

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岛国。长期以来，所罗门群岛政府以薄弱的政党政治和非常不稳定的议会联盟为特点，因为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罗门群岛政府受频繁的不信任影响，内阁因此经常改组。

所罗门群岛曾在1983年与台湾中华民国建交，但2019年9月，在中共金钱外交的压力下，所罗门群岛内阁决议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罗门群岛政府主要官员都直接从中共驻该国大使馆处领取“薪水”。

2022年上半年，中共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中方将能应所罗门群岛政府要求派遣军警至当地协助维持秩序、救灾、保护中国公民及协助大型基础建设计划，中方船舰（不限民用，包含军方、海警船舰）也能在该国停泊补给。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东的原油必须通过马六甲进入南中国海，中国的出口货物也大多数必须通过这条通道出去。15世纪至17世纪，受封于中国明朝的马六甲人，一直把中国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常常向中国的君主朝贡，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同样，如今的中共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保持良好关系，以维护其在南海运输通道的畅通。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于 2018 年两度访华，分别于 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4 月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马哈迪表示马来西亚期待扮演“一带一路”上的贸易枢纽角色，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对于马来西亚作用非常重要。1994 年 5 月 11 日，他在出访中国的演讲中表示：“在过去六十年的岁月里，我都在密切追随发生在中国的系列历史事件。我也花了很大心力，在阅读中国二千年以来的历史。”

受中共贿赂收买的前总理纳吉布和孟建柱的私生子刘特佐是 1MDB 腐败案的关键人物。目前在逃的刘特佐被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国家通缉。刘特佐一直生活在中国内地并受到中共公安部门的特殊保护。

中国大陆与巴基斯坦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型工程计划，长达 3000 公里，投资 460 亿美元，也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旗舰项目。2013 年 2 月 18 日，巴基斯坦将瓜德尔港的建设和运营权正式交予中国的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2013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决定建设“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连接瓜德尔港和中国新疆。2015 年巴方将把瓜德尔港 2000 亩土地租赁给中方，为期 43 年，用于建设（瓜德尔港）首个经济特区。瓜德尔港临近主要石油产地的波斯湾，对中国的能源战略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在 2014 年 5 月 21 日的亚信会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了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亚洲新安全观以及“普遍安全世界”的概念，强调对话解决、发展安全并重的思路。又在 2017 年乌镇互联网大会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互联网治理上强调各国尊重网络主权、促进安全治理合作，要求“促进公平正义”。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安全共同体”，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穷兵黩武及所谓的“绝对安全”，反对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要求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威胁。

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受到广泛关注。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由于中共的财政捐款，在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委员会的五个席位中，中共控制了四个席位。该委员会就该基金资助哪些项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这使中共能够为其有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支持。

自 2012 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中共的影响力。目前，中共已经获得了对联合国 15 个专门机构中四个机构的控制权，即粮食及农业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为了争取足够

支持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推上位，中共依靠“老式的贿赂套路”，游说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共的候选人。

评注：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大撒币”行为广受批评。

中国政府 2014 年的报告说，2010 年至 2012 年的三年间，中国总共提供了 890 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其中一半是向非洲国家提供的。2014 年，中国政府出资 400 亿美金，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7 年，习近平宣布向该基金增资 1000 亿人民币。

习近平自上台，每次出访到处提供对外援助。2018 年 7 月，习近平出访非洲无果，一路大撒币，送给斯里兰卡 20 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 147 亿美元。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举行。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抵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谋求在非洲有更大的影响。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峰会吸引多国领导人出席，是“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结果”，峰会有望构建“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对接“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表示，中国将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8 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 10 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 500 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提供 150 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 200 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 100 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 50 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 3 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 100 亿美元。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2020 年 4 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共操控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纳瓦罗说：“过去十年，中国非常积极地试图控制这些国际组织，通过推举代理人进入高层。”

其中，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2006 年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世卸任后，中共指派出身非洲马列党高层的谭德塞，充当世卫代理人。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中共农村农业部副部长的屈冬玉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中共教育副部长郝平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林毅夫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建海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

最令世人不齿的是中共驻日内瓦公使蒋端成为人权理事会专家组成员，有遴选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决策权。联合国监督机构、联合国观察执行董事诺伊尔表示，让中国担任该职务，就像找纵火犯担任消防局长，荒谬而不道德。

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为倒数第五。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为“劣中之劣”。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于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首届的主题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中共政府主导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为了保证第一届会议的顺利进行，会议期间由中国电信提供了专用无线网络“iWifi-Wuzhen”，能保证会议期间5万人同时上网。在11月19日至21日会议召开期间，北京政府暂停了对主办地乌镇专用无线网络“iWifi-Wuzhen”的网管措施。通过此Wifi，到访乌镇的嘉宾、记者以至普通游客们都可以正常使用Facebook、Twitter、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BBC中文网等被防火长城封锁的网站。而登记使用“iWifi-Wuzhen”专用无线网络，用户必须在登录页面使用本人的手机号码注册，获取验证码后才可以使用。此次网管措施的临时解禁在21日随着会议的结束而停止。中国人权周刊直接引用一些中国大陆网友的评论，戏称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局域网大会”。

2016年9月，中国在杭州举办了G20峰会。2016年7月10日，浙江台州椒江区白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恩平在QQ空间发表题为《杭州，为你羞耻》，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G20峰会，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随后他被开除公职和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遭警方刑拘。自8月开始，杭州许多企业被停业，商户、餐馆被关门，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都被警方强制贴上了封条。政府在市区以及浙江省其他区域部署了大量部队警力及戴“红袖章”巡防的国家机关干部和普通居民，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自8月底开始杭州及周边道路交通采取限流和安全检查等管制措施，政府亦推出周边景点优惠措施，鼓励杭州市民出游。对于相关管制措施，批评声称G20已成为浙江地方政府官员巴结讨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欢心、逼疯杭州人的“疯会”。

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BBC 中文引述分析：中国虽然表面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也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之一，只接受对自己有利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属于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与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同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持者和吹鼓手。

金灿荣认为其实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没什么了不起，说穿了就是地底石化能源的大机械产生的制造能力，其效能约是人力的成千上万倍，整个社会被解放出的时间、精力就能用于更新机械的研发设计和文艺文化创作，所以制造业和重工业是国力之本，同时工业品和机械能够大量出口，提供了国内人民不必出国就能赚取大量外国钱的重商主义机会，所以任何放弃工业工厂的国家不论金融游戏、文艺创作或观光服务做得再好，最终结局都会是衰弱。

张维为倡导建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解构西方学术话语；他曾多次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张维为担任主嘉宾的《这就是中国》为中共独裁续命，有巨大反响，其收视率位居思政类全国前五位，中国大陆视频网站播放量超过一亿次，祸害无数青年人。《人民日报》评论称：“围绕着一张小圆桌，讨论、演讲、答问，让年轻观众们思考新中国 70 年发展背后的‘理论力量’。”金灿荣和张维为都被认为是“出卖良心”的无耻学者。

“走出去”战略始于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旨在推动海外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贸促会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支持本土企业进行全球布局，同时发展本国和国际市场。在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投资大大增长了，特别是私营企业。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对外投资从 1991 年的 3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03 年的 350 亿美元，在 2007 年达到了 920 亿美元。

2005 年 5 月，联想集团收购 IBM 个人电脑部门；2009 年 2 月，中铝集团宣布将投资 195 亿美元入股澳大利亚 Rio Tinto 公司；2009 年 2 月，五矿集团宣布将投资 17 亿美元入股 Oz 矿业公司；2010 年 3 月，吉利汽车收购美国福特旗下的富豪汽车；2010 年 3 月，海尔集团收购了日本三洋品牌所有业务；2013 年 10 月，复星国际收购了纽约 60 层大楼曼哈顿广场；2016 年 1 月，大连万达集团收购美国传奇影业；2016 年 1 月，海尔集团收购了美国通用电气（GE）旗下的家电业务；2016 年 2 月，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了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2016 年 3 月，美的集团收购了日本东芝旗下的家电业务；2016 年 8 月，中欧体育投资收购意大利 AC 米兰超甲足球队、苏宁收购意大利国际米兰超甲足球队。

2014 年 10 月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宣布将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 19.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安邦保险。希尔顿集团与买家签订了为期 100 年的合同，将继续管理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2015年12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以20亿港元收购《南华早报》，编辑方向开始改变。一百年前，该报创办人之一的谢纘泰欲透过《南华早报》支援颠覆满清皇朝，并以英语向世界宣扬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华早报》成为中共大外宣的组成部分，还是中共内斗的晴雨表。2017年7月，《南华早报》报导称一名新加坡籍的商人蔡华波在香港有多项投资，多次增持半岛酒店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的股份。文章暗示这位商人与习近平的亲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关系密切。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45位升至第17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外出花费2580亿美元，占2成国际旅游收入，有1.305亿中国人到外国旅游。

伴随着每年上亿人次的出境旅游，中国游客的素质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随地便溺、便后不冲水、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乱涂乱画、贪小便宜、对服务人员颐指气使等不文明行为，几乎成了中国游客特有的标签，遭到了广泛的指责和嫌弃。如两位中国大叔在悉尼皇家植物园随地大小便、宁波游客在日本酒店顺走马桶、著名运动员在日本宾馆通宵放自来水所谓报复日本、一青年在泰国白庙饮水机洗脚、中国大妈加州当街脱裤大便等，这就是中共多年教育和洗脑后中国国民的众生相。

评注：在无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华为是一家为中国人带来民族自豪感的优秀企业。但是，中国人并不知道，华为为中共建立迫害民众的监控系统，是中共暴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助纣为虐，形象并不十分光彩，其狼性的企业文化亦是与中华文化传统相悖的。

华为在1995年开始布局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在1996年华为发生“市场部集体大辞职”事件后，任正非开始谋划加速进军海外市场的进程。1996年，华为与香港和记电讯签约，双方约定在3个月内构建一个总投资额为3600万港币的综合性商业网，成为当时华为自创办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也使华为走向全球化迈进了第一步。

除了继续开发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之外，华为还积极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2002年开始主攻非洲市场。中东方面，华为承建了阿联酋电信3G网络，于2003年正式投入商用，是全球第一个投入商用的WCDMA网络。

在拉美国家方面，华为在1999年于巴西开设了拉丁美洲首家海外代表处，但由于巴西长期只采购欧洲厂家的产品，且对于华为公司闻所未闻，因此非常排斥。一直至2004年，华为与巴西CTBC合作建设新一代移动通

信网络，是华为在拉美的首个合同。至 2013 年，拉美成为华为业务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同时拥有除亚洲以外的雇员。

在海外华为一直被质疑创办人原身份和解放军背景，2012 年澳大利亚时拒绝华为投标当地的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疑虑华为的“军方背景”。任正非在 2015 年首次公开演讲，接受 BBC 主播的对话，未有指明公司性质，不过肯定公司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祖国。而公司有推崇“狼性文化”，在给与员工超高待遇同时施以高压管理，过往曾有多位员工自杀，饱受外界质疑。

《华尔街日报》报导，自 2008 年以来，华为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60 亿美元资助。至 2019 年，华为从中国政府获得了数以 750 亿美元计的财务支援，规模远超其他国家科企扶持，协助华为迅速冒起。

美国政府 2018 年起的网络安全指控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通过华为的基础设施设备实现监控。特别是随着 5G 无线网络中国积极推动发展，美国一直呼吁阻止华为或中国电信商中兴通讯使用美国或其盟国的零件，此成为中美贸易战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发展。华为受到美国制裁的同时，也造成多家美国以外供应链受到打击。

2019 年 5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期间，指出“美国打压华为是典型的经济霸凌行为”。5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谷歌暂停与华为公司部分业务往来时表示“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不仅严重破坏两国企业正常商业合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希望美方保持理性，纠正这样的威胁做法”。

美国《纽约时报》指，华为公司遭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指控称该公司“以贿赂和圈套客户而闻名”。其员工也被美国指控贿赂政府官员。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批评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华为是依靠盗窃、抄袭以及诈骗，获得外国科技及商业机密而成功起家，华为系透过不正当的方式，才能发展现今规模。

2020 年 6 月 30 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华为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这意味着美国将无法使用该部门的拨款采购华为的产品。2021 年 3 月 12 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列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电讯设备企业黑名单。

在华为被调查之前，加拿大早就成了中共的后花园。据 The Gateway Pundit 报导，加拿大媒体 Rebel Media 获得一份被政府编辑过的文件显示，特鲁多政府“正

在多伦多加拿大军队学院以及金斯敦的其他军事设施中训练中国（共）指挥官。中共军方参与者包括 1 星和 2 星将领，以及将学习加拿大寒冷天气军事战术的整个特遣队。”

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对，加拿大国防部 2019 年取消了约 10 个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合作和活动。包括两国进行冬季军事演习、协助训练中共军人极地训练、培训联合国维和任务课程等。

2018 年 7 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五国的“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负责人开会，一致视华为为“安全威胁”，认为需要抵制华为。8 月 23 日，澳大利亚率先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11 月 21 日，白宫指责“中国日益频繁的网络攻击”；11 月 27 日，新西兰以“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为由禁止该国移动网络使用华为 5G 设备。

2018 年 12 月 1 日，孟晚舟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时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拘留审问，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加拿大皇家骑警随后根据美国的临时引渡请求逮捕了孟晚舟，罪名是欺诈和阴谋实施欺诈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孟晚舟被逮捕时面临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指控。众多传媒报导称孟氏可能是因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向伊朗出售“敏感科技”，并“以假账资料掩护”而被捕。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政府逮捕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加拿大政府指控此事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的报复。据报道，自 2018 年 12 月被拘留后，两名加拿大人被转移到拘留设施，在那里他们每天接受长达八小时的审讯，他们的牢房里的灯一天 24 小时都亮着，他们被拒绝会见领事官员和他的律师。

2019 年 1 月 28 日，美国代理总检察长惠特克，商务部长罗斯，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亚瑟·雷在美国司法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并以 23 项罪名起诉华为。

2019 年 9 月 6 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控北京利用任意拘留为工具以达成国际或国内政治目标，不只加拿大，我们所有的盟友都会关切。西方盟国已对中国这项策略表达关切，对于这种人质外交，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均强调这在国际社会是无法接受的行为。

2020 年 2 月 13 日，美国司法部提出针对华为 16 项新的刑事指控时指出，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受美国、欧盟限制或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参与了商业和技术项目，如朝鲜与伊朗。

2020 年 5 月 27 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裁决，孟晚舟败诉，该引渡案符合“双重犯罪”标准，法院对该引渡案将继续审理。

2021年9月24日，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协议声明写道，孟晚舟承认曾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美国纽约东区代理检察官妮可·博克曼表示：“在签订延缓起诉协议时，孟晚舟在实施计划欺骗一家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视频庭审中，孟晚舟对多项欺诈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

在与美方的协议生效之后，加拿大方面随即宣布释放孟晚舟。孟晚舟随后在温哥华机场并于当地时间下午4:29分乘中国政府包机回国。根据航路追踪显示，她的包机采取了北极航线，避开了北太平洋及阿拉斯加航路。而朝北偏东绕经北极航路，被视为刻意避开美国及周边空域。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方面之一，经常左右着中美关系的大局。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达到555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4200亿美元。中国一度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超过2万个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美股历史上最大的IPO和市值最高的中概股。之后，中国的大型国企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人寿、中国铝业等纷纷在美国上市。中国国企到海外上市，表面上是为中国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实际上是王岐山等盗国集团利用与华尔街等外国邪恶势力合作，就地分赃，转移和藏匿赃款，将国企利润转成私人资产留存海外。而美国所谓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共合谋财务造假，共同欺骗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其中美方与中方最大的争议是要求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交出审计底稿，中国盗国集团以国家利益和涉及中国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交出，双方的谈判一直不断。2020年，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通过后，多只中概股因未能提交会计底稿而被列入预定除牌名单。

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3月发动中美贸易战。贸易争端源起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时，宣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计估达600亿美元，以及设置其他贸易壁垒，旨在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指称这些行为导致扩大贸易逆差、强逼技术转移到中国。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中国商务部同日作出反制措施。

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表示，“我们将从我们之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与中国工作”，两国经贸谈判将重回轨道，中国将恢复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其他货物，美国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

学。特朗普同时指，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大量产品用于华为的产品中，“涉及到很多钱”，他支持美国公司向其他国家销售产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公司对销售禁令很不高兴，因此美国政府现在允许它们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习近平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2018年10月15日，美国国务卿马蒂斯在飞往越南的专机上表示，“很显然，我们并不是要遏制中国，如果那么想的话，我们早已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们没那么想过。”国务卿马蒂斯试图淡化中美两国间紧张关系，并指，“我们寻求与中国创建一种基于公平、互惠和尊重主权的关系”，“我们是两个大国，或者说是两个太平洋大国，两个经济大国。有时候也会相互踩到对方的脚，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有效管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他要告诉那些要打贸易战的人，“我们一定会反击，我们会报复。如果有人玩厉害的，我们就和他们玩厉害的，看谁更持久。”

2018年3月26日，新华社时评表示，中国人向来不惹事，但也从来不怕事。国际贸易主要缔造者，现在因为自己的失败就想改游戏规则，成了地地道道的破坏者，作为13亿巨大市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能力组织巨大的报复行动，坚实的物质基础，捍卫自身合法利益的决心和能力，美方低估为其任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2018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评论指，对中国而言，新关税无异于“雪上加霜”。并认为，中国和美国都低估了对方打贸易战的决心。这种误判导致贸易战不断升级，甚至有可能成为持久战。

2020年3月30日，路透社报道表示有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去年曾亲自下达指示，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

习近平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维护个人至上之威望，订定国家安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法执法政策，实现中国梦之国家复兴，带领中国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超越美国。

2020年5月24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原则，变得更加强硬”的提问时表示，“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2013年，刚刚担任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率领中国外交部从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开始主动进取，贯彻习近平的所谓大国外交思想，在与各国会谈中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的合作倡议。王毅于2018年3月30日率团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六次领导人会议并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领导人分别会谈，并在大会上介绍“一带一路”对湄公河流域的贡献。

2016年6月1日，外交部长王毅与加拿大外长迪翁举行会晤。会后，有记者团队代表向王毅询问了有关人权（包括被囚加拿大人高凯文）及铜锣湾书店的相关问题，令王毅大为不悦，并怒斥记者“充满偏见、不负责任”，并且抛出一连串反问。“关于中国人权状况，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了解，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发言立场的。”“你到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你知道中国已经帮助超过6亿人民脱贫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和推动人权写进了宪法吗？”此番言论与习近平的“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有相似处，不但强行代表了国民，还答非所问、缺乏逻辑、理不直而气壮。

2017年2月，王毅赴德国出席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外长会议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会议期间，王毅以“五个我们认为”，概括解释了中国对全球局势的意识观点。

2017年9月1日，王毅在《学习时报》头版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署名文章。文章写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风云演变，把握时代前进方向，站立世界发展潮头，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王毅更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过去300多年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以王毅为代表的中共战狼和外交小丑宣称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搬弄是非、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毒化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面。

刘晓明是最惹人注目的中国外交官之一，自200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他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抨击中国的批评者，对中国镇压香港民主倡导人士以及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的批评进行反击。

2020年7月的一个BBC节目中，记者给他放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似乎是新疆囚徒带上火车的视频。记者问他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他无言以对，然后回答说：“新疆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地方。”

2019年底，澳大利亚税务局向中国商人黄向墨追缴1.41亿澳元涉税款。黄向墨于2011年移居澳大利亚，开始进行大规模政治捐款。2019年澳政府对其发出调查令；12月5日，黄向墨的澳洲永居签证被取消，他则在两周后撤回了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申请。

2014年至2021年期间，新州好事围市多位市议员接受华裔开发商贿赂，以换取他们对好事围市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支持。其中一人接受了华人开发商17万澳元。澳洲廉政公署对辛迪、巴达拉蒂及桑索姆等三位议员立案调查。巴达拉蒂于1999年首次当选为好事围市议会议员，并在2001至2004年、2005至2008年和2015至2016年担任市长；辛迪于2004年首次当选为好事围市议会议员，曾担任过市长和副市长；桑索姆在1999至2000年和2009至2011年担任过好事围市市长。

在听证会上，有关方面提交证据，至少从2007年开始，巴达拉蒂和桑索姆就经常与菲利普·黄在中国或香港见面，他们在周末一起“吃饭、喝酒、唱卡拉OK”。华人开发商还安排他们到中国河北唐山市等地嫖妓。

2020年，《悉尼晨驱报》报导，一名不具名的中国官员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一份来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文件，内容列举了14项澳大利亚政府引起中国不满的行为。该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中国生气了。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便会是你的敌人。”《悉尼晨驱报》在报导中写道，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发动了非比寻常的攻击，指控澳大利亚“毒害”了双边关系。

这份清单上列出了北京认为澳大利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14个领域，其中包括2018年决定禁止华为参与5G招标，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以及所谓的“肆意干涉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澳关系下滑的症结在哪里，澳方是十分清楚的。澳方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起挑衅性、对抗性行动，是造成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

2020年10月8日，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于苏瓦太平洋大酒店举办中华民国国庆酒会，2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闯入会场拍照。台湾方面表示代表处馆员请中方人员离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人员拒绝，并殴打台方办事处，导致台方馆员脑震荡送医。斐济警方闻讯来到现场处理。事发之后，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向斐济外交部提出抗议。

2020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外界指责中国战狼外交回应称，“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国人的气节。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做‘战狼’又何妨？”

2020年7月21日，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关闭驻得克萨斯州城市休斯敦的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休斯敦领事馆是中国发展留学生间谍、获取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司令部”。“中国这些活动的控制中心是休斯敦领事馆，”史迪威指，该领馆长期以来从事“颠覆活

动”。对华立场强硬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休斯敦领馆并非外交机构，而是“间谍中心”。

2016 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揭露的一批机密文件，包含了该律师事务所自 1970 年代开始所列有关 21.4 万家离岸金融公司的详细资料共 1150 万笔，揭露了各国政治人物，权贵财阀们刻意隐藏，未经曝光的海外资产。经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全面分析，该公司有近三分之一的业务是来自其位于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办公室，使得中国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市场，而其香港办公室是业务最忙的办公室。

中国大陆牵涉其中的重要政治人物包括三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人，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青和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与其女李小琳，全国政协前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与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商业伙伴、法国人帕特里克·德维利耶等。其中一份文件显示邓家贵于 2009 年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两间空壳公司，邓家贵是空壳公司唯一董事与股东。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家公司已经注销或者停止活动。又根据中国商人王健林自述，邓家贵夫妇在万达上市前将万达的股份卖给自己，并且邓家贵夫妇在 2013 年 10 月将手中北京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曾在其手下工作十三年的徐再胜手中。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则以香港护照避过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的背景审查，以在欧洲国家列支敦士登成立一间名为“Fondation Silo”的基金公司。李紫丹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学士时，是英属维尔京群岛一间注册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至少有 8 位现任或前任政治局常委牵涉到其中。

在 2016 年 4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此事，新闻发言人洪磊仅表示：“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

2018 年 10 月，瑞银联合普华永道联合发布“亿万富翁报告”，有 100 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合计 7.8 万亿。中共急忙出来辟谣，反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中共真的需要向全国人民交代这 100 位中国人是谁，他们的名下分别存有的赃款有多少和是否有合法来源？

香港君怡酒店老板刘希泳约在 2016 年 11 月于天津失踪，但竟在 2017 年 3 月突然宣布在中国东北最边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死亡，有 9 名检察官轮流折磨他 50 多天至死，9 名检察官全部被控。刘希泳的妻子是著名央视主持人刘芳菲，面对丈夫无故惨死，悲痛欲绝，她出席杀死丈夫的检察官聆讯时，每当有被告进入法庭时，她都站着高举遗像表达愤怒。据郭文贵称，山东鲁能董事长刘振亚通过和李鹏家族、张高丽的关系掌握了巨额财富；刘希泳因掌握他们的贪腐证据和中共高官睡其妻子刘芳菲的视频而被中共灭口。

2021年11月2日，著名网球运动员彭帅通过新浪微博曝光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曾维持10多年的婚外情、不道德关系和非自愿性关系并最终遭到男方始乱终弃的经历，这是少数牵涉国家级运动员和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性侵犯问题。在彭帅发布贴文约半小时后，相关消息迅速在中国大陆社交网络上传播，但彭帅的微博帖文随后被删除，当晚中共开始大规模封杀相关内容。外界关注彭帅的情况特殊，也担心她的人身安全。对于此事件，11月3日的中国大陆外交部例行中外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询问政府对此事的评论，仅做出“非外交问题”的回答。

多年来，澳大利亚成为中共贪官藏赃款和养情妇的后花园。习近平家族、曾庆红家族、孙力军和山东鲁能的刘振亚等在澳洲都有巨额的经济利益。中共经常以经济利益为由威胁澳大利亚政商两界。

二十年来，有数百万中国青壮年“人才”移民到了海外，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觉得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不会有好的前途和未来。到了海外，很多人还自觉地加入了反共的行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中共邪恶的真相，另一方面是中共将邪恶输出海外、严重威胁海外华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发表的讲话称中国“反对恃强凌弱，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被批评言行不一，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发推特表示“我会引用他这句话”，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什·富来顿伯格认为“事实是，在我们的贸易方面，澳大利亚一直处于一些严厉措施接受端”，德国《明镜》也评论认为该言论很虚伪。

2021年3月，中美高层举行战略对话，中美双方本来同意4名高官每人向中美各6名记者只作两分钟简短、公开的开场白。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花了17分钟作开场发言批评美国。同月，中国驻法使馆认为，“如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形象受到威胁和损害，中国外交官就要守护，如果真有战狼，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疯狗对中国疯狂撕咬。羔羊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战狼”外交引发愤怒，威胁习近平国际地位。BBC中文网评论称，中国战狼外交新特征包括：“对外界的指责加以直接的言语攻击，而非用理据驳斥或解释；以谤止谤反击未经证实的言论，要么批评东道国处理疫情不利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要么扬言可能对东道国实施经济报复。”欧盟驻中国大使郁白也表示，战狼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霸凌、恐吓和胁迫式外交，欧盟和美国应该一同对抗中国的战狼外交。

2020年9月2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这条路，我们请你一起加速！》的视频，为贵州的扶贫和旅游做宣传，并号召“全民加速”，被网友调侃习近平的“总加速师”

称号获得官方正式认证。2020年10月5日，有个YouTube频道上传题为“总加速师是条狗”的视频，及后更改标题为《国家命运和狗》，内容谈到清朝慈禧太后爱好养狗，并以养狗之事影响国事的判断，该段视频被传指暗讽习近平。除此之外，赵立坚、华春莹、王毅、胡锡进等人因发表战狼式言论，被网民揶揄为“副加速师”。

第四十五章 郭文贵爆料革命

2017年1月26日和3月8日，郭文贵先后两次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集团的电视直播专访，声称为了“保命，保钱，报仇”，高调披露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多位中共权贵和相关人员的特殊身份背景和涉嫌贪腐丑闻，涉及中共政治局现任和前任常委级别人物及其家属，从此开启爆料革命，震撼华人社会，进而吹响了全球灭共的号角。

评注：郭文贵是山东省莘县古城镇西曹营村人，其父郭金福年轻时赴吉林省磐石县红旗岭镇赵家沟谋生，郭文贵于1970年5月10日出生在赵家沟。郭文贵自小就是一个孩子王，武功高强，好打不平。

1980年代初，郭文贵进入古城中学读初中。毕业后未考上高中。此后，郭文贵带着未婚妻岳庆芝，赴河南省郑州市定居，并混迹南北，经商倒卖。郭与岳庆芝于1989年双双成为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驻郑州业务处职员。

1989年5月28日郭文贵因卷入经济诈欺案被公安收容审查，同年8月19日被逮捕，其后因病取保候审。该案在1991年10月开审，他另被加控阻碍执行公务罪。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当时在刑警拘传郭文贵时，郭文贵用手卡住刑警宁某的脖子，并指使其妻岳庆芝外出喊人，其八弟郭文宾手持菜刀冲入室内，砍伤刑警宁某。宁某掏出手枪将郭文宾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判决书指，郭文贵当年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双方签订购油协议。当年无业的郭文贵，协议上却是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签署协议，先后3次共骗得7150万元人民币。郭文贵最终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在清风看守所，郭文贵结识了许多“六四事件”的仁人志士和同样遭受中共诬陷的奇人逸士，获得珍贵的人生感悟。郭文贵出狱后前往国外云游，之后归国继续经商。

1992年郭文贵创办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该厂登记注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郑州干休所下属的集体企业。1993年9月，河南大老板家具厂与香港爱莲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裕达置业，初始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董事长为香港爱莲代表夏平，郭文贵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合资公司开发的裕达国贸大厦原来是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后来建成“中原第一高楼”。

1998年6月，郭文贵和演员朱时茂合资成立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1年2月，朱时茂退出，郭文贵也将股份转让给他人，公司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因开发“盘古酒店”项目，又更名为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

2003年，因为受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方案削减了摩根中心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以及与建筑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团发生工程款纠纷，摩根中心工程停工。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7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资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之名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1亿元中标，并将摩根中心更名为“辉煌中心”。这次重新招标是北京市主管城建并主抓奥运工程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的一名情妇借北京首创集团旗号巧取豪夺。郭文贵向中央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2006年6月9日，刘志华遭到中纪委“双规”。2006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摩根中心地块再次收回，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组成的投标联盟放弃该地块，该地块由摩根投资重新获得，此后该项目更名为盘古大观。

随着北京盘古七星酒店、金泉广场等一系列地标性综合体的落成，郭文贵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背后重要的运作力量。

郭文贵以成功商业人士的身份影响中共高层，和当时中共开明派合作，期望以体制内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围绕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斗争，郭先生成功拿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为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所嫉恨。郭文贵先生还布局许多重要行业，在海通证券、民族证券、北大方正等企业的运作中，又引出一系列重要案件。

因生意上的纠纷，以及为了躲避中共再一次的加害，1999年和2005年前后，郭文贵曾两度逃往海外。2012年王岐山上台后不久，郭文贵被逼又逃到了香港，辗转到了海外，最后在美国开始“爆料”。郭文贵说，“如果我还在中国，我必死无疑”。

中共乱国，在其暴政下，国将不国。七十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做奴隶，当奴才，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郭文贵撕破了中共盗国贼集团假恶丑的面具，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指出腐烂了的中共是纸老虎的真实面目并与之抗争，并唤起国人要勇敢地站起来，是真正有勇气的中国汉子！

作为正道主义的倡导者，郭文贵通过爆料革命启动了全球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国人，使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到反共灭共的伟大事业，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因刘志华案早已被调查，王岐山的把柄掌握在他人手上，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南普陀计划后，王岐山掌握中纪委，孟建柱掌握政法委，二人合作“纪委加公安”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兴大狱，百万党员及家属的命运因此改变。王岐山以为郭文贵、马建、高辉、满永平、马馼、何勇、吴官正、令计划都参与了调查，对涉及人员欲一网打尽。2015年1月16日，中纪委通报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3月，胡舒立控制的财新发表了特别报道《权力猎手郭文贵》；各种信息都表明王岐山在对郭文贵动手。

马健被调查导致郭文贵已于2014年底离开中共控制的大陆。郭文贵从北京到了香港，在香港也经常往返美国，英国，日本到处跑。2014年11月29日，在中共决定去香港动手前20个小时不到，郭文贵马上飞到英国，飞英国之前飞机没有任何申请，“到机场我说起飞，他说没有申请我说飞，打电话给塔楼，塔楼这时候说，你们可以飞。”飞上天上以后，接到中共解放军的军事台电话，飞机不能跨越香港的西线，要从大屿山过来经过深圳，必须停落，有技术飞行误操作问题。“机长都傻了，说你怎么办？我说飞出去，现在合法了吗？合法。合法。我说飞！按既定路线飞，我们就直接就飞过去了，三个小时，上了就上了公海了嘛，我们飞机上收到调度，“飞机申请改变航线成功”。

郭文贵先生离开香港两个小时后，大陆就开始到香港大搜捕。到了英国大概待了两三天，中共追杀到英国，郭文贵从英国就飞到了纽约。2015年1月10日，郭先生已于三天前到达纽约，在纽约四季酒店总统套房，坐在77楼阳台上，接到吴征电话，说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查封你所有资产，“你全家都被抓了，在中共中央，中纪委。你要不听话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听话。”郭先生坐在四季酒店的窗台上，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说从现在起“过去的郭文贵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告诉你，我下面所有的人生就是开始灭共。”

2017年1月26日，郭文贵接受明镜记者陈小平的采访时说：“我今天要做的，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颠倒乾坤的人，谁是咱们大清朝赵高似的人物，谁是一个个的赵高似的人物，像傅政华这号人不就是赵高吗？党中央相信你，叫你带领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那你现在是想弄谁就是谁、吃了左边吃右边，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咱们的国内的所谓专案组一个一个地办案，全部不以事实为根据，也不以法律为准绳，也不管

你有没有证据，完全给你造出来的就够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现在刑讯逼供这个词完全不能形容所谓的国内办黑案了，这已经超出了人性的底线，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夸张。”这一天，郭文贵爆料傅政华，马建、李友案件内幕。在节目中，从北大方正李友的问题展开，揭发国有资产侵吞问题。

评注：2021年10月2日，傅政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之后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2022年3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异常严厉的措辞发布通报，称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投机钻营，利令智昏，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造成恶劣影响；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对纪法毫无敬畏，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政治后果；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

傅政华2010年刚上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提出治警铁纪“三个凡是”：凡是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一律给予行政开除处分；凡是泄露警务工作秘密、违法办案、办人情案的，一律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是打听案情、说情托人、接受吃请、收受财物的，一律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3月8日，郭文贵再次接受陈小平采访中说：“今天文贵在这块儿直播，参与明镜直播的目的，刚才我已经一再重复了：我希望像我这样的悲剧呢，不要在中国再发生，或者说是有更多发生。这是个悲剧，因为你们无法想象。今天三八妇女节，我对我母亲、我妻子、我女儿，还有我那几个女员工被关了两年，还有我哥哥们，还有我那侄女们，还有特别像我们杨英副总，还有像我的侄女们，都是孩子都是一岁两岁在里面关了两年了，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我是郭文贵，我的老弟不是韦石所说叫郭文奇，我弟弟叫郭文斌，不再是那个，那完全是谎言。现在我八弟不在，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从小跟着我父亲母亲长大。就这一个女人，我对母亲——这个女人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所以三八妇女节，今天的三八节播这个节目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这样事情的发生，最受打击的是家里的母亲和妻子和女人，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那么

我们今天反腐的初衷，就是让我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我也不希望我这些女员工们，还有男员工们，和我的家人们，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一天，郭文贵继续爆料傅政华，谈盘古案件内幕，同时开始警告王岐山、孟建柱、孙力军等人，此外还爆料了胡舒立、李友、韦石、西诺等人，以及贺国强、李源潮、令计划，节目中郭先生放出了吴征的通话，印证了吴征和杨澜在海外系统性特务运作的现实。

郭文贵说，围绕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前后的人事安排，中共高层的内斗趋于白热化，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系列大案的背后，是江泽民派系在南普陀计划的密谋。新一代盗国集团粉墨登场，依靠中共开明派在体制内自我改革，和平实现中国社会民主化已无可能。

2017 年 4 月 6 日，上任不久的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加勒比海沿岸的自家产业海湖庄园接待到访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司法部在尼基·戴维斯案的文件中透露了习近平对遣返郭文贵的尝试。为了遣返郭文贵，习近平亲自出马游说川普总统。

郭文贵介绍说，2016 年大选，川普入主白宫，永利被任命为总统就职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被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席。永利在澳门拥有赌牌，中共借助永利的私人关系去影响川普总统。埃利·布罗伊迪和永利参与了对川普总统的游说。

2017 年 4 月 19 日，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继续指称中共高层内斗，并声称为了让其国内被抓的家人和公司员工恢复自由，他曾接受中国大陆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命令，去收集和调查海南航空的近年来资金进出情况。当天直播预计进行 3 小时，但播出到 80 分钟时便突然中断，引发中方施压美国之音的猜测。但是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在国会调查中拒绝承认是受中方指令，宣称是自主行为。

在美国之音断播门事件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对郭文贵发出所谓的“红色通缉令”。郭文贵说，长期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是中共对外渗透的重点之一。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共强力运作下，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上任该组织主席，孟宏伟上任后，立即加快动用其资源推动遣返郭文贵。出于对 419 美国之音直播的恐惧，中共在节目开播前发出了红通，试图给美国之音施压。

评注：2018 年 9 月，孟宏伟从法国里昂回到北京时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人员扣查。

2019 年 3 月 2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给予孟宏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通报中称孟宏伟“毫无党性原则，毫无组织观念，不按规定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特权思想极其严重，公权私用，滥权妄为，肆意挥霍国家资财满足家庭奢靡生活；家风败坏，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利用其职权搞特殊、谋私利”。

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中，指控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他有家人是非上市公司海航集团的股东之一，而且王的家人在美国加州一早拥有价值五百多万美元的豪宅；郭称后者经多个华文媒体查证有其事。及后，郭更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对王立案调查。2017年5月29日，郭文贵在YouTube上直播，爆料王岐山控制中国大陆数十万亿金融资源，拥有国外多间房产和私生女等个人和家庭隐私。王岐山至今没作出辩解。

2017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一行4人持过境签证登门造访郭文贵位于纽约第五大道荷兰雪梨酒店18楼的寓所。在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谈中，刘彦平等中国官员敦促郭文贵回国，政府然后将会解冻郭文贵的资产，并放过郭文贵的亲戚们一马。由于刘彦平等人的签证并不容许他们从事官方事务，因此引起联邦调查局FBI的关注。当天下午下班晚高峰时间5点左右，FBI人员在纽约宾州火车站当场向刘彦平等4人查问。起初，刘彦平等人宣称他们是文化事务的外交官员，之后他们承认是国安人员。FBI人员指示他们要离开美国，宣称他们有违签证性质，并要求他们不要再与郭文贵接触。

刘彦平等之后等上火车返回华盛顿，FBI以为他们将会在24小时内离开美国。但两天之后，即5月26日，刘彦平等人在当天傍晚飞返中国之前，再次回到郭文贵的寓所。在华盛顿，为了是否逮捕刘彦平等人一事，白宫官员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情报机关等有关官员召开一次电话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担心事件将导致在中国的美国官员受到报复，对采取行动表示有所保留。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另一建议：再次检查这班中国官员，目的是使他们赶不上飞机，以便进一步的扣留。但美国官员们始终没有达成共识，FBI人员于是只能扣下刘彦平等人的手机，然后才准其登上飞机，回到中国。

刘彦平本来准备去哥伦比亚特区和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碰头，而FBI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突然对他盘查，后来在肯尼迪机场又发生了扣押遣返事件。这件事打乱了孙力军的阵脚。中共不得不将扣押的郭文贵妻子岳庆芝和女儿郭美送到美国。她们母女二人于2017年5月16日下午2点抵达美国，与郭团聚。可以说是郭文贵爆料革命的第一个胜利。

评注：2020年4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双开孙力军的通报中写道：孙力军“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中共披露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有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原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原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原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

2008 年起，孙立军历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局局长、二十六局局长、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2018 年 3 月 28 日，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夏威夷地方法院的法庭文件，在马来西亚商人刘特佐的安排下，孙力军于 2017 年 5 月前往中国深圳一家酒店会见时任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副主席埃利奥特·布洛伊，希望对方游说特朗普政府驱逐发起爆料革命的流亡商人郭文贵，布洛伊随后交由赌场大亨史提芬·艾伦·永利亲自向特朗普转达孙立军的请求，永利在同年 6 月与特朗普共进晚餐时转达了这一要求。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孙力军长期执行公安秘密任务，参与镇压法轮功、香港铜锣湾书店抓捕及 709 大抓捕，并且指挥审讯，包括使用酷刑，维权律师、709 被捕律师家属和法轮功学员受到严重迫害。

2022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7 年 6 月 16 日，在明镜专访第三期，郭文贵爆料盘古大连法院、潘石屹、胡舒立、黄艳、董克文诸案件，指出中共借助国际刑警组织运作遣返郭先生的红色通缉令，从贯君开始爆王岐山海航利益集团。

在时长四个多小时网络直播专访中，郭文贵回答了采访记者陈小平的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对盘古氏公司“骗贷骗汇案”审判结果的评论、对九家中国大陆企业赴纽约联合起诉事件的评论、网络直播爆料的动机和中长期目标、对历任国家领导人家族的了解、与国内“新”“老”领导的交流和博弈、全球新闻发布会的计划和安排、爆料的信息来源和收集方式等。访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爆料内容是披露王岐山多个亲属的美国公民身份和房产资产、海航集团的金融网络与关联公司、海航主要负责身份和疑似贪污贷款所涉及的银行账号和交易记录。郭文贵在访谈中称，相关人士所涉及的资产总值高达 20 万亿元。

2017年6月30日，郭文贵在报平安视频中揭露范冰冰、许晴在内的众多女明星和王岐山有染，王岐山还录制了有18张光碟之多的性爱影片，郭文贵也看了一部分。7月13日，范冰冰宣布正式委托美国律师在美起诉郭文贵；许晴也在7月7日发表声明作澄清，宣布委托律师起诉郭文贵。之后，郭文贵承认无意中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双方达成和解。

2017年7月17日，郭文贵第四次接受明镜新闻网采访，再次报料王岐山家族以及曾经下属腐败的证据链。节目中，除了披露了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及其儿子陈超、陈晓峰与亲信姚庆、王健等人的关系网，他还公开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及护照号码等个人信息、在海内外各大银行账户余额和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信息。他还进一步公布了王岐山家族在美多处房产的地址和房主。据他所说，上述资料一部分由自己的团队收集，一部分基于所建立“分享信息”、“信息置换”的关系源于美国政府。

评注：2018年7月3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期间，于博尼约的一个小村游玩时因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离世。郭文贵说，王健是被王岐山谋杀的。

郭文贵爆料了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简称海航）内部股份控制的黑幕，实际它是王岐山通过家族成员和多个私生子女利用复杂的关系网控制的私人公司。冠军、孙瑶、姚庆、刘呈杰等王岐山家里人所占的股份超过51%。也就是说王岐山家族控制着海航的万亿资财。海航的表面领导王健和陈峰只是白手套、代理人而已。

郭文贵爆料了海航真相后，引起了中共和盗国贼王岐山的恐慌，急忙处理海航的相关资产，将大量的财富转给纽约慈航基金，实际该基金是王岐山家族的私人基金。

郭文贵在2017年爆料时多次重申海航的董事长王健和陈峰一定会被抓、被消失或被弄死。因为他们帮助盗国贼窃取太多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犯下了罪行。同时，盗国贼为了掩盖真相定会让他们永远闭口。果然，王健2018年7月3日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小村“拍照坠落”而死。法国普罗旺斯王健被害身亡案虽然未破，但是，真相恐怕早已大白于天下。2021年9月24日消息称陈峰被抓。

2017年11月20日，郭文贵就王健被害事件成功地在纽约召开了发布会，宣布成立法治基金、法治社会。郭文贵还爆料，中共对美国有“3F”计划，并首次向世界发出警告“中共给世界带来的黑暗即将来临”。

郭文贵最早从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力军盗国集团开始披露，数年间爆料内容所涉及的人物尽已失去自由或入狱。郭文贵在爆料中逐步揭露中共和历史上人类黑暗势力的渊源，中共红色家族篡取国家政权后利用国家机器奴役中国人民、向全球输出腐败、疯狂扩张，妄图控制全世界。爆料革命揭示了中共多年处心积虑密谋的潘多拉盒子、南普陀计划、3F计划、13579计划、双龙计划、蓝金黄等等邪恶计划，并揭露了中共奴役中国老百姓 70 年的各种罪恶。

“蓝金黄”三种颜色代表的是：通过提前布局和埋伏，控制全球互联网，这是蓝；利用金钱利益输送收买，这是金；黄，就是美色。郭文贵 2017 年 8 月 7 日直播说：“台商都知道的游戏规则！领导都安排好了。饿哦们都是表兄弟。钱也替我付了。所以在台湾很多台商，故意中招，故意往蓝金黄这个计划里跳！因为他享受这个黄！享受这个金！”2019 年 1 月 1 日郭文贵视频中说：“关于加拿大被蓝金黄的问题，有多深啊。我觉得加拿大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政府，非常受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法制国家。但由于过去，特别是和中国的经济加深，加密合作以后，被共产党在西方成为打击美国、渗透美国、蓝金黄美国的桥头堡。加拿大已经成了共产党对付美国的叫北部大平台！南部是巴哈马。”

根据郭文贵爆料，南普陀计划是江泽民集团在浙江舟山普陀山召开秘密会议制定的计划。从 2007 年中共十七大后，胡锦涛的共青团派进一步扩张实权。团派最重要的人物令计划成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经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胡锦涛的声望达到高峰。团派开始谋求胡锦涛卸任后向最高权力角逐，各方面围绕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开始了日趋紧张的斗争。

2011 年夏，80 多岁的江泽民一度病重，一时间政坛中的江系人心惶惶。绞肉机中的大小零件们都在选边站，江泽民死后树倒猢猻散，如果不向胡锦涛表忠，清算的刀就要落在自己头上。许多已经掌握重权的江泽民旧部流露出另投胡锦涛的迹象。

江泽民康复后，对期间旧部的离心离德感到愤怒。以王岐山、孟建柱为代表的效忠江泽民的人物，以及江家的江绵恒，政治盟友曾庆红等，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今后几年的政治计划，并从十八大之前开始执行，直到习近平时代的前期。南普陀计划深刻影响了中共和中国的命运，一时间中共高层腥风血雨，直至失控，推动了中共的衰亡。

郭文贵把孟建柱称为“孟监国”。他介绍说，南普陀计划这场政治大清洗的赢家，既包括媳妇熬成婆的习近平，也包括江家新一代的利益代言人孟建柱。孟建柱从爱健身、爱女人的老实人，成为了中国最黑的刀把子、掌管数百万公检法的中国

的贝利亚。除了政治上搞人，肉体上消灭人，在经济上，从盛京银行、海航、江西铜业，到绿地、明天系，.....巨额的财富建立在颗颗人头之上。用孟建柱的一句话：“习近平的智商和习近平的情商，和老佛爷也就是江泽民那要比的话，那是千年的差距。用孟建柱说的话：“习近平最多当个什么？地方地市级干部的干部，也就是厅局级干部。”这是孟建柱原话。

评注：2017年11月22日晚，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十余名家长反映，孩子被老师用针扎、喂成分不明的白色药片，并提供了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红黄蓝事件”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热点，引发网民关注和愤慨。

较早一起为2015年12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被曝有近30名幼儿遭针扎。2017年4月，一段据称拍摄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大红门分园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内容是幼儿园老师推搡、踢打孩子。2017年11月27日，在河北沧州运河区分园，有家长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到侵害。2019年1月25日，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万科城的红黄蓝分园一外籍教师丹尼尔在学生午休期间，趁无其他教师在场之机，对一女童进行猥亵。2021年4月12日，有微博网友称江西瑞金红黄蓝幼儿园一男性幼师在朋友圈发布了三张男童闻成人脚掌的照片，其配文写道“从小培养m”。

红黄蓝教育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立儿童早期教育企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令人疑惑的是，2016年以后，各地政府官员对红黄蓝旗下幼儿园视察增加。2016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孟建柱、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共同考察海南生态软件园，并视察了位于软件园内的红黄蓝海南生态国际幼儿园，称赞该幼儿园“环境好、理念新”。

郭文贵说红黄蓝幼儿园专为中外官员特供双修幼女，摧残少年祸及子孙。

2019年12月15日爆料称：“弄官员有中纪委，抓人有政法委，判人有检察院有公安。那孩子咋来啊？8岁，14岁，怎么来啊？水啊，阴啊，代表水阴啊，什么呀？就是红啊，红就是火啊，黄就是阴呐，这叫智慧女；蓝呢？蓝叫啥呀，大家记得吗？叫土。黄叫土，对不对？所以说，咱得搞一个叫红黄蓝幼儿园，红黄蓝。红黄蓝干嘛的？红黄蓝是给他培养叫智慧女的，搞双修的。还得把它上市。弄哪上市？美国啊，华尔街啊？”“谁能让红黄蓝的孩子小女孩阴道被人家戳了以后也就是破了处以后，把火、阴、土、智慧女变成了双修女之后，还不能有人去碰，不能有人去查，谁敢说

话家人消失，连那公安的孩子都被消失了。孟建柱亲自到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家里面告诉，“孩子不错吧？按上探头看着点。听说你孩子想爆料嘛？”

2021年11月5日郭文贵再爆料称：“红黄蓝幼儿园是满足中共官员变态需求的缩影。中共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中共红黄蓝是给孟建柱培养智慧女，目的是给中共高官们搞双修，它背后老板就是孟建柱。红黄蓝幼儿园孩子们的描述，有爷爷医生，有叔叔医生，小朋友光溜溜，爷爷有衣服穿，但叔叔也光溜溜。”

2001年4月，孟建柱调任江西省委书记，成为地方诸侯。对他而言这是一次失败，因为这次任命实际上关上了他通往皇储的大门。郭文贵说，孟建柱带着他的大马仔孙力军，经手了这些年几乎所有的大案。不仅如此，他们的手还伸向了香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乃至美国司法系统的内部。控制全世界的野心无与伦比地膨胀起来。在香港，他们的傲慢造成了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这个事件让香港人开始意识到司法渗透可能带来的巨大生存危机，终于导致了2019年由反送中条例引发的、持续至今的香港历史上最大的香港抵抗运动，成为引发国际警觉、重审对华关系，乃至迫使中共释放生化武器、引起世界动荡，最终死于自我疯狂的灭共的第一道大门。

郭文贵2019年8月23日第一次直播中说：“太尼能把美国的所有男人杀死三回，女人杀死两回到五回，”这不是开玩笑的。芬太尼是共产党.....，在两年前我和比尔盖茨先生在华盛顿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共产党的BGY计划和3F计划是一个国家集权要搞弱美国、搞乱美国、搞死美国的计划，现在美国人还天天在念叨哪，你都死了多少人了，现在才明白，美国人反应得太慢了。现在大家知道那是恐怖主义组织叫共产党，它不代表中国人民。”

郭文贵在2021年12月28日视频中回答伊莎贝拉的问题时说：“如果你去看我从2017年，我开始上社交媒体，还有我使用Twitter还有YouTube，都是直播的。我从来不会录播的，不会像你们一样录播可以编辑篡改的。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说过打开潘多拉盒子，我就说过共产党已经为西方准备潘多拉盒子。我也为共产党的下台准备了潘多拉盒子，而且我就谈到了生化武器和化学武器。”“那么后来我一再说到，西方一定记住黑暗即将到来。不仅我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公开的在去年，在这个病毒2019年的前几个月告诉美国：‘你们真的想我们打开潘多拉盒子吗’？他本人官方也讲过。然后冠状病毒就放出来了，就发生了。”

根据郭文贵介绍，13579计划是由迟浩田亲自设计规划，习近平签字的第一绝密文件，其主要内容为：1 制造一种生化武器；3 自2017年起三年内付诸实施；5 保证此种武器五年内有效；7 彻底瘫痪七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和日本印度）；9

九个月内出疫苗来要挟全世界。同时，郭文贵已经充分预计了中共的魔性和对整个人类极其恶劣的后果；针对西方政界精英目光短浅的状况，郭文贵希望通过爆料革命认真地唤醒沉睡中的西方世界。

郭文贵原定于2017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主题为“与郭文贵对话”的活动，主要议题是中国政治高层的腐败，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统治体系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然而，在接近活动开始前，主办方突然宣布活动推迟，哈德逊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也一度陷入无法访问的状态。

美国司法系统被中共渗透极深，中共动用这些力量游说遣返郭文贵，同时为1MDB案开脱。孟建柱的私生子刘特佐是华尔街之胖狼，在美国因1MDB案臭名昭著。孙力军去美国办事，许多方面要借助刘特佐巨大的全球勾兑网络。从2017到2018年，尼基·戴维斯女士游走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DNC)副主席埃利·布罗伊迪(Elliott Broidy)和刘特佐之间，谈成了这项对川普行政当局，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其行政分支、司法部的非法游说计划。

此案的公开披露，昭示着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开官方支持，一系列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惊天大案陆续暴露出来。同时，作为对抗中共法律超限战的重要案件，涉及中共海外力量单伟建主导的太平联盟案和起诉中共走狗的瑞士银行案也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

评注：郭文贵是中共最后的掘墓人。他引领的爆料革命，坚持“为真不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见闻向世人深入剖析中国的人性、中国财富贵族背后的故事以及中共盗国贼集团的丑恶嘴脸，令国人警醒，让世人惊叹！这里节选郭文贵部分视频爆料内容如下：

因为我那时经常去中南海。我每次都从北门进去。江泽民总书记的家后面就是毛主席故居。后面还有原胡耀邦书记的家，那时夫人没过世，还在旁边住着。这个人说，当时在中南海，准备给习主席安排房子的时候，结果安排来安排去没有房子。后来习主席问“旁边哪还有什么空的？”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姓陶的，说“旁边就剩一个，毛主席故居了”。习主席说“那我就住毛主席故居吧。”习主席就搬进了毛主席故居住。这个人告诉我说党内因此暴怒。很多人接受不了习主席住毛主席故居。（2017年5月29日）

2012年的6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上次说有一次视频我说胡锦涛访美是错的，胡锦涛访丹麦。访丹麦之前发生了所谓的傅振华告密，揭发令谷死亡的重大事件，向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还有曾庆红等这些老同志，包括了郭伯雄。所以他们就在玉泉山开了会，开了会做出了所谓的决

定对十八大召开前十八大筹备小组人事安排的决定。所以呢？胡锦涛在回国下飞机以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官员接机了，因为各个总书记出国啊，北京市公安局那傅振华跟狗似的，一定要去，公安部的部长、警卫局长、中央警卫局长那必到的一些人，结果已没人接机了，什么胡锦涛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任务都得给他变了，说白了你就是被绑架了，然后呢被江、朱、曾、郭伯雄、习、王等政变成功。（2018年7月17日）

这位咱们这位朋友明确地很清楚地，就王岐山的恐惧、王岐山的紧张和敏感度，都是说跟他在，因为王岐山那时候就一定要去海南的，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春节什么一定要去海南的，就曾庆红每年冬天一定在福建过、在厦门过，王岐山一定去海南，邓小平当年一定去珠海，珠海的就是那个避暑山庄就是给他就一直为邓家留着的，这都是有规矩的啊，贾庆林也是去福建。（2021年4月23日）

那我说那又会到哪去啊？他说其他道家所分析，他一定是自然轮回界之外去。就是我说的，还想六道轮回，这些人就完了，他的家人，包括他.....你看共产党死了以后，大家发现没有，你看，江泽民九十多岁了，江泽民真是将近四十多天昏死过去，他醒过来第一句话说什么，“My God! I'm so painful.”讲的英文，你可以问江绵恒是不是这样。他出来他发生了很多幻象，讲了很多他这些天不能说话躺在病床上.....这老头挺厉害的，是他和曾庆红建立了南普陀寺，你不要小看这个江泽民。他对法轮功犯下了极大的罪，但是他绝对是有魔性，是个魔，是个精怪。朱镕基也九十多了，朱镕基这个人我跟大家说过，他把女人.....他不一定玩，他变态，咬人家乳房，很多女的被他咬过乳房，朱镕基牙印都在乳房上带着，绝对是个大骗子，伪君子。对自己的儿女无限放纵，贪婪无比，绝对的伪君子，杀人如麻。他那一百个棺材是啥呀，一百个棺材不是关人的，是往家弄钱的、弄元宝的，那一百个棺材一个没弄他家，全弄成钱回去了，而且捡好钱弄，大金元宝、银元宝的，银元宝都不要我估计，这就是朱镕基，但是也活九十多了。（2020年11月30日）

朱镕基跟江有个最好的办法，只要开会，江泽民说，镕基同志你表个态吧，哎呦我心脏不舒服，哎呦，不行，我得看医生去。从当副总理就这样，朱镕基你看他长的那个样儿，很男人。事实上是极度小人，你看他对待他儿子，你看他对王岐山你就知道。这是极为卑鄙之人，偷奸取巧之人。用装病躲过了江泽民，蒙混了江泽民，当众面夸江泽民，背后就骂。所以哲人是投机主义，这会大家整明白。（2019年10月5日）

很清楚的，王岐山家搞养老、殡葬、银行、保险、金融、纪委这块别人都别碰啊，江家的过去搞的通讯最后都让习家搞走了，是不是？搞通讯搞华为啊，ZTE什么的。他这个常委里边儿的分工，分利益啊很清楚，那么你看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共产党搞的是啥？（2021年12月3日）

第一个原因：最核心的就是我有习近平、王岐山的做爱视频，还有他们家资产清单；第二：龚小夏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就包括吴征的所谓线人告诉他，郭文贵掌握海外的情报网，然后孟建柱说我们现在很明确，马建把海外，因为马建副部长是绝对掌握的，海外情报网都是郭文贵掌握的，郭文贵手里有；第三个：说你看到郭文贵在他的电脑里、信息里掌握了习近平、王岐山等所有证券，江泽民、江志诚、朱镕基、曾庆红等所有人多少多少G的录像、美国大使馆的录像、跟日本情报部门、英国情报部门见面的录像，这都是有的。一结合龚小夏这个假报，她连一个毛都没看到，我从没给龚小夏看过一秒钟的录像。瞎编。但这个编把我家人害了、把我同事害了。但某种程度帮了我，就是习和王、孟他们之间的斗争充分利用这种假情报，夸大事实，但是也把我们的爆料革命推向了更加决绝的阶段。到现在习近平、王岐山两人都深信不疑呀，我手里有这几样核心东西。（2020年4月19日）

说双规，总书记不被双规了吗？！能出国吗？江泽民总书记能出国吗？朱镕基能出国吗？曾庆红能出国吗？常委政治局委员哪个能出国？哪个不被双规啊？他们从北京到五环都不自由，甭说去深圳广东香港了。你看习总书记去香港多风光啊！747飞机，有警车，多累啊！那个体制那个社会就是人间地狱！（2017年7月3日）

第一个江泽民的孙子叫博裕资本，江志诚。江志诚下边有二三十个基金是跟他合作的。盯住江志诚。第二个你们要盯住核心的香港那几个跟王岐山有关系的大家族。要看明白啊，要看明白。田惠宇啊、田国立啊、朱云来的基金哪；中央老常委、新常委属于跟习啊、跟王岐山跟江家跟孟家都是一伙的。这些人。你看看，他们那些基金在那些天都干啥了。（2018年9月12日）

江志成是绝对是跟江、还有和曾（庆红）和王岐山都认可，习（近平）只能干五年滚蛋，然后下一个人是他来选的，这绝对是他想的。要不然你怎么想想中国你给我说吧，所有最挣钱的微信、腾讯、滴滴打车、马云、蚂蚁金服、平安、上海银行、上海九市、兴业银行、几大地产商，哪个不是江志成控股，你给我找一个出来。（2021年10月3日）

今天腊肉节，我简单说一下马云。马云先生，我跟他喝过酒，喝得伶仃大醉。马云先生一直是我极为尊敬之人。马云先生，我了解他是从过去我有个朋友，中央电视台的，做那个《赢在中国》的那个制片人，叫王利芬女士，很了不起，这个女士非常好，跟马云先生，他俩是好朋友，我从那儿得到一些马云先生的一些过去的情况。马云先生过去跟马化腾斗，QQ什么的，斗德很很很残酷，但是他找不着组织，就是找不着老板。马云先生曾经，大家知道他的办公室从杭州到了上海，从上海到了北京，北京又滚回上海，上海又回杭州，很惨。有一次，他在中国大饭店门口，通过大饭店门口，嚎啕大哭，为啥呀，他就没人，就是没组织。后来，听说江家出手，江家一出手，马云先生咣一下就起来了，从江家当他的老板，到后来诸个常委家族当他的老板，然后他摸清了一条路，就N个政治局委员，我好几个政治局委员朋友的孩子们都是他的都是他的股东。马云就开始了马云的真正的发家之路。马云的发家主要是靠什么？就是官商垄断，就马云所有干的事情都是法律的边缘，都是法律的灰色区域或法律的禁止区域。（2017年9月9日）

马云先生我今天给朋友面子我不往下说了！就说到这儿为止！澳门赌场那个小弟买给我录像的时候，我给了他两百万。他说你这还不够马云一戳的呢！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你要能当马云的话，你有江绵恒吗？你有江泽民吗？中国所有的联通电信全服务一个人：马云！另外一个人叫马化腾！14亿人民的通信权被他们垄断了！你有吗？你就贪了你？我说你能贪得过吗？给你两百万你还想着马云一戳就没了！马云一玩几十个亿！马云他有钱！马云他钱哪儿来的啊？马云那块儿那是洗钱呢！对不对啊？所以啊今天啊马云的事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给我这个老兄的面子，我就说到这儿为止。本来要重说马云先生的。（2017年9月10日）

当时马云最牛的一句话：老子做生意不为了钱。但是你觉得现在马云他是不是为了钱？马云到了香港，马云到了香港的活动证明了——是不为了钱，我为的是权，我为的是权力。马云在香港所有见的面、布的局都是为未来的权力，在全世界颠覆习近平，要树立所谓的上海江家江志成、王岐山和他朱镕基这样的啊，马云这样的政府。很多人以为是不是马云上去当中国总书记？江泽民，江志成上去中国就很好，习死了，这些人是不是比他更好？（2021年10月13日）

马云是靠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造成的百分之百的市场垄断的权力和制度，与官员们真正勾结最好的样板，这就是马云第一成功的。第二，马云这人民法律贡献，什么叫淘宝，全都是卖假货，这全天下人类都知道，全

卖假货，偷税漏税，卖假货，然后到全世界去，还得打着一个英雄、救国救民、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这个事情，这真的是人类的悲哀。（2017年9月9日）

中国的体制如果是一个好的体制，万达的王健林、马云、许家印、吴小晖，这个肖建华，都是好企业家。这些人在哪国他都是天才。那柳传志先生在哪国都是天才，你不得不承认。啊，他们投机，马化腾，啊，头两天都在骂马化腾，都在骂那个那个什么张，京东的张什么？我不知道那小伙叫什么东啊？啊，这个穿上这个什么什么八路军红路军这个跑到什么井冈山去了。大家骂他干什么呀？他是被强奸的。他明天脱光了呢，那时候你也不要骂他，他没选择。一个企业在中国那种企业家，他首先他要生存，他要为员工发工资，他还得……上市公司为股民负责，还有个他还有家人，最后一个他要记住：他扛得过那些盗国贼吗？（河南方言）王岐山一个电话就把他给灭啦，那不用个电话呀，王岐山就是个眼神你就没啦！（2018年6月5日）

你看看然后单伟建跟谁呢？平安马明哲，是吧？然后呢这个是，特别是康典，王岐山的大马仔，呵呵，绝对是，是中国整个保险业的老大，王岐山的大马仔。然后周亮，呵呵，大家都记住了吧，大家看着没有，马明哲，然后腾讯，是不是？马化腾，全部是他的人。包括 SOHO 张欣，张欣那跟单伟建那是男女关系啊，男女关系，那是胡来的关系啊，潘石屹绝对是一看张欣和单伟建见面，自己要躲一边去，看门儿去啦，就跟那个谁，那个张高丽老婆一样。

我再说到单伟建，你说到单伟建的时候，中国的大咖里边沈南鹏、马云、马化腾、史玉柱、董文标、马明哲、柳传志，就这样大佬级的，包括泛海卢志强，你可以数出一堆的私营企业家，你像王健林就别提了，那儿子都出来和爹一起唱对台，一阴一阳在唱，全家都上，都在这社交媒体上。

马明哲见了单伟建哆哩哆嗦。马明哲跟布什的弟弟见面之前，他弟弟就是跟着他一起——单伟建陪着他跟马明哲见面，马明哲见他毕恭毕敬的，小布什弟弟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就是今天你们看到那个卢比奥当时还是他办公室主任呢。（2021年12月8日）

田伟是从草根出来的中共白手套，其人生哲学是女人、权力和介绍关系，田伟进入中组部如进他家；彭丽媛的恩人宋新斌帮田伟搞定了山东鲁能。宋新斌是山东郓城人，其父亲是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是宋家这个老乡介绍彭丽媛认识了习近平。肖建华通过田伟认识了曾维和曾庆红；令计划、霍克、梁光烈，陈炳德、徐才厚、郭伯雄和李鹏几乎天天都去田伟的小白

鲨俱乐部。鲁能的刘振亚的权力大到能让泰山封山，就为了他的情人拜泰山娘娘；他和杨澜的关系非同一般；田伟帮刘振亚搞女人、杀人灭口，他的小白鲨俱乐部就是中共党政军领导的高级妓院。曾维在北京东三环的 US 联邦公寓地下室有一个茶室，号称小中南海，姚庆也有几个类似的茶室；对于这些太子党来说，茶室就是警察与黑道做交易，当官的做钱权交易，和明星们做性交易的场所！曾维和孟建柱大用特用王珉替曾家、江家和孟家干脏活，结果却担心王珉知情太多成为麻烦，便把省委书记王珉送进秦城监狱，让他成为戴永革在盛京银行做的所有坏事的替罪羊！（2022 年 8 月 17 日）

大家看到中国的 BAT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个核心人物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他犯了几个大的忌讳。所有当年跟他们创业的几乎都消失了，还有所有这些人都靠他们的政治关系。最后你发现了没有，阿里巴巴的总部和腾讯总部和百度总部周围有一帮贪污犯，官家的私生子女、政治关系，还有一帮自己的哥们，七大姑八大姨。永远不变的独立董事会和董事会，永远不变的老的血液，腐败集团，永远没有新鲜血液。公平在哪里，创新在哪里，信用在哪里，没有共产党的防火墙，你立马就是零。（2020 年 4 月 27 日）

但是就像共产党一样，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撑下去吗？它的财富它的国内经济，你认为恒大倒了，就一个恒大就结束了？知道了吧？张力已经完了吧，富力已经结束了吧，富力完了，恒大完了，平安一定完，平安你不来告我你是孙子，我就求你来告我。陆金所完，马云完，腾讯马上完，百度已经完了，民生完，招商银行完，盛京银行、北京银行完，然后上海银行、兴业银行一定完。（2021 年 9 月 10 日）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都是暴力革命，农民暴动和军事政变，我们不知道今日中国之改变，会走什么样的路，要流多少血。无论如何，在老百姓的心中，乃至在无数中共党员心中，中共已死，这个暴力的政权已死，尽管它那丑陋的躯壳还延续着末日的疯狂。

郭文贵本人多次表示无意发动改朝换代和革命，但随着爆料革命的发展，郭文贵起初宣称的“郭七条”发生改变。从“反对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到“消灭共产党、消灭习近平”。郭文贵的每一次公共露面都伴随着中共的系统性抹黑。中共在墙内对郭文贵先生和爆料革命讳莫如深，极少正面公开宣传。在海外，中共一边收买主流媒体抹黑，

一边通过大大小小的海外民运人士展开了骂战。多位民运人士表示郭文贵只会把境外民运搞得乌烟瘴气，纷纷质疑爆料真实性，决心与郭文贵划清界线。

2020年3月28日，郭文贵在直播中说：“把战场拉向国际，以美灭共、依法灭共、以共灭共、坚持郭七条，这是我们爆料革命的本质、原则、决不可妥协。除了郭七条，根据形势我们要经过修改。”“我们会跟所有的媒体合作，重塑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让海外的人更加欢迎。从中国大陆出来上学的孩子们，包括这些孩子得到尊重、得到工作和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会让所有的人知道，全世界知道，香港人是全世界最大的牺牲者，她是中国人的圣地，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的素质。中华民族，香港人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这就是爆料革命，唯真不破、呼吁全球、联合灭共、以美灭共、以法灭共、以共灭共，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消失在地球上，变成一个新的中国，没有共产党的一个新中国。”

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不会乱了，百姓会不会遭殃？不会。就像满清末年没有了皇帝，中国更加太平；文革后毛泽东死了，中国才有机会拨乱反正。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才有新生。

事至今日，郭文贵说，爆料革命的目的是：“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以假治国、以黑治国和以警治国的本质；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们犯下的罪行；唤醒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清中共是邪教组织，是反人类、反社会的集团。最终团结中华民族一切的力量和全世界正义的力量，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制，让中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

北京时间2020年6月4日上午7时37分，纽约当地时间6月3日下午7时37分，郭文贵和史蒂芬·班农在美国纽约市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联邦成立。郝海东宣读了中文版的新中国联邦宣言，班农宣读了英文版的新中国联邦宣言。同时，新中国联邦的国旗用直升飞机牵引盘旋飘扬在纽约的天空，新中国联邦的国歌响彻世界各地。

评注：班农于1953年11月27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和中层经理。他的家庭是“蓝领、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迪派、支持民主党和工会”。2017年1月起，班农担任白宫首席策略长兼美国总统顾问。2019年10月建立《班农战斗室》，开始集中发声支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反击弹劾案。

班农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在海军服役七年，曾在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佛瑞斯塔号上服役任水面战军官，驻防于波斯湾，后调往五角大楼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退伍后，他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就职于高盛，着重于媒体投资。20世纪90年代，班农制作了十多部电影。

班农坚定反共。班农告诫美国人要区分“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2020年5月班农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并没收中国共产党包括习近平、王岐山在内的高官在美财富并捐给疫情死难人民家属，表示“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进行纽伦堡审判”。班农强烈批评华尔街为中共独裁提供金钱和技术；他于2020年4月在《班农战斗室》节目批评比尔·盖茨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班农在《战斗室》直播中说：“2000年到2019年中共从1.4万亿的GDP升至14万亿。基辛格一直说，纵观历史，中共不会扩张，因为中国自称是天地之间的王国，周边都是野蛮民族，只有蒙古人才想扩张，中国不关心周边，中国也不需要发展海岸线的商业。再说了中共有已经被腐蚀了的西方合作伙伴，包括布什家族、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华尔街、好莱坞、达沃斯派、媒体、伦敦金融等。”

郭文贵在2017年11月7日接受郭宝胜采访中说：“在过去这些年来，王岐山和孟建柱先生在西方的布局、和在媒体界的布局、和他们展示的国际形象，是超出你想象的！我昨天晚上才知道班农先生和王岐山见面的细节。当天王岐山先生让JANSAOTON，就是那个在清华的前高盛的CEO，主动联系的班农先生。班农本来在香港演讲完就走啦！让他去说王岐山要见他，还说有可能见习主席。所以他就私人飞机把他给接到了北京。”

2018年4月6日，郭文贵视频中说：“王岐山早就布局对这个川普总统以及身边的人进行了“蓝金黄”。而且呢信心满满，非常看不起川普总统，他在多次场合进行了贬低，甚至人格的侮辱。这个可以问一问川普总统比较熟的人——班农先生，还有那个John Thornton王岐山最好的朋友，也是带班农去见王岐山的人。”

2019年6月22日，郭文贵说：“这不是咱牛，这说明我们合作到达这个极致的顶点了。而且班农先生是我们坚定的战友，而且整个大楼里面都是最高素质的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四个常驻律师，大概六十个律师为我们工作，六十个律师，而且都是最高美国教育的人士，投资界的凯尔巴斯，班农，律师界几个大律师事务所的牛人，年轻人，美女帅哥，我们保镖团队，全都是现役警察和美国的警察，还有美国FBI退休的人，全都是武装装备，内外两层。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曼哈顿最先进的最新的楼，唯一一个防弹玻璃独立的楼，24小时运作的，这里有十个G的通讯网络，这些事你说说，就是我们具备了反共的基础和能力啊。”

2019年6月28日，郭文贵在直播中说：“郭文贵的背后有班农，班农和郭文贵的背后有CIA。CIA帮我们是正常的，不帮我们是不正常的。那有

啥呀？对不对呀？CIA 在国外和我们合作也正常啊！FBI 跟我们合作那也正常啊！那有啥不正常的呀？如果他们帮助梁颂恒先生，帮助香港的抗议运动，那是太好不过了呀！咱感激不尽呐！那不叫黑手，那叫正义之手，那叫神手！”

郭文贵说：“史蒂夫·班农先生是一位英雄，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们爱班农！我们爱班农...给班农先生的爱的信息太多了。他是唯一一个从中国人那里赢得如此多爱的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和美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班农 2020 年 9 月 5 日做客战斗室说：“美国的华尔街，美国的大公司，美国的达沃斯派，养肥了中共这个怪兽，罪责难逃。”

班农说：“从整个事情看，郭先生提供的信息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想要向这个世界传递什么呢？他是第一个向世界揭发了控制着北京的这个中共的杀人本质，这些中共的盗国贼只是数个家族，总共只有九十多个成员，就是这些家族企图统治整个世界，由于他们挟持了中国的老百姓，他们通过持续奴役十四亿中国人民推行他们统治世界的邪恶企图，但是他们通过输出腐败、洗钱拉拢世界的精英，世界的精英是中共的合作伙伴，这些精英们向中共叩头，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人，所有的小人物们，不管这些小人物们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法国的老百姓还是全世界的小人物们像印度的、日本的、西欧的、非洲的，这些小人物们也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郭文贵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一个特别节目中说：“一带一路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可怕了。他真的是、他这个是野心的一个膨胀的绝对开始。这个达沃斯，班农老谈达沃斯论坛。那习到那去了，你千万、你往回看，刚才你没有提醒我，你记得习在达沃斯论坛是提了什么吗？‘给世界提供一个未来的走向的方案，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

“蓝金黄，大家看到蓝了吗？网络怎么样？金，你见华尔街、好莱坞哪里没有金？黄，你见哪个西方政要、达沃斯政要到中国去，哇塞天津搞达沃斯论坛，清除夜总会突然间天津增加了 30 万小姐，这个你们都知道吧，你们都知道吧，你说它开达沃斯论坛你来 30 万小姐，文霄你说你这学过中国党史的你告诉大家干啥来了，跟谁睡呀，都清空了，跟谁睡呀？”（2022 年 2 月 20 日直播）

“坦白讲，文贵的警告没有受到西方的重视。回看文贵刚到美国，第一次记者会上对西方的警告。其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我们的政治精英，金融精英，商业精英不听他的警告，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与中共勾兑，从对中国百姓的奴役中赚钱。

所以他们不想改变，包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有的跨国企业和华人街。”
(2021年11月20日)

评注：中国富豪的悲剧。中国富豪榜往往被称为“杀猪榜”。1999年至2008年，《胡润百富榜》所列富豪中共有49人因经济问题而被调查、判刑或逃亡。在中共的统治下，富豪只是政治权贵的白手套和“小三”，是用完就扔的擦脚布。如果没有共产党，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等商业奇才，走人间正道，同样会创造事业的辉煌。郭文贵说，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只能“为富不仁”，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出任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柳传志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2021年，在联想巨额亏损的情况下，柳传志仍然收取高达1亿多人民币的巨额退休金，引起投资者的强烈不满，其涉嫌在任期间稀释国有资产股权份额的行为亦受到中共政府调查。

2020年10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各组委员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10月24日，马云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的身份进行了演讲。他说：“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借10万块，你怕银行；借1000万，你和银行都有点慌；借10个亿，银行怕你。”此番言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议论。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马云发言后，亲自下令阻止蚂蚁集团的IPO。12月24日，受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约谈蚂蚁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阿里巴巴的股价开市既跌超过15%，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美金。

2016年8月底，王健林接受由陈鲁豫主持的《鲁豫大咖一日行》节目的采访时，在讲述很多学生一上来就说“我要当首富”后，耐心教导说：“先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在此之后，“小目标”迅速成为了网络热词。

2017年8月份，就有中文媒体报导，王健林的房地产帝国早就成为“负资产”，“这几年加快将资本转移海外，并将庞大债务留给中国国内银行，等于是‘坑国家或者纳税人’”。2017年8月28日，媒体报导王健林传遭限制出

境，全家搭私人机赴英国被扣留，在机场与官员谈话数小时后被释放，但遭万达集团否认，但已造成万达酒店发展股价重挫，一度跌逾 10%。

2020 年 4 月份，中文媒体报导：AMC 院线因付不起租金被传破产，王健林债务缺口高达 4000 亿元人民币。

当地时间 2018 年 8 月 31 日晚间，刘强东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课程项目学生赴美期间，因涉嫌“性犯罪行为”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拘留，次日下午被释放。刘强东自称是女方主动邀请他到公寓，还帮他洗澡，两人发生性行为后熟睡。根据路透社 9 月 24 日的报道，该女学生称自己被灌酒，称饭局为“陷阱”。

2020 年 4 月 2 日，刘强东不再担任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由京东零售集团首席执行官徐雷接任。

2021 年 6 月起，恒大集团经营状况不断恶化，现金周转出现问题，厂商付款拖延、股价下跌、债务违约等现象频频爆发。造成股债跌跌不休，已传出各种破产、倒闭流言。9 月 8 日透过旗下员工发出消息，停止兑付所有理财产品孳息与利润。消息传出后在恒大财富的投资人间引爆恐慌，事态开始扩大。恒大欠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 1.9665 万亿元人民币（合 3000 多亿美元）。2021 年 8 月 17 日，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赵长龙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

2016 年 10 月 17 日，李彦宏在中科大演讲时，遭到众观众砸场。签名墙上有学生留名“魏则西”，这是百度一直以来关于魏则西事件的敏感内容。在演讲过程中，有人高喊“李彦宏你个大骗子”。2017 年 2 月 22 日，“博闻社”曝出李彦宏被限制出境的消息。

2018 年 3 月 26 日，李彦宏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谈及用户隐私问题时说，“中国人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企业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同时李彦宏也表示，“百度会遵循一系列的原则，如果用这个数据会让所用者收益，也愿意，百度就会去做，这是百度的基本做法”。上述言论引发巨大争议。

“百度贴吧门”事件后，网络大 V 秦朔致信李彦宏。信中写道，“贴吧门”事件至今，李彦宏没有给社会一个起码的交代。面对“贴吧门”他满是委屈和怨戾，他放不下尊严和盛名，所以他低不下头！他低不下头，不彻底反省，他的精神世界不会重生；李彦宏不重生，百度不会重生；百度不重生，就到此为止，没有新希望。

简书网站上一篇名为《青年才俊 or 网络流氓，我们一起还原李彦宏》的文章暗指李彦宏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早在 2003 年就有用户反映通过 QQ 传送的信息似乎被过滤和检查过。后经专业人士分析指出：QQ 系统被安装上了关键字过滤系统，除了被要求安装关键字过滤系统，因怀疑大量百度空间网页带有木马病毒。

2018 年 2 月 25 日起至 3 月底，微信头像、昵称及个性签名、QQ 空间个人资料内容暂时无法修改；2019 年纪念六四运动 30 周年前后亦发生过此现象。

微信会执行中国大陆的关键字审查。特定词汇无法发送给收件人。腾讯称，由于“技术故障”误将关键字审查应用于中国大陆之外的用户。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微信是针对内地，WeChat 是针对国际市场”，内外有别。

2020 年 5 月 7 日，加拿大公民实验室再次发布了针对微信关键字过滤问题的研究报告。这次研究发现，微信对中国注册和非中国注册的账户都进行了内容监视。

微信作为马化腾腾讯旗下的产品，因涉嫌对其他公司采取不正当竞争而引发广泛的争议。

王者荣耀是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手机游戏，一些媒体声称一些人极度沉迷于游戏当中，导致猝死。2020 年 8 月 15 日，嘉达研发大楼 A 座发生一起坠楼事件，21 岁因微信被封跳楼的坠楼者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强调，生存的基础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将永远专注于“本分”这一内在价值。在拼多多的工作系统中，当员工的月工时达到 300 小时，系统会显示“您已本分”。

2018 年 3 月 9 日晚间，微博多名网友爆料称拼多多被微信封杀。2018 年 6 月 13 日，数位商家在拼多多上海总部大厦集体讨伐维权。2019 年 11 月，一微信公众号指拼多多双十一活动存在套路用户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3 日，网传年仅 23 岁的拼多多新疆分部员工因加班过多而猝死。2021 年 1 月 9 日，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长沙 27 楼家中跳楼当场离世。2021 年 5 月 10 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约谈了拼多多，指出拼多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商品质量、假冒侵权、强制取消订单、虚假发货、售后服务、砍价拉新等方面的问题。

究竟说，李彦宏和马化腾等够不上企业家之名号，他们最多是中共黑监狱的看门狗而已。2016 年中国“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将福耀玻璃的生产厂从中国搬到了美国，这不但体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商业眼光和国际

视野，而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体悟了在中共政权下作为企业家的悲哀后，而找回了一个企业人的价值观和良心。

郭文贵的爆料革命，为真不破，却把中共最里面的内裤都扒下来了。郭文贵的人生，竟然有神话一般的经历，真是不可思议。郭文贵开启爆料革命，以他的胆量、胸怀、智慧同中共掌控的国家权力对抗。爆料革命的口号从“保命保财报仇”到郭七条，再到消灭中国共产党 TAKE DOWN THE CCP，大大地影响力了中国和世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相继加入到爆料革命中。爆料革命的队伍不断地扩大。世界对中共认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政要已经认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逐渐地将中国和中共区分开。虽然黑暗仍然统治世界，但世界人民正在醒来。

评说：一位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人性。乍听之下，甚是疑惑；仔细一想，振聋发聩。如是，如是！中国人是泯灭了人性，只留下兽性。但邪恶不是中共独有，当今世界，不管东西方，邪恶无处不在。西方世界的邪恶势力，他们时刻都在干着毁灭世界的勾当。

人类世界从开拓征服时代，到贸易富饶时代，到精英奢靡时代。这个奢靡时代的特征是：军队腐败，贫富差距，欲望与炫富，性泛滥与无耻，货币贬值。大公司高管、金融地产家、俱乐部球员、厨师和艺人，他们被过分追捧，并通过电视媒介大量敛财。人类创造了这个有严重缺陷的政府与经济系统，牺牲大多数人而让少数人得利，社会畸形发展，一边是财富和浪费，一边是饥饿和贫穷。我们已进入自食恶果的时代。

最为可恶的是，现在的医疗机构和大药商要确保的是人类持续患病而不断用药，建筑商和银行要确保房子持续升价而他们永远盈利，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持续造假而为精英，大媒体继续以掩盖真相和误导听众为己任，而腐败政府要确保给所有这些罪恶披上合法的外衣。

今日之社会，处处杀盗淫妄，人人怒目相向，人心邪恶而冷漠，美国 9·11 恐怖袭击和中国“车碾小月月事件”为重要标志。工业化致使地球表面千疮百孔，江河湖海普受污染，人类饮苦食毒。地球自然灾害频发。采矿业是祸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每年有数百万例死亡与雾霾等室外空气污染有关，室内空气污染也同样致命。政府名为管理，实为收费。现代教育很坏，的确很坏，“傲慢和偏见，我们却任由着它，随波逐流。”没有了道德，为师者堕落，施医药者堕落，执法者犯罪。选举是欺骗，媒体被操控，精

英阶层和主流社会满脑子邪知邪见却自以为是。没有了人性，人如畜生，器官随意活摘，或身首异处，或死无葬身之地。

在我们人类社会里，统治者从来都是邪恶势力，正义总是在路上，姗姗来迟。要对付共产党这样的恶人帮，善人是做不到的，要么是作恶者自毙，要么是要有更恶的人，才可以制服恶人。还有就是神佛的力量。人在做，天在看；我相信，神佛的力量已经出现。

明日之社会，疯子和狂人当政，政府将更加无耻，当权者将以瘟疫屠杀的方式降低人口。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极少数的利益集团将拥有世界上极大多数的资源和财富，弱势百姓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无力反抗。智能机器会取代诸多手工劳动，畸形发展的高科技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大脑复杂、四肢简单，人类面目越发像外星人。知识不受尊重，艺术变成胡闹，诗歌无志可言，音乐沦为杂响。女性不思嫁娶，家庭人伦破坏，商人和娼妓获得更多的荣誉，人类寿命减少。

在人类过度欲望驱使的所谓经济大发展后，一定会迎来一个时期严重的“人造”自然灾害。未来之社会，地震海啸，气温升高，地水火风灾害频发，会有瘟疫发生，鬼神归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人类的归宿指示了天堂和地狱两个地方。《古兰经》说，天堂里的居民没有受伤、悲伤、恐惧或耻辱，在那里凡事有求必应。那里的住所宜人，有高耸的花园、林荫的山谷、有樟脑或生姜味的甘泉；有水河、乳河、蜜河与酒河；四季的美味水果一应俱全，而且不带扎人的刺。佛教众生觉悟，回归自性，使世界和平，佛光普照。“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中国会出现一人一票的民选政府吗？世界会大同吗？末日是否能迎来新生，我们期待着。

第四十六章 中共末日疯狂

2019年4月起，香港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6月9日，大批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内地受审，由于港人普遍不信任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部分港人对于此次修例有相当大的忧虑，引发大规模抗议运动。这次运动被视为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共遭遇的最严重政治危机。

2019年6月起，香港爆发多次大型的警民冲突事件及占领行动，并演变成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没有暴动，只有暴政”、“解散警队，刻不容缓”、“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为口号的一系列政治抗争运动。9月4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反送中运动示威导致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剧烈的社会动荡。

评注：2018年2月13日，香港和台湾的春节前夕气氛和平，来自香港的情侣陈同佳和潘晓颖入住台北大同区紫园饭店，共度情人节。17日，陈同佳杀害女友潘晓颖并抛尸，随即返港。

此案的发生引起了港台两个司法管辖区的司法合作问题。借助此案的社会影响，香港保安局于2019年2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草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港共见机推行跨境遣送，实质则是在打开任由中共在香港抓人遣送大陆的通道。

从此，香港反送中进入了最黑暗的一段。从黑社会骚扰到黑警亲手下场打人，从秘密抓捕、虐待、强奸、谋杀、抛尸，到全世界直播下多日武力围攻大学校园。港共在香港下手越来越残暴，越来越不避讳公众舆论，甚至在镜头前公然威胁绑架灭口抗议者。在世人面前，中共的末日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2019年6月初，香港举行年度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以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最初示威者的首要抗议对象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并以“反送中”为主要口号。其后，民间人权阵线与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等五大诉求。在占领立法会后，示威者则将林郑月娥下台诉求改为实现“双普选”，即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均由自由的直接选举产生，成为运动的转折点。

随着反修例运动的发展，运动出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同时，因为警方武力因应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而升级，香港人的口号亦由“香港人加油”变成“香港人反抗”。除了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传统的集会游行活动外，大部分抗争始终是没有代表群众的领导人和组织的自发运动。

6月9日，民阵发起游行，有超过100万名市民参与。不过，特区政府不顾民意强烈反对，继续强行推动修例，6月12日，于香港立法会继续将条例恢复二读辩论，触发了四万名市民围在了立法会大楼外示威，为了阻止条例在立法会通过，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由于特区政府的不顾民意强推修例，引发了更多市民参与这次游行，游行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是香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

7月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是“公然挑战”。之后中央政府开始暗示可能会干预抗议活动，国防部指出军方密切关注形势，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在7月21日，游行后发生了元朗袭击事件，这次事件成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使运动发生转折，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加剧。后续的示威抗议往往从一开始的和平示威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示威者开始投掷燃烧弹、纵火与警方对峙。而警方也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等武器。随着抗议策略逐渐升级、立场趋向极端，及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挑战，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高。

7月29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表态坚定支持林郑月娥政府施政与警队执法，称事态演变严重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8月7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在深圳市举行特别会议，指事件有“颜色革命”特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是港独口号，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重要的任务。

针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和欧洲议会声援反送中运动，外交部驻港公署多次发声强硬表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共见记者时表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中央政府和官方媒体还要求“外国势力”必须停止干涉香港事务，批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外交官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

2019年7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黎智英会面，期间讨论了香港情况，包括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发展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他说，香港民众正在同美国一道与中共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战争，是在为美国而战。此举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指责其“祸港殃民”。黎智英对此回应说，受到中国的指责是一种荣幸。

2019年8月，央视新闻发表题为《祸港黎智英，从“占中”到“骚乱”的黑手》的文章，批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是“民族败类”，指他“为一己私利甘愿充当外国势力反中乱港的政治工具”，此乃中央级媒体首次发长文针对黎智英个人进行措辞严厉的批评。此后两个月，新华社等媒体屡发文章批评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及何俊仁为“祸港四人帮”。

8月18日，民阵再度举办大规模和平集会，参与8·18集会的人数超过170万人。8月31日发生太子站袭击事件，防暴警员及特别战术小队成员（速龙小队）冲入太子站往中环的月台及列车，以警棍、警枪及胡椒喷雾等武器向车厢内的乘客使用武力，若干人被警察殴打致死。

10月1日警方使用实弹击伤示威者而引起各国关注；10月4日香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引起更大反抗，因此冲突并没有缓和，抗争此起彼伏。

从11月起，示威者发起三罢行动，并把武力升级，同时发生香港警察强行攻入香港多所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引致多人受伤，11月中旬更多次爆发全日的大型冲突，令多间大专院校及中小学停课或提早完结学期，但区议会选举后，示威活动因建制派和乡事派惨败收场有缓和迹象。

2019年10月—11月期间，示威者占领香港主要五大公立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堵塞香港几条主要干道及隧道、包括港岛薄扶林道、九龙的联合道、窝打老道、金城道、红磡海底隧道、新界的吐露港公路及港铁东铁线，企图迫使全港市民被罢工。事后警方在中大及理大施放大量催泪弹及使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经过多日激战、及后民主派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摘下破纪录388席。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立法，要求每年认证香港自治情况，作为贸易待遇的前提，该法案于2019年11月19日和20日先后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外交官也曾与黄之锋等人会晤。

2019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称他拯救了香港，让香港避过“在14分钟内被摧毁”的厄运。特朗普政府称，中共已经准备动用军队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是特朗普在关键时候阻止了中共的冒险行为。

2020年1月，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职务；2月，张晓明被降职转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一职。

2020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即意味着香港可能不再继续享有美国特殊待遇。美国时间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香港制订国家安全法的决定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认为“中国将一国两制承诺，变成一国一制”。

6月底，《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随后美国方面认为国安法摧毁了一国两制，并撤销香港特殊地位。

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损害人权自由及强行推动香港《国安法》的涉事中港官员，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12个官员。

评注：《苹果日报》是“返送中运动”中最具独立抗争精神的良心媒体。2020年12月，无国界记者授予黎智英年度新闻自由奖，“以此向在北京压力下日益新闻自由空间日益收窄的香港独立媒体表达支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曾先后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起的社会纷争致歉，曾传出林郑月娥几次提出辞职，暂缓修订也被认为是习近平自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最大的政治让步。

香港总商会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促请政府独立审视连串事件、查找不断升级的缘由，以及问责不称职的官员。8月16日，香港首富李嘉诚首度就现状表态，再度引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诗句，呼吁停止暴力。警方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也成为舆论焦点，并引发民众愤怒。

在内地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受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自由亚洲电台指，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包括“官媒发布假新闻、内地网络平台准许发布虚假的消息，引导民众仇视香港抗争者”。

香港部分市民在示威现场指责警察为“黑社会”、“知法犯法”，而中国大陆则是支持警方的情绪高涨。在香港抗议与中美贸易战期间，推特和脸书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资讯战，利用散布虚假信息，试图对外抹黑香港抗议。8月19日，Twitter和Facebook封锁大批散播“假新闻”的账号，指中国政府涉嫌以虚假资讯抹黑抗议活动。受事件影响，香港经济及治安于2019年下半年出现较明显的负面影响，香港市民对政府及警队之信心急剧下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市民之间出现严重分野。海外受中共鼓噪和蒙骗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以及华侨普遍表达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受到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政治局势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香港经济开始受到打击，包括经济增长遭削减、股市受冲击、流动性收紧、营商环境恶化，企业活跃度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统计处10月31日公布本年度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下跌2.9%，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录得季度

按年跌幅。香港经济近受到本地社会事件严重冲击情况严峻，连续两季出现按季负增长，显示香港经济步入“技术性衰退”。

2017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0日在回应《环球时报》记者相关问询时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中英联合声明》维持香港回归中国50年不变的承诺变成废纸，中英关系立即进入“速冻”期。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开启的所谓中英“黄金时代”已经从黄金变废铁。昔日的东方明珠，在中共的蹂躏下，已经彻底称为死港、臭港。

2019年12月，中国大陆爆发COVID-19疫情，及后疫情迅速扩散至全球。至2020年1月下旬，疫情传入香港，反修例运动受其影响而开始减弱。部分原计划于农历新年假期间举行的重要集会被多个主办单位宣布取消。各类集会虽然仍继续进行，但抗疫已慢慢成为焦点。

疫情于2019年11月在武汉发现。有可能在发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根据从2019年12月开始的回顾性分析，湖北的病例数逐渐增加，至12月20日约60人感染，12月31日至少有266人感染。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与同行交流，认为出现SARS提醒同行注意保护，成为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的医疗人员，被称为“疫情吹哨人”。2020年1月3日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李文亮因感染新冠于2月7日去世，社会各界对其去世表示哀悼。

1月23日，武汉市进入封城状态。同日世界卫生组织就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日内瓦开始连续两天召集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月30日举行第三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该次疫情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月中旬开始，2019冠状病毒病开始在大韩民国、意大利、伊朗及日本等国开始迅速蔓延，除中国外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中国国内新增确诊人数。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根据德国联邦情报局调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与习近平在1月21日通话时，被要求世卫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及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

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全球蔓延，并加以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自2020年2月20日起，美国三大股指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交易周，随后几周内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股指创下单日最大跌幅，10余国股指触发熔断机制，大宗商品和虚拟货币的价格亦出现波动。

2020年3月14日，郭文贵在直播视频中说：“香港会更糟，会有更多人被自杀，会有更多人莫名其妙传染上 CCP 冠状病毒。听起来这些真让人不舒服。”“我可以今天再次负责任的告诉大家，CCP 在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就是共产党生物实验室的，P4 实验室的，就是共产党放出来要弄香港人的，弄完香港人他也会弄全世界，他也会弄台湾人。共产党掌握这个病毒和他掌握使用病毒的历史和思想那是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看一看。看一看 2012 以后中共对冠状病毒以及生化武器，他的吹捧，和对它的整个的崇拜，以及想使用的提前打招呼，叫大外宣。大家都是可以看的着、摸得见的。今天的武汉和 CCP 冠状病毒，毒死了这么多中国人，现在威胁到了全人类的存在，他是人为的，他也是天意。”

3月23日，郭文贵又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病毒——叫 CCP 病毒；这两天我给欧洲的很多政治家说，如果你们能把尽早把这件事说清楚，把这个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分开，把这个病毒叫 CCP 病毒，你们将是历史上伟人，就像当年定义纳粹是犯罪组织，而不是德国人犯罪组织一样，他们都同意。”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 2020 年 10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已经开始“居家隔离”，并已经再次接受核酸检测，正在等待结果。之后，特朗普确认染上新冠病毒。

郭文贵 2020 年 10 月 2 日盖特直播说：“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现在是 10 月 2 号凌晨两点半不到差两分钟，我相信所有的全世界的都震撼了，也就是川普总统夫妇被检查出来 CCP 病毒呈阳性，这是挺吓人的、太吓人了，但是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意外，也就是二十几个小时，昨天这个时间、凌晨两点的时候，差不多吧，就是两点的时候，我给欧洲的朋友还有美国的朋友，我说我相信美国的大选一定是荒谬的结果，荒谬的结果一个是法律战，第二个我说共产党一定有可能会给放病毒，而且我在过去的这七八个月以来，我跟所有的美国的有关朋友我都这么说，我说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川普总统他最害怕的、也是他本人最担心的——共产党病毒他会染上，而且我说他一染他就是一家染上，据我所了解的共产党，它一定会这么干，它不这么干它不叫共产党。”

2021 年 1 月 27 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破 1 亿人、死亡人数逾 215 万人。截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全球已累计报告逾 5.45 亿例确诊病例，其中逾 633.2 万人死亡。

郭文贵在直播中多次向世人报告：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共在包括 SARS 病毒及 MERS 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家族中发展出的生物武器。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中共病毒。

郭文贵 2020 年 3 月 7 日的直播中说：“叫武汉疫情是不对的，严格讲应该叫 CCP 病毒。Coronavirus 是不对的，应该叫 CCP virus。CCP virus 是对的。这个 virus

就是 CCP，叫武汉，叫湖北都是不公平的。武汉，湖北不是你共产党弄的吗？”“说到这，战友们，共产党现在制造的这场病毒，中共病毒，中共冠状病毒，和中共冠状病毒的人道灾难，和这种腐败、官僚体现的以假治国、以黑治国、以警治国所制造的人道的一次次的次生灾难，我们再看看它对全世界的伤害。”“那么现在我告诉战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战友们记住，我们最不希望的事情病毒在这些国家大肆的扩散、爆发。但是大家要看到整个共产党的 CCP 冠状病毒的一切爆发和灾难的时刻根本没有到来！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传播更多的真相。人类的无知和人类的贪婪和人类的傲慢和政治的这种下作和这种黑，不同程度的黑，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无法想象的。”

评注：郭文贵先生于 2017 年首次警告世界，中共病毒是中共在跨越数十年的 13579 计划下历经多年研发的生物武器。已经疯狂的中共在 2019 年香港抵抗运动期间开始投毒，启动了 CCP 冠状病毒生化战争，引起了 2019 年至今的全球 CCP 冠状病毒大流行。

中共官方公布在武汉的死亡人数为两千多人，但实际数据超过 20 万人。武汉病毒是中共研制生化武器不慎泄漏的结果。但中共为了掩盖其罪恶，进一步制造混乱，更有意施放病毒，不但对外国施放，还对国人施放。

无论是 CCP 冠状病毒，还是为此次病毒设计的各种疫苗，都含有共同的刺突蛋白。病毒主要通过上呼吸道入侵人体，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和人体多种细胞表面表达的 ACE2 受体结合，使得冠状病毒可以进入细胞，感染多个主要器官。病毒外层包裹的膜蛋白打开后，RNA 片段释放到人体细胞中，病毒开始利用细胞中的资源进行自我复制。

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病毒学家蒙塔尼耶教授，心脏病专家、物理学博士，律师理查德·弗莱明，大脑研究科学家 Kevin McCairn 博士等人确认，病毒的刺突蛋白中被插入了 HIV、PRRA 序列（脯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和朊病毒样结构域，这些是被多位顶级科学家认为武器化的毒素。

在大流行引起全球的恐慌和顺从心理后，中共和世界黑暗力量启动了更重要的步骤，借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疫苗，引起了比病毒大流行疫情本身的影响远为严重和深远的疫苗灾难，导致了当前和未来数代人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将人类带入威胁到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2020 年 3 月 23 日，泽连科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公开信，他称自己已经成功地治疗了数百名 COVID-19 患者，他采用的是 5 天的羟氯喹、阿奇霉素和硫酸锌疗法。

中共病毒疫情和疫苗危机中，世界科学界、医疗界、媒体界等暴露出空前的腐败，使世人对科学家、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信心崩塌，世界各国以传统的精英阶层主导的制度遭受挑战，平民主义和平权主义渐渐走向政治的舞台。

2021年9月15日，特朗普前顾问纳瓦罗出席郭文贵直播说：“我想重申一下，这是中共病毒，它来自武汉实验室。武汉实验室是一个生化武器实验室。很遗憾的是，美国这里的安东尼·福奇医生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资助研究。他必须和共产党一起被追责。”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特朗普多次批评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在2020年4月14日宣布冻结对世卫的金援，认为世卫处理2019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一事上严重失职，并声称世卫被中国把持，于同年5月18日致函给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要求世卫在30天内完成改革否则退出。同年5月29日，特朗普宣布美国“终止”其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2020年11月3日美国迎来新一轮大选。美国情报机构点名，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在内的外国势力蠢蠢欲动，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则正在为因应可能的信息混乱或网络攻击做准备。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8月9日证实，受中共指使的黑客，过去曾持续发动网络攻击，干扰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基础设施，意在操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奥布莱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他们希望看到特朗普总统落选”。他直言，“中国就像俄罗斯、伊朗一样，他们发动网络攻击和网络钓鱼等活动，来攻击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网站等。”

自2020年春季，特朗普开始对本次选举提出质疑，在没有公开证据的前提下声称大选或将被“操纵”，并称“若广泛使用邮寄选票将导致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11月3号大选日结束后的凌晨2点，在计票结果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特朗普即在白宫向支持者宣布自己已经胜选，并要求立即停止计票，称“某些人企图偷走这次的选举结果”。12月2日，特朗普指责在选举期间“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他指控总统选举被操纵，充斥着欺诈行为。戏剧性的结果，拜登最终成为新总统。

评注：2020美国大选，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联邦演绎了一场现实而深刻的民主法治启蒙课。政治永远都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被寄予厚望的川普太过仁慈，最后时刻依然当断不断犹豫不决。若继续出任总统，灭共大计恐生变数。环顾整个美国，能代表沼泽地主人堪当灭共大任之人为数极少。川普的人生经历，决定他是被上天选中播下灭共种子的人，他是一个好父

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许还是一个好老板，但他却不是一个在历史性时刻能做出正义决断的伟大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在改变人类命运的时刻，能够果断跳出常规束缚做出正确的选择。川普在定义中共病毒是生化武器时被各种羁绊所困扰，始终无法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而把世界各地军队调回美国准备对中共开战之际，仍被各种利益勾兑所左右，举棋不定痛失良机，原本支持他的各个利益集团最终弃他而去。

拜登当选总统给世界当头一棒：美国自由灯塔熄灭；魔鬼在统治这个世界！他们就在每个人的身边。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20日8时15分，特朗普与妻子梅拉尼娅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参加简短告别仪式。特朗普拒绝出席数小时后举办的拜登总统就职典礼。

2020年起拜登关于中国的言论变得比往年更加尖锐，曾经公开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恶棍”，并指控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巴结习近平。拜登亦抨击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人权问题，并且表示当选总统后将会延续特朗普的反中政策来反制中国“滥用经济政策”的手段。拜登表示，美国需要对中国“强硬起来”，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以对抗中国的虐待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拜登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对进行压迫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实体进行经济制裁和商业限制。

2020年12月，他宣布会继续保持对华关税，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2021年2月，拜登称中国是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挑战的“最严重的竞争对手”。随后拜登在当选总统后首次与习近平通话时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胁迫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

2021年1月6日，香港发生了民主派初选大搜捕，其后他们会站在香港人的一方，同时反对北京施压香港的民主。6月17日，壹传媒高层大搜捕中，拜登称对于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

拜登说：“中共的镇压力度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香港急需的独立新闻堡垒《苹果日报》现已停止出版。通过逮捕、威胁和强制通过惩罚言论自由的港版国安法，中共坚持行使权力压制独立媒体并压制不同意见。独立媒体在恢复活力和繁荣的社会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记者是说真话的人，他们让领导人负责并保持信息自由流动，这在香港和世界各地民主受到威胁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共必须停止针对独立媒体，并释放被拘留的记者和媒体高层。新闻业的行为不是犯罪。香港人有新闻自由的权利。相反，中共否认基本自由并攻击香港的

自治和民主制度和程序，这与其国际义务不符。美国不会动摇我们对香港人民和所有捍卫所有人应得的基本自由的人的支持”。

2020年9月26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他介绍了澳大利亚的防控疫情的措施和成果，并表示坚决支持审查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应对行动。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坚决支持审查新冠大流行的应对行动。他说：“澳大利亚正坚决地应对这场疾病大流行和经济衰退的风暴。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不让这种病毒对我们、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计造成破坏。”

据莫里森表示，很高兴世卫组织成立了一个独立小组来评估全球的新冠应对，并明确要求确定新冠病毒的人畜共患病源以及这一病毒是如何传播给人类的。

中共政府当时断然拒绝这项要求，中国驻坎培拉大使警告，这项调查要求可能导致中澳贸易关系恶化。中国之后对澳洲实施了贸易制裁。中国技术性暂停了部分澳洲牛肉的进口，并对澳洲大麦课征80.5%的进口关税，实际上封杀了4.39亿澳元的大麦贸易。中国也对进口澳洲红酒发动反倾销调查。

2021年6月12日，正在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再次呼吁对疫情源头进行彻底调查，以避免将来重蹈覆辙。莫里森强调说：“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疫真相，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要指责谁.....这是为了避免将来再次出现这种传遍全世界、导致大量人丧生的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则表示，调查需要中方的配合。他说：“我们需要透明度，以便找到这种病毒的来源。”但中共不可能给与配合。

郭文贵在爆料中说，中共有“双龙计划”，指中共多年来蓄谋同时拿下香港和台湾的秘密计划。2021年8月18日，郭文贵说：“双龙计划，七哥最早说的，只有我一个人说的。香港已经拿下，下一个就是台湾。拿下香港，台湾，拿哪去呀？干掉日本，占领马六甲海峡，统治亚洲，进而把美国经济、政治搞乱，然后统治全世界。要不然同归于尽，要不然就让我们说了算。”

根据郭文贵爆料革命的战友们记录，台湾人在关注香港事态时，也关注2020台湾大选。普通的台湾人和香港人，既没有意识到来自台湾的一件刑事个案，将会引爆一系列蓄谋已久的阴谋，惨无人道地改变这座以法治和治安良好闻名的香港；更没有预料到香港遭受重击的结果，最终又促使台湾人深刻地反思中共的本质，在民意上彻底改变了2020台湾大选。

香港和台湾的命运在不为人所知的深处密切相连，中共的黑手早已笼罩在海峡两岸上空。

中共渗透台湾政界，染指台湾大选，已是世人皆知的秘密。2019年11月23日，CCP驻港台的特务王立强向澳大利亚政府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投诚，

惊动全球舆论，坐实了中共对港台的情报传闻。澳大利亚国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对王立强事件持正面支持的态度，而他由于批评中国曾被中国禁止入境。

根据王立强的供述，他任职于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共军总参成立，目的是渗透香港金融市场并搜集军事情报。他的老板、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向心和龚青夫妇都是来自大陆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王立强的情报工作主要是在香港的大学、媒体渗透，获取港独方面的信息。

王立强承认他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亲自参与策划绑架李波，并负责谈判和后续任务。中共在港台的情报网络错综复杂，王立强表示除了香港的运作，他们还在台湾积极活动，影响台湾各界，包括媒体、宗教、民间社团，运作推翻现任的蔡英文当局。

他于2019年5月获得一本假韩国护照，奉命前往台北运作2020大选。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协调台湾的网军，和蔡英文阵营打舆论超限战。王立强承认他曾经成功干预了2018年台湾的地方“九合一”选举，其中就包括帮助2020台湾大选的主要亲共候选人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

王立强投诚并现身公众舆论，时值香港反送中血雨腥风、台湾2020选战如火如荼的阶段，此前数日的11月21日，王立强的老板向心、龚青夫妇已入境台湾。王立强的公开露面，使台湾调查局、国安局、移民署、内政部等机构应声而动。11月24日，也就是王立强投诚公开次日，向心、龚青夫妇在桃园机场出境时，被台湾调查局国家安全处阻止离境，再次日25日移送台北地检署，进而于26日被限制出境。

评注：2019年4月17日，在中国大陆拥有大量投资的鸿海(富士康)老板、台湾首富郭台铭来到他的出生地和儿时居住地，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挹秀里的一座妈祖庙——板桥慈惠宫。他参拜请示神意，宣布将参选总统。郭台铭给记者谈及妈祖托梦叫他出来竞选总统，以改善经济和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要做好事。妈祖说一定要用我的力量来帮忙年轻人。对两岸和平要维持。”

令人讽刺的是，郭台铭的巨额财富来自对受苦受难老百姓的剥削；许多年轻人在他的工厂感到绝望自杀；两岸和平论的背后，往往是通共和卖台。

从2019年4月20日开始，21日，30日，郭文贵先生多次点评台湾大选问题。郭先生回顾了中共对柯文哲、郭台铭的安排，表示郭台铭是“唯一一个连接美、中、台最重要的商人”，是中美贸易争端当中的关键人物。郭

先生提到了中共对台的双枪战略：“过去的西北军，就是当时习近平主席的爸爸领导的高岗，还有一个西北的刘司令，包括习主席的父亲，当中有一个女英雄叫双枪老太婆。所以说当时刘志丹还有高岗下面有一个双枪老太婆……。共产党说，如果你想赢，你要双枪，双枪有更多赢的机会。……今天的台湾他们布局韩国瑜，又最后抛出郭台铭，就是他们对台湾的最猛的招叫双枪政策。”

实际上，郭台铭就是中共下一个培养的台湾总统。当郭台铭在深圳的工厂因为严酷的劳资关系，导致许多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后，中共军方、情报系统动用国家的力量，安排郭台铭把大部分的工业设施迁入河南郑州。

2019年9月12日，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17日，宣布退选，放弃以独立身份参选机会。16日深夜，韩国瑜竞选总部发表声明。

郭文贵先生爆料的双枪战略生效了，备胎韩国瑜成了中共的头牌。韩国瑜一时风光无限，可一如先前的爆料，他的败局早已注定。

9月17日，郭文贵先生直播点评：“郭台铭他的噩梦真的是刚刚开始，妈祖会证明给世界看没给他托梦，妈祖会告诉全台湾人民我从来没给这小子做梦啊没做梦，你们要相信妈祖不要相信郭台铭。大家记住拿着上天和神来说事儿骗钱的，你付出代价只是早晚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不会不发生！”

2020年1月2日，在离台湾大选不足十天的紧张时刻，发生了一场黑幕重重的军事政变。当日上午7时50分，一架隶属台军的黑鹰UH-60M直升机计划从台北松山区飞往宜兰东澳岭雷达站，其间迫降在新北市乌来山区。事故造成同机13人中的8人遇难，其中包括台军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与两位少将。

早在2017年7月18日，郭文贵乘坐技术先进的Lady May游艇在纽约哈德逊河上航行，遭遇失控转圈，险些和300英尺外的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船相撞。此后29日、31日，船行至哈德逊河熊山大桥附近时，被四旋翼无人机近距离跟踪。事后证实船用计算机控制系统被中共的黑客攻击。

据郭文贵介绍，2019年底到2020年初，香港反送中、台湾大选、伊朗军事行动，还有美国的川普弹劾案，和中美贸易协议，就这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然而，2020真正的主题——中共冠状病毒疫情才刚刚酝酿成型。这一切世界风云莫测的背后都是同一张大手——中共。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表示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国防疫工作。2020年3月10日，《求是》杂志发布文章《大国战“疫”，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爆料革命战友认为，共匪在香港越来越嚣张，越来越享受到香港新疆化的征服者的变态快感。每天，港共在香港的暴行，通过各种媒体和通信手段，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海峡对岸台湾人的关注。香港的繁荣，台湾的和平，数十年来港台之间亲如手足。如今，台湾人终于意识到，97 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早已不再属于习以为常的自由世界。台湾人每天呼吸的自由空气，原来是如此珍贵。

距离大选日不足一周，郭文贵在 1 月 7 日，10 日直播中明确表示，韩国瑜就是共产党的走狗，不会让韩国瑜当选的，必须选蔡英文。2020 年 1 月 11 日，借助香港运动给台湾带来的巨大震撼，蔡英文以超过 817 万票成功连任，创下台湾总统选举史上最高得票数，民进党也保持住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

习近平于 20121 年 3 月 22 至 25 日视察福建。习近平在 24 日上午到福州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视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底线思维，聚焦备战打仗。6 月，中共狂徒学者李毅又一次发出“留岛不留人”的威胁言论。其惊人之语，呛声“打烂台湾”并没什么，称台湾人即使都在核战统一当中死光光，仅需从“大陆”移民过去即可。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 7 月 21 日，中国解放军刚刚完成在台湾海峡北部、浙江附近的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台湾媒体报道，这是“美国军机近期两度降落台湾、解放军警告将引发严重后果后，大陆最新的反应。”

路透社 2020 年 12 月的一篇特别报导指出，解放军正向台湾采取“灰色地带”战争，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冲突形式，目的是消耗台湾，迫使台湾屈服，不需要大动干戈。

根据台湾国防部 2020 年 10 月的资料，2020 年，中共军机共扰台逾 380 次。2020 年，台湾派遣空中战巡共 4132 架次。如果升空成本以每小时百万台币计算，仅空军升空一项去年前 10 个月就已经耗资 41 亿台币，大约 1.42 亿美元。

总统选战过后，台湾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中港台正义和邪恶的较量远未结束。2021 年 10 月 10 日，郭文贵在直播中说：“对待以美灭共、以共灭共，现在真是可能要以台灭共了，要到了，这是第一次七哥说这话。这是双龙计划继续执行，每分每秒都可能攻击台湾，每分每秒而且是迅速级的，而且美方不会说话已经决定。”

2021 年 1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中方对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等 28 人实施制裁。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批评中国制裁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举动是“毫无成效和愤世嫉俗”，敦促美国参众两院谴责这一行动。

2021 年 2 月 11 日，拜登上任总统后首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两国元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拜登在通话中强调自己的首要工作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健康和生活方式，同时保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拜登又向习近平表达对中国当局在香港的镇压、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对台湾等地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关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形容习近平“非常聪明”、“非常强硬”、但“他骨子里并无民主”。

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明文指出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2021年3月17日，欧盟17国协商同意，就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大规模迫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这将是欧盟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2021年4月22日，英国下议院在无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投票通过了由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提出的一项动议，确认新疆的维吾尔人遭受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2021年4月28日，拜登在上任美国总统100天前夕，到国会发表约65分钟的演讲，其间多次提及中国的威胁，他称习近平等独裁者认为在21世纪民主制度不敌专制主义，拜登表明会维护美国利益，应对中国的挑战。

2021年3月2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了与加拿大、英国和欧洲联盟一道发布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执行北京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实体的高层官员。2021年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政府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暴行。

2021年5月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美国不是要遏制中国，但是中国政府正变得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与盟友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2021年4月8日，美国商务部以破坏美国军事现代化为由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实体清单。6月，拜登签署行政令，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7月，拜登政府以中国打压香港自由为由发布香港商业警示并对7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进行金融制裁。

据《希望之声》2021年11月8日报道，包括欧盟各国在内的32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宣布取消对中共的优惠关税。有专家分析，欧盟悄然无声地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中共打击相当大，中共的世贸资格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2021年11月16日，中共六中全会刚结束，郭文贵在直播中说：“恒大一定破产，随后将对中共和国和世界金融、经济造成雪崩效应，可恶的是西方主流媒体非但不提疫苗问题，对恒大爆雷也是统一口径、避重就轻，因为背后都是同一拨邪恶的人。”

进入 2021 年，郭文贵就说：“兄弟姐妹们，我要给大家说的，关于国内经济情况，和房地产，兄弟姐妹们，国内不会，共产党的卖地经济，房地产经济，还有一个这种共产党的完全依靠一千多亿在美国搞的贸易经济，还有国内的卖地经济，绝对结束了，绝对结束了。所以说在国内今年，粮食和生存，还有一个生存的环境是你最重要考虑的，你不一定要相信文贵，你在你合适的能力下，你要做一个妥善的安排。”（2021 年 1 月 9 日直播）

评注：中国人对房地产情有独钟，但是中国人买房子只是买了七十年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归共党政权的。七十年以后怎么样呢，就没有人太在意了。共产党利用土地来割百姓的韭菜，而百姓又心甘情愿地被割韭菜，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住房空置率较高，与国际相比处于较高水平。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在 2019 年发布的报告，城镇居民住房空置率已经从 2011 年的 18.4% 上升至 2017 年的 21.4%，多套房家庭的空置住房是住房空置率上涨的主要原因，2017 年空置房总数达到了 6500 万套，二三线城市的空置率远远高于一线城市。调查也显示大部分空置住房都和住房抵押贷款有关，这些空置住房占有了大量贷款资源，同时也蕴含着金融风险。

自 2010 年以来，所谓“空城”或“鬼城”的说法就屡屡见诸报端，诸如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营口鲅鱼圈新城、天津京津新城、宁夏海原新城等新城区或是在沿海发达城市、或是在二三线城市，都曾被媒体归类为鬼城的范畴。这些鬼城一般耗资巨大，开发规模大，且远离老城区，产业结构单一，人气严重不足。2015 年百度大数据实验室的一项研究通过时空数据分析挖掘得出来 50 座“鬼城”，其中既包括了康巴什等媒体集中报道的“鬼城”，还识别出来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萧山等地区“鬼城”现象。

2018 年以来，租房企业借用租金贷从客户手中攫取资金，不顾自身流动性风险肆意加杠杆，最终导致自身破产，引发了住房租赁市场一些列社会影响。无数家庭为了买房，掏空子孙三代的钱包和老人的养老金，还背负上了沉重的房贷，苦不堪言。

进入 2021 年，最让人感觉和往年不一样的就是房地产企业暴雷，几乎是成群结队的爆。2021 年，全国的调控已经达到了 500 多次，都是限贷、限购、限售等政策手段的人为控制，政策的急转弯导致房企的经营计划来不及调整，销售和回款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流动资金出现了枯竭，资金链断裂，暴雷不可避免的产生。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房地产财富游戏终于结束了。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作为落实习近平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通知中将此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工作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下推进的，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使命担当、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中国大陆股市和房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撰文指出，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母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不明显。

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在2017年4月23日举行的第六期钱学森论坛上表示，新区所在的白洋淀流域不仅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且入淀河流的水污染非常严重。雄安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他认为环境问题是雄安新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习近平选择雄安的主要原因是雄安是他母亲齐心的出生地，他甚至想迁都雄安。一百年了，独裁政权的一种惯性思维还是顽固地延续着。不是民意主导、专家充分论证，而是领导人拍拍屁股、拍拍脑袋，就立起个“世纪工程”，既劳民伤财，又贻害无穷。

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调研时似乎表示不满，称雄安“这两年，几乎没有动一砖一瓦”。到了2021年底，“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再传“烂尾”消息。因经济活力不足发展缓慢，堪忧的消息不断传出，最新指相当于6个北京火车站大小的雄安火车站，客流惨淡。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但是粤港澳三地民众都不买账，使得习近平的世纪规划变成世纪笑话。2018年2月，连接香港、广东珠海和澳门的港珠澳大桥隆重开通，习近平出席仪式。这座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总投资1269亿，使用了最先进的桥梁建筑技术，耗时9年完工。通车的时候，锣鼓震天，各路媒体一路猛吹上天。可是从通车的第一天开始，港珠澳大桥就陷入了亏损，每日车辆寥寥可数，回本遥遥无期。2022年1月，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港珠线双向暂停运行，成了最严重的一个烂尾工程。

到 2021 年，中国落成的 300 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已经有 120 座，最高的上海中心到达 632 米。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将给后世留下无穷后患。人类自傲得太久了，骄傲得要与天比高，骄傲得要射天上的太阳，要捞取水中的月亮。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斗的。

2021 年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代表 7 万余人以盛大仪式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他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习近平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但是，中共罪恶滔天，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它的末日已经来临。

据彭博社报道，11 月 17 日，王岐山在于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王岐山希望通过华尔街的力量将习近平赶下台。

“青城山上定乾坤”。郭文贵直播中曾说过青城山老道的一个小锦囊的故事，锦囊里写着什么呢？“习亡岐山义、民心向郭”。不管是真是假，亿万中国人心向郭文贵，希望“习近平、王岐山”尽快灭亡的心声是千真万确的。

评注：2020 年 6 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 20 分钟的音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音频中抨击习近平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没有人权和法治可言，并建议习近平退居二线养老。随后，中央党校曾 10 次向蔡霞打电话，要求她回国“跟组织上谈清楚”。对此，蔡霞表示没有安全保障她不能回去。

2020 年 8 月 17 日，蔡霞被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被取消相关退休待遇。对此，蔡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证实，网络上流传的那段讲话的确是她说出的，实际上那天的讲话共两段，另一段 9 分钟的音频传到网上后很快丢掉了。蔡霞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自己无意留在中共这个“黑帮”，很高兴被中共开除。她还表示，中共党内普遍希望撤换习近平，但众人敢怒不敢言。在被开除党籍剥夺退休待遇后，蔡霞得到许多人以邮件、电话的形式对她表示支持，令她非常感动，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2020年11月3日，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上席研究员藤和彦针对中共19届五中全会撰述评论，指出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难题，并且提及网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危机感”、“习近平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受到内外批评，党内的权力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习近平是引导中国崩溃的总加速师”等。

中共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习近平向全球防毒、输出邪恶，在世界的追讨声中，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在2019年11月的报告建议，美国不应该再称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国家主席”，避免外界以为其为民选领袖，应该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职衔“总书记”称呼他。

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索罗斯2021年8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署名文章“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威胁着中国”中说，“习近平绝对是全世界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

2021年1月7日，郭文贵在盖特直播中说：“我再想说一遍，爆料革命，灭共事业，从来没指望美国，也没指望任何人，以美灭共，以共灭共，它是我们的手段，是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但绝对不是我们百分之百的依靠，更不是我们全部的力量。灭共没你不行，灭共靠我们自己中国人。中国人不要再依靠任何人啦。”

“共产党，你完球蛋了！”郭文贵常常以这句话结束他的直播。

2020年6月4日，郭文贵在自由女神像前咬破手指签下血书，上天也以闪电作为回应订立契约。但从上天的角度来看，新中国联邦也许仍未做好接管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准备。

战友“自由心声”说，三亿多人的美国，二百多年的民主进程，被树为民主与自由的灯塔。民主和法治深入普通善良而正义美国人的骨髓，大多数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个人素质普遍较高。拥有十四亿人口、受中共洗脑教育多年的中国，如果照搬美国的民主与法制，注定水土不服。因此，是否设计好符合中国国情、吸收世界经验且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决定中国能否平稳过渡的关键。否则，十四亿人的国度一旦出现混乱，对全世界都是一场巨大灾难。所以，上天给出更多的时间，让更多中国人觉醒，或许是对新中国联邦最好的安排。

山顶闲人2022年1月1月参与郭文贵的直播中说：“2022年注定不会是人类历史上平凡的一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中共国粮食危机，全球排华风暴，世界疫苗灾年和史诗级经济都将携手来袭，虽然未来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是本人坚信各位战友在七哥带领下，爆料革命将“让领导先走”成为现实，ccp寿终就寝就在不远的明天。在新年来临之际，祝各位战友在通往喜马拉雅的道路上都能越走越坚定，越走越顺利。祝新中国联邦像盘古一样开天辟地，创千秋之伟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该决议称：“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决议总结了中共百年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决议最后总结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评说：土匪帮治国一百年，红魔乱舞，罪恶滔天，人神共愤。今日中共总结其“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其一贯构造的“假大空”宣传体系，极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之能，其理论水平之高，举世无双。

中共八股文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独裁统治。中共承认自己是独裁政权，只不过用了另外一种说辞而已，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独裁者，人人得以诛之！

中共百年，习近平说，“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五千年历史，出现过无数个辉煌的时代和峥嵘的岁月，中华民族真正立于世界之巅。共产党这一百年，制造了数以亿计的枉死冤案，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百年？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也不会作出如此混球蛋的评价！

共产先驱高举红色血旗，迷惑和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以亿万人的性命代价，成就了其窃国大盗的“伟业”，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独裁政权。一百年后，中国人才幡然醒悟，原来“我们被骗了！”

共产党最害怕真相；它见光即死，在阳光之下，它的罪恶无所遁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死死地管控新闻媒介和建造防火墙的缘故。

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毁灭甚于十次日本侵华战争，超过百次“阿房宫”烧杀。“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中共当政短短几十年，就把神传文化消灭殆尽，把百家争鸣赶尽杀绝！“蜉蝣的羽啊，像穿着衣裳鲜明楚楚。心里的忧伤啊，不知哪里是我的归处？”

邓小平改革开放，让饥饿的中国人有口饭吃，确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撇开积极的一面不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大权贵家族垄断主要行业、控制国家财富，并存在大量“裸官”，许多中央高层的子女或亲属移民并把资产转移海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的是共产党权贵的家庭而已。而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差别大、城乡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教育文化事业、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道德全面堕落，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和国民党剿匪时，中共反说蒋是“匪”；今天全国人民说“共匪”之时，中共又说老百姓是“匪”。入WTO，中共是小偷；扩南海诸岛，中共是强盗；BGY、红黄蓝、活摘，中共是罪犯。毒疫苗、毒奶粉、雾霾、泛亚、e-租宝、P2P等，那个庞氏骗局不记录着中共的罪孽？究竟谁是匪帮？

这个决议报告还评价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是盗国贼、卖国贼；是匪首。这将是历史给予他们的最中肯的评价。共匪为了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独裁，让土匪帮永葆红色血脉，永远凌驾于人民之上，奴役广大劳动者，灭佛、灭教、灭祖宗。妄言依法治国，依的是哪门子的恶法？！现在的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没有人敢自由说话；多少人想要挖中共的祖坟，习近平知道吗？香港百年自由、东方明珠，一年不到就被你全毁灭；台湾两千万人民支持了你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没有惹你害你，你现在却要全灭了人家，“留岛不留人”，中共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还要到全世界到处放毒，输出独裁理念，妄言正义。去你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不忘初心”，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习近平的心想歪了，路走歪了，机关算尽，新时代的“梁家河思想”还是免不了被“拉清单”的结局。不想再提中共如何以贪腐治国。中共高官之子女无一不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或接受教育。习近平的弟弟拿的是澳大利亚护照，女儿在哈佛学习“民主自由”。不是他们不可以，而是中共要求中国人民“爱国爱党”，骗谁呢？

中共的初心是邪恶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垃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更是垃圾，一定是9千万中共党员的共识。共匪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却到处拿来骗人了！所以，中共永远是以谎言治国。

这个百年决议报告以共匪一贯的斗争思想，多次提出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其实就是承认匪帮内部你死我活的不停内斗。这是全世界最腐败的政党，无数个小贪官被打倒了，还有无数个大贪官坐在台上。这就是共匪帮的众生相。根据共匪自己的中纪委公布的信息，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和孙政才，以及已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2021年6月10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透露自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以来，中国全国有12576名干警向纪委监委投案自首。很明显，就是一群土匪强盗在治理着中国。

高智晟说，“今天我要是败了，就再没人会相信天理了！所以掌握天理的人祂不会袖手旁观！所以神在和我们并肩作战！”中共善于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中共国判处为正义而战的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高智晟为民除害不是罪！这个邪恶的独裁政权，人人得以诛之，必须要颠覆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举牌“我们都是杨佳！”都是来给中共送丧的。

在中共独裁下，“民为重君为轻”这样的治国理念早已灰飞烟灭，“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警戒思想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通商宽衣（农）”的人肉包子铺和赤裸裸的杀戮！过去，自私懦弱的中国人对他人的悲惨遭遇漠不关心，如今他们一个个都尝到了中共独裁铁拳落在自己身上的滋味。

中共深谙商鞅的驭民五术，一直是以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来维护专制。在中共治下，有无数个小悦悦、杨改兰、锁链女... ..草泥马！去你大爷的！我们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这些都是中共的谎言。中共这艘破船早已千疮百孔，就要沉没了，但几百个红色恶家族垄断了全国人民的财富，还梦想千秋万代，让亿万人民继续为他们的邪恶埋单。中共马列子孙们在真相暴露后，日日噩梦，知道有无数的冤魂野鬼来找他们索命！他们在末日之时，必然会更加的疯狂。

中共的数据显示，中国有7000万人确诊中共新冠病毒和1370万“冠状病毒相关性死亡”案例，但该数据都不包括在全球五亿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数和600万死亡人数之中。而在此人类的大灾难中，习近平家族却试图通过病毒、疫苗和核酸检测来发国难财。在习近平治下，中共暴行远超纳粹，中共末日之疯狂远超纳粹。

双手沾满“六四”死难者鲜血的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在2005年一次内部讲话中承认共产党和德国纳粹有共同之处，“都认为自己的种族最优越，都有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而有复仇心理，都有崇拜自己权威的传统，都感到生存空间严重不足，都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都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迟浩田说，“德国纳粹是中共学习的榜样，希特勒在教育、宣传、新闻方面做得很有成效。”

迟浩田讲到，“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两个最根本的传家宝：无神论和大一统。这两个法宝决定我们比西方国家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如果让西方的有神论到中国来把我们掏空，还会有谁能老老实实地听我们话、跟我们走？如果我们教徒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里去领导上帝，我们党还能领导中国吗！”

迟浩田宣称，“我们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死到一起。我看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捆绑，就是我们党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共产党完了，中国就完了，世界就完了。”

在这次讲话中，迟浩田还讲到使用生化武器。他说：“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但是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被困死在这现有国土上发生社会大崩溃，根据“黄祸”作者的计算，中国人要死掉一大半，八亿多人口！我们这片黄土地在解放初时承载了近五亿人口，现在的公开人口就超过十三亿，这片黄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说不定到哪一天，说崩溃就崩溃，人口死掉一大半。”

这真是“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像迟浩田这样泯灭人性的中共狂徒，真是满脑子装的大粪。他说：“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迟浩田不但要中国人民与匪帮陪葬，而且要世界人民与其陪葬；如此邪恶的中共国防部长，他早就该自取灭亡了！

有人认为，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我们要告诉世人、警醒世人，让世人知道中共的狼子野心。同时我们也告诉中共：“不要异想天开了，中美开

战的那一天，一定就是中共被消灭的那一天。阅兵是虚张声势，航空母舰和核武器也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人心让子弹飞向何方。中国的导弹点火发射，当它们掉下来时，落地开花的一定不是太平洋对岸，而是北京中南坑，信不？！”

尽管共匪用尽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装饰、宇宙间最高尚的言辞，但是中共再也骗不下去了。习近平就是穿了皇帝新装的小丑。现在被小孩子点破了，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全世界都在鄙视他、耻笑他、在操他娘！

中国人传统是讲孝道的；中国领导人中却也有许多“孝子”，包括习近平。在当政期间，在陕西老家为其父亲习仲勋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坟墓。但作为一邦之主，侍奉好你的人民，让社会讲正气，人人树立积极向上之心，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力，才是君子的至孝。尧舜之有天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中共哪里有这样的心志和胸怀呢？

中共治下的中国，民怨沸腾，官不聊生，黑白颠倒，老祖宗创造的智慧用语全可以反用在习近平的身上：自相矛盾、痴人说梦、掩耳盗铃、指鹿为马、自欺欺人、黔驴技穷等等。还妄图篡改圣人经典，做欺师灭祖的勾当，真是大不孝啊！

为了彰显中国人的孝道，佛陀上了忉利天为母说法，让地藏菩萨的教戒来警醒世人如何行孝道。单单是习近平试图篡改圣经、毁谤三宝，让共产党的血旗从少林古寺升起，他可知道有何报应？

佛陀说，“若有众生毁谤三宝，不敬尊经，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何为无间地狱？地藏菩萨说，“在大铁围山之内，大地狱有一十八所。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驰逐，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获报如是。又诸罪人备受众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复铜爪拖拽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抛空翻接或置床上。复有铁鹰啖罪人目，复有铁蛇缴罪人颈，百肢节内悉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锉斩，洋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业感如是，动经亿劫求出无期。”

中共疯狂暴政已经招致天象警示，大灾大难必定降临。在遥远的他乡，我常常对着故土的方向眺望天空。借问苍天，中国的水，中国的土地，中国的空气，还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荷塘的月色”，有几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荡起双桨，让微风推开波浪”！

习包子的“中国梦”，白日梦。挑战美国，与世界为敌，还撸起袖子加油干，自己作死！想学王阳明“知行合一”，想学《国语》“轻关易道，通

商宽衣（农）”，继续做梦吧。如果鲁迅还活着，一定会站起来，扇他几个大耳光。还想来一个百年吗？来个全国人人投票，问问中国十亿百姓答应不答应！？

包子乱国，其最大的历史罪孽之一是在国人渐渐弱化马克思主义邪教的时候再一次用强迫性的高压手段给中国人打了马列邪毒的加强针，此举必将再祸害中华民族几代人之久。“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孝，但在中共高压下躺平的韭菜们已经连生育的欲望都没有了。有网友抗拒中共的多胎生育政策说：“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给的苦难到我为止”。深受其害的“国人已经出离愤怒了；他们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对中共政权绝望的国人已经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这样彻底的宣言。中国人渴望中共暴政必须马上结束，解体中共，刻不容缓，不能再等了，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给邪灵作恶的机会了，这场世纪大悲剧该收场了！

进入 2022 年，灭共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今日我们回顾中共的百年历史，不是为了质疑，也不是为了引起讨论，而是中共邪党罪恶滔天，证据确凿，应该直接交给全民审判，将中共独裁政权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是人心所向、时代所需。我们不是为了灭共而反共，而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因此了解历史真相，思想自由地去分辨好坏，从而选择属于自己的更好未来。

虽然天下已经疯乱，中国在期待一个大赦天下的时代，因为历史应有宽恕之精神，亦有包容之胸怀。周朝八百国，仍是大中华。中国需要有一场关于真相和国家前途的全国大讨论。中华大地，从农村到城市，从乡镇县市长到国家领导人，必须由公民选举产生，重大事件必须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目前，在中共高层，李克强的履历是相对比较干净的。在神州大地，不管党内党外，无论是李克强还是曾庆红等，只要能放下屠刀，振臂一呼，结束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实现一人一票民选，开放党禁、报禁和互联网，尊重人权和人性尊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道路的，不管是统一，还是邦国自治，我们都应该既往不咎，欢迎拥护，并给予支持。这是我的白日梦。

这正是：百年红朝梦，都付笑谈中。日月少光泽，山河尽悲歌。多少荒唐事，今日皆成空。良辰美景虽有时，落红花影犹浓。春去秋来伤怀日，我在梦中歌！全剧终。

2022 年春夏之交 于澳大利亚悉尼市

看完本书后，请您把书转送给下一位读者。欢迎翻印传播，功德无量！

作者小传：原名冯英雄，笔名三英、莲龙居士、Cloudy Seagail 等。

1979-1985 广东恩平第一中学

1985-1989 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989-1992 广东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1992-1997 广东省中旅社/澳门中旅社外国人接待部

1998-1999 人民日报社大地编委会

2000-2003 广州电视台新闻部

2003- 移民澳大利亚

其他作品：《唐代佛教史》、《楞严摸象记》、《金刚经演义》、
《六祖坛经述旨疏钞》、《心的力量》、《大方广佛华严经义解》、
《楞伽经浅释》、《西方极乐世界的味道》、《道德经释义》、
《论语广义》、《中国佛教百年回顾》、《历史公义信仰偏见》、
《佛法的修行》、《健康从心开始》、《实用中医临证解要》、
《佛陀一生的启示》

英文作品：《Communism is dying》、《Knocks at the door of life》
《Viewpoints》

